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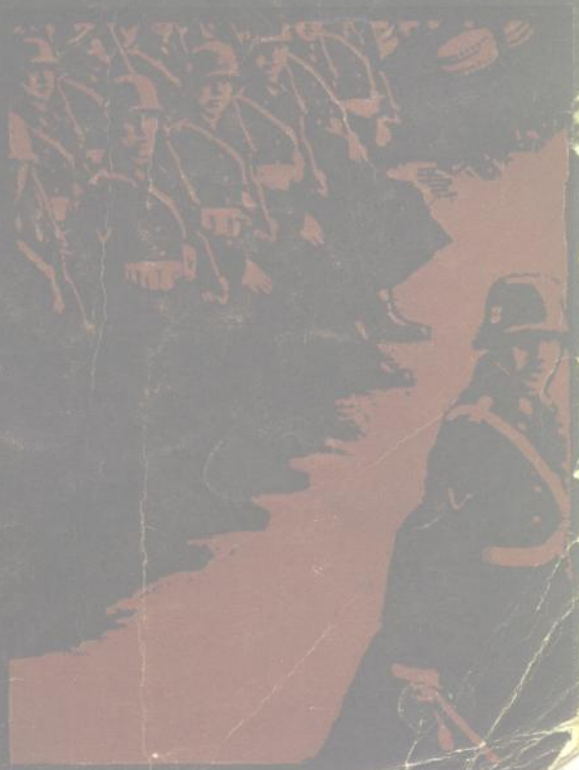
〔联邦德国〕 海因茨·赫内著

# 党卫队

——佩鞞髅标志集团

Heinz Höhne  
Der Orden  
unter dem  
Totenkopf

Die Geschichte der SS



商务印书馆

# 党 卫 队

## 佩 黼 黻 标 志 集 团

〔联邦德国〕海因茨·赫内著

江 南 杨 西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年·北京

*Heinz Höhne*  
**ORDEN UNTER DEM TOTENKOPF  
DIE GESCHICHTE DER SS**

根据联邦德国慕尼黑C.贝特尔斯曼出版社1967年版本翻译

DǎNGWÈIDUÌ  
PÈI DÚLÓUBIÀOZHÌ DE JÍTUÁN

**党卫队**

**佩雷髅标志集团**

〔联邦德国〕海因茨·赫内著

江南 杨西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排版

统一书号：11017·631

---

1984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542千

印数 35,200册

印张 22 5/8

定价：2.80 元

## 中译本前言

1945年4月，在硝烟弥漫的德国本土上，第三帝国已经摇摇欲坠，濒于毁灭。4月下旬，党卫队头子希姆莱背着正在总理府邸地下室负隅顽抗的希特勒，企图单独与英、美洽降，未遂。几天后，希特勒死了。5月20日，希姆莱带着几名亲信畏罪潜逃，穿过荷尔斯泰因，渡过易北河，终被英军俘获，不久即怯懦自杀。尽管还有数以百计的党卫队大小头目外逃，乔装打扮，改名换姓，流窜于欧美各地，但是在战后，埋葬着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尸骨的大地时刻发出复仇之声，幸存的人们始终密切注视着这批逃犯的动向，跟踪追缉。1960年，躲藏在阿根廷的前党卫队头目、灭犹逃犯艾希曼被绑架送交以色列审判，被处以绞刑；1983年，前纳粹德国驻里昂的党卫队头目、杀人犯巴比被玻利维亚驱逐出境，押解到法国受审。诸如这类逃犯，迄今仍在追捕通缉中。风腥雨血的岁月已经过去，但人民对党卫队犯下的滔天罪行依然切齿痛恨，不会淡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面镜子。

党卫队是以希特勒为头子的纳粹党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最庞大、最凶恶的执行工具。希特勒在1923年发动十一月政变（即“啤酒店暴动”）失败后，纳粹党及其格斗组织——冲锋队被取缔，自己身陷囹圄，但于1924年年底即被提前释放。他出狱不久，继续纠集死党头目重新建党，但与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在重建冲锋队问题上发生分歧，乃于1925年决定另立纳粹党格斗组织——党卫队，使之逐步发展为党内与冲锋队相对立的集团，从而形成纳粹党内后来的激烈内讧。



党卫队先是纳粹主义的“中坚”组织，后为纳粹主义的恐怖集团，由1923年以来的“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和“本部警卫队”拼凑而成。最初的任务是保卫纳粹党及其党魁希特勒的人身安全，人数仅达二百八十人左右。从1929年起，这支党的警察部队由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领导。其成员只听命于希特勒一人，持有亚利安人出身证，身穿黑色制服，佩戴骷髅标志。这支队伍名义上隶属冲锋队全国领袖，但实际上，早在1930年年底，希特勒已批准它“独立于冲锋队之外”。（第57页）随着纳粹党的崛起，党卫队的队伍及其任务不断扩大，分支机构骤增。希特勒上台后，党卫队和冲锋队头目之间的争夺趋于白热化。希特勒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1934年7月借口“罗姆暴动”，在希姆莱、戈林等人怂恿下，一举血洗冲锋队头目，剪除异己，使冲锋队从此一蹶不振，而党卫队却声威全国，其魔爪伸向各个领域，渗入党、政、财、文各部门。党卫队拥有四万五千名秘密警察官员，分布在全国二十个局和三十九个分局以及另外三百个边防警察中心站和八百五十个分站，监视着敌视政府的一切活动；它拥有三十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所率的六万五千名保安警察和二百八十万名风纪警察，保卫国家安全；它还有四万名看守人员在二十座集中营和附设的一百六十座劳动营残酷迫害几十万无辜的“犯人”和抵抗战士；随着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建立起来的九十五万人武装党卫队监视着武装部队的一举一动，在侵略战争中与武装部队并肩作战，敢于同它分庭抗礼，并且疯狂掠夺占领区，残杀无辜居民。由党卫队保安处十万名情报人员组成的影子部队，密切监视着国民的思想动向，象长着触手的水母，几乎控制着整个民族。

党卫队行踪诡秘，纪律森严，规定成员不得向外透露内部情况，遮盖严密，因此连戈林也不知其内情。他曾供称：“局外人是无法知晓希姆莱组织的任何情况的。”（第8页）直到1945年纳粹德

国覆灭后，这个黑色集团的帷幕才被揭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通过审判揭露了党卫队的凶恶面目和累累罪行，宣布它是犯罪组织。但在战后的联邦德国却出现了一股翻案逆流，一批被减刑释放的前党卫队头目先后抛出辩白书，企图把罪责推给已故的党卫队同伙，声称普通党卫队“与武装党卫队毫无关系”等等。但事实胜于雄辩，那些身受黑色集团残酷迫害而从死亡营中死里逃生的人们终于向全世界揭开了党卫队之谜。（第10页）有关党卫队史的著作、回忆录和专著，在战后的西方，汗牛充栋。遗憾的是，有些著作虚构情节，哗众取宠；也有的歪曲事实，为纳粹翻案；多数著作又缺乏史料，论证偏颇。尤其在法西斯专政和战火纷飞时期，无数史实并无文字记载，被保存的档案文件，有的被转移散失，也有的被销毁灭迹，致使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至今争论不休，立论无据。

本书作者海因茨·赫内，生于1926年，在1943年前，他还是中学生，1944年被纳粹军队征召入伍，不久即被美军俘虏。战后释放，他从事新闻和编辑工作至今，现任联邦德国《明镜》周刊编辑，长于德国现代史和谍报史研究，著有《卡纳里斯传》等。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欧美这类书籍中较好的一种。本书自1963年问世以来，备受西方史学界的重视和联邦德国史学界的称誉，已被译成各种世界通用语言的版本。作者治史态度较为严谨。他不仅批驳为纳粹翻案的言行，而且在许多已发表的有关党卫队史著作的综合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党卫队史，查阅和运用了大量已发表的和尚未公之于众的纳粹档案文献和第一手史料，夹叙夹议，抒发己见，着墨于揭露纳粹党内幕及其残暴罪行，深入细致地叙述了党卫队的兴衰过程，而且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广泛背景和重大事件，深刻揭示了纳粹党头目在政治、军事、外交、种族和对占领区控制等方面的战略决策及他们之间的倾轧争斗，同时也把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可耻下场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通过这一著作向世

界人民提供了极好的反面教材。它既是党卫队的罪行录，也是研究纳粹德国史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史书。

但是，应当指出，作者由于阶级局限，还是沿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评断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因而不可能揭示纳粹德国的阶级实质。在某些章节里，作者把民族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纳粹德国和社会主义苏联的政权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这对今日的中国广大读者来说，是不难识别的。本书同我国已经翻译出版的这类书籍相比，内容并不重复，对许多历史事实可以相互印证和补充，能够起到加深认识纳粹德国史的作用。

宋 钟 璜

1983年春节于北京

#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党卫队的建立	18
第三章	海因里希·希姆莱	35
第四章	从卫队到党的警察	62
第五章	取得政权	93
第六章	罗姆暴动	112
第七章	集团	157
第八章	海德里希和秘密警察	191
第九章	党卫队保安处	233
第十章	德国中央保安局	267
第十一章	党卫队与外交	305
第十二章	东方民族政策	344
第十三章	最后解决	379
第十四章	党卫队权力的盛衰	468
第十五章	武装党卫队	512
第十六章	党卫队和德国人的抵抗	570
第十七章	结局	635
人名索引		688

## 第一章 导言

7

他们身穿黑色制服，使整个民族毛骨悚然。他们头戴佩有骷髅标志的帽子，向领袖宣誓忠贞不贰。他们跟从希特勒<sup>①</sup>，杀戮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整个民族的各个生命攸关的部门几乎都捏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指挥警察和秘密情报机构，他们警卫总理府，看守集中营，装备起一师师佩戴骷髅标志的队伍，开赴欧洲各地。他们占据农业、卫生、民政和科学领域的要害部门，他们渗入外交部门的传统据点，把持着政府各部门的关键岗位。

他们自称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sup>②</sup>的卫队，简称SS（党卫队）。正如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迪特尔·维斯利歇尼所说，他们感到自己“是一种新型的教派，有着独特的组织形式和习俗”。

党卫队这个秘密宗派，不让任何人了解它的组织内幕。领袖专政的卫队，应当保持它的神秘性，使国民有如面对诡秘的耶稣会<sup>③</sup>一样，对它望而生畏和不可捉摸；党卫队名义上反对耶稣会，但事无巨细又都以它为楷模。黑色秘密集团<sup>④</sup>的先生们有意保持

---

① 希特勒 Schutzzstaffel（党卫队）的两个缩写字母SS，党卫队以此作为它们的符号。——译者

② 简称纳粹党。——译者

③ 一名“耶稣连队”。天主教教会之一。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为天主教会反对该运动的主要集团。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1540年经罗马教皇三世批准。它仿效军队编制组成，有森严的纪律，会士必须服从会长，强调会士绝对效忠教皇，它以宗教名义于各国政界扩张其势力。——译者

④ Orden 一词，德文原意是：受一定教规和誓言约束的宗教团体。这里喻党卫队成员狂热信仰法西斯主义，绝对服从希特勒，遵守严密纪律，其程度类似这样性质的宗教团体。故译为“集团”，下同。——译者

其存在的恐怖效果。“国家秘密警察、刑事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被蒙上一层叫人窃窃私语和悄悄谈论的政治侦探小说式的神秘色彩”，党卫队副总指挥、保安警察处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曾眉飞色舞地这样说过。这个集团的首领、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洋洋得意地宣称：“我知道，德国有些人看到这种黑色制服就感到不舒服，我们对此很理解，而且也不希望有太多的人喜欢我们。”

人民党察得到，这个令人谈虎色变的组织在全国撒下了一张网眼细密的罗网，但是他们却无法看到党卫队的这张罗网。德国人只听到黑色纵队在城市和乡村蹂躏着石砌路面的行军脚步声，还有成千上万男子汉的吼叫声：

党卫队在前进，道路畅通无阻！

突击纵队整装待命！

要去消灭专制，

开拓自由之路。

8

象我们父辈一样！

时刻准备作最后冲击！

死神是我们的战侣！

我们就是黑色的队伍。

成千上万只眼睛似乎暗中注视着德国人的一举一动。警察蛛网象长着许多触手的水母，让全国同胞喘不过气来；四万五千名秘密警察官员，在全国二十个局和三十九个分局以及另外三百个边防警察中心站和八百五十个分站的所谓触角点里，监视着敌视政府的一切活动。三十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率领着六万五千名保安警察和二百八十万名风纪警察，卫护着国家的安全。四万名看守人员在二十座集中营和附设的一百六十座劳动营里，恣意虐待

几十万所谓的或事实上的反抗政府的人。武装党卫队有九十五万人，其中三十一万是东南欧的德意志族人，二十万是外国人，他们同武装部队一起作战，并密切注视着军事对手的一举一动。由党卫队保安处(SD)十万名情报人员组成的影子部队，时刻监视着国民的思想。大学、工厂企业、农村、机关的任何点滴情况都被收集起来，上报柏林总部。

但是，有关党卫队各机构的工作方法不得向外透露只言片语，海因里希·希姆莱范围内所考虑的事情绝对不得泄露一星半点。希姆莱经常三令五申，该组织的成员不得与外界人士来往过密。他禁止党卫队领袖们与民众发生民事纠纷，以免法院洞悉党卫队内幕。他还拒绝向中央经济部提供有关党卫队系统所属工厂企业的情况。他命令看守集中营的鬍鬚队人员：“第一，任何部队不得去自己的家乡，也就是说，波美拉尼亚人的突击队不得在波美拉尼亚<sup>①</sup>执行任务；第二，所有部队均隔三个月换防一次；第三，部队人员不得单独在街头执勤。”即使第三帝国的烜赫领袖们也不了解这个黑衣教派的内情。赫尔曼·戈林在1945年供认说：“我不了解党卫队的内情，……局外人是无法知晓希姆莱组织的任何情况的。”

只是在褐色众神末日来临后<sup>②</sup>，才撕破了这个黑衣集团王国的帷幕：那些多年来指挥党卫队的人物，出现在四个同盟战胜国主持的纽伦堡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被指控犯下了准备战争和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滔天罪行。

盟国军事法庭的审讯记录，揭示了过去为党卫队组织的帷幕所严密遮蔽着的情况。证人的陈述和提出指控的证据，使人们看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种族狂的图景，勾划出党卫队作为民族生物<sup>9</sup>

① 波美拉尼亚，旧时普鲁士北部的一个省。——译者

② 指1945年4月，德国法西斯政权崩溃。希特勒这批纳粹凶神恶煞，自杀的自杀，被俘的被俘，以及被押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到历史审判。——译者

学上洁净而患有变态心理病狂人的一部骇人听闻的历史。这种恐怖所造成的恶果是：四、五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二百五十万波兰人被消灭，五十二万吉卜赛人被杀害，四十七万三千名俄国战俘被处死，十万名痼疾难治的病人根据无苦致死术的计划被毒气结束了生命。

1946年9月30日，盟国法官宣判希姆莱的党卫队是一个罪行累累的组织，其理由为：“党卫队的所作所为都是服从于犯罪的目的，即它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在集中营里恣睢暴戾，杀人如麻，插手对占领区的统治，执行强迫劳动的计划，以及虐待和杀害战俘。”结论是：所有“被正式吸收加入过党卫队……曾经是或一直是该组织的成员，并且知道自己系被用于从事进行按〔伦敦战争罪行条例〕第六条所解释为犯罪”活动的人，俱属涉嫌犯罪之列。

纽伦堡的判决给党卫队的标志烙上了政治罪犯的该隐<sup>①</sup>印记，从此这种印记就和每一个曾经穿过这个黑色集团的制服的人相联在一起。当年的所谓精华荟萃之所的党卫队，变成了“被褫夺公民权利者的大军”，党卫队将军菲立克斯·施坦因纳无限感伤地说道。毋庸置疑，盟国的判决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它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一百多万人竟会集体地、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屠杀群众的刽子手；它没有解释，党卫队何以有那么大的权力，将纳粹政权的种族狂变为骇人听闻的行动。

前党卫队队员是不想而且也无法揭开这个谜的。他们声称什么也不了解，经常把责任推给那些已离开人世的同伙，尽量为自己开脱，不想追根究底。最初还有一些人，如党卫队三等突击队中队长埃里希·克恩迈尔，又姓克恩的人，在他所著的《酩酊大醉》一书中所做的那样，壮着胆子向公众作一种羞羞答答的自我批评。

---

① 典出《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四章。亚当之子，杀害其弟。——译者



但是，不久在联邦德国翻案思潮的庇护下，出现了一批前党卫队头目的辩白书。这些头目耽于一般经验，以为同时代的人可能是健忘者。武装党卫队的头头、总指挥豪塞尔，在纽伦堡的法庭上几乎记不起曾经见到“与军队格格不入的”希姆莱到部队里来过。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布里尔感到，普通党卫队“只是一个自愿参加的团体”，与武装党卫队毫无关系。而且，有些党卫队员一再强调：“从未进行过种族仇恨的教育。”

这时，从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毒气室的死亡烟雾中，从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已被砸烂的刑场里，爬出来一批形容枯槁的精灵，这些黑色恐怖下的幸存者向整个民族揭开了党卫队之谜。<sup>10</sup>

他们说：党卫队是一个由狂热的空想家和伤天害理的统治者所组成、受一种魔鬼般意志所驱使、铁板一块的组织。党卫队逐渐攫取了第三帝国的一切权柄，以便建立如同当年布痕瓦尔德囚犯、今达姆斯塔特政治学院政治学教授欧根·科贡所想象的“党卫队之国”，即由党卫队“彻底组织起来的、在一切部门和任何时刻都能调动指挥的统治体系和奴役制度”。分析家科贡在他那本畅销书《党卫队之国》中，把黑色组织的头目描绘为一个行动一致的集团，它“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循序渐进地按部就班地策划，以完全超乎正常想象力的残酷无情，心狠手辣地致力于实现每一个具体目标。”科贡接着说：唯其如此，才“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德国，继而在欧洲”，形成了党卫队之国的“完整机构”。换言之，集中营是党卫队之国的“模式”；党卫队是阿道夫·希特勒在欧洲的真正统治者。

欧根·科贡提出了一种粗略的论断，看来是首次对党卫队这个怪物进行了明白易懂的剖析。1948年，党卫队领袖奥托·奥伦道夫在死囚房里甚至这样写道：“我们必须认真注意一个名叫科贡的人。”如果说，这位教授在这本书里还稍有保留，调子略微持平的

话，那么其他学者所描绘的则是万能和独裁的一幅巨帙而阴暗的油画。

英国历史学家吉拉德·莱特林格把希姆莱的帝国评价为“只有俄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才能与其相比拟的国中之国”。艾希曼的传记作者库默·克拉克看到了党卫队“使纳粹暴政的阴影几乎笼罩着欧洲大陆上的家家户户”。法国作家约瑟夫·凯塞尔发现整个欧洲都处在党卫队铁蹄之下：“从北冰洋到地中海，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和高加索，人人都俯伏在他〔希姆莱〕脚下。”

但是，国内外的编年史作者把党卫队的权力说得愈大，党卫队人物画像的色调也就愈不协调，黑色主宰民族的面貌也就愈加走样。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囚徒，今天《德意志周报》的发行人鲁道夫·佩歇尔发现：“党卫队队员的眼睛具有一些共同之处，都带着冷酷的凶焰和那种缺乏精神生活的呆滞神色。”他认为，“从眼神就可以识别出”一个保安处的密探来。科贡发现党卫队员都是“深怀不满，一事无成，由于某种原因而郁郁不得志的人，而且都是些形形色色的低能儿”。在秘密警察下层官员中，他看到“充斥着新近集结起来的破落户”；他认为，保安处情报人员是“社会各方面渣滓的大杂烩，他们是贵族、资产阶级、职员、工人中的败类”。

11 如果说，贬义词的说服力渐次减弱，那么研究党卫队之国的理论家就乞灵于现代精神分析法的符咒。当年奥斯维辛的犯人埃利艾·科恩讲课时说：“党卫队员，撇开例外的情况不谈，都是些正常的人，他们由于罪恶的超我思想而成为通常的罪犯。”心理学家莱奥·亚历山大甚至把党卫队说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歹徒组织，他们的行为和犯罪集团通常所干的勾当一样。亚历山大说：“一个党卫队的成员，只要做一点涉嫌不忠于他们组织的事情，那他就会遭到收拾——处死——，要不就必须进行一次犯罪活动，从而无可抗拒地把自己永远和这个组织紧紧相连。按照罪犯集团的古老惯

例，这样的活动也包括杀人。”

但是，科贡学派的理论并不是不容争辩的。早在1954年，德裔美籍新闻记者卡尔·O·佩特尔就在一篇社会学论著中表示怀疑，是否可以一古脑儿地对党卫队贬低评价。佩特尔的看法是，党卫队的成员“不是清一色”，而是“既有罪犯，也有理想主义者，既有笨蛋，也有博学多才的人士”。副博士埃蒙希尔德·诺伊聚斯-洪克尔在她1956年发表的《党卫队》一书中说过，希姆莱机器许多结构的职能各不相同，因而不能“对所有党卫队成员不加区别地作一概而论的明确评断”。根据这位女专家作出的估计，党卫队全体成员中最多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参与了纳粹政权统治机构的活动：在1944年登记在册的八十万名党卫队成员中，有三万九千四百十五名在党卫队中央处局机关供职，二万六千名参加了所谓警察加强部队，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名在国外德占区保安警察部队和保安处里服役，近六万名任国内保安警察和风纪警察，以及二千名为集中营看守人员。

此外，在此期间盟国重新开放了党卫队的案卷，研究的结果是，要求对战后勾画的党卫队图象进一步加以匡正。首先是科贡那本著作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档案说明，就科贡所提到的日期、数字和人物而言，凡不是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接经历范围内得来的，这位教授述及的材料就是极其不可靠的。人们对这位达姆施塔特的政治学家每次重版他的著作不得不进行修改一事，引起了注意：

刑事警察处长阿图尔·奈比由“党卫队机构的最不出名、但却最残忍的干部之一”（初版），变成了一个“一开始就经受内心矛盾”（第二版）的抵抗分子，那些凭空臆想出来的战争年代中的各大区保安处（初版）又重新消失不见。同样，科贡还对他的假定，即“第五纵队”这个引人注目的字眼源出于保安处五处（虚构的）名称的

12 这种说法，作出了修正。但是科贡一书的后来几版也提出问题：教授的有些介绍是否还符合现有研究情况。科贡谈到保安处的一种五级干部体系，竟没有一个保安处的人员了解。他让“罗姆的复仇者”谋杀了一百五十五名党卫队领袖，可是没有一张死者名单上提到过这些人。他肯定国家秘密警察处 I 处没有自己的处长，而显然不知道这个处长就是瓦尔纳·贝斯特博士。科贡把 1936 年党卫队武装部队的人数比实有人数（约一万五千人）多说了十九万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波尔被说成是党卫队中央主管处局头目，并显然把武装党卫队司令部，即作战指挥部，当作整个党卫队的一种政治中心。

然而奇怪的是，不管专业历史学家们如何迅速地修改党卫队的流行图像——德国人对此几乎还是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有使一个民族自我辩白遭到粉碎的危险：万能的党卫队专断独行。

有关党卫队大量罪行的揭露，使德国人既大吃一惊，又松了一口气。大吃一惊的是，这些罪行使祖国的名字在世界上几十年地蒙受玷污；而所以会感到松了一口气，则是有关黑色集团恐怖政权的知识，至少给老一代从过去无法驾驭的历史中展示了一条狭窄的出路。如果党卫队真正是万能——这一点还可以争论——的话，如果他们确实是未遇上任何竞争者，就把这个国家掌握在自己的铁掌之中，那么对第三帝国的公民来说，抨击这个政策的政策，或者甚至积极地反对这个纳粹国家的罪行，就确实等于是自寻短见了。

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对揭露党卫队的罪行，并不是不欢迎的：恐怖就是最好的托词，可以自我开脱和获得世界舆论的谅解。看来希姆莱的剑子手军团命中注定了对第三帝国许多德国人拒绝同流合污的意义估计不足。还在 1946 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辩

护士拉特恩泽尔就在纽伦堡提出口号说，党卫队领袖反正是死定了，因此他们必须把一切承担下来——而武装部队这块招牌则必须保持干净。后来美国公布的材料披露，希姆莱也曾有一段时间与1944年7月20日的密谋分子眉来眼去，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费尔斯就请求德国同事们注意，不要对这个题目“过分重视”：“事实上德国地下运动史中不存在‘希姆莱’这一章！”

党卫队这个题目对于广大的德国历史学家来说仍然是一块禁区。没有任何一本有关党卫队的著作，没有任何一本论述希姆莱东方政策比较有分量的作品，没有一本研究纳粹警察机构的著作，透露出朗克和特莱希克的后继者们对德国人创立的这个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组织的想法。德国历史学家将这块园地放手让外国人来开辟，他们或多或少地凭着直觉，或多或少地凭着考证学的专门知识，以党卫队为中心着手重写德国现代史。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有一些例如美国人劳尔·希尔伯格写的《消灭欧洲犹太人》(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和他的同胞亚历山大·达林写的《俄国土地上的德国统治》，证明都是具有水平的著作。但是由德国著名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作品中，大部分无助于以较为具体的描述来取代那些对党卫队的不正确想象，而且大多数作家也缺乏比较精确的原始资料。 13

法国作家雅克·德拉律写了一本《秘密警察史》，却没有翻阅过有关这个题材的最重要的资料，即党卫队全国领袖本部的人事档案。另一位秘密警察编年史作者、英国新闻记者爱德华·克兰克肖连秘密警察和特别行动队的职权也难以区别清楚。十卷集《德国军事力量史》的作者法国人伯努瓦·梅尚甚至表明，仅仅引用几篇希特勒的演说和过去报纸上的片言只语，就可以写出罗姆事件的始末。结果当然是十分糟糕。作者只是证实了纳粹分子的一贯说法。

谁要是如此轻率地撰写现代史，那么他也就必须听任专家们指出他作品中的某些错误。英国人莱特林格（《党卫队》、《最后解决》的作者）提出一个论点，说犹太人出身的海德里希出于“对自己犹太血统的憎恨”，伙同另一些党卫队非亚利安人将犹太人斩尽杀绝，——作者显然不知道，纳粹种族局 1932 年 6 月 22 日的鉴定已确认海德里希是“亚利安人出身”。莱特林格竟然还介绍海德里希生平的其他细节：波罗的海地区情报军官、卡纳里斯“上尉”的同事，波罗的海舰队情报机关头目，纳粹党区领袖科赫的宠儿，科赫老婆的情人，——没有一桩跟事实相符。

缺乏根据的凭空臆想是什么都能虚构的。描述近东旅行者阿道夫·艾希曼 1937 年短暂海法之行的三个作者就说明了这一点。美国人昆廷·雷诺兹（《死亡部长》一书的作者）让艾希曼参观了海法附近的一个犹太人的集体农业社，在巴勒斯坦同一个德国间谍碰头，并访问了耶路撒冷的敌视犹太人的大穆夫提<sup>①</sup>。艾希曼的传记作者库默·克拉克向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情节：他使自己书中的主人公拥有五万美元的“纳粹黄金”，让他住进海法的“默杰斯蒂克”饭店，艾希曼在那里等待“一个名叫加达尔的神秘人物”的电话。艾希曼将黄金交付给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不久就被四名英国军事警察送出国境。奥地利人西蒙·维森塔尔在他的《大穆夫提——轴心国的大间谍》一书中写道，早先攻读神学的艾希曼被德国“反间谍组织”派往巴勒斯坦，在萨罗纳城附近布下间谍网，并“同德国负责近东地区的大女间谍伊尔西·科赫在一起”，跟大穆夫提挂上了钩。所写纯属子虚，只有旅行者艾希曼在海法观光了四十八小时一事是事实。

如果不是 1961 年耶路撒冷法庭对艾希曼进行了审讯，以及随

<sup>①</sup> 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他有权依据伊斯兰教经典解释和决定有关教法问题。现在阿拉伯的一些国家，仍设此职。——译者

后联邦德国对党卫队刽子手和办公室犯罪者<sup>①</sup>起诉的浪潮，唤起和增强了德语地区现代史作家们对于党卫队关注的话，这种荒诞不经的描述还会吸引人们和广泛传播下去。

流亡在美国的女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作出了一个开端。她在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首次成功地赋予一个党卫队领袖以具有个性的、令人可信的面貌。同年，青年史学家恩诺·格奥尔格以党卫队的经济企业情况为例，说明了这些聚集在夕旗号下的人们的成分是多么复杂。不久，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通过汉斯·希赫海姆所著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纳粹之国的党卫队与警察》和两卷集《党卫队之国剖析》抨击了——象前言里所说的——“感情冲动地‘钻研历史’，为了突出描述一些重大事实的重要影响，而不特别严格注意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在维也纳出生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格奥尔格·H·施泰因也遥相呼应，用足够的科学根据撰写了第一部论述武装党卫队的著作。

美国教授施泰因总结说：“纽伦堡时代所提的罪恶阴谋与集体有罪的说法不能再使严谨的研究工作者感到满意了。新近的研究并没有低估希姆莱追随者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证明了党卫队成员的确比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席上那个铁板一块的犯罪组织，还要三教九流和错综复杂。”

诚然，研究人员的工作还只是处于开始阶段，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存在一个党卫队之国的假象，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还和卡尔·O·佩特尔一样，还相信第三帝国（至少在末期）是“根据阿道

---

<sup>①</sup> “办公室犯罪者”（Schreibentischtäter），见联邦德国1973年版的Brockhaus释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这个新词，特指在纳粹党、政、军等机关办公室中通过有关业务工作间接参与重大罪行活动的人，以别于在武装部队、秘密警察、集中营等直接从事迫害和屠杀活动的犯罪者。——译者

夫·希特勒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两双眼睛”行事的。许多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接受了一种错误的第三帝国的图样，以致不能很快摆脱为他们所喜爱的想法，即认为党卫队是纳粹专政中扮演了唯一举足轻重的和无可置辩的权力集团的角色。

15 人们想象第三帝国是一个“彻底组织起来的”(科贡语)极权主义国家，天衣无缝似地掌握了每个国民，并使其屈从于一个统一的中央意志。纳粹分子似乎实现了德国人的古老梦想：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只有一个意志，即领袖的意志；只有一种政治世界观，即纳粹党的世界观；只有一种维护秩序的权力，即党卫队-警察。

强国之梦终究是一种幻想。第三帝国并不是极权主义国家，倒确实是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幅讽刺画，一幅对纳粹领袖们曾经用以建立一个独裁国家所抱有的一切梦想、希望和理想的讽刺画。历史学家布赫海姆发现，这个极权主义的领袖国家“并不是一部经过精心构思的机器，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特权与政治关系、部门权力与全权的交错混杂，最终导致彼此争斗，当时曾美其名曰‘纳粹竞赛’”。布赫海姆的英国同事特雷弗-罗珀惊异地说：“过去的几年中，不知有多少人上当受骗相信了纳粹的宣传，错误地相信纳粹德国被组成了‘极权主义的’国家——变成了独一无二的整体，进行了全面动员，由中央集中掌握！然而事实上德国的极权主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在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极权只是希特勒的意志，他以所谓领袖谕示和领袖命令统治着八千万人民。只要领袖的意图有所表达和以命令的形式下达，作为领袖专政的最重要工具的党卫队也就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在党卫队的心目中，这个喜怒无常的领袖存在着一种缺陷：他要干什么事情，并不是件件都以命令形式公布周知的，领袖命令也不是达及国家的各个生活领域。由于不再召



开内阁会议，以及希特勒呆在领袖大本营里，与部长们日益疏远，因此领袖命令的内容往往是心血来潮的产物。

除此以外，希特勒的领导艺术之一是，在他的亲密同事之间经常变换政治权力中心，以防止出现他所不希望出现的对手。领袖专政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即决不允许出现任何足以限制希特勒行动自由的政治机构和法律机构。决定纳粹政权的，不是铁板一块似的一致，而是如同不得志的纳粹法学家汉斯·弗朗克所说的“全权的无政府状态”。希特勒不愿受到任何一种体系的束缚，因此他把任务委托给尽可能多的小体系去执行。使用一种主观直觉多于周密思考的手法加以操纵，以防范可能出现某一下属同竞争对手密谋反对希特勒的情况。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持续自我抑制”（汉娜·阿伦特语）的奇特 16 体系。让许多掌权人物去解决同样一项任务，以确保独裁者可以不受任何下手的掣肘。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却变成了争权夺利的战场，因而削弱了国家机器的效率，其程度更甚于为纳粹分子所厌恶的民主政体的党派之争。国家降低为一个非政治性的行政机构，成为一块虚有其名的招牌，以掩盖掌权的人物进行争权夺利的混战。后来成为 1944 年七月二十日事件的领导人之一乌里希·冯·哈塞尔曾大声疾呼道：“这些人根本就不懂得国家是怎么一回事！”

象奥托·奥仑道夫这样有才智的党卫队领袖也对希特勒感到恼火：“这样一幅奇特的景象，即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个极权的领袖国家，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形成了一种多中心的无政府状态。”1946 年奥仑道夫在纽伦堡供认：“领袖不仅否定了作为本身目的的国家，而且毁灭了形式上的国家，使它不再成为可供使用的工具。国家已为最高头目们的多中心专制所取代。”在这个“私人国家、私人军队、私人谍报机关的混乱局面中”（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语），党卫队谈不上具有垄断地位。只要没有接奉希特勒的旨意，

党卫队就降格为一个权力集团，退到那些在最高领导层之下争夺着最大的势力的集团行列里。

什么时候没有接奉希特勒的旨意，对党卫队来说，就不能拉希特勒的权威作虎皮，那希姆莱就不得不跟国家的其他头目商量办事。党卫队被迫在并非领袖命令明确阐明的不受法律限制的范围内行动。在这种范围内占上风，并不决定于谁是更虔诚的纳粹分子，而只取决于谁掌握的实力更强，谁的个人权势更大。纳粹党内多年的派系和政见之争已扩大到国家政权方面，这也是领袖的愿望——别人的明争暗斗确保了希特勒在党内和国家政权中的巩固地位。

象上几个世纪的封建诸侯一样，希特勒麾下的这些古波斯式的总督们相互结盟，相互争吵，然后又言归于好。他们彼此结成形式上的联盟：1936年保安警察局与谍报局达成一项十点协议，以“十诫”协议而载入史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接纳几名党卫队领袖进入外交部作为条件，换来了党卫队和外交部争斗的短暂平息；而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罗森堡则与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伯格路达成协议，以防止形式上归他领导的德国驻乌克兰专员科赫阴谋反对自己。

- 17 党卫队处身在这种权力斗争的荆棘丛中，不得不举步维艰地开展，因此它几乎没有时间和力量去攫取德国的独裁统治权。诚然，它夺得了又一个又一个的权力部门，但是它没有能够压倒两种力量：党和武装部队。它无可奈何地容忍党、劳工阵线和冲锋队逐猎保安处的秘密情报人员，它无可奈何地接受关于取缔保安处自编的《全国简报》的命令，无可奈何地眼睁睁看着驻波兰总督弗朗克在武装部队和冲锋队的一片喝采声中，运用手腕除掉在波兰的德国占领区的最强有力的人物、党卫队副总指挥克吕格尔。

尽管有越来越多穿党卫队制服的人出现在希特勒的贴身周

围——但是独裁者心怀疑虑，不让党卫队染指国家最关键的权力地位。希特勒让党卫队领袖们感到，他们只是他的当差。他挑剔地指责说，新德国的警察象旧德国的警察一样糟糕。当党卫队违背他的意志，干预德国的罗马尼亚政策时，希特勒咆哮地吼道：他将要再一次“消灭”这种“黑色疫病”。党卫队全国领袖被希特勒召见时，总是忐忑不安。希姆莱被他看作是一个勤奋的、但并无特殊天分的学徒，除此很少有别的看法。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让他作继承人。1945年3月，他说明了他的理由：因为党不欢迎希姆莱，还说这个人根本不懂得艺术。

毋庸置疑，在这场人人争夺、彼此反对的竞赛法则中，只有拥有较强实力的人才能与党卫队进行抗衡。但是，在希特勒的帝国里，犹太人是完全处于孤立无援、无人对他们伸出同情之手的群众。他们成了随时随地可以被抓去投入党卫队集中营和焚尸炉的牺牲品，执掌政权的头目们谁也不会为他们讲一句话。这儿，仅是在这儿与世隔绝的集中营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的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党卫队之国的带刺的铁丝网围栅。希姆莱集中营里的囚徒是地地道道的奴隶，他们听任摆布，无法逃脱厄运。可是灭绝犹太人的历史也记录了：有个别穿着褐色党员衬衫的人、老纳粹党员、党卫队的要员和第三帝国的盟友也曾阻挠过希姆莱的屠杀机器的运转。

例如驻白俄罗斯专员、前纳粹党区领袖库贝，直到被苏联游击队炸死之前，都在控告警官们对犹太人的暴行，保护运往明斯克处决的犹太人，单枪匹马地与党卫队和保安处进行搏斗。党卫队副总指挥瓦尔纳·贝斯特博士消极地执行他的首领有关消灭犹太人的计划，让数千名丹麦籍犹太人逃往中立国瑞典。希姆莱的保健医生、“我唯一的朋友，我的如来佛”（希姆莱语）、按摩师费利克斯·克尔斯滕置身于党卫队的核心，一有机会就用他给希姆莱解除胃痛的18

获准流亡到瑞典的犹太人。又如形形色色的人物，诸如意大利的将军，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家和法国的同谋者，则运用谎言和诡计给欧洲几十万犹太人遮盖了一张迷惑人的保护网，长期愚弄了艾希曼的密探，使犹太人化险为夷。

瓦尔纳·贝斯特的态度正好说明，党卫队之国这一论点的一个前提是不切合实际的：党卫队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组织。在第三帝国的历史上还找不出任何一个其他的党的机构，其内部倾轧和成分复杂的程度超过党卫队。几乎没有一个高级干部不跟同僚发生冲突。几乎没有一项具体政策能在两个党卫队高级领袖之间取得一致看法。党卫队区队长赖内克在纽伦堡还感叹地说：党卫队“混进了与它的宗旨完全不相符的人和组织”。迄今很少被历史学家所利用的党卫队秘密档案，披露了党卫队领导层内部的冲突：

希姆莱责备党卫队地区总队长雷德尔在比利时破坏日耳曼人的党卫队政策。纽伦堡武装党卫队旗队长拒绝与普通党卫队及保安处进行任何合作。一名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搜集了不少材料，用来反对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伯格，而伯格则抛出材料，证明另一些党卫队领袖给天主教会事务以照顾。奥仑道夫嘲笑希姆莱的血统和土地浪漫主义。德国中央保安局和经济管理总处就对犹太人应屠杀还是把他们充作劳役奴隶争执不休。秘密警察则将保安处计划用来建立一支俄国人打俄国人的部队的苏联投诚者全部枪杀。同时，就连普通人士，非集团的成员，也促进了党卫队的内部争夺：天主教徒理查德·科勒尔博士当上了希姆莱的主计长；会计检查员汉斯·霍贝格晋升为党卫队所属企业的实际主管人；受人尊敬的航空部建筑工程主管人卡姆勒，没有几年工夫，青云直上，成了党卫队将军和声名狼藉的集中营建筑师。

怪诞、反常、不符合任何逻辑——这就是党卫队的世界。怪诞——尽管看起来合乎逻辑——就是迄今为止所提出用来阐明党

卫队这个奇特现象的注释。但是，党卫队的真实的历史是一个并非由超人的计划性、而是由偶然事件和下意识行为作为发展动力的组织的历史。它是理想主义者和罪犯、争名逐利之徒和浪漫主义者的历史，是一个异想天开到无以复加程度的人物集团的历史。

## 第二章 党卫队的建立

党卫队的历史和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编年史发端于同一时期，即战后动乱的1919年春。因为民族社会主义生来就残缺不全，而党卫队正是这种残缺不全的产物。

在自由团和国防军赶走巴伐利亚红色工人士兵苏维埃先生们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慕尼黑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无意中充当了纳粹运动的助产士。他跟当时控制慕尼黑局势的年轻民族主义军官们过从密切。在一次军人报告会上，一个口才奇妙而扣人心弦的人引起了冯·米勒教授的注意。“我当时看见，”冯·米勒叙述说，“一张苍白瘦削的脸，额上耷拉着一绺非军人式的头发，修饰得短短的小胡子，和两只淡蓝色大眼睛充满狂热的激情，闪烁着寒光。”米勒推推坐在自己身旁的学友迈尔，问道：“你知道在你的教官中，有一个富有口才的天生男高音吗？”

陆军参谋本部上尉、国防军第四军（驻巴伐利亚）新闻和宣传部（政治第一处）处长卡尔·迈尔认出了这个人。迈尔说：“这是李斯特团的希特勒。喂，希特勒，您出来一下！”接着，这个被招呼的人——米勒记述道——“顺从地走出来了，动作不利索，看上去，我感到有些执拗的尴尬相”。这个场面象征着阿道夫·希特勒对巴伐利亚国防军军官的依附性，也象征着大德意志国家未来元首多年都未能克服的纡尊降贵。

负责政治工作的迈尔上尉很快就发现了下士希特勒的宣传才能。从1919年7月起，迈尔主管的政治第一处在慕尼黑舍恩菲尔德街巴伐利亚陆军部大楼里备有一份连队心腹人员的秘密名单，

上面也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不论迈尔上尉什么时候看到意识形态战线上受到威胁，他的心腹人员希特勒都准备以其雄辩的口才为之赴汤蹈火。

迈尔上尉渐渐感到这个下士作用非凡，以致他在信中一变上司的粗暴口吻，彬彬有礼地称呼他：“最尊敬的希特勒先生”。希特勒很快就成为陆军部的座上客，并可以自称是那个负责宣传部门的上尉的政治工作同事。当勒希菲尔德遣散营士兵气势汹汹不服他们军官的管教时，希特勒就挺身而出。他重新整顿了秩序。“特别是希特勒先生，”1919年8月23日心腹人员洛伦茨·弗兰克报告说，<sup>20</sup>“是一位具有天赋的通俗演说家，他以他的狂热激情和平易近人姿态出现在一次集会上，听众就不由自主地被他紧紧地吸引住了。”

迈尔决定对他的这名心腹委以更大的重任。他由于兼负督导巴伐利亚各个政党之责，因此于1919年9月派希特勒出席德国工人党(DAP)的集会。与会者是一批民族主义宗派分子，他们除仇视犹太人和共和国外，还醉心于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感情社会主义(“打破利息奴役制度”)。军方的这位特派员迅即成为德国工人党集会上的明星演说家，以其口若悬河的辩才驳得啤酒馆座上那些比较稳重的对手们哑口无言。1920年1月，这个六十四名成员的党推选希特勒负责抓宣传工作，通过了由他参与制定的党纲，并在后来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此时卡尔退休，一个塌鼻子、剃光头的五短身材的人接替了他的职位。这个人脸上疤痕斑斑，满面红光，神色中露出颇有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抱负；恩斯特·罗姆上尉看来是当年唯一使这时业已退伍的希特勒厕身德国政界一举成名的人。他是香霍斯特<sup>①</sup>和巴伐利亚的煞有介事忙个不停之徒的罕见的混合物，在他

<sup>①</sup> 香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 1755—1813)，普鲁士将军，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倡导者。——译者

的身上，燃烧着难以抑制的搞阴谋的欲火。不过在他的同伙看来，这个同性恋爱者却是一名响当当的冲杀能手，性格粗暴，厌恶一切精神文明，同时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罕见天性。

恩斯特·罗姆善于集某些相互对立的東西于一身。这个坚定的巴伐利亚保皇派、巴伐利亚第十兵团“国王团”（王子为国王路德维希三世）前连长，决心对1918年被推翻的皇帝“谨遵吾誓，直至皇上晏驾而后已”。但他认为巴伐利亚只是一个“制度的细胞”，这个细胞必须得到民族主义势力的大力培植，才能攻下这个革命的罪恶渊藪的柏林。这位慕尼黑雇佣兵队长手下，纠集着——尽管以极端激进的面目出现——一代郁郁不得志的失意军官。战争的失败和皇朝的结束使这些军官沦落于平庸的生活底层。

他们往昔的社会声望已被剥夺，虚假的荣誉也丧失殆尽，寻求在前线经历中似已见端倪的新的共同生活形式，但一无所获。于是，军官们转而反对根基不稳、摇摆不定和谁也不喜欢的那种制度：民主政治、“十一月共和国”。它被视为一切灾难的根源。德国军人企图逐步夺回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为祖国重建1918年被胜利者从帝国夺走的一支武装部队。

一个历史性的偶然机会帮了他们的忙：主要是在巴伐利亚进行21 的反对共产党人和斯巴达克派的斗争，它使政权一度落入军官们的手中，在工人士兵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后的日子里，谁穿军服，谁就得势。这些军官遭到社会民主党人的部分反对和得到右派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的部分支持，在实施宪法状态恢复以前一直左右着巴伐利亚的政局。迈尔上尉控制所有政党，同伙罗特博士掌管司法，恩斯特·波纳中尉接管了慕尼黑警察局。当时才三十二岁的罗姆上尉，前任慕尼黑城防司令的参谋长、后负责里特·冯·埃普上校步兵旅旅部第一处（武器和装备），接受了一个德国军官在当时可以想象得出的最棘手的任务：在巴伐利亚建



立和武装所谓的民团。

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国防军的兵力和武装严格限制为七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这样，在紧急情况下，事实上没有可以动用的后备兵力。军官们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问题：国家必须给自己搞一支第二武装，即一支“秘密的”国防军。罗姆设想用一种民兵，一支象编年史作者康拉德·海登所说的“枪支藏在衣柜里的国民军队”，作为后备部队。上尉发现，巴伐利亚人民党追随者、林务官埃舍里希富有独创精神，又和自己志同道合。他俩着手创办德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民军：巴伐利亚民团。

罗姆一个劲儿地搞武器，建立秘密军火库，在满腹狐疑的协约国面前不露任何声色。单是在慕尼黑一地，他就搜集了一百六十九门轻炮和十一门重炮、七百六十挺机枪、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一支步枪、马枪和手枪，三十万枚手榴弹和八百万发子弹——直到1935年，国防军在三十年代中期扩军所需的武器，其中三分之一还是由罗姆的秘密军火库提供的。

可是巴伐利亚民团在1921年夏天突然完蛋了。柏林中央政府取缔了（这曾向协约国许过诺言）慕尼黑的民团，夺走了罗姆最得力的志同道合者。上尉手里只剩下少数一些极右军事团体和自由团残余分子，他们过着不得温饱的生活，半公开地耍刀弄枪和从事政治暗杀。这些仇视民主分子突然发觉，没有群众成不了气候，没有群众这些领袖都成了光杆司令；而只有群众才能使他们举足轻重——按照反动诗人博吉斯拉夫·冯·泽尔肖夫一首诗的说法是：

✓

我仇恨

群众。

他们渺小。

卑贱；  
他们点头哈腰，  
吃喝睡觉、生男育女。

我仇恨  
群众。  
他们麻木不仁，  
百依百顺；  
他们今天相信我，  
而明天就将要我的老命。

不过罗姆知道有一个人能够吸引群众。他在慕尼黑一个名为“铁拳”的民族社会主义小组里，认识了纳粹党吹鼓手阿道夫·希特勒。罗姆发现，这个前国防军亲信是一名具有吸引力的鼓手，他能把上尉为建立自己的影子部队所需要的人吸引过来。1921年7月希特勒刚刚攫取了纳粹党第一主席的职位，罗姆就决心跟希特勒一起夺取政权。

这位奥地利籍鼓动家开始活动了，从一家啤酒馆走到另一家啤酒馆，煽动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通货膨胀的受害者起来反对“十一月罪人”，与此同时罗姆拉起了第一批行动队，它们的任务是保护这位吹鼓手的宝贵生命。施特雷克上尉领导的第十九迫击炮连的士兵挥舞棍棒，击倒一个个破坏纳粹党集会的人。由这些士兵组成了一支党的纠察队，接着纠察队变成体育运动部，最后又变成一个没有它纳粹运动就无法想象的组织：冲锋队(SA)。

首批队员是经罗姆挑选的，现在他又在极右派赫尔曼·埃尔哈特舰长第二海军旅的残部中，为冲锋队物色到了第一批领袖。这些人参加了由地方议会总监卡普发动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政变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们坐在烟雾腾腾的九柱戏球场地旁，商量如何开展第一阶段的活动。突击队员们的成分属于党的另一个社会范畴，不同于埃尔哈特和罗姆两人的羽翼。他们多数出身于慕尼黑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从事手工业，如果说他们可以自称是军官的话，那么充其量只不过是后备役少尉而已。

希特勒第一个和最重要的私人卫士乌尔里希·格拉夫是个屠夫，并且在业余摔跤比赛中名噪一时。同希特勒称兄道弟的朋友艾米尔·莫里斯本是一名钟表匠，因侵吞一笔款项而被列入刑事犯名单。马夫出身的克里斯蒂安·韦伯原在慕尼黑“蓝山羊”酒馆当跑堂，收入微薄。但是这些人现在却纠集在一起，以保卫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袖的生命安全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不论希特勒上哪儿去办事，他们都揣上“橡皮”和“打火机”（这是他们的切口，指橡皮棍和手枪）追随左右，保护他们的领袖不致被敌对者所伤害。1942年，希特勒还得意地谈起这些“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并知道有一天将要豁出命来干的人”。

1923年11月，这一天来到了。巴伐利亚政府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希特勒企图利用这个时机实现自己的计划：巴伐利亚分离主义保皇派政府首脑、邦长官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和驻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奥托·赫尔曼·洛索少将，同柏林闹翻了，巴伐利亚随时都有可能脱离中央。巴伐利亚的军方几年来大肆网罗死心塌地与民主进步为敌的势力的“制度细胞”，准备决一死战。

里特·冯·卡尔定于11月8日晚假慕尼黑罗森海默大街“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召集各界要人开会，就在这时，希特勒决定冒险单独发动政变。他断定卡尔要宣布巴伐利亚独立，而他却决心迫使巴伐利亚的分离主义分子反守为攻：进军柏林，消灭“十一月共和国”。希特勒匆匆忙忙向自己的民族运动盟友发出战斗信号，这些盟友是他为了实现自己制定的突然袭击计划而争取到的。前

第一陆军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也接到了紧急通知，参加了政变，只不过抱怨自己受骗没当上主角。希特勒集合起手下的五十名突击队员，给他们鼓气，一切准备停当。于是他身披黑色大衣，别上一级铁十字勋章，乘车出发。晚上8时许，他站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门口，等候他的部下到来。

三刻钟后，突击队长伯希托尔德拖来一挺机枪，架在啤酒馆门口。就在这当儿，希特勒率领私人卫士们一直闯进高朋满座的啤酒馆。他拔出手枪朝天花板放了一枪，跳上一张桌子，叫喊道：“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这个会场已经由六百名全副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巴伐利亚政府和中央政府已被推翻，临时中央政府即将成立。”遭到突然袭击的巴伐利亚军人和政界人士听凭这个狂人摆布，表示愿意同希特勒合作。

可是到了第二天，卡尔和洛索就调动他们的部队向纳粹党领袖反扑过来，声明与希特勒断绝关系。这位政变战略家好象瘫痪了似的，坐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等候捷报。捷报可没有盼到，只有一个消息还算不坏，并终于促使希特勒走上街头：罗姆率领由自己建立的武装团体“德国战旗”冲进了陆军部，正在与越来越多的军警部队相持不下。

11月9日中午时分，希特勒带领他的部属和盟友排成八路纵队，在狭窄的府邸街上行进，前去解救陷在陆军部里的罗姆。来到奥第昂广场，他们遇到一百名左右的邦警察，在菲尔德赫恩会堂的台阶上严阵以待，挡住队伍的去路。当政变者仍然企图前进时，又有一队邦警察赶来布防。希特勒和鲁登道夫面色苍白地挪着步子。希特勒的卫士格拉夫几步跳到警察的枪口前，叫喊道：“别开枪！过来的是鲁登道夫阁下和希特勒！”话音刚停，警察队伍里就响起了一阵枪声。十六名纳粹分子——其中五名是突击队员——和三名警察当场饮弹毙命，几乎所有纳粹运动领袖都被逮捕。突

击队长伯希托尔德和身负重伤的冲锋队司令戈林漏网，逃往奥地利。

阿道夫·希特勒的轻举妄动召致了纳粹党的毁灭。党组织、冲锋队和突击队均被取缔。剩下来的是一群争吵不和的纳粹分子，他们先且躲到鲁登道夫的大旗下藏身，后来又不断分裂成新的派别和集团。只有坚持不懈的恩斯特·罗姆在被开除军籍并关押不久保释出来后，仍然打定主意继续干。希特勒在自己还被关在兰茨贝格要塞监狱里时，就封上尉为那个转入地下的冲锋队的领袖。 26

但罗姆很快就看出，巴伐利亚政府是不会撤销取缔冲锋队的命令的。这时，在罗姆的老上级里特·冯·埃普的领导下，卡尔已把所有武装团体合并成一个“紧急分部”，统一控制起来。不久罗姆另行组织一个由冲锋队旧部组成的武装团体，名义上将其置于鲁登道夫将军的领导之下，并给这个团体取名“火线分部”。

有了“火线分部”，罗姆得以首次在巴伐利亚以外的地区为自己和那个勃劳瑙人<sup>①</sup>争取纳粹分子。在十一月政变以前，希特勒的运动几乎从未越出慕尼黑市的范围，现在，老自由团的幸存者和群龙无首的北德纳粹分子，纷纷前来投奔“火线分部”。心狠手辣的极端民族主义亡命之徒，后来主张将粗鄙的作风奉为冲锋队生活方式的自由团军官，都站到了罗姆的军旗下：冯·海德布雷克上尉和赫尔道夫伯爵来了，还有埃德蒙·海因斯中尉也来了，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流氓，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供述的那样，也一贯有相公癖的罗姆“首次交往”。

在此之前，希特勒的冲锋队在其全盛时期也至多只有过两千名队员——现在，罗姆可以向蹲在兰茨贝格要塞监狱里的朋友报告，“火线分部”成员已达三万人。不过希特勒看到上尉的部队人

---

<sup>①</sup> 勃劳瑙(Braunau)为上奥地利地名。希特勒出生于此，这里即指希特勒。——译者

数不断增加，心里却有些不舒服。罗姆（“我今天仍然是而且只是一个军人”）并未停止和民族运动政治家们争夺武装团体的独立性，他在写给鲁登道夫的信中就说过：“政治运动和军事运动完全是两码事。”

1924年12月，希特勒获释出狱，委托上尉重新建立冲锋队，这时两个伙伴发生了公开的争吵。希特勒再不同意组织埃尔哈特式的独立的冲锋队，罗姆则坚持搞党务的人无权干预军人的行动，声称希特勒只有象过去一样仍然充当武装团体的鼓手。“党的政治不得进入‘火线分部’，也不得进入冲锋队”，罗姆在一份致这位前下士<sup>①</sup>的备忘录中说。他还明确表示：“我断然不许冲锋队干预任何党务，我也同样断然不许冲锋队领袖听任党的领袖发号施令。”

罗姆哪里知道，希特勒早已打定了主意：在他确有把握不再受制于身穿冲锋队制服的异己分子之前，他是不会让成立冲锋队的。希特勒和罗姆分手了。这位冲锋队的真正创业者别无他法，只好于1925年4月30日致函希特勒，声称“忆及我们曾经共同度过的美好和艰难时刻，衷心感谢你的同志式的情谊，并请不要断绝你跟我的个人友谊”。不到一个月，希特勒通过自己的秘书处回了信：“希特勒先生无意再次从事武装运动。如果说他当年这样做了，那完全是出于后来那些把他弃置不顾的先生们的主张。今天他只需要一支维持会场秩序的纠察队，象1923年以前一样。”

党卫队(SS)诞生的时刻临近了。早先带有罗姆和埃尔哈特标记的冲锋队所不愿干的事，现在应由党卫队来完成；处处确保领袖在党内的权威，时刻准备无条件地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我当时考虑，”希特勒后来谈到党卫队的成立经过时说，“我需要一支私人卫

---

<sup>①</sup>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是下士。——译者



队，他们即使人数不多，但无条件地忠于我，甚至可以挺身而出对付自己的兄弟。宁可一个城市只挑选二十个人——条件是他们必须绝对可靠——，也不要一群不可靠的乌合之众。”<sup>7</sup>

当然，一般党员所知道的有关党卫队的成立却是另一种说法——后来在第三帝国的任何一种政治教科书上都可以读到：由于冲锋队一再遭到取缔，1925年2月新成立的党不得不建立一个自卫性组织，以对付政敌变本加厉的恐怖手段。绝口不提希特勒有意迟迟不肯重建冲锋队；取缔冲锋队的命令也并非在德国各邦都生效，相反，特别是北德和西德各地的冲锋队发展得很快，只是它们不听命于当时这位地位还颇不稳固的慕尼黑的党的领袖罢了。

希特勒想不失时机地建立一支私人卫队。1925年4月，他指令原突击队员、这时间或也给他开开汽车的尤利乌斯·施雷克新建一支本部卫队。几星期后，这支本部卫队改称“党卫队”。施雷克物色了首批党卫队员，他们的来源与本部警卫和突击队一模一样：慕尼黑伊扎托尔门附近托尔勃劳啤酒馆座上的常客。最初一共八个人，几乎都是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的成员。他们仍旧穿突击队制服，只是取消了原来的灰衬衫，代之以这时已成为党的标志的褐衬衫\*，系黑领带。

党卫队领袖施雷克也着手在其他城市拉起队伍。1925年9月28日，他发出“第1号通知”，要求所有各纳粹党地方组织建立党卫队；规定它们应是小型、精干的精锐队伍，至多设一名队长和十名队员，只有柏林可以设两名队长、二十名队员。施雷克负责掌管，

---

\* 褐衬衫成为党的标志事出偶然。有人向逃往奥地利的冲锋队领袖罗斯巴赫提供了相当一批原定供德国驻东非殖民地部队穿的褐衬衫。罗斯巴赫将其于1924年运到了德国。同党卫队的黑领带相反，冲锋队穿褐衬衫，系褐领带。见海因里希·贝内克：《希特勒和冲锋队》第125页。——原注

参加党卫队的人必须经过挑选，都应是纳粹分子中信奉武力的精萃人物。党卫队领导规定，发展对象年龄限于二十三岁至三十五岁，必须有两名介绍人；在一个地方需要正式居住满五年，还要“身体健康和体力强壮”。

党卫队的“方针”规定，“对好酒贪杯、多言饶舌和有其他毛病的人一律不予考虑”。当施雷克 1925 年 11 月从《人民观察家报》上看到，慕尼黑-诺伊豪森党员道布搞起一支由十五名前冲锋队员组成的党卫队并自封为队长时，这位党卫队创始人提出抗议。他于 11 月 27 日写信给党的指导处说：“鉴于所谓的新建工作仅仅是将原来的冲锋队换上‘党卫队’的名字，因此党卫队高级指导处恳请党的指导处采取措施，通知这些先生们不得滥用党卫队的名称来称呼这些组织。不应当让一个创业维艰、基础健全的组织由于滥事摹仿而受到损害。”

施雷克极力主张“集中最优秀和最可靠的党员，以保卫运动和高度大公无私、孜孜不倦地为运动作好工作”。他还在一份通知中提出了党卫队的任务：“集会时维持会场秩序，为《人民观察家报》征求订户和广告，为党征集党员。”部门负责人、作为中央机构设立的党卫队高级指导处的真正创建者阿洛伊斯·罗森温克，则用地道的纳粹行话气势汹汹地说：“我们在我们的黑色帽上佩戴骷髅标志，借以警告我们的敌人并向我们的领袖表示我们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实现他的思想。”

首批捷报传到了慕尼黑：在德累斯顿，党卫队队员阻止了五十名共产党人试图冲击会场，保卫了纳粹党人的一次集会。在萨克森——罗森温克报告说——，“自从德累斯顿、普劳恩、次维考和克姆尼茨等地的党卫队联合起来，在克姆尼茨大理石宫将共产党人不仅狠狠揍了一顿，而且将一部分人抛出窗外以后，再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者胆敢破坏我们的集会了”。1925 年圣诞节，党卫队高级

指导处有这样一段记录：“我们拥有一个近千名成员的组织上统一的保卫团体。”尽管真正的党卫队员人数不久又急剧下降到两百名，但党卫队作为纳粹党第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1926年4月，逃亡奥地利的原突击队队长伯希托尔德归国，<sup>29</sup>接替施雷克领导高级指导处。这个十一月政变分子回国后，希特勒公开把党卫队捧为自己的中坚组织。1926年7月4日，希特勒在魏玛举行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授予党卫队“血旗”，即1923年11月9日给行进在府邸街上的八路纵队开道的那块布头。党卫队站稳了脚跟，并发展壮大了。现在，希特勒可以大胆地再次同冲锋队打交道了。他心里非常清楚，他需要这根用来运转群众大军的皮带，只有这样一根皮带，才能在党的军队和政治行军纵队的德国将他一举推上台去。

可是，巴伐利亚以外的冲锋队领袖对这个奥地利人希特勒还心存疑窦。希特勒必须物色一个人，帮他将分散各地的冲锋队组织建立联系。这个人他物色到了，就是北德自由团领袖、前上尉弗兰茨·普菲费尔·冯·扎洛蒙。1926年7月27日，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12时在首脑那里，作了认真商讨。普菲费尔将任冲锋队全国领袖。”对希特勒来说，事情的确不是闹着玩儿的，因为北德纳粹领袖们至今尚不完全相信这个慕尼黑来的人，而现在竟让他们的亲信普菲费尔进入党的指导处——既是坐探，又是监军。

希特勒不得不给这个自由团分子以相当大的权力：普菲费尔从1926年11月1日起任“冲锋队最高领袖”(OSAF)，领导德国所有冲锋队组织。他虽然原则上必须执行党的首脑希特勒的指示，但在建设冲锋队组织的工作中却可以便宜行事。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把自己同北德纳粹分子的结盟看成是一大胜利，以致他也不得不削减他的党卫队的权力。党卫队同样也归“冲锋队最高领

袖”领导，它的头儿只是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安慰：高级指导处负责人伯希托尔德从此可以自称党卫队全国领袖。

希特勒很快就不再感到得意了；他看到，自己的中坚队伍有可能完全听命于冲锋队和党的干部的危险。早在任命伯希托尔德时，问题即已存在：高级指导处的成员没有遴选前任施雷克，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愚蠢的党卫队创始人只不过是后来任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成员的菲利普·布勒和弗朗兹·沙维埃·施瓦兹这类阴险的党阀的百依百顺的玩物。高级指导处成员恩斯特·瓦格纳致信希特勒说，大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看到施雷克不具备领袖应有的才能和组织才能，也缺少确保党卫队成为运动的中坚队伍的名望”。

就这样，被任命的是较有魄力的伯希托尔德，不过他要对付那些党阀也不是很容易的。

他发出命令：“不论党的地方组织或党的区领导机关，均无权  
30 干预当地党卫队的内部组织任务。”在另一项命令中说：“党卫队在运动内部拥有完全的独立地位。”尽管如此，面对党的干部们，伯希托尔德还是无法贯彻自己的意图。党卫队的权贵和党阀们之间开始显露出潜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始终存在，一直延续到第三帝国的末日。1926年5月11日，党卫队成员瓦格纳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叫嚷必须“驱除党阀”。党阀布勒和施瓦兹当即禁止他进入设在慕尼黑黑舍林街50号后楼的党卫队高级指导处。全国领袖伯希托尔德甚至不得不亲笔签署禁止瓦格纳同志进入高级指导处大门的命令。瓦格纳气愤地对希特勒说：“伯希托尔德同志告诉我，是布勒和施瓦兹先生逼得他这样做的。”

憋着这股怨气还不算，冲锋队的权力重又急剧上升，因此伯希托尔德一甩手丢下自己的职务不干了。1927年3月，他的副手埃哈德·海登出任党卫队新的全国领袖。面对人多势众的冲锋队，

他也差点儿站不住脚，冲锋队最高领袖普菲费尔甚至禁止党卫队在冲锋队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城市建立党卫队。

在每个地区，党卫队的人数只及冲锋队人数的十分之一，因此直到1928年，党卫队员总人数只增至区区二百八十名。党卫队的中坚分子还必须常常听任冲锋队领袖的指挥，干打杂的工作：完成日常事务，分发宣传材料和出售《人民观察家报》。他们往往不得不满足于象1926年成绩汇报中所列举的这样一些事情：“由于各地党卫队的努力，10月份在全国共征集：纳粹党新党员二百四十九名，《人民观察家报》新读者五十四人，《冲锋队员》新读者一百六十九人，《民族社会主义者》新读者八十二人，《西南德观察家报》新读者一百四十人，《西德观察家报》新读者四百七十五人，其他民族社会主义报刊新读者一百八十九人。此外还推销了观察家画报两千份。”这份成绩汇报的标题是：“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

仅仅是由于坚信自己百里挑一选出来的，才促使这支“也许是高效率的、无论如何是趾高气扬的队伍”（康拉德·海登语）继续前进。这支队伍的内部口号是：“好汉有话不放在嘴上！”它默不出声地同褐色行进纵队举步相随——要求更高的入队条件和更为严格的执勤条例，使它时刻不忘党卫队的优越感。“党卫队不参加党员会议上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参加座谈晚会听报告过程中，党卫队员不得抽烟和离开会场——这有助于对大家进行教育，”1927年9月13日全国领袖埃哈德·海登发布的《第1号命令》中这样说。“党卫队员和队长不介入任何与己无关的领域（地方组织政治领导和冲锋队），不发表意见。”

命令规定，每次参加集会执勤时，各分队“应将队员排成两列横队”，检查服装和证件。党卫队员必须随身携带纳粹党党证、党卫队员证和党卫队歌本。特别要求绝对遵守有关禁止携带武器的第8号命令；希特勒决心用表面上合法的手段攫取政权，为此也就要

求党在公开场合下以不同于任何武装团体和非法军事组织的姿态出现。每次执勤之前，党卫队队长必须检查自己的队员是否带有武器，一经发现，即予没收。

连党卫队的政敌也对它的铁的纪律有着深刻的印象。慕尼黑警察局在1929年5月7日的一份关于形势的机密报告中写道：“党卫队员纪律要求何等严格。稍有违反党卫队日常命令中的规定，也会受到罚款、定期收回袖章或撤销职务的危险。特别重视队员的个人表现和服装。”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应显示出党卫队是党的尊严。党卫队的一份指示中说：“党卫队员是最优秀的模范党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党卫队每次集会结束前必唱的队歌中，也可以清楚地听出对党卫队使命感的狂热信念：

即使人人背叛，  
我们也忠贞不贰；  
大地上永远存在  
一支为你战斗的小分队。

“冲锋队是常备军，党卫队是近卫军，”一个党卫队这样自负地说。“近卫军自古有之，波斯人有，希腊人有，恺撒有，拿破仑有，从老腓特烈直到世界大战都有，而新德国的近卫军将是党卫队。”

说这番话的人决心要使党卫队成为国家的主宰。从此，党卫队的历史注定了将是这个人的历史，党卫队的所作所为将是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党卫队的罪行录将是这个人的罪行录。1929年1月6日，希特勒任命这个人统率党卫队的全国领袖，他的名字叫：海因里希·希姆莱。

### 第三章 海因里希·希姆莱

32

列车在单调的节奏声中向北方奔驰，有位旅客的脸上越来越流露出鄙夷的神色。几个钟头以来，纳粹党汉堡区第一领袖阿尔伯特·克雷布斯一直在倾听对座那个人喋喋不休地发表议论，这个人是在埃尔伯费尔德跟他一道上车的。

这个人中等身材，长得相当结实，一张普通人的脸略微显得浮肿。下巴短得几乎都快看不见了，使人感到性格有些软弱，而那双透过夹鼻眼镜机灵地向四周打量的青灰色眼睛，却又暗示出非常坚强的意志力。同样，他那鲁莽举止，也和一双指甲修剪得光洁、几乎象女人那样秀气的手不相协调。

当然，这个旅伴的不协调的外表在当时——1929年春天——并未引起纳粹党区领袖克雷布斯的注意。他只是愈来愈气愤地默默听着这位新上任的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对政局发表的议论。希姆莱高谈阔论，说政治的关键就在于掌握别人的诡秘。弄清楚冲锋队领袖科恩为什么给自己取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听上去象犹太人科恩<sup>①</sup>），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必须调查纳粹党区领袖洛泽早先当银行职员时是否依赖过犹太人的资本。克雷布斯摇了摇头。

三十年后，克雷布斯对希姆莱这番谈话还“留下了难以忍受的回忆”，感到是一种“由气势汹汹的吹牛、酒店老主顾座上的小市民闲扯和教派牧师的狂热预言互相混杂的谬论”。

---

<sup>①</sup> 原文为Cohn，和前一“科恩”(Comm)谐音。——译者

象阿尔伯特·克雷布斯所看到的首次对纳粹党党卫队进行视察旅行的希姆莱同志一样，其他持有独立思考的纳粹党员也把这位年方二十九岁的党卫队新主子，看成是阿道夫·希特勒手下一个略有名气、犹豫不决和见识不广的党阀。后来，在这个教派信徒和酒店老主顾座上演说家的身上，又掺进了魔鬼般令人毛骨悚然的特点。希姆莱那双女人般的手攫取的权力愈多，党卫队全国领袖在德国人心目中也愈加成为非凡超人，愈加近似魔怪和面目狰狞。希姆莱三字很快就成为一种毫无个性的概念，变为冷酷无情的纳粹警察国家的象征，似乎是不惜任何代价执意剪除异己和漠视人情的魔鬼。从他的身世中，没有任何一点足以显示这个拥有“党  
33 卫队全国领袖”头衔的人的真实面目——直到今天，德国人对此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希姆莱生前的那些老相识，后来几乎都很难清楚地描绘出他的真实形象。要给希姆莱勾勒一幅统一的标准像确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希姆莱的同时代人和传记作者对他众说纷纭：刽子手希姆莱、善心人希姆莱、狂热的种族理论家希姆莱、廉洁奉公的使徒希姆莱、充当领袖驯服工具的希姆莱、德国国内抵抗派的一个老谋深算的谈判对手希姆莱。

“这个人是希特勒手下的恶魔，冷酷狡黠，权迷心窍，也许是第三帝国最野心勃勃和不择手段的人，”前希特勒武装部队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将军曾这样评论过他。装甲部队上将古德里安认为：“他不是这个行星上的人。”前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瑞士人卡尔·J·布克哈特这样剖析他说：“他之所以令人憎恶，是因为他对部属要求极其严厉，固执己见，采用象机器人那样的不近人情的工作方法。”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在看到一张希姆莱的照片时，突然想到，“我从来看不透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两只眼睛，老是隔着夹鼻眼镜眨巴眨巴，现在照片上这两只眼睛却一动



不动地直盯着我，我认为有一点被我看出来了：奸诈。”V-2 火箭部队将军瓦尔特·多恩贝格尔的印象则相反，感到希姆莱“象个有才华的小学教员，肯定不象使用暴力的人”，希姆莱有着“罕见的、善于倾听别人讲话的天才”，是“一个举止文静、不慷慨激昂的人”，“一个异常沉着的人”。

1945年同希姆莱举行过谈判的瑞典人伯纳多特伯爵也惊奇地说：“我的确看不出他有丝毫跟魔鬼相似的地方。”他显得异常和葛，“有时试图以冷面滑稽的口吻显示出他的幽默感，喜欢讲上一句开玩笑的话，使周围气氛活跃起来”。有些外交家很重视他那偶而作出的明智的判断，连外国人和德国抵抗运动战士有时也认为，在纳粹领袖当中，只有希姆莱才能使希特勒垮台。希姆莱这个怪物——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这样断定说——“具有某些罕见的品质，使他成为某种不可思议的形象”。

希姆莱的传记作者终于作出了一种假设，以便至少能将如此众多的不同形象勉强解释成一个人：揭开希姆莱之谜的关键——我们这样读到——在于他这个人的青少年时期；他父亲迂腐拘谨，母亲冷酷无情，这个孤寂的资产阶级的儿子，就在这样一个抑郁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在战后年代的社会里长期四处流浪，得不到人们正眼相待，直到纳粹运动才给他带来了在父母身边不曾得到过的安定生活。

这种假设娓娓动听，适应于用精神分析学阐明无法解释的问题的时兴。可是，这种假设不切合实际情况。事实终究是事实：希姆莱出身于巴伐利亚一个人们可以想象较为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希姆莱同父母和两个兄弟——哥哥格布哈德（1898年生），弟弟恩斯特（1905年生）——的亲密关系，是怎么也不容否认的，尽管他以全副精力倾注于党卫队的工作，身负使命日重，尽管他那神经质的妻子玛加丽特叫苦埋怨（“想到你的父母，我就老是憋不过

气来”),破坏了希姆莱一家的和睦气氛,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还是始终不肯和父母兄弟分家。母亲过世时,希姆莱自己虽也病魔缠身,但他仍然守在灵前,通宵达旦。举行葬礼时,他和两个兄弟\*隔着灵柩紧紧握手,作了对他来说难得这样作的庄严宣誓:“我们要永远生活在一起!”

他一向以家庭的保护者自居。“咳,不能让爸爸再这样工作了,一个星期中应该让他常去散散步,别让他过分劳累”,他1921年在大学里念书时给“亲爱的妈妈”这样写道。哥哥和弟弟有时也免不了要听他那套学究式的迂腐说教。1920年11月14日,“恩斯蒂”<sup>①</sup>不得不听从比自己年长不满五岁的哥哥的训诫:“我也为你获得这样好的分数感到很高兴。但你不能因此而骄傲起来。除此以外,我还希望你对历史课也花点功夫……不要再使我感到你的成绩有所偏废。永远注意上进,别让爸爸妈妈生气。”

海因里希·希姆莱蛮不讲理地好管闲事,使哥哥格布哈德吃到了苦头。格布哈德不走运,同魏尔海姆一个银行家的女儿保拉·施特尔茨勒订了婚,她这个人不受古板的道学先生的喜欢。海因里希·希姆莱立即给她写了一封信,明确指出这一点。“你们结合在一起,”他于1923年4月18日写信给保拉说,“要想既给你们俩带来幸福,也有益于必须以身体健康和品德端正的家庭为基础的人民,那你就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至于由谁来担负约束之责,保拉再往下看就知道了:“由于你不严于律己,你未来的丈夫对你也过于宠爱,必须有另外的人负起责来……对此,我感到责无旁贷。”希姆莱生前把二十世纪的妇女和日耳曼人民间传说中的贵妇混同

---

\* 恩斯特·希姆莱是工学士,柏林中央广播电台总技师,死于1945年。格布哈德·希姆莱曾任中央教育部部务司长,现在慕尼黑欧洲-阿富汗文化研究所工作。——原注

① 恩斯特的昵称。——译者

起来，将所有婚前交往一概指责为违反他所要求的贞洁。他委托慕尼黑马克斯·布吕梅尔侦探事务所调查保拉过去的的生活。可是<sup>35</sup>不等包探布吕梅尔在1924年3月14日提出调查报告，希姆莱又另外找人了解情况。他写信给一个姓勒斯纳的公务人员说：“我可以请您将您所知道的，有关施特尔茨勒小姐、特别是有关她和您同事达夫纳的关系的详情告诉我吗？”结果哥哥格布哈德俯首听命，同保拉解除了婚约。从这个插曲可以看出，象为数不多的纳粹领袖一样，海因里希·希姆莱是在一个未受波折和令人窒息的资产阶级安定环境中长大的。

他作为枢密院教育顾问格布哈德·希姆莱<sup>①</sup>的次子，不同于想到自己早先在维也纳踉跄街头的流浪岁月就感到犹如恶梦一场的希特勒，不同于父亲是工头的约瑟夫·戈培尔，不同于出身波罗的海之滨的失意的流亡者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希姆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和自觉的中产阶级和公务人员阶层的儿子。

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00年10月7日出生在慕尼黑希尔德加德街2号的三楼。当他呱呱坠地时，父亲满有把握地认为这个儿子会得到社会的重视。巴伐利亚王国的一个大人物向婴儿伸出了庇护之手，这就是枢密顾问希姆莱的王室学生、维特尔斯巴赫的海因里希亲王。老师的儿子就从亲王取名，海因里希亲王听到枢密顾问希姆莱向他最恭顺地报告说新出世的嫡子体重七磅又两百克，立即表示有意做孩子的教父。名字和教父约束着孩子从小就恪守忠于国王的传统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学生时代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对父母的权威，或者甚至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制度从未发生过怀疑。父亲教导他懂得他的列祖列宗都是善良的人，并奠定了一种历史浪漫主义的基础。在这样的浪漫主义中，日耳曼人的贵族和名媛淑女们遵循晚期追随瓦格

<sup>①</sup> 父亲和长子同名格布哈德。——译者

纳①狂时代寻欢作乐，后来只要摇身一变就成为主宰民族的德意志北欧人，以适应纳粹政权的需要。这个男孩很早就学会了对自己所处环境表示应有的尊敬。甚至在他那干干净净的生日本上，也可看到一条处世谦恭的警句：毋忘用完整的头衔尊称日记中出现的人物。

但是，谁认一位亲王作教父，谁就必须当军官。这里有一点是了解希姆莱本性的关键：他一直梦想指挥百战百胜的军队，但却未能完全实现童年时的这一梦想。这个教书先生的儿子视力不好，最初想进帝国海军，可是舰队不收戴眼镜的人。于是他决定参加陆军。枢密顾问希姆莱在1917年6月26日这样登记道：“我的儿子海因里希迫切希望以步兵军官为终身职业。”这个年轻人简直迫不及待要上前线打仗。当哥哥格布哈德1915年参加民军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在自己的笔记簿上歪歪斜斜地写道：“唉，我多么希望自己年龄也能合格，好上前线去。”他逐字逐句地将陆军最高司令部的战报抄下来，并咒骂兰次胡特人（全家已迁居兰次胡特）缺乏战争热情。

希姆莱嚷着就是要当兵，父亲只好央求自己在宫廷中的朋友们，让儿子提前加入军队。朋友们帮了忙，而且几乎就在同时，希姆莱还得到了这时死去的亲王教父在另一方面的最后一次恩宠。官庭事务管理部门通知“尊敬的格·希姆莱副校长先生”说，“兹指定本埠扎尔瓦托街18号J.N.奥伯恩德费尔银行奉上息金为百分之五的德国战时公债券一千马克整。请代令郎晒纳，此系令郎已故教父前海因里希亲王殿下之馈赠。”

希姆莱于1917年底加入巴伐利亚第十一步兵团“森林团”。可是行伍生涯还未开始，就已宣告结束。虽然这位全国领袖临死前

---

① 指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大作曲家、文学家。——译者

不久告诉瑞典伯爵伯纳多特，说他和他的部下“上过战场”，在其他材料上甚至还谈到他参加过西线的一次战役，事实上候补军官希姆莱根本没见过前线是什么样子，他没有赶上打仗；在累根斯堡经过半年入伍基础训练后，步兵希姆莱于1918年6月15日至9月15日在弗赖辛格修完候补军官训练班，紧接着又进了第十七机枪连在拜罗伊特举办的机枪训练班，到1918年10月1日结业。两个月后，他在第十一步兵团补充营四连奉命退役。

不过，战后的混乱局势，看来还是给这个退役候补军官开辟了另一条行伍发迹的道路。1919年2月，巴伐利亚左翼社会民主党总理库特·艾斯纳被一名军官暗杀，随后共产党人及追随他们的革命派宣布成立红色工人士兵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政府逃往班堡，并不得不违背本意，拉起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退役军人和自愿参加者组成，取名自由团。

由柏林派出的国防军和自由团于1919年4月准备就绪，进攻红色慕尼黑，候补军官希姆莱也报名加入一支人数不多的自由团。领导人为劳滕巴赫尔少尉。这一次他又来晚了，没投入战斗。希姆莱所在的部队没有开进慕尼黑，这个候补军官仍旧是一名仪仗队士兵。不过他并未气馁。1919年6月17日，他写信给第十一步兵团后卫分遣队，请求发给他军人证明，“因为我将于日内转入国防军”。

进国防军的打算也未实现，原因是这时他父亲决定，考虑到王室的庇荫已不复存在，通货膨胀有增无已，现在应该让希姆莱在战 37  
后赶紧熟谙一门可靠的职业了。父亲看中了农业。这个功名未就的陆军元帅表示同意，他对农业素感兴趣，仅次于当兵。他在童年时就收集过许多植物标本，他那古怪的、对草药种植园的癖好，日后还将使集中营的囚徒受尽折磨。每个集中营都必须辟出一块尽可能种植草药的园子，希姆莱认为这些草药能治病，其疗效超过药

剂。

农学家的生涯仍然是时运不济。希姆莱刚刚开始<sup>①</sup>在因戈尔施塔特的某农场学农，就被一场流行性伤寒弄得卧床不起。一个姓格林施塔特的医生决定：“停止工作一年，进行学习。”1919年10月18日，希姆莱进了慕尼黑大学技术学院，注册为农科大学生。难道象传说的那样，他已经屡遭失败而心灰意懒，变成了一只“lonely wolf”<sup>②</sup>只身处于社会边缘吗？根本没有。在慕尼黑，希姆莱开始了生平春风得意、轻松愉快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成为传记作家们的难解之谜。

这个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和显得有些无聊的大学生，在慕尼黑的化装舞会上扮演阿布杜尔·哈密德土耳其苏丹<sup>③</sup>的角色，不幸地堕入情网，爱上了一个名叫玛雅·洛里茨的女士，并讲究吃喝。谁也没有看出他日后会成为大规模屠杀的刽子手。

无疑，有时他还是念念不忘政治和玩弄枪杆子。1920年5月16日开具的一张“收据”证明，他以慕尼黑民团身分，向第二十一步兵旅共领到“步枪一支、子弹五十发、钢盔一顶、子弹带二条、军用干粮袋（老式）一条”。他把1921年12月1日看成他生平意义特别重大的一天：国防军通知他从此可以自称为见习军官了。他同其他民族主义大学生和军官准备发动一次暴动，意图劫狱，将刺杀巴伐利亚总理艾斯纳的凶手阿尔科-凡雷伯爵营救出来。但是当伯爵的死刑被改为无期徒刑时，密谋者放弃了原定计划。希姆莱并不泄气，他在日记里冷静地写道：“好吧，那就等另一次机会吧。”

希姆莱这时有更加难于忍受的烦恼。他在1919年11月加入了一个取名“阿波罗”的大学生协会击剑组织，并苦思冥想怎样使他的新生活，同家庭的极端天主教观点以及自己容易发病的胃取

① 意为“孤独(或凄凉)的狼”。——译者

② Abdul Hamid II.(1842—1918),在位期是1876—1909年。——译者

得协调，因为教会禁止决斗，医生不准他在大学生饮酒晚会上喝啤酒。

啤酒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他设法得到自己所在大学生协会特别批准，免喝啤酒。当然阿波罗的酒友们并不特别器重这个戒酒者，他们让希姆莱在下一届大学生协会改组中落选了。他要找个对手决斗也非易事，大部分同学显然都认为他不堪一击。直到最后一个学期，即1922年6月，才有一个大学生勉为其难地使希姆莱的脸上破了点相<sup>①</sup>，没有这么一下，未来的党卫队全国领袖就会感到条顿式的大学生性格是难以想象的。

事实证明，教会的决斗禁令比啤酒问题更不好对付。希姆莱一家向来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一个表兄弟奥古斯特·威廉·帕廷当上了慕尼黑宫廷教堂的驻会神父。希姆莱也算得是个笃信的天主教徒。安息日弥撒对他来说不是表面上的礼仪，而是内心的需要。他每次参加祈祷活动后写下自己的感受，并多次写道：“我来到这所教堂里感到幸福。”他羞怯地向一位姑娘献殷勤，当听到这个姑娘说自己每天参加圣餐礼后，他就在日记里写道：“这是我八天来得到的最大快乐。”

可是参加击剑组织影响了希姆莱和教会的关系。裂缝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但月复一月地更加明显了。起初，希姆莱尽力使自己和教会一样反对决斗，然而为了适应社会对他进行的家教胜过了宗教的传统。“我认为我和我的宗教信仰产生了矛盾，”希姆莱在1919年12月15日这样写道。这个人后来强令几万名党卫队员退出教会并公然打算处死教皇，然而他在当时还写道：“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将永远热爱上帝，向他祈祷和忠于天主教会，即使它将我逐出教门，我也要保卫它。”

---

<sup>①</sup> 大学生协会会员以脸上有决斗留下的伤痕为勇武之标志。——译者

同教会关系的破裂使希姆莱感到迷惘，但并未使他有所震动。他的兴致在于世俗方面：这个兰次胡特大学生更关心的，不是宗教和政治，而是慕尼黑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娱乐活动、同洛里茨太太共进午餐以及大学生的性问题。

安娜·洛里茨是某音乐会歌唱演员的遗孀，和希姆莱家沾点亲，她住在慕尼黑耶格尔街9号，家里给别人搭伙包饭。洛里茨太太的女儿玛丽亚——叫名玛雅——使这个兰次胡特大学生着了迷，但结果证明，一名情敌，即后来的斯图加特皮革商汉斯·克尼普却博得了这位美女的青睐。有时希姆莱全家上洛里茨那儿去聚餐。“每当‘希姆莱一家子’——大家这样叫他们——五个人接踵而来，洛里茨家里总是热闹非凡，”克尼普这样回忆说，“希〔姆莱〕一家人知道，到洛里茨这个好婶婶家里来，准能吃上些美味可口的饭菜。”

39 洛里茨母女一家的节日庆宴也对“希姆莱-海尼<sup>①</sup>”具有诱惑力。“你也学跳舞吗？”还是在兰次胡特时和他在同一个团的战友罗伯特·基斯特勒曾这样写信问过他；希姆莱来到慕尼黑后，就立即选修了跳舞课，以期博得玛雅的欢心。1920年1月，他已经会跳波士顿华尔兹了。他和朋友路德维希——平常叫名“路”——是慕尼黑嘉年华会上的不知疲倦的客人。屁大的事情他也要在日记里记上一笔。他记述在洛里茨太太家的一次节日说：“房间布置成古代土耳其人家住女眷的内院，在壁角里火炉旁给我和路搭了一顶帐篷……洛里茨太太给我们弄了许多吃的东西，首先是喝可可，我把可可泼洒了一裤子。”

他忙于过节，以致这个故弄风雅的日记作者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时在慕尼黑召开的纳粹党代表大会。美国历史学家沃纳·T·

---

<sup>①</sup> “海尼”为“海因里希”的昵称。——译者



安格雷斯和布雷德利·F·史密斯认为，当时的希姆莱是“一个囿于习俗概念考虑事情的年轻人，怀有巴伐利亚中产阶级因袭相传的价值观，显然心地特别善良，没有色采，举止正常”。

他活动频繁，从不闲着。圣诞节期间，他给一个盲人朗读，帮一个退休的老年妇女烘制一只蛋糕，参加为救济维也纳贫苦儿童而举行的义卖演出，还出席多次集会，因为他是许多团体协会的会员：德国植物栽培学会、德国农业协会、文科高中校友联谊会、“自由之路”射击协会、古巴伐利亚射击联合会、慕尼黑技术学院参战者联谊会、慕尼黑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分部、德国旅游俱乐部、兰次胡特 1860 年体育协会，前皇家巴伐利亚第十一步兵团军官联合会。有这么多会员证的人是不难适应环境的。希姆莱的政治见解也只是反映了他周围社会的判断和偏见：这种见解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不过没有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狂热和笃信。

他可以算是一个巴伐利亚的保守派：为了向前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的遗体告别，大学生希姆莱特意借了大礼帽和大礼服。他为自己是巴伐利亚人而感到自豪，但在全国大学生委员会改选时，他却投票赞成德意志民族党候选人的名单。连他的反犹评论似乎也有一定的分寸。被民族主义分子杀害的德国外交部长腊特瑙，对他来说（希姆莱：“我高兴”）始终不失为“一位才智之士”。他过去的学友和民主之敌的沃尔夫冈·哈尔加滕，被他亲切多于鄙夷地称为“犹太顽童”。酒馆舞女、犹太人英格·巴尔科因和一个大学生私通被父母赶出家庭。希姆莱在名为国徽之鹰的酒吧间和她邂逅相遇，感到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姑娘”。

40

他的日记只有一点暴露出日后的希姆莱在政治上的侵略成性：他不甘心从此结束自己的行伍生涯。当他所热烈思慕的包午饭女主人的女儿拒绝了他笨拙的追求后，他感到战争和当兵是摆脱失恋痛苦的最好出路。他在 1919 年 11 月 28 日写道：“我现在

但愿能身临险境，让我以生命孤注一掷，让我去战斗，这也许会使我得到解脱。”1921年11月22日，他——这里已经显示出希姆莱日后的锋芒——写道：“倘使东方战事再起，我将投身其间。东方对我们来说是最关紧要的，西方很快就要死亡。我们必须在东方战斗和开拓殖民地。”他一次比一次更热衷于战争和穷兵黩武。1922年2月19日：“但愿果真能再次战斗、战争和出征！”6月11日：“也许我会这样或那样地去参加，因为说到底我是一位军人。不过眼下我得参加考试。”

他禀告父母：“我自己感到至今考试成绩相当不错。”这时，恩斯特·罗姆上尉闯进了希姆莱的生活圈，决意要和希姆莱血腥地、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他答应满足这个失恋者的入伍愿望。

这两个人究竟在何时相识，已无法查清。他们所走的道路已有多次交织在一起：1918年年底，罗姆在希姆莱家的住地兰次胡特第十二巴伐利亚步兵师师部供职，后来又在慕尼黑任第二十一步兵旅武器装备军官，1920年5月，后备役军人希姆莱就是在这个旅领到武器的。此外，罗姆还是那些半公开地偷偷进行活动的武装团体的秘密军火库主管人，这些武装团体被国防军看成是自己的民兵部队。1922年1月，这些团体在慕尼黑“阿茨贝格凯勒”啤酒馆举行会议，希姆莱和上尉就在会上相遇。希姆莱回忆道：“罗姆上尉和安格雷尔少校〔希姆莱过去所在连的连长〕也在场，十分亲切。罗姆对布尔什维主义表示悲观。”

罗姆给希姆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竭力想适应环境的后备军官怎么也不会忘记在等级森严的军界中，对地位比自己高出几级，每次遇见上尉先生，总要两腿一并，囊的一声碰响皮靴后跟。这两个人，一个是胸前挂满勋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连长、有相公癖的中世纪式的雇佣兵，另一个是夙愿未偿的武士和严格注意风化的资产阶级子弟，结成了奇特的一对。尽管如此，罗姆还

是善于使这个大学生对自己倾慕——希姆莱愿意为罗姆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希姆莱刚刚在1922年8月5日考试及格，并在施莱斯海姆<sup>41</sup>“兰德氮素有限公司”谋得了一席农业助理员的职位，旋即加入了由罗姆推荐的一个名叫“德国国旗”的民族主义组织。农学士希姆莱对此颇为高兴，终于又穿上了制服，尽管那只不过是“德国国旗”的浅灰色风雨茄克和绑腿裤制服而已。他下了班就扛起步枪，主动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进行操练，准备在行将到来的内战中参加街头格斗。

不久，他得到机会以其实际行动来表示他对罗姆的倾慕。从施莱斯海姆回来后——希姆莱于1923年8月底辞去了兰德氮素公司的职务，仍旧返回慕尼黑——，他得以首次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参加了民族主义运动，即阿道夫·希特勒发动的十一月政变。在此前后，“德国国旗”由于内部勾心斗角已改名为“德国战旗”，隶属于罗姆和希特勒领导。早已参加希特勒党的罗姆，深知如何动员自己的朋友加入纳粹党。希姆莱也跟党挂上了钩，但还不是纳粹党员，他心目中的未来伙伴是罗姆，而不是希特勒；他认为未来的标志不是卐字，而是君主政体的颜色<sup>①</sup>。

1923年11月8日晚，“德国战旗”在慕尼黑“勒文勃劳凯勒”啤酒馆开会，传来了希特勒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用手枪威胁巴伐利亚军政领导人最终表示同意讨伐柏林的“十一月罪人”的消息后，希姆莱顿时举起了帝国军旗出发。罗姆描述这一场面说：希姆莱的同事们高兴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相互拥抱，许多人欣喜若狂，热泪盈眶。国防军士兵纷纷扯下军帽上的黄帽徽！终于盼到了——这是异口同声的一句话，也是大家感到宽慰的话”。

罗姆将该团体不久前对着它举行过宣誓的一面旧帝国军旗交

<sup>①</sup> 指德国帝制时代(1867—1918)标志的黑白红三色——译者。

给了助手希姆莱，随即把手下的人拉上大街。几分钟后，这群狂人就排成行军纵队，步伐整齐地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进发，希特勒正在那里同巴伐利亚的掌权人物，即分离主义者首席邦长官里特·冯·卡尔和国防军将军冯·洛索就“民族革命”问题磨嘴皮。罗姆纵队来到布里恩纳街时，被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派出的一名通讯员叫住。他带来命令：让罗姆占领舍恩菲尔德街第七军区（巴伐利亚）司令部驻地的陆军部。罗姆上尉执行命令，一个钟头不到，陆军部已被他占领。这一伙共有四百人，他们在大楼窗口虎视眈眈地架起机枪，因为罗姆也渐渐看出苗头有些不对：遭到突然袭击的巴伐利亚政界人士和将军们在反扑过来了。

11月9日凌晨，隆隆逼近的坦克声闯入陆军部的人证实了他们的判断没有错。国防军和邦警察的部队开过来了，把房子逐一封锁，架上机枪和大炮，待命射击。战场上出现了可怕的寂静。路德维希街头拉起的带刺铁丝网，把敌友双方分开，希姆莱就站在铁丝网后，举着帝国军旗旗杆的手直打哆嗦。希特勒的癫狂行动导致同伙们和对手们、未来现代史上的杀人者和被杀者在少有的混乱中混杂在一起。希姆莱的身旁站着未来的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十一年后他却被当年自己的旗手派出的党卫队密探用子弹撂倒。站在罗姆旁边作好战斗准备的杜·穆林-埃卡特伯爵，后来担任了冲锋队情报工作头子，却受到希姆莱在第三帝国法庭和集中营的心腹们的恣意虐待。他们的对面，铁丝网的另一边，蹲伏着罗姆过去的通讯军官、“德国战旗”的秘密成员国防军少尉赫尔曼·赫夫勒，他出于对罗姆的忠诚，在1934年夏警告自己的前领导人提防日益临近的杀身之祸，以后还当上武装党卫队的将军，给希姆莱带来了麻烦。

今天的敌人是明天的朋友，现在的同志是未来的杀人者：1934年6月30日，党卫队刽子手的子弹将使里特·冯·卡尔和他当年

的对头罗姆殊途同归。只有在1923年11月9日那天促成卡尔同政变分子和解的两个调停人才经历党卫队这段历史。他们是罗姆过去的司令官里特·冯·埃普和后来任冲锋队领袖的赫劳夫。

然而调停失败了。罗姆不得不向国防军和邦警察缴械投降，只有徒手的“德国战旗”成员获准通过步兵警戒线。希特勒和罗姆发动的运动就此破产，上尉被囚于施塔德尔海姆监狱的铁窗之内。

旗手希姆莱茕茕孑立，一无制服，二无崇拜偶像，三无信仰。他面对一场危机：原来的饭碗已经敲掉，尽管四处谋事，仍无着落，玛雅·洛里茨终于对他下了逐客令，搞政治也使他的希望化为泡影。只由于他的一些女性崇拜者给他鼓气，他才没有完全躺倒，这些女友煞有介事地认为，旗手希姆莱在1923年11月9日作出了一项历史性的功绩。有一个女性崇拜者神魂颠倒地回忆道：“‘德国战旗’在陆军部前列阵以待，海因里希·希姆莱手挽大旗站在前列，人们果然看见大旗迎风招展，看到他多么引以自豪。我走到他跟43前，虽然没有说话，但我的心头响起了这样的声音：

自豪吧：我举着大旗！

放心吧：我举着大旗！

爱我吧：我举着大旗！”

希姆莱的女友玛丽埃·R（估计系：玛丽埃勒·劳施迈埃尔）把这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崇拜者的书信转给了旗手，并附上几句话：“谨将此信转给我的朋友海因里希，他可以将它看成一个小小的象征，意即感谢和铭记他给人带来新希望的、历时几小时的那个行动。”

这个政变失败者打定主意继续搞政治。希姆莱决定，在纳粹党被取缔后剩下来的两个钩心斗角的民族运动小组之间，选择其一而从之：他选择了处在鲁登道夫将军保护下的“民族社会主义自

由运动”<sup>\*</sup>。自由运动的成员中也有一个和希姆莱有过泛泛之交的旧友，即兰次胡特的药剂师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他是一名好斗和狡猾的纳粹分子，是自由运动小组中真正有头脑的人。施特拉塞看出希姆莱具有组织能力，立即起用了他。

1924年5月，国会大选在即，共和国的劲敌首次大胆运用民主这一武器和善举，从事危害民主的活动。施特拉塞企图利用希特勒政变在整个德国引起的轰动，将自己手下的纳粹分子塞进国会。一场史无前例的竞选闹剧在巴伐利亚甚嚣尘上。在这场闹剧中，人们也看到一个戴着风镜和大口罩的宣传员，驾驶一辆瑞典造的摩托车，在下巴伐利亚各村镇之间往返飞驰，传送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通知文告。

这个驾驶摩托车的人就是希姆莱，他不遗余力地进行民族社会主义的蛊惑宣传。他诅咒犹太人和共济会<sup>①</sup>成员，他煽动农民反对金融资本，他有声有色地描绘一个由高贵的农民决定一切的世界，他声嘶力竭地攻击布尔什维主义，诋毁民主政治和一切合理的政策。这个宣传员不知劳累地从一个村镇赶到另一个村镇。这里有一个星期内的活动安排表为例：1924年2月23日，去埃格米尔、兰魏德和比恩巴赫演说。2月24日，去克尔海姆和萨尔讲话，随后进行“个别解释”。2月25日，去罗尔作一小时半演说。

“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希姆莱告诉他的朋友基斯特勒说，“我得领导和从各方面扩大整个下巴伐利亚的组织。”他的力气没有白花：施特拉塞的运动捞到了近两百万张选票，赢得了三十二个  
44 国会议员席位。然而希姆莱对这些成就并不十分高兴，他怀疑自己是否确实在献身于一个前途可靠的运动。他写给他的朋友基斯

---

<sup>\*</sup> 另一小组名“大德意志民族团体”，其领导成员为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和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原注

<sup>①</sup> 十八世纪初起源于伦敦的一种共济性的秘密社团。——译者

特勒的信中谈到“我们民族运动的工作听天由命，在短时期内决不会产生明显的成就”，他甚至感到自己是待在“一个也许毫无希望的岗位上”。

民族运动者和纳粹分子之间争吵不休，身系囹圄的党的领袖希特勒的追随者同反对者之间勾心斗角，使这个性格软弱的人茫然无所适从。他站在右倾激进主义集团中，翘首企望有个偶像来重新激发自己，施展从小学会的适应环境的本领。他愿意听命于人，但不知这个主子在何处。他决心坚定信仰，但却看不到有理想。他渴望在历史上崭露头角，他已经把自己看成为殉难者，并写道：

纵使你身中弹，  
也要坚持战斗；  
你虽自认失利，  
旗帜依然存在。

等你长眠地下，  
擎旗仍有后来人；  
你所憧憬的幸福，  
他们将为之继续奋斗。

可是旗帜在何处呢？值得杀身成仁的神圣事业又在何方呢？希姆莱十分清楚，他是不能靠单枪匹马赢得幸福的，他生来就不是意志坚强的人。有害的疑虑一再挫伤了他的自负心，他始终没有充分的说服力相信自己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对自己的真实看法。

他感到自己缺乏在大庭广众面前应有的泰然自若，话说得太多，爱讲笨拙的笑话。希姆莱说：“人是一种多么可怜的造物。”“我是

一个空谈家和饶舌者，优柔寡断，我将一事无成”，他在1922年1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逗人取乐、好管闲事的小伙子：‘海尼会把事情做好的。’”他对此深有自知之明。

他对自己的事业完全失去信心，以致认真地考虑过要离开德国。他学俄语，打算去东部找个地方定居务农，有时他感到自己的未来仿佛是在土耳其或秘鲁——1919年至1924年期间，希姆莱在日记中十四次提到出国侨居的计划。后来，这个犹疑不决和惯于迷信的人断定自己的运气不好。“我们这些中世纪式的雇佣兵活该无人理睬和得不到法律保障，”几年后他对妻子这样诉苦地说。  
45 但他得到的回答是：“你别把自己的前途想象得这样可怕，不要这样来谈论前途。”希姆莱夫人的话更加说明问题：“因为想不到今年又碰上凶年。你去过星卜家那里，玛尔斯<sup>①</sup>控制了我們，所以凶上加凶。我干脆请你别谈这些吧。”

直到踏进了一个今后能取代他心目中上帝的人的圈子以后，他才逐渐克服了他那种自我折磨的疑虑：1924年12月，阿道夫·希特勒离开了兰茨贝格要塞监狱，随即着手重建已被禁止和陷于分裂的纳粹党。希特勒在不到一年间，就消除了使希姆莱在民族运动分子中茫然若失的状况。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将巴伐利亚民族运动分子和纳粹分子中的骨干纳入由他领导的新的纳粹党，两个月后建立了党卫队，并挫败了自己营垒中的所有竞争者，直到他在1926年年底能够最终建立起冲锋队作为党自己的军队。

希姆莱凭着择主而侍的本能，觉察到自己已找到了崇拜的偶像。1925年8月，他领到了新建的纳粹党党证，不久当上了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秘书，在兰次胡特圣马丁斯教堂附近一间陈设简

---

① 据罗马神话玛尔斯是战神。——译者



单的房间里办公，月薪一百二十马克。负责下巴伐利亚党的宣传工作的施特拉塞，把有些工作委诸助手。希姆莱跟最偏僻地区的纳粹党地方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于没有见过世面的纳粹分子来说，驾驶摩托车的他就是党领导的化身。为时不久，他就可以称自己是纳粹党下巴伐利亚地区的常务负责人了。

后来历史学家们纷纷揣测，希姆莱象莱茵区人戈培尔一样，在思想上投靠了希特勒的对手施特拉塞。实际上，希姆莱始终认为自己是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从来不是施特拉塞的侍从。当他的上司调往柏林并成为希特勒在北德的对立面时，希姆莱就进一步靠拢了希特勒。编年史作者至今还不清楚希姆莱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希特勒的。他称希特勒具有“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慧”；他和希特勒直接交往时，总是不能克制自己的畏缩情绪。

还在兰次胡特施特拉塞办公室工作的时候，他就对他的领袖怀有一种青少年学生似的敬畏心情。希姆莱的朋友汉斯·艾哈德对英国作家威利·弗里肖尔说，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希特勒的照片，希姆莱经常同照片上的希特勒低声交谈。即使是和希特勒通电话，他也要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后来在战争期间，他的保健医生费利克斯·克尔斯滕有次接到希特勒打来的电话，希姆莱感到十分幸福，几乎不能自己：“克尔斯滕先生，您知道您刚才是同谁讲话吗？您听到了领袖的声音。您多么幸福！赶快写信告诉您的夫人！您能得到这么一次十分难得的佳遇，她会感到说不出的高兴。”<sup>46</sup>

他觉得在希特勒身边经历过的“斗争时期”是自己毕生事业中最伟大的时刻。“那是一个美好的时期，”直到1945年他还满怀激情地这样说。“我们这些运动的成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并不害怕。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着我们，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这些年一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几年。”他一次又一次地推出摩托车，为自己的领袖在公路上奔驰，一个原来就患有痉挛症的人，由于热

衷于谋取功名，常常胃痛得几乎要昏过去。“您什么事都亲自出马，真了不起，”1927年年底有一个柏林女性崇拜者赞扬他说，“您的胃只是由于一再受到这样的折磨，才会发作起来。这不好怨胃。这是不消说的。”他后来的太太则失望地说：“你又上路了，今天我不禁想到，你的生活就是一年到头疲于奔命。”

希特勒没有亏待他，希姆莱在党的特权阶层中地位步步高升：1925年任纳粹党下巴伐利亚-上法耳次区副领袖，1926年任纳粹党上巴伐利亚-施瓦本区副领袖，同年任全国宣传工作副领导，1927年任党卫队全国副领袖。短短几年，一个犹豫不定和无所适从的大学生，变成了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以独具一格的组织才能为他的领袖所赏识。然而希姆莱并不满足于搞组织工作，他想成为周围环境的教育者和导师，要引导党和人民探索生活的真正源泉。

由于他长期待在农民之邦的下巴伐利亚，因此变成了一个癫狂而滑稽可笑的血统哲学和土地哲学门徒。从具有思考能力起，他的那种浪漫主义的历史观就认为农民阶级是民族的本源。“自由乡土上的自由农民，”希姆莱感慨地说，“乃是德意志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的最强大的后盾。”后来他又说，“从家世、血统和气质来说”，他是农民，他想象中的伟大人物全是农民的儿子，他所敬爱的英雄萨克森国王和征服斯拉夫人的亨利一世即捕鸟者<sup>①</sup>（876—936），他也称之为“他的民族的高贵农民”。

大学毕业后，在民族运动宣传影响下，他就设想了一种以农民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在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记录中，他设计了一所农庄学校，作为回到农村之国的胚种细胞；在这所学校里，全体师生“展示出真正的德意志国家制度的图像”，仿佛提供了一个

---

<sup>①</sup> 捕鸟者(der Vogler)为亨利一世的绰号。——译者

新社会的样板。

这所学校的教师，也就是农民梦寐以求的教师，是男女“师傅”和“伙计”。男师傅必须具备“领导者的品质”，此外还应“通晓人世间的欺诈和诳骗”。女师傅相反则是“生活乐观和品德纯正的、具备真正母性的女子，没有沾染世风日下的今日城市妇女的习气，性格坚强，但在日常生活中又温柔娴雅，事事乐于最终听从丈夫的话”。希姆莱式农民阶级的这种胚种细胞设置“朴实的艺术课”，并作为“思想和文化的中心内容”向“德意志民族的人士、作家和艺术家”随时公开宣传，以便脑力劳动者“能不受谬误思想潮流的影响，创造性地工作”。谁还会看不出这一套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和党卫队自己设想的乌托邦社会的基本因素呢！“但重点不在于知识，而是在于思想，”这位国家缔造者之一希姆莱这样要求说，并提出，他的学校计划培养“体质健康、神经健全、意志坚强的人”，这些人“通过经常同学校保持联系，逐渐成长为民族领袖”。

希姆莱甚至找到了看来愿意把他那农民-民族运动高谈阔论付诸实施的朋友。他们下巴伐利亚购置一座庄园，供希姆莱使用。可是他希望“物色到一批深孚众望的人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筹建一笔资金”，但这个希望最终破灭了。农庄学校只是空中楼阁。不过希姆莱并未放弃他的农民理想国的空想。这个枢密顾问的儿子认定自己身上具有教育天才，他以为自己是天生的伟大教育家，必能诲人不倦和给人教益。

他经常教训身边的人说，先辈们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情况是如何做工作的；他常常善于援引一个历史事例，用以阐明现实和教育同时代的人。还在战争期间，他就盼望“接受再教育才能进行教育”的和平时期到来——最接近他的知情者按摩医生克尔斯滕后来严肃地说，以希姆莱的性格而论，他对东方各国人民是宁愿教育而不愿消灭的。对于农庄学校的破产，希姆莱也获得了教益，当然

只不过是空想家和教派信徒的教益。他第一次面对农民阶级的经济困难，从中引出一种荒谬的结论。

农民神秘主义者希姆莱所看到的，不是至迟在俾斯麦的关税保护政策结束后已开始出现的那种德国农业结构危机，也不是对无力维持的小型企业采取合理化措施和予以废除的必要性。他所看到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一个魔鬼布下的光怪陆离的网状结构，它名叫“世界犹太民族”。1924年前后，他在一篇笔记中写道：农民的“最危险的敌人”是“世界犹太资本”，因为它“煽动城市居民反对农民”——而且“通过投机和交易所的操纵压低生产价格和提高消费价格。农民收入很少，城市居民开支很大。巨额的中间利润被犹太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所中饱。”1923年十一月政变以前，希姆莱日记中提到的犹太人至少还具有明显的个性，现在犹太人则千人一面，丑恶可憎，每一个“非亚利安人”都变成了所谓世界犹太威胁的游击队员。从现在起，犹太人在希姆莱的心目中仅仅是整体的污辱对象——未来的党卫队全国领袖找到了自己的敌人。

在同一篇笔记里，他还揭示了另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没有这个敌人，他今后是过不了日子的：斯拉夫人。他振振有词地说，德国农民阶级唯有在反斯拉夫人的斗争中才能保存和壮大自己，因为未来完全在于德国的东部。“特别是在东部，”他写道，“在大农庄占有制的情况下，今天有着大片土地出售。将农民和农业工人子弟移居到那里去是必要的，以免象过去那样，德国农民被迫让次子和第三个儿子流入城市。只有通过大规模移民，才能重新使农民在德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新的移民当然也是德国民族主义强大的表现。希姆莱说：“农民人口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是防止斯拉夫工人群众从东部入侵的唯一有效措施。因此应象六百年前一样，让农民担负起使命，在反对斯拉夫人的斗争中，使德意志民族保持和扩大它所占有的、哺育自己的神圣土地。”

希姆莱无意中就为日后的党卫队纲领提出了两个要点，即确定第三帝国反犹和反斯拉夫政策的基本思想。反斯拉夫“劣等民族”和反“世界犹太民族”形成为坚定不移的思想。这一纲领还未具有狂热的语调和虚伪的宗教狂——但希姆莱的整个政治狂想却以此为起点。

不过当时的纳粹党还微不足道，它还无法给希姆莱提供一种实行他那民族运动的农民政策的可能性。希姆莱参加了一个有志于认真从事回到农村去的小组：阿尔塔曼<sup>①</sup>。这些人来自德国青年运动中的民族运动派，并且是已经开始在自己家乡定居的民族主义理想主义者。阿尔塔曼的大部分成员并未参加纳粹党（虽然他们的头儿格奥尔格·肯斯特勒是党员），但这些青年人也坚信“血统和土地”，也患有反斯拉夫人的变态心理：他们决心把居住在易北河以东德国领土上的波兰农业工人撵回波兰去。

1924年，第一个阿尔塔曼小组启程赴萨克森，到一个庄园去尽它认为自己应尽的经济义务和民族义务。希姆莱所设想的下巴伐利亚农庄，显然也和阿尔塔曼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两千名青年涌向德国东部的庄园，形成了对付斯拉夫人的防御战斗力量。希姆莱日渐跻身于阿尔塔曼的领导行列。他当上了纳粹党巴伐利亚区领袖，同全国各地阿尔塔曼小组保持着联系，其中也有一个在勃兰登堡活动的阿尔塔曼分子，名叫鲁道夫·霍斯。此人后来任奥斯维辛灭绝营长官，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最凶恶的助手之一。

在这帮阿尔塔曼分子中，纳粹党区领袖希姆莱也结识了里夏德·瓦尔特·达里，他最早给这位民族运动农民政治家的偏见进行了理论上的加工，将其纳入一种种族理论体系，即北欧人种优越论。达里是阿根廷裔德国人，1895年生，曾经就读于英国温布尔

---

<sup>①</sup> 阿尔塔曼是 Artaman 的译音。——译者

登皇家学院，早先在普鲁士农业部任职，后来是纳粹党的农业专家，他收下比自己年轻五岁的希姆莱作门徒。

达里把自己多年来的说教内容传授给希姆莱：农业问题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血统问题”；农民（达里后来在一份党卫队刊物中这样阐述）“永远构成了我国人民唯一坚强可靠的血统基础”，因此国家的任务在于扩大农民的血统基础，而且是通过移民计划、奖励生育和控制农民流入城市等措施来加以实现。达里认为，关键在于“尽快使我国人民的优秀血统和土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优秀血统的提供者，他认为就是那种已将民族主义的青年运动成员搞得神魂颠倒的传奇式的生物：北欧人种。唯有“具有北欧人种血统的人”，才是世界的创造者——血统理论家达里自诩这是他对历史的一大发现。“我们知道，”党卫队刊物是这样概括达里的设想的，“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国家和最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北欧血统的人创造并加以保持的。我们也知道，一旦创造这些伟大国家和文化的、具有北欧人种血统的人混杂了其他人种血液，这些伟大的国家和文化也就随之毁灭。”

不过当前的任务是：抑制一切损害北欧血统神话的影响，消灭从共济会（它被纳粹宣传家夸大为一种统治世界的强大力量）直到各民族及人类和睦修好的基督教信仰的一切人道主义国际势力。希姆莱心驰神往，注视着眼前这个感觉其隐约存在、但从未认识清楚的世界。现在，这位血统和土地预言家的眼界打开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奇妙的景象：他看到了未来的民族运动中坚，看到了新日耳曼人的统治者，看到了这个党卫队帮派集团。

阿尔塔曼分子在历史的流沙中消失了，青年运动派的理想主义由于易北河以东大地主的利己主义而宣告破产，因为他们毫不迟疑地充分利用这些城市幻想家。不过希姆莱对于他所依仗这个阿尔塔曼兄弟达里却长期铭记在心，后来他把达里拉进党卫队，让

他主管党卫队新设立的种族和移民局，达里以此为跳板钻进了中央农业部。希姆莱也亲自将血统和土地的神话传授给由他建立的下巴伐利亚党卫队。这个身穿党卫队制服的农民理论家博得了党的上层人士的瞩目，充当党卫队全国领袖的时机已在向希姆莱招手。不过他还把握不定，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属于土地还是属于党卫队。他相信已找到了一个主张移居务农的生活伴侣。

1926年某天，他在巴特赖兴哈尔闯入一家旅馆的客厅避雨，他在一位女士跟前猛地摘下湿漉漉的猎人帽，使这位女客人溅了一身雨水。希姆莱狼狈地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站着个象他所幻想的日耳曼女神：金发碧眼，俨然是一尊女武神<sup>①</sup>。她名叫玛加丽特·博登，是西普鲁士贡歇策沃一个德国地主的女儿。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护士，到柏林后结了婚，不久又离了婚，用父亲的钱在柏林开了一家小型私人诊所。

这个童男子的纳粹宣传家显然一见钟情，但父母对儿子找到的对象却并不怎么满意。玛尔加——她这样称自己——比海因里希大八岁，而且除了有种种令人讨厌之处外，还是一个新教徒和结过婚的女人。很长一段时间内，希姆莱都不敢带着玛尔加去见父母。希姆莱对哥哥格布哈德说：“我宁愿一个人去驱散有成千个共产党人的集会！”

父母没有固执己见，听任这对情侣去憧憬未来。海因里希和玛尔加在1928年7月3日结了婚，并考虑双双去共度移民生活。玛尔加变卖了私人诊所，夫妻把所得款项在慕尼黑附近的瓦尔德特鲁德林买下一块地皮，在那里盖了一座小木房：底层有两间住房，上面还有三间。希姆莱执意要亲手搭一座鸡棚，因为希姆莱一家曾计划办一个大型养鸡场。

---

<sup>①</sup> 女武神(Walküre)为北欧神话中司战争的奥丁神的十二侍婢之一。——译者

“亲爱的，我老想着到我们将会有的那一小块土地上去，”早在婚前几个月，玛尔加就兴致勃勃，并以她初识希姆莱时惯用的戏谑口吻写道：“亲爱的，我相信狠心的男人必然要注意省吃俭用。因为你知道，狠心的妻子总是有多少钱花多少钱的。”夫妇俩养了五十只种鸡，但是移居和养鸡场的计划，由于筹款困难和希姆莱的党51 务生涯而没有实现。作为纳粹党工作人员，希姆莱的两百马克月薪是没法办好养鸡场的。1929年5月6日，玛尔加写信告诉丈夫：“情况非常不妙，这些母鸡每天只生两个蛋。我很苦恼，靠两个蛋我们怎么过日子，而且还要积攒些钱过圣灵降临节。老是倒霉。我也注意积钱，但很快又花光了。”她不断地为钱发愁：“你信也不写，真狠心。如果明天上午以前不给我钱，你就别指望贝尔塔〔女佣〕给你去送鞋子。”

随着经济上的矛盾，夫妻之间出现了危机，来势之快出乎双方预料。这个瓦尔德特鲁德林的主妇冷酷无情，相当神经质，几乎从来没有高兴的脸色，很快就把这个感情过敏的丈夫气得越发经常不回家。在他们仅有的一个女儿古德龙出世后，这两口子就分居了。

玛尔加徒然地期望，有一天纳粹政治能使这位家主和丈夫重回身边。“等选举过后，至少能有几年安静……你，你会永远和我待在一起的，”她这样期待着。另一封信中写道：“你这个没良心的职业军人，你也该上这儿来走走呀。”还有一次写道：“哪怕你来住上两天也好，你来吧。”可是玛尔加渐渐看到，她的海因里希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有时想到自己老是待在家里，我真伤心。今天我考虑了我们怎样庆祝你的生日。亲爱的，我们一道去参观一个展览会好吗？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呢，”她告诉他说。另外一次又说：“我近况不好。到底该怎么办呢？心里总是不由地惦念着……好人啊，你说叫我怎么办呢？”



希姆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早已被领袖的命令迷住心窍——领袖于1929年1月6日命令他担任党卫队头子。现在，这个领到第168号队员证的党卫队员，可以把他向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和瓦尔特·达里学到的本领，全部施展出来了。党卫队已经存在，希姆莱感到，它只是在等待有一个能手来将它扩建成为民族运动的集团，扩建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的中坚。

当然，这位新上任的党卫队全国领袖很快就知道，他的领袖对他要求的，并不是世界观上清一色的纯正语言。希特勒不是要一个有信仰的神秘人物集团，而是要一支盲目服从的卫队，一个巩固他个人统治的工具。纳粹党正站在十字路口。二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驱使着越来越多的怀有不满情绪的德国人进入纳粹阵营，加强了同时也危及到阿道夫·希特勒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一地位必须不顾任何阻力得到新的巩固。德国政党史上最残酷的一章开始了。

## 第四章 从卫队到党的警察

党员卢多尔夫·哈泽有一个梦想。他是纳粹党汉诺威南区地方组织领袖和民族运动“古代北欧吟唱集团”的领导成员，在其致慕尼黑党的全国指导处的信中，陈述了在他看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哈泽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1923年慕尼黑十一月政变后之所以分崩离析，是因为党缺少一个领袖团，而领袖团又缺少一个权力工具。重新建立的党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党内的民族社会主义集团”，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给领导充当卫士和助手的秘密社团。哈泽设计出一个使运动保持钢铁般团结一致的党内秘密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进行清洗组织，坚决彻底，如有必要，对友邻团体和机构也可采取行动”；同时，他们“通过监视等手段，掌握对手的计划、行动和关系等至关重要的情况”。哈泽要求未来的民族社会主义集团必须成为“溶化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中”的一个组织，“它应成为最高领袖必不可少的工具，使其能从根本上、富有成效地推行民族运动的强权政治”。

这样，党的地方组织领袖哈泽就具有预见地写下了党卫队的基本思想，它有朝一日将使其阴影投在党的身上。可是，慕尼黑党的指导处干部看到这封来自汉诺威南区的信件，不知道应该怎样办理。哈泽的名字也就湮没无闻，他的条陈归入了档案。

但是，1929年1月，有一个人进入了慕尼黑舍林街五十号后楼纳粹党指导处的机关，他同哈泽有类似的见解，而且后来在其档案材料中重新找到了这份未注明日期的条陈。新上任的党卫队全

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确实力图把他的组织“溶化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中”。当然，眼下他的境遇和党内同志哈泽并无两样。对这个瓦尔德特鲁德林村的农学士和养鸡者的勃勃野心，党内大多数同志只报以同情的微笑。

许多人认为，希姆莱是个怪人。人们议论纷纷，说他是一个教派信徒，他把自己职业生活中有关养鸡的设想，同党的官方种族主义信条糅合成一种离奇古怪的中坚概念。此外，他那过于狂热的野心，也与他接管这么一个党的小小机构不相称地到了荒唐的地步。当时，党卫队只有二百八十名队员，隶属于对他们不大重视的“冲锋队最高领袖（OSAF）”弗兰茨·普菲费尔·冯·扎洛蒙麾下，并且艰辛地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普遍的偏见作斗争，这 53 种偏见把党卫队看作是一支推销党的报刊的队伍。

但是，希姆莱不因这种嘲弄而陷入迷惘。他制定了一项野心勃勃的扩张规划，要在短期内加速扩张党卫队的人数，并向外界突出党卫队的中坚性质。1929年4月，他向希特勒和冲锋队最高领袖普菲费尔呈报了一项实际上建立党卫队集团的规划草案。从这时起，只有符合极其严格选拔条件的人，才有可能被党卫队吸收，对于血统和土地神秘教义信仰者达里的门徒来说，除了着眼于挑选种族之外，别无其他可能，除了北欧勇士的虚有其表、富有浪漫色彩的形象外，再也没有其他理想的男子汉。

嗣后，希姆莱作了这样阐述：“我们犹如育种员一样，有责任对一种已经混杂和退化了的原有良种，重新纯化、培育。首先遍及田野进行所谓挑选粗壮的种苗，即第一步从外表上将我们认为不符合用来建立党卫队的人淘汰掉。”要真的采用如此崇高的原则，毫无疑问，希姆莱就得裁减党卫队中的一半人员，因为党卫队的成员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几乎都不象瓦尔特·达里在实验室里用试管制造的日耳曼型人。希姆莱知道，必须避免这种自我破坏。他

三令五申指示，新的条例不适用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兵的老党卫队员。对于精选方案的螺丝，他只能逐渐地拧紧。希姆莱说：“我首先提出，一定要达到规定的身高〔一米七十〕的要求。”他以行家具有的骄傲口吻作了补充，因为他知道，“身高超过规定标准的人，必定符合所要求的血统”。

他叫人把每个发展对象的照片拿来，用小型放大镜长时间地一一细细端详，最后由他作出决断，这个对象是否符合这位种族狂的粗壮种苗园艺家所说的“优秀血统”。希姆莱对军官们解释说：“我思量这人的脸上是否非常明显混有其他民族血统的痕迹，即人们通常说的颧骨特别高，面貌象蒙古人或斯拉夫人？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要提醒你们注意这个经验体会，请你们回想一下1918和1919年担任士兵苏维埃成员的那些人的模样吧。”

这个解释一语道破了希姆莱的“优秀血统”为标准的生物学上的精选，并不仅仅出于种族主义的观念所编造出来的谎言。这种精选也是考虑到当年参加世界大战的军官和自由团头头们必然会有想法，他们还未忘却经受过被扯下肩章的痛苦感受。对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士兵苏维埃是个人耻辱的一种象征；战争一结束，极左派的士兵扯下了军官们的肩章。创痛的另一面则是，  
54 这些同样的士兵苏维埃曾亲眼目睹，在发生革命的情况下，保护皇帝大元帅的军官们连手指也都没有动一动。见习士官希姆莱本人是否亲眼看到这些士兵苏维埃的情况，这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在红色叛乱分子面前可耻地放下武器”（罗姆语）。希姆莱懂得反复提醒当年的军官，不要忘记他们同士兵苏维埃的那些不愉快的遭遇：“你们当中每个当时当军官的人，都会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对这帮人有所认识。你们定能发现，一般说来，这些人在我们德国人眼中，看上去总是有点古怪，因为他们多少带点古怪的特点，他们已经掺进了异族的血液。”

这样的论证完全符合那个社会集团的内心世界，希姆莱把那个社会集团看作是党卫队首批后备军的储备源地。血统 - 精华的观念，使早先的军人、身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大学毕业生，和失业者这一大群无人问津的人心驰神往，他们在经历了自由团和民族主义军人团体一段迷茫的旅程后，正在探索新的组织形式。希姆莱的种族精华观念给了他们一个栖身之所，答应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根基已被摧毁和社会声誉丧失殆尽的混乱处境中拯救出来。

精华，过去一直是一个社会概念：谁有财产，受过教育和出身名门世家，谁就属于精华。对于失去希望的、上过前线的这一代人来说，通向精华的大门是关闭着的；不善于适应环境和职业军人的浪漫主义的性格，把他们驱入社会的中间地带。现在，希姆莱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精华取代了社会的精华：即种族精选，世界观的贵族。优秀血统的精华概念模糊不清，尺度颇宽，足以收容所有失去希望的人群，只要他们讨希姆莱欢心的话。他们很快就成群结队地蜂拥而来。

早先党卫队摇篮时期的成员是屠宰商的下手乌尔里希·格拉夫和文具商约瑟夫·贝希托尔德一类的城郊小资产阶级分子。现在，一个新的阶层——中产的和富有的资产阶级中的破产者——涌进了党卫队。这些新参加进来的人员，给党卫队增添了一种冷酷和好斗的心理状态，这是同任何思想意识都截然不同的。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来历：他们曾经是自由团的后卫队，他们是“从来没有被战争遣散、永远是秉性好战的人”。1930年，替自由团唱赞歌和刺杀腊特瑙的凶手恩斯特·冯·扎洛蒙就是这样描述他们的。

自由团的成员代表着一种过于德国式的、对文化抱有憎恶的一代，这一代曾经待在渴望已久的、世界大战的强劲暴风雨中，把资产阶级的伪善和饱食终日的所有弊病腐恶荡涤干净，并如同他

们所崇拜的英国偶像、阿拉伯陆军上校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所说的那样，具有“自我捐躯”的抱负。战争已经过去，资产阶级社会仍苟延残喘，但是这些上过前线的一代人，几乎没有被战壕士兵永远不要再有战争的呼声所触动，继续寄希望于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可恶世界。

对战前社会的憎恶转变成对战后社会的反感。在自由团员们看来，即使在和平环境中，暴力和残暴也是将资产阶级文明的破烂货付之一炬的正当手段，同时，他们的那些以动听语言扰乱人们思想的诗人也应运而生了。失去希望的一代的最重要代言人、普鲁士最高奖章获得者恩斯特·约恩格<sup>①</sup>上尉写道，战争在任何时候都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我们从峥嵘、蜿蜒的群山沿山谷而下去寻找新大陆。只要我们生命的车轮还在不停地转动，这场战争就是辘辘转动的车轮轴心。也许它已经完结了，委弃于战场，有如行刑房和绞刑架一样臭名昭著，但它的精神已经深入于它的奴隶们的内心之中，并将使他们对它发挥的效用永不忘怀”。

战后德国的混乱，为战争之轴辘辘转动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国家需要军人击退共产党起义者和波兰的叛逆者，参加过前线作战的一代人，对于重新拿起武器简直高兴得心花怒放，何况还有约恩格告诉他们：“还有什么能比进行战斗的人更加神圣？”毫无疑问，新的军人与旧的军人截然不同。他们称自己的部队为自由团，大致是想由此明确显示出他们是志愿为政府效力的，而且也可以自动解散。他们不是忠于政府，而是忠于在他们前面开道的旗帜，只忠于他们所隶属的头目。

德国军事史上很少见到过比 1919 年和 1920 年的自由团更为冒险的、由既打仗又搞政治活动的军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了。少尉

---

<sup>①</sup> 他的作品曾在纳粹德国风行一时，当时，仅有他与恩斯特·维查特的早期作品，在纳粹统治时期出版发行。——译者

们领导着虚有其名的一些团，对于来自各远方参谋部的命令，只是根据意愿执行。他们是职业军人，谈到这点时都引以为骄傲。象中世纪雇佣兵一样，部队对他们来说是战友们欢聚的团体，是唯一的家园。象雇佣兵一样，七万名自由团成员“吊而郎当，吵吵嚷嚷，故意戕害自己的健康，追求难以言状的男色和冒险，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他们象中世纪的雇佣兵一样，遭到生活优裕、面颊丰满者的白眼；他们由于自己过着野营篝火和风餐露宿的生活，所以对这些人的回答是，在激烈战斗和长途行军中……用嗤之以鼻的态度来扫除另外那些受尊敬的人物的看法和评价”（扎洛蒙语）。

这样一支军队，象是专为了树立一面无情暴力的旗帜而建立的。由于旧的军事纪律的传统和准则早已破坏殆尽，部队开创了秘密审判制度。自由团对他们认为犯有罪行的人，采取枪决的处置办法，并美其名曰“司法自救”。人的生命，无论自己的人和不属于自己的人，自由团都不当作一回事。他们的口号是：敢于处死和视死如归——后来的武装党卫队也是如此。恩斯特·冯·扎洛蒙在1930年对自由团的赞许，成为十年以后希姆莱士兵的标志：“毫不留情地对付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群众及对手，无限蔑视所谓生命的神圣性，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充当俘虏的鲜明倾向。”56

自由团完蛋后，暴力的恶性肿瘤继续发展。秘密审判转移到了政界，追捕民主派和共和派人士。一如既往，恐怖是民族主义的武装团体和党派的关键暗语。然而自由团的成员已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已投奔冲锋队，并在其中爬上了领导岗位。同时，在经济萧条的阴影下，成千上万的失业者蜂拥而来，使过去自由团的成员清楚地知道，冲锋队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家园：从各地劳动局门前等候谋职的长蛇行列里吸收的冲锋队员，只不过是眼前的反叛者。他们期待阿道夫·希特勒将使们重新得到面包，从而能回到老婆和孩子的身旁；自由团的成员，也包括那些穿

上褐衫的人情况则不同，他们鄙视资产阶级世界，但冲锋队中即使是残暴成性的无赖，心中也多少向往能回到这个世界中去。

现在，海因里希·希姆莱展示出一个真正的家园：党卫队这个精华集团。从1929年起，自由团战士就成群结队涌入党卫队。他们是随着两批高潮进来的，首批的老战士，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发现和找到了加入这个集团的门路，这一批中有一些赫赫知名的人物：波美拉尼亚的帝国国防军军官埃里希·冯·登·巴赫-齐列夫斯基，他因从事民族社会主义阴谋活动而不得不离开他的步兵团，从1931年起建立了边陲地区的党卫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少尉自由团头目赫尔道夫伯爵的副官弗里德里希·卡尔·冯·埃贝施泰因男爵，后来当了萨克森的党卫队负责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尉边防军指挥官乌多·冯·沃伊尔施则组织了西里西亚的党卫队。

经济危机掀起了第二批人进入党卫队谋求出路的浪潮，这一批人曾经一度在资产阶级生活中勉强地站住了脚跟，但在日益残酷的竞争中，丧失了他们在自由经济中的地位。破产促使他们穿上了党卫队的制服。上校的儿子、前吕佐夫自由团上尉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抛弃了自由商的社会地位。地方法院顾问的儿子、前黑森大公国第一百一十五近卫团少尉卡尔·沃尔夫失去了他的广告事务所。医生的儿子、前参加西线作战的少尉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奥伯格博士关闭了他的香蕉进口商行。

57 希姆莱允许如此众多滋事好斗的自由团成员加入进来，使党卫队人数不断增长。他风尘仆仆地周游德国各地，为他的精华集团大肆宣传。他蔑视党内反对他急切扩充的一切阻力。当他宣称，他在汉堡可以立即拉起一支五百人的党卫队时，纳粹党汉堡区领袖克雷布斯反驳他说，汉堡的党员几乎还不到五百人。希姆莱对此狂妄地说道：比例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人。



罗姆跟希特勒闹翻后，跑到玻利维亚去担任德国军事教官，1930年1月29日，希姆莱向他早先的引路人罗姆报告说：“党卫队在成长，至本季度末可望达到两千人。”希姆莱写信说：他的旗队长都是些“精明干练的汉子”，还告诉罗姆说：“将逐月加强业务活动和提高吸收条件。”党卫队成员人数不断逐步上升：1929年1月为二百八十名，1929年12月为一千名，1930年12月达二千七百二十七名。党卫队如此迅速成长，促使希姆莱最终决定把他的精华集团这块磁铁，转而对准迄今还未对其开放的一个储备源地：冲锋队。

冲锋队那里还有着罗姆的前线派掌权时代的自由团成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于改换门庭转向党卫队，并非不感兴趣。但是冲锋队最高领袖普菲费尔非常警觉，提防他的任何下级头目投向希姆莱集团。早在1926年年底，普菲费尔就在一项命令中规定，党卫队只许在冲锋队领导最密切的配合下采取行动。从这时开始，党卫队就不可能自行其事了，在党卫队和冲锋队采取共同行动时，党卫队成员始终受当时所属冲锋队领导的指挥。普菲费尔首先紧紧控制党卫队招募人员。如果发生这种危险，即党卫队（普菲费尔说）“把所有具有领导才干的人全部吸引过去，从而违背意愿地窒息了冲锋队的成立”，那冲锋队最高领袖就非得过问不可。

可是，希姆莱并未被普菲费尔的命令所吓退。他开始暗地里在冲锋队中大肆宣扬党卫队集团，并拉走了大批冲锋队员。希姆莱取得的成就并没有长期瞒过冲锋队的领袖。“最危险的事情是，新近在筹建中的党卫队组织使用卑鄙手段招募人员，并试图瓦解冲锋队，”东德地区冲锋队领袖施滕内斯满腹牢骚地说。在柏林，怒不可遏的冲锋队队员纷纷印发匿名传单，反对“以牺牲冲锋队来扩充我们平民阶级党魁的私人卫队党卫队”。

希特勒立即制止了党的两支部队之间的敌对状态，并帮助希

姆莱首次取得一项巨大成就：1930年年底，他将冲锋队和党卫队各自分开。党卫队虽然在形式上还隶属于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但它已获准独立于冲锋队之外。希特勒说：“任何冲锋队领袖均无权对党卫队发布命令。”甚至在制服上也显示出党卫队的独立性，党卫队着黑色制服，以区别于冲锋队的褐色制服；党卫队员戴黑帽，<sup>58</sup> 结黑领带，穿黑裤子，佩戴镶黑边的卐字臂章。左袖口上有一条五公分宽的带阿拉伯数字的黑边，标明党卫队员所属突击队的番号。

党卫队赢得了它的初步独立。甚至，希特勒还允许它建成为一个面目全新的组织，废除了原先的十人编制（任何一个地区不得超过十名队员和一名队长的编制），重新建立一种类似冲锋队的职衔和编制的组织结构。现在规定党卫队的最基层的单位为**小队**，一名小队长，八名队员。三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设中队长一名，队员人数在二十至六十名之间，相当于军队中的排。三个中队编成一个**突击队**——党卫队最重要的基层单位——，人数七十至一百二十人，由一名突击队队长统率，相当于军队中的连。三个突击队组成一个类似军队营编制的**突击大队**，人数二百五十名至六百名，由一名突击大队队长领导。三至四个突击大队编成一个**旗队**，人数一千至三千人，由旗队长率领，相当于军队中的团。若干旗队组成一个分队（后称：**区队**），使人联想到军队中的旅，它的领导人称为区队长。后来又规定若干分队或是若干区队组成一个支队或称**地区总队**，由一名地区总队队长统率，相当于军队中的师。

当然，眼下建立新的党卫队部队还是一纸空文，希姆莱还缺乏人员来使这些设想付诸实现。但是希特勒为使党卫队实现这种抱负打开了方便之门。他指示，党卫队不要再在冲锋队内招募人员，相反，应由冲锋队来为党卫队输送人员，而且要提供各地区规划中的党卫队人数的一半，特别叫冲锋队感到不舒服的是，有一道命令规定，只许“挑选优秀的人员”输送给党卫队，此外，各地党卫

队突击大队甚至有权拒绝接受不符合条件的冲锋队员。

冲锋队领袖自我解嘲地说，现在至少把党卫队干预冲锋队重要事务的一切门路都给堵住了。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的代表奥古斯特·施奈德休勃期望：“冲锋队终于有权制止党卫队领袖和队员在我们的队伍中招募人员，哪怕是用非正式名义进行这种招募工作。”冲锋队领袖施奈德休勃给迷惑住了。显然，他读过1930年11月7日希特勒的命令，忽略了一句具有中心思想的话，正是这句话说明了，希特勒为什么突然同意党卫队进行高度爆炸性的扩大。这句话的原文是：“党卫队的任务首先是在党内执行警察职责。”纳粹党地方组织领袖哈泽的梦想实现了，秘密集团终于在党内值勤守卫。

阿道夫·希特勒有充分理由，正是在目前这个时刻召唤他的私人卫队充当他的帮手。党的基层组织骚动不宁，说明他的地位极端岌岌可危。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日益蜕变成为了阴谋诡计、虚伪欺骗、暗杀行刺和玩弄政治的名利场。希特勒起用党卫队的目的就在于，使党保持钢铁般的团结，以及对一切不顺从党的领袖的行径挥舞大棒，实行镇压。在这个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存在着许多不顺从的情况，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党。

它原先是一个民族运动-全德意志的小资产阶级协会，随后充实了苏台德地区产生的民族社会主义观念的货色，不久沦为巴伐利亚各武装团体的政治附庸、民族运动阵营相互攻讦的政客们的迷宫，后来是一个带有无产阶级思想的民族运动的社会主义试验场所，冲锋队-无产者的避难所，和反动的党派领袖及工业家的冒险园地——一个如此五花八门的党不可能有内部的统一，而只能是热衷于暴行、吵吵闹闹和唯恐天下不乱。只是对于进步和民主的仇恨、夺取国家权力的欲望，才把他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但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信条，几乎没有一条不受到党员自己

的非难，几乎没有一个党的大头目能得到另一个大头目的支持。

希特勒的卫士赫尔曼·埃塞侮辱北德民族运动的成员，说他们是崇信奥丁神的光明派教徒的团体。莱茵区人约瑟夫·戈培尔建议把“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清除出党，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总有人提出收回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党员证的要求。戈培尔提出：“在国家内实行社会主义专政的思想是未来的事情”，结果不得不要受到责难，说这是《红旗报》的语言，而不能登在纳粹党的机关报上。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要求同苏联结盟，因为莫斯科在反对凡尔赛和约中是盟友，这种要求立即受到反苏十字军式的人物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反对，他主观臆断地认为党已经成为赤色世界敌人的战利品。就连狂暴的反犹运动也没有把所有的纳粹党员捏在一起，党内的反犹主义形形色色，并不一样。戈培尔认为：“犹太人问题，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大概资本主义的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犹太人不是一回事。”

党内争执如此激烈，以致不得不建立一个调查解决委员会，简称 *Utschla*①，在前少校和纽伦堡冲锋队领袖瓦尔特·布赫的领导下，消除党员中的小资产阶级齟齬不和，几乎忙得他不可开交。

但是，希特勒懂得利用阴谋诡计来巩固他的权力地位。希特勒是各种针锋相对思想的天才综合家，他能够把党内各个派系合成一体，同时突出自己的地位，他似乎日益成为党内的一把独一无二的钳子——他一有可能就亲自煽动别人相互对立。别人相互争斗越剧烈，这个慕尼黑的党的教皇就必定越被人承认。“完全是存心这样干的，”罗森堡在纽伦堡的绞架阴影下招认道，“希特勒容许党内存在敌对的派系，从而得以使他自己扮演仲裁者和领袖的角色。”在党内矛盾的掩盖下，希特勒有目的地利用每次危机，每种意

---

① 德文 *Untersuchungs- und Schlichtungsausschuß*（调查解决委员会）的简称。——译者

见分歧，苦心经营。在1925年2月建党后，希特勒的权力几乎还没有越出巴伐利亚的范围。

对于他来说，进入北德和西德民族运动和民族社会主义小组的道路，被一道由三个人把守着的防线封锁着：兰次胡特的药剂师、天才的组织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他的弟弟、令人捉摸不定的、空洞的理论家奥托·施特拉塞博士和他的负责宣传工作的头目约瑟夫·戈培尔博士。这三个人严格控制着北方的纳粹组织，在思想意识上也不同于小心翼翼地在复旧和革命两者之间看风使舵的希特勒。他们相信一种民族运动社会主义，要求工业国有化和宣传无产阶级的德俄联盟。1926年2月，希特勒突破了施特拉塞的防线。他在班堡举行的一次领导人会议上（以希特勒党徒为主的会议），将针锋相对的社会革命纲领提付表决，结果取得了胜利。戈培尔终于倒向了希特勒这一边。但是，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也半心半意地和希特勒取得妥协，并进入慕尼黑党的领导机关，担任全国组织部门负责人。

只有奥托·施特拉塞在柏林继续同希特勒进行公开斗争。作为颇有影响的北方纳粹党机关报《柏林工人日报》主编，和一个爱从左的方面阐释民族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集团的首领，在柏林筑起了一座党内反对派的碉堡。于是，在施普雷河畔争执不休的纳粹党派系中间，介入了一支第三种力量。柏林的冲锋队出动了。

柏林冲锋队的头目是体格魁伟的库特·达吕格，原是柏林垃圾运输部门的工程师。他在1921年率领一支自由团，从波兰叛乱者手中夺取了上西里西亚的安纳贝格，在首都，他是最凶悍的暴徒之一，由于他见识短浅，柏林的地痞流氓都管他叫“杜米-杜米”<sup>①</sup>。1923年11月政变后，他参加了罗姆那个代替冲锋队组织

---

① 德文“Dummi-Dummi”意指“草包—草包”。——译者

的火线分部，后来建立了以自由团老战士、游手好闲的寻衅滋事分子和民族运动小组体操运动员组成的第一支柏林冲锋队。这支冲锋队在1926年年初有五百人，超过了柏林纳粹党党员的人数。

冲锋队员利用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纳粹党柏林区领袖是以奥托·施特拉塞为后台的政务参议恩斯特·施兰格，冲锋队队员感到他过于软弱无力，要求他下台，并将他们所信任的原火线分部领袖豪恩施泰因抬了出来，打算在1926年8月25日接管其权力。在纳粹党和冲锋队领导人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上，豪恩施泰因给了施兰格的保护人施特拉塞几记响亮的耳光，随后，冲锋队的伙计们得意地扬长而去，看来领导权的更迭势在必行。

但是，希特勒插手了，并且再次显示出，他善于怎样利用对手去制服对手。1926年11月，他派遣归顺他的戈培尔前往柏林担任新的区领袖。戈培尔有充分理由死心塌地把赌注押在希特勒的这张王牌上，否则，他在柏林将一事无成。施特拉塞一派早已把他看成一个憎恶的背叛者。柏林冲锋队把戈培尔的名字和他们一次可耻的失败联在一起。不过希特勒也懂得耍弄把戏，将羽毛日益丰满的冲锋队引向党内斗争。冲锋队是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所领导的政治组织(PO)的宿敌，这个政治组织被冲锋队蔑视为“政治废物”。党阀们和冲锋队能够相互保持均势，并协助希特勒轻易地驾驭着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当然，这并非是希特勒重视冲锋队的唯一原因，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想利用冲锋队掌握权力，也只有通过冲锋队的历史，通过与希特勒的希望和失意相连的历史，才能清楚地了解何以党卫队能最终晋升为领袖专政的决定性工具。希特勒把冲锋队看成是一个化政治思想为战斗力量的组织，冲锋队纵队出动的使命，就是“在无休止的竞选中的一种恐怖手段”(历史学家沃尔夫冈·绍尔语)，用以无情打击民主的竞争者本来就十分微弱无力的主张。

象希特勒一样，冲锋队最高领袖普菲费尔·冯·扎洛蒙也是一个狂热崇拜出动纵队的人。他们两人都认为，群众听到震耳的步伐声，看到具有良好纪律机器人似的四列纵队行进，就会在心理上产生强制作用。普菲费尔还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群众催眠术进行了极其露骨的描述。“精神和外表协调一致、纪律良好、清楚地显示出或使人感到充满斗志的一支大队人马的面貌，”普菲费尔说，“就能使德国人产生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心灵上宛如一种比任何文字、演说和逻辑更具有说服力和更动听的语言。”对搞行军把戏的战略家普菲费尔说来，首先引起重视的是“力量的印象”，“行军纵队的力量，及其为之进军的事业的力量。这种事业的内在力量使德国人从感情上断定它是正确的。如果成群结队的人有计划地将躯体、生命、存在都倾注于一项事业，那么这项事业必然是伟大和真实的。”

作为行军纵队的驯兽者前上尉普菲费尔知道，更加高明的驯兽师莫过于原先的军官们了。他们精通行军操练的口令，绝大多数冲锋队员都是早先的前线士兵，他们本来就习惯于听从他们的发号施令。普菲费尔找来一些老战友，要他们担任这支褐色军队的领导人。1928年，他建立了七个设区队长的区，这些区都是由早先的职业军官掌握。退伍警察上尉瓦尔特·施滕内斯任冲锋队东区（柏林）区队长、退伍少校保罗·丁克拉格晋升为冲锋队北区（汉诺威）区队长、退伍上校库特·冯·乌尔里希担任西区（卡塞尔）区队长、退伍海军上尉曼弗雷德·冯·基林格男爵擢升为中区（德累斯顿）冲锋队区队长、退伍少校奥古斯特·施奈德休勃主管南区（慕尼黑）冲锋队、退伍上校维克多·卢策担任鲁尔（埃尔伯菲尔德）冲锋队区队长、退伍上尉赫尔曼·雷施尼执掌奥地利（维也纳）冲锋队的区领导工作。

1929年初，普菲费尔将这些职业军官更紧密地拉在自己身边。

区队长施滕内斯、丁克拉格、乌尔里希和施奈德休勃被选拔为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的副手，乌尔里希还被任命为冲锋队训练总监。这支党的军队的干部，已着手准备接收1929年秋季爆发经济危机后涌向冲锋队来的新兵。日益增长的失业灾难促使冲锋队爆炸性地扩充起来。1930年，它的人数已达六万至十万之间。

冲锋队的扩张，增强了冲锋队部队的自负心。冲锋队领袖们显得日益不愿接受政治干部的指挥。冲锋队进一步从事摆脱政治组织的独立活动。希特勒满腹狐疑。来自柏林的报告说，他在那里玩弄的保持均势把戏已岌岌可危，这时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疑虑。在施普雷河畔，以社会灾难和日益抨击所谓已经不再革命的希特勒政策为标志，奥托·施特拉塞的知识分子派和冲锋队领袖相互靠拢接近了，甚至希特勒派出的监视人戈培尔也开始动摇。

但是，在两个集团尚未形成结盟之前，希特勒就踩灭了闪烁着的火花。1930年5月21日，他突然出现在柏林，同施特拉塞展开一场世界观的辩论，并以达到蓄意的翻脸目的而告终：希特勒将奥托·施特拉塞带走，授意戈培尔将其追随者清除出党，并胜利地接到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效忠电报。希特勒认为，柏林的反对派已缄默不语。此外，还有党卫队在负责监视柏林的党内政敌。希特勒日益信赖具有警犬本性的库特·达吕格，达吕格这时已离开了冲锋队，于1929年春天擢升为柏林党卫队领袖。

柏林党卫队领袖取得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慕尼黑党卫队  
63 全国领袖制约的地位。在一般情况下，他只跟希特勒和冲锋队全国领袖保持联系。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只有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部意见分歧，才能将他推到关键性角色的地位。如同达吕格的一位工作人员所描绘的那样，在柏林体育宫附近的冲锋队活动中心，达吕格建立了“一个特别可靠的和将要成为这样的党卫队同志的中心。只有少数几个柏林人知道这个党卫队的队本部，对



其真正目的也讳莫如深，其目的早就不是局限于领导柏林的党卫队了。”

达吕格的情报员中，有一个他的老朋友名叫赫伯特·帕克布施的人，待在柏林冲锋队的总部里。从自由团的时代起，这个木匠的儿子帕克布施就象狗忠于主人那样追随达吕格。他是柏林冲锋队第二十一突击队队长。他将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情都记录下来，可是丝毫没有侦察到什么情况。帕克布施没有发觉，在柏林的冲锋队全国领袖副手施滕内斯的周围，形成了一股由冲锋队领袖组成的逆党，他们在大力密谋策划夺取慕尼黑党的领袖的权力。奥托·施特拉塞的垮台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社会革命口号造成了柏林冲锋队的思想混乱。

社会灾难也驱使冲锋队领袖参加反对政治组织这一竞争者和希特勒的阵线。失业者受激进的理论和冲锋队的厨房所诱惑，大批涌进冲锋队，逐渐耗尽了冲锋队金库里的最后一文钱。“在柏林的有些旗队，其中百分之六十七的队员是失业者，在布雷斯劳竟无法拉出一支冲锋队进行检阅——确实面临严寒和大雪——，因为他们缺乏鞋袜，”施滕内斯向慕尼黑报告道。德国的失业人数（1930年）已高达三百万之多。

犯罪分子也随失业者一起涌进了冲锋队，这些人给冲锋队和红色战线之间多年来进行的基层斗争具有了芝加哥式的流氓殴斗特点。从旅馆到旅馆，从啤酒店到啤酒店，进行着疯狂的殴斗。单从绰号也可窥其一斑，谁在这儿横行霸道：新克尔纳的突击队名叫“拉皮条突击队”，韦丁区附近的一个突击队名叫“强盗突击队”，冲锋队领袖“橡皮腿”在“啤酒杯国王”、“左轮枪口”、“枪手米勒”的前呼后拥下横行街头。冲锋队的头目们大叫大喊要有更多的经费，因为他们不愿再次失去这些新手，因为纳粹和公社之间的壕沟相距只有一公分。但是财力比较雄厚的纳粹党区领导机关却紧紧关

闭金库大门。政治组织的人员不愿再拨出公款去助长冲锋队发展权势的欲望。

他们这种吝啬的态度使冲锋队惴惴不安，怀疑党的领导存心要限制冲锋队的规模，更其糟糕的是，热衷于追求权力和威望的党的领袖把冲锋队视作他的障碍。一个愤怒的口号出现了：“阿道夫  
64 背叛了我们无产者！”站在反对立场的冲锋队员印发了反对自己领袖的匿名传单：“我们这些运动的无产阶级分子实在太满意了！我们心甘情愿忍饥挨饿，好让我们心爱的‘领袖们’以其每月二千至五千马克<sup>①</sup>的收入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我们也极其喜悦地听到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汽车展览会上购买了价值四万马克<sup>②</sup>的一辆崭新的大型梅塞德斯轿车……”

柏林已经谣传希特勒为了同德国民族主义分子进行联合铺平道路，打算逐步解散冲锋队。东德的冲锋队最高领袖施滕内斯立即采取了一次闪电行动。他仗着可以获得其他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副手们的支持，致信慕尼黑提出强硬要求：允许冲锋队领袖担任国会议员、限制纳粹党区领袖的影响、对党召开大会时光荣担任会场保卫工作的冲锋队支付报酬。施滕内斯选择了恰当的行动时间：1930年9月将进行新的国会选举——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将首次获得机会，可以利用失业者和破产者的埋怨情绪而有利于卐字旗。在竞选中，冲锋队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

柏林冲锋队派了一个全权代表团前往慕尼黑，向党的领袖陈述自己的要求。但是希特勒拒绝接见。此后不久，参加国会选举的纳粹党新的候选人名单表明，施滕内斯和柏林冲锋队第二号人物又一次被排斥在名单之外时，群情激愤，公开决裂。8月底，柏

---

① 此处马克原文为 Mk(Mark)，系德国1871—1924年的币制单位。——译者

② 此处马克原文为 Rm(Reichsmark)，系德国1924—1948年的币制单位。——译者

林冲锋队领袖纷纷离职，并授意他们的冲锋队不参加选举。冲锋队拒绝给戈培尔计划安排在体育宫举行的选举大会担任保卫工作。冲锋队会场保卫人员在大会进行中途撤走，丢下纳粹党的演说者，让他们去听任敌对者的凌辱。冲锋队员齐声嘲笑道：

哪怕国会大人物们召唤，  
我也不听从。  
什么样的灯光，  
就得配什么样的墙纸。  
我坐在我自己的车上，  
绞尽脑汁，  
研究这张教授名单，  
是卐字还是蠢货。

柏林冲锋队员开到维滕贝格广场，举行了一次反戈培尔的集会。《慕尼黑邮报》报道说，“暴风雨般的呼喊声震耳欲聋：‘戈培尔博士出来讲讲清楚！’另一些冲锋队员扬言要开向体育宫，以武力彻底驱散‘戈培尔的喧嚣’”。戈培尔火速向柏林党卫队求援。达吕格的部下接替了体育宫会场的保卫工作，并为黑德曼大街10号纳粹党柏林区领导机关配置了警卫岗哨，因为戈培尔时刻担心冲锋队的袭击。8月30日凌晨，袭击开始了：“施滕内斯的人员”袭击了区领导机关的党卫队岗哨，用棍棒击倒达吕格的人员，砸烂了家具。纳粹党区领袖不得不灰心丧气地请求过去经常被他辱骂的共和国警察出来干预，一队警察逮捕了二十五名冲锋队员，并将他们带走。戈培尔钻进火车，到慕尼黑去向他的领袖报告这次灾难。这位党的首脑也气得神经几乎失常，但随后又强行振作起来。

次日，希特勒站在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副手施滕内斯面前，声嘶力竭地向他发誓，绝不离开党。这位党的领袖走遍一家家酒店，

逼着冲锋队继续对他表示信任。1930年9月1日晚，他们在柏林军人联合会之家言归于好。希特勒答应，将满足党员施滕内斯提出的一些最主要的要求。对手们和和气气地离开了。

但是，党卫队为自己的领袖对冲锋队同志进行了第一次打击。从这时开始，希特勒下定决心，放手让党卫队充当党内的警察。一名未来的党卫队领袖也提醒希特勒，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东部地区副手随时都有重新出击的可能。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东部地区的主任医生莱奥纳多·康蒂博士，从施滕内斯总部自愿表示效忠，充当心腹，后来他当了党卫队副总指挥和德国卫生部的头目。1930年9月8日，间谍康蒂报告说：“冲锋队将在他〔施滕内斯〕的领导下，变成一支同运动及其意识形态毫无任何内在联系的部队。因此，它随时都可能被它的领导人纵容寻衅闹事。这个领导人本身对于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就格格不入，并有意识地拒绝深入研究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

希特勒早已认识到威胁自己地位的致命危险。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普菲费尔本来就打算辞职。希特勒接替了他的职务，宣布自任冲锋队最高领袖，并想起了一个老朋友对他讲过的话：“你只要叫人转告我一声就行了：在某一天早上6点钟率领连队到凯旋门！——到时候我也会在那里。”希特勒召回了待在玻利维亚的恩斯特·罗姆中校。

可是在罗姆还未接到担任冲锋队参谋长的召唤之前，希特勒就采取了一次令人注目的行动，这一行动多少预示了未来的事情。阿道夫·希特勒在自己党内树立了崇拜领袖的偶像标志：每个冲锋队员必须宣誓永远地、无条件地忠于他，他要求他自己成为党和领导融于一体的化身。1930年9月3日，冲锋队代理参谋长瓦格纳通知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的所有副手，要他们“向党和冲锋队最高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个人进行一次无条件的宣誓效忠”。每个冲锋

队成员必须宣誓：“不畏艰难，认真执行所有命令，因为我知道，我的领袖不要求我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据官方正式说明，这些领袖们都是由希特勒亲自任命的。

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开始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实行独裁统治，他一手掌握了在自己党内充当警察的党卫队。需要党卫队的急迫程度超过党卫队自己的预料，因为党内还存在未被领袖崇拜所蒙住眼睛的纳粹党员。

未来的党卫队员康蒂的预言应验了：瓦尔特·施滕内斯已摆好略微后退、以便再度扑打过来的架势。由希特勒和新上任的冲锋队参谋长罗姆推行的强化冲锋队中央集权方针，遭到了施滕内斯一帮人的反抗。这一次，达吕格的朋友帕克布施探听到了情况。达吕格表示，只是靠了帕克布施的帮助，“我才不断地掌握了施滕内斯的部署情况”。不论在冲锋队东部地区势力范围内进行什么策划，达吕格都能采取对策。间谍帕克布施探悉，施滕内斯正在策划反对慕尼黑领袖的一次大规模反叛，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1931年4月1日凌晨，时机成熟了。

凌晨，党卫队达吕格就向罗姆报告：“我刚于4月1日凌晨4点半钟收到了一个旗队长副官的电话通知，夜里12点至3点，在东部地区总队长雅恩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绝密的柏林区冲锋队领袖会议。”秘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由……雅恩传达，4月1日中午起在魏玛的一次会议上，东部地区地区总队长施滕内斯将被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撤职。毫无疑问，希特勒的命令将被拒绝执行，与会的领袖们在会上表示支持施滕内斯，反对希特勒！”

冲锋队员又一次与党卫队员干起来了，党卫队员再次不得不在人数众多的对手面前退缩。施滕内斯的党徒占领了纳粹党区领导机关办公处和纳粹党机关报《进攻报》的编辑部。这场内部暴动迅即蔓延到北德和东德地区。几小时后，易北河彼岸的希特勒冲锋

队帝国已趋于土崩瓦解：勃兰登堡、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等地直到突击中队长一级的冲锋队领袖，大多数都加入了反希特勒的斗争。韦策尔、费尔蒂恩斯、雅恩、普斯特罗、卢斯蒂希、克雷姆泽尔——几乎所有的冲锋队知名人物，无一不在反希特勒派的名单上。只有施滕内斯的亲密朋友曼弗雷德·冯·基林格不在内。德国其他地区的区队长也与施滕内斯保持着距离。

一时，那些给希特勒竞选成功所压倒的民主分子，为一名纳粹领袖向其他纳粹领袖们宣布倒台而拍手称快。施滕内斯撤销了戈培尔的职务，戈培尔解除冲锋队员对于施滕内斯的效忠义务；东德冲锋队“接管了”党，党将冲锋队的叛逆者清除出去。但是，施滕内斯暴动的势头很快就逐渐减弱，一俟冲锋队的金库空虚，这次叛乱也就一蹶不振。希特勒就让人来收拾残局。一个前地下国防军时代惯于私设刑堂的人物和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追随者、斯德丁<sup>①</sup>人退役中尉保罗·舒尔茨担任了重建东部地区冲锋队集团的任务。赫尔曼·戈林清洗了冲锋队施滕内斯的党羽。

但是希特勒在全党面前明白表示，他把战胜施滕内斯只是归功于他的党卫队的机警。一个党卫队新人、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擢升为冲锋队东部地区地区总队长，希特勒给达吕格的一句题词（经过修改），直到党卫队最后完蛋，都被铸在他们武装带的搭扣上：“党卫队员，忠诚是你的荣誉！”党卫队的地位巩固了。不论希特勒的威信在哪里受到损害，也不论哪里有褐色不顺从分子图谋反对领袖崇拜，党卫队就会出现哪里。希姆莱在一次党卫队领导人会议上趾高气扬地说：“我们不是到处都讨人喜欢，说不定我们干了什么以后，人们会对我们嗤之以鼻，我们不可能指望得到别人的感激。但我们的领袖知道党卫队对他的

---

<sup>①</sup> Stettin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名斯德丁，现为波兰的什切青。——译者

重要性。我们是他最宠爱和最器重的组织，因为我们还从未使他失望过。”

希姆莱发布新的命令，旨在确保党卫队能够迅捷地、悄悄地按照党的首脑委托进行出击。每个地方的党卫队基层单位，均按一条大街或市区某一地段分成若干组，每组有三至五名党卫队员。在值勤前半小时内按组集合，由组长检查，所有组员是否都已到齐，并派人把缺席的人叫来值勤。无故缺席当受到严厉处分，党卫队的值勤守则规定：“一次无故缺席由党卫队领袖给予书面申斥，第二次无故缺席，由队部给予开除出队的书面警告，并责令在集合的全队的面前作自我检查，第三次无故缺席给予开除出队的处分。”

一个单位的头头必须经常注意，使他的队员时刻处于戒备和机动的状态。他必须坚持不懈地增加本单位的摩托车和自行车的数量，举行长距离行驶，对信使进行三十至五十公里距离的传递训练。

但党卫队也同时拉起了一道严密的帷幕，遮掩它的活动。任何人、连党内同志和冲锋队员都不可以了解党卫队的活动。希姆莱的集团开始神秘地将自己隐蔽起来。达吕格命令：“我最严格地禁止党卫队员和领袖们同冲锋队员和领袖们以及普通党员同志 68 们交谈任何有关必要性的目的等等，即使遇到不符合事实的攻击……如果在较小范围的集会上受到攻击，党卫队员可以扼要地说明党卫队纯系执行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然后保持缄默，立即离开会场。”

在此之前，冲锋队代理参谋长瓦格纳就向党说明，为什么党卫队要按照自己的活动规律行事。瓦格纳说：“党卫队是一种保卫组织，它的任务是，一方面执行运动内部的警察任务，另一方面负责纠察勤务，不使运动的成员违反国家的任何条例和法令。”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党卫队要履行它的义务，就必须完全独立，也就是

说，不仅不属于政治领导而且也不受冲锋队领导的制约。”在这种解释的庇护下，党卫队从它建立伊始，就倾其全力以加强一种活动：侦察反希特勒分子和反党人物。

从1925年起，党卫队就搜集有关观点不一致的党员精神生活的机密报告。党卫队的第一份秘密报告注明的日期为1925年9月24日。在一份经党卫队创建人施雷克转呈的以“U致党的全国指导处”抬头的报告中写道：“在昨天诺伊比贝格地方组织的碰头会上，有一个叫黑策尔的……谈了下列看法：‘在今年年初的《民族运动信使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文章断言并谴责〔希特勒的心腹赫尔曼·〕埃塞，说他从一个名叫兰道尔的犹太人那里获得了三万马克。由于这一事件至今还未看到有更正声明，我过去和现在还是不得不认为这件事的情况属实。再说埃塞过去和共产党厮混在一起，因此更应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起初只是偶然的事情，到了后来便被纳入了一种制度。地方党卫队各单位必须向党卫队高级指导处报告有关当地国旗队<sup>①</sup>、德国共产党这样一些敌对集团的情况，以及有关共济会会员、犹太籍头面人物的情况和所有政治事件。报送慕尼黑舍林街的材料，当然多半被送进字纸篓；自希姆莱担任领导后，党卫队的情报工作才走上了正轨。1931年6月，希姆莱发出命令：“敌人使德国布尔什维克化的工作在日益加强。我们在揭发并尽力打击犹太人和共济会等敌人方面的情报工作，乃是党卫队今天的一项最重要任务。”他在党卫队各个地区建立起秘密侦察部门，负责监视党内外敌人的情况。

党卫队首领希姆莱懂得向他的领袖报告各方面的情况。他在  
69 1931年10月10日报告说：“在一些城市里，德国共产党将经过考

---

<sup>①</sup>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译者



验的反法西斯人物开除出共产党，以便把这些人打进党卫队组织充当密探。”在另一处谈到：“埃尔哈特上尉……，据说那位已被解散了的维京组织<sup>①</sup>领袖，近来又重新十分活跃起来。他与政府要人结成最紧密的关系，在民族主义外衣的掩护下，准备建立一个自由团，它通过征募新兵的方法，和以埃尔哈特上尉迄今所持的立场为基础，最终击溃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希姆莱在原海军中尉、几个月前刚刚参加党和党卫队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帮助下，建立起一个所谓 Ic 部门，后来由这个部门发展成为纳粹最庞大的情报机构：党卫队保安处，缩写是 SD。

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海德里希的表现，说明他是一个搜集情报的杰出能手，使得党卫队日益成为党的最重要的情报组织。连希特勒也认为，只有依靠党卫队才能确保他个人的安全。1932年1月25日，他任命希姆莱为褐色大厦——坐落在慕尼黑布里恩纳街45号那所经过翻修的巴洛夫宫——党中央机关的保安处处长。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的114/32a号命令指出：“党的整个办公机关（褐色大厦和附属建筑物）的保安工作，由党卫队全国领袖负责领导，冲锋队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区队的区队长和党卫队慕尼黑第一旗队的旗队长，向党卫队全国领袖报送经过挑选的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的名单。”冲锋队全国领袖的命令指示希姆莱立即采取措施，“防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的侵犯和制止警察的袭击”。希姆莱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一桩阴谋行刺事件就震动了褐色大厦，无疑，这桩行刺事件的幕后操纵者不是坐在敌党的司令部中，而是坐在这座褐色大厦的办公室里。

这次事件的发生，说明了希特勒在党内的专断地位还远未达到无可争辩的程度。施滕内斯的乱子提出了一个问题，希特勒究

---

<sup>①</sup> 维京(Wiking)，指古代北欧日耳曼人，转义为海上英雄、海盗。又埃尔哈特原在海军服役。——译者

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置冲锋队领袖们的观点于不顾，新的闹剧提出了问题，希特勒是否敢于无视党的最后一点道义上的考虑。因为新事件究其原因是，阿道夫·希特勒容忍了一个人，这个人纠集一帮狎玩男宠的家伙统治着冲锋队，将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队伍堕落成为伤风败俗的名利场。这个人就是冲锋队的新任参谋长恩斯特·罗姆。

罗姆从来就不掩盖自己的倾向。他说：“我事先说清楚，我不是个善良的人，也不指望跟善良的人为伍。”他反对国家试图“通过法律以调节人类的本能，或将其引向其他轨道”，并针锋相对地提出里查德·瓦格纳的话：“狂想、狂想，到处都是狂想！”他还傲慢地  
70 对一位知名的民族社会主义人士的抨击进行反驳。他私下跟柏林医生海姆佐特博士说：“我跟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先生这个愚蠢的道学运动家势不两立。他的文章首先是指向我的，因为我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由此您可以看出，‘人们’和我在一起就非得习惯于民〔族〕社〔会主义〕圈圈的这种罪恶特性不可。”

自从罗姆告发一个名叫赫尔曼·西格斯蒙德的柏林舞男偷窃一只箱子后，他那伤风败俗的本性就在法院里无人不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5年1月13日晚，罗姆在柏林马里恩俱乐部邀西格斯蒙德喝啤酒，接着就按惯例干那种见面叙谈之后少不了要干的勾当。西格斯蒙德的供词说：“在我们还穿着衣服坐在旅馆房间里的时候，罗姆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香烟盒，我发觉有一张纸条掉在地上，就把它拾了起来。约莫半小时后，我离开旅馆的房间，因为罗姆先生要求跟我进行一次令人恶心的性交被我拒绝了。到了街上，我才看清楚，我在房内检到的纸条是罗姆先生的一张行李票。”西格斯蒙德领取了这只箱子，发觉里面装着一包令人讨厌的信件。

希特勒也不是不了解罗姆的本性，但他执拗地认为，这纯属个

人私事。罗姆刚就任冲锋队参谋长职位，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希特勒就在一项命令中通知党：冲锋队“不是培育名媛淑女的伦理学院，而是一支骠悍战士的队伍”，他认为控告“纯属私人范围”的人所难免的习性，是“要求过于苛刻，而予以彻底、严厉驳回”。

罗姆寻欢作乐决不仅限于“私人范围”。冲锋队不仅满足了他的政治野心，而且满足了他的性欲。冲锋队里的心腹队员为他们的参谋长四处寻觅合适的对象，并且只要罗姆的一个宠儿流出不忠实的迹象，冲锋队的行动队就棍棒交加地把他活活揍死。商店职员彼得·格兰宁格从1928年起就是罗姆的男宠，并为他奔走物色对象，被安插在冲锋队情报处里用以掩人耳目。他每月领取两百马克的报酬，以专门为罗姆物色新的对象，他在慕尼黑吉泽拉高级理科中学前面安下据点，猎取和挑选牺牲品。随后把他们介绍给罗姆，先后总共介绍过十一名学生和学徒。同时，罗姆的另一一些臭名昭著的朋友，也混到了由于施滕内斯叛乱而空缺的冲锋队高级职位上。罗姆在慕尼黑“格勒克尔熏香肠铺”有经常光顾的固定餐桌，是格兰宁格一帮人和具有相公癖的冲锋队领袖们聚会的中心。

象“格勒克尔熏香肠铺”店主卡尔·策恩特在格兰宁格家里（天文台大街24号二楼，靠近托布勒）侍候格兰宁格一样，新上任的柏林冲锋队领袖埃德蒙·海因斯也是罗姆固定餐桌上的老伙71  
伴。他在1927年曾因搞鸡奸而被希特勒开除出冲锋队。而柏林冲锋队新上任的参谋长卡尔·恩斯特，则又是原火线分部上尉勒尔拜因的老相好，勒尔拜因本人又跟罗姆在柏林“克莱斯特俱乐部”和“侧面黑影像”等搞鸡奸的饭店的固定餐桌上碰头。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驱散这一帮性变态的冲锋队领袖。希特勒在对待人们责问罗姆的所作所为时，就以参谋长的鸡奸行为查无实据为遁词，并表示倘使有人向他提出确凿证据，他将作出结论。

这方面的证据一般都被罗姆及其所纵容的一支密探队毁掉了。虽然如此，罗姆的信件还是于1932年3月起开始被披露于众。首先是社会民主党的《慕尼黑邮报》公布了罗姆有关鸡奸的信件。罗姆的一帮朋友为此惊恐万状。每个稍微规矩点的冲锋队领袖，都被怀疑打字复制了信件，并将这些信件交给了前国会议员赫尔穆特·克洛茨博士等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希特勒派。罗姆被弄得晕头转向，竟派他的密友、冒险家、新闻记者格奥尔格·贝尔去执行一项对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来说极其罕见的使命。贝尔也为社会民主党人提供纳粹党的情报，每月获得三百马克的进项，他不得不去找前少校卡尔·迈尔。1919年，迈尔曾和罗姆一起发现了希特勒这个政客，但后来又转向了民主派。

迈尔现在属于忠于共和的国旗队领袖，国旗队在最后一分钟还想阻止纳粹势力的增长。贝尔跑进马格德堡国旗队办事处去找迈尔，叫少校保证社会民主党报纸不再披露有关罗姆的信件。贝尔后来说：“迈尔对所有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罗姆也“告诉我，肯定那些混蛋想把我们置于死地”。可是不管将罗姆的信件投寄给报馆的“混蛋”是谁，——罗姆的褐色敌对者还是想按他们的方式解决问题。当希特勒再次拒绝开除他的朋友时，党内同志就自己动手采取措施了：党内最高法官、民族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布赫亲自拟定计划，暗杀冲锋队参谋长及其四名最重要的同事。

前少校布赫小心翼翼地着手工作。他想起了党的早期时代的一个老朋友，轮箍厂老板和原冲锋队旗队长埃米尔·特劳戈特·丹蔡森。他过去和丹蔡森在巴登建立了纳粹党组织。布赫告诉他，传说党内出现叛逆情况；冲锋队旗队长乌尔将冲锋队整个秘密工作人员联络网向警方告了密，在罗姆的心腹杜·穆林-埃卡特和72 施普雷蒂两个冲锋队伯爵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集团，这个集团打算攫取所有权力，同时由于他们的鸡奸丑行玷污

了党的声誉。

丹蔡森领会了少校的暗示，并想到了自己的几个嗜杀成性的伙计。他组成了一个暗杀小组，委派一个遭到排挤的建筑师卡尔·霍恩当组长。丹蔡森为取得事件发生时本人不在场的辩解理由，已赴奥地利。1932年3月16日，霍恩获得丹蔡森以“维兰德第二”为化名发出的有关采取行动的详细书面指示。霍恩谈到：“行动要点：50号房间办公的杜·M·伯爵系§175<sup>①</sup>。此人对其上级R.<sup>②</sup>影响极大，由来已久。两人将由一个贝尔先生挟持，希姆湖畔格罗滕米尔，应以相同方式处置在同屋的参谋部头目乌尔。”由冲锋队军乐手格林施带八名队员伺机用铁锤将贝尔击毙，并把他吊起来，标上一个卐字。接着就轮到罗姆。丹蔡森告诉格林施：“伙计们，要尽你们的职责，可别忘了参谋长！祝伙计们好运道。W. II<sup>③</sup>。”

霍恩得到了指示：“50号房间，10时50分，开一辆大型奥佩尔牌汽车。它每天停在房子前面，车轮螺丝，着蓝色装配工服。”确切的意思是：冲锋队情报头子卡尔·莱昂哈德·杜·穆林-埃卡特伯爵在褐色大厦50号房间办公，每天乘一辆汽车上班。由霍恩制造一次车祸将他干掉。但是，当凶手在偷窥褐色大厦时，突然产生了顾虑。他没有去拧松奥佩尔牌汽车车轮的螺丝，而是向杜·穆林自首，并供认了一切。再说，伯爵根本就不是具有相公癖的人，他突然一闪念：霍恩是不是愿意帮助揭露策划暗杀阴谋的所有幕后人物？霍恩表示愿意。

他给幕后策划者设下了一个圈套。霍恩找到了布赫在慕尼

---

① 德国刑法典第一百七十五条是犯鸡奸罪。这里是指杜·M.(穆林的缩写字母)伯爵有鸡奸行为的暗语。——译者

② 罗姆的缩写。——译者

③ 维兰德第二的缩写。——译者

黑-佐尔恩的私人寓所，给少校拨了电话。“我是霍恩，卡尔斯鲁厄的，”他通报了自己姓名，“我迫切需要跟您谈话。”

布赫：“您今天4点15分到霍尔茨基希纳车站来。”

霍恩：“我可不认识您。”

布赫：“我穿褐色裤子、褐色衬衫、褐色上衣、灰色大衣，戴灰色帽子，大衣敞开着。”

当然，他们在霍尔茨基希纳车站碰头时，布赫的表现比霍恩想象的还要狡猾。他显然看穿了霍恩的把戏，因为少校告诉他，事情已经清楚，有关杜·穆林的情报不完全正确，希望霍恩立即替他拍一份电报给丹蔡森：“同海伦妮解除婚约。”第二天，三颗左轮手枪的子弹才使霍恩明白，布赫实际上并未放弃他的计划。枪击的时间是夜11点，当时他正要走进埃米尔·丹蔡森在慕尼黑-莱姆的住宅。猜测谁是夜间行凶的主使者并不难。罗姆的副官施普雷蒂伯爵完全知道这个人：布赫头一天进行了侦察，看到霍恩从褐色大厦的参谋长办公室走出来。嗣后，冲锋队领袖将霍恩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但是，现在希姆莱插手干预了。褐色大厦的保安处处长试图保护罗姆，使他免遭布赫的游击队的伤害。1932年3月24日，希姆莱——如霍恩所记——“逮捕了布赫少校，进行讯问，从而使事情收场了结”。可是罗姆并不相信希姆莱的这套安抚术。他和贝尔逃往柏林，去跟政敌商量对策。4月1日，罗姆和他过去的战友迈尔会晤，向他索取控告冲锋队改组者保罗·舒尔茨的材料。罗姆错误地判断舒尔茨系谋杀的幕后策划人。八天后，贝尔跑到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编辑部，又一次讲述了谋杀经过的始末。《前进报》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记下了贝尔的故事：“他们的旅行是出逃，因为他们……将会被他们的自己人杀害。贝尔，他是接受委托将计划告诉我们的，如果计划真的实现的话，好让全世界知

道这些罪人。”

希姆莱的影子又一次出现了，这一次是在罗姆逃到柏林的住所里出现的。党卫队头子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已无法使其具体地见诸于文字。但是希姆莱显然懂得如何劝说冲锋队参谋长返回慕尼黑。当然，保安处处长希姆莱也不可能阻止党内的丑行公之于众。冲锋队的两位伯爵杜·穆林和施普雷蒂神经错乱，跑到警察局，控告他们的党内法官布赫及其助手。埃米尔·丹蔡森于1932年10月以主谋暗杀罪被判六个月徒刑。布赫和霍恩的卫队免于处分。

丹蔡森案件和随后不久的一起党指控《慕尼黑邮报》犯有侮辱罪的诉讼，使一个空前污浊的沼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其讽刺性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臭名昭著的冲锋队领袖们求救于迈尔少校周围的维护民主的卫道士，以对付自己营垒里搞暗杀的党内法官。“这可真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布赫的女婿、心腹马丁·鲍曼怒不可遏地叫喊道：“党内最有名望的领导人之一，在一位具有同样名望的最厉害的敌对者领导人面前进行咒骂，并且……将同样是领导人的自己党内同志骂作混蛋。”但是从褐色沼泽里腾起的霉烂气味越是刺鼻难闻，党员同志的目光就越是贪婪地投向海因里希·希姆莱集团。1932年10月5日，鲍曼对希特勒的秘书鲁道夫·赫斯说：“您看看党卫队吧，您真是了解希姆莱，您就知道希姆莱的才能。”

党外人士也开始预感到，为数达五万人的党卫队是一支冷酷 74  
无情的清教徒部队，它已作好准备，向一群粗野的、堕落的、搞鸡奸的冲锋队领袖的乌合之众进行挑战。可是，1931年6月13日，希姆莱向他的党卫队领袖们是怎么说的呢？希姆莱说：“也许还要过几个月，也许只要过几天，就要作出决断了。我们将站在我们领袖给我们指定的岗位上。”党卫队在等待他们断然出击的时刻，这

日子不会太长了。1933年1月30日已经临近。德国未来的地平线上升起了刀光剑影的黑色夜幕。不过还不清楚，黑夜将属于谁：属于冲锋队，还是党卫队。



## 第五章 取得政权

75

第三帝国建立伊始，海因里希·希姆莱感到失意。在1933年1月30日起决定德国命运的时刻，以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现国家变革的这场“民族革命”中，谁也没有邀请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占有一席关键性的要职。冲锋队已经出动，去控制街道和镇压持不同意见的分子，阿道夫·希特勒的那些帮手纷纷占据了国家机器的职位，而希姆莱及其党卫队却根本谈不上是新政权的重要配角。

有些人甚至认为，希姆莱属于民族社会主义上台后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之一。德国新总理没有让忠心耿耿的希姆莱在刚诞生的第三帝国中担任重要角色。希姆莱冒着风风雨雨，驾驶着摩托车为之卖命，并率领党卫队确保其全党统治地位的那个人，显然已把党卫队头子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位纳粹领袖给戈林、戈培尔、弗立克以及其他人以高官厚禄，却对这个面色苍白、一直极度勤奋的总管希姆莱冷眼相待。

1933年3月9日，慕尼黑发生政变，冲锋队和党卫队推翻了右派天主教徒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领导的合法的巴伐利亚政府，就连这一天，希姆莱也没有扮演主角。指挥政变的是罗姆过去的师长弗朗兹·里特·冯·埃普，他由于忠于教会而被党卫队队员嘲笑为“圣母将军”。希特勒任命的巴伐利亚邦长是反动的里特，而不是希姆莱。希姆莱再次未能担任首席职位，只不过升了一级，当上了慕尼黑警察局代理局长。

不过叫希姆莱更为恼火的是，在此期间，他在党卫队内的劲

敌、远在普鲁士的地区总队长库特·达吕格却重任政府要职。达吕格的靠山是普鲁士内政部长和未来的邦总理赫尔曼·戈林，也就是这个气量狭窄、级别不高的“全国海尼”从心里厌恶的那个人。戈林不怀好意，怂恿沽名钓誉的达吕格反对自己名义上的领导希姆莱，并将他安插进政府担任执行特别任务的政务专员，由他管辖普鲁士的风纪警察，又任命他为部务主任，甚至将其提拔为警察中将。达吕格随即细算，历史上只有拿破仑年纪轻轻就当上了  
76 将军——因而感到眼下没有任何理由再从属党卫队全国领袖麾下。达吕格和希姆莱之间的最后一根线就此断裂了。

为了使悖逆的同僚达吕格重新俯首帖耳，希姆莱将自己最得力的部下、这时业已晋升为党卫队旗队长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派往柏林，指令他在施普里河畔建立一个谍报机构，并经常向希姆莱报告有关达吕格的阴谋活动。海德里希收拾行装，带上怀孕的妻子莉娜一起到了柏林，在市西租了一幢房子，着手同戈林的那位近乎拿破仑式的人物进行对话。

然而这位已有声望的党卫队同志只让这个来自慕尼黑的令人厌恶的来访者与前厅的女秘书接洽。在那里，海德里希被告知：将军不能接见旗队长，因为他已另有所属。海德里希继续谋求接触，均被达吕格所拒绝。当海德里希仍不肯罢手时，戈林的秘密警察气势汹汹，竟以暴力行动对他进行威胁。莉娜·海德里希后来回忆说：“我丈夫知道，戈林已下令要逮捕他。”全国领袖的使者看出事情毫无希望，便踏上归途。莉娜·海德里希留在柏林，一直等到头胎分娩，生了一个男孩以后也返回慕尼黑。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认识到，权力是不会自动送上门来的。第三帝国远非理论家们所说的那种极权主义国家。从1933年1月30日起，德国国家机器就被一张等级森严相峙、把持执掌权柄的错综复杂之网所覆盖，只要有人企图在德国把阿道夫·希特勒的权

力集结起来，这张网才被认为有可能突破。

象许多人一样，党卫队领袖们在1933年以前，对民族社会主义上台也只有很不确切的设想。他们感到，由民族社会主义者执掌魏玛共和国的权力机器并取消民主政治，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于一切具体的做法，则悉听希特勒的指挥和睿断。多少有过一些考虑的人也许认为，纳粹运动必须和国家融为一体，而这种看法也全在意料之中，因为纳粹党领袖们必然要担任国家发号施令的职务。至于有碍调动国民力量的因素，党员们则幻想一定会融化于统一的较大目标之中；任何其他利益都必须服从国家的总体化。

“民族革命的目标只能是建立一个渗透到公共生活所有领域的总体国家，”戈培尔这样解释说。希特勒宣布“建立一个总体国家”，威廉·弗立克则预言“一个不受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特权、政党和议会干扰的强有力的政府”。但1933年1月30日以后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这个纳粹主义国家党的形形色色的集团取代了民主国家的所有政党；一种新型的议会制，即纳粹总督<sup>①</sup>们和特殊利益之间的权力斗争取代了不稳定的比例选举制国会。 77

纳粹党的上台使国家由一个党掌了权，从外表上看，这个党铁板一块，实际上却是德国政党史上矛盾最多的怪物。一个由各派别和各持己见的团体所合成的光怪陆离的集团集结在蛊惑人心的希特勒领导下竞争角逐。它真实地反映了因战败、通货膨胀、失业和扼杀民主而陷入动乱的德国的社会图景。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L·凯尔认为，希特勒的党计有四派：首先是党的首脑周围的老战士集团，他们是“纳粹主义坚固核心”，经历过党在早期历史阶段风险的亡命之徒；其次是同这些老战士关系密切的右倾激进利己主义派，这一派大都是1925年至1929

---

<sup>①</sup> 原文为 Satrap，原指古波斯的总督。这里转义用之。——译者

年期间入党的种族主义空谈家，当时一般资产阶级还认为犯不着参加党；第三派是“民族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联合”派（凯尔语），这一派出现于经济萧条年代（1930年至1933年），当时有些店主、技工和农民在“民族革命”的号召下被吸引进来；最后一派即第四派，是皈依“德国复兴党”的所谓殷实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出身军队、公务人员和实业界的黑—白—红<sup>①</sup>分子，他们深信依靠希特勒这个鼓手，能恢复他们在1914年以前的天下。

这样一个成分复杂的党，早在夺权时期就难以做到步调一致，而在1933年1月30日以后，党内的多元论更进而推向国家方面。一再宣称的极权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畸形的怪物，此外民族社会主义接管政权的特点，迫使希特勒暂时不得不同资产阶级右派政党的政客和保守派官员一起组阁。

除传统的国家机关外，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民族社会主义的影子机构。几乎每个机关都派驻一个身穿褐色制服的监督员。例如，跟外交部相对应地设有纳粹党外事局，后来还增设了所谓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中央司法部由两个野心勃勃的竞争者坐镇：普鲁士司法行政专员凯尔和中央司法专员弗朗克。前冲锋队参谋长瓦格纳则以中央经济专员身分监督着中央经济部。这种重叠的国家  
78 机构又几经膨胀，并由纳粹党各派别和集团头目为本身设置的新型政治总督们充任领导。这样就在这个国家里产生许多新的国家。全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冯·席拉赫声称，要争取建立一个“国中的青年之国”；图林根冲锋队地区总队长拉施提出建立一个最能体现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冲锋队之国。希姆莱则梦想搞一个党卫队之国，前陆军上校后来任全国劳工领袖的康斯坦丁·希尔设

---

<sup>①</sup> 此处指象征德意志帝国（1867年至1918年）的黑白红三色。——译者

计了一个独特的军人之国。

这伙亡命之徒将赖以起家的理论抛弃殆尽，拼命地争夺他们所染指的国家权力，戈林已身任普鲁士总理兼中央航空部长，又抢走了农业部中的林业局，自封为中央林业局长。戈培尔当宣传部长本是因人设事，他又挖空心思地自行组织起一个德国文化协会，以此打入主管文化的同事伯恩哈德·卢斯特的权力范围。

希特勒的总督们不断扩展自己的独立王国，以邻为壑：纳粹党政治部全国组织工作负责人兼德国劳工战线(DAF)头子罗伯特·莱伊，企图将他手下的领导干部团变成一个民族社会主义集团。与此相反，集团迷希姆莱却坚持认为党卫队内集合了真正的中坚人物，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纳粹党的集团。党的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也为他自己要求垄断民族社会主义集团的版权所有，认为他主管的纳粹党世界观教育局是最合适的纳粹集团模式。但冲锋队参谋长罗姆更认为，靠着他的部属已使集团思想成为现实：所谓冲锋队的帮派社会主义。

在人与人之间施展阴谋的这一层上面还有第三层，即冲突层，在这一层，冲突已深入到纳粹国家的核心。冲突层充满着国家和党之间的争吵；中央和各邦之间的旧有矛盾，也改头换面，再度萌发。有一批认真考虑把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国家口号付诸实践的纳粹分子，被吸收到威廉·弗立克博士的中央内政部。他们设计了一种普鲁士传统的、完全用行政方法进行管理的国家，想把党的作用下降为单纯进行宣传工作。这个计划遭到党的官员们的坚决反对；党的官员们也反对弗立克搞以中央内政部为首的德国行政管理全部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改革，因为行政管理权的任何简化，都要削弱那些有如封建诸侯的纳粹党区领袖们借以横行不法的权力和特权。不过德国最大的邦，即赫尔曼·戈林的普鲁士也反对这种国家改革。这个普鲁士的新国王，预见到自己的行政管理权将愈

79 来愈多地划归中央各部，因此他将普鲁士的部分行政机构划分出来，置于亲自掌管之下——对此，弗立克的国家改革派也几乎只好束手无策。

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总体国家，和不容许任何集团、阶级、政党干扰的强有力的政府的真实概貌。那么，在这种“如同任何一个东方苏丹统治那样令人难以捉摸”（特雷弗-罗珀语）的政府体制的混乱局面中，希姆莱的党卫队的位置在何处呢？对此，这位全国领袖在海德里希的使命失败后的1933年春，几乎还茫然无知。

希姆莱只好耐心等待，窥测时机，只好继续做他一直在做的工作：保护他心目中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命安全，确保希特勒在全党的统治地位。他以常有的勤勉来履行他自行选定的义务。由于他在“运动的首都”担任警察局长，希姆莱时有机会向他的领袖表明，希特勒在分割国家政权这块肥肉时，对勇武超群的人竟如此冷淡是多么不公平。在慕尼黑，这个博得公众好感的党卫队头子，懂得如何利用某些凶讯来大叫大喊，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瞩目。

3月中旬，警察局长希姆莱下令将他当大学生时曾经企图从监狱里救出来的那个人——行刺艾斯纳的凶手阿尔科-凡雷伯爵——加以监护拘留。据希姆莱解释，拘留他的原因是：伯爵“自己声称准备行刺阿道夫·希特勒总理”。两个星期后，希姆莱的警惕性再次显露锋芒，这一次他“破获了一起预谋用手榴弹谋害总理的案件”。据说有三名苏联间谍“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汽车必经之途的里查德·瓦格勒纪念碑旁放置了三颗手榴弹”。耳目遍布各处的警察局长提醒领袖和人民提防新的重大危险。希姆莱通知：“据来自瑞士的报告，我们多天来获悉，共产党正策划行刺阿道夫·希特勒总理和现有国家领导人的阴谋。”

希姆莱危言耸听的行刺报警，触及了总理府新任主子最易敏感的一点。至少从荷兰人马瑞纳斯·范·德·卢勃<sup>①</sup>在1933年2月27日采取国会纵火的绝望行动以来，希特勒就一直提心吊胆，生怕遇上刺客和炸药，经常变换汽车行驶路线，行动诡秘，防备刺客。

在内阁会议上，这位总理兼领袖几乎没有一次不挥动拳头，同向他逼近的影子进行搏斗。“一次成功的行刺将对公众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他在3月7日内阁会议上故弄玄虚地说。八天后的内阁会议记录写道：“总理指出必须勒令限期交出炸药。近年来失窃炸药近一千五百公斤，而找回来的只有一百五十公斤。”他怎么也对个人安全的万无一失放心不下。他疑神疑鬼，好象到处都有暗藏的刺客。

“有朝一日，”他描绘想象中的危险说，“定有那么一个丝毫看不出有危险性的人，在威廉街的某个地方租一间阁楼住下来。人们只当他是退休的高年级教师，一个诚实的同胞，戴一副角边眼镜，不好好刮脸，胡子拉碴。他不让任何人进入自己的简陋房间。他可以在房间里从容不迫地架起一挺机枪，以巨大的耐心一个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用观测器瞄准总理府前的阳台。然后到了某一天，他一勾扳机！”

希特勒就连待在自己房间里也会感到不安全。在内阁中间，他和另外三个党员同志（戈林、戈培尔、弗立克）面对人数超过他们的资产阶级部长，而负责警卫总理府的是一支国防军卫队，国防军的将军们是决不会放弃有朝一日反叛这位纳粹救世主的。除了如此忠心耿耿地为他的领袖生命安全关心的希姆莱以外，还有谁能充当比他更好的助手呢？希特勒指令党卫队领导建立一支负责保

---

<sup>①</sup> 1980年12月，西柏林法院认为纳粹德国最高法院对“国会纵火案”的判决是“枉法”，宣布卢勃无罪。——译者

卫他的本部警卫(党卫队历史上的第三支本部警卫)。希特勒和希姆莱挑选了一个矮胖粗壮的巴伐利亚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瑟夫(塞普)·狄特里希担任私人卫队长。

狄特里希纠集了一百二十名党卫队队员，其中多数人早在褐色大厦里就曾干过类似的差使。私人卫队在希特勒周围布置起一道由三层岗哨组成的警戒线，任何来访者必须通过这三层岗哨才能见到总理。1933年9月间，总理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给这个卫队授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这样，无意之中希特勒就为第二支国防军打下了基础，即后来的武装党卫队。

警卫旗队的先例使希姆莱获得启迪，进一步建立起类似性质的“党卫队特遣队”，后来又改称为“政治预备队”。某些邦建立了旨在保卫德国新贵和迫害政敌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警察部队。希姆莱的部队首次出现于1933年夏。埃尔旺根和罗伊特林根两地的党卫队组成了政治预备队(1934年人数为八百名)，奉符腾堡政治警察之命搜捕民主人士。德累斯顿成立了由黑森党卫队自愿参加者组成的第三特遣队，慕尼黑和阿罗尔森也组织了党卫队部队，恣意荼毒生灵。

81 希姆莱一举成功地插手了巴伐利亚以外的警察活动。由于他掌握着党纪严格的部队，一些邦的新上任的警察头子地位还不稳固，纷纷向他讨教求援。慕尼黑邦警察总监康拉德·希姆莱的孙子知道，警察是他的希望——只有通过警察机器这条曲折的道路，他才有可能参与民族社会主义特权阶层的角逐。

这时，希姆莱在巴伐利亚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4月1日，巴伐利亚的所有政治警察都划归他领导；他现在自称为政治警察司令，并领导巴伐利亚内政部的一个特别司。希姆莱显现出他对民族社会主义警察工作具有的设想。他指令搜捕政敌必须严格按规定



手续办，制止地方冲锋队头目对没有武装的竞争者恣意采用暴行，并规定逮捕天主教神职人员应由他亲自批准。但同时他也有计划地进行政治迫害活动。希姆莱在达豪附近一个火药厂的旧址上，以几间石砌的平房为中心，建立了一所集中营，把关押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人集中到这里。“集中营”这个新字眼使得德国人谈虎色变，“卡策特”<sup>①</sup>变成了海因里希·希姆莱警察统治的标志。

几乎谁也没有理睬希姆莱的样板集中营这一创造发明，新德国的警察头目只是发愣地看着希姆莱机器的官僚主义的办事效率和完善组织。人们开始感到希姆莱是德国未来的警察头子。他已经拟定了建立一支全国统一的警察的计划，因为空想家希姆莱始终感到自己眼前是“一片混乱，一支警察——它的正直部分遭到凌辱，人家将它的军官手中的军刀拿走，而塞给他一根橡皮棍——，一支杂有受过处罚的人和极端马克思主义者的警察”。

希姆莱决心废除民主国家行之有效的那种警察。他说：“我终于决定将这十六支不同的邦警察建成一支真正的全国性警察，因为全国性警察是一个国家所能掌握的最强有力的钳子之一。”1933年夏，希姆莱对黑森邦内政部警察头子、党卫队三级小队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说，他认为必须使德国警察摆脱“各区诸侯”<sup>②</sup>的影响，当然只能谨慎小心地行事。接着他问三级小队队长贝斯特，是否愿意参与建立全国警察的工作。贝斯特表示愿意。黑森人贝斯特并非是希姆莱用来给自己准备去柏林的进身阶的唯一警官。希姆莱副手海德里希在笔记本上还记下了在行将建立的全国警察组织的谋职人员的名字，其中也包括不少科班出身的旧官员（例如慕尼黑的刑事警官四重奏<sup>③</sup>：弗拉赫—缪勒—迈辛格—胡贝尔），有他

① 原文 Kazett, 系德语 Konzentrationslager:(集中营)的缩写 KZ 两字母的读音。——译者

② 指纳粹党各区领袖。——译者

③ “四重奏”指四个老搭档。——译者

们参加进来，只会提高希姆莱阵营的声望。

82 可是希姆莱建立全国警察的野心，碰到了一堵几乎无法逾越的墙，使他难于在一半以上的德国地区插手。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毫不踌躇地将自己的警察百人团摆开阵势，同这个慕尼黑黑的来犯者对垒。戈林和希姆莱的野心不相上下：两人都想掌握第三帝国的警察机器。但是尚未加冕的普鲁士国王比对手多一个有利条件，他手中已经掌握了普鲁士警察，而这是构成任何一种德国警察体制不可或缺的权力工具。

戈林在普鲁士上台后就着手把警察抓在自己手里，他给自己搞了一支私人卫队，取名“特别警察部队”，由民族社会主义警官联合会主席韦克警察少校指挥，并将反对现政权的分子共一千四百五十七人清除出警察局。戈林选定柏林警察总局第一处(IA)这个不引人注目的部门，作为自己进行统治的核心机构。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个处就不顾在全国范围内取缔秘密警察活动的正式命令，起着德国政治警察的情报中心作用。令人心惊胆战的普鲁士政治警察就要在这里诞生了。

身穿褐衫的普鲁士总理物色了一个狡猾异常的警官，即普鲁士内政部政治警察部队高级政务参议鲁道夫·狄尔斯博士，此人是个花花公子，略懂艺术，经常变换手法，以满足戈林附庸风雅而收藏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品的渴望。狄尔斯不是纳粹党员，后来跟主子攀上了亲<sup>①</sup>，答应给戈林拼凑一个普鲁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权力工具。狄尔斯当上了第一处处长，并把愈来愈多的刑事警官拉进新建立的政治警察队伍。原来只有六十人的单位，很快就扩大成二百五十名官员的机构。戈林提供必要的法律根据，使狄尔斯的警察逐步摆脱国家的领导。他给普鲁士建立一个中枢政治情报

---

① 狄尔斯于1943年同戈林弟弟卡尔的遗孀伊尔莎·戈林结婚。——原注

机关，赐予它以独立的执行权，并使这个作为后来秘密国家警察前身的新机构不受普鲁士警察管理法第十四条的约束，因为这条规定：警察只能“在有效的法律范围内”采取措施——换言之，即必须维护基本权利和人权。

政治刑事警官们也不跟一般警察在一起办公。他们迁出设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旁边的警察总署，另立机构：这个新立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特别部门”占用了前共产党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而狄尔斯机构的主要人手则待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sup>83</sup>一所宽敞的工艺学校，靠近莱比锡街的戈林官邸。4月底戈林通过一项法令，将狄尔斯的机构取名为“秘密国家警察处”，列为只受一个头目即赫尔曼·戈林控制的邦警察部门。一位不著名的设计邮戳图样的邮局职员，给这个新机构定了一个缩写名称：Gestapa。但民众都管它叫Gestapo<sup>①</sup>。这一令人谈虎色变的名词压在德国人的心头达十二年之久。

然而，戈林以警察为基础的这种权力地位也不是不能触动的。一个竞争者开始触动它了——戈林同这个竞争者的遭遇发生在1933年春天，当时他正煽动警察和被他称之为辅助警察的冲锋队大肆开展国家一体化和恐怖活动，以进攻最后一批坚持抵抗的民主的岛屿。

普鲁士总督戈林号召“采取最严厉的手段对付敌视国家的组织的活动……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器”。他指手划脚地对冲锋队员说：“在这一点上我不讲什么公正，我的任务只是处死和斩草除根，别无其他！”他的语言越说越恶毒，嗓门越发嘶哑。他大声叫喊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不能单靠警察这一工具，“我要同台下这些人——褐衫队员——一起领导这场殊死的斗争！我将使人民懂得

---

<sup>①</sup> Gestapa为“秘密国家警察处”，Gestapo为“秘密国家警察”，即秘密警察，或音译盖世太保。——译者

他们必须自己保卫自己。”可是，当穿褐衫的冲锋队员开始向幻想中的国家敌人战斗时，这位大言不惭的戈林却被这些应召而来的人的暴行吓坏了。那些同冲锋队最低级的本能和社会怨愤汇集在一起的东西，蛊惑人心的演说家和宣传家多年来灌输给冲锋队各营的东西，现在自辟蹊径了：普鲁士变成了一座恐怖的地狱。

冲锋队的行动队横行城市街头；柏林冲锋队的打手们尤其残暴凶狂。柏林-勃兰登堡冲锋队地区总队第一区队把所谓的反对国家的政敌送进防空掩体、地下室和偏僻的地方，对被捕者滥施殴打，百般折磨。仅柏林一地，冲锋队就设了五十个“野蛮”集中营。在帕佩将军街、康德街、黑德曼街、菲斯滕费尔德街——各处防空掩体中，都有冲锋队员在毒打被他们抓到的人。不仅柏林如此，柏林以外的地区也出现了疯狂的恐怖活动：佐内堡、博尔尼姆、克尼希斯武斯特豪森、克姆纳等地，都发出了恐怖信号。戈林意识到冲锋队已不受他的控制。他眼见自己已陷入了冲锋队的包围：普鲁士各地很大一批警察局长穿上了冲锋队的制服，而且在各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身边也都坐着所谓的冲锋队顾问。毫无疑问，戈林在德国最大的一个邦的统治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秘密警察头子狄尔斯向主子进言，挑动主子公开同冲锋队对  
84 着干。戈林犹豫不决，迟迟拿不定主意，而狄尔斯已抢先行动了。根据柏林的德意志俱乐部<sup>①</sup>的情报，狄尔斯掌握了冲锋队打手们的线索。随后，他的同行、刑事参议黑勒向他报告说，冲锋队在黑德曼街10号纳粹党柏林区党部四楼私设刑房，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当即从韦克营调来一批警察，在刑房四周架起机枪。经过长时间谈判，狄尔斯终于促使冲锋队交出了他们所抓的人。“我们见到的受害者，”他写道，“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他们被关在狭窄的柜子

---

<sup>①</sup> 1924年在柏林成立的一种政治学术团体，旨在保持同保守党政客和贵族的联系。1944年被解散。——译者

里，成天站着，逼迫他们‘招供’。所谓‘审讯’就是不停地拷打，十来个家伙分成几批，每隔几小时轮番上阵，给受害者饱尝铁条、橡皮棍和皮鞭的酷刑。我们走进刑房时，只见这批活着的僵尸一排排躺在烂草堆上，满身是化脓的伤口。”

秘密警察头子斗红了眼。他派出手下的秘密警察，开始一处一处地对冲锋队盘踞的防空掩体进行清剿。在戈林半心半意的支持下，狄尔斯死死盯住冲锋队打手不放，经常冒着会被这些凶神恶煞痛打的危险。到5月底，普鲁士境内的冲锋队“野蛮”集中营几乎已经绝迹。但狄尔斯并不就此收兵，他和普鲁士司法部一个勇敢的法学家小组联合作战，这个小组在检查官维尔纳·冯·哈克和约埃尔博士领导下追捕冲锋队暴徒，把他们扭送法庭处置。

反冲锋队的斗争愈演愈烈，但秘密警察头子有时暗自感到这样作战考虑过于欠周，因为同冲锋队的矛盾愈是尖锐，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徒也愈加悄悄地渗入到普鲁士的戈林地盘。狄尔斯预感到，威胁着戈林在普鲁士的独裁统治的更大危险来自黑色集团。狄尔斯说：“党卫队行将进行的出击，比明火执仗的冲锋队更为居心叵测和考虑周密。”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他已经一再给党卫队制造了障碍。

党卫队对秘密警察头子抢走了被它抓到的一个俘虏耿耿于怀，这个俘虏曾经是它手中掌握的一发重磅炮弹：1931年的冲锋队叛逆者瓦尔特·施滕内斯上尉。看来他已经注定必死无疑；但经过狄尔斯向戈林陈述利害，引起戈林对这个前冲锋队领袖的关注。戈林要求对方交出施滕内斯——于是上尉被关进了秘密警察的监狱。戈林在纳粹上台前的一次失败，是和施滕内斯的名字分不开的。这位前冲锋队司令在1931年并非没有兴趣再度出任冲锋队领导，同施滕内斯串通一气，密谋反对慕尼黑冲锋队的领导；他至少曾向柏林冲锋队保证过，在慕尼黑代表它的利益。

当时，施滕内斯感到身受党卫队的威胁，斗争的矛头也已针对着希姆莱的党卫队。1931年10月10日，接近施滕内斯的《每周实况》战报报道：“戈林主动声明，从现在起他将全力促使这一混乱局面的结束。他还断言……他也无惧于把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拉下马。”后来戈林也被反对派冲锋队员誉之为希姆莱的敌人，因为在施滕内斯暴动后，《每周实况》还报道说“戈林是力不从心，未能说到做到。”现在，这位普鲁士总理一心想弥补自己在1931年未能做到的事情。他指示狄尔斯保护施滕内斯，以防党卫队对施滕内斯下手。1933年秋，在施滕内斯妻子和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工作的某德国军训教官的帮助下，狄尔斯让这个前党卫队的阶下囚从荷兰边界越境潜逃。瓦尔特·施滕内斯后来晋升为当时的中国国家首脑蒋介石的卫队长。

不过，在同党卫队较量中取得这样的胜利是罕见的。多数情况下狄尔斯都一无所获。他始终未能砸开柏林党卫队刑房所在地的哥伦比亚大楼；他指挥的反殴打运动的另一个目标，即帕彭堡党卫队秘密集中营，也是在希特勒听了狄尔斯的报告后命令陆军部队炮兵“毫不留情地摧毁”这个营地及其全部坚持顽抗的党卫队时，才算被攻了下来。

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使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深感不安，即党卫队员既有戈林阵营的人，也有希姆莱阵营的人。这些人还能有几天忠于戈林的普鲁士呢？普鲁士警察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吕格，尽管有其个人原因没有参加希姆莱阵营，但他背后也有戈林派来的人监视。狄尔斯首先是怀疑脸色淡黄的刑事参议阿图尔·奈比和身材细长的秘密警察陪审官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前者是秘密警察中为数不多的纳粹党员之一，后者专好向奈比打小报告。

奈比的野心在同行中是无人不晓的。“他有朝一日会变成大

人物，要不就被绞死，”刑事警官利贝曼·冯·宗南贝格曾对他作出这样的预言。奈比身为秘密警察的行政负责人，爱听这样的传闻，即据说是他创造了一句名言：“没有信念，只有权变。”“不过奈比先生，这句话怎么可能是您说的呢？这是巴尔扎克作品中那个狱中囚犯伏脱冷说的呀，”一个熟语文学的听众这样反问道。奈比的回答是：“您一定很清楚，他〔狱中囚犯伏脱冷〕后来当上了巴黎刑事警察局长。”可是通向这个职务的道路被鲁道夫·狄尔斯堵死了。德意志民族党的逃兵吉斯维乌斯鼓励他的朋友奈比反对顶头上司狄尔斯，因为他具有刚够中学毕业生水平的奈比所缺少的一切：学识、大资产阶级出身、牢固的社会地位和一股毫不在乎的劲儿，对此连戈林也有时为之感到愕然。有一次戈林大声对他说：“狄尔斯，我警告您，您是想同时脚踏两条船！”狄尔斯听了只是莞尔一笑，答道：“秘密警察头儿必须同时脚踏所有的船，总理先生。”

奈比认为恰恰是这种“无原则性”，狄尔斯有可能实际上是个暗藏的共产党人，他的朋友吉斯维乌斯又给这种怪诞想法添油加酱。“对狄尔斯这个反复无常、轻率行事的家伙……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斗，”吉斯维乌斯写道。这两个朋友收集了控告狄尔斯的材料，并劝说头脑简单的达吕格相信红色狄尔斯的幽灵在徘徊。希姆莱的竞争者达吕格的眼睛偶尔也还算是明亮的，他对奈比和吉斯维乌斯说：“你们还想前门驱狼后门引虎吗？”但他不知道，奈比——估计还有吉斯维乌斯——早已和虎挂上了钩。希姆莱对于对手戈林的每一着棋都一清二楚。10月初，他认为戈林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他可以开始冲击普鲁士要塞了。

就在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向希特勒呈请将党卫队保安处和党卫队机关从慕尼黑迁往柏林的同时，达吕格的老搭档赫伯特·帕克布施带领党卫队队员冲进了秘密警察头子的住宅。狄尔斯太太被关在卧室里，接着帕克布施撬开了党卫队对手的书桌。但狄尔

斯的妻子还是设法及时打电话找到了丈夫。几分钟后，鲁道夫·狄尔斯领着动物园警察局的一队警察，匆匆忙忙赶回波茨坦街自己的住宅。帕克布施抬头一看，仿佛是撞见了一个幽灵。他还没有握好解下的执勤手枪，就被警察抓住，并被带走了。

但是秘密警察头子的胜利没有保持多久。库特·达吕格就出场了，他向戈林说明帕克布施“缺乏纪律性”；而狄尔斯阴谋反对柏林党卫队，嫌疑重大。戈林感到对自己手下的警察头子看错了人，这个人叫他太猜不透了。他释放了帕克布施。狄尔斯吃一堑长一智，明白戈林并不想同党卫队拼到底。当秘密警察头子两星期后获悉，警察和党卫队奉戈林之命包围了他的机关，他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到国外，在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观望等待。

这时，戈林挨过了党卫队的攻击这一关，慕尼黑党卫队机关迁往柏林一事被希特勒制止了；党卫队全国领袖得到的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他可以在施普雷河畔建立一个保安处机关。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老朋友赫尔曼·贝伦茨博士搬到了柏林艾兴林荫大道。贝伦茨是基尔一家旅店老板的儿子，海军中尉海德里希早先常常在他那里下榻，暂欠房钱。贝伦茨建立了东部大区保安处，而海德里希的另一名心腹、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海因茨·约斯特，当上了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派驻秘密警察处的代表。

希姆莱打进戈林帝国的突破口并不很深。戈林告知回国的秘密警察头子说：“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决不会到柏林来。”希姆莱甚至不得不同戈林握手言欢，同时并对党卫队敌手狄尔斯抚慰了一番。1933年11月9日这天使鲁道夫·狄尔斯博士荣幸地穿上了党卫队旗队长的制服。但是，党卫队头目们在这个最奇怪的党卫队队员的人事表上记下了他们的看法：此人圆滑，“不坦率”，自私自利。

希姆莱向戈林同志的警察帝国发动的第二次冲击失败了。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反普鲁士总督的盟友主动提出为党卫队全国



领袖出力：威廉·弗立克博士的中央内政部(RMdI)。1933年11月12日国会大选后，国家改革派弗立克决定，连德国各邦的最后一点主权也必须予以取消。各邦仅仅作作为行政单位行使由柏林控制的管理权。内政部当权的中央集权派、前地方政府领导人尼古拉和部务主任梅迪库斯，设计了一套国家的管理办法，规定中央应有权对各邦政府发布指示。国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警察。过去的警察主管权完全分属德国的十六个邦，有关警察的组织、任务、职权范围，概由各邦自行掌握，中央内政部只是进行一般性监督，至多不过通过国家对各邦警察的财政资助能施加一点影响。

但是弗立克博士手下的中央集权派，现在在他们的计划中写进了关键性的条款，规定各邦的主权即包括警察主管权全部都划归中央政府。换言之，中央内政部要求自己掌握德国所有的警察部队。从现在起，非经中央内政部事先批准，在德国警察内部不得颁发执勤条例，不得部署调整机构，不得提升和任命干部（少校以上）。国家改革派想要实现希姆莱也曾向贝斯特博士谈到过的纲领：剥夺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指挥权。但是有一个区的头目拒绝内政部侵夺这份权力。

虽然除了中央内政部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尼古拉-梅迪库斯计划，但普鲁士总理戈林赶在中央集权派之前采取了行动。他在1933年11月30日颁布法令，将普鲁士秘密警察定为内部行政当局的一个独立机构，由内政部主管的有关业务工作划给秘密警察处，隶属普鲁士总理领导。他任命一个督察员，代表戈林监督秘密警察处并自行确定一名秘密警察头子。国家改革计划还没来得及以法令形式获得通过，戈林就对准它的要害，给以致命的一击，德国最大的一个邦逃脱了威廉·弗立克对警察的操纵。

但是，内政部长无力迫使戈林同志就范，因为他在党内无支配

的权柄，也未博得希特勒的欢心，因为他过去曾经向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旗帜宣誓效忠。有如被魔法所迷惑，中央内政部的中央集权派都将目光投向一个人，这个人曾经宣称要解除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控制权。他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就是救星！党卫队全国领袖手中有权：他掌握着党内警察；在德国许多邦都有他的政治预备队，他长期以来鼓吹建立一支全国性的警察。

弗立克的僚属，当然是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帮助警察中央集权派希姆莱向普鲁士分离主义开始进攻。在中央内政部暗中配合下，希姆莱攫取了一个邦又一个邦的政治警察指挥权。1933年11月，希姆莱被任命为汉堡、卢卑克和梅克伦堡-什未林政治警察司令；1933年12月，任安哈尔特、巴登、不来梅、黑森、图林根和符腾堡政治警察司令；1934年1月，任不伦瑞克、奥耳登堡和萨克森政治警察司令。等到弗立克于1934年1月将他的“国家重建法”提交给唯唯诺诺的国会时，希姆莱已经掌握了除普鲁士和绍姆堡-利珀以外所有德国各邦的政治警察。当然戈林始终并未屈服，相反他收了收拳头，准备再次打出去。

1934年2月19日，弗立克向各邦邦长发布一项决定，“德国各邦警察的直接指挥权”由他统一掌握。3月9日，戈林针锋相对地发布决定：他已接管普鲁士邦警察最高领导权，并将普鲁士内政部主管一切邦警察事务的警察处头子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下。戈林再次敲掉了对方手里的武器。

然而，吗啡狂戈林靠毒品兴奋了一阵子后，刹那间又陷入失望和颓丧的情绪之中。这位普鲁士总理逐渐发觉，他坚持这样斗下去是得不偿失的。他自信已经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了大祸临头的狼烟，其来势之凶，对他权力的危害之大，超过了弗立克和希姆莱对他的威胁。1933年春刚刚冒头的恐怖行动，现已蔓延全国。不计其数的纵队在行进，嚓嚓的脚步声越来越震耳欲聋；褐色营插起了隆隆

战鼓，四百万冲锋队吹响了嘹亮的号角，发出了战斗的信号，他们找不到职业，政治野心勃勃，渴望革命的来到。

戈林感到现在应该同弗立克和希姆莱缔和了。3月底，他开始与中央内政部举行谈判，经过讨价还价之后自以为得了大利，才答应将普鲁士各部纳入中央管理。除邦总理府外只保留了普鲁士财政部，其他内政职权悉归中央内政部。警察头子达吕格上调弗立克主管的部里，指挥全国所有穿制服的警察。戈林在政治警察方面无疑作了不利于自己的让步：虽然他尚未完全承认中央内政部的统治权，但把秘密警察督察员的位子让给了希姆莱，海德里希当上了秘密警察处处长，奈比接管了邦刑事警察处。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仕途生涯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党卫队第一次掌握了德国警察。不过几乎还没有时间来欢呼庆祝，历史并不认为希姆莱和戈林之间缔结了协定就万事大吉了。继强迫订婚之后，随之到来的却是流血的婚礼。1934年4月10日戈林（“没有给每一个死人绊倒”）刚刚将新的主人引进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并把自己的心腹狄尔斯安置到科隆行政区政府头头的位子上，秘密警察处就接到报告，报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在它短暂的历史上已面临深重的危机。

所有报告反映，冲锋队内犹如开了锅的沸水，一片怨声。它那成员复杂的领袖团偏偏在一个问题上得出一致的看法，即深信“阿道夫”1933年1月30日以来奉行的整个方针根本不符合领袖团的意愿。

## 第六章 罗姆暴动

在冲锋队集会的酒店里，充斥着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怨言。如同1931年施滕内斯暴动前一样，到处可以听到一个口号：“阿道夫背叛了我们！”所有冲锋队领袖都感到，受到多方赞扬的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军冲锋队，已变成了这个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给冲锋队鼓动革命干劲，叫它为夺取政权这一天作好准备；可是当这一天和平地、表面上也完全符合宪法地来到时，党就不清楚该如何对待冲锋队了。人们终于给它提出一项令人放心的任务：负责“训练”青年，并和国防军配合组成一支强大的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军队。

从冲锋队成立时起，参谋长罗姆就把它视为一支新型德国军队的胚芽。“我是新型军队的香霍斯特，”他常常这样自我吹嘘，但这句话的后面掩盖着他的苦恼是，那些旧军官傲慢地不愿与他同伍。兴登堡总统拒绝跟他握手，这位陆军大元帅认为他既是一个有相公癖者，又是一个军人的叛逆，总而言之，是个靠不住的人。罗姆连长亲身经历过西线战场上的持久阵地战，体会到旧普鲁士军纪规章已不适应于现代战争。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必须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一种新的纪律，一种新的组织原则。将军们都是些老傻瓜，他们想不出任何新的主意。”他自以为有了新的主意，即组织民军，人民军思想。他的冲锋队就是新型的人民军。这支军队只需战斗力强，只需进行现代化的革命战争训练——之后，这一时刻就来到了；冲锋队接管国防军，并将他这个改

革家恩斯特·罗姆一举送上统率新德国的新型国防军的权力高峰。

新型的人民军干部早就存在。罗姆指挥着一支五十万人的大军，单从数量上说就五倍于国防军。党的这支军队分成五个冲锋队副总指挥大区(军团)和十八个地区总队(集团军)。罗姆领导着一个参谋部，由过去的军官担任其中的要职。事无巨细，罗姆都仿效军队的那一套。“巡视军官”负责检查冲锋队各突击队的执勤，冲锋队执勤条例模仿军队中的规章制度，冲锋队各旗队均沿袭前皇家军队的团一级番号。 91

冲锋队领袖们愈是自信地发号施令，指挥这支褐色大军，国防军也就愈是眼红地注视着罗姆的军事表演。职业军人们发觉，一旦国防军摆脱了凡尔赛强加于它的军备限制的束缚和恢复义务兵役制，冲锋队将是理想的预备兵源。希特勒指令这两支力量结合起来。但是罗姆碰上了一个对手，这个人可不是他所想象的“老傻瓜”，而是国防军中具有最现代化思想和最果断的军官之一。

这个对手名叫瓦尔特·冯·莱希瑙少将，他是运动爱好者和炮术专家，又是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尽管他右眼夹着单片眼镜，但却嘲笑普鲁士德意志军事传统的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许多保守派的同事都认为他是一个功名心切的野心家，有的人甚至认为他是纳粹党员，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前国防军第一号高级军官、现任国防部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陆军大将，早在1933年以前就受到希特勒的信任。虽然冯·莱希瑙将军一开始就胸有成竹：必须将冲锋队有用的军事力量纳入国防军，必须遏制罗姆危害军队的野心；但为了使罗姆上钩，除了迁就冲锋队外别无他法。

莱希瑙提议，冲锋队首先着手进行的重要任务，是负责抓民军以扩大国防力量的工作。特别是作为东部屏障的国防军的兵力奇缺，因此需要建立起一支对付波兰的所谓东部边防部队，它事实

上是作为一种民军形式列入计划的——据莱希瑙解释，东部是冲锋队大军的用武之地。此外，由冲锋队在国防军帮助下，对一切非武装部队团体进行入伍前的军事训练。

1933年5月中旬，冲锋队和国防军缔结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冲锋队、党卫队以及德意志民族党的前线战士团“钢盔团”，均隶属国防部领导。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被擢升为冲锋队训练处(AW)处长，并奉命领导一个由国防军教官组成的班子，每年训练二十五万名冲锋队员，作为日后国防军的后备力量。同时，由罗姆负责将各右派政党的军事团体，特别是纪律性强和人数众多的钢盔团并入冲锋队。不过莱希瑙对钢盔团却有自己的打算的。

将军怂恿钢盔团领袖西奥多·杜施特堡把尽可能多的钢盔团成员塞进冲锋队。莱希瑙的作战计划是：让一百万名钢盔团成员集体加入冲锋队，这样就能通过人多势众来控制罗姆的冲锋队；如果再加上委派国防军军官担任训练处和边防部队里的要职，罗姆也就被制服了。莱希瑙的盘算看来一开始进行得不错。克吕格尔的训练处和东部边防部队中的要职都被旧军官或现役军官占去了。但钢盔团未能顺利地打入冲锋队，罗姆对接纳工作考虑得很周到，他把冲锋队分为三部分，作用各不相同，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谓现役冲锋队——他安排了五十万名冲锋队员，而只吸收了三十一万四千名钢盔团成员。

现在罗姆可以号称拥有一支四百五十万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了；他随即转守为攻。他要求扩大势力和掌握东部边防部队中的有职有权的领导位子。尤其是他还要求控制国防军认为最不能让别人碰的东西——德国东部地区的军火库。罗姆的要求触犯了德国将军们的铁的信念：除国防军外，决不允许国家还有任何其他武器持有者。国防部决定，发誓不再跟罗姆的民军思想挑逗调

情。从1933年12月起原则上国防军只承认一种国防组织形式，即普遍义务兵役制。

但是罗姆继续走自己的路子。他于12月1日被任命为不管部长，立即指示冲锋队各副总指挥大区建立本部武装警卫，甚至拉拢外国参与其事；由于法国首先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同意德国加强民军部队，罗姆自作主张地同法国驻柏林大使馆武官商谈。1934年2月初，他还把自己的要求书面通知国防军。他的备忘录措词强硬，致使勃洛姆堡在一次司令官会议上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罗姆要求以全部国防领域作为“冲锋队的地盘”，叫国防军只是抓训练工作。

冯·勃洛姆堡大将随即提请希特勒裁决，逼使总理作出过去一直回避的抉择。从感情上说总理是倾向于罗姆的方案的，不过他也知道，要是没有军事专家，他就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对外扩张计划。然而对希特勒来说，再没有比冲着他的朋友罗姆讲“不行”这两个字，更难于启齿的了。他试图调解：1934年2月28日，希特勒将国防军和冲锋队双方的领袖请到国防部大理石会议厅，向他们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勃洛姆堡语）讲话，要他们保持和好。在他的督促下，勃洛姆堡和罗姆不得不达成一项协议，确定国防军是第三帝国唯一的武器持有者，并同意由冲锋队负责抓入伍前和退伍后的军事训练。在施坦达尔腾街罗姆的柏林总部举行的一次香槟酒早宴上，冲锋队和国防军双方的头目戏剧性地握手言欢。

但是，军官们刚刚离席，罗姆就骂开了：“可笑的下士宣布的那一套，同我们不相干。”他越来越气急败坏地咆哮道：“我才不会按协议办事呢。希特勒言而无信，少说也得去休假。”还更凶狠地说道：“要是希特勒不愿一起干，我们就撇开他来干。”在场的一位冲锋队副总指挥，听了罗姆酒后大放厥词，反对亲爱的领袖，吓得目

瞪口呆。退役中尉兼汉诺威冲锋队副总指挥维克多·卢策嗅出了大逆不道的气味。他急忙竭力加以制止。

1934年3月初，卢策找到了“领袖副手”鲁道夫·赫斯，并悄悄地向他报告了罗姆骇人听闻地发表反对领袖的言词（“阿道夫胡说八道”）。但赫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卢策并未就此罢休。他专程去伯希特斯加登向希特勒作了报告。他还揭发冲锋队中存在的对第三帝国领导的所有不满情绪。但希特勒也只是含糊其词地劝慰说：“我们还得让事情成熟了再说。”由于希特勒对自己的朋友罗姆不采取任何措施，卢策便又托付一个第三者，将一封信送给当时正在布劳恩费尔斯进行野营训练的冯·莱希瑙少将，卢策在信中提醒自己的参谋长<sup>①</sup>警惕一次新的反国防军运动。莱希瑙感谢副总指挥给予这样宝贵的指示，等送信的冲锋队员走远了以后，嘲笑地说：“卢策这家伙并不危险，好当参谋长。”

抨击罗姆的卢策并不知道，冯·莱希瑙将军连日来正跟一名党卫队旅队长合计着，这个旅队长对一举解决罗姆问题已有周密设想。秘密警察处长兼党卫队保安处（SD）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决心消灭以罗姆为中心的整个领导集团。他好久就争取海因里希·希姆莱支持他的斩草除根的计划。党卫队全国领袖犹豫不决，这种踌躇却说明了心里存在阴郁的预感：消灭罗姆就是打开了一个潘朵拉魔盒<sup>②</sup>，其恶果将使党卫队和冲锋队再无安宁之日。

希姆莱仿佛对行将到来的事变已有预感，他跟罗姆的对手敬而远之。这个早先的后补军官，对他同罗姆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难以忘怀。即使在民族社会主义年代的最初几个月里，希姆莱

---

① 指冯·莱希瑙，他曾任东普鲁士国防军参谋长。——译者

② 希腊神话：宙斯神为惩罚普罗米修斯偷取天火，派女人潘朵拉（Pandora）来到人间，行前把一个盒子交给她，盒子打开时，除留下希望以外，其中所藏的一切灾害罪恶统统跑出来，散布于人间。——译者



也不能设想不再和罗姆紧密来往。他们一道发表夸夸其谈的演说，一道在罗姆的柏林住所欢宴。他们一道策划过罪恶勾当：海德里希同冲锋队旗队长乌尔合作，武装起一支行动队，于1933年4月3日潜入奥地利，在杜希霍尔岑附近一家旅馆里，杀害了失宠于罗姆的参谋长心腹格奥尔格·贝尔。去年罗姆过生日（1933年11月28日），希姆莱“以军人和朋友”的身分祝愿他“事事将得到忠实的部属的支持。能够一直作为你最忠实的朋友，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无上的骄傲”。他们两人还是海德里希第一个孩子的教父，即使1934年2月28日罗姆在柏林施坦达尔腾街发表反希特勒的长篇言论引起震惊之后，希姆莱还试图使冲锋队头子对希特勒和国防军持重相处，避免任何轻率行动。

但是，希姆莱对罗姆一再表白的忠诚，在1934年春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而动摇了：他感到，与戈林新缔结的同盟，其重要性超过和老上司的关系。因为这个同盟是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攫取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基础。从这里出发，一条道路直接通向海德里希的歼灭计划：没有戈林就无法掌握秘密警察，不疏远罗姆就不能同戈林合作。而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是民族社会主义所有显要人物中最害怕罗姆冲锋队的一个人。罗姆以其各地任警察局长的冲锋队成员和各级地方政府首脑身边的顾问的冲锋队成员威胁着戈林在普鲁士的内部权力，同时阻梗着戈林充当国防军统帅的长远目标。

希姆莱改变初衷。这个谨小慎微的人所以能轻易地反戈一击，是由于轻率的罗姆同政权的几乎所有实力集团都闹翻了，各个集团都巴望罗姆集团的覆灭，从摧毁冲锋队中捞到好处：国防军和戈林摆脱了一个讨厌的竞争对手，党阀们和卫道士们除掉了一个声名狼藉、作恶多端的捣乱分子，党卫队则可以最终使自己挣脱冲锋队的约束。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置人死地的演出开始了，因为非杀人不可。纳粹党产生于自由团和暗杀时期，本身就是以从事犯罪活动作为政治手段；象这样的政党，对于无法解决的党内分歧，除了求助于暴力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更好办法。“暗中干掉一个人，我们并不认为是什么悲剧。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我们组织的一部分工作，”格奥尔格·贝尔有一次谈到过这样的哲理，当时冲锋队凶手们还没有亲身体会证实他的论点的正确性。“我们说这是自卫，你们则说是——谋杀。如果出于道义的原因、为了党的利益而干掉一个人，我认为没有什么不正常。”

95 联系罗姆的情况来看，这就意味着：只有处死一个参谋长，才能确保执政者高枕无忧，再也不用对冲锋队担心。罗姆这个人希特勒最早的和唯一的朋友，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纳粹内幕；如果按正常的办法将罗姆撤职，或是对这个在国内带头搞同性恋爱的家伙进行公开审判，那是不可能使掌权的领袖们放心的。罗姆非死不可。

秘密警察兼党卫队保安处头子海德里希于1934年4月底着手进行工作。希姆莱出发巡视各地党卫队旗队，布置党卫队作好准备向冲锋队同志们出击；海德里希安装起扼杀罗姆手下爪牙们的绞索。首先，他需要取得对冲锋队领导采取行动的充分理由。整个五月，海德里希都在搜集材料，好叫希特勒和国防军相信所谓的罗姆叛国计划。

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当时身穿冲锋队副总指挥制服，作为训练处长，在冲锋队各副总指挥大区 and 地区总队派有“动员代表”。海德里希就通过他的情报机构收集罪行材料。任何反冲锋队的材料，任何反罗姆的帮手，都受到欢迎。党卫队一个有名望的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将军、冲锋队名誉领袖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也参与了阴谋活

动。就连反对纳粹的威廉·亚当中将（施莱彻尔派军官，当时任驻慕尼黑第七师司令，给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施毛泽尔提供有关冲锋队的情报）的帮助，海德里希也不加拒绝。

可是，搞到的材料相当单薄。除了冲锋队在柏林、慕尼黑和西里西亚等地军火库的一些情况外，为海德里希收集材料的人，只揭发了几个冲锋队领袖声称要以血腥手段进行革命的胡言乱语，这些还不足以构成叛国罪的论据。有些间接证据甚至倒说明冲锋队不可能反叛希特勒。布雷斯劳城防司令冯·拉本瑙上校5月初判断说，冲锋队发难一说是难以置信的；西里西亚冲锋队长海因斯听到戈林说国防军无意（海因斯担心这一点）进攻冲锋队，他当即让他本部警卫的一半人员去度假。

相反，罗姆倒认为，他的职责是激励警察和国防军对付政权的敌人。他派冲锋队旅队长于特纳去国防部，告诫人们当心前总理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对现政权搞反叛活动——就是后来一些所谓罗姆暴动野史的作者将其升格为参谋长共谋犯的那个施莱彻尔！“我活着是为了我的领袖，”独臂冲锋队领袖汉斯·彼得·冯·海德布雷克冲着作家恩斯特·冯·扎洛蒙大喊大叫，因为冯·扎洛蒙讽刺了希特勒。海德布雷克说：“想到他〔希特勒〕，这是使我活着的唯一力量。如果我不再相信我的领袖，那我情愿一死。”几天后，当他心目中的偶像将他依军法处决时，这个冲锋队员在行刑者的枪声中发狂地吼叫：“领袖万岁！希特勒万岁！”

不，冲锋队没有打算叛逆，冲锋队没有考虑进行暴动或是不服 96  
从调度。它只是想对希特勒施加压力，让它最终在国家和军队中获得久久不肯给予它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罗姆想出了一种实际上是冒险的战术：以为要希特勒逐渐满足冲锋队的要求，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罗姆对希特勒发动了一场神经战，当然是有一定限度的。他深入各地区冲锋队总队，组织他的部队

举行大规模战斗演习。他拉开嗓门发表演说，声称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革命”即将到来。他指望，褐衫队的群众性进军将最终迫使希特勒让步。

罗姆没有看到，即使最善良的德国人也对他的这些搞法感到畏惧：冲锋队大军在准备夺取德国政权了。军人也必然把罗姆看成死敌——他们对参与海德里希的勾当不无兴趣。国防部谍报局长海军上校康拉德·帕齐希感到“简直令人毛骨悚然”，“那些作恶多端、不务正业的坏家伙”竟想把国防军从它传统的席位置上挤走。这种思想是不难理解的：必须干掉冲锋队。多数军官和布雷斯拉夫城防司令抱有同感，他曾坦率地说，即使没有查出冲锋队举行暴动的计划，清除褐衫队这个“奥吉亚斯牛圈”<sup>①</sup>也是当务之急。

同样，国防部首席政治战略家冯·莱希瑙将军的话也一点不含糊，他把海德里希视为情投意合的伙伴，是经常出入秘密警察处的常客，给党卫队保安处长提供营房、武器和运输工具，来进行这次重大作战行动。他在1932年向菲立克斯·施坦因纳上尉（后来是武装党卫队将军）作过怎样的预言呢？莱希瑙评论冲锋队说：“告诉您，他们总有一天会对我们低声下气的。”海德里希的行刑队业已组成，准备实现将军的预言。

6月初，达豪集中营长官、党卫队区队长西奥多·艾克的部队，经过精心策划的演习，准备打击罗姆的冲锋队。当时艾克就带领自己的部队排练了6月30日的演出：出其不意地对慕尼黑、勒希菲尔德和维西浴场发动进攻。几乎在同一时候，慕尼黑党卫队各部队准备行动。党卫队第三摩托突击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马克斯·米勒，奉命组织好队员，检修车辆，待命迅速投入行动；米勒的突击队的任务是，在X日这一天到距慕尼黑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处

---

<sup>①</sup> 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有养牛三千头的大牛圈，三十年未打扫，后以此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译者

不远的土耳其兵营集中。同样，在利奥波德街 10 号党卫队南德大区保安处办公室里，也发出了准备信号。

从南到北，自西向东，海德里希调动起他的部队。他估计有四个大规模冲突的重点地区：巴伐利亚、柏林、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包围圈越来越紧缩，冲锋队却还蒙在鼓里，毫无觉察。保安处头子紧张活动，进入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应该给谁以致命打击呢？海德里希派出心腹四处追踪罗姆的密友，指示心腹们制定杀害对象名单。<sup>97</sup>

还在 4 月底，艾克就提出了一份所谓全国“不受欢迎的人”的名单，作为定于 X 日的消灭对象。显然，列入这份名单的人几乎全是冲锋队领袖。可是海德里希随即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既然动了手，那就索性乘此机会把最危险的政敌也一起干掉！周复一周，海德里希的处死对象名单越来越长。几乎所有各大区保安处都制定了枪杀名单，党卫队和秘密警察提出的对象一增再增。保安处机关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伊尔格斯是一份处死名单的制定者，他问一个熟人说：“您知道什么叫嗜血成性吗？我现在感到，可以在血洗中为所欲为了。”

制定处死名单变成了局内人角逐死人的游戏。各人都有一张：戈林提了一张，纳粹党巴伐利亚区领袖瓦格纳提了一张，党卫队、保安处和秘密警察争相挑选处死对象。很快它们就对这个或那个是否真正需要予以消灭争执不休。巴伐利亚保安处头子瓦尔纳·贝斯特想勾掉“正派和忠实”的冲锋队副总指挥施奈德休勃的名字，而海德里希则认为这个冲锋队队员“象其他冲锋队队员一样危险”。戈林相反删去了他过去的秘密警察头子狄尔斯的名字，而狄尔斯自己却提出了另一份名单。

这时秘密警察处接到一个报告，打乱了海德里希精心安排的时间表。希特勒和罗姆出人意外地一致同意延期解决冲锋队和国

防军的问题；6月4日，他们俩举行了一次长达几小时的会谈，同意从7月1日起给冲锋队员休假一个月。此外，1934年6月8日《人民观察家报》登载了冲锋队总部新闻处一份引人注意的公报，公报中说，参谋长接受医生的劝告因病需要休假（去维西浴场碘疗）多周。接着还有这么一句奇怪的话：“为了一开始就防止因此而可能产生的种种误解，参谋长授权声明，他在恢复健康后将继续全权担任他的职务。”

国防军松了一口气，它的将军们感到似乎罗姆吃了一次败仗。罗姆在“斗争时期”的老伙伴、陆军大学的赫尔曼·赫夫勒上尉把“陆军决策机关内存在的看法”告诉了他：“新闻公报的头一点内容〔关于罗姆的病情〕最清楚地说明参谋长的地位已经动摇，对此，即使后来作出如下……声明，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陆军稍感宽慰，但是海德里希却惴惴不安，新的情况发展使  
98 他没有很多时间了，因为诬告正在休假中的冲锋队搞政变，那可不好办。柏林冲锋队领袖恩斯特已考虑好乘船去加那利群岛旅行，冲锋队总部政治头目、地区总队长格奥尔格·冯·德滕准备去巴特维尔东根旅行度假——哪有什么风暴将临的暴动呢？海德里希要想在为时还不太晚的当口上演出这场冲锋队好戏，就得迅速行动。计划已经拟就，凶杀队已经组织好了，但存在着一个把握不定的因素：希特勒的反应，他刚刚还同罗姆达成了协议，看法尚不一致。

希特勒一直畏惧跟冲锋队正面交锋。长期以来，他玩弄两面派手法，当然，更多的还是虚弱的反映，而不是理智的考虑：一方面他给褐衫大军打气（也是作为用来对付国防军的平衡力量），另一方面他又对于干脆取消冲锋队的想法频送秋波。但纳粹领袖感到自己的力量过于薄弱，无法要求他的冲锋队自行消灭。他几乎无力驳回罗姆越来越狂妄的要求。有一次，人们在总理府秘书室听到

希特勒绝望地叫道：“不，不，我不能这样做，你的要求太过分了。”

他总是指望假手别人来解决他的难题。有时他同意罗姆提出的某个要求，随即叫罗姆去找财政部长——指望铁石心肠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会有足够的胆量，以财政理由否定掉参谋长的计划。希特勒还曾一度认为，可以通过裁军的迂回道路取消冲锋队。1934年2月21日，他向访问柏林的英国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建议，德国政府可以在西方国家在裁军政策上让步的情况下，将冲锋队裁减三分之二，并同意由国际联盟对余下的三分之一进行监督。

但是现在海德里希、希姆莱和戈林三个人一起来找他，他们制定了一项计划，而且有可能解决冲锋队问题的详细办法。希特勒跃跃欲试，虽然还不无踌躇。就在他还没有完全打定主意的时候，一次引人瞩目的演说使他震惊不已。

6月17日，希特勒的副总理、中央党的叛徒弗朗兹·冯·巴本，爬上马尔堡大学马克西蒙大教室的讲台，痛斥“一切假德国革命之名，行营私利己、寡廉鲜耻、弄虚作假、庸俗卑劣和专横跋扈之实”的行为。在大学生们的掌声中，巴本高声发表不同政见，提出警告说：“残暴混淆了活力……任何一国人民都经受不住无休止的自下而上的暴动……用恐怖手段代替法治……德国人的新国家将以基督教立国还是沦为宗派主义或半宗教性质的唯物主义，现在是应该作出抉择的时候了。”

举国一片“赞同的吼声”（巴本语）使当权者们看到，在保守的 99  
资产阶级中，还盘踞着一群没有被一体化的压路机所碾平的反对派。巴本演说引起的反响已经够清楚的了，虽然宣传部立即禁止报纸刊登这篇演说。希特勒起了很大的疑惧：如果冲锋队里的不满分子跟资产阶级中的不满分子勾结起来，这怎么得了？秘密警察暗探已经看到闪现在两个营垒之间刚搭上的线路。

这个牵线人就是实际上插足双方营垒的冲锋队的傲慢的亲王：冲锋队地区总队长、普鲁士亲王奥古斯特·威廉，他是末代霍亨佐伦皇帝的儿子（绰号“奥威”）。在巴本一帮子保皇复辟派的心目中，他是八十六岁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大元帅一旦寿终正寝之后的合适的摄政后选者。奥威暗中对瓦尔纳·冯·阿尔文斯勒本示以风向，而冯·阿尔文斯勒本是个惯于爱管闲事、好出风头的人物，在极端保守派的“保护西方文化联盟”中捞了个干事长的位子。1933年以前，他给施莱彻尔和希特勒牵线搭桥，得到一张希特勒亲笔题辞（“送给我最忠实的朋友”）的照片；1934年6月30日以后，《人民观察家报》报道说，他是“一个为阿道夫·希特勒所强烈唾弃的、在柏林臭名昭著的人物”。

这位阿尔文斯勒本先生告诉每一个人——不管愿不愿意听——，奥威是未来的德国皇帝。5月里有一天，戈林的新闻秘书马丁·佐默尔费尔德正和保守派政客冯·格莱兴-鲁斯武尔姆共进午餐，阿尔文斯勒本出现在餐桌前。格莱兴看到来客神色慌张，显出一副搞阴谋的样子，便语中带刺地说，阿尔文斯勒本大概口袋里已经装有新内阁成员的名单。阿尔文斯勒本点点头，把身子凑到餐桌上低声说：“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副总理：库特·冯·施莱彻尔，国防军：恩斯特·罗姆，摄政：普鲁士亲王奥古斯特·威廉。”等他走了以后，佐默尔费尔德问格莱兴这种闲话真实性如何，格莱兴耸耸肩说：“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阿尔文斯勒本的闲话不会不传到希特勒的耳朵里。他看出，同反对派摊牌至迟不会晚于兴登堡去世的这一天；资产阶级对手们眼睁睁看着这把无依无靠的总统交椅——想让一个霍亨佐伦王室的亲王、一位以国防军为靠山和遏制民族社会主义动力的保皇复辟派代表人物来填补空缺。希特勒必须抢先走在这个人的前面。



他立即启程上大元帅在东普鲁士纽台克的庄园去谒见兴登堡。他要亲眼看看这位老人的健康状况，以便估计一下对他（希特勒）还留有多少活动余地，因为他也有一个寄希望于兴登堡去世的野心计划。希特勒一开始就下定决心，竭力要成为德国的独裁者。只要兴登堡一天不死，他的目的就一天不能达到；不只是大元帅的声望、而且也是誓死效忠于兴登堡的国防军将领们妨碍着他独揽大权。但是只要兴登堡一死，这条道路就畅通无阻了，希特勒就能集总理和总统两个职位于一身，具有烜赫的“领袖兼德国总理”的独裁者新头衔了——不过先决条件即目前关键性的一点是：国防军参加进来一道干。这个头衔必须得到国防军的承认，希特勒的计划成败都和国防军联在一起。

当他1934年6月21日顶着炎炎烈日登上纽台克庄门前台阶的时候，迎面碰到了国防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大将，这仿佛是有必要再一次明确地提醒他注意将军们举足轻重的作用。巴本的演说引起轰动后，兴登堡立即把大将召来，叫他同希特勒好好谈谈。勃洛姆堡说：迫切需要恢复国内和平，新德国不能给予激进的极左派以容身之地。

希特勒领会到这一暗示：要想争取国防军支持他继兴登堡之后当权，就必须牺牲与国防军为敌的罗姆冲锋队。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惠勒-贝纳特爵士认为，阿道夫·希特勒就在1934年6月21日乘机飞回柏林的途中作出决定，进行现代史上讽刺地称之为罗姆暴动的希特勒政权反罗姆暴动。

次日，维克多·卢策在汉诺威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他命令这个罗姆的告密者立即来总理府。卢策记述道：到达总理府后“领袖立即接见我，将我带进他的办公室，握着我的手要我郑重宣誓，在整个事情未解决以前保持缄默”。接着希特勒向这个冲锋队队员介绍了“整个事情”：罗姆必须撤职，因为冲锋队内部

多次举行了领导人会谈，罗姆亲自在场，决定武装冲锋队并命令它向国防军攻击，以便将所谓成了国防军俘虏的他这位领袖从军方手中解救出来。“领袖说，他一开始就知道我没有介入这件事情，”卢策在日记中写道，“叫我从现在起不再执行慕尼黑的命令，只执行他本人的命令。”

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至迟在6月25日也已获悉，希特勒打算使穿灰色制服的军队摆脱褐衫队的梦魇。希特勒告诉他，他准备召集所有冲锋队领导人到罗姆的休养地维西浴场开一次会议，他将在那里亲自逮捕冲锋队领袖，向他们“进行清算”。两天后，领袖警卫旗队长塞普·狄特里希来到国防部，请陆军组织处处长给他为执行一项“领袖委托的秘密的和十分重要的任务”准备武器。这是什么秘密任务，勃洛姆堡在6月25日就知道了。

塞普·狄特里希奉命在所谓罗姆暴动这一天担任主攻任务。他奉命率领警卫旗队的两个连向南巴伐利亚进军，同达豪集中营长官艾克的队伍会合，奔赴罗姆的休养地维西浴场，对参谋长的最重要的部属进行突然袭击。可是警卫旗队缺少交通工具，也几乎没有武器。于是狄特里希同陆军商定，由国防军的一支车队在勒希河畔兰德斯堡附近一个小火车站，将乘火车南下的警卫旗队接运到维西浴场，此外这两个连均由国防军的兵营补充武器。

莱希瑙、海德里希和希姆莱也商讨了围剿的最后细节。国防军和党卫队同意采取共同行动对付罗姆，一切很快部署就绪。6月22日，希姆莱告诉奉命去柏林的党卫队中德大区副总指挥冯·埃贝施泰因男爵：罗姆计划搞政变；叫他同军区司令取得联系，将其党卫队所部作好“悄悄的战斗准备”，听到警报就到营房集中。6月23日，陆军处长弗洛姆上校通知他的军官们：罗姆准备暴动；党卫队站在国防军一边，如果党卫队提出要求，可以发给武器。6月24日，陆军总司令男爵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指示各军区司令，针

对日益逼近的冲锋队暴动采取防范措施和不引人注目地将部队集中起来。6月27日，希姆莱召集各大区保安处领袖给他们分配任务，监视冲锋队领袖，一经发现冲锋队的任何可疑行动，应立即报告保安处领导机关。

可是说来也奇怪，尽管各团和各旗队以临战姿态各就各位，营房里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办公室抽屉里（如国防部）摆着打开保险的手枪——，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军事行动还是显得有些捕风捉影。几乎没有人真正相信冲锋队有暴动计划，特别是国防军军官们对此深为怀疑。

在千载帝国<sup>①</sup>垮台后，对德国的圣巴托罗缪之夜<sup>②</sup>所负责任有必要进行强词夺理的否定时，军人们认为罗姆暴动的危险当然是非常大的。例如，齐格菲·维斯特法尔将军知道“关于罗姆计划暴动的有根有据的消息”多得不计其数，弗雷特-皮科中将根据“亲身经历”有一切“理由今天仍然相信罗姆即将举行暴动”，哈尔德大将甚至还“了解”罗姆“制定了一份冲锋队反国防军的暴动计划”。102

然而在这场所谓的暴动前夕，军人们却是另一种想法。当时陆军处的科长戈特哈德·海因里希上校，在1958年还回忆得起，在罗姆闹剧前两三天，他的同事中谁也不曾担心真会有一场暴动；他本人不曾听到任何有关冲锋队准备进行暴动的报告。“当有人”海因里希记述道，“把一支枪搁在我的办公桌旁，叫我必要时（对付冲锋队暴动分子）用来自卫时，我说：孩子们，你们别这样让人家笑话了。”他也记得他的领导弗洛姆上校当时简单明了地表示的看法：“冲锋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

① 希特勒吹嘘纳粹德国的说法。——译者

② 十六世纪法国新教胡格诺派与天主教派内战期间的大屠杀事件。1572年，当有些天主教派封建主谋求同胡格诺派和解之际，巴黎天主教派突然于圣巴托罗缪节（8月24日）前夜和凌晨大举屠杀胡格诺派，随后蔓延至外省，死者数以千计。——译者

西里西亚军区司令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将军认为所谓的冲锋队暴动计划在难以置信，擅自冒失行事，险些坏了莱希瑙和海德里希的大事。当克莱施特被一连串冲锋队企图暴动的消息弄得晕头转向时，他约见西里西亚冲锋队头子海因斯，开门见山地责问对方为何阴谋反对军队。海因斯向他郑重宣誓，冲锋队做梦也没有想到采取行动反国防军。将军顿起疑窦：“我们国防军和冲锋队被第三者——我是指希姆莱——挑拨离间了。”他上柏林向冯·弗立契将军谈了自己的看法。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叫人把冯·莱希瑙找来；少将神态安详，透过单片眼镜打量着两位先生说：“可能是这么回事，不过现在已为时太晚了。”

这时海德里希对海因里希和冯·克莱施特这些怀疑论者施加巨大的压力，用接二连三的谣言、假情报和伪造文件来消除一切疑虑。必须使每一个国防军军官相信暴动确有其事。塞普·狄特里希给国防部看了一份所谓冲锋队领导制定的处决名单；名单说明，罗姆计划消灭贝克和冯·弗立契将军以下的所有国防军高级军官，而其他党卫队特派员则向各军区和城防司令报送冲锋队拟定的名单，说明已经决定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资格较老的军官。

103 一个自称冲锋队副总指挥的人来找第六军区(明斯特)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上校，提出要接管哈尔德的职务，理由据说是冲锋队领导将接管国防军。哈尔德上校没有答应，并向国防部探问；他感到事有蹊跷，这个冲锋队来访者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说就又很快离去，以后也没有再来。哈尔德估计，这个所谓的副总指挥根本就不是什么冲锋队队员，而是寻衅集团派来探听风声的人。

海德里希耍的另一花招，是四处散发所谓罗姆的命令，国防军大半对此置信不疑。但当某个冲锋队领袖查出假消息的来源时，党卫队也会反咬一口，说冲锋队的辟谣是欲盖弥彰。

柏林勃兰登堡冲锋队领袖卡尔·恩斯特有一天私下告诉原是

冲锋队的党卫队地区总长达吕格：首都到处流传着毫无根据的冲锋队即将暴动的谣言；他请达吕格同志设法安排他和内政部长弗立克谈一次话，好让他驳斥对冲锋队的诬蔑。当时任内政部部务主任的达吕格紧紧把住弗立克的房门，怎么也不肯让恩斯特进去，相反他跑到国防部去报告谍报局副局长：刚刚有个冲锋队领袖向他透露参加了一次冲锋队讨论准备暴动的秘密会议，但自己有顾虑，因此想提醒国防军注意即将到来的危险。

冯·莱希瑙将军诚心诚意支持海德里希玩弄的文件花招。谍报局长帕齐希突然发现，自己办公桌上仿佛变戏法似地出现了一份所谓的罗姆武装冲锋队的命令，据此他不得不得出冲锋队策划袭击国防军的结论，并把这份文件呈送冯·莱希瑙，将军读后顿时怒形于色，并说：“现在可是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海德里希的假情报难道只是造给国防军看的吗？有些人认为，这些伪造的文件也是用来欺骗希特勒的；一定要让希特勒看到这些文件，因为冯·勃洛姆堡从来不放任何机会在总理面前抱怨冲锋队搞武装暴乱。对于罗姆的对手来说，希特勒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罗姆的阿基里斯之踵<sup>①</sup>。诚然，纳粹领袖同意对罗姆采取行动的计划，但他又一再表现犹豫不决。不论是出于对最老战友的最后一点人情信义，还是感到不忍抛弃一支用以对付国防军的平衡力量和一个在争权夺利中平衡各派势力的重要伙伴，反正阿道夫·希特勒有时陷于不可捉摸的优柔寡断之中。

直到6月28日，第七军区（巴伐利亚）的军官们还未就希特勒究竟是支持国防军抑或支持冲锋队取得一致看法。要是他们知道

---

<sup>①</sup>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基里斯（一译阿喀琉斯）出生后，被其母捏着脚跟，倒浸在斯提克斯冥河的水里，从此他的周身就能刀箭不入，但他母亲用手指捏住的脚跟没有沾到冥河的水，这就成为他的致命的弱点。这里借喻反罗姆派认为，只有假希特勒之手才能最终干掉罗姆。——译者

104 希特勒同冲锋队副总司令兼罗姆的副手里特·冯·克劳塞尔的谈话，他们还会更加把握不定。克劳塞尔在被处决前几小时，将自己在6月29日同希特勒进行的一次谈话，告诉了和他一起被捕的冲锋队地区总队长卡尔·施赖尔。施赖尔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向他〔克劳塞尔〕保证，准备借冲锋队领袖在维西浴场开会的机会，向各地区总队长详细阐明自己的意见，消除一切分歧和误会。他承认并表示自己对冲锋队老队员关心太少，过意不去。希特勒对还在职的忠实战友恩斯特·罗姆也抱有很大希望和解的心情。”

这就是说，在罗姆闹剧前的关键性几天里，希特勒对冲锋队头子面临的命运散布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他告诉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要逮捕罗姆，同罗姆“进行清算”；他向罗姆的对手卢策说要将罗姆撤职；而对里特·冯·克劳塞尔则声称将同这位朋友和解。一个如此动摇不定的领袖，对于希姆莱—戈林—海德里希三重奏的计划是不协调的。所以在最后一场演出以前，一定得使希特勒远远离开操纵杆。

一桩偶然事件帮了密谋分子的忙：6月28日清晨，希特勒在戈林陪同下，乘飞机去威斯特伐利亚，参加纳粹党区领袖约瑟夫·特波文的婚礼。《民族社会主义通讯》后来写道，希特勒的西部德国之行“旨在对外给人以风平浪静的印象和不使叛变者们有所警觉”。历史学家们实际上接受了这种看法，他们认定：希特勒外出旅行，是为了让罗姆的对手们可以更好地悄悄动手。

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注意到，希特勒的这种所谓掩饰战术，是同反罗姆的围剿策略完全矛盾的。他无意掩盖同罗姆的决裂。恰恰相反，他有意搞一场大张旗鼓的运动，以便公开向罗姆挑战，使人民对一次大规模屠杀不致感到突然。6月25日，鲁道夫·赫斯通过德国所有电台气势汹汹发表广播讲话：“背信弃义、以为通过一次暴动有利于革命的人有罪！阿道夫·希特勒是伟大

的革命战略家。对他那考虑周到的战略计划横加践踏、妄想以此加速革命的人有罪，这种人是革命的敌人。”6月25日，莱希瑙以条件不合为理由，将恩斯特·罗姆上尉开除出“德国军官全国联合会”。这是“一种假世俗机构之手，行使本身具有几分宗教法庭裁判性质的、处置受害者的措施”（惠勒-贝纳特语）。同一天，戈林在一次演说中大肆叫嚣：“谁损害这种〔对希特勒的〕信任，就是叛国。谁想毁灭这种信任，就是毁灭德国。谁是这种信任的罪人，就要他脑袋搬家。”

向罗姆挑战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何尝是什么希特勒用西部105德国之行搞掩饰战术呢？实际上，罗姆这出戏的导演们依靠他们的情报、盘算和小道消息，知道举棋不定的总理远离柏林，个个感到高兴。罗姆的对手卢策突然听觉变得敏锐起来，他应召前往参加特波文的婚礼。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感觉，正是眼下领袖不在柏林，不能亲自看到全部书面材料而只能看电话记录或听电话的时候，某些方面的人士对促使‘事情’尖锐化和推向前进感到兴趣。”

希特勒刚于6月28日午后不久到达埃森，出现在特波文的婚礼盛会上，就被叫去听紧急电话；电话是希姆莱从柏林打给他的。这些角色安排得真不错：留在柏林的希姆莱将愈来愈令人忧虑的冲锋队阴谋活动的报告读给希特勒听，而站在希特勒身边的、忠实的戈林随时准备就希姆莱的报告加以解释和发挥。

希特勒六神无主，坐立不安，他指示暂停举行婚礼盛宴，在随从的簇拥下回到埃森的“凯撒霍夫”饭店，随即把身边的亲信包括戈林和卢策找来。“在埃森‘凯撒霍夫’饭店他的房间里长途电话也几乎没有闲过，”卢策写道。“领袖反复考虑，不过已经看得很清楚，他要动手了。”密谋者的另一心腹、戈林的大管家普鲁士总理府政务秘书保罗（“皮利”）·克尔纳出人意外地出现在领袖会议上。

他刚从柏林乘飞机赶来，带来了希姆莱获悉的进一步的消息。看来全国冲锋队都在进行武装，准备举事了。

这时，希特勒从坐椅上站了起来，大声说：“我受够了。我要惩一儆百。”作出了最后的、果断的决定。希特勒命令戈林和克尔纳回柏林，在柏林等接到希特勒的暗号后就开始出击，对象既包括冲锋队，也包括资产阶级政敌。戈林分秒必争，于6月29日晨赶回柏林，命令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和“戈林将军”邦警察部队作好准备。

戈林执笔写了一封信，密封送给海德里希。海德里希将其转给保安处领导机关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恩斯特·米勒，指示他将信件呈交东南大区党卫队副总指挥。戈林的这封密信内容是：德国总理已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委托普鲁士总理戈林全权负责普鲁士地区；因此他（戈林）将西里西亚省的执行全权授予党  
106 卫队东南大区领袖、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乌多·冯·沃伊尔施。随后戈林命令冯·沃伊尔施逮捕列入名单的冲锋队领袖和解除所有冲锋队本部警卫的武装，占领布雷斯劳警察局并跟邦警察司令取得联系。

在此期间，希特勒在埃森“凯撒霍夫”饭店考虑怎样悄悄地突然袭击冲锋队领导集团。他决定还是采用已向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讲过的原有计划：将冲锋队领袖们引到维西浴场，就地加以逮捕。6月28日晚，希特勒在维西浴场打电话通知罗姆说，莱茵区的冲锋队队员们侮辱了一名外国外交人员，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意见应该提出来。接着下达他的指示：定于1934年6月30日（星期六）上午11时，所有冲锋队副总指挥、地区总队长和督察员到罗姆休假住地同领袖会晤。

随后希特勒等着观察对手们的反应。可是罗姆在6月29日无忧无虑地带上副官贝格曼在维西浴场四处散步，高兴地等待同希



特勒讨论问题，并看望第一批下榻汉斯尔包尔旅馆休假的同志们。仅仅有另外一方下定决心采取行动。陆军总司令向部队发出全体戒备的警报。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将所部队伍拉进营房，并在那里配备武器。正在视察志愿劳动服役营的希特勒中途停顿下来，在午后3时发电报给国防部，召塞普·狄特里希前来巴特戈德斯堡希特勒的新住处“德莱森”饭店。

领袖警卫旗队长下午8时到达饭店，这时希特勒正在和十五名纳粹党干部开会，其中有卢策、戈培尔及希特勒的三名副官勃鲁克纳、夏勃和施雷克。过了一会儿，狄特里希搁下在饭店前厅里要的一杯啤酒，被召去见领袖。希特勒的命令很简短：“您乘飞机去慕尼黑。到了慕尼黑后再给我打电话来！”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狄特里希带上几个刑事警官上了飞机，赶往目的地慕尼黑褐色大厦。半夜时分，他打电话找希特勒，希特勒给他下了一道新的命令：立即乘车去勒希河畔兰德斯堡附近的考费林小火车站接两连领袖警卫旗队，把他们带往维西浴场。

同一时刻，柏林利希特菲尔德前士官总校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在夜12点到1点之间，接到国防部紧急电话。值班队长把二百二十名队员赶下木床，随后两连人乘上汽车出发赶火车去考费林。狄特里希业已驱车向考费林进发，领袖警卫旗队派出的队伍也已经集合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希特勒接到两个报告，使他跳了起来，并改变了计划。

一个报告来自柏林：希姆莱报告，柏林冲锋队暴动已准备就绪，定于明天即6月30日动手——冲锋队已下令午后4点紧急集合（希特勒后来在国会中是这样说的），“5点钟”计划“采取行动，先是进行突击，占领政府各部”。希特勒在巴特戈德斯堡并不知道，柏林的广大冲锋队队员这时早已休假了。他竟然直到7月13日还认为，柏林冲锋队头子卡尔·恩斯特拒命前往维西浴场，“留

在柏林亲自指挥行动”——实际上恩斯特于6月29日就离开了柏林，去不来梅携同妻子乘船赴特纳里夫岛旅行。

另一个报告也并不符合事实，这个报告是希特勒在巴特戈德斯堡听纳粹党巴伐利亚区领袖兼内政部长阿道夫·瓦格纳本人说的：慕尼黑的冲锋队已经上了街，大叫大嚷反对领袖和国防军。

6月29日天色漆黑以后，慕尼黑冲锋队的突击队的确在伊萨尔施塔特的大街上游行，呼喊“国防军反对我们”的口号。他们是听信不知名的作者手写的纸条诱出冲锋队通常聚会的酒馆的，而且他们也不致于还不知道国防军已有戒备措施。上巴伐利亚冲锋队领袖副总指挥奥古斯特·施奈德休勃和慕尼黑冲锋队领袖地区总队长威廉·施密特听说自己的部队上了街，立即插手干预，命令他们回去。施密特查获了两张匿名的行动命令，他只知道，这无论怎样也不是他本人和施奈德休勃写的或指使别人写的。

慕尼黑军区参谋长库希勒上校也听说有一支冲锋队往上维森费尔德机场方向运动。他把自己的运输队军官汉斯·德尔少校找来，派他穿便服去了解这件事情。6月30日凌晨1点，德尔少校乘车出发，不久就碰到一支为数三百人的冲锋队。而在上维森费尔德机场，他连冲锋队队员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但在柯尼希广场发现有另一支冲锋队，正在整队集合，只听见带队的说：“大家现在安心回家去，听候领袖处理决定。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阿道夫·希特勒叫大家休假也好，让不让穿制服也好，我们都毫无保留地支持他。”

掌握情报不灵的希特勒，被半夜来自柏林和慕尼黑的这两个报告吓得胆战心惊。现在他已深信不疑：叛乱分子已经撕下了假面具，罗姆已原形毕露。现在他要将“叛徒崽子们”斩尽杀绝。在这种丧失理智的思想支配下，希特勒作出了一个使他的随从人员吃惊的决定：立即去慕尼黑，立即去维西浴场。

午夜两点，他腰酸背痛、过度劳累和全身紧张得发抖，拖着沉重 103 的脚步来到波恩汉格拉机场，和随从人员爬进一架三引擎的 Ju52 型飞机。他蜷缩在大机舱最前面的座位上，一言不发地凝视着雾霭蒙蒙的夜空。夜雾徐徐消散，泛出了鱼肚色的晨曦。新的一天开始了，这是德国战前史上最残酷的一天。德国沉浸在残暴和野蛮的腥风血雨里。卢策想着罗姆，情不自禁地哼道：

晨曦啊，晨曦，  
照着我们提前去奔丧。  
昨天还威风凛凛，  
今日却饮弹身亡。

飞机在慕尼黑上维森费尔德机场刚刚停稳，希特勒就钻出机舱，神志不清似地匆忙从列队等候的党和冲锋队头面人物跟前走过。他一直走到他事先打电报指定的两名国防军军官身边才停住脚步。希特勒开口就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天。但我要去维西浴场进行严厉审判。你们将这一点关照亚当将军。”言毕即跨进汽车，前往巴伐利亚邦内政部。4点钟刚过，电话铃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冲锋队地区总队长施密特。内政部命令：希特勒等着地区总队长前去汇报。

“临走之前，”施密特的遗孀玛蒂娜记述道，“他在卧室里绝望地寻找两张白纸条，嘴里说‘有了纸条就能证明，我同整个事情毫无关系。’可是纸条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施密特地区总队长根本没有时间对希特勒作什么解释，总理一眼看到他，就扑了过来，扯掉他的肩章，骂他是叛徒，叫嚷：“您被捕了，要枪毙！”施密特被带走了，和几分钟以前被拉出去的副总指挥施奈德休勃走了同一条路：慕尼黑施塔德尔海姆预审监狱。

纳粹党区领袖瓦格纳指使党卫队和巴伐利亚政治警察 (Bay-

PoPo) 突击队分头去逮捕列入名单的冲锋队领袖和纳粹的重要对手，而希特勒则由两辆随行汽车陪同开足马力奔向维西浴场。

这时已是6点30分左右。汉斯尔包尔旅馆的冲锋队领袖们还在睡梦中。旅馆老板娘看到贵客临门，有些受宠若惊，急忙上前迎接，可是希特勒的陪同人员根本没有答理。他们只顾冲进去各就各位，打开手枪的保险，堵住一间间旅客的房门。卢策走慢一步，在后面翻阅旅客登记簿，查明受捕者所住的房间。不过他还没来得及亲眼目睹罗姆被捕的经过。

109 卢策后来记述道，他遇见希特勒“站在罗姆的房门口。一名刑警敲了敲门，说是有急事请开门。一会儿里面刚把门拉动，就被猛地一脚踢开。领袖握着手枪跨进房间，他骂罗姆是叛徒，罗姆矢口否认；随即命令罗姆穿好衣服，宣布逮捕令。刑警们留了下来。”

希特勒赶忙去找下一个。他用力敲对面一间的房门。一会儿工夫，房门打开了，露出副总指挥埃德蒙·海因斯的面孔和一个跟他睡在一起的男宠。宣传家戈培尔后来谈到纳粹的同性恋爱行为时，顿时满腔怒火地提起当时这一场面说：“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不堪入目，差点儿令人作呕”。希特勒赶紧去敲另一间房门，卢策则冲进海因斯的房间，到柜橱里搜查武器。海因斯叫道：“卢策，我可跟任何事都无关，您得救救我。”可是这个希特勒的亲信神情尴尬，支支吾吾地说：“我不好讲什么，我也无能为力。”

一会儿工夫，整个“阴谋分子的巢穴”就被扫除干净了。被捕的冲锋队队员一个个走进旅馆的地下室，他们被关在那里，由几名刑警看守着，稍后也被押往施塔德尔海姆。可是希特勒正要动身离开旅馆以前，有一辆大卡车急速驶来，车上跳下一群从慕尼黑召来的罗姆本部警卫队员，配备着武器。局面很尴尬：本部警卫的头子旗队长尤利乌斯·乌尔这时已身陷旅馆地下室，他的部下一个

个怒目而视。

希特勒向前跨出一步，清了清嗓门，用强硬的命令口吻，鼓起其一向具有成效的如簧之舌，对这些来意不善的客人讲了一通。冲锋队队员们驯服地，听从领袖的命令返回慕尼黑。他们坐上卡车向北驶去。不过来到离开维西浴场不远的地方，他们就不肯走了，大卡车停了下来，罗姆的本部警卫——据希特勒副官勃鲁克纳的说法——采取了“观望态度”。这一态度显示了情况的险恶，以致希特勒离开维西浴场时选择了往南行驶的公路，朝罗塔赫-埃格森和特格恩西湖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回到慕尼黑。

与此同时，政府行政官员兼施塔德尔海姆预审监狱监狱长罗伯特·科赫博士，在古老的监狱大门入口处来回踱步。他看到了自己办公桌上有一张通知：7时起将陆续押送冲锋队高级领袖来监狱。党卫队员已团团围住火车总站，巴伐利亚政治警察派出的警官站立守候，拦住每一个冲锋队领袖；他们将冲锋队队员撵走或逮捕起来。冲锋队队员一再被他们抓走。

110  
一列柏林开来的夜间快车刚刚进站，冲锋队旅队长马克斯·于特纳打算去接自己的上级里特·冯·克劳塞尔。这时，他发现里特身后跟着两名便衣，他们显然是警官。克劳塞尔告诉于特纳，他是刚刚被捕的。克劳塞尔的司机福尔默尔企图解救自己的主子，也被捕了。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被送往施塔德尔海姆的路上，其中有曼弗雷德·冯·基林格、汉斯·彼得·冯·海德布雷克、汉斯·海因、格奥尔格·冯·德滕、汉斯·约阿希姆·冯·法尔肯豪森，冲锋队知名人物几乎无一幸免。

谁要是没有落进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密探之手，并且服从命令坐车去维西浴场，那么半路上就会遇到有人站在公路中间，粗暴地打着手势把他拦住。阿道夫·希特勒告诉每一个冲锋队领袖说，他有了一个新的头目：维克多·卢策。希特勒大声说：“我刚刚从

维西回来，并下令逮捕了参谋长罗姆。这个人勾结施莱彻尔，阴谋策划暴动反对我和国家领导。所有参加进去的冲锋队领袖都得枪毙。”他命令大家跟着他的汽车去褐色大厦准备开会。

10点钟，希特勒来到这时已由国防军士兵封锁的布里恩纳街纳粹党总部，给戈培尔使了一个眼色。宣传部长立即抓起电话话筒，给戈林说了一声约定的暗号“蜂鸟”。海德里希和希姆莱听到这个暗号后，才能向党卫队发出大规模行动的命令。恐怖开始席卷整个德国。各大区保安处头子打开密封的封套，取出密令，催促手下的暗杀队出发。

在巴伐利亚，残暴的密探们也在搜捕他们的第一批受害者。党卫队带走了1923年曾经挫败希特勒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暴动的里特·冯·卡尔，后来在达豪的沼泽中发现了他被鹤嘴锄砸得稀烂的尸体。希特勒隐私的知情人帕得·伯恩哈德·施丹佛尔的心脏被连中三枪，脊椎骨被打断，死于非命。

党卫队搜捕慕尼黑医生路德维希·施密特，因为他曾经跟希特勒的死敌之一奥托·施特拉塞有过合作。他们找不到他，因为他们不知道施塔德尔海姆监狱一个看守已将施密特博士藏在一只木橱里了。密探们找不到他本人，找了个替身，把一个名为威廉·爱德华·施密特博士的音乐评论家抓走。尽管他住在另外一条街上，尽管他的姓最后一个字母是“d”<sup>①</sup>，尽管他的学位是哲学博士而不是医学博士——党卫队还是照样把他抓走了。等到家属再次看到自己的赡养人时，他已经躺在从达豪集中营抬回来的棺材里，连棺材盖也不许打开。

此时此刻，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比阿道夫·希特勒更狂热地鼓吹政治恐怖了。邦长里特·冯·埃普要求组织军事法庭审讯自

---

① 指姓 Schmid，与前一姓 Schmitt 词尾发音相同，译名同作施密特。——译者

已过去的部属罗姆，希特勒冲着冯·埃普大声吼叫说，冲锋队参谋长活到头了，罗姆背叛证据确凿。里特·冯·埃普被希特勒没头没脑的发作弄得目瞪口呆，等希特勒走了以后，他望着副官楚·伊森堡亲王发愣，嘟囔道：“疯子。”那些没有被捕的冲锋队领袖也同样惊恐失色，他们正聚集在褐色大厦的会议室里，11点30分左右，希特勒开门走到冲锋队员中来了。

他讲话了，嘴一张——地区总队长施赖尔记述亲眼见到的情况说——就“口沫四溅，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有谁象他这副样子。接着他激动得好几次说话的声音都沙哑了。他讲了事变经过：罗姆及其身边的人犯下了整个世界史上最大的背信弃义的罪行。他同罗姆出生入死，患难与共，对罗姆一直忠诚相待，可是罗姆却阴谋叛国反对他，想要逮捕杀害他，好把德国拱手交给他的敌人。〔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赛是那一边的主要活动人物，给了一直感到缺钱的罗姆一千二百万马克，收买了他。”然后断然宣布：“罗姆及其同谋将受到惩办，以儆效尤，他命令将他们通通枪毙。包括罗姆、施奈德休勃、施密特、海因斯、海因、海德布雷克、施普雷蒂伯爵在内的第一批人将于今晚处决。他已经下了命令。”

作出这一宣布当然只是把话说在前面而已。罗姆并非“今晚”枪毙，对其他死囚希特勒也还未下处决令。直到这个时候，希特勒还没有看见塞普·狄特里希上这儿来，他是负责处决施塔德尔海姆在押冲锋队领袖的人。一直到12点半刚过，这个领袖警卫旗队指挥官才出现在领袖面前，伸出手臂敬礼。

希特勒怏怏不乐，责问他这么长时间上什么地方去了。狄特里希辩解道：到维西浴场的道路上积水，他手下的旗队队员所乘的国防军大卡车的轮胎坏了，此外还得在兰德斯堡炮兵部队营房给汽车加油。因此他在特尔茨浴场和维西浴场之间的途中才接到领袖下达的到慕尼黑来的命令。希特勒问部队现在在什么

地方。狄特里希说在慕尼黑卡罗林广场。随后希特勒吩咐他将两连警卫旗队带到工兵部队营房去，安置好了，再立即回来向他报到。

下午2点半，狄特里希又回来了。他在褐色大厦的副官室里无聊地等了三个钟头，在此期间，他从会议厅的两扇门缝里听到乱嘈嘈的声音，声音很响，但听不清楚。希特勒和他的一些亲信正在讨论被捕冲锋队领袖的命运。这对党内法官布赫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因为他显然可以弥补自己在1932年没有做到的事情：处死罗姆这一帮人。鲁道夫·赫斯和纳粹出版社经理马克斯·阿曼争着要杀人取乐。赫斯叫道：“我的领袖，枪毙罗姆是我的任务。”

新任冲锋队参谋长卢策不知所措地坐在一旁，听着别人议论凶杀。他没有想到竟会这样来清洗冲锋队。当希特勒问他谁该枪毙时，卢策避开正面回答，表示他不知道谁是主犯和从犯，无法提名。说完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会场。下午5时许门开了，布赫的女婿马丁·鲍曼走了出来，他领狄特里希去见希特勒。希特勒说：“您到营房里去要六名军士和一名军官，把犯有叛国罪和叛逆罪的冲锋队领袖执行枪决。”

鲍曼随即交给地区总队长狄特里希一份犯人名单，这份名单是监狱长科赫午前送到褐色大厦来的，包括施塔德尔海姆在押的冲锋队领袖姓名。希特勒用绿铅笔在六个名字上划了勾：冲锋队副总指挥兼慕尼黑警察局长奥古斯特·施奈德休勃（504号牢房）、慕尼黑冲锋队地区总队长威廉·施密特（497号牢房）、斯德丁冲锋队地区总队长汉斯·彼得·冯·海德布雷克（502号牢房）、德累斯顿冲锋队地区总队长汉斯·海因（503号牢房）、慕尼黑冲锋队旗队长汉斯·约阿希姆·冯·施普雷蒂-魏尔巴赫伯爵（501号牢房）和冲锋队副总指挥兼布雷斯劳警察局长埃德蒙·海



因斯(483号牢房)。

恩斯特·罗姆的名字上没有划勾。接着，希特勒和埃普一道坐车去上维森费尔德机场，准备返回柏林，途中楚·伊森堡亲王听这位党的首脑说：“我考虑到罗姆的功劳，和克劳塞尔得过勋章，免他们一死。”难道希特勒对杀害朋友还手下留情吗？

塞普·狄特里希对此并不在意。他接过处死犯人名单，请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瓦尔台克·翁德·皮尔蒙特亲王先去施塔德尔海姆找一个合适的刑场；接着，如他后来所说，在他的士兵中挑了“六个枪法好的，以免发生不干净利落的事”。下午5点钟，他找到监狱长科赫，向他提取处死的犯人。但是这位谨慎小心的监狱长科赫怕出差错。党卫队亲王的来访引起了他的戒心，他向巴伐利亚司法部求援。由于司法部长汉斯·弗朗克博士已在前来监狱途中，科赫想方设法拖延时间。

他和头脑简单的狄特里希讨论这张名单，坚持认为名单未经签署，致使这个党卫队员只好回到褐色大厦去再次请示。在高级领导人中，他只找到了内政部长瓦格纳，后者在狄特里希的名单上批道：

奉领袖之命着即将本名单所列犯人交给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狄特里希。

内政部长 阿道夫·瓦格纳

这时，纳粹律师弗朗克来到施塔德尔海姆，提心吊胆地试图阻挠杀害。他打电话找到了鲁道夫·赫斯，赫斯指示任何人不得插手干预，要求执行领袖的命令。弗朗克想至少形式上要按规定办事，他向犯人施奈德休勃宣布判处死刑；这个冲锋队长一听就跳了起来，大喊大叫，致使弗朗克没法再说下去。现在狄特里希可以执行自己的使命了。

科赫博士布置将六名冲锋队领袖——每名由两个邦警察监护——押到监狱的院子里。当这几个冲锋队队员看到狄特里希过来时，施奈德休勃叫道：“塞普同志，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罪。”狄特里希这个满脸横肉的乡巴佬面无表情。这个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两腿一并碰响鞋后跟宣布：“领袖判处你们死刑。希特勒万岁！”冲锋队领袖一个接着一个被拉进行刑的院子。迎面站着一个党卫队领袖，他对罪犯们说了一句“领袖兼总理判处你们死刑，立即执行”。随后院子里一阵密集的砰砰枪声，轰得院墙嗡嗡作响。

连狄特里希的神经也受不住这种杀人场面。不等六个人枪毙完，他就离开了现场。狄特里希说：“轮到施奈德休勃时，我已经离开。我受不住了。”他一直等到次日中午，把他的党卫队队员送上开往柏林的火车，然后自己也乘飞机回施普雷河畔的大都会——柏林，从6月30日上午10时起，这里已经历了戈林和希姆莱策划的德国的圣巴托罗缪之夜。

自从戈培尔在电话里说出“蜂鸟”两字后，戈林管辖的地区也开动了恐怖的机器。副总理弗朗兹·冯·巴本是在戈林副官包登夏茨少校请他来莱比锡广场普鲁士总理府时获悉这件事情的。“我看见戈林，”巴本回忆说，“在他的办公室里跟希姆莱待在一起。他向我宣布，希特勒委托他戈林全权镇压柏林的〔罗姆〕暴动。”冯·巴本先生感到自己身为副总理而未能与闻其事，提出抗议。就在他和戈林磨嘴皮的时候，党卫队头子走进巴本的随从弗里茨·京特·冯·奇尔希基正在那里等候的休息室，打了一个电话；奇尔希基听到希姆莱说：“现在可以出动了。”一场对政敌的大搜捕开始了。

邦警察的汽车和载着党卫队员的卡车在全市街头奔驰。冲锋队高级要员们居住的动物园区已被包围封锁。正在值班的冲锋队领袖没有反抗，一一被捕。党卫队和警察同时查封了副总理办公

室，开枪打死了巴本的新闻秘书冯·包斯，并逮捕了副总理的其他同事，因为“反动的”国家政敌也属一并清洗之列。

这时，在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集中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 114 旗队已经发出了大规模行动的警报。领袖警卫旗队营长、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瓦格纳奉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的命令准备了行动队。他指定一贯忠实执行命令的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库特·吉尔狄施负责最重要的一个队。吉尔狄施集合起本连的十八个人，带领他们出发，向秘密警察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报到。海德里希的秘书室里已经有八个人在等候，有的是便衣，有的身穿党卫队制服。

一会儿，海德里希从办公室出来，简单明了地说了他在这一天不知重复多少遍的话：罗姆暴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领袖命令、立即行动。说完他又钻进了办公室，把等在外面的一个人一个地叫进去。这些便衣和秘密警察人员每人领到一张消灭对象名单。一名秘密警察奉命同吉尔狄施的队伍一起逮捕所谓的国家政敌。吉尔狄施还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海德里希说：“您负责克劳斯纳，由您亲手枪毙。现在您马上到中央交通部去！”他只是顺便问了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是否认识克劳斯纳。吉尔狄施回答说不认识。海德里希将右臂一伸，说了一声“希特勒万岁！”就打发吉尔狄施走了。

在去威廉街中央交通部的路上，吉尔狄施绞尽脑汁考虑怎样枪杀他的对象。他的武装带上佩着一支口径为九毫米的“半自动化”值勤手枪，但右边裤兜里还藏有一支打开了保险的毛瑟手枪，口径为七点六五毫米，外人是看不出来的。这位党卫队队员决定用这件暗藏的武器实现他的突然袭击计划。这是库特·吉尔狄施考虑的全部问题吗？是的，这就是他所考虑的全部问题。他丝毫不去考虑，究竟中央交通部部务主任、天主教行动组织主席和前普鲁士内政部警察司长埃里希·克劳斯纳博士犯了什么罪，不去

考虑未经法庭作出判决和不给任何辩护机会就将他枪毙。

这时是下午1点钟，部务主任刚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上盥洗室去，迎面碰上一个头戴钢盔的党卫队队员。他急忙又回办公室，请吉尔狄施进来，吉尔狄施向克劳斯纳出示逮捕令。克劳斯纳转过身去，到一个衣橱跟前打算拿件上衣，这时吉尔狄施拔出那支私人手枪向克劳斯纳的头部射击。克劳斯纳立即倒地身亡。吉尔狄施抓起写字桌上的电话，拨了海德里希的号码，他听到了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的那个矫揉造作的高嗓门，命令他布置成自杀假象。凶手把自己的手枪放在克劳斯纳瘫在地上的右手旁边，在房门口留下两个人看守。对于第三帝国来说，克劳斯纳事件就此了结。

115 吉尔狄施直到下午1点一刻到海德里希那里时，他才知道死在自己枪口下的是什么人：一个“危险的天主教领袖”。不过秘密警察头子又有了新任务，吉尔狄施奉命乘飞机去不来梅逮捕柏林冲锋队头子卡尔·恩斯特，将其押到士官学校的刑场上。继恩斯特之后，还有一些人成了干练的吉尔狄施手下的牺牲品，其中之一是军医旗队长埃尔温·菲莱因博士。

象库特·吉尔狄施及其手下的十八个密探一样，党卫队凶杀队员于1934年6月30日这一天，在戈林管辖的普鲁士到处搜捕所谓的国家政敌。他们毫不思考，而是一味唯命是从。他们不动脑子，只管行动。他们默不作声地完成派给他们的差事。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机器人根本不问一声为什么，只要知道了自己凶杀的对象姓什么叫什么，他们就举起长短枪支一扣扳机开火完事。

只有准备孤注一掷的人，倒能死里逃生。退職在家的中央部长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听到希姆莱的使者在外面的拉门铃，他上身只穿一件网球衫，翻过花园围墙，逃往国外去了。1923年曾经不愿充当希特勒伙伴的埃尔哈特舰长，带上两杆猎枪躲进了森林，待秘密警察人员再次搜查过他的住宅后，在朋友掩护下潜逃到

奥地利。

莱希瑙所在的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前任主任费迪南德·冯·布雷多少将，被纳粹怀疑为在巴黎流亡人士中出版的《一位国防军将军的日记》一书的作者。某外国大使馆武官建议他到使馆中躲一夜，被布雷多谢绝。几个钟头后，一辆秘密警察汽车将他送到利希特菲尔德——头部中弹身亡。黑衫队的凶杀愈来愈厉害。它已超出官方宣布的消灭暴动分子和国家政敌的目标，变成了大肆公报私仇的行动。党卫队副总指挥埃里希·冯·巴赫-齐列夫斯基指使两名党卫队跟踪他的对头党卫队骑兵队长安东·冯·霍贝格·翁德·布赫瓦尔德男爵，从背后开枪把这个地主打死在自己的书房里。当死者十七岁的儿子跑进来时，其中一个凶手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声：“我们刚才枪毙了你父亲，”然后扬长而去。

在西里西亚，党卫队的公报私仇尤其无法无天。当地党卫队副总指挥乌多·冯·沃伊尔施已无法控制自己的部属。布雷斯劳警察局副局长、冲锋队突击大队长恩格斯被党卫队队员撵进树林，用猎枪击毙。前西里西亚党卫队本部领袖森巴赫，被沃伊尔施手下的挤奶员扔进布里克<sup>①</sup>附近的一个水库淹死，随后凶手又为他人所杀。复仇，复仇，复仇：党卫队队员杀害了希尔斯贝格<sup>②</sup>的律师弗尔斯特博士，因为他参加过控告纳粹分子的诉讼案。而瓦尔登堡<sup>③</sup>市政建设参议坎普豪森也未能幸免，原因是有一次他不同意发给凶手建筑工程执照。

116

私怨也支配着戈林和希姆莱的许多行动。他们派人追捕一个对象：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因为他比任何其他纳粹领袖都熟知希特勒这两个亲信的底细。在1932年因策略分歧同希特勒分手以

---

① 现为波兰的布热克。——译者

② 现为波兰的耶那尼亚-古腊。——译者

③ 现为波兰的瓦夫布日赫。——译者

前，施特拉塞是第二号重要的党阀。他曾警告党的首脑希特勒说，对领袖和运动最大的危险之一是“希姆莱这伙人和追随他们的人”；关于戈林他则想到了一句话：“戈林是个残忍的利己主义者，只要一切跟着他转，他就决不会关心德国的一丝一毫。”

对希姆莱和戈林来说，他们无法排除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有朝一日同希特勒重归于好的可能性，那这样一个人是再危险不过的了。他们知道，希特勒曾考虑过有一天要任命施特拉塞当中央内政部长。他们已获悉，希特勒同施特拉塞进行过一次重新修好的会谈，6月23日希特勒授予老对手第九号纳粹党金质勋章。如果要使1934年6月30日成为对戈林和希姆莱意义重大的一天，那么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就非死不可。中午过后不久，秘密警察官员将施特拉塞带来了，几小时后一个党卫队员在秘密警察监狱第16号牢房里开枪打死了他。他仰面倒在地上。按照官方的习惯说法，他是“自杀”身亡。

所谓可怕的冲锋队暴动在什么地方呢？希特勒在褐色大厦向冲锋队幸存者声称的“整个世界史上最大的背信弃义罪行”的幕后指挥者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幕后指挥者在享受阳光灿烂的周末，他们待在自己家里准备度假。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在新巴贝尔斯贝格的格里布尼茨街的寓所里，坐在书桌旁。这时，女厨师玛丽·京特尔领着两个人走进施莱彻尔的书房，其中一个问坐在书桌旁的是不是施莱彻尔将军。“听到有人问他，”女厨师后来的口述说，“他〔冯·施莱彻尔〕微微侧过脸看了看问话的先生，说了一声是。话音刚落就响起了枪声。”坐在工作室收音机旁的将军夫人闻声赶来，也被击毙。

但是，在被害者的文件中，秘密警察没有找到任何说明冯·施莱彻尔同罗姆或施特拉塞或弗朗索瓦-庞赛合作的材料。冯·施莱彻尔最近一次跟罗姆接触还是在1933年6月；而据法国大使弗

朗索瓦-庞赛后来写道，前总理对他“也根本没有说过可以使我猜测出他……参与了一场密谋活动的话。每次提到罗姆的名字时，他都显出鄙夷和厌恶的神色”。施莱彻尔-罗姆暴动的传说太难以令人置信了，连宣传部的人也不愿去听它。当天下午宣传部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一个记者问冯·施莱彻尔将军之死是否同反罗姆冲锋队的行动有关，宣传部发言人回答：“并无此事。”<sup>117</sup>

戈林和希姆莱惶惶不可终日。现在，国防军政治上形象最为突出的将军就这么被党卫队凶手杀害掉了，国防军会大打出手吗？决不会这样做的。冯·莱希瑙将军可不是那种为了一个讨厌的死鬼而放弃整个计划的人。就在当天下午，他口授了一份公报：“几周查明，前国防部长、退役将军冯·施莱彻尔同敌视国家的冲锋队领导人物和危害国家的外国势力相互勾结，从而证明他在言论上和行动上从事反对这个国家及其领导的活动。根据这一事实，有必要在此次总清洗行动中将他逮捕。在刑警逮捕时，退役将军冯·施莱彻尔持枪反抗，交火中他和在此期间进入现场的妻子一起饮弹毙命。”

尽管如此，冯·施莱彻尔的被害还是暴露出清洗者之间存在着分歧。戈林后来声称，他只是打算把将军抓起来，但一支秘密警察的突击队抢在他的邦警察前面，一去就立即杀死了将军。普鲁士总理的确很想立即遏止这种嗜血的酒肉欢宴，从普鲁士各地传来的消息使他明白，面对越来越走极端的党卫队队员，邦警察已经无能为力了；再说他自己还必须装扮成一副心地善良和保守主义的面孔，这是赫尔曼·戈林乐于要让同胞们看到的。

副总理冯·巴本是最先看出恐怖分子元凶们之间存在着分歧的人。当他正要离开莱比锡广场的戈林官邸时，大门口站岗的党卫队警卫挡住了他的去路。戈林的副官包登夏茨连忙赶来，骂道：“我们倒要看看谁是这儿的主人，是戈林总理还是党卫队！”被死神

选中了的人看出，他们可以利用戈林和希姆莱之间的分歧。死在眼前的冲锋队地区总队长西格弗里德·卡舍再三恳求戈林，终于被戈林放跑；外交部国务秘书冯·贝劳被戈林从死亡名单上勾掉。大难临头的冲锋队亲王奥威也得到了戈林的庇护。

118 但是曾几何时，戈林乐于救人的好生之德就骤然结束了，因为当天夜里 10 点钟希特勒从慕尼黑回来，带来了一个使戈林和希姆莱心惊肉跳的消息：免除罗姆一死。这是希特勒亲口答应里特·冯·埃普的。莱比锡广场的这两个刽子手为之吃惊。如果恩斯特·罗姆活下来，对于他们两人来说，1934 年 6 月 30 日这一天就毫无意义了。“罗姆死定了，”希姆莱在 6 月 29 日晚就对里宾特洛甫的老婆安内莉斯这样说，这话一定要算数的。但希特勒可能是蓦地里有过闪念，即不让戈林和希姆莱砍掉罗姆的脑袋于自己将大有好处。这位领袖不能叫这两个亲信过分得势，6 月 30 日的阿道夫·希特勒还不是极权主义领袖专政的希特勒——要等到他继承了兴登堡的职位和通过勃洛姆堡—弗立契危机攫取了整个武装部队的权力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就这样把罗姆杀掉，势必破坏政权体制的巧妙的平衡体系，而希特勒正是靠促成这个体系来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

希特勒施展狡猾的花招：这个在施塔德尔海姆冷酷无情地指令处决最重要的冲锋队领袖、口口声声坚持要“斩尽杀绝”的人，回到柏林后，突然以稳健审慎、注意分寸的领袖姿态出现，并不事事迁就自己下属。他在内阁里说明由他承担有关处决“叛逆分子”的责任，“即使罪行大小不曾完全查证核实和并非所有依军法枪决都是由他亲自下的命令”；他还要明确告诉党卫队领袖于特纳：他本想依法进行审讯，但事变使他顾不上这一层了。

冲锋队的幸存者，特别是新参谋长维克多·卢策天真地相信这位领袖的这番讲话。希特勒成功地玩弄了一种心理学的花招：



幸免于难的人对希姆莱和戈林的刽子手们越是怒不可遏，阿道夫·希特勒就越是显得所谓公平正直。“问题不在于领袖下令枪毙了人，这是根本无庸争辩的，”冲锋队头子卢策写道。他完全相信，希特勒只下令枪毙了七名冲锋队领袖和“事后批准了”未经他同意处死的十个人。

但是不论希特勒出于什么居心装扮成稳健审慎的姿态，希姆莱和戈林还是催促他干掉罗姆。就在6月30日午夜，他们开始劝说这个一向见风使舵、哪边势大倒向哪边的领袖。谁要是在这天夜里将自己的生命依托于希特勒的诺言，那就会铸成大错。有一个人此时此刻满身血污，气喘吁吁地穿过波茨坦附近的树林，被树根绊得跌跌撞撞，倒在地上又爬起来继续奔跑。他曾在施滕内斯暴动后负责过冲锋队改组工作，是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朋友、退役中尉保罗·舒尔茨，他看到了这一点，正在逃命。

6月30日的追捕者按照他们的荒谬逻辑，竟将患相公癖的罗姆的宿敌舒尔茨，列为罗姆的同伙。秘密警察盯住了他。在吃晚饭时他们把他逮捕了。“五个穿便服的青年小伙子，有的没穿衬衫，没系领带，手持打开了保险的手枪，”舒尔茨后来记述道。一小时后他被关进秘密警察处第10号房间。后来三个人带着他坐上一部灰色敞篷汽车，开始了死亡之行。他们向波茨坦疾驶而去，打算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借口“试图逃跑”将他击毙。可是当时正是星期六夜里，不时有汽车来往，闪闪的灯光使行刑者难于下手。

他们折入通往莱比锡的公路，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舒尔茨被拉下汽车，三名押送者中的一个命令他转过身去。他正要想逃跑，身上就中了一枪，显然是由于距离太远，这一枪没有击中要害。舒尔茨还是咬紧牙关装成被打死了。那三个人回到汽车上去取一块帆布，准备把这个伪装的死鬼卷起来。舒尔茨记述说：“就在这当儿，我一跃而起，连蹦带跳地钻进林间的道路，一面转脸

朝三个凶手扫了一眼，只见他们站在那儿愣住了。”

舒尔茨奔跑着。他感到背部剧痛，子弹打中了背脊骨。“不过我发现嘴里并没有血，这就放心了，”往前跑，一个劲儿往前跑，可不能软瘫下来，他这样想。他一开始跑出几百公尺后，随即改变方向，跑到了泽丁村，但已看到有汽车在进行搜索，用车灯照遍了所有道路的角落。他扑到灌木林后面，伏在地上——后来追捕者发现了滴落下来的血迹。他气喘吁吁地爬到努特河边，藏在芦苇丛里，借着月光擦洗身上的血污，一面考虑怎样最后把追捕者甩掉。

突然他想起一个名字：一个熟人，退休海军少将吕贝特，不久前刚迁来柏林，因此秘密警察对他还不怎么了解——舒尔茨决定到这个人家里去躲避。事情很顺利，海军少将接纳了这个逃亡者。这时警察和党卫队已大批出动，对波茨坦附近进行反复搜查，并号召居民捉拿这个被打伤的逃犯，必要时可以将其击毙。舒尔茨必须“抢先采取行动，赶在那些想要把我杀死的人的前面”。

他有直通希特勒的朋友。于是他动员他们用铅笔写了一封信，秘密送给一个联系人，但不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藏身之所；舒尔茨想了一个叫人捉摸不定的地址：“躺在一块庄稼地里。”一位朋友赶忙去找希特勒，希特勒答应不杀这个当年的秘密法庭英雄，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一个知心朋友找到了舒尔茨躲藏的地方，带来了消息：“您处在领袖保护之下！希特勒说了：对舒尔茨既往不究；他在我亲自保护之下。”可是深知希特勒其人的舒尔茨并不相信自己的领袖，他久久不肯离开躲藏的地方。朋友们不得不再相劝，他才出来了。他对希特勒的估计是正确的；希特勒的诺言是越来越不值钱了——舒尔茨也该知足了；希特勒最终将他逐出了德国，这就是庄严诺言还剩下的一点价值。

象保罗·舒尔茨一样，罗姆卫队劫后余生的一些领袖也知道阿道夫·希特勒的诺言具有多少价值。希特勒在7月1日上午还说

要保住他唯一的朋友的性命，但到了中午时刻，戈林和希姆莱终于如愿以偿：党卫队旅队长西奥多·艾克得到了枪决罗姆的命令。诚然，希特勒还指望罗姆能省却他下最后一道命令：艾克接到指示，示意这位前冲锋队头子自杀。艾克准备好一支手枪，装进了一颗子弹，和自己的副手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迈戈尔·利伯特，共同驱车去施塔德尔海姆。随同他们两人前往的，还有第三者：党卫队对国防军的联络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施毛泽尔。

下午3点，一行三人来见施塔德尔海姆监狱长科赫。这位监狱长再次制造麻烦，他不肯单凭一句话就让把犯人给提走，咕嘟着得按公事规程办理，一面照他碰到这种情况时惯用的办法向司法部长弗朗克告急。当纳粹律师弗朗克在电话中表示对科赫的顾虑抱有同感时，艾克一把抢过科赫手中的话筒，对着话筒吼道：这件事情同部长先生毫不相干；他艾克是奉了领袖的命令办事，这不就得了。科赫唯唯诺诺，他找来监狱管理员勒希勒，叫他领艾克、利伯特和施毛泽尔到新监狱474号牢房去。

罗姆蹲在474号牢房里的一张木床上，赤着膊，汗流浹背。当牢门吱的一声打开，集中营长官艾克走进去时，他微微转过脸来。艾克说：“您活到头了，领袖最后还给您一个机会自己裁决。”说着把手枪放在一张桌子上，还有一份刚出版的《人民观察家报》，通栏标题登载：“罗姆被捕并撤职——冲锋队内进行彻底清洗”。艾克退出牢房时告诉罗姆：给他十分钟时间，时间一到就没有说的了。随手关上了牢门。

三个党卫队站在牢房门前两米半宽的过道里，等了一刻钟，没听到里面有动静。艾克看了看表，和利伯特双双拔出执勤手枪。旅队长艾克再次打开牢门，大声说：“参谋长，您准备好！”说着眼睛瞅了瞅站在身旁的利伯特，只见利伯特右手握着的一支枪在发抖。艾克低声说：“别发慌，沉住气瞄准。”砰砰两枪，罗姆仰面栽倒在

地，连连抽泣：“我的领袖，我的领袖。”艾克讷笑着说：“您要早想到这点就好了，现在已经晚了。”罗姆艰难地喘着气，两个党卫队队员中的一个（不清楚是谁）对准重伤者的胸口又开了一枪。冲锋队的创建人、希特勒的唯一的朋友、国防军的对手恩斯特·罗姆完了。他死于1934年7月1日下午6时。

随着罗姆之死，再一次爆发了行刑队的密集枪声。被囚在柏林党卫队第二刑讯处哥伦比亚大楼的冲锋队地区总队长卡尔·施赖尔，只听见牢房门开启声、行刑命令声和枪杀的回声，响成一片，越来越近。7月2日凌晨，还不停地枪毙着人。施赖尔在自己牢房里计算着一个人给枪杀的时间：冲锋队区队长冯·法尔肯豪森死于2点；地区总队长冯·德滕死于2点30分；里特·冯·克劳塞尔——希特勒也曾答应过对他宽大处理——死于3点。

又过了半个钟头，轮到施赖尔了。牢房门打开，一个党卫队中队长叉开双腿站在门口，后面跟着两名手持上刺刀的步枪的党卫队队员。“施赖尔，出来！”这个中队长喊道，“奉领袖命令现在枪决您。”施赖尔说：“我要求先进行审讯。”中队长答道：“你们倒想得好，你们这些叛逆犯。你们罪证确凿，就得枪毙。你象他们一样，把脑袋放到自来水龙头下去冲一冲，清醒清醒，样子好装得神气一点。”

一会儿施赖尔被带走了，但又重新被关进牢房。按规定，他要被送到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去枪毙，而汽车还没有来。几分钟后汽车来了。“我被带下楼去，”施赖尔记述道，“监狱门口停着一辆抓人的小汽车，两个人上去了，当我正要第三个上去时，只见呼地一声开来一辆大型梅塞德斯牌轿车，车上跳下一个警卫旗队的旗队长，不停地摇手喊道：‘停住，停住！’并冲着我们说：‘不能再干了，领袖已经答应了兴登堡，枪毙到此立即全部停止。’”

这时正是1934年7月2日4点。第三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大

屠杀告一段落。八十三人惨遭横死，既未经过司法程序，也未给予任何辩护机会，他们成了横暴的党派集团争斗的牺牲品。希特勒宣称：“在这个时刻，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内阁匆忙确认这种国家所犯的罪行完全是正当的。7月3日，阿道夫·希特勒的部长们通过了一项法令，唯一的一句话是：“为粉碎叛逆和叛国性进攻，1934年6月30日和7月1、2两日所采取的保卫国家的措施具有法律根据。”<sup>122</sup>

国防军营房里发出一片欢呼声，军官食堂中香槟酒觥筹交错。“All caught”(一网打尽)——当最后一批被捕的冲锋队领袖枪毙完毕时，冯·莱希瑙将军用蹩脚的英语给谍报局长帕齐希打了这样一份电报。“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参加，”冯·维茨勒本少将兴致勃勃地说。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颂扬“领袖亲自出马打击粉碎卖国贼和叛逆分子”，表现了“军人的坚定性”和“表率性的果断”。只有前总理府国务秘书、退役骑兵上尉埃尔温·普朗克警告冯·弗立契男爵将军说：“您如果袖手旁观，迟早也会遇到同样的命运的。”

后来的事实应验了他的预言：冯·弗立契象罗姆一样，在类似的阴谋中栽了跟头，冯·维茨勒本被吊死在人民法庭的一个肉钩子上，而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中尉也必须在1944年7月20日为自己年轻时所犯的过失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他说过：6月30日只不过是“挤掉了一个脓疱”。连勃洛姆堡也很快就对自己部属为6月30日鼓掌喝采感到不快。据海因里希上校记述，勃洛姆堡向国防军各部门领导人作的一次讲话中有如下要点：“部队没有保持人们所期望的态度。对死去的人感到高兴并在食堂里纷纷谈论，这是不适当的。”

这位部长已经看出，6月30日的胜利者并不是国防军。获得全胜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队，因为党卫队摆脱了冲锋队

的所有约束,加强了它在党内的势力。6月9日,党的领导机关就宣布了党卫队保安处是纳粹党的唯一政治情报机构,7月20日希特勒规定:“鉴于党卫队特别是在1934年6月30日事件中作出的巨大功绩,我将其升格为纳粹党内的一个独立组织。”希特勒还批准党卫队建立武装部队。这样,他就破坏了国防军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计划,因为它是国家武器的唯一持有者,而它正是为此而向冲锋队宣战的。

1934年6月30日给第三帝国的历史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刀痕。血洗冲锋队加速了希特勒的独裁和恐怖统治的进程,建立了戈林-希姆莱轴心(这个轴心直到战争爆发时在纳粹特权阶层的权力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预示着对于未来的一个凶讯:党卫队业已证明,它决心执行,而且是不折不扣地执行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切命令。当然,在党的权力大厦内部也同时绽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即党卫队和冲锋队彼此已成为死敌。

123 成千上万的冲锋队队员再也不会忘记他们忍受过的那些欺凌和屈辱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冲锋队事实上已沦为党卫队的囚徒。最富于象征性的事实莫过于: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卢策必须偏偏委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吕格负责整个东德地区冲锋队的清洗和改组工作。冲锋队领导的重要政治机构(政治处和部长办公室<sup>①</sup>)被撤消。卢策还不得不下令:“兹委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吕格负责清理包括接收所有属于冲锋队总部的物资(办公家具、办公用品、车辆等)。”

直到8月初,冲锋队才重新成为自己大楼里的主人,并可自行清洗组织。冲锋队地区总队长伯肯豪尔成立了一个冲锋队特别法庭,下设派驻各个有揭发所谓罗姆同伙及审查“一切事件”的地区

---

<sup>①</sup> 系指罗姆任不管部长时的办公室。——译者

的调查委员会；据 1934 年 8 月 9 日一项希特勒命令规定，“凡冲锋队领袖由于品行不端、道德败坏、猎取名位、享乐至上、鲸吞中饱、酗酒放纵、骄横挥霍等等而不符合作为领袖军队的冲锋队标准”的一切事件，均属审查之列。这些机构刚刚开始工作，就把调查的主要内容翻转过来，它们不去追查罗姆的同伙，而是收集党卫队在 6 月 30 日及其以后的表现的报告。

冲锋队的一份份报告吐露出他们的愤怒，表达了褐衫队队员们的气愤、仇恨和惊骇。“我一向，”1925 年参加冲锋队的突击中队长赫尔曼·贝克控诉说，“为廉洁和正义而斗争，可现在竟有人扬言要逮捕我。我们这些为团体和德国国旗拼杀了多年的老冲锋队员，竟受人欺侮，被警察剥光自己的衣服，被他们敲掉饭碗，难道现在已不配称为中坚分子了么？难道我们现在再次沦为任人宰割的地步了么？”第一百六十八冲锋队旗队长在 7 月 28 日报告道：“我反复告诫我的部下一定要听从党卫队的指挥……但由于部分年轻党卫队队员对冲锋队老同志所持的态度，使所有老冲锋队队员心灵上都受到莫大的打击。”

奥芬巴赫的费尔滕小队长气愤地报告：“同志们……纷纷向我诉说经常负责巡逻凯撒大街的党卫队巡逻队的态度……半夜 1 时许，一名党卫队候补队员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擦过，向我吼道：‘怎么不敬礼——你准是睡糊涂了！’我叫他下车，他头也不回地飞快蹬着车跑了。他要是下车，我只需稍微动动手就管叫这小子懂得，他对一位阿道夫·希特勒的战士、一个入党多年的同志和佩戴冲锋队勋章的冲锋队队员犯了什么罪。”

党卫队成了冲锋队永远痛恨的对象。这两支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军队再也不会言归于好了。从此以后，冲锋队和党卫队相互尖锐对立——开始进行着一场默默的、看不见的战争。维克多·卢策自告奋勇地向对手挑战。1935 年 8 月 17 日深夜，在斯德丁“普鲁

124

士霍夫”旅馆的餐厅里，他和二十名自己的同事及三名党卫队领袖簇拥在一堆啤酒杯跟前，向黑色集团宣战了。

卢策大声说：“6月30日的做法是那么专横和枉法，总有一天要得到报应的。德国人的秉性是讲正义的，而这种对正义伤天害理的举动，总有一天会落到犯罪者自己头上的，他们决不会有好下场。”北德大区保安处党卫队旗队长罗伯特·舒尔茨竭力压制心头怒火，咬牙切齿地答道：“可惜没有彻底斩草除根。人们的做法过于宽大了，让一些人漏了网，甚至冲锋队里就还有完全知道罗姆干了哪些勾当的人。”

卢策反驳说，党卫队要装扮成正人君子是徒劳的，因为它本身就不干净。尽管三个党卫队领袖暴跳如雷，可是冲锋队参谋长根本不加理睬。他大声说：“是谁一有机会就给罗姆鼓掌喝采，一再向他表示忠实呢，难道是一个老冲锋队领袖或者说随便哪个冲锋队领袖吗？要我在这里点出这样做的那个人的名字吗？”北德大区保安处事后向柏林报告说：“要不是舒尔茨旗队长在这里一再插话打断，我们也许就会处于狼狈境地，因为卢策会点出：党卫队全国领袖。”冲锋队头子不肯罢休。卢策说：“是谁起劲地干了谴责罗姆所干的那些勾当呢？难道是冲锋队吗？冲锋队不会干这种肮脏勾当的，或者说至少不光是冲锋队干这种肮脏勾当，而是对方肆无忌惮地干这种肮脏勾当。要我点名吗？我可以马上点名！”

党卫队队员舒尔茨无计可施，只有赶忙打圆场：“参谋长，已经快两点钟了，我们还是去睡觉为好。”他把服务员叫来，自己掏腰包付了账。先生们纷纷离座。维克多·卢策也摇摇晃晃走了出去，但是他言犹未尽；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即使明天撤我的职，送我去蹲集中营，我也始终坚持这样的看法。”



## 第七章 集团

125

党卫队全国领袖在慕尼黑举行一次报告会，邀请人们参加。军官、工业家、教授和地主抱着好奇、犹豫和狐疑的心情出席了会议。好几个月以来，德国上层阶级已经听惯了纳粹领袖们的攻击言论，说他们腐朽没落，唯犹太人马首是瞻。出乎意料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莱这次对他们未加任何指责，不仅如此，党卫队头子还号召先生们为“使各种传统思潮在党卫队内汇流”作出积极贡献。

希姆莱提出论据说明，任何国家都需要有一支中坚力量。纳粹德国的中坚力量就是党卫队，但是，党卫队只有将“纯正的军人传统，德意志贵族的高尚思想、风度和教养，以及以种族精华作为基础的工业家的创造性活力，连同时代的社会要求”集其大成于一身，它才能发挥其中坚作用。一个与会者后来向希姆莱的保健医生费利克斯·克尔斯滕说，全国领袖的话“引起了普遍的惊讶”。纳粹党员是不习惯于用这种语调的。此次报告会的结果是，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加入了党卫队。

民族社会主义纪元元年中的这件事表明，希姆莱多么善于巧妙地让他的党卫队面向公众开展活动。党卫队享有的声誉是任何其他纳粹组织无法与之比拟的，它明显地不同于乌合之众的褐衫大军。“那些所谓‘文雅人士’都愿意加入党卫队这样一个党的团体，”党卫队保安处领袖瓦尔特·施伦堡后来回忆说；弗赖堡天主教大主教格勒贝尔博士1946年还承认，党卫队“在我们弗赖堡被认为是党的最正派的一个组织”。

在许多德国人的心目中，党卫队以中坚自命是无可非议的，因

为不论哪个朝代都有中坚力量。没有中坚力量，一个国家——不论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就无法永存；从盎格鲁萨克逊民主制度到苏联体制的一党专政都深信，一个政权愈是坚定地依靠一个肩负国家重任的居民阶层，这个政权就愈能经受住危机动荡。

魏玛共和国由于没有依靠种族精华以致给国家造成的情况，可谓前车之鉴。因此，党卫队关于中坚的宣传对德国人特别具有诱惑力，更何况希姆莱使用了德国人十分熟悉的保守浪漫主义词汇来表达他的论点。即使持批判态度的希特勒传记作家康拉德·海登，也在1934年就提到，跟“革命的冲锋队”相反，党卫队体现了保守主义的原则。1934年6月30日的杀戮丝毫无损于公民们对希姆莱集团的钦佩。从希特勒取得政权以来，冲锋队领导在街头巷尾喧嚣一时的过激行动已宣告结束，人们对此舒了一口气。这种心情压倒了传统的法治感。

“将人民从卑劣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值得为之付出牺牲的，”《法兰克福报》这样写道，而这也正反映了几乎所有德国人的想法。对资产阶级政敌的凶杀已被人们忘怀，被消灭的冲锋队领袖死前的呼叫声也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国民中只怀有一个希望：永远不让褐衫队打手们再次破坏市民的安定生活。德国人对“凶神恶煞的诈骗术”（狄特里希·波霍弗语）还缺乏认识；他们还不知道，在绝对专制的前厅里，对自由的进攻往往伴随着这样的要求：建立秩序和行历史之所需，即如同理论家们所说的“可以理解的犯罪”。

此外，这种所谓的在所必需的犯罪，在1934年夏天身上还披着一套最讨德国人喜欢而又时新的制服，它从头到脚一身是黑，无形中使乌合之众的褐色相形见绌：头上是一顶有黑牛皮扣带和佩银骷髅标志的黑色大沿帽。上身着黑色皮钮扣的褐衬衫，系黑领带，外套黑制服，黑制服上戴黑肩章。下身是黑马裤，裤腿掖进黑

色长统靴里。

这种制服的设计师挖空心思地使用种种神秘的标志，牢牢地吸引着德国人爱好等级官阶的奇思遐想。右上臂套一只铝色线刺绣的臂章，表明是“老战士”；一块带有 SD 两个字母的菱形牌，说明佩戴者是神秘莫测的保安处人员。最能看出等级分明的是肩章：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以下的级别肩章上为六条平行的铝色线，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至旗队长为三股铝色线编成的一道线辫，区队长以上为三道双股线辫。领章上的等级标志更是花样繁多。高级官员两块领章上都有表示级别的标记：旗队长各为一片橡树叶，区队长各为两片橡树叶，旅队长为两片橡树叶加一颗星，地区总队长为三片橡树叶，副总指挥为三片橡树叶加一颗星，全国领袖则是三片橡树叶带一个橡树叶花环。

党卫队外表上的每一英寸面积，都用以显示它是一个精华荟萃的组织，一支身系监视国家安危的严格的清教徒近卫军，体现出“毫不犹豫、无条件地执行领袖每一项命令”（希姆莱语）的顺从性。127

全国领袖敞开他的党卫队的大门，让国内有心趋炎附势的上层阶级人士参加进来。希姆莱的组织，首先是保安处特别部队、骷髅队和特别机动部队，迫切需要经费和领导人员，而这些又只能来源于一向居统治地位的旧有中坚力量：贵族、资产阶级和财界。希姆莱不遗余力地紧张工作，要使党卫队成为一个替崛起的帝国的各部门网罗人材的机构，以致一时几乎没有注意他的工作是何等自相矛盾：民族社会主义党的近卫军年复一年地将种族主义优生学奉为自身生存规律的圭臬，而现在党卫队却向一些居民阶层频送秋波，这些阶层拥有任何一部褐色种族主义哲学词典所没有收进的那些词汇的东西：声望、金钱和一种世代相传的统治本能。

新的阶层涌入党卫队，迅速改变了党卫队的社会成分面貌。截至 1933 年止，决定党卫队的成分有三种人：前自由团成员，由于经

济危机致使职业训练中断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老党员。1933年以前的这个党卫队，只有一个人数很少的领导集团，但它一直窃踞着党卫队内的重要职位，直到第三帝国的末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百分之九十的老党卫队员均已退休养老。

老党员中仅有百分之十的人经历了大批新人涌入希姆莱的组织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1933年3月，因此心存疑忌的党卫队老战士称这些新人为“香堇菜”<sup>①</sup>。率先加入的是贵族。早在取得政权之前不久，已经有知名的贵族人士参加了党卫队，例如冯·梅克伦堡大公爵、楚·瓦尔台克·翁德·皮尔蒙特亲王、克里斯托夫·冯·黑森亲王和威廉·冯·黑森亲王、巴塞维茨-贝尔伯爵和冯·普法伊尔-布格豪斯伯爵、德国直属帝国男爵冯·廷根，以及男爵冯·盖尔、冯·赖岑施泰因和冯·马尔森-波尼考。

1933年春，党卫队的血管里进一步注入了贵族血液。西格马林根王室的冯·霍亨佐伦-埃姆登亲王和冯·舒伦堡伯爵参加了党卫队。过不多久，党卫队的花名册上也相应地从哥达充实了人员。普鲁士-德意志军事史上的烜赫姓名几乎无一遗漏；贵族冯·丹尼尔斯、冯·勒德恩伯爵、施特拉赫维茨伯爵、冯·德·戈尔茨男爵、贵族冯·德·普拉尼茨、冯·科伊德尔、冯·阿尔文斯勒本、冯·波德比尔斯基、冯·特洛伊恩费尔德、冯·纳图西乌斯等等，全都上了名册。穿上黑制服的贵族在党卫队领导集团中担任了一些高级职位。1938年贵族任高级职位的比例为：在党卫队副总指挥一级中占百分之十八点七，在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九点八，在党卫队旅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十四点三，在党卫队区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八点八，在党卫队旗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八点四。

---

<sup>①</sup> 原文是 Märzeilchen，相当于英文的 sweet violet，即香堇菜。——译者

继贵族之后是中等资产阶级子弟。同贵族相反，他们是党卫队中的二十世纪人物，其中多半为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多数是法律）和几乎全部在德国青年运动的感情和思想中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差不多都进了保安处，在那里促使形成一种法学-理智主义的典型，它同党卫队老战士的战壕社会主义或斗争时期的小资产阶级庸俗民族社会主义都格格不入。瓦尔特·施伦堡和赖因哈德·赫恩，弗朗兹·西克斯和奥托·奥仑道夫，全都是读过大学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他们创造了不凭感情用事的党卫队技术政治家、所谓“social engineer”<sup>①</sup>的样板，给领袖专政提供了各种需要的、形式上合乎法律的或组织上的公式——巧妙、实用、除了着眼于权力之外几乎不考虑任何意识形态，但又灭绝人性和不承认人们一致公认的准则。

跟保安处知识分子性质相同的一批资产阶级，是参加党卫队厂矿企业管理机构的青年经济学家。他们这些人同今天西德各厂矿企业管理人员办事处的工艺学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对党卫队本身的世界观，比保安处的伙伴更加不感兴趣，将希姆莱的经济企业完全看成是一条特别保险的成名发迹的道路。旗队长瓦尔特·扎尔佩特博士是黑色集团经济王国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党卫队高级领袖们在他的档案中写道：他想试图“用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装饰”他的功名心。这项评语基本上适合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的情况。

香堇菜的另一股人来自国防军的资产阶级军官团，他们使本已很不一致的党卫队成分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军官们加入1934年起建立的特别机动部队（VT），而且为时不久，就凌驾于具有塞普·狄特里希那种粗暴性格的初期党卫队军人之上。当然，新的

---

① 英语：社会工程师。——译者

职业军官几乎算不上是一派。前国防军中将、钢盔团领袖保罗·豪塞尔是典型的保皇派军官，他作为后备队督察员给这支武装党卫队前身带来了一种罕见的保守主义特征；而东普鲁士少校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和空军少尉威廉·比特里希一类的改革派，则把特别机动部队视为一种实验性质的军队。

农民也是党卫队的人员之源。比较年轻、大多是感到前途无出路的农民，纷纷当了看守集中营的骷髅队。受过教育的农家子弟则相反，拼命挤入巴特特尔茨和不伦瑞克的党卫队士官学校，谋求发迹，这种士官学校有时迫于需要，甚至可以提供国防军不可能提供的机会：无需经过基本训练就能进入军官生涯。

129 似乎希姆莱还嫌党卫队成员的类别不够五花八门，他又搞了一种党卫队的新标本：名誉领袖。希姆莱授予有影响的公职人员、党的干部、科学家和外交人员以领袖头衔，并让他们有权穿相应的党卫队制服；党卫队名誉领袖多半直接由全国领袖本部领导，不需值勤，也无权发号施令。希姆莱显然希望，利用这种名誉头衔扩大党卫队的社会基础，并以党卫队的思想影响名誉领袖——这种荒诞想法，除了希姆莱以外，只有1945年以后负责整肃纳粹的人员和一些历史学家才会相信。

头脑简单的历史学家看到，持不同政见的外交官员、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威兹萨克男爵获得党卫队旅队长头衔，或者希姆莱的死对头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当上了党卫队副总指挥，就误认为所有身穿黑制服的都是希姆莱打入国家和党内的第五纵队的一名狡猾成员。实际上，名誉领袖并不是党卫队头子的游击队员，如同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的妻子一样，希姆莱也曾授予她党卫队名誉队员的称号。

科隆行政区政府领导人鲁道夫·狄尔斯拥有党卫队区队长名誉领袖头衔，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同秘密警察干预内政的渗透活动

展开斗争。另一名誉领袖、希姆莱在1943年试图给予纪律制裁的军政府首脑兼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埃格特·雷德尔，几乎毫不掩饰地反对党卫队头子对他的职务进行任何干预。党卫队的制服掩盖了某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党领袖康拉德·汉莱因当上了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是由于保安处试图推翻汉莱因未能得逞；而党卫队名誉领袖马丁·鲍曼，则使国内保安处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

然而希姆莱并未停止继续为自己的帝国招兵买马，扩充势力。他甚至暂时在党卫队内系统地建立各种组织，只要它们有助于他接触现实社会。他已经开辟了一条联系农业协会的渠道：农村骑术协会。

希姆莱抓住这个德意志民族保守主义的节日活动：一部分地区的骑术协会虽已投向冲锋队，但实力最雄厚的部分却紧紧依附党卫队——在东普鲁士、荷尔斯泰因、奥耳登堡、汉诺威和威斯特伐利亚这些主要养马地区，所有骑术协会都披上了党卫队的服饰。党卫队骑师们确保希姆莱在社会上获得了某些光采。1935年在克莱因-弗洛特贝克举行第十六届德意志春季赛马大会，党卫队三级小队副骑师京特·特梅乘“埃格利”坐骑赢得了全胜，成为德国赛马史上的创举；1937年赛马会上，党卫队骑师们更囊括了德国国内所有各个项目的冠军。

当然，为了取得这些成就希姆莱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他答应 130  
农村骑术协会，不问其政治态度如何，可吸收它们的所有会员，加入党卫队。从此党卫队内的老战士们嘀嘀咕咕，说这些骑师尽管身穿黑制服可仍然是反动的德意志民族党人。党卫队机关刊物《黑色团》义正词严地警告骑师们：“他们必须培养民族社会主义精神，亦即党卫队在其建立以来的漫长岁月中培养并奉为行动准则的全部道德品质：效忠领袖、服从和纪律。”多数骑师俯首帖耳，但有些

骑师却另有其作为骑师心目中的道德观。1933年有十一名骑师拒绝参加党卫队宣誓，被送进了集中营。东普鲁士党卫队骑师队长安东·冯·霍贝格·翁得·布赫瓦尔德男爵，于1934年7月2日被党卫队员枪决，原因是这个老钢盔团员向国防军透露了党卫队的内幕。十年之后，希姆莱以煽动反对希特勒的罪名，下令处死他的马匹补充处长、骑师兼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汉斯-维克托·冯·扎尔菲阿蒂伯爵。

跟骑师们缔结的协定给希姆莱提供了接触农业协会成员的机会，和半保皇性质的“基夫豪塞”德国军官联合会总会领导的结盟，使他有获得老战士的兵源。德国军官联合会总会的中央领导成员和地方分会领袖均集体加入了党卫队。老战士对他们的全国领袖再也无法理解了，因为参加党卫队的德国军官联合会领袖中，为首的就是忠于皇帝的步兵将军威廉·赖因哈德，此人系反动军人的同僚。《黑色团》对此在1935年还曾指责，在这些军人中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狂妄自大，将工人排斥于人民集体之外；他必将唤起社会感并被作为第三等级”。

讽刺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黑色团》咒骂极端保守的吕狄格·冯·德·戈尔茨伯爵将军是可恶的反动分子，而1920年跟冯·德·戈尔茨伯爵在卡普暴动中并肩作战、志同道合的赖因哈德，却被党卫队机关刊物誉为党卫队副总指挥和民族社会主义者。直到1941年，老党卫队员、纳粹党司库弗朗兹·沙维埃·施瓦兹还对披上黑制服的保皇派赖因哈德看不顺眼。施瓦兹说：“我只是遗憾，这么一个人当上了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穿上了这种漂亮的制服，而骨子里却依然如故。”

希姆莱也把赫尔曼·埃尔哈特舰长海军旅的残存人员拉进党卫队，党卫队的老战士们对此亦具有同样感触。有些老战士对1931年10月10日党卫队第53号命令还记忆犹新，希姆莱在命



令中提出，要注意舰长居心叵测地阴谋将其党羽打进党的机构，“企图搞垮纳粹党”。而现在，希姆莱却有意集体接纳埃尔哈特旅的人员入党卫队，具体办法业已谈妥，只是由于固执的舰长发表 131 的一通怪里怪气的讲话，出乎党卫队候补队员们的意料之外，才使计划告吹。

“本旅官兵们，”埃尔哈特当着亲临该旅最后一次动员人们入党卫队的纳粹头面人物，大声向集合在场地上的部属说，“你们知道，我们是经过了长时间多次斗争之后，直到最近才愿意加入新国家的一个组织的。对此我表示敬意！因为只有斗争中才能了解敌手，重视或藐视敌手！而且今后我们也要坚持这样做。”纳粹党领袖们气得暴跳如雷，最后希姆莱决定放弃埃尔哈特旅。只有个别成员参加了党卫队，其中包括埃尔哈特的前副官哈特穆特·普拉斯，他当上了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1944年以七月二十日政变的帮凶罪名在集中营里结束了生命。

但是希姆莱并不是光顾着给党卫队争取新的成员，他也同样需要钱，以维持越来越浩繁的党卫队组织的开支。德国的工厂主和经济学家欣然站在全国领袖一边。他们在一个号称“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的俱乐部里进行活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出于某些原因谋求接近海因里希·希姆莱。象伊·格·法本公司董事海因里希·比特菲施博士之流的机会主义者、象宣传部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博士的坚定的纳粹分子、象弗里德里希·弗利克的小心谨慎的康采恩老板，和象罗伯特-博施公司经理汉斯·瓦尔茨的冒牌的反纳粹主义者，他们凑成一伙，以捐款资助党卫队。

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的前身，是希特勒的经济顾问威廉·凯普勒在1932年夏天组织的“经济问题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旨在从业务上支持未来的德国主子们，它的成员是著名的经济和财界人士，其中有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联合钢铁公司老板艾伯

特·伏格勒，和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希特勒召开经济座谈会并未谈出什么名堂，倒是凯普勒的年轻助手、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弗里茨·克拉内富斯善于出谋献策，他劝说希姆莱关心这个俱乐部，从1934年年中起，这个俱乐部就受到党卫队头子的保护。

132 沙赫特和伏格勒退了回去，相反许多厂商都纷纷加入“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几乎没有一家大型厂矿企业不希望通过派出一名理事和出钱资助党卫队，借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得受到党的加害。希姆莱之友社的会员名单，读起来宛如一本重要厂商注册登记簿：银行业有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私营银行、国家银行和J.H.施泰因银行，航运业有北德劳合轮船公司和汉堡美洲航运公司，油商有德美石油公司和大陆油业公司，奥古斯特·厄特克尔博士营养食品厂和伊·格·法本工业大卡特尔，中德钢铁厂，西门子-舒克尔特工厂，波特兰水泥厂，莱因博尔西希金属工厂和“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

希姆莱之友社书记克拉内富斯定期召开会员大会，经常有党卫队高级领袖参加。起初每年集会两次，一次是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纽伦堡召开，另一次是趁特别机动部队举行宣誓时在慕尼黑召开；后来会员每月都在柏林“飞行员之家”集会。从1936年起，希姆莱还要求这些先生们定期捐献。他告诉该社银行家冯·施罗德，希望大家捐款给“党卫队用于文化、社会和慈善事业的开支”。这个银行家忙不迭地满足了大恩主的意愿。

厂商会员们也表示愿意效力，事隔不久，捐款就源源流入施罗德担任董事的J.H.施泰因银行的S字号储款账户；每年捐款总额达一百万马克，悉数解交德累斯顿银行党卫队的R字号特别账户，由希姆莱的首席副官卡尔·沃尔夫开支票提取。党卫队头子深表感激，给希姆莱之友社的成员封官晋爵，纷纷给予党卫队头衔；在

三十二名未参加党卫队的成员中，有十五人被任命为党卫队名誉领袖，他们只是间或穿穿党卫队制服而已。

当然，对于那些不敢身穿佩戴骷髅标记的制服的人，党卫队也提供了一种较为隐蔽而且花钱不多的合作方式。希特勒特许这样一支作为独特的党组织而经常急需经费的党卫队有权自行筹款，发展赞助队员(FM)。所谓赞助队员就是同情者，他们虽然资助党卫队，但并不参加党卫队组织。他们无需向希特勒宣誓，也不受党卫队内部命令的约束。

每个党卫队旗队均附有一个赞助队员机构，它责成每个党卫队员至少发展一名赞助队员。“赞助队员机构，”党卫队领袖库特·维特耶在1933年3月1日解释说，“是党卫队唯一可靠的财源，它定将进一步成为建设党卫队经济的保证。”取得政权以后，党卫队加强宣传赞助队员的工作，因为它掌握了许多德国人宁愿当一名匿名的赞助队员而不愿参加另一党组织的心理。赞助队员这个身分足可免除纳粹找到头上来的麻烦，而且无需参加党，捐献数字可以由自己确定，每年至少应捐献一个马克。

除了这种吸引力外，希姆莱还搞了一种独出心裁的诱饵。他叫人设计了一种不在市场上公开发售的银质赞助队员徽章，徽章为椭圆形，中间镌有卐字、SS和FM字母；还办了一份《赞助队员杂志》(战争爆发时发行量为三十六万五千份)，并给每个关心赞助队员的同胞送一幅宣传标语，挂在家里，上面写着：

党卫队员真光荣，  
赞助队员也光荣；  
我们党卫队员和你们赞助队员，  
人人继续履行各自的义务，  
坚守自己的岗位。

德国必会重新强大。

大规模的宣传带来了预期的效果。为时不久，希姆莱的赞助队员影子部队在人数上就超过了正式党卫队员，马克源源流进党卫队的金库：1932年有赞助队员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七名，纳款一万七千马克；1933年十六万七千二百七十二名，纳款三十五万七千马克；1934年三十四万二千四百九十二名，纳款五十八万一千马克。

但是，一个成员如此复杂的党卫队必然内部缺少团结。党卫队老战士们突然看到，那些显然连民族社会主义的起码知识也不懂的人，都纷纷穿上了党卫队制服。党卫队变成了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纳粹党司库施瓦兹再也不想穿党卫队制服了，因为——据地区总队长伯格记录——“穿这种制服的人太多了，特别是许多党卫队领袖无论从思想上和外表上来说都不配穿它。”党卫队的肩章、领章和制服很难说明一个队员的实际思想情况。后来担任秘密警察头子的海因里希·缪勒，在自己的党卫队制服上戴了一个老战士臂章，虽然纳粹党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区领导机关1937年1月14日证明，说这个追求名誉和逐猎官位的缪勒“不是党员”，“从来不曾在党内积极工作”，因而“对民族的振兴毫无任何贡献”。

德国中央保安局人事处对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海因里希·比特菲施博士写了这样的评语：此人原系共济会员，“完全受制于康采恩”，具有“一种事事着眼于国际合作的心理状态，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康采恩是拥有其固有生存法则和生存权利的国中之国”。关于区队长冯·施罗德男爵，1937年8月一份党卫队内部简报的作者写道：这个银行家过去是莱茵分离主义者的同伙和康拉德·阿登纳的朋友，因此“无疑不会是党卫队所要求的那种积极

分子”。

连希姆莱自己也逐渐看到了威胁着党卫队内部统一的危险。他在1937年承认，“数字的危险、量的危险”曾经咄咄逼人，因为党卫队里“〔进来了〕一大批心地不纯洁和不完全具有理想的人”。希姆莱以为危险已得到克服——事实上，只要党卫队还存在，这种危险就永远存在。 134

无论如何，他在1933年年中已下令暂停发展党卫队队员。希姆莱说：“我说过：不再吸收任何人。随后，从1933年年底至1935年年底，我们又将新队员中所有不起作用的人通通清除出队。”两年内共清除六万名党卫队队员。希姆莱清洗中的牺牲品是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酒鬼、有相公癖者、无法确证其为亚利安种的人，也有老战士，他们在斗争时期曾经挥舞棍棒对付政敌，表现良好，而眼下已不再符合希特勒卫队的标准。希姆莱甚至对不乐意就业的失业者也不能再容忍了：“凡无真实可信的理由而调换工作满三次的人，我们就将他撵出去，我们用不着游手好闲的人。”

他十分执拗地指示追查有相公癖的人，因为他把违反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看成是给他自己脸上抹黑。在他看来，搞鸡奸活动是犯死罪，没有一个搞鸡奸的党卫队员能逃脱他的惩罚——连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第一任局长、地区总队长库特·维特耶这样的老战士，也未能幸免。1935年5月22日《黑色团》报道，维特耶“因病”解职，希姆莱在一次讲话中说，他“遗憾地”并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让维特耶离职，但希望维特耶“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全力投入工作”。那些冲锋队领袖对党卫队抨击罗姆搞鸡奸的议论记忆犹新，他们清楚维特耶真正害了什么病。冲锋队头子卢策挖苦地说：“不知拖了多长时间才在各方压力下把维特耶调走。”

希姆莱在1937年提出，必须将所有搞鸡奸的人清除出党卫队并交付法庭；在狱中服刑期满后“将根据我的命令送往集中营，作

为试图逃跑将其枪决”。不过希姆莱也在党卫队系统中发动揭发非亚利安种血统的人。从1935年6月1日起，所有突击队中队长以上的党卫队领袖必须提出本人和妻子双方的祖先中均无犹太人的证明；同年10月1日起，又将这条规定扩大到二级小队长和一级小队长，随后，没有多久进而再扩大到所有党卫队员。

党卫队员，包括希姆莱的白发苍苍的老战友，纷纷出动，花了很长时间翻遍教堂受洗人登记册和大部头的陈古册籍，仔细寻出现在非有不可的东西：“亚利安”家谱。一般队员必须上溯查到1800年，领袖或候补领袖查到1750年。希姆莱一经发现自己队员家谱中有世界敌人犹太人的线索，那就毫不手软，特别对于级别比较低的。谁要是发现自己有犹太人血统，趁早向上级打报告退队，135 否则党卫队法庭就要对其干预和进行裁决，驱逐出队。

不过迫害犹太人的希姆莱对官衔较高的人较为宽恕。一个同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女子结婚、在党卫队档案中以M作代号的某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在表示妻子不再生育和儿子不参加党卫队的情况下，获准留在党卫队里。在往后的年头里，全国领袖对级别越高的罪人就越发宽容。地区总队长瓦尔特·克吕格尔得到了二级突击队中队长M不曾得到的宽大待遇。战争期间，克吕格尔准备把女儿许配嫁给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克林根贝格，这时突然披露了希姆莱记下的这个党卫队女儿的谱系：发现她的“母系亲属中1711年有一个完全犹太血统的祖先”。克林根贝格不得跟克吕格尔的女儿结婚，但克吕格尔的儿子却获准参加了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

只是把六万名党卫队员清洗出去，还不足以保证党卫队得到必要的内部一致。希姆莱知道，党卫队缺少一种使大家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缺少精干的组织、严格的入队条件和一部使队员人人感到有义务遵守的尊严的法典。时至今日，党卫队不能再是一个

组织，它现在应该成为一个集团了。

海因里希·希姆莱已经找到了一个历史样板：耶稣会，他要效法这个样板制定出他的集团计划。已故冲锋队领袖卡尔·恩斯特生前多次嘲笑他是“黑色耶稣会士”，并非偶然；希特勒也将这个党卫队头子称为“我的依纳爵·罗耀拉”<sup>①</sup>。这是因为希姆莱从耶稣会找到了他认为是构成任何一种集团心理状态的核心因素：服从主义、崇拜组织。保安处领袖施伦堡证实，党卫队组织是希姆莱“按照耶稣教团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事实上，这两种势力有其惊人相似之处：它们同样是拥有最大特权的集团，不受任何世俗法治的约束，有严格的入会条件给予保护，通过宣誓绝对地盲目服从统治者：一个统治者名为教皇，另一个统治者称为领袖。这两个组织都有着某些相同的历史偶然现象：耶稣会士十七世纪在巴拉圭的印第安人中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国家，摆脱世俗的无上权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党卫队梦想建立一个独立于大德意志国家之外的党卫队之国，搞一个党卫队的勃艮第<sup>②</sup>邦，拥有自治政府、军队、行政机构和派驻柏林的公使。甚至它们各自的危机也很酷似。耶稣会士在天主教会中一再树敌，同样党卫队也在党内产生敌对者。耶稣教团内部对自己是反宗教改革之剑还是修道院的虔诚工具而争论不休，党卫队内也对党卫队是发展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动力还是政权的当差警察这一问题悬而未决。

136

还有，党卫队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也使人想起是效法教团的样板。耶稣会创建人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给他的教团最

---

<sup>①</sup> 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von Loyola, 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出身西班牙贵族军人家庭，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创立天主教耶稣会，任首任会长。——译者

<sup>②</sup> 查理帝国分裂后，九至十一世纪法兰克王国的大封建领地之一，称勃艮第公国，当时这些领地对法兰克国王几乎完全独立，一切内政国王均无权过问。——译者

高层安了一个会长，四名助手任顾问，组成一种教团政府。希姆莱依样画葫芦，如法炮制了一个党卫队发号施令的中央机构。耶稣会是四名助手辅佐一个教团会长，党卫队集团则设立下列主管处局，以辅佐全国领袖；以旅队长卡尔·沃尔夫为首的首席副官处，这是党卫队最高一级的领导部门，1936年改称“党卫队全国领袖本部”，1939年又升格为处；以地区总队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首的党卫队保安处，这是保安机关的领导机构；以副总指挥兼中央农业部长R·瓦尔特·达里为首的党卫队种族和移民局，它的职责是捍卫所有党卫队员意识形态和种族的纯洁；以旅队长保罗·沙尔费为首的党卫队法庭，负责受理党卫队委托的特别审讯案件，并于1939年建立了一个相应的处；以奥古斯特·海斯迈尔（前任为维特耶）为首的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管理除保安处以外的其他所有党卫队单位。

海斯迈尔的技术管理局后来发展成一个庞大复杂的超级机构，它不仅要管理原有的党卫队（从1934年年中起称为**普通党卫队**，以区别于其他特种单位），还得负责抓**骷髅队**和**特别机动部队**。后来除开这两个武装党卫队组织之外，又将骑师旗队和党卫队所有财政管理机构统统划归海斯迈尔的部门领导，这时技术管理局就进行了改组。

1942年新设立了四个主管处局，其中三个是由海斯迈尔的部门分出来的。规模缩小后的技术管理局改由地区总队长戈特洛勃·伯格尔当局长；新设立的主管处局是：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负责人为地区总队长汉斯·于特纳；主要负责所有党卫队领袖人事问题和普通党卫队任免事项的人事处，处长为地区总队长马克西米利安·冯·赫尔夫；总管党卫队厂矿企业和集中营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处，处长为地区总队长奥斯瓦德·波尔；以及控制全国政治教育单位的“党卫队副总指挥海斯迈尔办公室”。



这些主管处局监督着密如蛛网的各地区总队、区队、旗队、突击大队和突击中队，由这些大大小小的队紧密构成党卫队大军。主管处局必须经常派员视察各党卫队单位的纪律和执行勤务。全国领袖的使节下来视察时，事前均不通知，他们找队长个别谈话，仿佛审讯犯人似地进行盘问，了解队长对规章条例的熟悉程度，检查勤务日志，包括对级别较高的队长在内的人员进行考勤。

“我在视察中发现，”党卫队主管局地区总队长策希批评说，“突击大队长和旗队长几乎毫无例外地很少按规定到部队执勤。”按规定，勤务日志〔应该〕详细反映党卫队队长每天为自己的部队做了哪些工作和取得哪些成绩”，也“完全未按条例的要求书写”。党卫队单位对柏林派来的视察员常常明显表示反感。策希有一次向队内提出的警告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监督一词必须取消。我们的领袖不是去监督我们的突击中队，他们只是来参观参观。”

党卫队头子标新立异，又搞了一个花样：他想针对党卫队内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确定一种标准的党卫队员，即根据希姆莱的意愿作为党卫队固有统一标准的北欧种主宰民族的那种人。种族和移民局（RuSHA）奉命制定新的更严格的吸收党卫队员的条件。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布鲁诺·K·舒尔茨教授博士给种族和移民局种族委员会拟定了一个挑选标准，所有党卫队应征者都要根据这个标准接受审查，以决定取舍。

这位党卫队教授把他的挑选标准分为三部分，即应征对象的种族特征、体态和风度。至于才智秉赋，这个穿髑髅队制服的教授根本不列为挑选的标准。由于希姆莱迷信民族社会主义人口政治学家的神话，设想唯有金发碧眼的北欧种是主宰民族，企图将党卫队中的其他种族逐渐清洗淘汰掉，因此种族和移民局的舒尔茨也将挑选的重点放在北欧种的矮个子上。他的种族表上列有五类：

“纯北欧种”类、“主要为北欧种或弗里斯人”类、由两个种族和谐地混血并“略带阿尔卑斯、狄那里克或地中海种特征”类、主要是奥斯特人种<sup>①</sup>的或阿尔卑斯山人种混血类，以及欧洲种以外的混血类。

符合党卫队应征对象条件的只有前三类。对于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希姆莱来说，即使这样也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了，他声称过几年以后只有金发的人才能担负国家重任，至少一百二十年以后必须使德国人恢复纯种的日耳曼-北欧人外貌。不过种族并非唯一的条件。种族和移民局的舒尔茨教授在提出的九等计分制中，  
138 也要求今后的党卫队员在体态上各部分比例必须匀称。他用这一条来打消全国领袖对“身材虽属高大但长相有些难看的人”的厌恶心理。

希姆莱以科班出身的养鸡家的滑稽可笑的精确性，要求党卫队员决不可以“体态〔不〕匀称，例如小腿和大腿的比例不协调，小腿大腿与上身完全不相称，以致走路时整个身子必然象提水泵那样难看地跳动，必然大大消耗体力，因为不这样就做不来齐步走的动作”。

因此，舒尔茨只挑选达到他的九等计分制中前四等（“理想”、“优”、“良”、“中”）的应征者；七、八、九三等分数的应征者根本不予考虑。只有达到五、六两等分数的，舒尔茨还给予一个机会，这两种人必须的确具有北欧人的风度，借以弥补体态上的“缺陷”。对此希姆莱说：“因此关键就在于他〔应征对象〕既要纪律性好，又不能一副奴才相，他走路的步子，他的两只手，一切都要真正符合我们理想的要求。”

如果应征对象顺利地通过了种族委员会的挑选关，随后就得接受一连串的系统考验和锻炼，这一套又是希姆莱从耶稣会士那

---

<sup>①</sup> 原文是 ostisch，音译为奥斯特人种的；这种人主要居住在西欧山区，身躯矮小，头发呈深色或黑色。——译者

儿抄袭来的。耶稣会规定，新皈依者必须经过两年艰苦修行和磨炼，然后方能进行清贫、忠贞和服从三方面的宣誓，加入经院哲学家的行列；同样，党卫队应征对象也必须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然后才能参加所谓的血族宣誓，获得党卫队员的身分。新皈依党卫队者的具体入队过程，按纳粹通行的节日历法分为：

每年11月9日纪念慕尼黑啤酒馆暴动这一天，十八岁的应征者入队，为预备队员，穿党卫队制服，不戴领章。1月30日（纳粹党取得政权）这一天，预备队员即已转为党卫队新队员，领到一份临时党卫队员证。高潮要到希特勒的生日，即4月20日，这一天举行新队员宣誓，佩戴领章并最后发给党卫队员证。向领袖宣誓。誓词是：

德国领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  
我向你宣誓  
忠诚和勇敢。  
我永远服从你和你所任命的上级领导，  
死而后已。  
谨此宣誓。

宣誓仪式旨在使新入队者感到有一种神秘组织的气氛，将这 139  
个不可思议的领袖同他的黑衫奴仆们联系在一起。最具有魔力的是特别机动队的宣誓；它（不同于普通党卫队）定于每年11月9日夜10时在民族社会主义圣地慕尼黑举行，希特勒亲临现场。希姆莱之友社成员埃米尔·黑尔费里希至今还激动地回忆起“午夜时分在慕尼黑菲尔赫恩纪念堂前的宣誓。一个个棒小伙子，严肃、仪表堂堂、服饰端正。好一支中坚部队。当几千人在火炬照耀下齐声朗读誓词时，我流出了眼泪，仿佛在做祈祷。”

不过，对普通党卫队的新队员来说，考验期还没有完。从宣誓

(4月20日)到参加劳动服役(10月1日)这段时间内,他还必须获得国家体育运动证章和熟读党卫队的问答课本。这种一问一答使新队员进一步深信黑色集团对希特勒的崇拜。

问:“我们为什么相信德国和领袖?”答:“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创造的德国和上帝给我们派来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问:“我们必须首先为谁效忠?”答:“为我国人民和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问:“你为什么会做到服从?”答:“出于内心深处的信念,出于相信德国,相信领袖、运动、党卫队和出于忠诚。”

在这种世界观的熏陶下,新队员经过劳动服役和军队生活,结束了后补期,最后以新的面貌回到党卫队,作为党卫队正式新队员。如果军队的评语良好,那么他在一个月之内即可正式被接受进入这个集团。日期又是定在11月9日:整个入队过程到此结束。不过,正式新队员还得宣一次誓,这次是为他自己和自己未来的家庭宣誓,遵守党卫队全国领袖1931年12月31日颁发的婚姻令,这项命令规定,所有党卫队成员必须“完全着眼于种族和世代健康”、只有经种族和移民局或希姆莱批准,才能结婚。

宣誓后的集团青年成员被授予党卫队短剑,从此就属于一个神秘的、外人无法了解其内幕的圈子里的人了;在这个圈子里,宗派狂热主义、封建主义生活习惯和浪漫主义的日耳曼崇拜,同现代政治经济手腕和最冷酷无情的权术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现在,希姆莱规划的将党卫队信徒教育成主宰民族的关键性节目开始了:建立一种团结精神。这种精神显然是普鲁士军官等级崇拜的翻版。希姆莱的每一项命令,有关勤务活动的每一点细小指示,都启发党卫队队员意识到自己是中坚,旨在使党卫队不同于党的其他组织。希姆莱给他的集团灌输一种模仿中世纪骑士团的独特的荣誉感。

党卫队法官沙尔费就党卫队即使在党内也与众不同的道理，作了这样的阐述：“党卫队员同一般党员相比当然地位特殊，尤其是因为他的任务在于保卫运动和领袖，必要时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特殊地位……不言而喻要求给予党卫队员以特殊对待。”为此沙尔费提出，国家法庭和党的法庭均无权对一个党卫队员作出判决——只有党卫队的法官和上级有权作出判决。

一种特别审判权产生了，它使保安处、特别行动部队、骷髅队、士官学校和实际上所有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以上的党卫队领袖，均不受世俗法律的约束。几百年来的欧洲法律史不复存在：党卫队员有其固有的荣誉，由他自己来保卫这种荣誉。被授与的短剑变成了秘密帮派特有的荣誉象征。罗姆事件使党卫队摆脱了冲锋队队内法庭裁决程序的束缚，希姆莱在1935年11月规定：“每个党卫队员有权利也有义务用武器保卫自己的荣誉。”决斗——贵族阶级骄矜自负的这具僵尸复活了。

从此，每个党卫队员均可报经全国领袖同意后找人决斗。在—项命令中，希姆莱以素有的高年级教师般的细心确定了进行决斗的办法。他规定，党卫队员受到侮辱后“必须在三至二十四小时内采取明确的步骤，提出要求对方解释并赔礼道歉”，但“星期天和节日不计算在内”。如拒绝赔礼道歉，则他应向对方“宣布他将委派代表（下战书的人）提出交涉并通知下一步措施”。下战书的人应“尽可能与施加侮辱者的官阶相等”，“原则上应穿制服”出场，代表委托人通知对方决斗并商定使用何种武器。“只有特殊情况才可以”由下战书的人用书面形式办理交涉，而且必须“一概用挂号信邮寄”。

希姆莱有时允许采用自杀手段，也作为他设想中的党卫队固有的荣誉。由于虐待下级被判处死刑的二级突击队中队长约翰内斯·布赫霍尔德一事生动地表明，希姆莱也在这方面欢喜繁文缛

节和装腔作势的一套形式。

“我通知……布赫霍尔德，”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布莱尔于1943年6月22日写道，“党卫队全国领袖指示：去牢房送给他一支手枪，给他六个钟头，让他有机会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自裁。奉此，我交给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布赫霍尔德一支零点八厘米口径的手枪，内装一粒子弹，顶上火，打开保险，然后我就走了。”  
141 这个死到临头的人还得书面表示受领全国领袖的恩典：“我承认并签字同意上述审讯记录属实。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布赫霍尔德。”全国领袖发布的下一条消息是：“尸体着即交给家属。布赫霍尔德以死偿罪，其家属按阵亡人员抚恤。”

但是在希姆莱看来，让所有党卫队都享受特权的作法，必然会  
给纪律和秩序造成危害：平均主义泛滥成灾。以前仅限于普鲁士  
军官享有的等级荣誉，党卫队也扩大到了最低的级别。针对这样  
一种虚假的民主化，希姆莱不得不在党卫队内更加强等级制度。

全国领袖在党卫队这个集体单位里划上一条界线，把集团教士和高级教士同杂役僧侣区别开来。希姆莱学习自己视为洪水猛兽的共济会员，通过颁发重要的勋章和官阶，以增强一个集团等级制的力量和神秘性。跟共济会不同，希姆莱黑色集团的勋章分为三种。

对表现良好的党卫队员，不论其属于何种级别，他设计了一种  
镌有精巧的党卫队骷髅标志的银指环。最初这种骷髅指环准备发  
给老战士，只给队员证第10000号以内的党卫队员。但实际上得  
到这种指环的人越来越多；到1939年，所有任队长满三年的党卫  
队领袖几乎人手一枚。

第二种是党卫队领袖团佩带的荣誉剑，它成了新德意志骑士团最重要的装饰品之一。希姆莱对这种荣誉剑掌握较严，只授予三级突击队中队长以上的党卫队成员，也没有（象骷髅指环那

样)明文规定颁发办法,而是完全随全国领袖的意愿和恩宠,想给谁就给谁。只有党卫队的贵族骑士侍从、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在修业期满考试及格后可以自动得到。谁有希姆莱的荣誉剑,就表明谁是这个骑士团首领特权集团的成员。级别越高,得剑的人数越多:到战争结束时,六百二十一名旗队长中获得荣誉剑的有三百六十二人,二百七十六名区队长中有二百三十人,九十六名地区总队长中有八十八人,九十二名副总指挥中有九十一人,四名总指挥个个都有。

可是,信仰神秘教义的希姆莱,对这种细针密缕的等级差别还嫌不足。作为历史浪漫主义者的希姆莱,从自己的神话故事集中看到,克尔特族的阿塔尔王(公元500年)同十二名最勇敢和最显贵的骑士围坐在一张圆桌上,与他们为保卫克尔特人的信仰和自由团结在一起,同入侵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作战。这也是值得党卫队学习的,阿塔尔王的神话必定给这个党卫队头子以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的座上客一直限于十二名。而且象阿塔尔王挑选十二个最勇敢的骑士一样,这位海因里希王<sup>①</sup>也指定十二名最得力的副总指挥,作为他集团等级中最高一级的领导。

对于这十二名出类拔萃的人物,希姆莱又想出了一种殊为不同的标志。慕尼黑党卫队负责主管艺术问题的卡尔·迪比契教授,于1937年奉全国领袖指示为最重要的党卫队领袖设计徽章。但是教授还没有来得及以科学性的细致精神将党卫队头子的命令付诸执行,希姆莱又另搞了一套花样:一个主要从事发掘日耳曼人古物器皿的“遗传研究所”。这个机构派人四处寻觅,为徽章设计者迪比契搜集血统学资料。1937年7月17日,出类拔萃者之一的地区总队长波尔听遗传研究所介绍说:“我们的研究从日耳曼人

---

<sup>①</sup> 指希姆莱。——译者

的原始徽章即家族的标记开始，它是日耳曼血族和先人的象征。为了能够跟古日耳曼血族的标记联系起来，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工作。”

党卫队头子在韦韦尔斯城堡找到了一所昭忠祠，他可以在这里大摆他的阿塔尔王宴席，并给他的骑士徽章添上一层光荣的历史背景。在希姆莱陈放圣盘的城堡中，十二名出类拔萃者聚在一间三十五米长十五米宽的餐厅里，同全国领袖围着一张橡木桌同坐，椅子是猪皮面高背沙发，各系有一块小银牌，注明党卫队骑士各自的姓名。他们定期来这里沉思反省和举行会议，与招魂者的聚会几乎是一模一样。在这所城堡里，他们每人都有一间房间，分别布置成特定历史时期的风格并各自选定一个历史人物命名之。

这所城堡的主人，按军备部长艾伯特·斯佩尔的说法，是个“半迂腐半疯癫的傻瓜”，他居然早就想到了骑士们的后事。餐厅下面有一个就天然彩色岩石凿成的拱形顶地下室，由一堵一米八十公分厚的墙同外界完全隔绝。这里就是集团的至圣所：祭坛、冥府。

地下室正中央有一个象井眼似的圆坑，向下走两级当中是一个石盆，地下室四周靠墙边排列十二个石墩。石盆用来焚化死去的副总指挥的徽章，盛有徽章灰的骨灰盒就陈放在一个石墩上。地下室顶部有四个拳头大的洞眼，举行火化仪式时，空气从四个洞眼流入地下室，使烟袅袅上升，象一根笔直竖立的柱子。

143 希姆莱有心和他的副总指挥们在韦韦尔斯城堡里锤炼这一集团在意识形态上的武器。这是一个理想的地方：韦韦尔斯堡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唯一制高点要塞，离帕德博恩不远，以它过去的主人之一强盗骑士韦韦尔·冯·比隆命名。这座当年供帕德博恩主教们避难用的城堡，高高耸立（今天亦复如此）在山梁间的一堵悬崖之上，下临阿尔默小河，附近是韦韦尔斯堡村。它最初原为匈奴人



时代修筑的萨克森防御城堡，十七世纪改建成三角形，一座灰色的庞然大物突出在大自然的景色里。对热衷于厚古薄今的希姆莱来说，除此再也找不到更理想的地方了。

据碑史记载，有一次希姆莱听人预言，说唯有威斯特伐利亚的某处城堡能够抵挡住下一次来自东方的狂飚，于是便派人四处寻找要塞据点，最后终于发现了韦韦尔斯堡。实际上事情并没有这么复杂：以保护这座城堡为其职守之一的比隆县县长，乐得把这所老古董让给城堡迷的党卫队头子。1934年7月27日，党卫队以每年付一个马克地租税的代价，将城堡据为己有，随后希姆莱通知中央经济部长施密特：“我拟将韦韦尔斯城堡……扩建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学校，并提请由国家尽可能拨给大量扩建补助费。”

在此以前，浪漫主义者希姆莱找到了位于西普鲁士的马里安堡，它曾经是德意志骑士团最高首领计划统治斯拉夫人的所在地，最著名的人物死后就在城堡教堂唱诗班的乐声中在这里下葬。希姆莱视党卫队为第二个德意志骑士团，也计划将韦韦尔斯堡建成一个精神中心，建成新集团的圣地。

希姆莱在他的总部设立了一个“韦韦尔斯堡办公室”，由旗队长、1937年任城堡长官的西格弗里德·陶贝特负责。党卫队建筑师赫尔曼·巴特尔斯制定了扩建计划，以期实现耶稣会士约翰·霍里恩早在十七世纪初就曾为之讴歌的心愿：

你看那韦韦尔斯堡，  
耸立在坚实的崖颠，  
直上云霄，  
巍峨挺拔。  
如果你相信传说的话，  
它是匈奴人当年兴建，

虽已几易其主，  
终于听凭你的支配；  
而今是名堡一座，你当之无愧……

144 一个义务劳动服役队和一个党卫队专家班子负责希姆莱城堡的基建工程。在三角形要塞的南楼上布置了全国领袖的专用房间，包括一间陈列他所收藏的各种武器的大厅，和一个藏有一万二千册各种图书的书斋。旁边是会议室和党卫队最高法院专用的审判厅。用作希特勒的客房也安排在这里，不过他从来未光临过城堡——村里却流传谣言，说百年后的阿道夫·希特勒要送到韦韦尔斯堡安葬。

截至战争结束为止，希姆莱为城堡先后花了一千三百万马克，他的幽灵在这么一座城堡里游荡，决不只是为了在历史上搞点骗人的花招而已。他感到，历史——或者说这个党卫队头子认为是历史的东西——可以成为党卫队的一把意识形态的钳子，成为党卫队的一台世界观发动机。韦韦尔斯堡并不是希姆莱用来跟党卫队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一堵墙垣。“我的目的是，”希姆莱在1937年说，“尽可能在每个旗队范围内都搞这样一个体现德意志伟大和德意志历史的文化中心，将它好好加以修缮并使之保持同一个文明国家人民相称的面貌。”

1936年，他组织了一个保护历史建筑的“发掘和保护德意志文物协会”，不过它只是保护那些党卫队空想家们关切的时代，即日耳曼人古代、中古初期的非基督教时代和在德意志骑士团统治下向东方进行德意志殖民的时代的文献。本着党卫队反基督教和反斯拉夫人的世界观，希姆莱的文物协会有意识地保护德意志骑士团的古老城堡或阿勒河河畔费尔登的萨克森森林——这是一处纪念地，公元782年查理大帝（希姆莱所说的“法兰克人查理”）在这里

屠杀了四千五百个不信教的萨克森人。

希姆莱说：“我们喜欢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在世界观和政治斗争中有着极为巨大的重要性。”将历史浪漫主义、日耳曼主义和非基督教教义三者作为由各个社会阶层人员所组成的党卫队的一体化因素——这就是希姆莱创办的这个基金会以及其他基金会的宗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亨利一世纪念基金会，因为萨克森王朝的德意志国王和斯拉夫人征服者亨利一世（876年至936年），是敌视波兰的希姆莱所狂热崇拜的偶像。

1936年7月2日适逢亨利一世逝世一千周年。这一天，活人希姆莱在奎德林堡大教堂亨利一世陵墓（当时还是空陵）前向死者宣誓，决心继续进行并完成萨克森王朝的东方使命事业。第二年，他举办隆重的奉安典礼，将亨利一世遗骸送进大教堂。希姆莱指示，亨利陵墓是“供我们德国人晋谒以纪念亨利国王的圣地”。每年国王忌辰之日，全国领袖都要专程前去同另一个海因里希<sup>①</sup>进行无声的对话——站在大教堂阴森森的地下室里，等候敲响午夜12点的洪亮钟声。

希姆莱不放弃任何机会，把自己同这个威名显赫的死人联系起来。他吹嘘自己有用咒语召鬼神并定期同鬼神会晤的本领；不过据他向知交克尔斯滕透露，召来的鬼神都是已离人世百年之久的人物的精灵。希姆莱说，每当他睡意朦胧之时，已故的亨利国王就来找他，给他出谋献策。希姆莱常常话不离题地说：“要是亨利一世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就会采取如下的做法。”他对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太热衷了，渐渐地竟把自己看成是亨利国王的化身。

神秘主义发展到如此地步，决不是出于盲目热爱历史。迷恋过去，其目的是给党卫队集团灌输一种奉天承运的精神，赋予一种

---

<sup>①</sup> 即指亨利一世，亨利系海因里希（Heinrich）的旧译，希姆莱名海因里希，故称亨利一世为另一个海因里希。——译者

历史注定的依据，借以证明所有党卫队员都是日耳曼贵族连绵不断的链条上新铸就的环节。希姆莱的“党卫队核心论”提出，党卫队的前进目标是“成为具有北欧人种血统的人的民族社会主义集团及其血族精诚团结不容改变的法则”。希姆莱说：“我们不想只是做善于战斗的后裔，而是更要做使德意志日耳曼民族亿万斯年永恒不泯所需的后辈的先人。”

崇拜先人和崇拜日耳曼，显然是希姆莱灌输给党卫队，用以代替它本身所缺少的思想团结的东西。尽管这伙秘密帮派故作姿态地仿效教团的神秘教义，也无法掩饰党卫队缺少一个集团有别于其周围环境的一点：天衣无缝的教义。

就世界观的根本信条而言，党卫队除了重复其他纳粹组织的主张以外，再也提不出新的内容：五体投地地信仰希特勒、过分膨胀的民族主义，加上种族主义的狂热思想。党卫队并无不同于纳粹党其他组织的任何信条。希姆莱和达里这两个阿尔塔曼分子虽然给党卫队注入了一些独特的农民移民政策思想，但这些由种族和移民局作为目标列入计划的信条（直到1940年）只不过是点缀品。农民移民的主张早已证明是反动的江湖医生的空想，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现实社会中的匆匆过客——即使在第三帝国，自由农民的地位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不，党卫队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独特思想意识。种族和移民局负责抓训练的头头们一再抱怨特别机动部队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普通党卫队看到种族和移民局的人员也不搭理。在党卫队的集体活动中，学习会属于参加人数最少的一种。据地区总队长策希报告，党卫队领袖也常常把出席国防军啤酒晚会，看得比参加党卫队学习班更为重要。党卫队训练办公室主任旗队长凯撒博士在1939年1月叫苦说，党卫队员几乎再也不把种族政治课放在心上了。凯撒说：“队员中渐渐地公开表示对这些课题厌倦，因此增

加了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学习内容。”然而，这个方法也“未达到要求”。

此后，种族和移民局的训练工作划归中央技术管理局负责，从此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处于低调，取代世界观的是“越来越侧重于历史方面的题材”（凯撒语）。意识形态化的、枯燥无味的历史伪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代用品，填补了党卫队无法用自己的思想弥补的空白。

空想家希姆莱还借助历史，编排出一种古怪的、伪造的日耳曼民族习俗，这也是他企图用来增强党卫队团结精神的东西。党卫队必须以一种彻底的新型的非基督教教义，使自己得以独树一帜。这个身穿全国领袖制服的学究决心干预党卫队员最普通的个人事情：爱情、家庭和宗教都要首先经过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审查，因为对他来说，党卫队不是一个帮派集团，而是一个“日耳曼血族集团”。

他在1936年的一份记录中就提到，“要求党卫队员尽可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时结婚和建立家庭”。每个党卫队员必须宣誓遵守1931年全国领袖发布的婚姻令，这项命令使希姆莱能够用否决权对不受欢迎的党卫队员的未婚妻予以否定。

党卫队员必须和未婚妻填写一份种族和移民局的调查表，经一名党卫队大夫检查身体完全健康，提出亚利安种的谱系证明，并缴纳本人及未婚妻身穿浴衣的照片；然后由种族和移民局决定申请结婚的双方是否有资格列入党卫队的“血族簿”。如系党卫队领袖则由希姆莱亲自决定。

婚礼也被蒙上党卫队标记的阴影。教堂婚礼被严格取缔，代之以男女双方亲属小范围内的“结婚仪式”；这种仪式在办好结婚登记手续后举行，由当地党卫队队长主持，新郎新娘当场交换戒指，接受党卫队送给的面包和盐。希姆莱加给夫妇的一切规定，都

147 是旨在促使集团成员脱离基督教会。党卫队队员要想当头头，就必须脱离教会和承认“相信神”，这样，牧师神父也不参加洗礼和葬礼。

地方党卫队领袖代替了牧师神父。洗礼改为由全国领袖馈赠礼物，礼物等级分得很细，都是慕尼黑附近阿拉赫党卫队专用磁器厂车间的产品：生第一个孩子送一只银杯、一把银汤匙和一方蓝绸巾，生第四个孩子送一具银烛台，上面镌有这一字句：“你是永恒血族链上的一环。”

只有在德国人最高兴的圣诞节临近时刻，日耳曼人领袖希姆莱便陷入了理论上的困难境地。1936年，他大骂道：“我们要采取措施……防止已经多次成为危及德国人民生存的欢乐钻进我们的队伍。”但是党卫队员的妻子在圣诞节临近时，渴望着基督教的节日气氛。希姆莱提出要以古代日耳曼人的中冬节<sup>①</sup>取代圣诞节。每年阿拉赫磁器厂生产出大批“中冬节烛台”和“中冬节盘子”，供应党卫队员家庭。希姆莱异想天开地说：“这些太太们由于失去了教会的神话，正需要有点别的什么东西来满足自己和孩子们的要求，才能高兴起来。”

为了圣诞节在世界观上花尽力气，绞尽脑汁，这说明即使在党卫队内，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也多么难于做到一致。希姆莱的非基督教新生活习惯，实际上大半只是纸上谈兵。单就宣誓遵守的婚姻令来说就大成问题，有些党卫队员对此不加理睬。1937年，有三百零七名党卫队成员因违反希姆莱这项指令而被开除出队。党卫队内不满情绪年复一年地增长，迫使希姆莱一再放宽违反婚姻令的处分条例。最初，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1935年7月3日的一项命令规定，凡蓄意无视婚姻令者均予开除出党卫队。但从1937

---

<sup>①</sup> 古代日耳曼人的中冬节后来与基督教的圣诞节互相融合；在北欧、英国和北德有其特有的习俗。——译者

年6月23日起改为：党卫队员可以不作为违反命令而开除出队，如果查明该队员及其妻子符合有关种族条例规定的話。1940年11月1日希姆莱又指示，所有因违反婚姻令被开除或驱逐出队的党卫队员均可重新参加集团，只要他们符合种族条例。

希姆莱敌视教会的纲领也始终未能贯彻执行。普通党卫队中三分之二的人仍然是教徒；百分之五十四点二信仰新教，百分之二十三点七信仰天主教。只有武装党卫队单位暂时还是希姆莱的信徒占多数：特别机动部队中的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三点六，骷髅队中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九。但战争也迫使武装党卫队中的希姆莱信徒退居守势。党卫队部队中出现了零星活动的天主教随军教士，148 允许日耳曼族信徒自愿进教堂，例如在副总指挥比特里希所属的一些单位，甚至允许教会来办公室劝说人们参加礼拜和祈祷活动。

血统神秘论者希姆莱尤其失望的是，党卫队员的妻子对生儿育女缺乏兴趣。党卫队员家庭跟周围的普通人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同希姆莱宣布的一家有四个孩子的制度相反，1939年12月31日统计数字说明，十一万五千六百五十名已婚党卫队队员平均每对夫妇生孩子一点一个，其中党卫队领袖每对夫妇平均生孩子一点四一个。希姆莱在1936年创办了一个幼育协会，取名“生命之源”，附设有不对外公开和费用便宜的妇产科医院，但也未能提高党卫队队员的生育率。虽然所有三千五百名中央主管处局的党卫队领袖规定必须入会，并缴纳他们薪金的一部分（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生命之源协会在1939年仍只有八千名党卫队会员——总共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九名普通党卫队成员中只有八千人。

生命之源协会主要吸引人的地方是：没有结婚的母亲也可以在它附设的妇产科医院里生孩子。该协会干事长埃布纳博士吹嘘说：“生命之源协会确是适合于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分娩的唯一团体。”为此，全国领袖“命令每一个党卫队员保护血统纯正的怀孕的

母亲”。但即使如此明确地暗示出，为了“血统纯正”可以破除一切民间习俗框框，多数党卫队队员还是充耳不闻。在二十岁至五十岁的已婚党卫队领袖的一万二千零八十一个孩子中，只有一百三十五个非婚生子。

显然，党卫队五花八门的面貌并未因希姆莱培植的新日耳曼人生活习俗而一致化。仇视教会的宣传使党卫队内部得不偿失：这种宣传吓得许多人不敢加入党卫队。贵族们已经开始离开党卫队，重新投奔自己传统地盘的国防军，赞助队员的捐款已由五十八万一千马克（1934年）减到四十万马克（1936年）。党卫队司库波尔证实：“赞助队员机构……高潮已经过去。”

中央主管处局的领袖也越来越多地离开党卫队，1938年一年就走掉四十四名。“一大危险是主管处局的领袖转入工业，”党卫队人事处长施密特1938年12月31日证实，并说走掉的都是“我们最优秀的领袖”。特别是多瑙地区，许多领袖只是利用机会“在党卫队内任职一时，作为跳板进入工业界……捞取收入更优厚的位子”。

149 此外，人事处还列出了一份统计数字表上报希姆莱：他在短时间内必须撤换二百七十三名不称职的中级领袖（旗队长和突击大队长、各区本部头头、本部负责专家）和补充新的人手。人事处提出：“在五百一十三名担任最重要的职务的主管处局领袖中，根据估计只有一百二十八人（百分之二十六）完全适合现任职务和适于担任较高级职务。”

但是，对黑色集团的首领来说，这确是一个大难题，他始终无法加以解决：党卫队这个帝国的组织愈来愈庞大和领袖团人手不足，不断要求增加人员，可是发展工作已经变得困难起来，它迫使希姆莱部分录用根本不符合党卫队北欧种血统理想要求的人。

不过党卫队尽管胡搞乱七八糟的日耳曼崇拜，仍然有着精神上的诱惑力，即使要求苛刻的人也经不起这种诱惑，要不是这个原



因，党卫队的发展工作是要陷入绝境的。这就是说，党卫队有一个唯一不同于它的周围世界和党的特点：独特的生活作风。真正的党卫队员并非决定于希姆莱的怪诞命令中所说的信仰坚定或民族社会主义的狂热，而是决定于“一种义务，这种义务不象党那样着眼于政治目的，而是着眼于不屈不挠的性格”——前中央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这样说。

由此可以再次看出，党卫队同前自由团的心理状态一脉相承。自由团首屈一指的作家恩斯特·约恩格曾经写道：“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而斗争，而是我们怎样进行斗争。”他的一个弟子、后来任秘密警察法官兼党卫队副总指挥的瓦尔纳·贝斯特博士，从约恩格这种亡命之徒的哲学中，阐明了一种决定党卫队领袖的精神概貌的思想，即“英雄现实主义”的思想。贝斯特在1930年指出：“斗争是绝对的、永恒的，斗争的目标则是由时间决定，并可以改变的。因此斗争的成果也可以不是决定性的东西……所以说检验道德的标准不是内容，不是一种什么东西，而是一种怎样的东西，而是形式。”

这样一种不择手段的伦理学，给极度集中于提高效率开了方便之门，而它也就构成了党卫队心理状态的核心，并被希姆莱绝妙地表达为：“‘不可能’这个词永远不许在我们队伍中出现。”依历史学家汉斯·布赫海姆之见，“崇拜为效率而效率”也迷惑了那些原来对希姆莱集团的英雄侈谈抱有反感的非纳粹分子。但效率和事业心的号召，不断地要求全力以赴和作出成绩，促使集团成员投入一场原始人式的角逐竞争，这种竞争使他们将一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置诸脑后。

诚然，约恩格的弟子贝斯特在1930年还相信“健康的斗争”，并至少相信一种“英雄的道德”；他的斗士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物，正直的主观主义者，只对自己负责。但是党卫队的英雄斗士从上

面得到命令,并成为一种不择手段的伦理学的俘虏,这种伦理学突然也把出于所谓国家政治需要而犯下的罪行,解释为只是人类工艺学效率的对象。“谁不关心自己为什么而斗争而只是关心怎样进行斗争,谁就会特别积极地时而也为犯罪的目的英勇地进行战斗,”布赫海姆评论说。“当英雄斗士幻想完全依靠自己不需要外援时,他……必定要为极权主义支配欲效劳——对此,他根本不会发现,或者发现时已经太晚了。”

瓦尔纳·贝斯特的情况正是如此。当他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身边着手扩建第三帝国的警察和恐怖机器时,英雄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垮台了。因为党卫队早已开始将领袖专政的最有效的工具抓在自己手里。

#### 党卫队级别表(对照陆军)

党卫队员	(列兵)
突击队员	(二等兵)
组长	(一等兵)
三级小队副	(二级下士)
三级小队长	(一级下士)
二级小队长	(中士)
一级小队长	(上士)
三级突击队中队长	(少尉)
二级突击队中队长	(中尉)
一级突击队中队长	(上尉)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	(少校)
一级突击队大队长	(中校)
旗队长	(上校)
区队长	(上校)
旅队长	(少将)
地区总队长	(中将)
副总指挥	(上将)
总指挥	(大将)

## 第八章 海德里希和秘密警察

151

1932年夏季，纳粹党哈雷-梅泽堡区领袖鲁道夫·约尔丹叫纳粹党全国指导处吓了一跳。这位区领袖感到凶祸临头：他已得悉，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身边睡着一名世界犹太敌人的游击队员。

“我听说，”约尔丹在1932年6月6日致纳粹党全国组织部负责人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信中写道，“据我所知，全国指导处里有一个姓海德里希的党员同志，他的父亲住在哈雷。有理由推测，这个住在哈雷的名叫布鲁诺·海德里希的父亲是犹太人……由人事部门对此事进行一次审查也许是恰当的。”区领袖的来信还附有从胡戈·里曼编的《音乐辞典》<sup>①</sup>中摘录的一段释文，慕尼黑接到报警的党员同志们读到：“海德里希，布鲁诺，原名**苏斯**，1865年2月23日生于萨克森的洛伊本。”

施特拉塞调来人事档案，果然看到，确有一个名叫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从1931年10月1日以来待在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的高级指导处里，主管一个小小的但神秘的号称“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的机构。难道海因里希·希姆莱会将最狂热的反犹主义党的保安工作，恰恰委托给一个犹太人吗？

组织部负责人施特拉塞动员声望最高的党内谱系专家阿希姆·格尔克博士，去搞清楚这个嫌疑分子的出身世系。博士花了

---

<sup>①</sup> 胡戈·里曼(Hugo Riemann, 1849—1919)，德国音乐学家，曾任国立音乐学研究所所长，《音乐辞典》初版于1882年，是音乐史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苏斯(Süß)为有代表性的犹太人姓名，取材于苏斯-奥本海默(名犹太人苏斯，1692—1738)的故事，曾出现在德国舞台上和文学作品中。——译者

两星期时间，然后将调查结果写成一份“关于退役海军中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种族出身的鉴定报告”。结论是：“从附上的家世表看出，中尉……海德里希系德裔出身，并无有色或犹太人混血……整个报告均以经过查证属实的文件为依据。”

格尔克在1932年6月22日解释说，之所以产生海德里希系犹太人出身的谣传，是因为“海德里希中尉的祖母埃内斯蒂纳·威廉明尼·海德里希(父姓林德纳)曾经再嫁给钳工助手古斯塔夫·罗伯特·苏斯，她和前夫赖因霍尔德·海德里希生有一大串孩子，常常管自己叫苏斯-海德里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钳工助手苏斯也不是犹太人”。

152 格尔克振振有词地说：“布鲁诺·海德里希的母亲再嫁导致了错误的假设，这个假设由于1916年‘里曼编的音乐家辞典’的注释‘海德里希，原名苏斯’而传播开来。后来，这本辞典再版时，删去了这条错误的注释，而且是应海德里希家族的要求删去的。”

谱系专家认为，就此海德里希事件已获得澄清。实际上它刚刚才开了个头，因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纳粹特权阶级的梯子上爬得愈高，并且变成第三帝国“年轻的、凶恶的死神”(瑞士人布克哈特语)，关于党卫队第二号人物出身犹太人的这个谣传就愈是紧紧缠住他不放。

在希特勒政权完蛋后，同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们差不多都津津有味地继续谈论党卫队保安处头子的这个所谓天生的种族出身缺点，而且人人几乎都能对海德里希非亚利安人这个话题，增添一点新的细节。前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一度担任过国外保安处副组长的威廉·赫特尔博士说，海德里希在三十年代中期曾经三次同公开声称他是非亚利安人的德国人进行过民事诉讼，三次都打赢了官司，于是叫人销毁了所有说明他出身不纯的材料，其中也包括他那犹太祖母扎拉·海德里希在莱比锡公墓的墓碑。

希姆莱当年的保健医生费利克斯·克尔斯滕记述说，希特勒在取得政权后不久知道了海德里希出身的真实情况，但表示同意让保安处头子留任。而党卫队副总指挥威廉·施图卡特博士则记得，他听部务司长黑林说过，海德里希“曾经被视为犹太人或部分犹太人”。在这批著名的知情者中间，当然少不了谍报局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柏林钢琴家、前谍报局工作人员赫尔穆特·毛雷尔，在1940年还曾设法向哈雷户籍管理局搞到关于海德里希家世有问题的材料，好让卡纳里斯用来对竞争对手海德里希施加压力，并保护谍报局不受保安处的攻击。

但是几乎谁也没有注意，这些知情者之间往往是存在矛盾的，谍报局的毛雷尔找到的有问题的材料，按照赫特尔的说法早已被海德里希销毁掉了；赫特尔坚持认为，据他推测海德里希“非亚利安人”根源在于母系方面，但是毛雷尔却硬说在于父系方面。至于谍报局长已经利用海德里希出身的证明材料对其施加过压力，卡纳里斯传记作者卡尔·海因茨·阿布斯哈根认为，对于这种论断用“以下事实即可驳倒：接近卡纳里斯的人确证，他一直害怕海德里希，听到……〔海德里希〕1942年5月殒命消息，才舒了一口气”。

到了五十年代，格尔克博士殚心竭力查考的材料也公开了，这时所谓犹太人海德里希这套五花八门拼凑的理论又崩脱了一块宝石。显而易见，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名叫扎拉·海德里希的女人。可是理论家们仍不灰心丧气。当年的纽伦堡检察官罗伯特·肯普纳提出一种看法，即纳粹格尔克的谱系表根本不说明问题，因为它“显然同希特勒和希姆莱预先作出庇护海德里希的决定是一致的”。

肯普纳没有看到，格尔克的鉴定报告写于1932年6月，而根据克尔斯滕所述，希特勒的决定最早作于1933年3月，差不多要晚了一年。英国的海德里希传记作者查尔斯·怀顿，指出了一条走出死胡同的最后出路。他推测格尔克根本没有追查海德里希祖

母的母亲及其祖先，而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个女人“如果不是犹太人，至少也有犹太血统”。

以色列年轻历史学家什洛莫·阿伦森连这种论点也不同意。他认为怀顿“没有理解这份鉴定报告的整个精神。他忽视了母系根本不……存在问题。因为纳粹认为母系方面‘清清白白’，鉴定报告只是谈父系方面，而父系‘种族纯正性’也查证属实了”。阿伦森是博士学位应试人员，1966年夏完成了博士论文“海德里希和秘密警察及保安处的崛起”，他必定掌握了这一点。他排出了海德里希的先人表，父系上溯至1738年，母系上溯至1688年，并未发现有任何犹太血统。

有些历史学家过去和现在都以一种奇特的顽固性，揪住这个犹太人课题死死不放，甚至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这反映了一种要求，即要揭露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北欧主宰民族假面具下掩盖得很巧妙的一种秘密，一种畸形心理状态，一个无法消灭的缺点，它以宛如催眠术般的作用确凿地证明，希姆莱最重要的伙伴和保安警察头子是纳粹国家学说的最残暴的维护者，是如同英国人吉拉德·莱特林格所说的“一切种族主义者中最狂热的分子”。

无论如何，在这个必会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的人物身上，在这个“历史上罪恶滔天的人物”（米夏埃尔·弗罗因德语）身上，定然存在着一种内心的分裂。而看来尤为可信的是，作为判断分裂之处就在于那个所谓的出身的缺点上，对于一个纳粹分子来说，这种缺点是自杀性的，无异于罪该万死。因而历史学家莱特林格也迅即认为，海德里希是受一种“病态的、犹太人自己憎恨自己血统的仇恨”所支配的，他感到这种仇恨给他提供了了解所谓狂热分子海德里希的钥匙；而特莱西恩施塔特<sup>①</sup>编年史作者H·G·阿德勒也推断道，

---

<sup>①</sup> 特莱西恩施塔特是捷克北部小城市，现名特雷津，希特勒统治时期在此地曾设犹太人隔离区。——译者

第三帝国给“海德里希〔提供了〕无限制的权力，通过屠杀一切得以屠杀的犹太人……来消灭自己身上的可恨的犹太病菌”。

即使希姆莱也在自己所信赖的人物圈子里散布，海德里希本来是“一个可怜的人，内心世界完全分裂，象混血儿中习见的情况一样”。国际联盟专员卡尔·J·布克哈特也有同感；他惊奇地发现，海德里希的脸庞是由迥然相异的两个半边面孔拼起来的：“我心里想，同时有两个人在打量着我。”

布克哈特也记下了党卫队员们向他谈到的关于海德里希的情况。有一天，保安处头子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地踏进他那灯光照得如同白昼的浴室，对着一面大壁镜里自己的影像走去。他霍地从枪套里拔出手枪，向自己的影像砰砰开了两枪，并叫道：“我叫你完蛋，流氓！”这位瑞士人评论道：“他枪击的是另外一个人，他这个两面人，击中了他另外半边面孔的那个人，但只是在碎裂的玻璃镜子里，他并没有因此而摆脱他，并注定要最后和他同归于尽。”

可是，尽管传记作家们不厌其详、一点一点地拼凑这头“金发野兽”——党卫队中有时也这样叫海德里希——的完整形象，最后却往往仍然逃不了先哲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sup>①</sup>的一句老话：你可以和一个人频繁交往，但到头来还是不了解这个人。因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不是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圣茹斯特<sup>②</sup>，他并不是种族主义狂热分子，在他的身上也找不到象历史学家弗罗因德所臆想的“魔鬼式的思想罪犯”的影子。

无疑，历史诱使人们把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两个搭档，同法国

---

<sup>①</sup> 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 Georg Christoph, 1742—1799)，德国物理学家和文学家。——译者

<sup>②</sup> 圣茹斯特(Saint-Just, Antoine de, 1767—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领袖之一，罗伯斯比尔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雅各宾专政时期任公安委员会委员。——译者

革命的恐怖分子二重奏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sup>①</sup>和安都昂·圣茹斯特相提并论。在罪行方面，党卫队保安处头子比他的法国楷模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善于摒弃空论家和革命狂热主义者圣茹斯特那种令人厌恶的理想主义。反之，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身上，集中了两种二十世纪的、诚然打上了过激主义烙印的典型因素：观念论者和工艺学家。尽管他们一向乞灵于历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歪曲历史——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始终是逆历史而行的人物，无根无源，是传统和一切伦理-人道准则的激进否定者。

海德里希的上帝就是为取得权力的权力，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最赤裸裸的政治手腕工艺学，体现了海德里希以此获得“怀疑一切”的绰号的那种统治者的多疑。可是他没有将一个圣茹斯特还和那些死在其断头台上的人联在一起的仇恨；海德里希并不厌恶犹太人，对于他，犹太人只不过是有计划的技术行动的对象，只不过是一种由国家领导决定的、惨无人道的“清洗行动”中的毫无灵魂的众生。

海德里希所知道的仇恨只是在于表达个人的怨愤。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指示将他逐出海军，他对雷德尔一心图谋报复，拒绝他当年同一条军舰上的伙伴们进行任何调解的努力。另一方面，  
155 海德里希并不知道有意识形态上的仇视。对于各种世界观，包括褐色世界观，他有的只是嗤之以鼻。海德里希是体育运动迷，他是击剑手、骑师、飞行员、滑雪运动员和现代五项全能运动选手，除此以外，还是党卫队全国领袖的体育运动总监。有时他甚至庇护犹太体育运动员；他帮助德国击剑冠军保罗·佐默尔去美国，并给波兰奥运会选手康托尔提供旅费和证件。

---

<sup>①</sup> 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党人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译者



他显然也不是毫无批判地信仰希特勒，信仰希特勒是他的全国领袖的延寿剂，它使小资产阶级希姆莱仿佛变成了超人的庞然大物；相反海德里希可以设想一个没有希特勒的、但是不能没有海德里希的德国。他的那些亲近的同事直到今天还坚信，海德里希要是不早死的话，在1944年7月20日很可能是站在叛乱分子阵营的一边。有两名击剑运动员还记得他1941年在巴特克罗伊茨纳赫讲过的话：他将是第一个除掉希特勒这个祸害的人，如果“老家伙瞎胡干的话”。

他一直到死始终是权术家和功利主义信徒：1942年5月27日，捷克空降人员用手榴弹置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于死地，他们的手榴弹不是投向一个残暴的封建领主，而是投向一个狡猾的党卫队理性主义者，他所玩弄的介乎甜面包和皮鞭之间的弹性政策，使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感到危险异常，除了干掉海德里希外别无选择。

但是，使这个功利主义的权术家最为恼火的，莫过于观念论者希姆莱那滔滔不绝的连篇大话了。海德里希经常在妻子莉娜跟前，发泄对全国领袖的气愤，希姆莱的种族主义狂热幻想干扰着党卫队这部机器的正常运转。海德里希微带醉意地扯开嗓门叫道：“你看看他的面孔和他的鼻子吧，典型的犹太人，一个标准的犹太乡巴佬！”莉娜·海德里希跟着咒骂，因为她打心底里讨厌希姆莱这一家，特别讨厌“全国领袖的婆娘”。莉娜在战后嘲笑玛尔加·希姆莱说：“五十公分的女式短衬裤，不然她穿不下。”还有：“这个粗俗、毫无幽默感和患了广场恐怖症的金发女人，统治着她的男人，至少一直统治到1936年，对他各方面都具有影响。”

莉娜·海德里希亲身强烈感受过这种影响：希姆莱受妻子的怂恿，提出保安处长海德里希必须尽快同令人难以忍受和放荡不羁的莉娜离婚。但莉娜·海德里希比希姆莱好发脾气的老婆还要

棋高一手。有一次，赫尔曼·戈林家举行游园会时，她进行了反击。出于偶然，希姆莱被安排为陪伴海德里希妻子入席的男宾。莉娜·海德里希记述说：“那是令人难堪而又可笑的时刻。我装成满肚子不高兴的样子，一动不动地坐着。突然希姆莱问：‘难道您这么好静？’我回答：‘您感到奇怪吗？’接着我们跳舞。希姆莱跳得很糟。一会儿他说：‘唉，海德里希太太，一切事情都会过去的。’您瞧，这  
156 又是希姆莱典型性格的地方：是他亲口命令离婚，可是一看到我，他又没有胆量了。以后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但是，当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意识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个事事管的集团神秘主义者的时候，他更加注意在肚皮里下功夫。尽管才智胜过这个党卫队头子，但海德里希一分钟也不忘记“象一名普鲁士少尉对一位老将军那样”对待全国领袖——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这样说。在希姆莱跟前，海德里希说话的腔调几乎是低三下四的，甚至使用在党卫队内严禁使用的称呼“全国领袖先生”。他奴颜卑膝地围着头儿转：“是，全国领袖先生，要是全国领袖先生这样认为，我可以马上采取必要措施，并向全国领袖先生汇报，是，是！”可在莉娜面前，他却大发雷霆：“希姆莱光是指手划脚，见风使舵，想不承担任何责任。”

反过来说，每当这位最亲近的僚属前来汇报的时候，希姆莱往往心里着慌。克尔斯滕写道：“有时我感到，希姆莱在听完汇报后仿佛象挨过一顿揍似的。”克尔斯滕说，海德里希是“擅长于汇报艺术的名手：简明扼要地叙述有关人物或事实情况，接着提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样就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然后进而打出他的决定性的王牌，其中包括往往使希姆莱难于回避的建议……希姆莱简直跟着转还来不及”。

害怕听海德里希汇报的全国领袖有时勇敢地固执己见，但这只是在海德里希离开了以后。这时希姆莱打电话告诉海德里希

说，对于刚才商量好的措施他还得报告希特勒。过后不久，希姆莱发出一条改变了提法的指示，在这位同僚面前诡称是所谓的领袖命令。有一次希姆莱恼火得当面发生顶撞，他冲着海德里希结结巴巴地大声喊叫道：“您，您……和您的逻辑。您老是给我讲您的逻辑。不论我提什么意见，您都以您的逻辑来否定。您和您那没完没了的冷冰冰的批评劲，我受够了。”海德里希立时退缩回来，赶快让步。希姆莱又重新和颜悦色。

希姆莱始终满腹狐疑地注意警惕一切潜在的竞争者，但却无意把他的保安处头子列为足以构成对他危险的人物。因为全国领袖掌握了海德里希的特性，这些特性无疑适合于当一名契卡人员，不过更主要的是，它们可以防止广泛存在于纳粹国家本身中的政治野心。在异常敏感、一心指望青云直上的实权人物周围，气氛是冷冰冰的，不可能产生任何友谊，甚至也不可能有关心。海德里希不倦的工作，他的机灵的、尽管是颇为肤浅的才智，他那事事要求比别人懂得多的欲望，他在保安处、击剑场或妓院里到处都想胜过别人的那种贪婪，都不能掩盖他内心的空虚。在这种空虚中，无论

157

是意识形态和人，都会象石沉大海，不起任何作用。象他避免公开树敌一样，他也不知友谊为何物；即使对妻子莉娜，他也只是在于发泄自己贪得无厌的性欲而已。他在哪里出现，那里的人就远远避开。甚至连敬佩击剑能手海德里希剑法高超的运动员，见到他来也赶快避而远之。

希姆莱身后至少留下了一批当年的同事，他们直到今天还不能不称道他们的全国领袖生前对人体的贴，和蔼可亲。而被希特勒称之为“铁石心肠的人”的海德里希，死后从未有人说过他的好话。警卫旗队司令塞普·狄特里希道出了许多党卫队员对他的看法，狄特里希在听到海德里希死去时大声嚷道：“谢天谢地，现在这只畜生死了。”

连操皮肉生涯、靠吃四方买卖营生的女人，也不乐意主动开门接待他进房间。他一向带上一名副官寻花问柳，这位首长经常气恼，因为姑娘们宁愿对副官献殷勤，而不喜欢这个长着两只凶恶毕露的狼眼睛的人。只有少数人看出，在党卫队保安处长高傲的神态后面，隐藏着一种敏感性。它糅合了功名未就的海军军官的低能变态心理，和继承父母作为演员那种具有对批评的敏锐感觉。残暴至少不是他的生活需要。他对访问他的布克哈特压低嗓门说：“国外有人把我们当成嗜杀成性的人，难道不是吗？对个别人来说差不多是过分生硬了一点，但是我们必须象花岗石一样坚硬。”

一个内心如此不稳、一直处在进攻和渴望成名之间的人物，仿佛生来就是希姆莱的年轻伙计，决不会危及全国领袖的统治地位。两人都清楚，谁也不能离开谁——都是为了保存自己。希姆莱是纳粹特权阶级中地位牢固的党卫队头子，没有他，功名心切的海德里希就不可能有往上爬的途径；而没有海德里希那种神速的敏感和活力，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希姆莱就无法在民族社会主义统治者的蜘蛛网中贯彻自己的意愿。

不过最初看来，似乎这两人之间的伙伴关系相当一般化。1931年6月，希姆莱在瓦尔德特鲁德林家里病榻前，接见了这个担任保安处工作的年轻人，他显然是个栽过跟头的人，人们夺去了他最心爱的东西：军官职业。

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1904年3月7日生于萨勒河畔的哈雷，他的开端也象共和制的战后德国许多市民子弟的经历一样。他父亲是歌剧院的歌唱家，母亲是演员。他就读于哈雷的革新文科中学，在经济困难时期离开受到战争和通货膨胀打击的家庭，十六岁就参加了梅克尔将军的自由团。当重返故乡时，他只知要当军官。他给自己选择了海军生涯，这也是中学时代的希姆莱的第一志愿；在受到裁减军备限制的德国，只有海军

给海德里希提供了一个满足炫耀自己和冒险欲望的机会。

1922年海德里希在基尔入伍，穿上了海军士官生制服。学习期间，他于1923年7月登上“柏林号”教练舰，和最初发现“这头聪明绝顶的野兽”的才华的人之一待在一起，即旧式三桅战舰舰长、当时“柏林号”上的一等军官威廉·卡纳里斯。这位个子矮小、注重仪容的舰长，对这个身材颀长、长着一双罕见的蒙古人眼睛的士官生总是感到厌恶，但尽管如此，还是赞赏海德里希的航海数学才能。

卡纳里斯太太埃里卡则不同，她是普福尔茨海姆工厂主卡尔·弗里德里希·瓦格的女儿，熟谙艺术，她倒欣赏歌剧演员儿子的小提琴技艺。“海德里希拉得柔和圆润，表现了作为提琴手的第一流手法和高度灵活，”以色列的海德里希传记作家阿伦森作了这样记述。在演奏时，海德里希可以“长时间哭泣。这是他的性格的另一面，它能把残忍性和玩世不恭同多愁善感和软弱性同时”结合在一起。

卡纳里斯于1924年上调柏林海军领导机关，候补军官海德里希则并无特殊成绩，但也逐渐沿着海军生涯的狭窄舷梯往上爬：1926年初，他任上等见习军官，1926年末，晋升为海军少尉，就读于海军通讯学校，成为舰队旗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的通讯军官，任波罗的海海军驻地各通讯部门的军官。1928年，海德里希晋升为中尉，并且还通过了一次俄语考试，他可算是个天资聪颖的海军军官，但在同伴中间却并不怎么受欢迎，而且由于他的嗓门特尖而被嘲笑为“山羊”，加上一副横蛮的上级派头，在全体舰队人员中成了最令人厌恶的军官。

虽然如此，他还是深信干海军前途未可限量。突然，一次艳遇毁掉了他的前程。事情发生在1930年夏末某天的傍晚。开始时，海德里希和后来任县长的莫尔在基尔附近泛舟于水上。当小船随着

平静的潮水徐徐滑行时，他们突然看见，另一只坐着两个姑娘的小船翻了。海德里希和莫尔跳进水中，把两个姑娘救了起来；其中的一个长着金发，是某中学的校花，十九岁的莉娜·玛蒂尔德·冯·奥斯滕，波罗的海费尔马恩岛乡村教师的女儿。海德里希和莉娜由相识后逐渐发展到相互钟情，他们不顾不乐意的父亲冯·奥斯滕的反对，于1930年12月9日订婚。

159 可是，莉娜仅仅是病态嗜色的海德里希猎获物中的一个。不久就有另一位女士找上门来，提出他们相识在先的种种应有权利。海德里希对登门交涉的女士不予理睬。但这位女士是伦茨堡海外殖民学校的大学生，法本工业公司某经理的女儿，她颇有来头，上告到了海军领导机关首脑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跟前。上司们指令海德里希放弃莉娜·冯·奥斯滕；当他拒不同意时，雷德尔开动了军法机器。

1931年年初，一个由四名海军军官组成的荣誉公断委员会开会，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审查中尉海德里希的问题。委员会主席为波罗的海海军驻地负责人汉森海军上将，委员会首席——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委员，是前海军上校古斯塔夫·克莱坎普，海德里希过去就读海军通讯学校的教官，如他所说，他不得不“特别详细地同海德里希就由其申述的理由进行辩论”。但莉娜·冯·奥斯滕的未婚夫十分傲慢地回答，给予过去的老师一阵抢白，致使荣誉公断委员会不许海德里希出言伤人。

不过，荣誉公断委员会对海德里希特别生气的是，这个无线电通讯军官显然试图反咬出身名门的海外殖民学校女大学生一口，诬赖她撒谎，声言自己毫无过错。这可是违反崇高的海军荣誉法典的行为。“除了海德里希不可原谅的态度外，”海军中将克莱坎普后来回忆说，“特别是他在解释事实经过时明显表现出的不实态度，促使荣誉公断委员会最后裁决时相应报请上级决定一个

问题：是否还应让这么一名军官继续留在德国海军里。”

海军清教徒雷德尔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将海德里希逐出舰队。1931年4月底，海军中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接到了判决书。判决书上写道：“由于有失荣誉着即退役。”当然，后来有谣传说，海德里希对被搞大了肚皮的女大学生拒绝结合，理由是他不能同一个已经失身于他的姑娘结婚。

雷德尔的训令把海德里希从最保守的海军颠峰上拉了下来，扔进了当时重重包围着德国各地劳动局的千百万失业大军的行列。海德里希对咎由自取的命运非常恼恨。他看到自己的机会有限：他可以象许多退役海军军官一样去当个帆航教员，也有希望在游艇学校里找个工作，但是要想穿海军制服，即使是干商船队，也是永远不可能了。受了伤害的虚荣心驱使他只好找一套别的制服来弥补，聊以自慰——海德里希参加了海军冲锋队。不过这并不是表现有志于政治，莉娜·海德里希说：“他只不过是职业军官，他和他的海军生涯结了缘。其他兴趣在于体育活动。对政治他根本不懂，也从来没有多大兴趣。” 160

但是莉娜却精于政治之道，她被赫特尔评价为“典型的埃达<sup>①</sup>故事中那种凶狠的、渴慕荣华的女人”；莉娜敬慕希特勒，认为自己未来的丈夫也必须向希特勒求取前程。另一个女人，即海德里希的姐妹伊丽莎白，实现了莉娜的心中宿愿。她想起莱因哈德有个教母，其儿子是慕尼黑的冲锋队高级领袖，并且不久即将成为党卫队的要员。“小卡尔”，即年青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卡尔·冯·埃贝施泰因男爵，必定会帮“赖尼”<sup>②</sup>的忙——果然他对此出了力。

多亏男爵分不清无线电军官和情报军官的区别，海德里希找

---

① 古代冰岛文学两大名著《新埃达》（《散文埃达》）和《老埃达》（《诗歌埃达》）的总称，创作时期约为公元七到十三世纪。——译者

② 赖尼(Reini)为莱因哈德之昵称。——译者

到了进入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木头房的门径，希姆莱正在物色一名谍报人员做他的保安工作。1931年6月14日，海德里希踏进了希姆莱的房间和生活圈。希姆莱给他二十分钟时间，叫他在一张纸上描绘出党卫队未来的谍报工作组织。这实际上是党卫队保安处诞生的真正时刻。党卫队头子对海德里希作的草图表示满意，就在1931年10月5日，纳粹党汉堡区领导机关从慕尼黑接到通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同志（汉堡，党员证第544916号）以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总部成员于今年10月1日起参加全国指导处工作，作为单独活动的党员。”海德里希被授予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衔，并开始工作。

还在1931年年初，希姆莱已接受希特勒委托组织一个保安处，负责纳粹领袖的保卫工作。他立即仿效旧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的模式，在党卫队高级指导处建立了一个叫做Ic的部门——陆军参谋本部主管敌情侦察的部门。党卫队头子在任命海德里希后仍亲自任Ic的领导，但把实际工作完全委托给了这个前海军人员负责。

海德里希带着希姆莱交给的几本卷宗，搬进了褐色大厦的一间房间，从事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纳粹分子适合干的事业：契卡分子的生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生涯。8月底，他已在褐色大厦召开的一次慕尼黑党卫队领袖大会上，以未来的情报头子身分露面，并描绘了一个被混进无数反对党派和警察机器的密探的党的恐怖幻影。结论是：纳粹党必须无情地清除一切间谍和破坏分子。此后不久，所有党卫队单位接到命令：“各区立即着手建立Ic科，负责抓区内所有的情报工作。随后，各党卫队旗队亦规定设立Ic科。”

海德里希在各党卫队单位几乎拉不到第一批办事人员，因为他深居褐色大厦，不接触这些单位，而居住在褐色大厦里的人又都



显得过分地好奇。于是他带上三名僚属，搬到慕尼黑土耳其街23号维多利亚恩德里希附近的一所有两间房间的屋子里，开始进行一种奇特的、显然仿效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专业工作：海德里希要求他的助手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参加两个人以上的商谈，也就是说，除了本人以外谈话的对方只能有一个人。1932年初，他已将他的僚属机构扩大，可以向新岸扩展了。他已不再满足于跟几个密探和情报员保持松散的接触了。

4月里，他启程作一次全国性旅行，以了解用哪一种形式把各地争取到的部属组织起来。就在这时，共和国的保卫者们迫使他采用一种起保护色作用的名称。中央政府取缔冲锋队和党卫队；Ic随即改名为PID（“新闻和情报处”）。尽管如此，海德里希在周游德国过程中仍得到了莫大的鼓舞，于是建立起大型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取名为党卫队保安处（SD）。

海德里希把党卫队各单位的谍报人员和密探抽调出来，置于自己领导之下。由此产生了第一个党卫队特别机构。新机构仍是党卫队的一个单位，尽管是个特别机构，仿佛党卫队中的党卫队。海德里希建立起自己的主权组织，它们好象影子一样紧附在党卫队各大区和各区。区保安处和大区保安处人员的任务是，侦查纳粹党内部的反党分子，以及监视敌对党派的活动。每一点具体情况、每一次监视活动、每一个人物履历，都详细记入海德里希的专门卡片——保存在慕尼黑楚卡里街4号保安处新总部。

然而，海德里希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他不满足于监视党的敌对者——这一行，党和冲锋队的其他谍报组织也在干。他想超出这一范围：保安处应该出色地工作，以排除党内的竞争者，确保保安处在全党的唯一情报机构的垄断地位。即使这样，党卫队也还不过瘾；正当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执政的时刻，海德里希有心使保安处从隐蒞的状况中走出来，建立新德国的新警察。

小资产阶级分子希姆莱惊奇地、几乎目瞪口呆地对他的情报头子那种强劲灵活的事业心赞叹不已。显然，在这个被逐出海军的军官身上表现过的那种自我折磨的忧郁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海德里希以新近皈依改宗转向者的激情，督促下属加紧工作，专断、急躁、说起话来神经质的尖嗓门高得出奇。希姆莱忙不迭地酬以应有的头衔。海德里希真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1931年8月10日任突击队中队长，1931年12月1日任一级突击队中队长，162 1932年7月19日也正式当上了保安处长，1932年7月29日任旗队长，1933年3月21日任区队长。

党卫队头子本能地感到，象他私下告诉克尔斯滕那样，偶然地把这样一个“天生的情报人材”送到了他的身边；他是“一部活的记录器，一个了解所有线路并使它们始终连接畅通的有头脑的人物”。海德里希带来了这个谍报部门头目所具有的理想武器：严格，不凭感情用事，不停地搜集情报和令人发指的玩世不恭的态度。

在所有体育运动项目中，他特别喜爱击剑，这并不是偶然的。满腹狐疑地观察和提防敌方企图，对预先估计不到的情况作出闪电般的迅速反应，成了海德里希的第二天性。他的助手施伦堡感到他仿佛是一头猛兽，“始终保持警觉，始终预感危险，怀疑一切”。他象幽灵一样，似乎具有第六感官，能猜测细微末节的来龙去脉。在全国领袖存档的记载别人言论的笔记中，海德里希常用刚劲的字体批道：“我不相信”，或者写道：“无稽之谈”；当希姆莱问他对情况是否进行过核实时，海德里希回答说，他的感觉不会欺骗他——而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对的。

对此，希姆莱说：“他对人有着可靠的嗅觉。他具有令人惊异的敏锐目光，能事先看清敌友的动向。他的同事不敢对他讲假话。”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仿佛是生来就适合当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情报机关头子的人。保安处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赫特尔认为，海德

里希是第一个能“提醒”希姆莱“利用党卫队全国领袖这个地位干什么事业”的人；把党卫队进一步变成第三帝国的警察权力也是他的主意。

海德里希设计了一个缜密的监视系统蓝图，用以监视国民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并确保纳粹党的绝对统治，进行监视工作的只有党卫队全国领袖的保安处一家，进行指挥的只有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一人。一支政治警察的草图出现了，它和它以前的所有警察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的警察对国家政敌只满足于现场抓获，只有当客观危险临头，它才插手干预；而海德里希的警察则要在还没有产生反对思想、更不用说策划敌对行动之前，就侦破对手。

海德里希的警察概念所引伸的范围是没有尽头的，它包括国民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警察不是国家的一个防范性机构，它则转向主动进攻。它更多地成了人民的“教化者”，成了使国民摆脱一切不受欢迎的思想影响的万能清洗专员。据保安处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阿尔弗雷德·施韦德尔说，警察的任务规定为“把人民中潜在力量的积极性通过矫正提高到极度统一的思想……但同时要通过彻底执行民族主义思想，以肃清一切不符合人民的、因而也起破坏作用的力量”。海德里希制订的方案，打破了一切传统警察工作的法律约束。保安处著名法学家瓦尔纳·贝斯特给警察赋予一种无处不在的性质，必须对任何破坏国家秩序的罪行“〔进行〕反击和防范，即使它没有或目前还没有破坏外部秩序”。

换句话说：海德里希所要的一支警察，它拥有无限权力、只受“德国警察的总任务”（贝斯特语）制约，而这个总任务是：不择手段地保护阿道夫·希特勒的领袖专政。既然如此，能把这种不受限制的任务赋予一支在魏玛共和国一再受到尊重法律和宪法的教育的警察吗？绝对不能！能对一个口头上谈论民族社会主义、但

仍奉行普鲁士制度规范的行政机关寄予信任吗？不能，永远不能！

海德里希知道应该怎么办：保安处必须掌握新的政治警察中的要职，这支特别警察必须摆脱同内政部门的全部关系，终于使整个警察和党卫队合并成一支国家保卫团。这个计划已包含着一个远为深入的、更加革新的方案的胚芽，即建立党卫队自己的行政胚芽，把警察、党卫队和国家官僚政治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总体。

海因里希·希姆莱被他的保安处头子的设想所陶醉。虽然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奥古斯特·海斯迈尔等老战士曾提醒他，同警察合并将使党卫队这个担负教化使命的集团背上一个沉重的、不得人心的包袱（党卫队领袖赛斯-英夸特1946年说：“党卫队思想已经破产，因为希姆莱将它作为执行权加以滥用”）；但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全国领袖上升为第三帝国的警察主子。巴伐利亚已经提供了一个练兵场，在这里海德里希可以把他的想法付之于行动。

1933年3月9日，民族社会主义搞垮了巴伐利亚邦政府，使全国领袖及其契卡分子跟警察结成了联盟：希姆莱以代理警察局长身分进入慕尼黑警察局，海德里希接管了警察总局第四处政治科。一周后，这两位党卫队员迈出了一大步。希姆莱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内政部政治司长，掌握了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司令大权；党卫队头子迅即将伙计海德里希拉进来当他的常务代表。

164 两人在巴伐利亚省排演了他们几年以后将要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行的事情。希姆莱在巴伐利亚内政部设立了“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司令”办公室，海德里希则着手建设一支巴伐利亚政治警察(Bay-PoPo)，全部配备保安处的人员。海德里希首先重视的一点是，使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独立于国家行政部门之外。在此以前，政治警察是普通警察部门中的一部分，现在海德里希把它从行政体制中划出来：政治警察脱离慕尼黑警察局，拥有一个独立机构的地

位。

保安处头子将国家警察局和警察机关中的政治部门，以及各地区机关和县的直辖城镇的政治警察科汇合成一个系统，只服从一个中央机构的领导：政治警察司令办公室。同时，办公室有权随时命令巴伐利亚穿制服的警察充当执行工具。海德里希和希姆莱设计的政治警察司令的职权还不只限于此，它也插手司法特权：辖制集中营，这是根据狂暴的纳粹党区领袖兼巴伐利亚内政部长阿道夫·瓦格纳的指令建立起来，用以关押监护拘留犯，以减轻司法监狱容纳不了政治犯的压力。

由于德国总统颁布了“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条例，使警察有权仅仅因怀疑公民进行敌视国家的活动，就将其“预防性”地投入集中营，集中营主子希姆莱获得了出乎预料的大权。任何人也制止不了他那股进行政治清洗的狂热劲头。虽然他在形式上处于内政部长兼党的区领袖瓦格纳之下，但身负党卫队全国领袖兼政治警察司令双重职务，使希姆莱可以不受任何上级的约束；邦内政部长瓦格纳有权向政治警察司令希姆莱发布命令，但却无权对一个身为党内组织的领袖、地位高于他的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发号施令；从另一方面说，一个象冲锋队参谋长罗姆——他的古罗马式步兵队不时干扰政治警察的工作——这样的党内上级，可以向地位低于自己的党卫队全国领袖发指示，但不能对这个国家地区内的政治警察司令发布指令。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肆无忌惮地利用他们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地位。达豪这个恐怖的名字标志着一种野蛮的精明干练，它甚至使坚定的纳粹分子也大惑不解；当全国其他地区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恐怖浪潮早已过去的时候，这两个秘密帮派人物反而将越来越多的囚徒投入他们的集中营。希姆莱后来回忆说：“应各部的敦促，我们在1933年释放了在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各邦的大批监

护拘留犯。当时只有我在巴伐利亚没有让步，没有释放我手中的监护拘留犯。”

巴伐利亚邦长里特·冯·埃普对动辄“滥事宣布监护拘留”产生埋怨情绪，他在1934年3月20写信给瓦格纳说，由于这种专横的做法，可能“动摇对司法的信任”。瓦格纳禁止了这种干预。里特在1934年4月14日记道，瓦格纳的信“句句都有火药味，不值得一驳”，甚至充满“错误、颠倒是非、歪曲和虚伪”。

连嗅觉迟钝的中央内政部长弗立克，也参与指责警察司令希姆莱蛮不讲理的逮捕狂。“我已多次，”他在1935年1月30日写道，“指出巴伐利亚监护拘留犯的数字相当惊人，而巴伐利亚政治警察方面对此并未充分说明，或认真考虑减少拘留犯的人数……我不能……不继续反对，在经过最近一次清理后，巴伐利亚监护拘留犯的数字还超过所有其他各邦包括普鲁士在内的人的总数好几百名。”然而希姆莱对柏林发出的警告置若罔闻。针对弗立克的来信，他断然写道：“犯人原状不动。”

无疑，这两个党卫队-警察很快就感到巴伐利亚这块试验田太狭窄了；他们把手伸向全国，当时德国其他十六个邦的警察还没有主子，至少还没有被一个人统一操纵。不过时间紧迫，赫尔曼·戈林在普鲁士已经在秘密警察内组织一支政治警察，其结构同希姆莱-海德里希的机器相类似：从行政机关划出来，由一人统辖，独立于国家和党之外。

民族社会主义统治者相互间的权力争斗使希姆莱及其助手较快地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速度之快出乎两人预料之外。荏弱的国家改革派威廉·弗立克在同戈林的普鲁士分离主义进行争夺中，除了向党卫队头子求助外别无他法，因为弗立克和希姆莱在一点上看法一致：两人都希望搞一支由中央领导的全国警察。弗立克让巴伐利亚警察司令将各邦警察逐一攫为己有。普鲁士这

个要塞则落入了两个秘密帮派人物的手中，这正好是在恩斯特·罗姆跟赫尔曼·戈林斗争激烈的时刻，戈林跟希姆莱实现和解，把秘密警察交给他，以此换取党卫队支持对冲锋队头子进行血腥的清算。

4月底，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控制了普鲁士的警察：希姆莱成了秘密国家警察(秘密警察)——亦即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普鲁士变种——副头子兼督察员，海德里希作为副头子的代表负责领导秘密警察处(Gestapa)。他们同时还扩大了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党 166 的领导确认，党卫队保安处是纳粹党的唯一情报机构。领袖代表于1934年6月9日规定，即日起“除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外，不许再出现党的任何情报或谍报机构，也不许搞名为国内情报组织实则插手外交的机构”。

可是保安处的胜利未免来得过早了。再加海德里希对自己的创新多少失去信心。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经验，打破了他那利用保安处可以建立一支新警察的幻想。旧学校出身的警官们对这个保安处的青年暴发户来说表现了充分的明智。这一点海德里希必是早有觉察，因为他正好就在民族社会主义取得政权的前几天，离开了保安处。1933年1月27日，他辞去保安处长职务，进入党卫队全国领袖本部，任特别〔任务〕旗队长。保安处这具机器在离开海德里希领导的情况下，运转了达三月之久。

这个原任和未来的保安处头子十分现实地看到，他的组织就人数而言，还搭不起一支新警察队伍的架子。1933年秋，保安处有一百名工作人员，其中例如西南大区(斯图加特)保安处只有整整五个人。何况海德里希对保安处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的前途也抱怀疑态度。莉娜·海德里希告诉以色列历史学家阿伦森说，她丈夫当年说过：“现在我们再也不需要党了。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和开拓了取得政权的道路。现在应该是党卫队打入警察，并和

警察建立一个新组织。”

这正是他的目标，当时他受希姆莱的委托，着手在秘密警察处的最高层将德国各邦警察合并，贴上党卫队的标记；他计划把富有经验的警察干部改造成成为忠于政权、只是薄施一层褐色油彩以资点缀的实权人物，供领袖专政的种种任务支配。对实用主义者海德里希来说，不在乎信仰坚定，而是首先强调业务能力。为此他找到了一批慕尼黑的刑事警官，这些人毫不掩饰他们对新保安处的强烈反感。

刑事高级警官赖因哈德·弗勒施及其同事，其中包括海因里希·缪勒、弗兰茨·约瑟夫·胡贝尔和约瑟夫·迈辛格，坐在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第二处和第四处，等待被保安处的新贵赶出机关。“海尼”·缪勒自己给自己鼓气说：“让他们来好了。我们会给他们明话直说的！”其实，这些职业老手担心会被这些新主子们撵走，因为他们中间除迈辛格外，在1933年以前一直都是站在另一边的。只有迈辛格是老战士，在1923年11月9日就参加了从慕尼黑菲尔  
167 德赫恩会堂前面走过的那支队伍；除了他，弗勒施小组的成员都是民主党派，多半属于巴伐利亚人民党(BVP)。

身材矮胖、颈项粗短的刑警探长缪勒的情况也是如此，他的脸显出他是农家子弟。海因里希·缪勒生于1900年，前西线飞行员和军士，从1919年年底起在慕尼黑警察局任职，在巴伐利亚刑事警察中，享有最凶狠的铲共老手的称号——在巴伐利亚工人士兵苏维埃时期枪杀红色分子人质，办公室助理员缪勒的第一次大失败促使他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在警察局政治科里，早在魏玛时代他就分管〔打击〕共产主义方面的工作。连不喜欢缪勒这个野心家的纳粹党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区领导机关，也知道“不能不赞扬”他对共产主义“进行极其严厉的、有时甚至置法律条文和规定于不顾的打击”。



但是，纳粹党区领导机关也证实道：“不过同样清楚的是，缪勒对右的方面也会这样干的，只要给他布置任务的话。以他的十分严重的名利思想……他在这里也总是会得到他任何上一级体系的赞扬。”因此纳粹党慕尼黑领导怀疑，这个能够得到任何“体系”赞扬的警察和伪装虔诚去教堂作礼拜的缪勒，今后是否能在新德国找到饭碗，因为每年纳粹冬赈募捐他一向只捐款四十分尼，而且除了种种令人厌恶之处外，他还是巴伐利亚人民党出版商迪施纳（“蠹鱼塔尔博特”）的女婿。这可不是纳粹分子们所设想的那种警察官员。

1937年1月4日，纳粹党慕尼黑区领导机关这样刻划缪勒的形象：“他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抡起胳膊横冲直闯，时刻善于表现自己的才干，但对掠人之美却毫不知耻。”纳粹党慕尼黑-帕辛格基层组织领袖声称：“我们称他是我们党内的同志感到羞耻。”可是保安处头子海德里希颇有胆识，不动声色地偏偏把这个职业老手吸收进自己的机关，包括他和弗勒施小组的其他成员。连在党内受到人们憎恨的、对纳粹分子盯梢的警察局密探、刑事警察书记官胡贝尔，也被海德里希吸收录用。

海德里希打发人把胡贝尔找来，出示一份裁减对象名单，不吭一声，在令人压抑的寂静气氛中，伸出手指一行行数将下去。他突然把头一抬问道：“您到底是哪一个胡贝尔？”胡贝尔作了回答。接着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当刑事警官走出这位审查者的房间时，海德里希知道，弗兰茨·约瑟夫·胡贝尔会象慕尼黑警察局所有其他有妻室儿女的好汉们一样，从现在起，更加毫无顾虑地、更加勤奋地为现政权工作，而过去他们都曾反对过这个政权的崛起。

纳粹党慕尼黑区领导机关负责人无法理解，（他在1937年3月9日写道）这样一个“令人痛恨的反对运动的人”，一个一向 168  
“〔曾经〕力图通过特别粗暴的反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行径以博取上

级称赞和表彰”的人，一个曾经把伟大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称为“逃跑的失业油漆匠”和“潜逃的奥地利人”，现在怎么会变成政权的保卫者。

缪勒及其同伴们准备“埋头苦干”，用来报答如此的宽宏大度。慕尼黑的刑事警察没有被赶出机关，相反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擢升：他们全部被接纳进党卫队保安处。不过，当时海德里希的大胆行为，忽略了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副作用：缪勒、弗勒施和胡贝尔这三个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以及其他人员，虽然在自己的衣袖上别上了党卫队保安处的菱形徽章，但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保安处的厌恶，这种厌恶一直延续到第三帝国的末日，并且构成了阻碍将秘密警察变为保安处统治地盘的因素之一。

以海因里希·缪勒为首的这帮子人，并不是海德里希用来给自己建立统治机器的唯一的一批职业刑事警察老手。与慕尼黑刑警队相类似的还有一个柏林小组，它的头儿是高级政务参议阿图尔·奈比，他的专业才能和钻营本领并不在巴伐利亚人缪勒之下。

在奈比同1944年7月20日的人<sup>①</sup>合作表演之后，海德里希的继任者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描绘了这个因反抗纳粹政权而被处死的唯一的一名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的性格，他的性格跟纳粹党慕尼黑领导机关给缪勒所作的画像不无相似之处：“一种分裂的性格，怀有十足的病态性名利欲……由于具有这种名利欲，奈比同样不择手段地排除一切可能阻碍他向上爬的前进道路上的东西。”无疑，卡尔登勃鲁纳是怀着对“叛徒”的愤怒而执笔的，它并未刻划出奈比的基本特征：这个柏林国民学校<sup>②</sup>教员的儿子生于1894年，曾任工兵中尉，从1920年起就当上了柏林刑事警察，他的行动一再表明，他是善于学习自己所接触的窃贼骗子的犬儒哲学的人。

<sup>①</sup> 指1940年七·二〇事件中企图推翻希特勒的政变分子。——译者

<sup>②</sup> 指小学到初中的义务制国民学校。——译者

刑事警官奈比生性多疑，令人捉摸不透，他经常在毒品和盗窃两科之间变换工作，在1931年就找到了入党的门径。他接受了当时使许多警察着迷的纳粹刑警政治论点的诱惑，因为民族社会主义提供了魏玛国家不曾给警察提供的东西：更多的经费和技术装备，联合打击犯罪活动，不受报刊的抨击和严厉的预防性刑法。共和国灭亡前的痉挛鼓励这个行事谨慎的人更为卖力地干。奈比当上了党卫队赞助队员，此外还参加了冲锋队，调进秘密警察，任执行部门（秘密警察处第四处）的领导。

但是，奈比对投身秘密警察可能很快就感到遗憾，因为没有多久，他就卷入了滚滚而来的希姆莱—海德里希两驾马车跟首任秘密警察头子、戈林宠儿鲁道夫·狄尔斯之间的明争暗斗，狄尔斯那学究式的那种目中无人的傲慢，使勉强才念完高中的奈比无法忍受。他向海德里希提供诬陷罗姆的材料，希望以此能换来获准离开秘密警察——这个希望是很难如愿以偿的。 169

除了慕尼黑和柏林这两批刑警队外，海德里希还拉进来另一组科班出身的专家，即来自德国各地的公务人员和法学家，其中也包括将要成为海德里希最亲近的僚属和最终成为仇敌的那个人，前黑森初级法院法官瓦尔纳·贝斯特博士。

卡尔·鲁道夫·瓦尔纳·贝斯特是邮局职员儿子，1903年7月10日生于达姆施塔特，在弗赖堡、法兰克福和吉森等大学修完法律后，即开始了法官生涯，他是一个专横的政治权术信徒和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是恩斯特·约恩格的学生，具有自由团的那种视战争为“整个生活过程中的一种必要和自然的形式”（贝斯特语）的浪漫主义气质。他在1930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读来有如民族运动“法治”国的纲领性草案。贝斯特在“热情地肯定国家作为超乎个人的意志力的最高形式”的同时，彻底抛弃了自由主义法治国的理想，几乎取消了法律的任何一点普遍约束性。

据此，法治不是一种状态，即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不受国家万能的侵犯；依照贝斯特的看法，法治只是一种权力斗争的手段，一块划分“刚刚过去的斗争的结果的标志：一方赢得了权力，另一方丧失了权力”。贝斯特写道：“国家对内的任何一种权力，其目的都是在于统治别人，同时每一种权力……总是使自己同‘国家’一致。统治的完善是国家的趋势：统治愈完善，国家也就愈完善。”

他并不限于纸上谈兵。当共产主义革命的幽灵在魏玛德国四处出现时，纳粹分子贝斯特于1931年年中，在沃尔姆斯附近的租佃庄园“博克斯海姆庄园”，用言语和文字向该地的几个党员同志阐述了纳粹主义的制止革命思想，它很快就以“博克斯海姆文件”而臭名远扬。在“废除了迄今为止最高的国家机关和战胜了地方自治团体”以后，贝斯特要求冲锋队和各邦军队夺取“已经孤立的国家权力”，并毫不留情地建立“居民中最严格的纪律”；私藏武器者应“不加审讯就地”处决。

一个变节的党员将贝斯特的计划向警察告了密，警察立即着手干预；黑森司法部门解除了这位法官的职务，但莱比锡德国最高法院于1932年10月以“查无实据”为由，停止对他进一步追究。而纳粹的上台也使这个警察国家理论家本身同警察融合在一起。贝斯特的朋友海因里希·缪勒博士被任命为驻黑森中央专员；缪勒请贝斯特负责领导警察，这位朋友应允了这个请求。

但是这位新任邦警察局长不久就同纳粹党黑森区领袖施普伦格发生了冲突，后者不喜欢贝斯特博士对党的要求客观地、批判性地保持距离，1933年秋，贝斯特不得不离开。此后，瓦尔纳·贝斯特（他已于1932年加入党卫队，在被撵出黑森后领导着南部和西南大区保安处）的名字列入了海德里希的人员名册。这时保安处头子正在着手扩大秘密警察，他于1934年年底召见了这个黑森

人。起初，他不知道他给自己招来了一个最大的“制动装置”（海德里希语）。因为贝斯特尽管理论上处处主张民族主义的强权国家，但内心深处仍保留着坚持最后一点规范化的法学家思想。他的公务人员作风也过分严重，思考问题过于刻板，无法同不讲原则的通权达变竞争，而瓦尔特·施伦堡一类正在成长中的法学功能主义的保安处一代人，正是以这种通权达变而著称的。

海德里希依靠他的新僚属巩固未来统治机器的核心，也就是那个偶一提及就使千百万德国人毛骨悚然的工具即秘密警察，在那个时候，民族社会主义警察干部中存在的上述分歧，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海德里希有意识地扩大秘密警察那种威风凛凛的名声，因为只有无所不知和毫不容情出击的声名，才能使秘密警察印上领袖专政最强大的威慑性武器的标记，并遏制任何可能存在的反对政权的行动。海德里希后来说过，秘密警察是作为“一种慑服和恐怖的混和物”而考虑建立起来的，这句话道破了一个已经达到目的的人的沾沾自喜。

给秘密警察奠基的还是普鲁士总理戈林。他把刑事警察中的政治特别部门、政治警察（打击重大谋反）和谍报警察（打击叛国）同刑事警察分开，合并成一个新的组织——秘密国家警察。原先，政治警察执行的任务属于普鲁士邦刑事警察处（LKPA）的职权范围；在每一所警察总局都保持着所谓的 Ia 部门，即柏林警察总局执行政治警察情报中心任务的那个处。邦刑事警察分处作为警察行政机关分别隶属各级地方行政机关首脑领导。

戈林将结构作了很大的改革。1933年4月，邦刑事警察处被秘密国家警察处即秘密警察处所取代，它把所有政治警察部门合并成一支基本部队；真正的政治警察——秘密警察的核心——组成秘密警察处的第三处；谍报警察组成第四处。另外两处是第一

处(组织和行政)和第二处(法律)。

中层一级的机构面貌也发生了类似变化。各省的邦刑事警察分处不得不让位给新的国家警察分局，它们只是在形式上仍隶属省长——这是决定性的一点——领导。原因是从1933年年底起，秘密警察提出要求成为独立的行政机关，不受内政部门制约而只对普鲁士总理负责。1933年11月30日普鲁士秘密警察法中的一节强调指出，各地秘密警察局长可以按情况听从行政机关首脑的“愿望”，只要同秘密国家警察处的指示和方针不相抵触的话。

实际上，内政部门已经被排除了对政治警察的一切影响。从1934年4月1日起，国家警察机关不得再保持任何政工部门。外加1933年2月28日德国总统颁发的“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条例取消了所有基本权利，因而使警察无需通过法庭命令就可以进行抄家和逮捕、没收财产、窃听电话和拆查信件，所以在人们想象中，没有再比戈林的秘密警察权力更大的警察了。

可是，海德里希主张绝对完善的监视论，对此犹未感到满足。他不知疲倦地、危言耸听地描绘政权面临的危险。海德里希秉承一切独裁政治警察头子们惯于用来为自己建立恐怖机器的那种做法，主观臆想国家政敌。

秘密警察处长海德里希突然从素不公开露面的状态中走出来，对公众发出报警讯号。他在1935年初的一次讲话中生气地说，许多党员同志还根本不懂得：“随着敌对组织被摧毁”，敌手并不等于已被消灭干净；政权的敌人接受了“一体化”，现在的任务是“到新的阵地上去寻找敌人”。他解释说，“公开的敌人”虽然仍旧“和过去相同，即世界犹太主义、世界共济会和以进行政治活动为主的圣职人员”，但是还有比这些“明显的”敌人更危险的披上了伪装的敌人：“这种敌人进行地下活动……其目标是破坏国家和党的统一领导……这个分布网异常广阔。”

扩大统治机器可以着手进行了。秘密警察处的各部门被合并为三个处，恐怖总部随即掌握了大权：奈比调任邦刑事警察处长，<sup>172</sup>得以摆脱秘密警察的苦差事，稍事休息，直到1936年才划归海德里希领导；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贝斯特负责第一处（行政和法律），随后于1935年春接替在国防军压力下被失宠的党卫队旗队长京特·帕乔夫斯基博士，负责抓第三处（谍报警察）。

真正的秘密警察被把持在海德里希的巴伐利亚派的手里。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弗勒施负责第二处，这个处的六个最主要的科很快全都落入他的同伙手里；海因里希·缪勒掌握“马克思主义”科（监视和侦缉被查禁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党派），弗兰茨·约瑟夫·胡贝尔领导“复旧、右倾反对派和教会”科（监视从天主教到德意志民族党“钢盔团”等非纳粹组织的敌视政权活动），约瑟夫·迈辛格抓“纳粹党、堕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sup>①</sup>和种族凌辱”科（侦破党内反希特勒分子、鸡奸、堕胎事件和违反关于非犹太人同犹太人不得发生性关系的禁令），初级法院法官罗德博士领导“经济”科（监督合法的协会和经济联合会包括德国劳工阵线），检察参议特斯默尔负责监护拘留令和关押集中营事务科，以及政务参议卡尔·哈塞尔巴赫尔博士抓“共济会和宗教派别”科（侦查不属教会之列的宗教团体的反纳粹思潮和打击共济会地方组织）。

新的人马着手将戈林所建立的监视网进一步紧密联接起来。但是进一步同所谓的国家敌人进行斗争必需首先具备这样一个前提，即秘密警察必须明确谁是国家敌人。过去，戈林常常使他的部属怀疑，国家敌人主要就是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但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的新主子们对此却带来了明确的概念。

“今天的国家敌人是一切蓄意反对人民、党和国家及其世界观基础和政治行动的人，”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阿尔弗雷德·施

<sup>①</sup> 指犯鸡奸罪的条例。——译者

维德尔说：刑事警察专员文德齐奥以秘密警察的露骨的真情在一份内部材料中写道：“具体说来，我们所说的国家敌人指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犹太主义、政治化的教会、共济会、政治上的不满分子（发牢骚者）、民族主义反对派、复旧、黑色阵线（布拉格的施特拉塞）、经济破坏分子、惯犯，以及堕胎者和鸡奸分子（从人口政治观点而言破坏人民和防御力量，鸡奸〔分子〕有掩盖间谍分子的危险）、重大谋反和叛国分子。”据文德齐奥说，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他们的斗争矛头“直指德国人民的精神基础和种族基础”。

人们绞尽脑汁设计出一套表格和卡片索引系统，用来记录每个可能的政权敌人。柏林秘密警察处及其在外省的分局建立了一套所谓的 A 部卡片索引，分为三类登记秘密警察心目中所有的政权敌人：A 部一类索引卡左上角用红色检字器标出记号，属于这一类的是已经着手采取各种秘密措施准备进行一次普遍动员予以逮捕的政权敌人；A 部二类（蓝色检字器记号）是准备采取公开发布通令予以逮捕的敌人；A 部三类（绿色检字器记号）是虽未构成安全威胁的公民，但象海德里希在一项命令中所说的那样，他“在严重困难考验的时刻……必须被视为非常危险，故需要考虑予以逮捕或重点进行监视”。

秘密警察也善于用颜色对它的打击对象作出细致入微的区别标记。卡片右上角另有一个检字器记号，用来表示不同的国家敌人：深红色记号指共党分子，浅红色指“马克思主义者”，褐色指“暗杀分子”，紫色指“不满分子”。每年 4 月 1 日和 10 月 1 日，必须由专人审查颜色标记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

然而，对秘密警察所谓的国家敌人进行如此周密的监视，要求几乎不停顿地扩大国家警察的权力和职能。秘密警察处开创时，柏林警察总局的 Ia 部门有工作人员三十五名，到 1935 年初，已有



六百零七名公职人员；1933年一年秘密警察的经费开支为一百万马克，1937年预算已达四千万马克。

各行政区秘密警察分局和（1937年成立的）设在省长机关或邦政府里的秘密警察领导机构扩大了。谍报警察愈益打入军事反谍机关的特权领域。德国的边境也逐渐纳入秘密警察的控制范围，此前属于邦刑事警察处的边防管理站改由秘密警察一手掌握，并成为各邦秘密警察分局的外事科。后来，秘密警察建立了一支自己的边防警察，它不是执行所谓边防任务，而是完全执行国家警察的任务，即在边境地区侦查政敌、特别是缉捕叛国者；因此它也受秘密警察第三处的G科（谍报警察）领导。

在整个希特勒德国边境上布下了一道铁幕。为了确保任何外逃者无法避开秘密警察的敏锐眼睛，人们苦心孤诣地设想出一套174 侦缉系统。形形色色的侦缉方式构成了一个密布全国的罗网。既有地方侦缉（由地方警察和城市当局负责），也有国家警察侦缉。在这方面对敌人也以颜色作为标记：红砖色侦缉卡表明系在逃犯，红边白卡表明系应予驱逐出境的人。特别细致的是秘密警察搞的所谓字母代号侦缉，它下分八类，每一类侦缉字母代表秘密警察的一个要求。A类侦缉：逮捕；B类侦缉：无居住户口的予以逮捕；C类：查明行踪；D类：驱逐出境；E类：搜寻失踪者；F类：核实遗失的证件；G类：暗中监视；V类：逮捕职业性犯罪分子。

警察攫取的权力愈大，秘密警察在一些领域内进行侦缉也就愈加容易。在以后的几年里，秘密警察处把应予驱逐出境的无国籍者转交有关部门，直至采取一套手续把他们送进集中营——具体作法当然都有冠冕堂皇的规定。1937年7月26日，秘密警察法官贝斯特许诺：“接纳无国籍者进入我所指定的集中营，应由邦警察当局填写秘密警察处第240号表格。集中营在接到被驱逐出境的犯人后，将秘密警察处第240号表格的正本，连同贴有

被驱逐出境的犯人的照片的秘密警察处第98号集中营索引卡报送给我。”只有在有关外国声明愿意接纳犯人时，才准许他离开集中营。贝斯特规定：“在出境以前，边防警察应和无国籍者进行谈话，书面具结一式两份，警告对方：如再入境，将重新以驱逐出境犯被投入集中营。”

发布监护拘留令和关押集中营的特权，是秘密警察手中掌握的一件致人死命的武器。它摧毁了德国的所有司法权，因为任何一个法官、检察官和辩护人，都无法阻止被关在集中营带刺的铁丝网后面的人消失无踪。

负责发布监护拘留令的最高当局是秘密警察处。最初它可以将每个普鲁士人、后来可以将每个德国人无限期地关入集中营，不受任何司法约束。下级秘密警察机关也可以宣布监护拘留，但拘留期仅以七天为限；如拘留令未获秘密警察处批准，则必须在第八天将被拘留者释放。自从海德里希指挥秘密警察后，集中营在押犯的人数多起来了。单是1935年到1936年，就有七千名“马克思主义者”被捕，完全如同贝斯特博士所说：“任何旨在实现或者哪怕只是持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企图，都将作为危害不可分割的民族机体健康统一的病症予以消灭，而不问其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如何。”

175 但是秘密警察的权力愈是凶猛扩展，它的敌对者也就愈是增多。法学家和行政官员极力阻止、至少也要延缓秘密警察的节节胜利。敌对者们的主要企图是敲掉秘密警察手中的最心爱的武器，即集中营。胆大的法官们纷纷揭露集中营的种种罪行和弊端，以指望创造条件，有助于比较公正的纳粹领袖们争取取消新德国的这些人间地狱。

还在1933年夏，个别法学家就开始了小心谨慎的隐蔽活动，那时候，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正在巴伐利亚为他们的恐怖系统设计模型。当时慕尼黑第二高等法院检察部门，掌握了达豪集中营发

生的不计其数的原因不明的死亡事件。检察部门随即提出，司法机关“有责任对上述事件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管牵涉到什么人”——它在1933年6月2日致函巴伐利亚司法部这样说。检察部门一再记录了达豪的凶杀事件：1933年5月下半月，检察部门调查了死去的四名达豪囚犯施洛斯、豪斯曼、施特劳斯和内夫茨格的情况。调查结论是，他们系被集中营人员折磨致死。1933年9月底，检察部门强行对达豪死去的囚徒胡戈·汉德舒赫的尸体解剖检验。检察部门记录如下：“因受钝器猛击而流血……有他人过失的依据。”1933年10月底，检察部门设法调查威廉·弗兰茨和德尔温·卡茨博士两名所谓自杀身亡的囚徒情况。检察部门指出：“对两具尸体解剖结果说明，有理由怀疑被虐杀……被扼住咽喉和卡住脖子窒息而死。”

慕尼黑第二检察部门呈请司法部审查达豪集中营秩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于1933年6月1日对三名人员恣意杀人提起公诉，他们是：集中营长官、党卫队区队长希尔马尔·韦克勒，集中营医生尼恩贝克博士，和办公室高等文书穆茨包尔。希姆莱只好牺牲自己的集中营长官。他和海德里希恼羞成怒，设法对付检察部门将其他事件也诉诸法院的所有企图。他们两个鼓励内政部长瓦格纳在内阁提议：“由于国家政治原因”禁止对集中营罪行进行调查。

巴伐利亚内阁中的多数人否决了瓦格纳的提议，这时希姆莱堵死了检察部门进入集中营的道路，他运动司法部长汉斯·弗朗克博士指示首席检察官“至另有通知变更为止，取消开庭预审的动议”。但检察部门不肯让步。它于1934年7月12日请求巴伐利亚政治警察“会同达豪集中营指挥部继续澄清事实真相，并追查涉嫌凶手的犯罪人员”。海德里希的巴伐利亚政治警察恶狠狠地反驳说：“新近由慕尼黑第二检察部门提出的要求提供证据的提议表明，人们在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把莫须有的罪名嫁祸于达豪集中

营。”集中营的人员匆忙地消灭一切罪证；1934年9月27日，首席检察官温特尔斯贝格尔被迫停止诉讼程序。

希姆莱懂得通过狡猾的一着棋捆住危险的检察部门的手脚。他劝诱反达豪派的为首人物、坚定的纳粹党员第一检察官瓦尔特·施特普博士加入党卫队，使他想入非非，以为当上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后，他就可以更好地消除达豪的弊端。这个曾经抨击过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它的干部——一年后，施特普当上了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副头目！

在普鲁士，有胆量的人也开始反对集中营罪行的斗争。第一任秘密警察头子狄尔斯解散了一大批“野蛮”的、多半由冲锋队办的集中营。他也争取了司法部两名纳粹分子，即首席检察官维尔纳·冯·哈克和检察官京特·约埃尔，支持他的计划，运用部的权威同政治罪行作斗争。哈克和约埃尔在普鲁士司法部建立了一个检察中心，它虽然主要只是收拾冲锋队匪徒，但有时也敢于向秘密警察和党卫队犯罪分子开火。

穿褐衫的纳粹对头冯·哈克的最大胜利，是同斯德丁秘密警察局进行的斗争，该局头子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约阿希姆·霍夫曼，在斯德丁-布雷多夫的弗尔康船厂设立了一所集中营，对犯人进行非人的折磨（按秘密警察的行话是：“弗尔康化”）。哈克竟成功地逮捕了秘密警察霍夫曼；冯·哈克回忆说，在他的面前站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狂热、虐待成性和冷酷无情的知识分子。我只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的性格、甚至一举一动和姿势使我乍看之下想起了他：海德里希。”1934年4月6日，斯德丁第二高级刑事裁判所判处霍夫曼十三年徒刑，他的助手们同样也被判刑。

这个例子也鼓励其他法学家反抗穿黑色制服的打手们。布雷斯劳总检察官瓦尔特·舍费尔博士表现出不平凡的勇敢，他在6月30日大流血后布置逮捕了二十名党卫队杀人嫌疑犯，其中包括

两名旗队长，直到同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法赖斯勒激烈争吵后，才将他们释放。然而，狄尔斯的下台和戈林动摇转向希姆莱—海德里希营垒，使法官们失去了庇护者——尽管常常是半心半意的。1934年11月，戈林在普鲁士枢密院的一次会议上气势汹汹地说：<sup>177</sup>“现在居然还有以把〔党的〕勋章佩戴者抓入监狱为乐事的检察官，但是我们会制止他们干这种肮脏勾当的！”

然而，有些法学家并没有被吓倒。1935年初，萨克森检察官、冲锋队队员瓦尔特博士控告霍恩施泰因集中营负责人严重虐待囚徒，事情也牵涉到秘密警察；瓦尔特也准备对负责的秘密警察官员、高级政务参议埃里希·福格尔单独起诉。当集中营刽子手们被判处多年徒刑时，纳粹党萨克森区领袖穆特施曼给法庭施加压力，要求无罪开释。但中央司法部长弗朗兹·古特纳提出抗议：“这种残暴行径叫人想起东方虐待狂，即使以残酷斗争作为理由，也无从解释和得到原谅。”法庭维持原判，但纳粹分子们立即进行报复。法庭的两名陪审官被开除出党，检察官被强迫退出冲锋队。后来法院的太上皇希特勒出面干预：他赦免被判刑的人无罪，并取消了对秘密警察福格尔的起诉。

面对如此专横独断的做法，打心底里倾向民族自由主义的司法部长古特纳，考虑采取一种十分冒险的行动。他在绝望之余想了一个主意：他感到，只有将法律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格式加以剪裁，同时定出一个使希特勒及其工具也能遵守的最起码的法律规范，才能控制领袖专政和秘密警察的专制政治。

右倾自由派古特纳跟最强硬的纳粹律师、新任中央司法专员汉斯·弗兰克博士联合起来。这个纳粹积极分子打算对整个刑法进行一次过激的非自由主义化，并确定一个新的含糊不清的概念——保护所谓的民族运动价值；不过弗兰克博士也并不认为万能的警察专横独断就是法律。诚然，直到站在纽伦堡绞刑架下的

时候，他才承认“阿道夫·希特勒可怕之处”在于，“他本人在战斗岁月中亲身受到过法律的保护，后来当上了国家领导人则完全蔑视法律和司法”。无论如何，早在1934年6月30日进行屠杀这一天，弗朗克律师在施塔德尔海姆预审监狱里，就对领袖专政的法学观表现出惊惶失措的情绪。当时，他内心里开始逐渐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促使1942年的波兰总督弗朗克大肆进行公开抨击，这是在大德意志国家中矛头针对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警察专制公开进行了空前猛烈的抨击。

178 还在1933年底，弗朗克和古特纳就组织了一个“官方刑法委员会”，准备制定一部新的刑法。弗朗克提出民族社会主义这些字眼，时刻乐于效力的罗兰·法赖斯勒将其润色成条文，而古特纳及其挚友、后来的中央法院参议和抵抗运动烈士汉斯·冯·杜那尼，则尽力限制希特勒和秘密警察的司法专制。不过，古特纳同时也争取纳粹律师弗朗克支持他最迫切的目标：取消集中营。

1934年夏，弗朗克和古特纳大胆地发动了“一次在希特勒身边的直接出击”——弗朗克这样说。在总理府内阁会议大会议厅里，两位法学家当着希特勒和希姆莱的面，列举理由反对集中营制度。“我提议，”弗朗克在回忆录中说，“必须限期结束这一套‘制度’，期限应尽可能地短，立即全面停止继续捕人，并对所有迄今已进行和准备进行的逮捕以及所有控告不法行为的案件，依法即由正常法庭加以审理。中央司法部长古特纳博士严词支持我的提议，但我和我始终孤立，因为只有两个人。”希特勒拒绝这项提议并声称取消集中营“为时尚早”。弗朗克的新刑法后来也被他归档了事。

古特纳再次考虑如何限制秘密警察的权力及其肆虐的监护拘留令。中央司法部长收集了集中营无数原因不明的死亡事件材料，然后提出必须由正常的律师给监护拘留犯提供法律帮助。希姆莱反驳了这种批评。他说：“特别措施对于不言而喻地负有责任心的

集中营领导来说不会被视为必要的。”希姆莱始终清楚希特勒会支持他。他在1935年11月6日教训古特纳说：“1935年11月1日，我就对我们提出的希望即批准律师介入监护拘留问题一事，向领袖兼总理作了报告。领袖禁止请律师参加，并责成我将他的决定通知您。”

司法部长秉性懦弱和过分谨慎，他的反对终于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顽固不化的花岗岩脑袋上碰得粉碎。不过它也是失败于许多在十九世纪法律实证主义熏陶下成长的法学家麻木不仁的感觉上，因为他们很快患上屈从和服务于纳粹的领袖崇拜的欣快症。

象总检察官舍费尔这样有勇气的律师，或象中央司法部长古特纳这类谨小慎微的规范的维护者，并不是左右德国法学的人物，对德国法学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卡尔·施密特这类通权达变的法学教授，他主张使法学家成为“领袖意志的具有法律创造性的工作人员”以“取代规范化的痉挛和法律审判唯一服从事实真相”。1934年，《法学周刊》号召“从实证主义法律的咬文嚼字中走出来”，德国法官们也开始越来越无所顾忌地解释秘密警察的权力：普鲁士高等行政法院于1935年5月2日裁决，秘密警察处采取的措施不能用行政诉讼程序进行非难，唯一的途径是向秘密警察处长提出申诉，要求对下属严加管教。1935年10月7日，汉堡行政法院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并无相互抵触之处……因而司法不得持相异看法的立场以否决国家作为政治行动所做的事”，这是符合法律根据的。179

秘密警察法官贝斯特满意地看到，法律仆役们迅速显示出靠拢的意图，他将法院的裁决发给所有秘密警察机关，让大家知道并为之高兴。贝斯特的骨干法官越来越趋于玩世不恭的警察主义，这种警察主义干脆说：“‘警察’的行动绝对谈不上‘不符合法律’或‘违反法律’，只要它按照上级——直至最高领导——给它定下的规则

行动的话。只要警察执行领导的意志，它的行动就是合法的。”

司法部长古特纳激动地说：“真叫人发疯！”他告知柏林市长扎姆博士说，他再也不敢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了，因为经常会碰到外国记者问他关于集中营的情况。扎姆问及，中央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博士对此意见究竟如何。古特纳摇头示意：“戈林和希姆莱的力量超过一百个弗立克。”古特纳没有看出，就在此刻，畏缩不前的纳粹保守派威廉·弗立克又在试图摆脱由他自己曾经召来反对戈林的这个魔术学徒<sup>①</sup>了；对于让一个象希姆莱这样危险的人物指挥一支合并起来的德国警察，中央内政部（RMdI）部长突然感到疑虑重重。

弗立克的努力也许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如果不是德国高级官员支持部长的话，因为这些人尽管事事附和政权，但并不满意秘密警察越来越觊觎行政权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秘密警察派的头子是两个表面上同党卫队联系密切的人：党卫队赞助队员和后来任亚琛地区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地区总队长埃格特·雷德尔，以及他的科隆同事、党卫队旗队长鲁道夫·狄尔斯，后者恰恰是戈林当年的那个宠儿，他对秘密警察权力扩张作出的贡献超过任何其他官员。

弗立克和两位地方行政机关领导人巧妙地把球传来传去，以便至少削弱秘密警察在省一级的影响。1933年11月30日的秘密警察法，剥夺了地方各级行政机关领导人对秘密警察机关的一切影响；目前要紧的是，重新严格控制邦秘密警察处的前哨部队。

180 1934年7月16日，弗立克向所有地方各级行政机关领导人发出一项通告，开始进行战斗，通知中有一句奇怪的话。

---

<sup>①</sup> 最早见于希腊作家琉善（Lukianos，约公元120—180年以后）作品中的故事，儿子向魔术师父亲学戏法，技艺未成而急于显本事，结果出乖露丑。歌德取材于此写出叙事诗。——译者



这句话说：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即秘密警察的独立性“只是一种过渡性的解决办法”，“这是由于罗姆暴动引起政局紧张而变得有此必要的”。内政部长在通告中指示，必须“确保”秘密警察和行政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国家警察机关经常向地方各级行政机关领导人报告”。换句话说：弗立克设计的是受行政领导的秘密警察。

接着，亚琛地区行政机关负责人雷德尔随即在1934年8月写信给中央内政部说，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实际上对本地区担负不可分割的政治责任”，“不能放弃”一点，即“国家警察机关负责人是我领导下的一名局长”。同行狄尔斯的话说得更明确，他在1934年11月4日给戈林的信上写道：“将政治警察分开导致永久性的麻烦，想必这是您总理先生知道的。除了内政方面如此‘支离破碎’之外，还有种种由于党统治国家而引起的麻烦……必须终于废弃这种‘政治可靠性’的概念……这种概念已变成盲目的、导致国家行政工作困难的不信任温床。”

有如党卫队的纳粹党区领袖埃里希·科赫一样狂热的东普鲁士省长也埋怨起笼罩在自己头上的秘密警察阴影，并要求弗立克消除这种情况。1935年9月23日，弗立克写信给希姆莱说：“我认为，省长和国家警察局长之间目前的关系长此以往是不能容忍的，并大大有损国家的威望。”希姆莱以老练的口吻回答道：“领袖业已决定，柯尼斯堡<sup>①</sup>国家警察的职权不作任何变动。”尽管如此，官员们对警察机器仍然长时间施加压力，直到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声明同意跟中央内政部商谈制定一项新的秘密警察法。

经过几个月讨价还价，1936年2月10日颁布了新的秘密警察法，它实际上确认现状，但是在第五章中说：“各地国家警察机关同

---

<sup>①</sup> 原东普鲁士城市，今苏联的加里宁格勒。——译者

时隶属于该地方行政机关首脑领导，接受其指示并就所有政治警察事务向其报告。”

取得这一部分胜利，使中央内政部的官员们变得敢于进攻了。当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要求内政部依法解决组织上尚未解决的全  
181 国警察问题，作为酬答他们对行政部门所作的让步时，官员们划定了一条新界线来抵制这两个秘密帮派人物。从原则上说问题早已定下来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 1934 年 4 月攫取秘密警察后，在秘密警察处设了一个“邦政治警察司令中央办公室”，负责具体协调德国各邦警察工作和秘密警察计划。

希姆莱实际上已经在指挥全国政治警察。不曾解决的问题只是，党卫队头子应该采用什么形式统治整个德国警察包括其非政治性部分。中央内政部官员幻想将合并后的警察置于中央内政部长统率之下，并通过希姆莱在柏林的竞争者、党卫队副总指挥兼警察中将库特·达吕格来将权力过大的希姆莱挤走。

1933 年 5 月间，希姆莱的竞争者达吕格以普鲁士邦警察司令身分制定了一项计划，规定要——正式提法是——“充实”政治警察。国家改革派弗立克对达吕格的计划表示满意，从此他把这个党卫队队员看成是未来的德国警察头子。当普鲁士邦内政部并入中央内政部时，弗立克也接受了易于驾驭的达吕格，后者于是搬进中央内政部，担任新的警察司长。希姆莱在 1934 年夏季的权力上升，破坏了弗立克的达吕格计划，不过弗立克还是指示其亲信法学家设计一种新德国的警察领导结构——尽可能甩掉希姆莱。

弗立克设计了这样的警察领导结构：德国所有警察统属中央内政部领导；秘密警察督察员希姆莱主管内政部警察司，隶属于中央内政部长领导并接受警察将军达吕格担任常务代表。历史学家汉斯-约阿希姆·诺伊菲尔特评论说，弗立克的战术“显而易见的目的，是将希姆莱改为仅仅担任一个政治代表的角色，整个警察的

实际领导权却抓在达吕格手里”。

希姆莱不同意弗立克的方案。1936年6月9日，保安处头子海德里希代表全国领袖提出要求全部权力：希姆莱必须拥有部长衔，同国防军军种司令的地位相等，授予“党卫队全国领袖兼警察总监”的职称，成为几乎是警察机器的唯一司令，仅仅隶属中央内政部长的“个人”领导（因而这只是一句空话）。弗立克勃然大怒，立即谒见希特勒提出抗议。领袖劝慰这位怒气冲冲的部长：希姆莱同志不会得到部长衔，而只是以国务秘书身分列席参加内阁会议讨论。尽管如此，内政部长还是败阵而归——希特勒告诉他，任命希姆莱的问题已经决定，不容更改。

这位部长只是还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他反对把一个党的职务（党卫队全国领袖）和一个国家职务（德国警察总监）集于一身。他在法律草案中，四次在希姆莱的警察头衔前面加了：“中央内政部的”字眼。他极力坚持他提出的要求，即达吕格必须任希姆莱的“常务代表”。党卫队头子作了细微的让步。他放弃部长衔，同意“直接”隶属中央内政部长“个人”领导。这在颠三倒四的纳粹术语中反正无关紧要。而且他同意称达吕格为他的常务代表，不过只是“在他〔希姆莱〕缺席的情况下”。182

但是，希特勒刚刚于1936年6月17日签署德国警察总监的任命令，海因里希·希姆莱就显出了他那掌握新权力的真实意图。他不仅要求一手控制内政部警察司，而且还要攫取内政部的基本职权：新闻权和武器权、武器运输、签证事务和任免警察部门所有官员包括警察总局局长和分局局长的人事权。

那么弗立克暗中属意的党卫队领袖达吕格结局如何呢？希姆莱让他屈居第三把交椅，因为在这位骄傲自大的警察将军前面，新排上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两人的名字。象以往在巴伐利亚政治警察问题上曾经出现过的一样，希姆莱又给党卫队保安处头子考虑

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他以德国警察总监身分建立了两个主管部门，并将其置于自己领导之下，这两个总处是：“保安警察总处，它统一领导秘密国家警察和刑事警察，处长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风纪警察总处——这是希姆莱将治安警察、宪兵和地方警察统一归口组成的主管部门——，处长为党卫队副总指挥兼警察将军库特·达吕格。

海因里希·希姆莱又一次达到了目的。他一手掌握了希特勒德国的警察。现在， he 可以和海德里希进行伟大计划的第二阶段了：开始将党卫队和警察合并成第三帝国的国家保卫团。

## 第九章 党卫队保安处

183

在主管德国所有刑事警察机构的普鲁士邦刑事警察处里，发出了准备行动的警报。1937年1月27日这一天，邦刑事警察处的发报机向全国各地刑事警察机构滴滴哒哒下达刑事警察中央最紧急的任务：搜捕犯罪分子。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刑事警察中央指示“各地刑事警察机构，迅速将本地区内的所有违法分子，即刑事警察认为的职业犯罪分子、惯犯和一贯危害风化并逍遥法外者，列出名单上报”。刑事警察机构应列表登记，将自己掌握的所有刑事犯逐一编上号码。邦刑事警察处规定：“在执行措施〔逮捕〕时，只需用无线电上报有关职业犯罪分子的名单号码。”

一个月后，准备工作就绪。德国警察总监于2月23日指示普鲁士邦刑事警察处，在3月9日“将近两千名职业犯罪分子、惯犯或危害治安的破坏风化罪犯加以违警法预防性逮捕”。邦刑事警察处的发报机再次滴滴哒哒向全国发布命令。1937年3月9日，全国各地准时进行了大搜捕。刑事警察四处出动，两千名被捕者被送进萨克森豪森、萨克森堡、利希滕堡和达豪等集中营。

邦刑事警察处的行动，揭开了第三帝国非政治性的警察工作史上最不得人心的一章，即预防性打击犯罪活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保安警察——刑事警察也包括在内——将整批整批的人称为危害人民分子，任意延伸防犯罪于未然的概念，根本置法律于不顾。

行动信号是由刑事警察发出的。亚历山大广场上的人长期以

来就要求采取最严厉的预防性措施（确保治安），以防止刑事犯重新犯罪。保安警察领导接过了这个口号。虽然根据德国刑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法院完全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治安，如果它认为有此必要的话，但保安警察却认为法院执法异常拘谨，它的决定过于“温和”，过分讲究合乎规范。

184 因此保安警察独揽大权，将所谓职业犯罪分子加以预防性逮捕，而这在第三帝国意味着关进集中营。其理由是：一个法院只能在个别单独的犯罪事实范围内判断一个罪犯的危害性，而警察则根据其掌握的所有内部和外部情况，对刑事犯作出全面的判断。

这样做当然有一个难处，即警察对某一犯人进行预防性逮捕总是缺乏任何法律根据。任何法律是决不会容许这种做法的。但保安警察知道有一个解决办法——这是保安警察瓦尔纳·贝斯特博士法官后来在一次报告中所阐明的。贝斯特的论据是这样的：警察的做法完全拥有法律根据，因为按照民族运动的法律观点来说，行政机关和每个同胞都是人民的器官，“它们在人民制度下，按照领导制定的法规为实现民族运动的目的而互相配合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器官同样配合行动，警察主动行使职权，“犯罪者则束手就擒，不得不受到预防性逮捕”。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更加冷酷无情和玩世不恭地践踏人类的智理了：罪犯通过听凭逮捕和被投入集中营来给警察帮忙！

预防性打击犯罪的实践，倒是剥夺了正常司法对每个案件进行不抱偏见的审理权利。开始出现了慕尼黑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斯察特笔下评述的现象：“整个人民受到如同栽培作物一样的对待，必须经常每隔一定时间‘摘去’和‘剪除’其不良的枝芽。”虽然当时的德国犯罪活动并无明显的增加，但对保安警察来说却是捕人的旺季。德国警察头子或他属下的保安警察头子，经常作出什么时候需要新抓一批刑事犯投入集中营的决定。

预防性逮捕犯人的事例生动地表明，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第三帝国拥有多么大的权力。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36年6月升任德国警察总监，并将保安警察的领导权托付给他的保安处头子执掌，从这时起，海德里希就控制了德国史上这样从未有过的一部统治机器。

在权欲熏心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手里，“保安警察”这个词不用说已经与原来的含义不同了。行政法学家过去所说的保安警察是指整个警察，它分为两类，即**行政警察**（比如交通警察或工商警察）和各种**执行警察**：刑事警察、治安警察、政治警察和宪兵。希姆莱却将执行警察中的两根主要强权政治支柱，即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拼凑成一种新的保安警察（Sipo），把它置于海德里希的领导之下，而将执行警察的其余部分和行政警察交给他在党卫队内的竞争者库特·达吕格，合并成新的风纪警察（Orpo）。185

保安警察头子海德里希建立了一个“保安警察总处”，跟达吕格的“风纪警察总处”同属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总监领导，并构成中央内政部的一个司。但是保安警察总处由于警察法的原因不能发布逮捕令或进行审讯，因此它必须依靠已有的两个警察行政机关：一是依靠秘密警察处（Gestapa），这是普鲁士秘密警察的最高邦机构，以及行政上领导全国所有各邦政治警察的最高中央机构\*；二是依靠普鲁士邦刑事警察处，它控制着各邦的刑事警察，并于1937年7月正式取名中央刑事警察处（RKPA），成为最高中央机构，全国刑事警察行政上均属它领导。

秘密警察处和中央刑事警察处也都留在保安警察总处内，作为所谓的全国专业人员中心；只有秘密警察第一处（行政和法律）分了出去，成为中央内政部的直属机构。这三个部分最后合成了

\* 1936年10月1日起，全国所有政治警察统一取名“秘密国家警察”并称所属机构为国家警察局和国家警察分局。——原注

保安警察总处，虽然不在同一地方办公。下分：行政和法律处，处长是党卫队区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地点设在菩提树下大街72—74号中央内政部；政治警察处，处长是党卫队旗队长海因里希·缪勒，地点设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秘密警察处；谍报警察处，处长是党卫队区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地点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秘密警察处；刑事警察处，处长是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阿图尔·奈比，地点（1938年年底起）设在韦尔德尔市场5—6号中央刑事警察处。

一种巨大的势力集结起来了，它力图控制越来越多的国家生活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一个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任何其他国家机关和法律权威都无法插手干预的区域。保安警察总处形式上是中央内政部的一个司，因此海德里希隶属中央内政部长领导。但实际上，保安警察处长不让部长弗立克对他的工作有任何了解——海德里希的几个重要机关和他自己，都待在距离内政部很远的地方，这就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

186 海德里希苦心经营，使他的机构不受任何外来的影响。在他的总处里，眼快手勤的法学家们试图对轻信的公民们证明，警察的专断乃是一种高级形式的法律。整天不甘寂寞的贝斯特认为，警察的工作无需再有任何法律上的规定，因为希特勒的每个意志都在“创造法律和改变迄今通行的法律”。保安处教授赖因哈德·赫恩走得更远。他想从根本上取消国家和作为法人的个人；他认为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领袖规定的人民目的的手段。

但是，国家和作为法人的个人如果消失，公民也就无从再控诉警察的任何专断行为。对于保安警察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无法从法学观点上进行非议，不能诉诸行政法院，不能间接控诉要求赔偿损失，不能控告人身遭受侮辱，更不能运用刑事诉讼程序控告被剥夺了的自由。对于受到损害的公民来说，只有一条十分为难的路



可走：向保安处长提出申诉，要求严加管教下属。

在这种毫无法律可言的情况下，保安警察头子海德里希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赤手空拳的公民。他操生杀予夺之大权，因为他可以发布监护拘留令和将人投入集中营。虽然中央内政部1934年4月12日颁布的基本监护拘留令规定，关进集中营“不得用来惩罚可以判刑的或……可以判罪的案情”，它们只能“由法院加以判决”。但保安警察自认为“朕即法律”，可以推翻和加重法院的判决。

每当犯人服刑期满即将出狱时，海德里希的那些爪牙就已等候在监狱大门口。因叛国或图谋不轨、情节严重而被判刑的人员、刑满获释的共产党干部、所有经人民法庭判过罪的人和被查禁的国际圣经研究者协会会员（该协会的反战口号被保安警察解释为煽动瓦解国防力量），一出狱又都被直接送进集中营。

海德里希及其机关可以任意将政治上可疑者交付法庭和关进集中营。多数是直接投入集中营，而且是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审批的监护拘留——与警方逮捕人的情况截然相反。1937年2月26日，海德里希指示秘密警察处：“我争取今后不再采用警方逮捕人的办法，以免警方采取措施需经法律手续审批。警方逮捕人的法令……是多余的，因为所有这些情况都有可能采用监护拘留。”

然而，海德里希并不满足于抓政治性案件。他不断扩大关于国家敌人的概念。如不足以构成政治性质，就以刑事警察观点作为补充：国家敌人变成了危害人民分子。在预防性打击犯罪的外衣下，保安警察大肆拘捕处在社会边缘、以自己的方式逃避政权的极权指令的人。保安警察不断扩大预防性逮捕对象的范围，危害人民分子的概念日益扩大。

这样就形成了三类含义笼统的够条件关进集中营的人：一是“职业性罪犯和惯犯”，这是指曾经三次判处六个月以上监禁或徒

刑的人；二是“危害社会分子”，这是指乞丐、游民、吉卜赛人、流浪者、妓女、同性恋爱者、不满分子、酗酒者、发牢骚讲怪话者、违犯交通规则者、心理变态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和哄抬物价者；三是“厌恶劳动的人”，这完全是指希姆莱所说的“查明两次以上无正当理由拒绝从事给他们提供的就业机会”的人。保安警察随时随地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些类别和是否应关进集中营。在德国，人们从来没有遭受过由警察局如此任意量刑的特权之害。

尽管如此，保安警察的外貌还是掩盖不住内部的虚弱和矛盾，这使保安警察头子海德里希并不感到相当乐观。他的权力迅速上升，引起了有权有势的党卫队领袖们的嫉妒，党卫队中央主管总局的头头们对海德里希的霸道群起而攻之。生性猜忌的希姆莱也采取紧急刹车，不让他的副手几乎毫无阻挡地往前发展。

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在统治和权力阴谋交织的莽莽丛林中，唯有最善于挥舞大刀劈山开路的人，才能获得高官显爵。权力之争代替了议会的争吵；政治势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主管权限，取决于部属的情况和职权——表面上的级别，形式上的职务，往往并不说明就是强者。但是在这座莽莽丛林中，海德里希的统治是不完整的。他可以发布监护拘留令，但没有掌握集中营。因此他向希姆莱提出把集中营也交给他管辖。他指望，只有将警察和集中营都抓在手里，他才能取得绝对统治权。

集中营构成了希姆莱警察之国的中心，每一个德国人都面临着这个无声无息、但又无处不有的威胁。KZ或（官方语言所说的）KL<sup>①</sup>以其带电的铁丝网和木结构看守塔，给党卫队领导的警察控制系统增添了较为阴暗的现实：这两个字母旨在使德国人循规蹈矩，摧毁一切不顺从的精神。“集中营的主要目的，”欧根·科贡

① KL和KZ一样同为德文Konzentrationslager的缩写，此处分别照用原文，以示区别，为方便起见，以后均译为集中营。——译者

说，“在于消灭民族社会主义统治的每一个真正的和可能的敌人。隔离、毁誉、凌辱、拷打和处死——这些都是用来收到恐怖效果的形式。” 183

集中营世界的党卫队统治者终于也有意识地不考虑把集中营办成政治改造所。轻信的纳粹党员有时以为，政敌关在集中营里是在进行改造教育，经过一段考察期以后就会放出来的。实际上，集中营一开始就是作为恐怖和维护政权的工具而设计的。直到战争最初几年，集中营成了战争经济方面重要的奴隶劳动大军的生产基地，那时的集中营一直是以发挥恐吓和威慑作用为其任务的。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等地的座座骨粉磨就是要让德国人知道，猛烈攻击领袖专政，将会得到什么下场。

“别去想你们的老婆、儿女和家庭了！你们将象狗一样死在这里，”集中营头目卡尔·弗里奇有一次对押送到他所在的集中营里来的犯人吼道。从带刺的铁丝网后面透露出来的集中营罪行报道广泛流传，例如布痕瓦尔德的“马厩”及其处决时枪弹专打后颈窝的装置，囚徒只能侧身蹉缩躺在一起的达豪的“狗棚”，蓄意制造的毛特豪森采石场工伤事故，使阿道夫·希特勒德国的集中营的恐怖和阴森有增无已。

但是，如果海德里希要想一手控制他的统治机构的话，这么一个领袖专政的工具可不能长期处于保安警察的行动范围之外。他一再催促希姆莱把集中营划给保安警察总处。于是继1936年2月10日的秘密警察法之后，也产生一项条例。它包括了由秘密警察处负责管理集中营的这一条。1938年出版的赫尔穆特·施利尔巴赫的权威著作《普鲁士的政治警察》一书中已写道，集中营“直接由秘密警察处督察员管理”。看来象狄尔斯时代那样，秘密警察又成为集中营的主人了。

可是，希姆莱并不肯把集中营真正交给保安警察头子。1936

年的条例根本未付诸实施。希姆莱紧紧抓住对集中营系统的控制权不放，集中营仍然是党卫队的机构。对海德里希来说，重演了他追随全国领袖曾经有过一次切身体会的一幕。那一次是为了达豪集中营；从1933年3月起，达豪集中营隶属政治警察司令希姆莱主管范围，但是当副手海德里希打算把它改为由巴伐利亚政治警察主管时，希姆莱抛出一个人来进行阻挠，不许乳臭未干的海德里希有所染指。

189 这个人名叫西奥多·艾克，他是全国领袖的驯服工具，因为党卫队头子曾经帮助这个不走运的警察和前军需官脱掉了维尔茨堡精神病疗养院的紧胸衣<sup>①</sup>，把他解救了出来；他是被自己的死敌纳粹党区领袖贝克尔关进去的，理由是说他属于“对公众有危险的精神病患者”。“艾克爸爸”至死对希姆莱的解救感恩不尽。

这个和善可亲的绰号是欺世盗名的。在阿尔萨斯人艾克的身上，聚蓄着一肚子的社会怨愤，急于发泄，这是一生事业在开头阶段几经毁灭而导致的结果：1919年艾克就读伊尔梅瑙工业学校，由于穷困而中途辍学。1920年进伊尔梅瑙警察局当谍报员，不久即被解雇。改进科特布斯警校，毕业后拒绝服从分配。跑到魏玛治安警察局，才干了十四天又被解雇。进佐劳警察局，又不肯担任分配的职务。这样一个人只有寄希望于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和党卫队生涯了。1933年6月底，希姆莱给党卫队区队长艾克安排了一份合适的差事：当达豪集中营的长官。

在集中营里，艾克遇到了一群跟他一样时运不济、充满怨愤、拿囚徒出气的人。囚徒贝内迪克特·考茨基在达豪看到了“最麻木不仁和最懒惰的一部分居民。在消灭了失业之后，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感到，除了参加党卫队外，再没有其他办法能既逃避老老

---

① 用以束缚疯癫病人之上衣。——译者

实实的劳动又可以混出点名堂的了”。即使谁还有一点正义感和天良，在艾克这个残暴成性的老手之下，也都很快变成了人面兽心的人。

这个集中营长官后来抱怨说，他在达豪接管的是“一支近一百二十人的贪污腐化的看守部队”，此外党卫队南德大区总队长派给他的，也都是些“由于种种原因他在慕尼黑有意避开的”人。艾克说：“一般人把我们当作只会糟蹋钱财的必然的祸害。”可是艾克采用残暴的管教方法，在他的囚徒大军中建立秩序。他拟定了一份详细的集中营条例，威胁每一个囚徒说：谁要是拒绝服从，将作为“聚众闹事者当场枪毙或随后绞死”。他还灌输手下的看守人员使他们极度仇视国家敌人。

他当着后来担任奥斯维辛集中营长官的霍斯的面宣称，对国家敌人的任何怜悯都是和一个党卫队员称号不相称的。心慈手软的人不配待在他的队伍里，最好趁早赶快到修道院里去。他只能要心狠手辣的人，他们坚决服从一切命令，不是白白地佩戴骷髅标志。希姆莱对艾克在达豪的管教颇为欣赏，以至他决定委任这个前军需官总管所有的集中营。1934年6月30日以后，希姆莱又给这个杀害罗姆的凶手艾克委以特权。艾克当上了所有集中营看守部队的头子。从1936年起，这些部队号称骷髅队(TV)，此外艾克还升任集中营督察员。

海德里希试图破坏艾克统管集中营的权力，结果是枉费心机。不过，他所进行的攻击火力也是有限度的，因为艾克是“集中营督察员兼党卫队看守部队领袖”，受希姆莱直接领导；他只是在表面上隶属于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

海德里希暗中派人收集指控艾克集中营里种种劣迹的材料。这个集中营头子在此期间已将许多分散的集中营并成为四个集中营(达豪、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和利希滕堡)，1937年是囚徒人

数最少的一年，四处集中营由四千八百三十三名鬍鬚队员看守着约一万名囚徒，但有关囚徒遭受牲口般虐待的报告却接踵而来。“在所有各地集中营里作为惩罚的主要形式，”布罗斯察特记述道，“是轮番拷打、关禁闭、惩罚性劳动、采用禁止写信和扣押邮件以恶化拘押条件，此外由艾克在达豪开创的将囚徒绑在树上，以及诸如党卫队看守人员虐待和杀死囚徒等暴行，在这一期间也没有停止过。”

海德里希的法官们开始抨击艾克集中营内对囚徒的虐待，当然其原因主要不是出于人道，而是为了政治权力。早在1935年10月，秘密警察就发布了集中营工作方针，要求集中营长官在囚徒死亡后医生无法澄清其死因时，必须立即呈报检察机关。可是，集中营很少照此办理，相反艾克谆谆告诫他们应残酷无情地对待囚徒。艾克说：任何丝毫怜悯都是向“国家敌人”示弱，他们将毫不迟疑地钻空子。

海德里希派人严密监视艾克的集中营。集中营里设立了政治部，有如保安警察在敌占区里的据点。政治部的人员都是秘密警察或刑事警察官员，他们记下营里发生的一切事件，负责审讯囚徒和保管囚徒卡片索引。海德里希派进去的人员隶属有关秘密警察或刑事警察机关领导，后来也“愈益变成一个不仅叫囚徒们恐惧，同时也叫〔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害怕的国中之国”——贝内迪克特·考茨基这样写道。

艾克预感危在旦夕。他向保护他的主子希姆莱报警。他在1936年8月10日写信给希姆莱说：“秘密警察处里谣诼纷纭，说我所领导的党卫队鬍鬚队将于1936年秋改由各党卫队大区总队领导。这个谣传来自贝斯特博士的办公室。”这位集中营督察员还听到了更为不妙的情況：“秘密警察处党卫队旗队长贝斯特博士在某地声称：集中营的情况糟糕透顶；现在是把集中营重新划归秘密警察领

导的时候了。”

艾克疑虑重重地注意保安警察头子的一切阴谋活动，并作好准备进行战斗。1937年2月，他甚至下令禁止虐待囚徒，因为，“尽管我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完全理解这种作法，但我不能也不允<sup>191</sup>许容忍这种态度，如果我们犯不着冒风险，被中央内政部说成是对付囚徒无能的话。”他孜孜不倦地警告部属，提防自己队伍中的敌人。艾克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声誉和我们的生存权利进行新的搏斗。”

这位集中营总管的顾虑是多余的。希姆莱并不打算把集中营交给这位权力已过分膨胀的保安警察处长。艾克这个名字标志着海德里希统治网上的一个极易戳破的窟窿。

在警察系统内部，海德里希也碰到了对政敌的地下活动破坏不力而对第三帝国权力机器却损害有余的争权夺利的危险区。保安警察处长掌握领导权的要求，遭到警察将军达吕格的反对，在海德里希的帮助下，希姆莱让达吕格坐上了最高警察系统的第三把交椅。

诚然，这位风纪警察处长过于软弱，过于懒散，不敢向海德里希这个竞争者公开宣战，但他掌握着一支唯有普鲁士军队能与其团结精神相比拟的警察部队；普鲁士的绿色治安警察一度是魏玛共和国的骄傲，在第三帝国初期也保持着它的声誉：在它原有的十五万人中，三分之一转入新的国防军，其余三分之二组成风纪警察。风纪警察也经受不住这个政权各种新的诱惑，因为它提供了表面上的安定，光彩耀目的制服和较好的晋升机会，取代了危险的街头的政治格斗和微薄的薪俸。不过国家的一体化并未完全消除风纪警察的成见，因而它始终未能做到象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完全做到的那样，即百分之百地编入党卫队。

全部编入党卫队的企图主要也遭到了风纪警察总处内部文职

官员的抵制，这些官员早在旧中央内政部的官场中即已形成。达吕格的首席法学家、风纪警察总处行政和法律处长、部务主任维尔纳·布拉赫特，比达吕格更加强烈地试图挫败海德里希的称霸计划。

海德里希的手一年比一年伸得更长，有一次他给达吕格写信说，必须把“所有政治方面的事情划为保安警察的管理范围”。布拉赫特从中作梗。根据记录，他说过这样的话：“那样一来，警察将……最终变成替其他当权部门跑腿的差役，本身只有不具备任何价值的指挥权而靠边站了，他只能一味执行别人的命令。”布拉赫特和海德里希很快就陷进了一场堑壕战，为争夺每一点管辖权斗得难解难分。尽管风纪警察和保安警察在1936年明确地分了家——风纪警察仍有几个前哨哨位耸立在对手的地盘内。达吕格  
192 的总处负责各地方警察的行政管理组织问题；刑事警察的预算以及刑事警察和秘密警察的机关房屋问题也由达吕格的总处说了算。

争夺特别激烈的是，决定刑事警察的绝对统治权属于谁的前沿地区。因为民族社会主义政权无数不合理的地方之一是，这个政权搞了种种新的权力机构，同时却又保留着原有权力机构的门面；例如，刑事警察的上层机构虽然也和秘密警察合并成了保安警察，但在中层和下层仍旧保持其原有行政管理的状态。这就是说，各邦的刑事警察机构业务上接受奈比的中央刑事警察处的指示，从而也就是保安警察的机构；同时它们在组织上却属于国家警察行政管理，它们的领导人，即各地警察局长，也各自成为各有关刑事警察机构的头头。这些警察局长反过来又归风纪警察总处领导，因此刑事警察机构间接说来也是风纪警察的机构。

保安警察和风纪警察这两个总处的斗争，集中反映到警察总局。保安警察处处长要求警察总局的权力也必须进行分配。海德里



希写信给达吕格说：“警察总局一分为二意味着彻底实行中央领导权的一分为二。警察总局是你的机关，也是我的机关。”但风纪警察处处长根本不听这一套；战略家布拉赫特暗中给所有同保安警察作对的警察局长撑腰。

海德里希挥戈反击。在跟希姆莱商定后，他任命了保安警察督察员（IdS），他们在各防区的任务是，强使刑事警察和秘密警察在中下层也联合起来。保安警察督察员，变成了受风纪警察控制的警察局长的危险对手；刑事警察机构突然间有了两个主子，哪个主子强就倒向哪一边——多半是倒向保安警察督察员。“自从设置督察员以来……我这个当警察局长的，活动受到了干预，部分地损害了我的权威，”德累斯顿警察局长、党卫队旅队长卡尔·普夫洛姆埋怨说，并写道，他“无法再负责下去了，如果我的职权逐渐被吞掉的话”。

然而，海德里希的督察员们不光是挖警察局长的墙脚，他们也有弥补海德里希王国另一个缺点的任务：刑事警察和秘密警察之间缺少合作。

奈比的刑事警察甘愿卷入醉心于警察权力的浪潮，这种浪潮使魏玛时代根深蒂固的法治思想荡然无存。海德里希向财政拮据的刑事警察提供了一向梦寐以求的东西：从严打击犯罪活动，不受公众和法律的约束——海德里希身边的人的确认认真考虑过要废除检察机关，把调查和代表起诉权一并交给警察。预防性打击犯罪 193  
这一反常现象已表明，韦尔德尔市场中央刑事警察处大楼里的人在保安警察方针上已走了多么远。但尽管如此，还是同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的保安警察主子们隔着一块坚石，这块坚石是任何党卫队人员都休想搬掉的。

甚至阿图尔·奈比在海德里希面前笔挺地站着表示忠于党卫队，他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的高谈阔论后来也证明都是一个刑事警

察存心作出的牺牲，因为他说什么也不让刑事警察被秘密警察吞掉。奈比自有自己的帐，但他的机会主义使副手保罗·维尔纳和执行科科长汉斯·洛贝斯两名非纳粹分子以及危害风化科科长格哈德·瑙克这样的反纳粹派，得以使中央刑事警察处的工作不受秘密警察的制约。

无怪秘密警察领导成员不得不既嫉妒又疑虑地注视着他们的同行刑事警察的事业了。海因里希·缪勒的巴伐利亚小队，是唯一海德里希马首是瞻的、充满改宗转向的盲目狂热主义的公务人员班子，这些人记下了刑事警察的每一个错误和失职行为。这个班子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痛苦地感到自己的活动令人厌恶。1937年的一份秘密警察内部调查报告，透露了缪勒、胡贝尔和迈辛格的怨愤。这份材料的未署名的作者，将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的任务作了比较。秘密警察：“这一行业在公众中很少会引起好感，相反，它会遇到公众多方面的直接敌视。”刑事警察则不同：“在公众舆论中得到充分理解和肯定。”

秘密警察缪勒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责难他的“朋友阿图尔”无能。这两个中央刑事部门的头儿拼命制造内讧，而且奈比还知道，如果缪勒向海德里希建议，刑事警察在打击犯罪活动时必须采用秘密警察的做法，后者是会乐于采纳的。

所以说，力求监视工作完美无缺的海德里希，只能好歹依靠秘密警察，但秘密警察人手太少，远远不可能记下八千万人民中每一点可疑的迹象。秘密警察贝斯特在战后声称，监视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是“根本无法靠为数有限又完全忙于日常事务的公务人员所能做到的”。巴伐利亚发生的一桩巨骗案，表明了海德里希的控制网漏洞百出。该地的高级机关，被一帮政治骗子、酒徒和患心理变态症者蒙骗了长达三年之久。

这个帮派的头子是慕尼黑前工厂主埃米尔·特劳戈特·丹察

森，他是一个政治上好出风头的人，早在1932年就参加过由党的大法官布赫所精心策划暗害冲锋队头子罗姆的阴谋。这个罗姆的宿敌感到自己被党的领导出卖了，在冲锋队头子伏诛后，他显然指望 194 终于能得到应有的犒赏。当奖章和头衔都未能捞到时，丹蔡森决定暗中伺机报复。

他跟一批出于种种原因同样对党怀恨的老战士纠集一起，其中也有因触犯刑法和失宠于纳粹党的血旗勋章<sup>①</sup>获得者，包括1923年希特勒政变中的旗手、多次吃过官司——最近一次是侵吞慕尼黑拳击俱乐部一万六千马克公款——的阿尔贝特·阿姆普勒策尔以及慕尼黑纳粹党全国指导处的职员埃里希·格鲁尔，据秘密警察一份报告说，他是“严重心理变态病患者，完全靠服用麻醉剂过日子”。

这帮怪诞不经的人物在1934年末搞了一个组织，其任务是将其的成员安插到有利可图的职位上，同时建立一个使党心惊胆寒的情报组织。发起人丹蔡森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从现在起打出“党卫队保安处”的旗号，他满有把握地认为，对于保安处的人，新德国的任何机关都不会拒之门外。

这位“保安处的丹蔡森”很快变成了巴伐利亚首府的有势力的人，谁也不愿失去替这个诡秘的保安处效力的机会。短时间内丹蔡森就拥有六十九名工作人员，他们的联络线从党卫队南德地区总队本部通到慕尼黑警察局政治部，一直通到褐色大厦。一批公务人员和警察局的警官热心为他们提供有关单位和重要人物的情况。在巴伐利亚邦劳动局和普法尔基兴、德根多夫、魏森堡、施魏因富特以及班堡等地的劳动局里，丹蔡森的心腹们也安下了眼线。

---

<sup>①</sup> 即1923年11月9日政变勋章。——译者

邦劳动局的灰衣主教<sup>①</sup>、前冲锋队区队长汉斯·卡伦巴赫，是丹蔡森最亲密的合作者。秘密警察后来证实：“他是局里一致公认拥有各种关系，可以直通领袖的人。凡是有所企求的人，都跟着卡伦巴赫的屁股转。”依靠卡伦巴赫找到工作的巴伐利亚老纳粹分子，甘心争当他的心腹。据说卡伦巴赫专给老战士介绍工作。连邦劳动局副局长也相信，卡伦巴赫是受党的委托给全国的老纳粹分子安排工作的。

直到丹蔡森开始用搞到的内部材料，向包括慕尼黑警察局长在内的纳粹高级干部进行讹诈，秘密警察才警觉起来。1937年春，秘密警察揭穿了那个冒牌党卫队保安处的蜘蛛网。但丹蔡森在警察局里的朋友这时还不肯放弃自己的想法，即他们确实是为真正的保安处效力的。

海德里希非常现实地看到，在自己的监视和控制系统中有漏洞。单靠秘密警察，他是无能为力的，现在必须开辟第二条战线，  
195 现在是启用另一个同样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担任第一把手的组织的时候了。这个组织就是党卫队保安处(SD)。

党卫队保安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崭露头角。对于民族社会主义上台，保安处实际上没有起到什么值得一提的臂助作用，为数可怜的一百名处级机关的和一百名名誉领袖的保安处人员（1933年秋），只是扮演了无足轻重的跑龙套角色。希姆莱也不用保安处的有力配合，就攫取了各邦警察机器。长期以来保安处默默无闻，连党卫队队员们也不大清楚“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是为什么使命服务的。

达豪特别机动部队党卫队三级小队长阿道夫·艾希曼以为，保安处是希姆莱的卫队，他怀着“可以到处转悠，有汽车代步，只要

---

<sup>①</sup> 灰衣主教是法王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的顾问佩勒·约瑟夫的绰号，喻在幕后操纵的实权人物。——译者

留神不出事情就行了”的想法向保安处报到，结果很快就“大失所望”。保安处门徒奥托·奥仑道夫原以为保安处是个情报机关。奥仑道夫说：“首先令人失望的是，在1936年还根本不存在一个作为情报组织而设立的保安处机器。”

党阀们显然并不怎么把保安处的人放在眼里。1933年秋天，纳粹党区领袖施普伦格将保安处领袖贝斯特博士从黑森警察局长的位子上挤走；更丢脸的是不伦瑞克纳粹邦政府总理迪特里希·克拉格斯对保安处的打击。1933年夏，保安处阴谋反对克拉格斯和两个同希姆莱竞争的党卫队领袖——邦司法部长阿尔佩斯和警察头子耶克尔恩——，并企图推翻克拉格斯集团，那时邦总理向党的最高法庭控告了保安处。保安处主子希姆莱赶快扯起了白旗。不伦瑞克保安处长被逐出党卫队，并送进了集中营，他的重要心腹被解除职务，保安处办事班子负责人被押送党的法庭。同时希姆莱还不得不把高级党卫队头衔送给保安处的冤家对头，党卫队队员阿尔佩斯晋升为旗队长，本来不是党卫队队员的克拉格斯一下子当上了地区总队长。

保安处一时威信扫地，党不得不在精神上给保安处以新的支持。1933年年底，马丁·鲍曼起草了一个致党的各区领袖的通知，驳斥保安处行将解散的谣言，这估计是应希姆莱的要求而写的。可是在千载帝国崩溃之后，人们看到历史学家笔下所叙述的却与此并不相同。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保安处成立伊始就是一种恐怖组织，一个渗透到所有地方的秘密帮派，象欧根·科贡所写的“即使在党内也四处作祟的”恐怖之神。

其实，在民族社会主义政权的最初几年中，保安处与其说是一个严格的情报机关，不如说是由天资聪颖的青年领袖组成的一帮子人。但尽管如此，它在当时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保安处是党领导能够利用的唯一的、由中央指挥的组织。 196

这是因为：1933年1月30日以后，在传奇性斗争时期的饥饿岁月中好不容易达到团结一致的党，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党的中坚分子在柏林已攫取了国家发号施令的职位，而党内中小头目们则在外省争夺战利品，建立他们的封建王国。在这座党内派别集团相互格斗的原始森林中，只有保安处起到了不受地方党阀们制约的党领导的独立组织的作用。保安处人员经常和警察配合，监视大小新主子们的阴谋诡计，开始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监视和观察系统。

这个谍报机构的幕后操纵者可以假借党领导委托之名，调查和揭发纳粹党内的敌对分子。党领导还鼓励保安处提高警惕；1934年6月，鲁道夫·赫斯宣布它是纳粹党的唯一情报机构。

情报工作的传统浪漫色彩和保安处公开反对“小希特勒们”的态度，吸引了一批年轻的纳粹知识分子，他们除了为升迁发迹外也还有一个目的，正如他们中间头脑最精明者之一冈特·达阿尔克文至今仍是这样描述的，为了“更好地干民族社会主义”。在短时间内，保安处变成了民族社会主义从未想到要起用的最有知识的人的集中地。

这些人是三十年代初德国中产阶级遭受社会解体的打击后从支离破碎的情况中出现的，他们是不再相信自己还象战前优越的资产阶级的后代。从1900年至1912年期间出生的青年人，深受德国青年运动中民族运动派的影响，他们成熟在这样的年代，即反对魏玛时代动摇的民主和亟需一个较好的、远比西方国家优越的特别适合德国国情的政权以取代“没落的”共和国这一信念蔓延的时期。

促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和凡尔赛〔条约带来〕的创伤，以及唯有最严格的纪律和个人牺牲才能恢复祖国旧有强国地位的迫切想法。他们的老师们的爱国主义箴言更激起

了这些青年人的盲目爱国激情。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攻读法律，而在德国各大学法律系占主导地位的都是主张国家万能的训导。青年人在实证主义的法律传统中长大，这种传统早在1892年就促使法学家贝格博姆写下了这样的信条：对法学家来说，即使最卑劣的立法权也有约束力，只要它是通过合法形式产生的。

青年人变成了法学机能主义者，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最高使命是用一系列天衣无缝的法律和条文才能确保国家的权力要求。对他们说来，国家是人们必须为之作出一切牺牲的上帝。法律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能给国家提供用以顺利实现其目的的司法手段。 197

可是，他们想要为之效力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呢？青年们认为，独裁是适合于领袖风格的，因为它把缄默不言的社会全部交给一个人来负责——这是1929年一位青年运动家在《德意志汇报》上所写的；在民族运动派资产阶级子弟们的心目中，再没有比实行民族社会主义独裁更为理所当然的了。青年人愈是眼看资产阶级社会遭到灭顶之灾，他们也就愈是赞助独裁。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使青年人完全失去了依靠，尽管他们也参加了父辈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感情上同世界银行和康采恩的破裂，给青年知识分子注入了一种毒素。许许多多的人把这种毒素当作经济改革的血清：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主义在纳粹青年头脑中，同国家理性的教条掺杂成一种实质上不讲教义的动力，成为一种统治的技术，它只是坚定不移地依附于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权力：国家，或者具体说：仁慈的领袖。还有一种逐渐背离资产阶级道德习惯准则的趋势来适应这种无依无靠的社会地位。统治，即权力本身，成了新的伦理准则，成了自命为中坚力量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它早已超过了党的老战士们心目中的那种庸俗民族社会主义了。

无论如何，第三帝国的这样一种新制度应该体现为“明智的”，

这种一人专政应该体现为合乎情理的，这样的民族社会主义革命不致于违反人类智慧的基本原则。然而，纳粹青年知识分子们实际上看到的，却往往是最原始的权势欲，是达官显贵和夤缘时会的冒险家们的侈谈世界观，是许多党阀们的狂妄自大。他们没有想到第三帝国竟会变成这个模样。

突然，他们听说党卫队内有一个以揭露国家弊端和匡正错误倾向为己任的组织。这个组织看来不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党卫队保安处背后站着一个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对于许多不满分子来说，保安处提供了一线希望，一个救星。汉诺威的农家子弟（1907年生、1925年入党）、法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奥托·奥仑道夫，就是这样一个过来的人。

奥仑道夫反对已经变质的、自认为的民族社会主义蜕化现象，已历时数月之久。他在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同自己的朋友和老师  
198 国民经济学教授詹斯·彼得·耶森一起，反对党内的国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潮——，言辞这样激烈，以致他们终于被带进了秘密警察的审讯室。“我的心里有些动摇。我再也没有过去那种为我们的民族社会主义奋斗的无忧无虑的坚定信念了，”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这样诉说。这就是纳粹分子奥仑道夫的下场，党再也不容忍他在公开场合发表抨击性的演说了。

但是朋友耶森的提议使他从这种绝望中解救出来。耶森要他不妨去找在柏林威廉街102号保安总处担任一个中央部门领导人的赖因哈德·赫恩教授，那里有个经济助理的位子空缺。奥仑道夫去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赫恩告诉他，保安处正需要象奥仑道夫这种有分析批判眼光的人。他被录用了。

继奥仑道夫之后，其他纳粹知识分子纷纷涌进保安处。这样，除了原属保安处初创时期的年轻人，象黑森党卫队领袖贝斯特博士和萨克森律师赫伯特·梅尔霍恩博士这些能干的调研人员之



外，又增加了一支更加年轻的、具有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组成的卫队。1933年10月，厌恶纳粹报刊千篇一律的报道的纯血统记者兼《人民观察家报》编辑冈特·达阿尔克文参加了保安处。随后，海德里希的老朋友、威廉港法学家赫尔曼·贝伦茨博士接踵而来，而保安处教授赫恩则逐步把一批多半在他熟人圈子里的纳粹专家顾问人员拉进来。

人们相约加入保安处：政治学家赫恩向推荐自己门生奥仑道夫进入保安处的同事耶森频送秋波，但耶森谢绝入伙；相反赫恩拉来了另一位同行政治学家弗朗兹·西克斯博士，后者又将自己的学生、本来有志于当文学教授的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吹捧一番，使他进了柏林威廉街。对保安处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纵队的第一号殿军，是一个功名心切的年轻萨尔布鲁根人，名叫瓦尔特·施伦堡，1910年生，法律和政治学家，他早在波恩上大学时就给保安处做过情报工作。善于识别人才的海德里希看出，他是一个可以培养成符合自己要求的人。

一支由机敏的知识分子拼凑成的保安处骨干力量，使海德里希摆脱了威胁他的警察国家统治机器活动的危险处境。在此之前，他的系统内的要津全被秘密警察占据，因此保安警察头子不得不担心会过分受制于秘密警察及其公务人员精神。因为即使是秘密警察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忠诚也掩盖不了以下这一点，虽然它的方法都是新的，但是在它内部仍旧活生生地存在着普鲁士德意志行政传统的残余。连秘密警察法官贝斯特也早就露出了维护旧公务人员体制的本来面目，妨碍着海德里希用革命的动力来取代一个专业公务人员体制的企图。 199

海德里希和贝斯特之间已发生过最初的分歧，因为这位法官过于以不凭公务人员个人感情的客观态度来对待保安警察头子。一条本身无可非难的墙上座右铭揭示了他俩之间日益加深的裂

缝。公务人员将贝斯特博士自己拟的一条座右铭写在一块牌子上，挂在他的办公室里：“实事求是地工作终将无敌于天下。”当海德里希某次来访，看到这条座右铭时，感到不是滋味。海德里希说：“这个也许能使到这里来同您谈判的部务参议们看了会感到喜欢，但在现实中，这句官僚主义的信条却是荒谬的！”

在任命秘密警察各级人选时也发生了摩擦。海德里希要派听话的、不拘泥于任何条文规定的非法学家担任主管，而贝斯特却提出只能考虑法学家。海德里希对法学家的看法跟他的领袖相似，因为领袖说过：“在德国人没有都懂得当法学家可耻之前，我是不会安心的。”

这里预示了一场冲突，海德里希显然想要通过加强保安处的工作使之得到缓和。1935年年初，他玩弄了一套花招，直到后来还叫历史学家们感到非常莫明其妙。海德里希把保安处一分为二，仿佛一夜之间出现了两类保安处：一是**党的机构**的保安处，规定吸收所有保安警察的成员参加，它是争取将整个保安警察中的公务人员队伍并入党卫队的工具。二是**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如同海德里希的助手施伦堡所言，它是“灵活的工具，人民身躯上的、一切敌对集团内的、一切生活领域内的触觉和感觉器官”。

海德里希利用这一着棋，使自己摆脱了固执的秘密警察官员们的压力。保安处的贝斯特和只是为了表面光采以保安处的职衔装饰门面的缪勒及胡贝尔之流，被作为党的机构的保安处成员从真正的保安处分出去了——这是解释保安处领袖贝斯特和缪勒后来为何千方百计抵制保安处打入秘密警察这一奇怪现象的唯一原因。不过现在，海德里希给情报机关的保安处开辟了一个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活动领域，遵循保安处头子提出的口号：保安处的使命是成为大德意志国家的情报局。

保安处原有监视机器的范围扩大并改善了。由党卫队旗队长

西格弗里德·陶贝特以处本部负责人身分代表头目海德里希(他在附近的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办公)坐镇在威廉街的保安总处,增设有新的部门和指挥所。

单看这一机器的组织机构,即已证实了海德里希传记作者什洛莫·阿伦森的看法:保安处的年轻人“迷恋于能够从事神秘的谍报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想法”,陷入了一种詹姆斯-邦德<sup>①</sup>式的踌躇满志。他们的楷模确实很少取自民族社会主义修身养性的课本,更多地却是取自大力渲染英国情报工作的那些侦探和冒险小说。例如侦探小说迷海德里希不知从哪本书中看到,英国谍报局头子用简单而神秘的代号“C”(chief=Chef<sup>②</sup>);他就摹仿这位老大哥的作法,从此“C”象幽灵似地出现在保安处的一切行动和公文案卷中,如“C命令”或“C亲自决定。”甚至连公章也要炫耀这个几乎从不公开露面的头子的魔力:“C审阅。”

以从事情报工作而表现的天真乐趣也反映在数字神秘学上,所有各处、中央和主管部门、科组的名称,均以数字代替。保安总处的三个处用罗马数字表示:I=组织处,II=镇反处,III=国外处。反之各处的下属机构则相应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例如:I<sub>1</sub>为中央“组织和督察”科,I<sub>2</sub>为“组织任务”主管科,I<sub>3</sub>为“人事任免”科,I<sub>4</sub>为相应的组。

最重要的中央和主管科除唯一的一个例外,全由大学毕业的学者和博士担任领导:工学士威廉·阿尔贝特博士领导中央“组织”科,法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赫伯特·梅尔霍恩博士领导“勤务督察”主管科,教授弗朗兹·西克斯博士领导中央“世界观镇反”

① 詹姆斯-邦德 (James-Bond) 是英国作家艾恩·弗莱明 (Ian Fleming, 1908—1964) 1953 年起发表的一系列间谍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

② chief 为英语, Chef 为德语, 释义为首脑、负责人、(……)长、头子。——译者

科。教授赖因哈德·赫恩博士领导中央“生活领域调研”科，党卫队区队长海因茨·约斯特领导中央“反谍情报”科。

这个情报总部的线通向保安处的七个大区(OA)的本部，大区管辖的地区不是(象普通党卫队大区那样)和军区一致，而是和行政区一致。各大区的情报网又划分为二至三个分区(UA)，分区情报网再各自伸展到一个县或一个大城市的保安处外勤站。外勤站是保安处情报机构最重要的细胞。

“每个外勤站站长，”1937年春“西北”大区保安处向其部属说明，“无论如何必须争取在他的县区境内每个地方设置一名或几名情报员，每名情报员又要建立自己的眼线。例如D.外勤站有三十二个乡镇，外勤站站长必须在每个乡镇发展一名情报员，代表党卫队保安处在该乡镇的利益……情报员的任务是在他所在的乡镇境内建立一个眼线网。”但是：“绝不让眼线知道他们是为党卫队保安处工作的。情报员还应发给报告簿，每天用复写笔按电报格式写汇报，据说这也许是开展工作的好办法。不久，情报员就不乐意干了，因为外勤站站长要求他们写索然无味的汇报。一般群众都不愿意摸笔杆子。”

在城市，外勤站的设置和辖区都跟纳粹党的地方组织一致，而大专院校里的情报员则由所谓的党卫队保安处工作组统一掌握。那么什么人可以当情报员呢？一切“具备必要的常识、且能逻辑地和客观地思考”的人，都属此列，“西北”大区保安处这样说，并举出象“教师、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冲锋队和党卫队领袖、地方农民领袖、兽医和有条件的退休公务人员”，都是“现成的可以担任这一工作的人”。

在这支保安处情报人员大军中，只有少数人是党员和党卫队员。保安处领袖海因茨·赫普纳在战后估计，总处一级的保安处成员中，有百分之十来自普通党卫队，百分之十的名誉职务成员

原属党卫队。有时连证据确凿的政敌也被保安处拉来，向他们了解对纳粹党的批评意见。

情报象水母那样，将它的触手伸向德国所有社会领域。同保安处合作的不光是低微的告密者和密探，同样威廉街也利用知名的法官、企业主、艺术家和科学家为它工作。象在中央一级工作的各种专业青年学者一样，各外勤站也有一批知识分子骨干作为“报告员”参与工作。科布伦次区保安处 1938 年有二十四名左右名誉合作者，其中四名得过博士学位。该区十一个特别知名的情报员中，四个是普通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四个是警官、一个医生、一个教师和一个兽医。

尽管如此，情报机关的知识分子对“密探”这个词还是羞羞答答地不表好感。“如果纳粹德国竟然……求助于密探和间谍，这也许是有失它的体面，”亲保安处的警察理论家施利尔巴赫这样写道；甚至在一份不对外发表的保安警察文件中，也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不允许进行职业性间谍工作!!!”在保安总处里，人们对密探敬而远之，几乎是授受不亲。阿道夫·艾希曼回忆道：“我们不认识任何情报员，也从未有任何情报员进过总处的大门。”直到后来那些秃顶的先生们<sup>①</sup>久已释怀之后，瓦尔特·施伦堡才使情报员制度走向正规化：从这时起，中央机关才认识自己的情报员了。

对于每个情报员的情况，威廉街都逐一立了档案，分为两种卷宗夹保管。一是卷宗夹 A，又名组织卷宗，其中收入情报员的代 202 号、一份不具名的生平简历、保安处内部的审查结论、志愿书、有关情报员担任的工种及其在保安处情报网中的组织联系情况材料。卷宗夹 B（“使用卷宗”）则放入有关分配给情报员的具体任务的所有材料、按 1 分（“优”）到 5 分（“完全无用”）评分的情报员送来的

---

① 指党卫队保安处的知识分子。——译者

报告，以及发给情报员的所有经费数字。两类档案中的任何材料上均不得暴露情报员的姓名。情报员的姓名只有两处地方可以查到：用来查阅情报员卷宗的情报人员卡片索引，和统一管理各保安处情报员卡片索引的中央情报人员卡片索引室。

保安处的监视网一年比一年细密，它的魔掌越来越紧地控制着全国。1937年保安处情报机构已拥有三千名总处一级工作人员，一支五万名看不见的情报员大军随时准备待命行动。

可是谁是行动的对象呢？保安处要监视什么，要调查研究什么呢？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在斗争时期，保安处的任务只限于清除纳粹党队伍内部的敌人，了解敌人方面的动向。这种任务一直是令人置信的，因为当时甚至连警察权力机器也掌握在敌人的手里。但是1933年1月30日以后，党已经接管了警察机器；对敌人，不论什么样的敌人，现在都可以运用警察手段予以打击。

因此保安处开始时只限于扮演一种辅助警察的角色。希姆莱在1934年7月4日宣布，保安处是“秘密警察的唯一政治谍报机构”。半年后，这位党卫队头子又发布指令：“党卫队保安处负责调查抵制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敌人，并推动国家警察部门开展打击工作和谍报工作。”但它不得行使任何执行权。可是保安处为了充当秘密警察眼线的角色过于自豪了，它为自己想出了一项新的使命：保安处应成为一种精神警察，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

希姆莱解释说：“党卫队保安处是党的、说到底也是国家的大型世界观情报组织……保安处关心的是世界观的大问题。”保安处以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保卫者自居，把新的工作领域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按照希姆莱的说法即“共产主义、犹太民族、共济会、极端拥护教皇思想、政治化教会和复旧活动”。但实际上这只是原有斗争任务的新提法而已，保安处的人统称之为“镇压反对者”。

“C”开动他的情报机器。保安处的密探们到处探索人民群众思想意识上的一切棱角，不放过任何机会去捕捉同胞心房里的杂音。威廉街大楼里不停地发出命令、电报和电话，使特遣队疲于奔命。 203

1937年11月25日，莱茵大区保安处通知科布伦次：“最近的多次报告和情报一再提到，特别法庭的判决在居民中遭到强烈的抨击。请详细研究，特别法庭的判决是否确实以及在哪些方面……遭到抨击……盼尽快复命，谢谢。”

1936年5月27日，西南大区保安处报告保安总处：“对法院在种族凌辱各案中的裁决无法理解……概言之，可以证明，上述案件中没有一件哪怕是比较充分地使用了法律的可能性。直到今天还根本未正式宣判处以徒刑，虽然根据案情是完全可以宣判的。”

保安处第037号形势报告：“民族社会主义在这一地区〔科隆〕受到天主教的攻击，情况严重。在这里将决定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成败……攻击希特勒青年团员（如在奥利瓦、科隆），撕毁希特勒青年团标语（如在奥格斯堡、阿尔滕霍芬）。针对希特勒青年团的宣传……辱骂和动武挑衅。”

1937年3月21日，保安总处指示各大区保安处：“应对全国各地现有ZVfD〔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地方组织的活动及其所有下属机构进行监视……对于其成员……必须加倍注意。必要时，可要求有关地区的国家警察局检查邮件和监听电话。”

德国人不论走到哪个公众场合，都会有保安处的影子跟随。1938年1月26日，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格里伦贝格尔报告随“精力来自欢乐”的游船“德意志人号”所作的意大利之行说：“度假者弗里茨·施瓦内贝克，1901年3月30日生，住米肯贝格的费罗居民区，他在唱国歌时态度吊儿郎当，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使人看了反感……度假者共六十名……进港太晚。旅行结束的会上对

此进行了严厉申斥……违反外汇管制条例……”

每当骗人的选举临近之际，保安处就得准备倾巢出动。如同1938年4月4日埃尔富特外勤站的一份指令所说，它在选举之前即已开始将“该地区内所有可以肯定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准备投‘反对’票的人”上报给保安处。不顺从者的名单一经上报，给嫌疑分子用的选票也随即准备好了：选票上用不带色带的打字机打上号码，同时在选民登记表相应的姓名后面分别注明这些号码。这  
204 样——1938年5月7日科布伦次区保安处报告说——，就能“查出投废票或反对票的人……涂上脱脂牛奶即可显现出来。”

保安总处的案卷、资料和分析报告年复一年地增多，堆积如山，上面记载着被怀疑的公民的一举一动。II处112科收集了至今还时而表现出不顺从的《法兰克福日报》主编鲁道夫·基歇尔在魏玛时代写的文章，一份资料中说，这些文章“很能说明基歇尔的真实政治态度”。纳粹明星记者施瓦茨·范·贝克尔不走运，倒了霉，他在一篇巴勒斯坦报道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犹太人也将为他们自己的事业战斗捐躯。保安处教授西克斯的亲信兼捉刀人、二级小队队长哈根咒骂说：“一个记者，尤其还在一份纳粹主义的报纸上公然承认，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内部的某些情况出于宣传的原因而只字不提，我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

保安处也不遗余力地在可能情况下，提供材料证实不受欢迎的非纳粹人的出身系犹太人。恩斯特·泽拉菲姆和海因里希·泽拉菲姆两位波兰裔教授，驳斥党所散布的他们系犹太人后裔的谣言，而保安处却看出有机可乘，“根据这里掌握的事实证明泽拉菲姆兄弟是犹太人出身的说法”。人们小心谨慎地着手，由保安处人员奥格斯堡怂恿波兰的德意志人协会，拉拢一名波兰大学生查明泽拉菲姆的家谱，不过要注意，注意：“在跟II处112科商量时，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西格斯批准了奥格斯堡提出的办法。但告



诉他千万不可以泄露是谁委办的。”

然而海德里希并不满足于他的影子部队悄悄地开始对全国布下的统治之网。要实行极权主义的思想统治还得制造声势，要在思想意识方面进行轰鸣，要有世界观整顿员和检查员摇旗呐喊。海德里希同推行民族社会主义新闻政策的最古怪又最可怕的机构勾结起来了，这个机构就是冈特·达阿尔克文的《黑色团》周报。

埃森羊毛商的儿子达阿尔克文，背叛了自己家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资产阶级传统，成为希特勒青年团开创时期的领袖之一，很早就意识到党所说的新闻工作是指什么。在穷得可怜的《不来梅民族社会主义报》报馆——稿子是手抄的，因经费短缺电话线被切断，排字机又老掉牙——和在条件虽较好但效果不大的《人民观察家报》国内政治栏的时期，达阿尔克文有时怀疑过，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能否当个名副其实的记者。

他那飞黄腾达的打算一开始就遭到了挫折。1934年初，党的出版者马克斯·阿曼让他任柏林《进攻报》的主编，并请他草拟编辑方针。“这时我干了一件蠢事，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蠢事，即我说了真话，”达阿尔克文说。“我提出了这种观点，即必须要有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如果不希望国家毁于动脉硬化症的话。”党使这个狂妄分子碰了一鼻子灰。

几个月后，达阿尔克文在一列火车的卧车车厢里，同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维特耶邂逅相逢，他们是同车去西里西亚参加一次边境地区党卫队碰头会的。他给维特耶谈了自己主编位子被丢掉的经过。“嗨，冈特，”维特耶安慰他说，“我去找海因里希谈谈。现在连冲锋队和每个草本植物协会都有报纸了，干吗党卫队不也办他一份呢？”等到兜售这一想法的维特耶去找全国领袖时，已经晚了几天；马克斯·阿曼已先行劝说希姆莱批准了相同的方案。希姆莱还胸有成竹地为报纸取了个名字：《黑色团》。不过维特耶还

是没有白忙一场；冈特·达阿尔克文接到了任务，担任纳粹行话所谓的党卫队自己的报纸的总主笔。

迂腐刻板的希姆莱坚持要给保安处这个才二十四岁的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就办报业务作了冗长的训话。达阿尔克文说：“他简直一窍不通。”对于报纸的名称，他们也意见不一，达阿尔克文考虑用《运动》，希姆莱却不肯改变自己的意见。直到创刊号出版前两天，达阿尔克文才让步，并和党的漫画家汉斯·施魏策尔-姆耶尔尼尔日夜加班，设计出了报头。同时，由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与党的弗兰茨·埃尔出版社签订合同，由它保证承印四万份。

1935年3月6日，“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卫队报、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机关报”——副标题如此——创刊了。达阿尔克文带领六个同事，把报社设在柏林齐默尔街88号，《黑色团》的发行量迅速增加：1935年年底，这份每逢星期四出版、由最初每期十六版增加到后来二十版的报纸，发行量达十八万九千三百一十七份，1937年增为五十万份，在战争期间更增至七十五万份。

达阿尔克文办的这份报纸成绩卓越，因为它使经过了国家一体化的德国人既感到震惊，又为之着迷。《黑色团》仇恨教会和犹太人，对他们大肆讨伐，它恶毒攻击资产阶级和公务人员，气急败坏地咒骂不愿趋炎附势的德国人毫无羞耻之心，但它也使人们听到了另外的一些声音。因为这份被人民群众称之为“唯一的反对派报纸”的《黑色团》，在自己的版面上反映了党卫队保安处秀才们的不同观点，他们想做激进而明智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他们试图把  
206 在国家现实政治生活中不容许做的事，至少用语言表达出来：他们要唱对台戏——反对趾高气扬的党阀，反对党内的腐败，反对褐色的卖官鬻爵行径。

“任何一次革命之后，”1937年1月21日《黑色团》说，“都存

在僵化的危险。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回顾了历史……旨在从历史中学习政治结构。因此在某些人看来，这种新形式反抗的必然性是意想不到的。”他们敢于在某些方面讲真话。他们显然厌恶一种作法，即“民族社会主义者即使才疏学浅，也非当官不可”，他们反对党的“靠革命发财致富者”，这些人“把每个没有党证的人打成二等同胞，打成可厌的人，特别是，如果个别赤贫者曾经一度当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话”。

当慕尼黑纳粹分子在1935年夏作为全国砸玻璃窗之夜的预习——砸毁犹太人商店橱窗时，《黑色团》谴责这种“罪恶阴谋”，并写道：“街头恐怖解决不了我国人民最迫切的问题之一的犹太人问题。”在谈到“健康的人民感情”时，人们读到：“一位自信的法官对自己所作出的判决无需采用词义含糊的概念……陈述理由。”党卫队报纸劝告自己的警察，使用国家敌人一词应稍加慎重，因为：“树敌过多，害多利少。”在另一处写道：“应进行一次详细统计，有多少案件是根据私下告密和出于公报私仇而起诉的。”

许多读者对党卫队报纸寄予信任，因为它显然审慎地考虑了第三帝国的情况。主编达阿尔克文还给读者鼓劲打气。他在1937年2月18日撰文指出：“读者们一开始就能深深感觉到，我们不仅希望别人看我们的报纸，而且我们自己也要了解人民的心情、意见和经验。”

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保安处长海德里希想把《黑色团》纳入自己的监视系统。这里不只是控制人们思想的喉舌，而且也是源源不断地输送有关公民生活和思想情报的渠道。海德里希同达阿尔克文一拍即合。保安总处给《黑色团》的打字机和轮转机提供新闻消息，总主笔则将读者来信择要抄送威廉街102号。达阿尔克文还叫手下赶印专供加强总处和总主笔之间信件往来用的表格，表格上有这样的话：“谨将我们读者的一封来信附寄给你们。请签注

207 意见或阅后赐还。麻烦之处，谨致谢意。希特勒万岁！”

例如，1938年6月7日，一个名叫保罗·科赫的人写信给《黑色团》说，施特拉尔宗德街37号肉商古斯塔夫·席韦克，一向用“某犹太厂商的广告单给他的顾客包肉”。密告者科赫说：“难道不能将这个人碰个鼻青脸肿，教训他一顿么？”《黑色团》在6月21日把这封信转给“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保安处，西克斯博士亲启”。随后这封读者来信到了II处112科，过了两星期，它被签上“请查明处理”字样，送到东部大区保安处。1938年7月8日，保安总处函复齐默尔街：“信悉，保罗·科赫一信已转所在地区国家警察局，俟调查结束后即予报告。”

《黑色团》的编辑们拿自己的报纸同保安处进行密切合作，迅即习以为常。在《黑色团》的笔杆子们看来，保安总处是一个大档案馆，它的秘密报告任凭党卫队机关报使用。“莫根施特恩是犹太人还是犹太杂种？”达阿尔克文的副手、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鲁道夫·奥斯·登·鲁滕从拍纸簿上撕下一张纸，写了一个便条问保安总处，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威廉街的同志们不断帮助主笔们查找资料。

比较重要的文章都要事先讨论，取得一致意见。二级小队长哈根，在和冈特的弟弟、《黑色团》编辑部第三把手罗尔夫·达阿尔克文开会后记道：“在报道德国犹太人情况上一致同意，除现行方针外不进行特别的攻击，而是和经济部就〔犹太人〕移居国外的固定财产问题取得最终的统一口径。”

保安处愈是看到《黑色团》是一个控制思想的公开强制性工具，它的专用保险柜也开得愈勤，因为它能代替自己缺少的执行职能。《黑色团》率直无忌的论战，对公民所起的暗示作用，往往比到处看不见、摸不着的秘密警察的威胁更令人不安，保安处的情报确使报纸读来好象神通广大，无所不知。

极端保守的德国军官全国联合会向《黑色团》刊登该会邦分会一次会议上秘密记录中反对纳粹的讲话，深感吃惊。同样，政论家威廉·施塔佩尔对《黑色团》登载了他收藏在写字台里的一封信里的内容心惊肉跳。信中说：只有心怀“保守的恐惧感”的人才会追随希特勒。次维考公民维尔纳·格龙德给英国首相张伯伦写过一封信，感谢首相为世界和平奔走操劳；格龙德看到了张伯伦给他的回信，不过不是投在他的信箱里，而是刊登在黑色团的版面上。莱比锡律师沃尔夫冈·登克博士目瞪口呆地看到了达阿尔克文的笔杆子们写的攻击他的文章，原因是他胆敢写匿名信为一个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妇女鸣冤叫屈。 208

有时报纸也坦然承认自己告密或间接告密的行径，1940年夏天就有这么一个例子。《黑色团》报道，它使“威斯巴登刑事裁判所对一名由《黑色团》点名的危害人民分子判处四年徒刑并褫夺公民权，其处理之迅速令人欣慰”。

保安处和《黑色团》演的双簧也许会收到丰硕的成果，如果保安处的主子海德里希考虑到在纳粹国家里同样适用的一条规章，即报刊和情报机关之间的合作也应有界限度的话。无奈冈特·达阿尔克文的那种不平静、蛊惑人心的天才抵制了威廉街千方百计要把《黑色团》受制于保安处领导的许多战术考虑的企图。但《黑色团》气势汹汹的攻击常常触犯了保安处的利益，当时，还没有另一个组织象保安处这样存在争议。

几年后，两个伙伴之间厝火积薪的关系日益严重：达阿尔克文总编坚持反对任何事情先由保安处定调调，不同意让象为《黑色团》撰稿的海纳尔·席林一类遭到嫌疑的合作者吃保安处的苦头，并对滥用《黑色团》主笔工作证掩护保安处搞情报活动表示愤怒。总之，海德里希的部下责难《黑色团》忘乎所以地大肆攻击真正的和所谓的政权敌人；此外，编辑部还越来越不肯根据保安处的材料

来撰写文章。结果是，报纸接二连三地出乖露丑。

后来，威廉街和齐默尔街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致使海德里希不得不正式指定一个协调关系的人——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冯·基尔平斯基——，负责改善两家的关系。达阿尔克文骂道：“我这辈子感到痛心，竟然要我受要求跟我们合作的保安处人员的气，就象他们也许对待一个局外人一样。”保安处的奥仑道夫终于说出了保安处对《黑色团》的指责：报上的文章“全是错误百出的空谈和陈词滥调”，它们的“文章方式采取诋毁漫骂，令人难以置信，肯定会有助于对读者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由于这样的措辞和腔调”，连“正直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也会同理应受到谴责的人结成统一战线”。

209 奥仑道夫提出，只有“《黑色团》不对那些尚未完全肯定、而需经过核实事情真相和应由保安处负责加以调查清楚的人进行攻击”，以及“事先跟我们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以便同时利用我们掌握的材料和我们的验经”，才有合作的可能。但黑色团笔杆子们不接受保安处提出的领导权要求。

海德里希早已看出，通过《黑色团》进行舆论工作不会使保安处获得进展。保安处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这个老问题再次提了出来。海德里希的两个统治机器——保安处和秘密警察——愈是勾心斗角地对着干，这个问题也就变得愈加迫切需要解决。

## 第十章 德国中央保安局

210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感到，作为他的统治机器而考虑建立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党卫队保安处和秘密警察，它们的力量将有相互抵消的危险。双方都在扩大自己的地盘，双方都力图控制国家——而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德意志国家太小了，容纳不了它们这两家。

1935年改组保安处时，忽略了给它明确划定一个不同于秘密警察职权范围的工作领域，现在却产生了恶果。秘密警察和保安处在同一领域内进行侦查缉捕，相互牵制。保安处在进行监视活动中，经常遇到秘密警察竞争者的盯梢。例如，秘密警察二处(马克思主义)所要捕捉的德共地下工作者，就是保安总处II处121科(左派运动)所要侦查的对象。

为了制止两个监视者竞相角逐，海德里希于1937年7月1日发布一项职能划分指示。当务之急是“既不开展竞争也不考虑谁领导谁，而要相互配合，避免重复工作”，海德里希这样告诫道，并作了分工。分配给秘密警察的业务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叛国犯和流亡者，分配给保安处的则是：科学、民族和民族学、艺术、教育、党和国家、宪法和行政、国外、共济会和社团。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摩擦面，因为“教会、教派、其他宗教和世界观团体，和平主义，犹太教，右派运动，其他敌视国家的社团(如黑色战线、联合青年等)，经济，新闻”，都属于共同活动的范围。对此也作了重新划分：保安处负责“所有带普遍性和原则性的问题”，秘密警察抓“所有需要考虑由国家警察出面采取执行措施的具体

案件”。

保安处分得了几乎一口气还念不完的这么多的任务，并不能掩盖它陷于被秘密警察挤入单抓世界观各领域的危险。对此保安处的人员奋起反抗。在保安总处处本部办公室里，提出了具有充分理由的专门报告，尖锐地指出应由保安处掌握领导权；秘密警察只不过是出于国家在司法和行政上需要的产物，而第三帝国却需要“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国家安全的屏障，它的起源和存在因素在于一种政治运动的意志”。这座屏障就是党卫队保安处。

211 这句话引自一份未披露作者姓名的备忘录，它有一个纲领性的标题：“保安处的独立性”。作者提出，秘密警察的任务是打击“敌视国家的现象”，保安处的任务是打击“危害人民的现象”：“敌视国家是一种涉及法律的现象，凡一个人及其行为经查明违犯了保卫国家的某条法律时，即构成敌视国家的现象。”相反“危害人民的现象的特点，在于往往根本无法看出它触犯刑法，但它对人民从而也对国家有时却具有远比直接敌视国家的现象严重得多的危险”。

但是，这种书面的自我欣赏，并不能遏制保安处开拓新领域的迫切心情。威廉街的人发现了两个至今尚未触及的、当然隐藏着新的冲突和勾心斗角的活动领域：国外谍报和生活问题的研究。

谍报工作一开始就使年轻的情报人员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不过保安处开展国外秘密情报工作主要是出于偶然事故，源于保安处追捕越过德国国境外的政权敌人。其中之一是“黑色战线”领袖奥托·施特拉塞，他在布拉格指挥一场鲁莽的十字军战役，反对他原来的党的首脑希特勒。

保安处领袖们感到施特拉塞的黑色电台特别危险，它向这个极权主义思想控制的国家播送反希特勒的口号。保安处得悉，这个电台是由前斯图加特广播电台技术领导人鲁道夫·福米斯工程师办的。海德里希下定决心要搞掉这个福米斯。1935年1月10



日，海德里希召见了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兼保安处长的全能助手、前机械师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指令他：“您把福米斯弄到柏林来！”瑙约克斯想出了一个作战计划。

保安处业已查明，福米斯办的施特拉塞电台肯定设在布拉格东南二、三十公里的某处。瑙约克斯办好护照，化名商人汉斯·米勒，带着女友柏林体操教员埃迪特·克斯巴赫，乘一辆车号为IP48259的梅塞德斯轿车穿越国境。他找到了自己的目标：黑色电台设在多布里斯，确切地说：设在多布里斯“察霍里”饭店的一间房间里。保安处密探瑙约克斯随即和女伴下榻在该饭店的第4号房间，跟福米斯的房间保持着一定距离。瑙约克斯设法将福米斯的房门钥匙印了个蜡模，给保安总处发电报说：“找到了”，然后等待下一步指示。过了几天，他准备行动了。

1月23日，瑙约克斯看了看表：夜晚9点30分。他拿了一盏灯在窗口晃了几圈。几分钟后，保安处派来配合瑙约克斯行动的212维尔纳·格奇，用一根绳子顺着墙头爬上来，跳进房间。他们俩以为福米斯不在房间里，便沿着走廊悄悄走到这个陌生人的门前停下。可是当他们把私自配的钥匙插进锁孔时，发觉对象待在里面。瑙约克斯当机立断，敲了敲房门，里面传出一声：“有什么事呀？”瑙约克斯嘟囔着说，对不起，忘了给福米斯先生房间摆肥皂了。

福米斯就去开门，正在这时，两个保安处分子一齐冲进房间，对工程师来了个突然袭击。福米斯正想拔出手枪，闯进来的两人中有一个开了枪：国家敌人鲁道夫·福米斯当场饮弹毙命。瑙约克斯和格奇给电台设备撒上磷粉，一把火烧着了，然后在急促赶来的饭店职工们的眼皮底下逃之夭夭。

可是，在柏林保安总处的海德里希对瑙约克斯之流的保安处人员采用这种近乎强盗影片中所表现的笨拙手法搞情报工作却大发雷霆。此后几年中，保安处也仍是些很不高明的半路出家的干

将聚集之所，他们叫任何一个情报老手看了都要摇头叹气。尽管如此，保安处还是在德国情报工作的莽莽丛林中逐步扩大了地盘。靠近边界地区的保安处外勤站系统地收集国外情报，一些保安处领袖则通过在国外居住的知名人士安设情报网。

主管谍报工作的是没有经验的党卫队区队长海因茨·约斯特及其中央 III 处 2 科（反谍情报），不过总处的其他部门也感到有必要抓谍报工作。例如，保安处犹太事务科就在近东地区设了自己的一个情报机构，收集有关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冲突的材料。这个近东地区机构的主要联络人是德通社(DNB)驻特拉维夫通讯员赖歇特博士，他在巴勒斯坦相互冲突的双方营垒里都有耳目；阿拉伯人一方是《防卫报》发行人、民族主义领袖易卜拉欣·香蒂，犹太人一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犹太秘密军“哈加纳”<sup>①</sup>司令官之一的法韦尔·波尔克斯。

保安总处一份存档的记录写道：“赖歇特博士允诺，在相应配合执行困难任务时只同保安处合作，所有重要情报材料均用‘H’记号标明，通过冯·里特根先生(DNB)或按二级小队长哈根通知的地址寄送。”保安处赖歇特的情报机构不是没有成绩的：1937年，它搞到了英国前首相斯坦莱·鲍德温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一项英国和土耳其的秘密协定；意大利情报机关曾出十五万英镑收买这项协定的文本。

但是保安处愈是在情报活动的灌木林里努力扩大地盘，它就愈是遭到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军事谍报局的阻扰。在此以前，这位善于交际的卡纳里斯一直跟他过去的海军学校士官生海德里希保持审慎的良好关系，但这种关系终于被保安处的扩张所破坏。

---

<sup>①</sup> 哈加纳为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伊休夫领导人指挥下的地下部队。——译者

谍报局和秘密警察之间经过海军上校帕齐希主管谍报局时期(1932年至1934年)的最初几次交锋之后,国防军领导看出卡纳里斯是适合同海德里希合作的军官。1887年出生的舰长和前潜艇艇长卡纳里斯,曾经是魏玛共和国的死对头,人们都认为他和海德里希的关系不错。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常常喜欢回忆他们在“柏林号”训练巡洋舰上共同度过的岁月,卡纳里斯的妻子埃里卡曾长时间为听不到家庭音乐师海德里希的提琴声而苦闷。卡纳里斯自1934年1月被任命为谍报局长后,也在努力接近海德里希。

人们传说,有一天,卡纳里斯偕妻子埃里卡在柏林南面近郊的德勒街头散步,突然他看见一个身材颀长的党卫队员和一位推着儿童车的金发女人。卡纳里斯说:“这不是海德里希么!”被招呼的人已经准备以训练有素的姿势,敲响鞋后跟喊叫希特勒万岁了,但随即又改用过去习惯了的海军少尉口气说:“舰长先生住在柏林这儿吗?”卡纳里斯说:“不远,不远。”海德里希说:“我们搬来德勒街几天了,舰长先生。”卡纳里斯:“是吗!多巧呀!”

两个对手充分利用这次巧遇的机会。星期天下午,卡纳里斯一家沿德勒街往上走,来到海德里希的花园里玩槌球。到了晚上,卡纳里斯头戴白色厨师帽,招待海德里希夫妇品尝亲手做的水手吃的杂烩,随后参加家庭音乐会。后来两家的寓所相距更近。1936年8月,卡纳里斯在柏林施拉赫滕湖的迪阿纳街有了一幢房子,半年后,海德里希颀长的身影又出现在用灌木栽成的花园篱笆旁。保安处长迁进了附近奥古斯塔街的新居。

在工作上,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一时也相处得很好。1936年12月21日,卡纳里斯同谍报警察头子贝斯特签定了一项协议(代号为“十诫”),明确划分了谍报局和秘密警察的职权范围。协议规定,谍报局负责国外谍报和侦破外国谍报活动,秘密警察则负责“对违反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叛国)的活动进行侦查和依法进行

必要的缉捕”。卡纳里斯承认秘密警察在技术问题上占有某些优势。因为谍报局在和平时期没有军警，它经办的案件也需要把作为执行工具的秘密警察拉来参加。但尽管如此，卡纳里斯-贝斯特协议还是承认军事谍报局的重要性居先。协议中有一条说：“在处理各个案件时，谍报警察案件的解决应服从情报工作和反谍报工作的利益。”秘密警察“根据国防军有关谍报站的要求，在国防军谍报站作出判断认为情报工作和反谍报工作的利益不存在冲突以前，停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正是谍报局的这一居先地位恰恰遭到了保安处扩张狂的冲击。保安处擅自对国外情报网搞渗透，干扰了谍报局的工作。在刺探外国经济实力和外国军备工业情报方面，谍报局和保安处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一桩事件加速了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关系的破裂，因为这桩事件使谍报局局长海军上将第一次看清了保安处外行们的肆无忌惮。

1936年年底，海德里希通过保安处的渠道获悉，说在苏联组成了一个试图用暴力推翻斯大林的反对派；为首的反斯大林分子是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米哈依尔·尼科莱也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保安处长想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要是能把这个消息抛给斯大林，再伪造几份文件增添其严重性，那么也许可以一举摧毁俄国的全军指挥部门——借斯大林和苏联国家警察之手加以摧毁！

海德里希已经考虑了具体的作法。在战后<sup>①</sup>国防军跟红军联系密切的时期里，还一定有一些文件、材料和书信，肯定也有现在属于密谋反斯大林的那些苏联将领的签名。将当年的文件加上几个注释，翻译成1937年的语言，那么任何人也能从中看出，苏联将

---

<sup>①</sup> 此处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译者

军们同德国军官们勾结起来反对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了。海德里希把在柏林德尔布吕克街设立了专门进行仿造假文件和假证件的实验室的瑙约克斯叫来，就此项绝密计划向这个击毙福米斯的凶手面授机宜。东部大区保安处长、党卫队旗队长赫尔曼·贝伦茨也被告知。阴谋家们着手进行工作。

保安处为数不多的谍报老手之一、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埃里希·雅恩克提醒注意，但毫无作用。他不相信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的情报确有其事，认为有可能倒是苏联情报机关设下的圈套。因为：是谁提供这个情报的呢？是住在巴黎的俄国流亡将军尼古拉·弗拉季米诺维奇·斯科布林。他替什么人工作呢？替保安处，同时也替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可是海德里希不需别人提醒注意；他把令人讨厌的敲警钟者雅恩克软禁起来，一面呈请希特勒批准，派人将四天之内伪造出来的陷害文件送给苏联人。

贝伦茨带上文件来到布拉格，通过第三者介绍，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怂恿贝奈斯将文件转给了莫斯科。苏联人随即行动起来，派了一名特使到柏林来跟海德里希谈判。莫斯科方面给文件付了报酬，据施伦堡声称付了一笔高达三百万金卢布的酬金，不过后来发现，同瑙约克斯实验室伪造的文件一样，金卢布也是假的。

1937年6月11日，苏联通讯社“塔斯社”报道，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七名红军将领被一个特别法庭判处死刑，因为“被告勾结推行敌视苏联政策的某外国政权的军事领导集团反对国家。被告为这个政权的谍报机关工作”。随着图哈切夫斯基一批人的处决，开始了斯大林俄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政治清洗。一年之内，赤色沙皇消灭了三万五千名军官——几乎是军官团总人数的一半；百分之九十的苏联将军和百分之八十的苏联陆军上校被消灭掉。换句话说：五个元帅去掉了三个，十五个军团司令去掉了十三个，八十五

个军长去掉了五十七个，一百九十五个师长去掉了一百一十个，四百零六个旅长去掉了一百一十个。

几个月后，国外保安处给自己的首脑上报了一份秘密报告，标题为“红军内部政治情况”。海德里希读到：“用新的人手来弥补如此深入进行的清洗给〔苏联〕指挥人员内部造成的影响……现在怎么估计也是过早的，临时培养出来和匆忙提升的指挥官的能力怎么估计也是低劣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拍手叫好。日后，从瓦尔特·施伦堡到威廉·赫特尔等党卫队回忆录作者们所断言的一点，O·E·哈塞主演的影片《卡纳里斯》<sup>①</sup>进一步传播的一点，甚至连温斯顿·丘吉尔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喋喋不休地反复谈论的一点，其实保安处头子当年早就向愿意听的人讲过了，即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砍掉了可怕的苏联军队的脑袋。

几乎与此同时，德国战争部总参谋处的一名军官，在走廊里叫住“外籍陆军”科(T<sub>3</sub>)的俄国问题专家陆军中校卡尔·施帕尔克博士。该总参谋处军官问施帕尔克，是否也听到了海德里希对他处死了图哈切夫斯基而自鸣得意。陆军中校施帕尔克一笑置之，他说：“海德里希全是瞎吹牛。”陆军中校施帕尔克是当时唯一明白真相的人，因为事实是：图哈切夫斯基压根儿就不是被海德里希和保安处搞掉的。施帕尔克在1937年无法证明他的疑窦，但今天已有材料证实，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海德里希对苏联情报机关只不过起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帮凶作用而已。

216 在海德里希用假文件玩弄手法以前，斯大林早已决定收拾这个对独裁者过分得势和对其独裁统治过于危险的图哈切夫斯基了。从1936年起，斯大林就准备给军人以狠狠打击。1936年12月，苏联国家警察头子若佐夫建立了一个“特别任务局”，简称“特

---

<sup>①</sup> 奥托·爱德华·哈塞(1903— )是著名演员，1930年起在慕尼黑、柏林等地剧院演出，1954年起主演拍摄过多部电影。《卡纳里斯》一片拍于1954年。——译者

局”，对图哈切夫斯基进行首次调查。随后不久，叶若夫下令逮捕了图哈切夫斯基最亲密的同僚之一维塔利耶·普特纳将军。1937年1月27日，在公审右倾分子卡尔·拉狄克时，这位元帅第一次被公开点名为“叛国犯”普特纳的朋友。3月3日，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红军队伍中一小撮间谍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5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被解除副国防人民委员职务，贬滴到遥远的伏尔加军区领导岗位上。三星期后，元帅被捕。

将这一连串事情和党卫队回忆录作者们的记述对比一下即可看出，保安处在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多么微不足道。保安处的赫特尔声称，奉海德里希之命进行的“系统的以假乱真的工作”始于1937年4月——也就是说，这时图哈切夫斯基的朋友普特纳已经被公开起诉，斯大林已谈到了红军中的“一小撮间谍”。施伦堡断言伪造的文件是1937年5月中旬抛给苏联人的——可是图哈切夫斯基5月11日即已受到冷遇。

如果说一定要承认保安处在除掉图哈切夫斯基上起了一分作用，那就只能归因于苏联情报机关同时在多种渠道上进行的工作。至少可以认为，叶若夫的特局对来自德国、来自图哈切夫斯基一度因职务关系进行过合作的国家的株连性的文件也感兴趣。图哈切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多次访问过德国，他经常应邀参观国防军演习，他握过兴登堡老人的手。对NKWD<sup>①</sup>头子叶若夫来说，再没有比从那个始终不赞成同布尔什维主义“世界敌人”进行军事合作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府搞陷害材料更自然的了。

无论如何，苏联对株连图哈切夫斯基的材料的兴趣必定是伪装的。而利用过去这位内战将军的名气为两家效劳的间谍斯科布

---

① 内务人民委员会。——译者

林，正是邀请保安处长海德里希上演了这出戏的合适的人，对于这出戏，哎，如此无所不知的“C”却始终没有识破其真相。

217 不过，有一桩同样构成有关图哈切夫斯基传闻不可分割部分的事也是完全错误的：据说海德里希曾向自己的对手卡纳里斯索取国防军和苏军合作时期的来往书信，在遭到海军上将拒绝后，又从国防军某机关窃获了德苏来往信札。俄国问题专家施帕尔克证明，卡纳里斯直到图哈切夫斯基完蛋时对海德里希的计划还一无所知。当施帕尔克向海军上将报告图哈切夫斯基事件时，谍报局长根本不知有这回事。

直到有一天，卡纳里斯早晨和海德里希骑马蹀躞时，才听到保安处头子谈了这次天才的杰作。他听到这个消息，想来很不好受，因为他看到眼前出现了一种冒险家精神，有朝一日它可能把整个德国推进深渊。卡纳里斯传记作者阿布斯哈根判断说，图哈切夫斯基事件成为海军上将对海德里希和政权的关系的转折点。仅仅不到一年，谍报局长威廉·卡纳里斯就决心解除保安警察和保安处整个领导的权力。

如果说，在这一点上已经宣告了国防军和党卫队保安处之间存在冲突，那么保安处的另一新开辟的活动领域就引起了一种势力的猜疑，对保安处来说，这种势力远比国防军危险：党的猜疑。正如国外保安处破坏了卡纳里斯—贝斯特协议条文的规定一样，国内保安处的新工作也向一条未形成条文的协议精神挑战，因为这条协议从党的总管鲁道夫·赫斯宣布保安处是纳粹党唯一的情报和谍报机构之时起，就使保安处受到党的约束。

保安处独揽情报工作的垄断地位是以一个条件为前提的：它任何时候不得干预党内的事务。按照规定的框框，保安处是对敌的情报机构，这就是说，它的任务是侦查党内的敌对分子，但不得过问党的内部问题。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发出严格指示，禁止一切保安处成员参加党内任何形式的讨论，不许报告任何有关党内的事情。下面自发送来的消息和报告，必须原封不动地立即上交党的秘书处。党，特别是党的区领袖们，疑虑重重地注意不让保安处发展成一个反对纳粹党的密探组织。

但是自从保安处改组后，威廉街就有两个偏偏主张对党进行监视的纳粹分子在工作。因为保安总处中央 II 处 2 科科长赖因哈德·赫恩教授及其工作班子负责人奥托·奥仑道夫认为，保安处就是纠正纳粹独裁工具、发出批评呼声这样一类的机构。

早在 1936 年他俩初次见面时，赫恩就告诉新同事奥仑道夫：由于再也听不到公开的批评意见，保安处今后的任务是“把民族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报告给党和国家领导部门，而且要着重谈发展中的错误倾向、弊端等等”。教授们的主张得到了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奥仑道夫这个忠实的内行的响应；长期以来，这位老战士和霍亨埃格尔森的前地方党组织头头，就在希尔德斯海姆设法为防止他所认为的民族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灾难性错误倾向而工作。

奥仑道夫这个人，可以说得上文质彬彬，许多党员把他看作是患有神经官能症、时常表现郁闷而自负的知识分子，他预感到民族社会主义的内脏存在着致命的危险。他断定民族社会主义内部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集体主义思潮，以及立宪政策上的国家绝对主义倾向。对于前一种逆流，他使用了含混的“布尔什维主义”这一词，并指出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国劳工阵线头子罗伯特·莱伊和德国农民理论家、党卫队副总指挥 R·瓦尔特·达里；后一种反对力量他称之为“法西斯主义”，并把所有象法学教授卡尔·施密特那样贴上民族社会主义标签而不受规范和制度约束的独裁政治的人列为法西斯主义信徒。

奥仑道夫及其上司赫恩煞有介事地相信，能运用保安处来影响民族社会主义的发展。教授已在组织上创造了初步的前提。早在奥仑道夫进保安处以前，中央 II 处 2 科就将镇压反对者的方针改为一种新的设想，即所谓生活领域的监视。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赫恩宣布保安处的任务是：研究国民各个生活领域中的意见，了解居民对政府和党的机关的措施的反应。只有这样，国家领导才能知道人民接受它的政策的情况。在民族社会主义用语中，出现了民意测验这一词汇。

赫恩业已在政治学家所熟悉的方面开始进行生活领域的调查报告：高等学校和大学。不过他还停留在畏缩不前的开始阶段。当奥仑道夫进入保安处时，他发现赫恩的工作中心“有二十来个年轻人，没有笔杆子，没有档案室设施，也没有经费”。奥仑道夫担任经济事务主管科领导，在短期内就建立起一个由大学毕业的国民经济学家组成的工作班子；他们收集全国各地的经济情况报告，并就总的形势作出批判性的分析。民意研究家奥仑道夫在一份备忘录里概括了进行这项工作的宗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

奥仑道夫写道，德国扩充军备给经济造成了“闻所未闻的紧张”，例如：“增强了大企业，削弱了其他企业。在许多方面排斥了私人积极性，代之以建立有种种缺点的收购和分配的大机构，干预价格和工资的确定”。因此当前“国家和经济工作领导的任务是认识不应超过这种紧张的极限，如果不想出现全面崩溃的话。”奥仑道夫写道：“在这里，保安处通过它对形势和情绪以及弊端的调查报告，有它自身担负的异常重要的特殊使命。”

经济事务主管科客观冷静的报告使赫恩大为赞赏。1937 年 4 月，他任命奥仑道夫为中央 II 处 2 科业务负责人。奥仑道夫将自己此前仅限于在经济方面进行暗中活动的调查报告网，扩大到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很快就再也找不出哪个生活领域不处在奥仑

道夫和赫恩的中央 II 处 2 科进行分析研究之外了。威廉街的三个大型工作班子深入掌握全国的真实情况：II 处 21 科主管文化、科学、教育和民族事务，II 处 22 科主管法律和行政、党和国家、高等院校和大学生工作，II 处 23 科主管所有经济领域。

但是，奥仑道夫的民意研究家们愈是大胆地放开手干，报告也就愈加带有抨击性的腔调。保安处报告员率直地指出种种弊端：康采恩扩大实力，国家经济开支漫无节制，德国劳工阵线的集体主义倾向，中产阶级遭受打击，党内的骄横自大。顷刻之间，生活领域的探索者们就陷入了党的统治权的禁区。为时不久，党的干部们看出，他们变成了保安处的调查对象了。开始出现了奥仑道夫后来所说的“一场持久战，失败、胜利以及保安处和我的一败再败”。

1936 年夏，保安处的对手利用赫恩的一次严重的失策，企图搞掉这个危险的民意研究家。赫恩阴谋撵走编纂民族社会主义历史的祭司长瓦尔特·弗兰克教授，打算把党卫队科学家安插到编写德国历史的关键岗位上。可是弗兰克借助敌视保安处的纳粹党区领袖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进行反击。弗兰克找到了赫恩过去发表的反民族社会主义的言论（“首先希特勒以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制造了一种强烈的具有反抗精神的情绪”），在纳粹分子听来，这种话未免太刺耳了，似乎连希特勒也要“对赫恩教授这个人顾虑重重”（总理府长官拉麦斯语）。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不得不随即撤掉他们的首席民意研究家的职务，赫恩被撵出保安处，跑到瑞典去避了几个月风头，以便至少逃脱被开除出党的危险。

赫恩刚刚销声匿迹，奥仑道夫就陷入了批评的火力网。起初，党卫队全国领袖对奥仑道夫切中时弊的报告是持赞赏态度的；但是当党的疑忌越来越重时，善于察言观色、小心谨慎的希姆莱就不再理睬这个保安处的人了。再说他也不喜欢这个“民族社会主义

圣杯派骑士”(希姆莱语)固执而好为人师的作风。“他〔奥仑道夫〕不懂得同全国领袖打交道的诀窍,”希姆莱的秘书鲁道夫·勃兰特感叹地说。“他应该间或带上一块刻有日耳曼民族古文的石刻去见全国领袖,针对他的日耳曼民族思想,投其所好地提出意见,不要用全国领袖显然不大懂的方面冷冰冰地去找他,也不要带着一副死板严肃的神情提出消极的预见。”

希姆莱甚至采取了平常特别小心避免的做法:不通过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直接把固执的奥仑道夫叫到跟前,当面撤了他的职务。奥仑道夫遭到训斥:保安处抓生活领域是非法的,党决不会容许;保安处只能合法地进行以敌对分子为目标的情报工作,其他一切做法都有损党卫队的利益。海德里希也紧跟着这样做。奥仑道夫被撤去II处2科的领导职务,仍干他原来仅限于经济方面的那份工作。1937年9月4日,海德里希发出指示:“各生活领域的形势报告的任务只能报道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在各个生活领域内的贯彻执行情况和遇到的阻力,以及〔有条件时〕说明施加阻力的人,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才可以报告文化、物质生活情况或与公共生活有关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奥仑道夫感到继续留在保安处已索然无味了。他呈请海德里希允许他离开保安总处。海德里希不予批准;他不愿丢掉奥仑道夫这个行家,因他是今后扩大势力时可能有用的工具。希姆莱尽管害怕党的批评,但也舍不得失掉奥仑道夫。

直到1938年春天,这个郁郁不乐的生活领域探索者才至少卸去了保安总处的领导职务。经济学家奥仑道夫只保留了保安处名誉旗队长的头衔,获准到纳粹党经济部门的一个强制性机构,即德国贸易组担任经理。不过他的命运仍继续和保安处联在一起;每天附带在威廉街大楼里待上几个钟头,象过去一样领导他原来的主管科。

奥托·奥仑道夫的情况并不是孤立的。威廉街接到了各地区保安处网为自己的存在忧心忡忡的告急报告：奥仑道夫危机再次清楚地反映了一个叫人更加弄不明白的问题，即一心想探索试验的保安处的前景究竟如何。海德里希的助手施伦堡记述道：“从前线\* 传来心理影响巨大、正在对保安处今后命运疑虑重重的报告 221 纷至沓来。同时还应指出，正在开始一股脱离总处的强大趋势。”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眼见有必要就保安处的地位问题最终作一次彻底明确的澄清。原因是，还在奥仑道夫引退以前就发生过一场大丑闻，暴露了他们的统治机器极不稳固。这场丑闻咎在秘密警察；它几乎断送了海德里希的权力和这两个党卫队头子之间的合作关系。

这件事情的渊源要追溯到1936年5月，导因于警察总局里的柏林第一审法院推事。该院推事恩斯特经手审讯一名惯犯，他是柏林法院和监狱的常客：工人奥托·施密特。恩斯特从积犯登记表上看到：奥托·施密特，二十九岁，1921年至1922年因三次行窃分别判处监禁两星期、三星期和三十天，1924年因行窃监禁四个月，1927年以侵吞财物罪监禁一个月，1928年因讹诈勒索监禁四个月，同年又因强行讹诈监禁六个月，1929年因诈骗监禁两周。

1935年，施密特再次因涉嫌讹诈被刑事警察抓住。在负责初审的刑事助理员尤斯图斯面前，这个骗子手供认了几件鸡毛蒜皮的讹诈勾当，不承认犯有更大罪行。于是施密特最后被带到法院推事办公室。但推事恩斯特成功地撬开了施密特的嘴巴。这个诈骗犯突然滔滔不绝地、不加掩饰地往下招供说，他曾经企图对许多人、对“几百个”其中包括不少知名人士进行讹诈；他们多半都是搞鸡奸被他当场抓住的人。接着他就交代一个个姓名，例如波罗的海

---

\* 保安处专用的字眼，指各地直接面对敌对分子的基层情报组织。——原注

自由团领袖的儿子、律师吕狄格·冯·戈尔茨伯爵，波茨坦警察局局长、党卫队旗队长冯·韦德尔伯爵，中央经济部长丰克，还有一个“弗立契将军”。恩斯特的耳朵立即竖了起来，问：哪个弗立契？施密特不肯回答。

从这一桩普通的讹诈勾当案，顿时引出一件重大的政治鸡奸案；这种案件属于“全国打击鸡奸罪行中心”的受理范围，它设在秘密警察处里，负责人是刑事参议约瑟夫·迈辛格。施密特的案卷送到了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迈辛格看了案卷，弗立契这个名字同样使他心里一怔。这是那个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大将吗？就是德国保守党反对派的暗中希望、党卫队千方百计想利用特别机动部队打掉国防军对武器拥有垄断权的那个公开的敌人吗？迈辛格命令把犯人施密特带来，交由治安警察霍伊塞雷尔上尉进行审讯。

222 1936年7月8（或9）日，霍伊塞雷尔拿出由迈辛格准备好的一本照片册，放在施密特面前，让指望一举闻名的施密特象灵雀似地，一伸嘴把那张拥有显赫头衔人物的照片啄出来。向来主张刑事侦查要采取大刀阔斧方法的刑事参议迈辛格，在被复制的像片下注了姓名和职称。施密特读到：“陆军总司令大将冯·弗立契男爵”，眼睛眨了一下，施密特说：“就是他。”接着人们记录了他的供词：

1933年11月某天晚上，他在柏林万湖火车站前厅，盯住了一个身穿带有褐色皮领的深色大衣、头戴深色礼帽、围白围巾、夹单片眼镜的人。这个人 and 绰号“巴伐利亚约普”的出卖色相的小伙子马丁·魏因格特纳一起，离开车站大厅，进入一条供铁路局专用的黑胡同。他尾随在后面，看到两人在那里发生了鸡奸关系。施密特继续说：过了一会，这位先生走出来了，步行到附近波茨坦广场的环形车站；在这里，他拦住那位先生，把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对他讲了一遍，并伪称是“刑事警官克勒格尔”。先生自称系冯·

弗立契将军，并出示了身分证，身分证右上方清清楚楚注明姓名“冯·弗立契”。

接着就讹诈金额进行了谈判。先生告诉他无意叫他发市不利，并表示不在乎几千马克，不过自己身边只有一百马克。他们双双乘车去利希特菲尔德，下车后先生走进了费迪南德街21号。过了十分钟，先生出来，往他手里塞了五百马克，并答应第二天再给他一千马克。这笔钱他也收到了，并且还答应他以后再给一千马克。1934年1月中旬，他在利希特菲尔德东首高速铁路车站二等车候车室里拿到了这一千马克——这一次是由他的朋友、绰号“野马”的工人海特尔陪同去的，他向被讹诈者介绍海特尔是他的上司。他分了五百马克给海特尔。

以上就是奥托·施密特1936年7月初的供词。迈辛格胜利了：偶然的机机会使他掌握了一件置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于死地的武器；他约瑟夫·迈辛格可以利用这件武器，为党卫队主子们除掉一个最危险的敌人。迈辛格抓紧办案。8月间，经过刑事书记官勒夫纳复审，施密特给自己的追述反复补充了其他细节；8月20日，同犯海特尔也供认了施密特所谈情节属实。对此，迈辛格再也不存在疑团了：施密特供出的冯·弗立契正是仇人冯·弗立契大将！

迈辛格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个引为欣幸的发现，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很快亲自出马向希特勒报告这一发现。可是，在总理府等待着他的却是一片扫兴。阿道夫·希特勒匆匆看了看长达八页的审讯记录，指令烧掉“这种无聊的东西”。希特勒曾经对这个军事技术专家冯·弗立契说过“喜欢”他的话，所以他对于扩军狂希特勒来说是非常需要的人物，希特勒是不会因为这么一桩不足道的事情而放弃一个军事技术家的。

希姆莱时运不济，他给这位独裁者送呈弗立契案卷不是时

候：他以为，由于希特勒对自己的陆军总司令还“持恭恭敬敬的审慎态度，大概会让他便宜行事，借以避免自己出面直接抨击陆军领导”，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前上校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也这样说过。党卫队头子活该忍气吞声给碰了一鼻子灰，在当时，任何一个胆敢批评国防军、特别是批评国防军将领的人，没有不给希特勒顶回去的。“说不定，”希特勒有一次对包姆海军上将谈到，“有哪个党内的人跑来告诉我：‘我的领袖啊，样样事情都好，只不过某个某个将军在讲反对您的话，在做反对您的事！’那我就说：‘我不相信有这种事！’如果对方再说：‘我可以拿书面证据给您看，我的领袖！’那我就撕掉那些废纸，因为我对国防军的信任是不可动摇的。”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同样只好把他们的“废纸”撕掉。海德里希指示销毁弗立契案卷，不过在销毁之前他设法复制了其中的一部分。看来他是指望有朝一日还能把这个案子重新抛出来的。这一天来得比他希望的要快，因为这时候，总理府发生了民族社会主义政权史上决定性转折点之一的一场争吵：1937年11月5日下午，希特勒已经意识到，冯·弗立契和国防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元帅，只会犹豫不决地、碍手碍脚地勉强跟着他走日益铤而走险的冒险政策道路了。

希特勒向六个最接近自己的人（除冯·弗立契、冯·勃洛姆堡、戈林和霍斯巴赫外，还有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和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披露了他认为非常重要、要求——据霍斯巴赫记录——“当成政治圣经”来看待的未来计划。核心问题是：德国至迟必须在1943年用武力扩大它的生存空间，必须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占为德国所有。军人冯·勃洛姆堡和冯·弗立契的士兵们有顾虑，当然仅仅是军事技术上的顾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上的工事异常难于攻克；即使在法、意两国交战的情况下，也必须估计到法国



在德国西部边境保持一支强大的陆军，只有在英国和法国确保中立时才能进行战争。“讨论的形式有时非常激烈，特别是以勃洛姆堡、弗立契为一方和以戈林为另一方发生争执，而希特勒只顾坐在一旁听着。”霍斯巴赫记述道。 224

希特勒听够以后就得出自己的看法。依靠这些军人，要向纳粹外交政策的战争冒险地带发起进攻，只能一开始就导致失败。希特勒对他的军事领导人物突然表现得冷淡起来。

迈辛格的弗立契案卷一下子又具有现实意义了。是希特勒将它重新抛出来的吗？这确是不大可能的。但另外有一个人兴致勃勃地急于怂恿秘密警察暗探们加害于陆军总司令。他就是在总理府那场争吵中被冯·弗立契骂为不学无术的那个人，就是形式上一直还在担任普鲁士秘密警察头子的那个人，就是自封为陆军大将但始终感到被职业军人们嘲笑的那个人：赫尔曼·戈林。1941年秋，秘密警察迈辛格对希特勒过去的政治副官弗里茨·维德曼说，是戈林命令他重新整理弗立契案卷的。无法查证的只是具体时间。

秘密警察对弗立契案件的兴致，必定是紧接着弗立契和戈林在总理府争吵之后重新引起来的，因为陆军总司令在1937年11月10日开始的埃及之行期间，即已受到两名秘密警察官员的监视，他们的任务是侦查大将是否出入鸡奸活动场所的酒馆。1938年1月中旬，迈辛格又派出他的刑事密探四处活动，并再次审阅了讹诈犯施密特的交代。迈辛格最亲密的同僚、刑警探长费林甚至已基本查明真相：1月15日他查出，在施密特的讹诈对象当年进去过的费迪南德街21号的邻宅，住有一个退役骑师冯·弗立契，但紧张的侦查再次中断。

但是戈林关于重立弗立契案卷的决定性指示是在稍后发布的，当时由于柏林警察局长沃尔夫-海因里希·冯·赫尔道夫伯爵

向他揭发了一桩叫军人难堪的事件，从而使他有机会满足他的平生欲望，当上德国战争部长。

1938年1月12日，从1932年起过鳏夫生活、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的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同德国蛋品总公司女秘书、原先当速记打字员的埃娜·格鲁恩结婚，为数不多的人参加了婚礼。证婚人：阿道夫·希特勒和赫尔曼·戈林。新婚夫妇随即动身去度蜜月旅行。他们刚走不久，中央刑事警察处全国技术鉴定中心头头、刑事参议库特·赫尔穆特·米勒就收到了一包淫秽的照片，是由“妨害风化罪行”科的同僚格哈德·瑙克交给他的。有几张照片特别引起米勒的秘书布克爾特的注意。米勒伸过头去仔细瞧瞧。

225 “当我看出两个影中人的裸体上，”米勒回忆说，“有用墨水笔写的影中人的签名时，我招呼瑙克，他是否有兴趣查明这两个人是谁。他说眼下也许还没有这样做的必要。我只不过是注意到了这个女人的名字，因为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但想不起她是谁了。”米勒打开他的指纹簿翻阅：“您瞧，所说的这位女士在我们的指纹簿里已出现过两三次了。”米勒这样说。随后他去找居民户籍管理处处长、政务参议梅施，了解这位女士是谁。梅施从一只保险箱里抽出一张户籍登记卡——陆军元帅夫人的户籍登记卡。

刑事参议赶忙去见他的头头。阿图尔·奈比说：“嗨，米勒同志，领袖吻过这个女人的手！”刑事警察处长小心谨慎，只把此事私下告诉了他的朋友、警察局长冯·赫尔道夫。1月23日上午，伯爵站在战争部国防军办公室主任、勃洛姆堡的亲信威廉·凯特尔将军前面，请将军证实卡片上的女士是不是勃洛姆堡新娶的太太。可是凯特尔声称无能为力，因为他从未见过这位女士。他随即给部长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但冯·勃洛姆堡外出未归。这时凯特尔突然想到一个令人致命的主意：他告诉警察局长去找戈林，戈林当过证婚人，一定认得出陆军元帅的太太。

由于冯·赫尔道夫伯爵给他讲了冯·勃洛姆堡的事情，赫尔曼·戈林在1938年1月23日晚，手里抓到了一张决定性的王牌。戈林立即觉察到，这场丑闻将把陆军元帅赶下台。可是接下来谁搬到本德勒街<sup>①</sup>去呢？除了戈林的竞争者冯·弗立契大将外不会有第二个。这是戈林说什么也要进行反对的。

戈林不得不等了二十四个钟头以后才能出击，因为直到1月24日晚，希特勒才从巴伐利亚的伯格霍夫回来。希特勒刚进总理府，戈林也就赶来了。他唉声叹气地对霍斯巴赫说，他不得不老是给领袖带来不愉快的消息。他也告诉了军事副官霍斯巴赫是什么样的不愉快消息：当事人是战争部长冯·勃洛姆堡。关于陆军总司令，他只字未提。直到会见希特勒时，看来戈林才谈到了冯·弗立契案件，但也不过是旁敲侧击而已，因为戈林离开以后，霍斯巴赫发现领袖虽然“非常激动，但并不显得怎样忧虑或难过的样子”。

就在这天夜里，戈林一定给刑事参议迈辛格下达了重新整理冯·弗立契案卷的命令。戈林在1月24日晚到总理府时，显然还没有把案卷带去，但次日上午，案卷却已摆在希特勒的办公桌上了。由此可见，它是在24日夜里才搞出来的。事实上，秘密警察官员们也一再声称案卷是“集中力量开夜车”重新整理出来的。希特勒的副官夏勃打的一个电话也符合这种说法——夏勃的电话在1月25日清晨2点15分左右叫醒了霍斯巴赫，通知他立即去总理府。看来正是因为迈辛格报来了弗立契的案卷。 226

相隔短短几个钟头以后，霍斯巴赫副官所见到的希特勒几乎判若两人。毫无疑问，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两案给了这位独裁者以沉重的打击，也许动摇了他终生对普鲁士德意志军人的轻信。据

---

① 本德勒街是战争部（即国防部）所在地，此处即指该部。——译者

维德曼副官记述，希特勒“这样垂头丧气，是我和他身边工作整整四年从未见到过的。他低着头，背着双手，在自己房间里踱来踱去，喃喃自语地说，如果一个德国陆军元帅做出这种事情，那么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了”。格德·冯·伦斯德将军发现希特勒“处于一种我从未见到过的盛怒之中。好象在他内心里有什么东西破灭了，他对人的信任也丧失殆尽”。

所有这些难道是表演吗？开始时肯定不是的。但很快希特勒的豺狼本性就预感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一举解除国防军领导阶层的权力，从而使自己登上军队的首脑地位。任何军人再也无法阻止他敢冒外交风险的征途了。

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噫使戈林出面对付这些军人。当正直的霍斯巴赫一再断言大将冯·弗立契无罪时，希特勒委派他最信得过的亲信去核实施密特的供词。戈林两次亲临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让人核实他和希特勒所要了解的情况：人证施密特坚持他的口供。这时，霍斯巴赫自己采取了行动，他不顾希特勒的明确禁令，在1月25日深夜至26日凌晨前去见大将冯·弗立契，通知他正在酝酿反对陆军总司令的事情。冯·弗立契呆若木鸡，只说了一句评语：“卑鄙的谎言！”再也没有讲别的话。

这一刹那间已经清楚地暴露，国防军的最大危机在于一种唯有以服从和领袖崇拜练成的军人性格，对此，法国元帅麦克马洪<sup>①</sup>概括成了一句名言：“将军们是全世界最缺少勇气采取行动的人。”这句名言特别切中这个当时被打成阴谋反对希特勒的人。冯·弗立契大将压根儿就不是这样一个人，也许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将军都更受到阿道夫·希特勒的蛊惑；直到最后他也不知道他的领袖究竟对他搞了些什么鬼，他没有看到自己可能会掉入深渊，

---

<sup>①</sup> 麦克马洪 (Patrice Maurice de MacMahon, 1808—1893)，法国元帅，镇压过巴黎公社起义，1873—1879年任共和国总统。——译者

如果不是同事们拉他一把的话。他极其不幸地、怀着愚昧盲目的忠心服从命运，服从他个人的命运、德国的命运。后来他这样描写希特勒道：“这个人是德国人的劫数，不论是好还是坏，这个劫数将走到它的道路尽头；如果它走进深渊，他将拉着我们大家与他同归于尽——没有任何办法可想。” 227

不过，也还有些军官并不甘心把自己交给这种厄运来摆布。霍斯巴赫再次站出来为他的上将讲话。他久久地劝说希特勒，直到希特勒终于同意接见冯·弗立契。1月26日晚，上将被召到总理府。冯·弗立契急忙去见自己的领袖，想要终于亲眼看看“这只猪猡”，他和同时被传来的施密特相遇。施密特说：“就是这个人！”冯·弗立契以军人的荣誉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位先生！”霍斯巴赫这时等候在总理府的小饭厅里，他记述道：“独自等了好一会，突然我听到图书室和小饭厅之间响起噔噔的脚步声，小饭厅的门猛一下被推开，戈林冲进我正在等候的房间，举着双手，大声嚷着，一屁股坐进沙发里，连连吼叫道：‘就是他，就是他！’”

希特勒声言，即使上将以军人的荣誉宣誓也不能使他满意。现在戈林看出自己的时机来了，他把希特勒的副官维德曼拉到一旁：“听我说，您满可以找领袖谈谈。您告诉他不妨把陆军交给我。我已准备交出四年计划。”他已不满足于当一名居间人了。1月27日，他获悉凯特尔将军接到通知午后1点钟去见希特勒，这时他打电话把凯特尔找来。戈林想知道，谁将接替冯·勃洛姆堡。凯特尔道：“不用说只有您才有可能，因为换了另一个陆军将领，您〔作为空军总司令〕大概是不会屈居其下的。”尽管对方如此敏感，戈林还是使劲点头赞同。显然戈林还控制了一个第三者，即勃洛姆堡。这个栽了跟头的战争部长却认为，由戈林来接替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可是，希特勒不想把自己的计划毁在戈林手里，总理使出他那

巧舌如簧的口才，三次拒绝戈林当选。他对维德曼副官说：“根本不会考虑。戈林连视察空军的规矩都不懂。我还比他懂得多呢。”凯特尔听到的说法是：“这是根本不会考虑的，他交给了他〔戈林〕四年计划，空军必须由他来抓，比他更好的人找不到了，而且他必须作为他的既定接班人熟悉政务。”而对勃洛姆堡，希特勒则说了“几句对戈林不客气的话：他太轻闲——也许甚至可以说是懒惰——，无论如何他不在考虑之列”，这位陆军元帅后来这样回忆说。

228 就在这个时刻，1938年1月27日下午4点钟左右，这位蒙受屈辱的战争部长开始对这帮军人怀恨在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喜欢过希特勒的宠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他们死抱住自己的荣誉观，没有略微向这个倒台的陆军元帅表示一点人情的安慰。冯·勃洛姆堡决意报复，对于这种凌辱，军人们注定会再一次感到痛悔的。这位部长果真报复了：在离职前拜会希特勒时，他提议还是由领袖兼总理亲自担任战争部长一职。希特勒暗自欣喜。正在此时，战争部“国防处”处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却在日记中写道：“人们感到，德国人民正处在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里。一个女人对一国人民，从而也对世界的命运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这她自己并未料到。”

希特勒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一天后凯特尔获悉，希特勒将亲自领导战争部（改名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挽留我当他的参谋长，说我不可以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置他于不顾”。1938年2月4日，全国听说，希特勒冒险政策的怀疑论者已被清除；冯·勃洛姆堡和冯·弗立契下台；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由外交门外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接替；十六名将军被强令退休养老，另外四十四人被调职；战争部被取消，改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宣传部对这一场德国式的图哈切夫斯基事件发出了这

样的口号：“集中力量。”走向灾难的道路已畅通无阻，阿道夫·希特勒变成了德国的绝对独裁者。

不过冯·弗立契这起刑事案件还得了结。希特勒在逼这位大将辞职的前几天，就想好了一个狡猾的计划：示意冯·弗立契在双方不声张的情况下提出辞呈，可以不作处理。但遭到陆军总司令的拒绝。希特勒又想了一个主意：那么就由特别法庭对案件作出裁决。这时军人和法学家纷纷干预，发动一场证明陆军大将无罪的攻势。1月27日，战争部国防军军法处处长、部务主任海因里希·罗森贝格尔博士向凯特尔将军指出，对弗立契是根本不能考虑使用特别法庭的，对一个军官只能使用军事法庭，而且根据军事刑事法庭规程第十一条规定，对中将以上的军官需由领袖指定法官和法庭。凯特尔吓坏了，他想到在希特勒面前提这种要求就害怕。凯特尔犹豫不决：“您必须考虑，这些人都是革命起家，有着和我们不同的标准尺度。”

罗森贝格尔毕竟还是坚持实现了他的主张，何况他也得到中央司法部长的支持。弗朗兹·古特纳看出一个机会，终于能使希姆莱—海德里希机器日益增长的势力得到限制。他要利用弗立契案件表明，如果只由警察来对人定罪，德国将会滑到多么严重的司法专断的境地。希特勒亲自召见古特纳，请他作出判断。司法部长调阅了二十二份法院卷宗、七个秘密警察卷宗和其他审讯记录。然后他作出了决定，用的当然是纳粹官场的谨慎小心的语言。古特纳给希特勒写道：“有无罪过的决定不应该也不能由我作出；不管当事人的声望、级别或地位，这是应由法律裁决的事情。”

独裁者别无他法，只好同意组织军事法庭。希特勒任命成立国防军最高司令法庭，由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和德国军事法庭的两庭庭长组成；他责成德国军事法庭法官比龙和卡尔·沙克博士进行预审。同时希特勒也在法庭机器里安上了制动装置：戈林被

任命为法庭主席，而秘密警察也奉命配合进行调查。穿黑衫的和着灰色军服的双方之间的角逐开始了。

最初看来似乎秘密警察占了上风。审判长沙克还未开始工作，冯·弗立契就突然自动跑到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去听凭秘密警察审讯者摆布。冯·弗立契的朋友们为之惊讶不已。多年来，连刚入伍的陆军士兵都反复受到教诲：秘密警察无权逮捕军人，哪怕只是传讯也不可以；多年以来国防军最重要的守则之一就是，它的地盘对任何一个秘密警察官员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论其职位多么高——而现在，神经失常的陆军总司令竟打破自己的规定，自动坐到秘密警察的面前去受审。

他不只去一次，而是接连去了两次。1月27日审讯他的是党卫队区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陪审员有刑事参议弗兰茨·约瑟夫·胡贝尔。1月28日，贝斯特叫来主要证人施密特和他对质。审讯弗立契可算是秘密警察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但秘密警察法官贝斯特内心感到一种少有的不安。无可置疑，大将给人的印象是慌慌张张，显然神经紧张，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引起旁人怀疑他犯有鸡奸的说理中语无伦次，在陈述他有一次在自己家里接待过两名所谓民族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小伙子住宿时也是矛盾百出。冯·弗立契与犯人施密特无休止的争辩，也使贝斯特感到讨厌。

230 尽管如此，区队长贝斯特还是无法设想施密特的供述确有其事。在此期间，骗子手交代的某些情况，例如冯·德·戈尔茨伯爵的作案，不是已经证明纯属子虚么？审讯者贝斯特无法消除自己的疑团。他向希姆莱作了报告。全国领袖驳斥这个怀疑者的看法。希姆莱说：“骗子手也有所谓骗子手的脸皮。”换句话说，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骗子手决不会撒谎的。虽然如此，还是对施密特的供词再次进行了核实，这时秘密警察伙计们不得不看到，他们



是受骗上当了。

奈比的知交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在1月30日晚上就听刑事警察处长说，“在所谓的弗立契‘案件’中，张冠李戴，搞错了人。海德里希和希姆莱也知道这一点，但采取一切可能把事情包起来”。施伦堡也证实：“当海德里希有所顾虑时，案卷已摆到了希特勒的办公桌上了。”

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拉起了一道讳莫如深的铁幕。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不得使另一方看出正确解决弗立契案件的办法。秘密警察开始玩弄无耻的掩人耳目的手法。它装成始终坚信大有罪的架势，海德里希派出一群使者闯进营房，审讯所有曾经在冯·弗立契身边当过清洁工的军人。将军过去的副官也一一遭到审讯。甚至连冯·弗立契提供过食宿的两个小青年的母亲，也未能免于秘密警察的摆布。迈辛格这个粗声大气的莽汉，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指使主要的假人证施密特三番五次地站着背诵他编造的老口供。

尽管这样，警察老爷们毕竟还是神色慌张，这连局外人也看得一清二楚。希姆莱已不再信任自己的精明强干的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头子了；海德里希连连叫苦，说他的脑袋也许保不住了。约德尔将军记述道：“希姆莱肯定担心自己要被国防军高级军官们骂得狗血喷头。”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天天收到报告，从这些报告中，海德里希和希姆莱不得不看到的只有一个内容：陆军军官们纷纷聚集起来，都想砸掉保安处的权力。海德里希相信这些报告是真的，但是他知道，现在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也跑到他的死对头那一边去了。

有一天，施伦堡接到自己头儿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海德里希命令施伦堡立即带上手枪和子弹去见他。施伦堡看到“C”心神不定；他们俩走进秘密警察处的机关食堂。一小时一小时过去，海德里希神经越来越紧张。突然海德里希看了看表说：“要是波茨坦

的人一小时内不出动，危险就可算是过去了。”直到这时施伦堡才  
231 明白，海德里希如临大敌，是认真估计了波茨坦卫戍部队会对艾伯  
莱希特亲王大街采取行动。

事实上，确有几个军官有此打算，但将军们临阵退缩，只限于口头上表示一番愤慨。总参谋长贝克长时间冥思苦想弗立契事件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新任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大将抗议秘密警察冲击营房，而受辱的冯·弗立契大将则向希姆莱提出要求决斗，负责下挑战书的人冯·伦斯德将军始终没有去做，而是把挑战书藏在家里当作纪念品。只有霍斯巴赫上校和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毫不妥协地跟黑衫队员斗。他们最亲密的盟友是弗立契的辩护人吕迪格·冯·德·戈尔茨伯爵和中央军事法庭法官沙克，他们派出的侦察人员逐渐接触到了秘密警察的阴私。

沙克和冯·德·戈尔茨试图推翻施密特的供词。他们可以证明，冯·弗立契大将从来没有施密特所说的那种身分证，从来没有在费迪南德街附近住过；将军也不（象施密特所说的那样）抽烟，没有带皮领的便服大衣。不过冯·弗立契的辩护者们也很快明白过来，施密特所说的情况一定确有其事。因为施密特对作案地点的描述显然符合实际。

这时冯·德·戈尔茨伯爵灵机一动。他查阅居民姓名地址册，寻找姓弗立契的或其他读音相近似的姓氏的人。他的眼睛一亮，看到有：“冯·弗立契骑兵上尉”。这个人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费迪南德街 21 号！首席侦缉员沙克带领部下赶到骑兵上尉家里，揭穿了这个谜底。所有情节一概相符：骑兵上尉冯·弗立契承认在万湖车站作过案，他穿的大衣就是所说的那件皮领大衣，他抽烟很凶，他最后还交出了支付讹诈金的提款单据，是从德累斯顿银行第四十九分行他的 10220 号账户提的款。

冯·德·戈尔茨伯爵去见自己的委托人，也顾不上问候，脑子里只想着这一消息，一见面就冲他喊道：“大将先生，您可以鸣炮祝捷了，真正的弗立契已经找到，案情全部弄清了。”但前陆军总司令表示怀疑：“即使这样也不会叫领袖满意的。他不大相信真会有这种事情。”

冯·弗立契的宿命论几几乎不幸而言中。秘密警察抓走了鸡奸犯骑兵上尉，准备杀人灭口，因为弗立契掌握了秘密警察的致命隐私：他知道并且也告诉了沙克，秘密警察探长费林 1938 年 1 月 15 日已经去找过他，也看到了他的银行提款单据。不过冯·弗立契大将的朋友们已有所警惕。沙克出面干预，迫使秘密警察又交出了骑兵上尉。

3 月 10 日，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法庭在柏林“普鲁士大厦”开庭，正式审讯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对秘密警察来说，它变成了古代希腊用贝壳投票放逐犯罪者的民众法庭。开始时，不用说被告很少有获胜的希望。几个钟头后审讯即告中断：希特勒将坐在法官席上的三军总司令们叫到总理府去了。有人私下告诉冯·弗立契是什么原因：阿道夫·希特勒发布了进军奥地利的命令。过了七天，审讯继续进行。秘密警察的证人施密特还想一口咬定自己的供词属实，这时，原来和秘密警察站在一边、挑起弗立契案件的那个人，把审讯权抓在手里：主席戈林用强有力的讯问，一连严词追问，迫使讹诈犯施密特招架不住，终于招认一切。

1938 年 3 月 18 日宣判：“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法庭就控告退役大将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一案，根据正式审讯结果……裁决：正式审讯证实退役大将冯·弗立契男爵在所有各点上均无罪。”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转入防守。现在国防军一定要大举进攻了，现在轮到穿灰色制服的打出王牌了。然而国防军默不作声。只有霍斯巴赫和卡纳里斯拟了一份“建议要求”，由陆军呈报希特

勒。卡纳里斯口授道：“一、郑重明确地公开为冯·弗立契男爵大将恢复名誉，因为……冯·弗立契男爵大将辞职的原因已广为传开。二、调动秘密警察主要领导人的职务。首先应考虑调动的是希姆莱、海德里希、约斯特（党卫队保安处）、贝斯特、迈辛格、费林和其他人。”

可是将军们又一次临阵退却。贝克仔细看了看卡纳里斯和霍斯巴赫的文件，将其归档了事。经过勃洛姆堡—弗立契危机，国防军领导政治上挺不起腰来。外加希特勒对军人们又进一步迁就，他把一批将军召集拢来，宣布给冯·弗立契恢复名誉，当然没有官复原职；只任命他当了第十二炮兵团团长——象宿命论者瓦尔纳·冯·弗立契自己说的，他在炮兵团里成了“众矢之的”——，1939年9月22日在围攻华沙时死去。反之，希姆莱下令枪毙了讹诈犯施密特，将刑警探长费林交纪律法庭，调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岗位上。弗立契案件经办人之一、刑事警官埃贝哈德·席勒被强令离开秘密警察处，迈辛格也丢掉了他的全国打击鸡奸罪行中心负责人的职位——在1939年被希姆莱放逐到了波兰的德占区。

希姆莱需要一段时间，用来忘掉弗立契事件所受的打击。最使党卫队头子受不了的是国防军谴责他煽动反陆军将领。当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施特雷肯巴赫调查一名受到国防军指责的党卫队领袖的案件时，希姆莱告诫说：“您要全面调查，不要有任何遗漏的地方，免得人家背后再说我对国防军不公正。”即使对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希姆莱也认为有必要否认有过丝毫参与冯·弗立契事件的行为。在一次对特别机动部队领袖的讲话中，希姆莱声言他是庸碌无能的官员们的受害者。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员豪塞尔说：“我们相信他的这种说法。”

全国领袖几乎时刻提心吊胆，当心不让警察和党卫队对武装部队进行任何较为尖锐的批评。希姆莱甚至不允许在党卫队领袖

的部秘密讨论会上攻击陆军。1939年1月，党卫队旅队长莱奥·佩特里请他看一份为在柏林召开的一次地区总队长大会起草的报告，其中指桑骂槐地提到勃洛姆堡—弗立契危机，希姆莱拿起绿铅笔狠狠几笔将其删去，并加上批语：“不能用这种提法。”佩特里起草：武装部队对党卫队“变得有所让步和顺从”。希姆莱改为：“……变得有所谅解”。佩特里起草：武装部队曾试图将特别机动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摧毁或迫使它接受武装部队控制”。希姆莱改为：武装部队曾试图使特别机动部队“失去作用或置于武装部队指挥之下”。

保安警察头子海德里希也不免感到力不从心。莉娜·海德里希谈到，她的丈夫当时处在沉重的精神负担之下。希姆莱最亲密的合作者知道被多数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一点：经过勃洛姆堡—弗立契事件后，警察机器的实力不是增强了。诚然，这一事件毕竟最终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但警察机器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变化，穿灰色制服的新领导人依然对党卫队权力抱抵制和敌对态度。

冲突反而变得更加尖锐化了。海德里希的对手卡纳里斯，特别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中央国外科科长汉斯·奥斯特中校，越来越让军事情报工作打入明令禁止由它插手的政治情报领域，并变本加厉地同秘密警察和保安处争夺政权敌人。连那个对希特勒唯唯诺诺的将军、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也把防止党卫队警察机器干预军事领域看成是他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贝克将军在弗立契危机后不久即下台，由哈尔德继任总参谋长，当哈尔德有一次责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说他对希特勒一味让步时，凯特尔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凯特尔推心置腹地写道：“哈尔德，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你，你应该了解我。”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清楚地了解，他的权力并没有无条件地

得到承认。他必须进一步集中使用他的统治手段，消灭自己王国里所有引起摩擦的因素。1938年春，秘密警察的声誉扫地以及保安处的信任危机，促使海德里希考虑成熟了一项计划，他要利用这个计划把他的监视系统的两部分溶为一个整体：海德里希筹划将保安处和秘密警察合并成德国中央保安局。

希姆莱促成了这一合并。从1938年夏天起，全国领袖加紧推行他的把党卫队和警察合并成一个机器的宏伟计划，成为——如同1938年6月23日希姆莱在一项指示中所说——“统一结成纳粹国家的国家保卫团”。希姆莱提出熔合过程分两步走：风纪警察成员加入普通党卫队，甚至可以建立大型地方党卫队警察突击队。保安警察成员则加入保安处党组织。希姆莱业已建立了（至少写在纸上了）一种绞尽脑汁设计的合而为一的个人负责制，用以把党卫队和警察象铁箍似地紧紧箍在一起：1936年秋，各大区保安处领袖已被任命为保安警察兼保安处督察员，负责推动秘密警察、刑事警察和保安处三者合一。1937年年底，党卫队各地区总队长被任命为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在进行动员时各自负责领导该地区的所有党卫队、风纪警察和保安警察部队。

但是，希姆莱的国家保卫团计划，有使保安处丧失其独立性的危险。对保安警察官员作为党的组织参加保安处的宣传，把一个主要来自秘密警察的官员新阶层送进了保安处，他们在自己所干的一行中，变成了作为情报机构的保安处的竞争者。

此外，新涌进保安处的官员作为新手得到的不是党卫队的起码级别，而是与其官阶相应的队衔。例如刑事警察书记长变成了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刑事参议变成了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政务主任变成了党卫队旗队长。原来的保安处人员看到自己就要受刚刚任命的（或按当时的说法：被同化的）、从秘密警察转来的保安处领袖们控制的日子不远了。而秘密警察官员团本身

还是一个巨大的、容纳保安处的潜在后备力量的场所。1935年年中，六百零七名秘密警察官员中，只有二百四十四人是党卫队，到战争开始时，二万名秘密警察官员中有三千名党卫队员。

只要保安警察和保安处成员起跑条件不同，原有广大保安处人员就不是新来的竞争者的对手。在保安警察中，占主要优势的是传统的警察官员和行政法学家；在情报机构的保安处中，则簇拥着一群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都是从党卫队仕途规则的专制下涌上来的。这也再次反映了保安处是党的机构、保安警察是国家行政机关这一事实。 235

海德里希决定结束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他想把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同保安警察合并，从而使保安处也变为国家行政机关，以消除保安处的两大缺点：对党的依赖性和享受不到与当公务人员同样的固定养老金。保安处抓生活领域引起的争吵即已暴露出，保安处在政治上多么离不开党的好意。

经常性的短缺经费说明了一种对党愈益不正常的依赖；保安处每年都得向党的全国司库写信乞求一番，1936年党卫队出纳员奥斯瓦德·波尔给党的司库弗朗兹·沙维埃·施瓦兹写的信就是一例。“请您看到这个需求后别惊怪，”波尔请求说。“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一文不名，存款和账外准备金悉已告罄。钱柜空空，最近几月经费情况三天两头捉襟见肘。前四个月党卫队库存现金平均为三千马克。!!!”。有时施瓦兹放下手头工作，给党卫队算账，说它所要求的数字（1934年：每月七十万零九百六十马克）超过了党员交纳的党费。即使给施瓦兹在党卫队内连连升官，也未能使这位司库拨款大方一些。遇到燃眉之急，往往得请领袖代表和全国指导处出面说话，给以资金补助。

海德里希想要使保安处摆脱这种依赖性。1938年年底，他责成施伦堡就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的合并进行一些研究。改革的核心

问题是使保安处国家机关化，把它的预算列入国家计划，不依赖于党。时间紧迫，因为全国纷纷谣传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寿命不长了。“这种谣言，”施伦堡在1939年4月4日写道，“集中反映为担心保安处将要解散和被保安警察吞并的说法，对此得出的必要结论是，所有保安处成员由于享受不到内政部门承认的任免迁升的条例，特别是由于缺乏完全的法学教育，因而将丧失他们的生存条件。”

这些谣言决不是凭空捏造的。党卫队头子确曾一度考虑解散整个情报机构的保安处。但强权政治思想使他没这样做：希姆莱在党内的地位是以保安处系纳粹党的唯一情报机构作为基础的；一旦希姆莱解散保安处，就会有换一个党内实力派另搞一个情报机构而不听命于全国领袖的危险。

因此，制订计划的施伦堡着手起草设计了一个新的超级机构。236 他提出建立一个德国中央保安局\* 的设想（保安处+保安警察），跟希姆莱的国家保卫团（党卫队+警察）方案相比较。施伦堡要把保安总处即党的机构，和保安警察总处即国家机关合并为德国中央保安局。各大区设德国中央保安局督察员，领导德国中央保安分局，并统一领导区内所属保安警察和保安处部队。无论如何，关键性的一点是：保安处不能被保安警察吞并，而必须保持它的“独特”性。

换言之：施伦堡希望沾国家财政预算的光，不依赖于党，而又对保安处成员和保安警察成员一视同仁，不过他同时也考虑要使保安处摆脱秘密警察公务人员法的范畴。他最担心不过的是，保安处的灵活机动性今后可能受到行政法学家们的限制。瓦尔特·施伦堡也和头头海德里希一样，是法学家规范化思想的狂热反对者。本身就是法学家的施伦堡，对行政法学家抱有一种几乎是病

---

\* 不要和另一个同名组织、即驻总理府负责保卫希特勒个人安全的刑事警察分队混淆。——原注



态性的不信任，因为他们缺乏新的主宰民族的无所顾忌的服从性，也就是保安处宣传的那种干部类型：他们不受社会和国家任何法律的约束，无条件地执行独裁者的一切旨意，包括执行阿道夫·希特勒最最罪恶的命令。施伦堡起草说：新机器必须“在排除一切起阻碍作用或因袭相传的思想的原则下……终于拥有一个国家机器所必须具备的灵活机动性，以便易于管理根据领袖考虑建立的范围内的德国”。这种灵活机动性却是旧法学家瓦尔纳·贝斯特做不到的，因为他坚持主张由行政法学家担任关键性要职，反对海德里希和施伦堡推行的警察非公务人员化。贝斯特制定了新的任免升迁方针，这种方针要求作为国家机关的保安处人员同样具有完全的法学教育。

施伦堡和贝斯特之间展开了一场游击战，它的部分战斗甚至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的楼房里进行。1939年4月，贝斯特在《德国法治》杂志上发表文章，矛头公开针对海德里希周围的蔑视法学家的。贝斯特写道：法学家的职业，特别是在第三帝国，应该理解为“人民制度中整治者的职业，因为他要精于文职人员发布和执行命令的技术，并熟悉和领导集体的所有任务，因而他能够在各个领域行使……他的整治职能。因此法学家的职业今天……是人民制度范围内‘政治性最强’的职业。”

海德里希对贝斯特的文章非常气愤，立即责成施伦堡写文章 237 答辩。他的助手以训练有素的机智着手这项工作。施伦堡批驳说，贝斯特的文章是“个人喜爱的问题”。施伦堡在1939年4月25日就贝斯特一文写道：“这无非是意味着促使发动今天这场批评的外行领导永远坚持其傲慢态度而已。因此它必然也要促使一种被认为业已过去的时期的危害永久化……很值得怀疑的是，保卫‘法学家’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毫无根据地宣判无罪……狂妄自大。”

但是法学家辩护士贝斯特无休止地一再提出，在保安警察里的保安处人员也应遵守普通行政机关的准则。他坚持负责官员必须具备法学教养。海德里希说：“哦，您是想办您的推事官幼儿园哩！”不过争吵自然是多余的。施伦堡雄心勃勃的计划失败了，败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怯懦，他不敢向党提出保安总处拟定的关于成立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规划。有一次党卫队头子向鲁道夫·赫斯小心翼翼地探问了一声，就挨了一顿训斥：纳粹党领导决不允许将一个党的机构和一个国家机关合并成新的国家超级机构。党怀着嫉妒的心理注意，对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即便由十分积极的纳粹分子担任领导，也不能让它知道党内事务。

最后搞成的德国中央保安局(RSHA)只是一种脆弱的妥协产物。虽然在1939年9月27日成立了这么一个机构，但始终未获准在公众中亮出这块招牌；指示规定，在和其他机关单位打交道时不得使用印有“德国中央保安局”字样的信笺。德国中央保安局过着隐蔽的生活，不得让任何人真正看出来。它始终是一个内部组织机构，对外只有“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处长”。保安处和保安警察合并的梦想也破灭了。党和国家没有混和在一起。

人们只是将保安总处和保安警察总处的部门组成为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各个处，而这些处同样也继续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独立性，按不同情况，或属国家或属于党。第一处（行政和法律）由两个总处的法律和组织部组成，处长为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属国家机关。第二处（世界观研究）由保安总处I处3科和II处1科组成，处长为教授弗朗兹·西克斯博士，属党的机构。第三处（德国生活领域或国内保安）为保安总处的中央II处2科，处长为奥托·奥仑道夫，属党的机构。第四处（镇压反对者）由秘密警察处二、三两处和保安总处中央III处2科组成，处长为海因里希·缪勒，属国家机关。第五处（打击犯罪活动）相当于中央刑事警察总处和保安

警察总处的刑事警察处，处长为阿图尔·奈比，属**国家机关**。第六处(国外情报或国外保安)由保安总处三处组成，处长为海因兹·约斯特，属**党的机构**\*。

但是，保安处依然没有离开党的关注。国家财政预算——除第一和第四两处所属的一些保安机构已属国家机关外——都未争取得到手，国内保安处也未摆脱从它过渡到生活领域调查研究以来行动上即受到限制的捉摸不定的局面。国内保安处形成了党用来装饰门面的一块僵化的招牌，从而使那里的人谁也不会再想到要建立一个新的情报组织。就连保安总处也仍然作为一个党的机构正式存在，尽管它早已解散了。奥仑道夫解释说：“由于党卫队全国领袖无意真正开展他已经招来许多麻烦的生活领域情报工作，因此他对保留门面的解决办法心满意足了。”

如果不是奥仑道夫周围的人一再——常常是违反希姆莱明确规定的政策——试图扩大他们的地盘的话，这个保安机构肯定要落到完全不起作用的地步的。而扩大地盘又导致了和党的新的冲突，直到1944年希姆莱命令保安处向党彻底投降才告一段落。保安处只剩下两方面的真正职能：进行国外谍报工作；网罗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特别行动队和特遣队头目、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新欧洲土地上进行政治恐怖和种族屠杀的人。

但是，策划恐怖的命令没有落在为这个可怕的暴力机器奠基的人的肩上。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已经看出，象他这种法学家在这个天地里再也没有容身之所了。他一有机会就退出保安警察。1940年5月，他请海德里希批准他自愿上前线——在武装部队里工作。去掉他身边这个制动装置，海德里希自然感到轻快。他对贝

---

\* 1940年贝斯特离职后，德国中央保安局所属各处再次作了调整：贝斯特的第一处分为两个新处，即一处(人事)和二处(组织、行政和法律)，原来的第二处改为新立的第七处，排在最末。——原注

斯特说：“每当我想到一个好主意，就要担心您会来找我的麻烦，并用您的法学家论点来证明不能这样做或必须另搞一套。”

239 当然，这两人还是客客气气地分了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德里希对这个摆脱了德国中央保安局羁绊的前合作者越来越反感。由反感而变成仇恨。不论贝斯特在什么地方露面，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都会给他设置障碍。贝斯特在一封致海德里希的信中抱怨说：“我有一次向您的对秘密事情常常很敏感的夫人说过，愿意做您的真正的朋友。可是您却不想要这个朋友。您要的是下级。”海德里希对此信置之不理。他根本拒绝同自己过去的法学家见面，但却写信给风纪警察头子达吕格说：“这位法学家在我手下在任何方面不曾起过所谓的领导作用，实际上只不过是……顾问、并非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导助手而已。说到底这是——如你所知——我和贝斯特博士分手的内在原因。”

法学家贝斯特博士离开了保安警察。这也几乎是象征着：瓦尔纳·贝斯特的法律观在民族意识上已七折八扣，其自由主义的权力概念被抽走，但至少还保留着几分虚弱的准则和依据，即使这样，它也是行不通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权力机器失去了任何形式的制动装置。战争和集体屠杀的时期开始了。

## 第十一章 党卫队与外交

240

阿道夫·希特勒向上伸出右臂致礼，举目向谒见者逐个横扫了一眼。独裁者面前站立着大德意志国家的最高军事骨干。1939年8月22日星期二这一天，武装部队三军总司令、参谋长和指挥将领们来到伯格霍夫，聆听希特勒亲口宣布一个可怕的决定：决心进行战争。

“我把你们召来，”希特勒开始说道，“是为了让你们了解政治局势的轮廓，以使你们对我据以作出我的无可更改的决定的各项因素能有深刻的了解。”将领们从希特勒长达几个钟头的独白中获悉，形势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对德国有利：英国“受到极大的威胁”，法国的地位“同样在恶化”，苏俄愿意和德国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说：“谁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因此最好现在就摊牌。”

午后不久，先生们离开一会儿工夫，去吃了点东西，接着又聚在一起。希特勒的战争狂热一分钟比一分钟厉害，他的目光越发直瞪瞪的和越发凶狠。他叫喊道：“心要狠，手要辣。八千万人民一定要得到他们应得的权利。”突然他又平静下来，从容地宣布，他准备就在明天决定对波兰开战的进攻日期。仗总是要打起来的，不管怎么个打法。希特勒说：“我将在宣传上提出发动战争的理由，人家信不信无所谓。事后是会有人问胜利者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有理，而在于胜利。”

将领们散会离去时，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已经有人奉命在准

备提供希特勒所宣布的“宣传上……发动战争的理由”了。希特勒挑选了海因里希·希姆莱从事这项使命。这次行动，把党卫队头子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和泪永远联在一起。

只有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隐约感到了希特勒的盘算，在1939年8月17日，他已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有些令人费解的话：“卡纳里斯……第1局，希姆莱—海德里希上萨尔斯堡，150套波兰军  
241 服和附件……上西里西亚。”翻译成明确的语言那就是：哈尔德听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谈到，在希特勒于上萨尔斯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独裁者跟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对党卫队难兄难弟讨论了一项行动计划，指示给上西里西亚提供一百五十套用来作为化装道具用的波兰军服。这是上演一出最终使五千五百万人失去生命的悲剧的序幕。

这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想出来的主意。早在1938年苏台德危机中，保安处长就曾建议德国必须通过虚构边境事件，作为口实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只是由于西方国家慑于希特勒的恫吓而投降和慕尼黑会议，才没有实现海德里希的计划。当前的同波兰的摊牌使海德里希跃跃欲试，又把他的老计划重新提了出来。8月初，他已知道怎样使全世界相信，德国是由于波兰挑衅而进行战争的。

海德里希的计划是：在德国进攻的前一天夜里，用保安处掌握的部队穿上波兰游击队员和士兵的制服，沿德波两国边界虚构发生侵犯边界事件。伪装的波兰人的任务是几分钟内攻占格莱维茨的德国电台，随后对着麦克风用波兰话发出一通攻击德国的叫嚣；在克罗伊堡北面的边界林区城市皮琴进攻当地的森林管理所；以及捣毁格莱维茨和拉蒂波尔之间边界地段的德国霍赫林登海关。

保安处的这出战争把戏规定需要流血，同时必须在现场留下死人——这是海德里希计划中最令人担心的部分——，因为应该

让世界报刊的记者们深信不疑。海德里希说：“对于外国新闻界和德国宣传工作，都需要有证明波兰人进攻的真凭实据。”可是往哪儿去找死人呢？这位玩世不恭的保安处长对此也想出了办法：指定由集中营提供“牺牲者”，即提供囚徒，为了X日这一天第三帝国更崇高的荣誉，将他们事先在集中营里注射毒药针剂，活活弄死，并加以收拾打扮，供上西里西亚战场使用。秘密警察的野蛮语言管这些人叫“罐头货”。

8月初，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将计划呈报领袖，希特勒立即予以批准。随后保安总处就拧开发报机，向驻格莱维茨—博伊滕—奥佩尔恩地区的党卫队第二十三和第四十五两旗队发出命令，选派会讲波兰话的人来柏林威廉街102号接受一项秘密任务。几乎与此同时，党卫队区队长赫伯特·梅尔霍恩博士接到指示，来见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向他交了底，责成他在霍赫林登地区对这一行动进行准备。接着，下一个谒见者也在一阵皮靴的咯咯声中跨进了海德里希处长办公室：这人就是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他从保安处开张起就是海德里希的伙计，这次的任务是指挥对格莱维茨电台采取行动。 242

瑙约克斯一听就领悟了处长的意思，处长告诉他说，一定要使“造成未来事件的责任一眼就能看出不在我方”。海德里希指示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带上六个人去格莱维茨潜伏下来，就近侦察地形并待命行动。行动暗号是：“祖母去世了。”海德里希严格叮嘱瑙约克斯说：“第一，对于这件事情您不得同格莱维茨的任何德国机关单位进行联系。第二，你们一行中谁也不得随身携带任何看得出是党卫队成员、保安处、警察或〔看得出是〕德国国籍的证件。”

这是8月10日的事情。瑙约克斯在自己部属中挑了五个人，配上一名用来发表准备好的煽动性演说的译员，带领他们乘车去格莱维茨。他们分住在两家旅馆里，瑙约克斯下榻“上西里西亚之

家”。然后他去侦察电台周围的地形。电台设在城外塔尔诺维茨公路旁，外面围着一道两米高的铁丝网，电台和相连的两幢楼房均不见有人警卫。

在此期间，海德里希召集其他关键性人物最后商定了各项细节，保安处处长一一分配角色：国外保安处长党卫队旅队长海因兹·约斯特负责置办行动需用的波兰军服；党卫队区队长、两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奥托·拉施指挥攻打皮琴森林管理所；党卫队区队长梅尔霍恩博士负责把霍赫林登一带地区的武装部队撤走，并协调进攻者和防守者双方假戏真做；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奥特弗里德·赫尔维格率领他手下的化装成波兰攻击部队的一伙人，由南面（从波兰方向）冲向霍赫林登；党卫队旗队长汉斯·特鲁姆勒博士负责指挥霍赫林登的边防警察和“防守者”；秘密警察处长、党卫队区队长海因里希·缪勒，则将从集中营拉来的“罐头货”分别送到各处战场。

到8月半，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可以再次向希特勒报告了。一项领袖命令给保安处打开了武装部队的保密军服柜。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二科日志记录员于1939年8月17日写道：“领袖指示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如下：给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为执行一项行动计划提供二百五十套波兰军服。”布雷斯劳第八军司令部谍报军官丁格勒上尉接到指示，将军服交给保安处代表，谍报局二科提供波兰武器和军人身分证。负责置办事宜的约斯特派人将一应什物送到伯尔瑙保安学校，由上西里西亚两个旗队选派的人员，在这里进行夜间演习和波兰军队的队列操练。

243 在伯尔瑙进行训练的这支部队领到了波兰军服，每人配备一支轻武器，三十发子弹；只有选派攻打林管所和海关站的党卫队队员装扮成游击队队员。“这些人规定穿绿衬衫和杂色的长裤及便



上衣。发给他们戴的是鸭舌帽和礼帽，”被派往伯尔瑙受训的一级小队长约瑟夫·格尔茨梅克后来这样记述说。

8月20日，时间到了。梅尔霍恩把所有人员召集到保安学校的大礼堂，直截了当地给他们交待了执行一项绝密性的“边境任务”。然后大家乘上遮盖严实的卡车，开赴各个行动的地区。格尔茨梅克说：“开车前郑重规定我们不许在途中把脑袋伸出车外张望，不得跟人说话或相互交谈。”两天后，海德里希接到报告，从报告中保安处处长看到，可以随时开始行动了。8月23日，希特勒作出决定：定于8月26日4时30分动手进攻波兰。

海德里希无疑不会那么神色镇定的，如果他知道，就在同一时刻谍报局里的政权敌人正在复制一份希特勒8月22日向将军们讲话的记录的话。这份记录中，除了希特勒确实讲过的话外，也夹有杜撰的（虽然与事实不谋而合）这位独裁者的声明，说他将派几个连在上西里西亚发动对德国边界的佯攻。经过作了这样篡改的希特勒讲话记录稿，落到了反对派青年领袖赫尔曼·马斯的手里，他通过美国通讯社“美联社”驻柏林办事处负责人路易斯·P·洛克纳，暗中转送给英国大使馆。因此英国政府在8月25日下午，就知道了希特勒打算蓄意制造边境事件，向波兰开战。

不过这项行动计划倒是在另一点上出了纰漏。当希特勒在8月25日下午3点钟左右明确命令次日拂晓开始对波作战时，对此还一无所知。海德里希抓起电话话筒发出最后指示：瑙约克斯接到通知不许再离开旅馆，必须随时待命出击，梅尔霍恩接到的命令是将赫尔维格的部队拉往边境，秘密警察缪勒通知装运死囚的卡车起劲。

突然，发生了海德里希事先不曾预料到的事情：希特勒通知收回战争命令。临近傍晚时分，希特勒在总理府接到两个报告，使这位独裁者举棋不定。意大利驻德国大使转达了通知，说他的

Duce<sup>①</sup>不能参与战争冒险；来自伦敦的报告则说，英国刚刚同波兰  
244 缔结了一项同盟条约。希特勒召见凯特尔大将，冲着他大声说：  
“立即停止一切行动。马上把〔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  
时间进行磋商。”

凯特尔冲到电话机跟前——这时已是下午 6 点 30 分了——  
给陆军总司令通话。凯特尔说：“由于政治局势变化，已开始进行  
的‘白色方案’定于下午 8 点 30 分停止执行。”费了好大的力气，已  
经转动起来的战争机器又停了下来。海德里希也跟着刹车，他急  
急忙忙向上西里西亚发命令；德国保安警察处处长命令立即停止  
边界行动。可是，梅尔霍恩已无法通知早已渗入波兰境内的一级  
突击队大队长赫尔维格了。赫尔维格的部队冲到霍赫林登海关  
站，开了火，立即遭到德国一方的回击；直到秘密警察缪勒赶到，才  
止住了战斗。

事后，梅尔霍恩和赫尔维格始终未能就谁应对这场流血事件  
负责辩个明白。显然赫尔维格把梅尔霍恩发出的准备行动令，误  
认为出发行动令了。赫尔维格以为暗号“小雄山鸡”是准备行动令，  
“大雄山鸡”是出发行动令。但就梅尔霍恩来说，“小雄山鸡”只是  
命令部队戒备，“大雄山鸡”是准备行动令，只有“阿加特”才是出发  
行动令。可是生性多疑的保安处长海德里希却认为，事情不只是  
出于对命令的误解，他开始怀疑有人存心破坏这次行动计划。

海德里希偏偏让区队长梅尔霍恩在这次行动中担负关键性任  
务，这的确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前克姆尼茨律师、保安处资格最老  
和最精明的同事之一的赫伯特·梅尔霍恩博士是保安总处公认的  
“智囊人物”；他属于那种对海德里希及其一伙无原则的肆无忌惮  
进行抵制的旧式知识分子。这个同海德里希作对的人，在 1937 年

<sup>①</sup> 意大利语，本义为“领袖”、“独裁者”，墨索里尼统治时期用此称呼，中文亦有  
音译“杜克”的。——译者

被解除保安总处“勤务督察”主管科科长职务，以后被踢到中央内政部，由内政部派往美国和日本进行考察。尽管如此，将智囊人物梅尔霍恩拉来参加保安处这次战争玩火，以便确保行动谨慎和周到，这还是符合海德里希的稳上加稳的想法的。直到海德里希听说，梅尔霍恩认为整个行动计划是一桩“历史性罪行”，以及8月25日夜里闹出的乱子有使保安处处长的声誉扫地之虞时，海德里希才同梅尔霍恩一刀两断。秘密警察缪勒接替了这个萨克森人的职务；梅尔霍恩被迫交出保安处的菱形徽章，此后永远不准再进保安总处的大门，这个最能使海德里希害怕的党卫队区队长以后再也没有升迁。赫尔维格也不得不下台，他的任务由已经扮演过一阵“防守者”角色的旗队长特鲁姆勒接替。

第二次行动干得比较顺利。希特勒刚于8月31日重新和最<sup>245</sup>后确定进攻时间(9月1日4点45分)，海德里希就再次命令他在德波边界上的秘密军作好戒备。下午4时许，璠约克斯在格莱维茨下榻的旅馆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璠约克斯抓起话筒，里面传出一声响亮而急促的嗓音：“请回电。”再没有说别的话。璠约克斯叫接柏林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的海德里希副官室。又听见那个响亮的嗓音讲了几个字：“祖母去世了。”璠约克斯听得清楚，立即通知手下人集合，和他们约定7点45分乘车去电台并把它占领。这时缪勒也下令启动停在奥佩恩一所别墅前面的卡车，因为他得赶快将死人送到各处战场上。他给璠约克斯准备了一个罐头货，至迟在8点20分以前必须将它摆在格莱维茨电台的大门口。

璠约克斯带领手下的人在塔尔诺维茨公路上急行军，直奔电台大楼。8时许，邮政信箱工人福伊齐克发现五个人走进电台的机房，上楼梯冲向播音室。福伊齐克正想问这几个生人有何贵干，就在一支枪口前愣住了。其他电台工作人员也受到了璠约克斯的款待：“举起手来！”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打了一个手势，他手下的人

就大叫大嚷起来。瑙约克斯记述道：“我们在播音室里用手枪射击。我们朝天花板开了几枪示威，制造一点声势，吓吓他们。”

电台人员被捆绑起来，塞进了地下室。瑙约克斯说：“接下来我们手忙脚乱设法使广播中断。”这些不速之客有好一会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中断正在播送的节目，以便把他们的波兰话的煽动性演说播送到太空中去。一会儿，他们终于发现了电台领导通常在遇到雷雨时用来通知广播受到干扰的所谓雷雨麦克风。瑙约克斯掏出波兰语讲稿宣读，几分钟后，成千上万的德国听众，就听到了一阵清清楚楚是波兰人发出的乱嘈嘈的叫器，最后被几声枪声所打断。整个演出历时四分钟，然后瑙约克斯带领手下人员撤走。当这个党卫队队员走上公路时，电台门口直挺挺地躺着一个集中营囚徒。这个死尸是瑙约克斯小队的两名队员从秘密警察处长缪勒手里领到的。瑙约克斯看了死尸一眼，一挥手招呼大家离去。

象在格莱维茨一样，另外两处地方也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计划向德国进行了佯攻。当约瑟夫·格尔茨梅克从霍赫林登附近被他的同伴们捣毁的海关跌跌撞撞走出来时，黑暗中有什么东西使他眼睛发花。格尔茨梅克说：“我弯腰一瞧，发现地上有好几个人一动不动地躺着，都是穿波兰军服……光着头。我蹲下去，因为我以为是我们自己的同伴。当我打算把其中的一个扶起来时，我发现他早已硬挺挺的了。”

不过党卫队全国领袖没有被几个死去的集中营囚徒所绊倒。他给他的领袖提供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需要的东西：波兰挑衅事件。就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士兵和坦克冲进波兰长驱直入的时候，第三帝国的报纸忙着上演一幕愤怒交响乐，向世界公众报道所谓发生在大德意志国家边境上的骇人听闻的事件。1939年9月1日，《人民观察家报》用头版刊登“波兰暴徒越境进犯德国”，报

道说：格莱维茨的罪行“明明白白是波兰游击队全面进犯德国领土的信号”。另一家报纸报道：“在边界地区执勤的保安警察分队奋起迎击入侵者。激烈战斗仍在进行中。”

第三帝国的首领们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题目。希特勒在9月1日打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会演说中声称，前一天夜里发生了十四起边境事件，其中三起极为严重。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告诉法国大使说，波兰军队从三个地区入侵德国领土。连对希特勒的作战方针持有自己看法的赫尔曼·戈林，也“稍事犹豫后”告诉瑞典和谈斡旋者比尔格·达勒鲁斯：“战争之所以爆发，原因是波兰人进攻了格莱维茨电台”。

报纸和权贵们一致发出的悲愤的哀鸣声，还促使秘密警察缪勒再次去现场上演了一幕滑稽戏，当然这一次他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了。中央刑事警察处处长缪勒及刑事警察同行、中央刑事警察处处长阿图尔·奈比，率领一个刑事调查组出场，对波兰入侵的真相进行刑事调查，并写出报告。刑事警查处处长奈比甚至叫人在中央刑事警察处里，搞了一座电动的边境事件示意模型，给来自各中立国家的客人们观看。揿一下按钮，模型里安装的小灯泡就闪闪发亮，同时响起阵阵模拟的机枪声。保安处长海德里希站在一旁观看这出把戏，一面嘴里自言自语说：“嗯，嗯，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保安处在德波边境上演的这出战争把戏表明，党卫队正力争使自己成为第三帝国推行扩张政策的重要角色。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党卫队队员们开枪射击，铺平了通向外交冒险的道路。黑色集团的这次行动也是一个信号，说明希特勒德国开始走向放任大胆的掠夺政策的新地平线；格莱维茨无疑只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有朝一日也要决定德国外交政策方针的长途中的一个站而已。谁象 247  
希姆莱那样满脑子充斥着德意志日耳曼主宰民族的世界使命感，

谁就必然要以打破限制主宰民族向世界扩张的界线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也同时意味着：党卫队有朝一日必须成为德意志强权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支柱。

不过，希姆莱只能小心行事。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第三帝国领导体系内互相争夺的实力集团丛林中那种为所欲为的地步。无疑他拥有很大的权力，他控制着仅次于武装部队的最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器——警察，他手中掌握了二十五万八千四百五十六名党卫队队员，他指挥着四个团的拥有武装的特别机动部队，他还负责监督德国的唯一政治情报机关。尽管如此，这些权力还不足以在领袖、独裁者容许他的最高级部属们可以自由活动的范围之内左右政治方针。党卫队只能在领袖授权的问题上，发挥其拉大旗作虎皮的作用，而在代表其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它就相形见绌了。

正是控制外交政策的斗争暴露出，纳粹的权力范围和集团的莽莽丛林要让党卫队去取得最后胜利是多么困难。早在建立政权的最初几年中，党卫队功名心切的外交家们就有一次深深陷进了纳粹内部勾心斗角的泥潭——更糟糕的是：他们把这个政权推进到它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外交危机。

当时，列入新德国政策议事日程表上的首要问题，是要求合并奥地利。为了控制德国的对奥方针，有五派人争执不休：职业外交家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的外交部；党的全国指导处成员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领导的纳粹党外交事务部；由党的经费建立的、以其头头外交门外汉兼希特勒顾问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命名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纳粹党区领袖威廉·博勒领导的纳粹党国外组织；以及流亡慕尼黑的、由希特勒委任特奥·哈比希特为邦<sup>①</sup>督察的奥地利纳粹党领导机关。但是，在这样一个在相互争夺

---

<sup>①</sup> 这里的“邦”指奥地利，喻计划吞并奥地利的希特勒早已视奥地利为德国的一个邦。——译者

的五派的一团乱线中，从1933年秋天起，党卫队也参加进去，因为有一桩偶然事件把党卫队和奥地利问题扯在一起了。

奥地利的纳粹党在1933年夏天，被奥地利右派天主教极权主义联邦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博士所取缔。由于害怕陶尔斐斯的殴打行凶的警察，几千名奥地利的纳粹分子纷纷逃到巴伐利亚，投入了正在招兵买马的希姆莱的大军。党卫队将逃亡者编为一个“奥地利军团”，由党卫队旅队长阿尔弗雷德·罗登比歇尔在勒希菲尔德修道院设立军营，进行训练，并由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发给武器。但是在党卫队看来，更重要的却是留在奥地利的那些最积极的党员同志也转向党卫队。由于奥地利党内的政治领导人 248 和冲锋队领袖已争吵不和，因此越来越多的纳粹分子听命于党卫队全国领袖。例如前卫队长弗里多林·格拉斯也是如此。他曾经在奥地利联邦军中组织过一个纳粹军人小组，1933年夏党被取缔后他被逐出军队。

格拉斯把跟自己一样被逐出军队的他的纳粹小组军人，组成一个“军人旗队”，下分六个连。最初他将这个旗队交给冲锋队第十一地区总队领导，但是他很快就厌恶冲锋队的勤务和思想作风。格拉斯跑到柏林，提出把他的人马交给党卫队。1934年春，他说服柏林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地区总队长维特耶同意了她的想法，接受军人旗队加入党卫队。希姆莱给予批准，宣布格拉斯所部为普通党卫队第八十九旗队。格拉斯的这一着棋，注定了要给奥地利纳粹分子带来灾难性后果。后来党卫队的一个调查组指出：“格拉斯的态度被奥地利冲锋队领导看成是出卖冲锋队。”

时至今日已经无法查明，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格拉斯是否在当时即已将一个计划告诉了柏林党卫队领导，即他计划把奥地利纳粹分子从陶尔斐斯政权下一举解放出来。格拉斯打算发动一次政变，推翻维也纳政府。这并不是什么新计划。早在1933年

夏天，维也纳就有一批纳粹警察官员准备用武力搞掉奥地利政府。但是这项政变计划由于希特勒反对而搁浅；1933年10月，密谋者从驻慕尼黑的纳粹邦领导机关<sup>①</sup>获悉，外交形势对发动一次政变的时机还不成熟。

但是，党卫队队员格拉斯不想长期屈从于他的领袖的否决权。他重新制定了一个政变计划。格拉斯准备用自己在维也纳的旗队的一百五十名队员，趁联邦总理府召开内阁会议的机会逮捕政府领导人，占领电台和宣布成立新政府，全国各地的冲锋队随即纷起响应。希特勒在有关奥地利所有问题上最得力的亲信、邦领导哈比希特得知了格拉斯的计划，在1934年6月初把这位党卫队领袖请到慕尼黑来。格拉斯断言，维也纳的部分警察和一些部队都会支持民族社会主义政变。哈比希特给这个密谋分子开放了绿灯。

哈比希特把格拉斯介绍给自己最亲近的心腹，他们是：邦领导机关本部负责人、前上尉鲁道夫·魏登哈默尔博士，哈比希特在奥地利的代表、维也纳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古斯塔夫·韦希特尔博士。哈比希特的伙计们对政变设想兴致很浓，他们作了分工：由韦希特尔担任政变政治工作领导，格拉斯担任军事领导，魏登哈默尔负责和外界保持接触。1934年6月25日，他们和头儿哈比希特在苏黎世会晤，初步确定了具体细节。格拉斯领到的任务是作好“万无一失”的行动准备，特别要确保维也纳警察和军方的合作。魏登哈默尔负责搞武器，并争取陶尔斐斯总理的基督教社会党对头、奥地利驻罗马公使安东·林特伦博士出任伪总理。

准备工作顺利地展开。林特伦声明同意粉墨登场，维也纳城

---

<sup>①</sup> 即上文提到的以特奥·哈比希特为首的奥地利纳粹党领导机关。——译者



防司令辛青格尔中校也同意参加，他负责给执行冲进总理府逮捕部长们的格拉斯的部下提供军服。7月16日晚，密谋分子们在慕尼黑库尼贡登街60号哈比希特寓所再次召开军事会议，这时他们也确定了政变的日期。政变分子选定7月24日下午暑假开始前联邦总理府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计划在这个时刻动手出击。

显然他们并不怎么担心，究竟德国总理希特勒对一项一旦失利必将使德国外交政策蒙受沉重打击的行动计划会有什么意见。韦希特尔后来写道，他一分钟也没有想到这不是按阿道夫·希特勒的想法行事。事实上，哈比希特已向领袖报告了计划，取得了希特勒的同意——当然方式是含糊其辞的，致使希特勒事后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可以在1938年授意别人向党的最高法庭控告政变领导人韦希特尔，说他“蓄意违反领袖声明的意愿行动”——韦希特尔就是这样在1938年5月31日成为被告的。

这个独裁者又一次玩弄两面派手法，他可以不让右手知道左手在做什么事情。因为就在纵容哈比希特阴谋反对陶尔斐斯总理的同时，他又反复叮嘱冯·牛赖特男爵的外交部提醒奥地利的党员同志，不能对陶尔斐斯政权有任何轻举妄动。密谋分子还在库尼贡登街开会时，德国驻维也纳公使里特博士就拟了一份电报，报告德国外交部长：奥地利纳粹分子计划发动一次政变，搞掉总理陶尔斐斯。

一个名叫汉斯·克勒的党员、海恩菲尔德的邮局职员，向公使馆送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转呈希特勒。备忘录的内容集中到一点，是要求逮捕奥地利所有政府领导人。这位公使发电报说：“公使馆已告知克勒先生，他的备忘录中所述的想法违背德国的政策，并请他劝说他的同事们不要支持这个计划。备忘录给存留起来了，以避免落入他人之手。由于这里无法肯定克勒先生是否继续坚持他的计划——虽已奉劝他别这样做——，因此我建议采取适当措施制

250

止此项行动。”

外交部的官员们对他们在维也纳的公使的忧虑抱有同感。外交部随即致函邦领导哈比希特，请他“制止可能仍然存在的这种计划”。特奥·哈比希特是否为了助兴把外交部的来信念给他的同谋者听，那就知道了。但是，在座的密谋分子中却有一个人，他决心要挫败反陶尔斐斯总理的政变，从而并造成政变头子韦希特尔后来所说的“我一生中最伤心的事件”。

奥地利非法的冲锋队头子、冲锋队副总指挥赫尔曼·雷施尼没有忘记，冲锋队在格拉斯和韦希特尔这两个党卫队领袖制定的颠覆计划中，只不过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而已；冲锋队只在维也纳大局已定时才出场。雷施尼看出这是存心要冲锋队坐冷板凳。他感到，党卫队员们又一次轻视冲锋队员的利益决非偶然。党卫队在德国摧毁了冲锋队的垄断地位，党卫队杀害了德国冲锋队的领袖骨干。党卫队现在又要求在奥地利取得领导地位，党卫队还拉走了奥地利冲锋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格拉斯旗队。

此外，赫尔曼·雷施尼也永远忘不了1934年6月30日流血的周末那一天乘车去特格恩西湖之行，就在那时，罗姆一帮人被消灭了，而这位奥地利冲锋队头子只是偶然侥幸，逃脱了党卫队刽子手的魔掌。现在党卫队又在准备扩大势力，难道他能放弃机会、不替被害的冲锋队同志们报仇么？

哈比希特的战术无意中帮了这位冲锋队副总指挥的忙。哈比希特命令，在暴动这一天，冲锋队和党卫队虽然联合作战，但是分头出击。“哈比希特同志向我宣布，”韦希特尔说，“我在执行自己的任务中不同冲锋队联系。冲锋队由其自行领导，并按发布的暗号统一由副总指挥雷施尼调动。”

冲锋队头子由此得出结论，一旦党卫队在维也纳政变中失败，决不能归咎于冲锋队，因为规定两支人马完全分开行动。他谨慎

地将有关政变计划的情报透露给奥地利保安机关，自己没有抛头露面。

雷施尼利用两个曾经多次代表他同陶尔斐斯政府进行过接触的亲信。韦希特尔后来根据1935年对哈姆布格勒的起诉书断言：维也纳冲锋队大区联络员、冲锋队突击队大队长弗里德里希·哈姆布格勒及其朋友骑兵上尉沙勒，已经“在1933年和1934年把党对奥地利政府各部门的私下看法，一古脑儿告诉了这些部门”。密谋分子们在哈比希特处集会之后，雷施尼将两名亲信召到慕尼黑，开了一个冲锋队大区领袖会议，再次就政变充分进行了讨论。 251

密探沙勒已经领悟：他作了详细记录，以便把情况通过维也纳保安官员齐拉尔告知联邦总理府。但雷施尼显然还担心沙勒没有完全明白。这个骑兵上尉后来在一次代宣誓性质的声明中说，哈姆布格勒再次郑重指示沙勒，把政变头目格拉斯、韦希特尔、魏登哈默尔等人的姓名和履历告知奥地利警方。奥地利秘密警察掌握了政变计划的基本细节。“鉴于韦希特尔，”齐拉尔在1935年声称，“沙勒近几个月来一直把七月政变的情况告诉了我。”

（尽管如此，政府还是被政变分子弄了个猝不及防。对此，历史学家赫尔穆特·奥尔巴赫现在把原因归于维也纳情报界的奇妙莫测的活动。他写道，在奥地利，“当时的谍报工作已发展〔到了〕如此高明的程度，以致相互起着抵消作用，分不出高低”）韦希特尔处在奥地利国家警察严密监视之下。不论这个党卫队领袖在何处露面，都有两名秘密警察盯着他。可是维也纳警察头子魏泽尔却不知道一个事实：盯住韦希特尔的尾巴本身就是纳粹分子，是他们每天晚上跟这个党卫队队员一起给魏泽尔写监视报告的。

因此，韦希特尔和格拉斯显然还有可能使政变获得成功。7月24日，巴尔豪斯广场召开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日子渐渐临近了。林特伦已经准备就绪待在维也纳“帝国”饭店里，第八十九旗

队的一百五十名党卫队队员已经武装起来待命出发，第一批密谋分子已奔赴约定的集合地点。突然魏登哈默尔在7月24日下午听林特伦说，内阁会议已暂停召开，改在翌日11点举行。林特伦想不干了，但纳粹领袖坚持非杀出去不可。分配担任攻打总理府的党卫队员接到新的命令：“八十九——12点1刻，七星胡同11号，联邦体育馆——不要由大胡同进入七星胡同。”

第二天，1934年7月25日，三十名党卫队员准时到达，准备在德意志体操运动员联合会的这个大型体育馆里，乔装打扮成军事部队。一辆卡车匆匆开来，送来了维也纳步兵团的军服，这是密谋分子从陆军军需品中搞来的。格拉斯催促大家行动快些，因为252 为队员们换衣服的时间太长了。12点30分卡车就要载上伪装的士兵向联邦总理府进发。可是等卡车开动时，已经12点45分了。每个人都熟悉了进入陶尔斐斯官邸大门的暗号：奉联邦总统米克拉斯的命令来联邦总理府执行一项特别任务。

当格拉斯率领所部乘车直驶巴尔豪斯广场时，担任政治领导的韦希特尔待在离联邦总理府不远的绍夫勒胡同蒂施勒饭店守望，准备必要时赶去支援。他要稍后些出场，他的任务是同被捕的部长们进行谈判和任命新政府。格拉斯和韦希特尔哪里知道，政变在没有开始以前就已经失败了。这次政变由于有人出卖而告失败，不过不是冲锋队的人。韦希特尔—格拉斯集团密谋者之一、前褐色大厦的经济主任、警察分局巡官约翰·多布勒由于神志失常，已把所有情况统统讲出去了。

内阁会议尚未正式开始，民防部长埃米尔·法伊就接到了报告，说一批激进派纳粹分子计划攻打联邦总理府。可是这位部长个人功名心切，他没有立即向陶尔斐斯和军方报警，而是派出自己的部队民防团上街，企图运用侦探具有的敏锐嗅觉查明阴谋活动线索。等到他终于想起自己的职责时，珍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好

几分钟。直到快12点，他才匆匆赶到内阁会议上，把联邦总理请到一个角落里，对着总理的耳朵悄悄地告诉了这个消息。这位文质彬彬的总理站立起来，并不相信，但还是拿定了主意。

陶尔斐斯对部长们说：“法伊刚刚告诉我有点情况，我不知道是否有什么背景。不过，我们还是中止会议，各位部长回到自己单位去为好。等到我们可以继续开会时，我再通知大家。”部长们摇晃着脑袋，纷纷退席，心中狐疑，吃不准要遇到什么事情。只有总理、法伊和保安国务秘书卡温斯基留在总理府。

卡温斯基命令调警察到巴尔豪斯广场来加强保卫。他满有把握地注视着院子里，只见有辆卡车，车头一转开进总理府大门。国务秘书想：警察来了。来的是密谋分子们！几分钟后，一个上尉跑进来报告陶尔斐斯说，武装人员冲进了联邦总理府。总理急忙走出办公室，到隔壁圆柱会议厅的窗口旁，想看看院子里的情况。一名刑事官员报告说，冲进来的都是军人。陶尔斐斯说：“怎么，是军人？”这时，看门人黑德维策克咚咚跑进房间，一把抓住总理的右手。黑德维策克催促说：“联邦总理先生，快！”看门人知道有一条通到外面去的旋转式暗梯；地点就在总理办公室旁边墙角处的一间房子里。

但是，黑德维策克拉着他所保护的對象刚刚走到墙角处那间房门口时，党卫队员奥托·普拉内塔就带领十名同伙从楼梯间冲了上来，正好碰上总理。闯进来的家伙顿时怔了一会，接着不约而同地歇斯底里叫道：“举起手来！”总理瞪着眼睛看着这伙人说：“你们找我有何事？”他的手猛地动了一下。普拉内塔朝后一退，一搂手中自动实弹手枪的扳机。砰的一枪，陶尔斐斯身子一缩，仰面倒在地板上，上身渗透了血。 253

密谋分子将身负重伤的总理抬到沙发上。过了一会儿陶尔斐斯张开眼睛。他目无定睛地喃喃说道：“孩子们，这是为什么，突然

闯进来一个少校、一个上尉和几个士兵，冲着我开枪。”渐渐地他才意识到自己不行了。陶尔斐斯仔细看了看站在他身边的人，然后，开始了他的传记作者、英国人戈登·谢泼德所说的陶尔斐斯同叛乱分子之间进行的“一次异常温和的政治辩论”。

陶尔斐斯说：“我一直竭尽全力，做出最大成绩，我也一直要求和平。”一个党卫队员反驳道，可是总理却把同德国实现和平的愿望捏在手里。垂死者回答：“孩子们，你们根本不懂得这个。”党卫队员哑口无言地看着他们的受害者，谁也不吭一声。下午3时45分，奥地利总理死了。他临终前的几句话是：“孩子们，你们对我这样好。为什么其他人不也象你们这样呢？我始终希望和平。我们从不发动侵略。我们始终只是自卫。愿上帝赦免他们的罪吧。”

政变分子们并不罢休。袭击内阁会议已经落空，逮捕所有部长这一主要行动未能得手，只占领了广播电台。奥托·古斯塔夫·韦希特尔匆匆走在维也纳街头去讨救兵。他一心想到的是，现在应该是冲锋队出动的时候了，副总指挥雷施尼现在必须把他的步兵队拉上街向政府进攻了。韦希特尔终于找到了集中在“圣詹姆斯”饭店里的奥地利冲锋队领袖们。几秒钟后，他站在冲锋队旅队长蒂尔克面前。“我简单介绍了情况，”韦希特尔记述说，“并要求冲锋队出动，这时蒂尔克当着我的面向维也纳和下奥地利地区总队发了紧急集合令。他还回答我说，一小时后冲锋队就开进市中心。”

但是旅队长蒂尔克和自己的头儿雷施尼是一条心。等韦希特尔匆匆忙忙去找下一个接头地点时，蒂尔克就收回成命，命令紧急集合的维也纳冲锋队返回驻地。没有一个冲锋队出动去支援情况紧急的党卫队政变分子。过了不久，蒂尔克派人传达指示：“7月25日政变是党卫队第八十九旗队的擅自行动，对此冲锋队不承担

任何责任。”当奥地利警察和军队收拾政变分子在维也纳演出的这场闹剧时，冲锋队同志们心安理得地作壁上观。谋杀总理的凶手普拉内塔及其六名同谋犯被处决，其他政变分子被从严判处监禁。

德国的独裁者却没想到，一夜间自己已处在举世抗议浪潮之中。第三帝国有史以来，阿道夫·希特勒第一次成了公众眼中的万恶杀人犯；动员文明世界的一切力量起来反对这个杀人犯，乃是富有责任感的政治家理所当然的职责。“我们面临着新的萨拉热窝<sup>①</sup>，”希特勒对他的前副总理弗朗兹·冯·巴本叫喊道，当时他正打发这个政权遐尔闻名的天主教徒火速去维也纳充当和解大使。希特勒采取了严厉措施：撤除特奥·哈比希特的职务，“奥地利军团”被解除武装，并由党的机关对密谋分子着手查办处理。但是这次失败打击最沉重的是党卫队全国领袖，因为他的声誉不能不遭受重大损失。

受骗上当的政变头子韦希特尔气急败坏地抱怨冲锋队“采用卖国的伎俩推行它旨在在奥地利建立冲锋队发号施令的政策”，和对“一个出于利己的动机将自己的同志……出卖给敌人的领导来说，是什么事情也干得出来的”，可这些抱怨又有什么用呢。党卫队的名誉受到的损失再也无法弥补，它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挽回已经被破坏的希特勒的信任。

党卫队取得了经验：在民族社会主义特权阶级体制的角逐中，参加逐鹿的是这样一些利益集团，它们只知道以轻率的残忍手段突出自己，根本不考虑大家都应遵守的纳粹信条。党内以及从1933年起国家—党的机器内集团和派别的战争，已经变成了褐色统治者们的生存法则，即使呼吁注意共同的意识形态，也无法制止来自政权内部本身的阻力。人们宁愿被政敌牵着鼻子走，也不肯在党

---

<sup>①</sup> 塞尔维亚城市，1914年6月奥国皇太子在此遇刺，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所在地。——译者

内竞争者面前放弃一点职权和一分势力。

冲锋队头子罗姆在 1932 年宁肯投靠社会民主党国旗队领导，也不愿同党内的对手们取得谅解。冲锋队雷施尼宁可让一次民族社会主义政变失败，也不容许党卫队在奥地利获胜。德国冲锋队参谋长维克多·卢策在罗姆丑闻后不肯同党卫队和解，而是梦想冲锋队和国防军联合起来反对可恨的党卫队。

在这种利害攸关、寸步不让的阵地战中，作为许多种势力之一的党卫队，是得不到任何重大突破的。在德国强权政治和外交政策战场上，它只有待在唯一受到人人承认的权力中心这个不挡风的地方，才能吃力地步步前进。这个权力中心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由他任命的党的全国指导处——当时体现为“领袖代表”鲁道夫·赫斯——的权威。党的总管赫斯也是终于给党卫队在德国外交方面另辟一个舞台的人，在这里，海因里希·希姆莱可以大肆施展他那种族主义—民族生物学的狂妄思想：推行德意志民族政策。

党的领袖们很早即已意识到，由于凡尔赛和约仲裁者们划定疆界而使在边境地区和国外的德意志人密集地区愈益增多，是未来德意志大国政策的根据地。明显的和隐蔽的形形色色的线，将纳粹党和德意志族人连接在一起，特别是在东欧和东南欧。

1931 年，纳粹党全国指导处建立了一个旨在团结所有居住在国外的德意志人的国外部。后来这个部取名“国外组织”(AO)，由纳粹党区领袖威廉·博勒领导，1937 年拥有五万一千名成员，并很快就发展成外交方面的一派强大势力，致使外交部长冯·牛赖特为谨慎起见，任命这位区领袖为外交部国务秘书，以便能对他更好地进行控制。博勒的国外组织仅仅是许多参与插手德国传统外交活动的利益集团中的一个。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外交事务部”专门培养全国的外国籍德裔大学生；形式上为民间团体、政治上早已从属纳粹方针的“国外德意志民族协会”(VDA)，则和世界各地



所有德意志族人保持着接触。

这些组织之间的勾心斗角愈演愈烈，希特勒乃于1936年责成副手赫斯领导所有国外德意志人的事务。赫斯又任命一名老战士，即部务参议奥托·冯·库尔泽尔主管一个“德意志族人中心”（Vomi），作为党的指导处领导下协调所有涉及国外德意志人问题的党政机关工作的秘密超级机构。但库尔泽尔缺少促使这些争权夺利的组织走向同舟共济的权威。于是赫斯想出了一个补救办法。在这一点上，只有传说其领袖们具有组织才能和纪律性良好的党的组织即党卫队还能解决问题。

赫斯请党卫队全国领袖选派一个能够消除混乱建立秩序的人。希姆莱抓住了这个终于能把德国外交牢牢掌握在手的机会。他任命一个最文雅也最狡猾的党卫队领袖来领导国外的德意志人，这个人就是党卫队副总指挥维尔纳·洛伦茨。

这个1891年出生的皇家士官生军训团学员，先前系军官和飞行员，后为但泽地主，最后任党卫队“西北”大区（汉堡）领袖，是公认的党卫队中的养尊处优者，又是旧普鲁士军官食堂习俗的保持者，这种习俗使人看不出这位日后汉堡报刊发行人阿列克赛·施普林格的岳父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善于阴谋策划于密室的大师。希姆莱可能后来对自己偏偏挑选洛伦茨而懊悔，因为这个乐于抓权的副总指挥很快就经不起诱惑，在党、外交部和党卫队三者之间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个王国并非时刻有利于党卫队全国领袖的野心。此外，两人之间还存在一个就党卫队队员说来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即洛伦茨是传统的民族主义者，经常抱着几分惋惜的心情瞧不起自己头儿的种族主义狂热幻想。希姆莱知道这一点，但直到战争期间通过一次动用武力，才把洛伦茨从民族政策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撵走，并将过分独立的德意志族人中心改组为党卫队的一个新的中央主管处，从而并入自己的王国。

尽管如此，党卫队还是通过德意志族人中心，有力地楔入德国民族政策亦即德国外交政策领域。原来考虑的作为党的协调机关，发展成为党卫队自己的一块磁铁，把越来越多的民族政策事务和组织工作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1937年1月，德意志族人中心头目洛伦茨以三十个人和有限的经费起家。在短短的时间内，接二连三的组织落入了他的控制范围；1938年7月，国外德意志民族协会全国领导人、过分温和的民族政策奉行者施泰纳赫博士归附进来，随之国外德意志民族协会会务指导处被洛伦茨的一名亲信所掌握。此后不久，德意志族人中心将主管边界地区工作的“德国东部地区联盟”抓在自己手里，并牢牢掌握了决定东欧德意志少数民族党派领导和经费的权力。保安处也利用德意志族人中心同德国国界以外各地区德意志族各组织的多方面联系，以其代表的身分作掩护，建立一个窃听和监视网。德意志族人中心和保安处密切合作——无怪保安处一位高级头目、海德里希的心腹赫尔曼·贝伦茨博士，会当上德意志族人中心头目洛伦茨的副手。

党卫队和保安处的联络网越来越明显地同外交部的官方工作交叉重叠。在许多旨在培植同东南欧各国交往的文化团体和协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也公然出现了身穿佩戴骷髅标志制服的人。例如党卫队队员埃瓦尔德·冯·马索当上了“德国—保加利亚协会”主席，洛伦茨出任“国际联合会”主席。

希姆莱和洛伦茨跟正式主管德意志族人中心的同志来往特别密切。这个人就是驻“领袖代表本部外事问题委员”——这是他自己用的正式头衔——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党卫队希望，依靠这个人能使自己在外交方面有一个强制性的突破。里宾特洛甫同党卫队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以致有些人猜测这位未来的德国外交部长是外交政策上的“党卫队高级代理人”。几

乎没有再比海因里希·希姆莱同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更亲<sup>257</sup>热交往的了。“你知道，我是多么支持你的党卫队和赞赏它的建设、即你最独特的事业的了，”里宾特洛甫在1940年7月写信给全国领袖说。“我将把参加这个对我们大德意志国家未来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骄傲的领袖团，永远视为一种特别的荣誉。”

这两个人初识于1932年底，当时卸掉戎装的陆军中尉、前香槟酒代理商冯·里宾特洛甫是亨克尔香槟酒厂女继承人的丈夫，曾将自己在柏林-达莱姆区伦策大街9号的别墅，提供给希特勒和弗朗兹·冯·巴本用来举行双方秘密会谈。希姆莱当时担负的任务是，帮助害怕和记者打照面的希特勒在翻越后花园的围墙、进出里宾特洛甫这所别墅，以及在席间通过温文尔雅的习俗举止以表明纳粹分子也有能力执政。

这些姿态至少使主人冯·里宾特洛甫心悦诚服，因为此后不久他就加入了纳粹党，并请求希姆莱惠允他参加党卫队。1933年5月30日，党卫队头子授予他旗队长头衔，而希姆莱则成了里宾特洛甫别墅里受欢迎的客人。里宾特洛甫对希特勒唯命是从，他越是受到领袖的宠爱和晋升为独裁者的外交特别顾问，希姆莱就越是紧紧地钉住这个显然时运亨通的半吊子外交家。当里宾特洛甫奉希特勒之命在威廉街外交部对面设立一个办事处，旨在通过自己的通讯网以监视希特勒不放心的外交部的对外活动时，希姆莱在出钱出人方面给予支援。

1937年，党卫队区队长罗尔夫·冯·胡曼-海恩霍芬进入“里宾特洛甫办事处”，任处本部领导（相当于业务领导人），他是党卫队外交家的先驱者，这种外交家随着里宾特洛甫上台而越来越多。党卫队领袖们是纳粹特别外交家最信得过的人，例如里宾特洛甫旧时的学友、党卫队区队长鲁道夫·利库斯，以及情报工作门外汉的党卫队旗队长维尔纳·皮科特。里宾特洛甫和党卫队合作得

十分密切，以致希姆莱把跟自己称兄道弟的朋友在1938年2月被任命为德国外交部长视为党卫队的莫大光荣。

新任外交部长在上台后也继续支持党卫队：他只挑选党卫队领袖当他的副官，他送儿子鲁道夫到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服役，并想出了一个叫外交部的官员们为之吃惊的主意。有一天，冯·里宾特洛甫向外交部高级官员宣布，他和全国领袖希姆莱商定接受他们集体加入党卫队；从现在起每个人都穿党卫队制服；国务秘书冯·威兹萨克男爵穿党卫队区队长制服，副国务秘书258 恩斯特·瓦尔曼穿党卫队旗队长制服，礼宾司长冯·德恩贝格穿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制服。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心中最大的快事，莫过于——据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希特勒反对者埃里希·科尔特所述——“穿着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制服、长统皮靴〔出现〕在外交部里，大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学习先辈俾斯麦学到家了，在他的想象中……俾斯麦经常是穿着不舒服的长统皮靴摇摇摆摆走路的”。

这位模仿俾斯麦的领袖对穿上党卫队制服的同僚简直百看不厌；有时他甚至责怪他的“最亲爱的希姆莱”没有派给外交部足够数量的党卫队员。“自从接任外交部长以来，我没有从党卫队得到任何一个标准的工作人员，”一次他写信给希姆莱诉苦说，并表示“考虑到我的单位和党卫队的良好合作以及我们私人的亲密关系”实属“不胜遗憾，如果党卫队因不肯派人而使人们感到奇怪的话”。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么两个搭档，恰恰在官僚政治权力争斗中相互摩擦得遍体鳞伤，终成仇敌。曾经将党卫队制服引进外交部的这个人，后来只要看到自己的外交人员中有谁身穿党卫队制服，就会气得暴跳如雷。连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的制服也无法使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不卷入那些并非罕见的、纳粹

当权者们习以为常的明争暗斗。这是因为：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已是一个行政部门的头子了，这个部门必须防止党卫队侵犯它的特权，如果它不愿德国外交政策被党卫队在业务上操纵控制的话。

争吵的原因是，阿道夫·希特勒作出的一个影响世界历史的灾难性决定。继占领奥地利之后，独裁者决心扩大德国权力空间，不顾战争风险挑起了危机四伏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境内的德意志族人问题。而这样一来，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正好转到了党卫队通过德意志族人中心已经一手控制的民族工作活动领域。外交部的外交官员们，眼见自己被党卫队的民族事务委员们逼得靠边站了。

的确，外交部在希特勒1938年盛夏挑起的苏台德危机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当德意志族人中心头子洛伦茨奉希特勒之命，同苏台德德意志人的领袖康拉德·汉莱因讨论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这盘棋如何具体下法时，他们故意没有让德国驻布拉格公使恩斯特·埃森洛尔知道，他是希特勒吞并政策的反对者。同时，另一个党卫队权力支柱，即将要成为外交部的梦魇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对外保安处，也首次插手进来，它不依靠、有时甚至反对洛伦茨的德意志族人中心，另有其分裂的目的：推翻汉莱因。

在保安处头头们的心目中有一种固定的想法，认为苏台德区 259  
领袖汉莱因既是妥协派，又是软弱派，他代表领袖的利益是不够坚决的。保安处用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一些领袖，如瓦尔特·勃兰德、威廉·西伯科夫斯基和海因里希·鲁塔，他们都是天主教等级国家理论的信徒；他们并不寄希望于希特勒德国，而是希望依靠各大国的支持，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部争取到一个较好的少数民族地位。汉莱因本人在1934年还说过：“我们毫不迟疑地声明，我们同民族社会主义有着原则性的区别。”

我们决不放弃个人的自由。”只有一小批极端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主张苏台德并入德国。海德里希就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1937年底，保安处处长决定在党内发动一次叛乱，推翻汉莱因。但汉莱因抢先行动，将保安处的盟友、即团结在《出发》杂志周围的一批政客驱逐出党。1938年初夏，海德里希看到有一个新机会能实现他的目的。这时候，他已同遭到取缔并和汉莱因的组织合并的苏台德纳粹党领袖、汉莱因在党内的对头卡尔·赫尔曼·弗朗克挂上了钩。弗朗克这个人，即使靠保安处的支持，也并非不想当党的第一把手。

汉莱因必定是看出了危险处境；他转守为攻，摆脱保安处的魔影。由于他还相信，布拉格政府的不妥协政策和奥地利的下场，使他除了同德国合作外别无其他选择，于是他在1938年7月底去布雷斯劳参加德国运动会，和同时出席运动会在该地逗留的希特勒取得了谅解。这位独裁者禁止保安处继续阴谋反对汉莱因。汉莱因得救了，当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可是党卫队除了逆来顺受适应形势外，别无他法：原来抨击纳粹党的汉莱因，被任命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

可是，外交部的官员们清楚地看到，党卫队已深深侵入外交特权范围。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虽说还能阻挠德意志族人中心的洛伦茨，使他争取被任命为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国务秘书的企图落空，但保安处已更加专横地掌握了外交特权。在随后发生的一次外交危机中，外交部就看到保安处连连得分，自己被击得招架不住了。这位独裁者纵容忠于他的情报人员上演一出新的拙劣把戏：在1939年3月摧毁余下的①捷克斯洛伐克。

希特勒想出了一条诡计：煽动极端保守的教权主义斯洛伐克

---

① 指除苏台德地区(根据1938年9月底慕尼黑协定已为德国所吞并)以外的捷克斯洛伐克。——译者

人民党的领袖们叛国，脱离布拉格的中央政府，同时又鼓励捷克人镇压斯洛伐克叛乱——在随后发生的闹剧中，希特勒以仲裁者的面貌出场，将双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余下的捷克划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个德国保护领，斯洛伐克则作为大德意志国家“保护”下的形式上独立的国家。 260

这年年初，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威廉·凯普勒及其助手党卫队旗队长埃德蒙德·费森迈尔，率领一个保安处谍报队启程去普赖斯堡<sup>①</sup>，同斯洛伐克政治家们接触。这些秘密使者们行前由希特勒作了严格指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将此行的目的告知外交部。凯普勒一行来得正是时候，为了半自治的斯洛伐克地方政府的经常摩擦而搞得厌倦不堪的布拉格政府，刚好邀请斯洛伐克人来共和国首都举行一次会议，实现和解。但柏林来的先生们懂得劝说斯洛伐克地方政府总理约瑟夫·提索拒绝布拉格的邀请，并立即准备斯洛伐克独立。

这时，斯洛伐克一个最杰出的政治家打乱了德国的方案：布拉格中央政府中的斯洛伐克国务部长、斯洛伐克的类似冲锋队组织的赫林卡<sup>②</sup>卫队司令卡洛尔·西多尔博士，反对接受由德国人授意拟定的分裂计划。西多尔的否定也使其他斯洛伐克政治家变得摇摆不定了。随后德国人找西多尔谈判，但这个斯洛伐克人坚持不同意。在这种形势下，保安处突然想到了它遇到这种情况时一贯采用的办法：杀人放火。

保安处的排除故障能手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奉命带领一个爆破组来到斯洛伐克。他的任务是策划使人相信由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分子进行的行刺案。第一批炸弹已经在普赖斯堡的一家巧

① 斯洛伐克首府，现名布拉迪斯拉发。——译者

② 赫林卡(Hlinka, Andrej, 1864—1938)，斯洛伐克天主教士和政治家，1905年建立斯洛伐克人民党，主张斯洛伐克独立。——译者

克力糖厂里爆炸了，布拉格听信了德国人用甜言蜜语许下的诺言，解散提索政府并宣布斯洛伐克处于紧急状态，就在这时候，冒出来一个原来的节目单上没有大名而自命不凡的外交家。

纳粹党维也纳区领袖约瑟夫·贝克尔——他也是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专程赶来，会见这时已由布拉格任命为斯洛伐克总理以取代分离主义分子提索的西多尔，试图劝说他改变主张。但是正如凯普勒尖酸刻薄的评述：“纳粹党区领袖独出心裁的努力”失败了。

希特勒在柏林感到神经紧张，因为现在一颗定时炸弹开始发出了啾啾啾的响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已预感到德国这出双簧戏的用心险恶，提出定于3月14日访问希特勒，从而出于无奈地迫使这位独裁者在3月13日晚上以前发表斯洛伐克独立宣言——希特勒要求捷克人投降的条件。3月11日，凯普勒再次去找  
261 提索，迫使他赞成跟布拉格一刀两断。在3月12日深夜至13日拂晓前，提索作了让步。他刚表示同意，就接到希特勒邀请他去柏林的通知。几个钟头以后，他站在希特勒跟前，来得正是时候，好赶在哈查到达之前把斯洛伐克拱手奉献给这位中欧统治者作垫脚石。

保安处第一次表明它是希特勒外交政策意志的全权执行者。领袖对区领袖贝克尔的诽谤信件也不屑一顾，贝克尔从维也纳大骂保安处在斯洛伐克的行动败事有余；如果让他贝克尔能多一点时间同西多尔会谈，那么一切本来是可以进行得更稳当一些的。党卫队在有一点上也是死心眼：继取得斯洛伐克的胜利之后，党卫队领袖们相互辱骂攻讦，这是由于他们对到底谁是胜利者的看法并不一致。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贝克尔给希特勒、戈林和冯·里宾特洛甫写了大批报告，说明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凯普勒庸碌无能。而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凯普勒则指责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贝克尔，说他几乎使德国蒙受无法估量的损失。“我想有一点谅能得到你的同



意，”凯普勒在写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激动地说，“即我在进一步追究上述事实时，也无需顾及贝克尔的党卫队成员身分，正如他对我的做法一样，因为看来我也许不能不提防……遭到重大嫌疑。”

这位独裁者对他的保安处寄予无限信任。这就无怪乎他也要把点燃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荣誉”同样授给情报机关了。德波边境的行动计划，只是保安处大肆进行战争挑衅活动中的一部分而已；于此同时，有十二个保安分队进入波兰，它们的任务是在8月底策划两百项嫁祸于波兰过激分子的行动。

保安处在外交方面得寸进尺。在希特勒的领袖大本营里，保安处的报告取代了外交部的外事条陈；冯·里宾特洛甫后来埋怨说，希特勒经常“根据〔保安处的〕错误情报自己作决定，而不让我知道”。在外交政策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方面可以由里宾特洛甫单独作主的了。1939年1月，希姆莱根本不征求外交部的意见，就支持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将军派十名俄国流亡者去苏联，用炸药谋刺斯大林；同样，保安处在战争中也推行自行其事的政策。保安处代表们企图自搞一套，不顾外交部的反对，讨好阿根廷总统卡斯蒂洛，叫他同第三帝国缔结反美联盟；在西班牙，煽动一名亲纳粹的长枪党领袖推翻无意参战的独裁者弗朗哥；在罗马尼亚扶植法西斯铁卫队上台。

对德国外交本身的存在尤其成为问题的是，在战争爆发最初的狂热日子里，里宾特洛甫同意了德国中央保安局（RSHA）搞的一个新的创造，但它使外交部再也不感兴趣，即在驻外外交机构中 262 设立所谓的警务随员。

里宾特洛甫在1939年10月26日宣布，同意保安处可以利用德国驻外大使馆和公使馆以掩护它在国外的工作，给保安处派在各个国家的情报网头子以外交人员地位，名义为警务随员。反之，保安处保证不干预外交政策问题。但警务随员们却开始对自己的

使团团长的方针进行非难挑剔，收集外交人员的材料。对此外交部无法制止，因为当时里宾特洛甫还指望同党卫队紧密合作，答应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直接”——即无需事先征询外交部的意见——派出保安处谍报人员，并向德国中央保安局汇报。这些汇报也常常包括对德国外交人员的严厉控告。“仅举一例即可说明，”里宾特洛甫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保安处直接送呈领袖的密报，我突然接到命令，叫我立即召回驻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典三国的使团团长。”

不过，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决不是容忍自己的特权这样横遭侵犯的人。他凭借手中的权力给自己构筑起防御工事，向过去的同志希姆莱展开一场不屈不挠的伏击战。为时不久，这位外交部长变成了民族社会主义权力之争的令人生畏的战略专家。

里宾特洛甫狡猾地利用一项领袖命令展开反攻。希特勒在1939年命令，“为了长期进行战争”，必须“将驻在国外的所有民政机构或党的机关……置于德国派驻有关国家的使团团领导之下”。希特勒说：“所述代表或使节的报告一律通过使团团领导寄外交部。”外交部长准备利用希特勒这项指示，将国外保安处的谍报人员抓在外交部手里。可是冯·里宾特洛甫必须小心行事；只要保安处奉希特勒之命进行活动和严格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外交部就没有机会最起码地夺回监视国外保安处工作的权力。里宾特洛甫必须等待到保安处犯上一次错误，使保安处的声誉在领袖大本营里也发生动摇。里宾特洛甫等待着时机。

1939年10月25日的警务随员协议签订后不久，就有一次事件生动地说明，在希特勒面前抨击保安处的实干家们的适当时刻还未到来。里宾特洛甫听说保安处计划在德荷边境进行一场谍报工作史上最大的绑架活动，使他顿时产生了疑虑。

之命，在当时尚属中立国的荷兰，同非常令人称羡的对手英国谍报局开始玩一场谍报游戏，对此这位保安处处长抱有种种希望，这样可以摸清英国情报机关的工作方法，摸清荷英两国情报机关如何合作，以及外国同德国国内反对派的联系。在荷兰的德国流亡者弗兰茨博士充当了保安处间谍，代号为 F479，他同英国情报机关关系很好，跟英国谍报局驻荷兰代表潘恩·贝斯特上尉有来往。上尉对德国将领中间的反希特勒派特别感兴趣。F479答应给英国人提供材料。

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国外保安）通过弗兰茨，将经过仔细准备的假材料送给英国人。德国中央保安局里的人估计，进一步摸清这个谍报上尉的底细也许是值得的。海德里希认为，对于这项使命最恰当的人选莫过于他的亲信施伦堡了。施伦堡摇身一变，成了最高统帅部运输部门的夏梅尔上尉，夹着单片眼镜，熟知德国国内反对派的重要机密。F479 介绍两人挂上了钩，10月21日，这位夹单片眼镜的夏梅尔，就在荷兰境内同夹单片眼镜的贝斯特面对面坐下了。

英国人用自己的别克牌轿车，把施伦堡—夏梅尔送到荷兰城市阿纳姆，那里等候着另外两位谍报机关的先生：英国谍报官斯蒂芬斯少校，和一个自称科佩尔实际上叫克洛普的荷兰参谋本部军官。三个外国人对新结识的德国朋友的倾吐特别感兴趣。这个德国人自我介绍是一位将军的亲信，这位将军正在计划和其他军人发动一场政变，搞掉希特勒。

双方约定在10月30日再次商谈，于是施伦堡再次进入荷兰。虽然科佩尔即克洛普做了一次手脚，以误会作幌子将施伦堡稍事扣留，以便乘机仔细看了看德国人的护照，但英国人却对这个党卫队员深信不疑。他们甚至交给他一部收发报机，用来进行紧急联系，呼号是 ON4。

在此期间，这两个英国人暴露出确系重要情报的掌握者，海德里希决定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从荷兰境内绑架到德国来。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正是在此时向领袖提出对保安处的做法持有疑虑的。但时间没选好，因为阿道夫·希特勒听不进别人批评他的保安处的话。他气势汹汹地庇护海德里希的人，以致里宾特洛甫赶紧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是他臭名远扬的大转弯之一。外交部长结结巴巴地说：“是啊，我的领袖，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只怪外交部这些官僚和法学家脑筋太不开窍了。”

里宾特洛甫还能赶在施伦堡的情报游戏玩到离奇古怪的地步之前，及时从判断错误的抨击中缩了回来。因为一个单枪匹马进行行刺的木匠，使两名情报军官斯蒂芬斯和贝斯特变成了叫希特勒感到巨大创痛而终生难忘的人物。

1939年11月8日晚，纽伦堡警察局局长马丁截住了刚从慕尼黑开来的希特勒和希姆莱乘坐的领袖专列。马丁爬进车厢报告：领袖在慕尼黑发表一年一度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演说之后几分钟，老战士集会的会场里发生了一起行刺案件，大厅的天花板被炸塌，估计炸死了十至十二名党员，凶手尚未查获。希特勒当即灵机一动：这是英国情报机关干的，指使人就是斯蒂芬斯和贝斯特！希姆莱心领神会，他赶到电话机旁向德国中央保安局报警，接着又说了一个电话号码，叫接杜塞尔多夫。

一会儿，施伦堡宿舍里的电话铃响了。这个保安处分子听到了希姆莱激动的嗓音：“今天晚上，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演说结束后，发生了一起谋刺领袖事件。不过领袖在几分钟前已经离开了大厅。这肯定是英国特工部门的阴谋。”随后，希姆莱下达领袖指示：立即把斯蒂芬斯和贝斯特抓到德国来。施伦堡完全听清楚了。对于这个行动他已准备了好几天：保安处的瑙约克斯率领一个突击队正在待命行动，施伦堡已同两个英国人约定，明天下

午在荷兰边境上的文洛镇会晤。

11月9日下午3时，保安处分子来到文洛镇一家紧挨边境的咖啡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悄悄过去，令人焦急，神经紧张。施伦堡向窗外张望，监视着马路上——不等英国人踏进咖啡馆就得动手。突然，施伦堡看见贝斯特的别克牌轿车驶了过来。这个党卫队员装成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走到大街迎接客人。贝斯特和斯蒂芬斯正朝他走了过来。

就在这当儿，开来一辆党卫队的敞篷汽车，冲过国境上的栅栏，停在两个英国人面前嘎然刹车。几支冲锋枪一齐开火，英国人连忙摸出手枪。瑞约克斯及其手下的人跳下汽车，扑向英国人；陪同英国人前来的荷兰人克洛普身负重伤，也被绑架了。这时，施伦堡跳上停在咖啡馆后面自己那辆已经发动的汽车——几分钟后演出全部结束：行动成功。

第二天，德国宣传机器一齐开动。德国人听说，德国保安机关已抓到了可憎的谋刺领袖的幕后策划人。党卫队区队长瓦尔特·<sup>265</sup>施伦堡由领袖亲自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以表彰他敢于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壮举；独裁者甚至邀请他和党卫队要员们一起，参加总理府的晚宴。不过在晚宴席上，这个党卫队领导机关的冒失的本杰明<sup>①</sup>，却使总理府主人大失所望。他说，谋刺领袖压根儿就不是英国谍报机关干的，可以肯定说不是斯蒂芬斯和贝斯特这两名俘虏干的；他认为整个行刺作案只有一个人，即凶手本人——格奥尔格·艾尔塞。

希姆莱赶忙出来打圆场：“我的领袖，这只不过是他的看法。”实际上这是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一致看法。施伦堡在事前仔细看过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案卷，结论只有一个：艾尔塞是唯

① 按圣经故事，本杰明(圣经作卞雅悯)为雅各的幼子，喻宠儿。——译者

一的一名刺客。刑事警察处长奈比在11月9日凌晨前的夜里，还带领一个“行刺案”特别小组（成员：海德里希、秘密警察缪勒、奈比的副手洛贝斯和爆破专家）从德贝里茨机场起飞，去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进行现场侦查。然而奈比找到的东西，并不比慕尼黑刑警局记录在案的情况多多少。

从直接和间接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行刺是经过长时间准备的。凶手使用一个定时起爆装置，其炸药不超过十公斤。炸药是装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大厅的一根镶有护壁板的钢筋水泥柱子里。这个人现在已经坐在秘密警察审讯室的强烈银光灯下了，他于11月8日将行刺准备安排就绪后，连夜潜往瑞士边境，在企图偷越国境时被捕：格奥尔格·艾尔塞，克尼希斯布龙的木工兼钟表匠，三十六岁，热情而有原则性的工人，也是属于国内对希特勒战争敢怒不敢言的人。

他书面交代了作案的经过：“我用一把雕孔锯将柱子的护壁板锯下一块，安上铰链，成为一扇小门，按原来的样子装好。后来我在小门里面嵌了一块两毫米厚的铁板。这块铁板起到好几种作用：一是防备万一有人敲柱子时发现里面掏了一个洞；二是我想人们在布置大厅时说不定偶然要钉钉子，有了铁板就不致于钉坏我安在里面的发条装置。”然后他把和闹钟联在一起的引爆装置拿来。艾尔塞接下去写道：“11月5日晚，我在9点到10点之间把发条装置包好，带到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我走进走廊……躲在一个柱子后面。我在柱子后面一直等到熄了灯和大厅关上了门。”“为了安全起见我又等了半个钟头。然后我把闹钟和发条装置拿到柱子前，打开小门，将发条装置放进炸药孔。最后我把闹钟和发条装置拨准。”

事实经过如此简单。可是大德意志国家领袖所要的不是简单的事实，他认为完全是英国谍报机关的一场大阴谋，是一个机构分

布很广的阴谋网，参与这个阴谋网的有他曾经发誓称之为势不两立的一切敌人：犹太人、英国人、共济会会员，特别是还有奥托·施特拉塞。海因里希·希姆莱急得满头大汗。到哪里去找幕后策划者呢？阿图尔·奈比没有查出幕后策划者，因而被撤职，并召回柏林。希姆莱几乎急得要哭出来地央告：“施伦堡，我们必须查出幕后策划人。希特勒就是不信艾尔塞会单独作案。”党卫队全国领袖怒气冲冲，还在得出单独作案结论的艾尔塞第一次审讯记录上批道：“是哪个白痴这样审讯的？”

希姆莱怀着那种欺下怕上的怒火，亲自去接触犯人艾尔塞，一见面就扑向这个凶手，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理智了。慕尼黑刑事警察局长、高级政务参议伯梅博士，是秘密警察局所在地维特尔斯巴赫宫里这一幕的目击者。“希姆莱一面破口大骂，一面用皮靴死劲踩戴着脚镣手铐的艾尔塞的身体，”伯梅记述道，“接着他叫一个我不认识的秘密警察官员，把艾尔塞拉进慕尼黑秘密警察局长办公室隔壁的盥洗间，给他吃了一顿鞭子这类的刑罚，致使他痛得号叫起来，然后又把他匆忙地拖到希姆莱跟前，希姆莱再次用脚踩他和骂他。”

格奥尔格·艾尔塞坚持原来的供词。希姆莱另派一名高级侦缉人员、维也纳秘密警察头子兼刑事参议弗兰茨·约瑟夫·胡贝尔来慕尼黑。他也不曾查出有幕后策划人。胡贝尔打电话给柏林的缪勒，告诉他侦查结果。可是秘密警察处长吃惊道：“天啊，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人人都已看出艾尔塞是唯一的作案者，连海德里希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信服。只有希姆莱仍然继续追查毫无踪影的幕后策划者。“光是一个人，我还交不了差啊，”希姆莱本部机关头头、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卡尔·沃尔夫在12月4日给党卫队区队长青曼写信说。但事实如此，的确只有一个凶手。

海因里希·希姆莱最后只好硬着头皮被希特勒痛骂了一顿

不中用。希特勒怎么也忘不了，希姆莱未把1939年11月8日的“真正”凶手们交给他——希姆莱有足够的理由把单枪匹马行刺的艾尔塞，作为他的警察精明干练的最好的活证据保护起来，用他来唯一证明希姆莱的下属并不是不中用的。

267 对希姆莱的竞争者冯·里宾特洛甫来说，艾尔塞事件却具有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教益：希姆莱机器的权力，只有当它绝对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和旨意时，才是无容争辩的；只要它哪怕离开这位独裁者的方针一点点，它就免不了受到各种批评。外交部长耐心地等待时机，到那时他可以向领袖证明，保安处也并非不是领袖意志的绝对可靠的工具。这个时机在谋刺希特勒案件发生一年之后终于来到了。保安处表现得那么不听话，以致希特勒气得叫嚷：他要“消灭”这种“黑色疫病”，如果它不听话的话。

促使这位独裁者怒不可遏的原因，是保安处怂恿罗马尼亚铁卫队谋叛，计划推翻希特勒的盟友、极端保守的总理伊昂·安东奈斯库将军。德国对罗政策所反映出来的外交部和保安处之间存在的矛盾特别滑稽可笑。保安处几年来一直支持铁卫队，这是一个奉行法西斯守则的民族革命党，被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使者看成是德国纳粹党的亲属。但是安东奈斯库将军于1940年9月抢在铁卫队之前上了台，他是传统的巴尔干独裁军官，象反对民主政治一样反对法西斯主义。

安东奈斯库有理由向德国人曲表谢忱；1940年7月他被卡洛尔国王逮捕过，只是由德国外交官采取步骤后才释放。此外由于铁卫队没有什么杰出的人物，柏林外交部也寄希望于安东奈斯库当罗马尼亚未来的独裁者。希特勒顺利地作出了这个决定，因为安东奈斯库起初同铁卫队结盟，和它共同统治罗马尼亚。但革命派和反对革命派之间的盟约很快就宣告破裂，几个月后，铁卫队头子霍里亚·西马拉起武装，谋叛安东奈斯库——特别是深信他的



保安处顾问们答应的德国给予援助。

1941年1月21日，铁卫队在布加勒斯特发难。首都各要地和建筑几乎全部落入它的手里，只有总理府还由安东奈斯库控制着。安东奈斯库的地位岌岌可危；现在只有向希特勒求援了。1月22日，将军通过德国公使馆问希特勒：是否还能得到他的信任。里宾特洛甫迅即回答：能，安东奈斯库尽可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领袖建议他考虑采取领袖过去处理罗姆叛乱分子的办法来处置铁卫队。

安东奈斯库进行了反击，终于平息叛乱。这位将军无情地追捕他的敌手。这时保安处突然插手干预，它把铁卫队的领导人物的头儿霍里亚·西马和十四名司令保护起来。西马被藏在德意志族人领袖安德烈亚斯·施密特家里。直到罗马尼亚警方停止搜捕在逃分子后，保安处才将这些叛乱者偷偷送出国境。他们穿上德国军服，乔装病号，被运到了德国。 268

里宾特洛甫刚一获悉保安处在罗马尼亚的特别行动，就煽风点火，激起希特勒对保安处的不满。里宾特洛甫看到了党卫队反对官方的德国对外政策的一场大阴谋：在罗马尼亚的保安处长怂恿霍里亚·西马发动叛乱，德意志族人中心头子兼党卫队副总指挥洛伦茨派安德烈亚斯·施密特当德意志族人领袖，后者又窝藏西马。因此，整个党卫队卷入了这场阴谋，施密特的线通到希姆莱的贴身周围，通到党卫队中央主管处负责人地区总队长戈特洛勃·伯格——他是德意志族人头子施密特的岳父。

里宾特洛甫新派一名公使去布加勒斯特，他拥有最高全权，把待在罗马尼亚的属于公使馆成员的保安处领袖撤了职，召回德国。这个保安处分子一回国，立即被捕，他在秘密警察那里关了好几个月。保安处的名声扫地，里宾特洛甫终于能够大胆地对吓坏了的警务随员们整顿纪律。1941年4月和6月，他给德国中央保

安局头子海德里希写了三封信，内容都是要求：由于保安处不断侵犯外交领域，两个部门之间需要确立一种新的工作关系。

外交部长声明废除 1939 年 10 月 26 日的协议。他援引希特勒关于德国驻外机构的一切行动均受驻在国使团团长的命令，并提出警务随员也只能通过使团团长的进行其职务上的交往。希姆莱作出了让步：1941 年 8 月 9 日，他和里宾特洛甫达成一项新协议，规定警务随员和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全部文件往来必须由使团团长的过目，此外保安处不得对驻在国的内政进行任何干预。

尽管保安处一直严格遵守这些协议——乐于抓权的外交部长还是突然来了劲儿，在党卫队面前更加坚决地维护他的重要性。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反复提醒党卫队全国领袖注意尊重冯·里宾特洛甫部长的外交特权。

有一次，希姆莱应意大利外长邀请出国旅行，这时外交部部长提醒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旅行必须及时向外交部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只有希姆莱把意大利之行的目的详细向他这位外交部长陈述清楚，外交部长才好决定是否可以向领袖建议作这次旅行。接着再一次提醒：“倘使你以为根据你在德国国内拥有的职权，可以进而也有特权在国外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特别行动的话，那么……无论如何〔就我来说〕可以首先肯定，我这方面决不会承认这种事关德国外交政策的国外权力要求。”

他在东南欧也设置了一道遏制党卫队插手外交事务利益的栅栏，因为党卫队在这个地区有着广泛深入的联系。外交部长跟曾经挫败过希姆莱的外交野心的那种力量即冲锋队联合起来。1941 年夏天，冯·里宾特洛甫将驻巴尔干地区所有大使和公使全部安插上冲锋队领袖，他们都是 1934 年 6 月 30 日的并非偶然的幸存者：下萨克森冲锋队副总指挥西格弗里德·卡舍任驻阿格拉姆①

① 现名萨格勒布，克罗地亚首府。——译者

公使，柏林冲锋队副总指挥迪特里希·冯·雅戈任驻布达佩斯公使，中德大区冲锋队副总指挥曼弗雷德·冯·基林格男爵任驻布加勒斯特公使，施瓦本冲锋队地区总队长汉斯·卢丁任驻普赖斯堡公使，黑森冲锋队副总指挥阿道夫-海因茨·贝克勒任驻索非亚公使。他们都没有忘却自己差一点儿死在党卫队的手里。

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划定了一条界线，不让希姆莱再行跨越。这位部长指示来外交部任职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瓦尔纳·贝斯特说，从现在起，贝斯特只能是冯·里宾特洛甫的人，而不是希姆莱的人。可是往日的同志的针刺再也伤不到党卫队全国领袖了；后者已经看出，随着战争岁月的迅速推移，外交的作用越来越小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天地越来越狭窄，中立和独立国家的世界紧缩了。现在占领政策取代了外交政策。在西方，特别是在辽阔的东方，打开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在那里，幻想家希姆莱那先知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新天地：德意志主宰民族的天地。

## 第十二章 东方民族政策

海因里希·希姆莱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妥为保管一份秘密文件。任何与此无关的人都无权阅读它，第三帝国级别最高的干部中几乎没有哪个了解它的内容。因为在这份长达六页的文件中，记下的是党卫队头子最讳莫如深的白日梦呓，记下的是使千百万人横遭劫难的狂热臆想。

1940年5月28日，希姆莱在日记中谈到这份秘密备忘录时说：“领袖指示，它只许有很少几份，不得翻印，严格注意保密。”了解这份秘密文件的只有少数纳粹要员，除了几个纳粹党区领袖、两名中央部长和驻波兰总督外，只有驻东方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和党卫队中央各主管处局的头子。党卫队领袖们必须将秘密文件送给各主管处局头子，当场等他们看完，并亲笔签字，以资证明。

党卫队全国领袖甚至也不让大多数可靠的纳粹分子看到，他在1940年5月以“处理东方异族人的几点想法”为题，写给希特勒过目的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希姆莱用他特有的率直而呆板的语言，提出了消灭东方各国人民以利于德意志主宰民族的主张。

备忘录的这位作者提出，德国东方政策的最后目的必须是，把原来拥有多民族（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戈拉人<sup>①</sup>、莱姆克人和卡舒布人<sup>②</sup>）的波兰“分解为尽可能多的部分和碎片”，“从这么一锅烂糊中选出种族上有用的人”，其余的部分逐渐

① 波兰南部加里西亚山区的一种游牧民族。——译者

② 西普鲁士的西斯拉夫民族。——译者

加以淘汰。希姆莱写道：“总督辖区内的居民经过下一个十年期间彻底推行这些措施之后，留下来的将是一种劣等居民。他们将作为没有自己的领袖的、专供驱使的苦力，充当德国每年季节性农业短工和作为特别劳动力的工人。”应该一步一步地压缩东方各民族：必须采用“大量外移非洲或殖民地的办法来彻底消灭”犹太人，也可以“在我国的国土上不再使用乌克兰人、戈拉人和莱姆克人等民族概念。这一点……相应地在较大范围内也适用于波兰人”。

那么怎样灭亡一个民族呢？其方法是消灭它的领导阶层，并将它的青年“过筛”。具体作法分为两种：把“优等种族”的儿童掳到德国来，使他们德国化；对筛落下来的，则有计划地使之变成愚民。“对东方的非德意志人居民，”希姆莱写道，“不得开办程度高于四年级以上的国民小学。这些小学的宗旨仅仅是教会他们：五百以下的简单计数，书写自己的名字，教育他们对德意志人服从、老实、勤劳、有礼貌，这是上帝的戒令。我认为没有什么必要让他们去阅读。”271

对于纳粹德国的征服欲来说，没有再比这些表达得更露骨的了。这是昔日德意志东进政策的变本加厉的继续，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尽管如此，希姆莱这份文件的字里行间还含有更多的内容。备忘录宣布了党卫队一手把持德国东方政策的欲望，反映了党卫队种族和移民局地区总队长奥托·霍夫曼直截了当地概括的那种傲慢要求：“东方属于党卫队所有。”

的确，希特勒德国战争初期的胜利，使党卫队在东方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希姆莱仿佛成了德国东方领土上的真正主人。这位党卫队头子第一次看到旧梦即将成为现实：为他的新德意志骑士团党卫队赢来一个新的集团普鲁士——结构坚固的集团国家；它是遏制波涛汹涌的斯拉夫主义洪流的堤坝，是使德国农民取得肥沃的移民垦殖区的保证。

海因里希·希姆莱打从能思索起就为这一使命作了准备。他打心底里认为,再没有比引导德国人东进、并使他们重新成为农民这一神圣使命更为合适的了。“您根本不知道,我是多么幸福,”有一天他从领袖大本营讨论回来,乐不可支地对保健医生费利克斯·克斯滕大声说。“领袖不仅仔细听了我的意见,而且也同意了我向他陈述的意见。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这个眉飞色舞的人向他的领袖究竟提了什么意见呢?那就是在东方建立党卫队自己的农民防御移民体制的计划。希姆莱说:“德意志民族过去是农民,今天必须恢复它的这一根本素质。东方应该为加强德意志人的这种农民素质作出贡献,它应该成为德意志血统青春常在和从而不断发展的源泉。”

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以这样的伟大日耳曼农民领袖自居。在他奇异的想象中,中世纪向东方迁徙的那幅浪漫主义的历史图画和对黑头发圆脑袋的人所产生的生物学上的恐惧糅合为这样一种狂想:德国的幸福就在于在东方实现封建主义的农民贵族政治。党  
272 卫队头子希姆莱孜孜不倦地宣传德国东方移民。这个阿尔塔曼分子当年曾打算和自己的朋友R·瓦尔特·达里在德国庄园遏制廉价的波兰农业工人蜂拥而来的洪流,反复教导他的党卫队队员,德意志人必须再次扎根于大地和开拓新的移民区。

希姆莱与种族和移民局(RuSHA)局长达里很快就把德国移民政策抓在手里。1934年,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里擢升中央农业部长,党卫队旗队长霍斯特·雷兴巴赫博士主管全国移民挑选局,中央农民事务局的领导干部全体加入党卫队,成为名誉领袖。尽管如此,两个反动空想家的社会理想国,还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而遭到失败。达里和希姆莱的友谊也因此中断。1938年2月,希姆莱撤了死抱住血统和土地贵族政体计划不放的种族和移民局长达里的职务,原因是他认为,达里“崇尚空谈”。善于看风使

舵的希姆莱耐心等待着领袖的政策能为他开拓他计划移殖大德意志国家新农民的移民区。

1939年3月，希特勒首次将外族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余下的捷克人并入大德意志国家，这时希姆莱见到有了一个使他的计划复活的机会。同年6月，他委派种族和移民局移民处长、党卫队区队长库特·冯·戈特贝格去布拉格，在那里建立一个地产局。冯·戈特贝格的任务是，剥夺德国保护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宜于发展农业地区上的捷克土地占有者，并把没收来的庄园交由德意志人移民经营。希特勒也参加了外迁六百万捷克人计划的讨论，但执行剥夺政策的头子冯·戈特贝格未能达到目的。大德意志的军备机器开始运转了，它同样需要依靠捷克的工业潜力和劳动潜力，不允许在德国的后院采取任何大规模外迁措施。布拉格地产局只好仅限于准备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地安置寥寥几户党卫队员的家属移居。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给反斯拉夫的农民神秘主义者希姆莱开放了梦寐以求的地区。诚然，他暂时也只能从侧门里钻进去，因为在波兰战役开始前就向自己最忠实的助手发出召唤的独裁者并不急需这位移民使徒，他感兴趣的只是诉诸暴力的警察。

阿道夫·希特勒决定解决“波兰问题”。就他来说，对波开战决不只是为了武力解决但泽和走廊问题而已，现在是实现多年前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即已大胆提出的预言的时候了：“我们要继承我们在六百年以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停止日耳曼人不断移  
273  
往欧洲南部和西部，转而瞩目东方的土地。我们要终于结束战前时期的殖民政策和贸易政策，向未来的土地政策过渡。”但是，这样的土地政策是和一个已经在土地上从事经营的异族相对立的。这一点希特勒早在1928年也已考虑到了：德国——他写道——只能  
“要么将这些异族分子加以封闭处理，以免本民族的血统不断受到

侵蚀，要么……干脆将他们消灭，把空出来的土地交给本民族同胞”。

希特勒的这些话翻译成1939年8月的语言，就是：使波兰人沦为农奴，强行使他们失去自己的上层，摧毁他们的民族性，剥夺他们的国籍和文化。自豪的波兰人将变成没有自由的苦力百姓，他们唯一的命运只能是服役于德意志的统治者。德国军方头目们至迟已在1939年8月22日上萨尔斯堡会议上获悉，这位独裁者决定灭亡波兰。费多尔·冯·包克陆军元帅记得希特勒这样说过：“可能会发生一些不会得到德国将领们鼓掌喝采的事情。因此，他不打算麻烦军队去做必要的消灭工作，而是把〔它〕……交给党卫队去执行。”

希特勒正是为了这项工作而召见了党卫队头子，并使党卫队成了导致波兰悲剧的千古罪人。这位独裁者责成希姆莱组织特别行动队，跟随进入波兰的德国军队消灭随时遇到的波兰上层人物。

在这以前，纳粹扩张政策的每一次进攻，都有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队参加。强占奥地利时，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特别队就曾随军前进，粉碎捷克斯洛伐克之役也吸引特别行动队开进了那个国家。海德里希的特别行动队是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的风尘仆仆的先头部队，它们闪电般地执行情报和保安警察的任务。任务一经完成，它们也就转为两个组织设在当地的固定据点，象在国内的情况一样；特别行动队就是由这些据点的人员组成的：秘密警察局和分局以及区和分区保安处机构。

海德里希在短时间内就组成了波兰战役的特别行动队。他组织了五个特别行动队，其成员身穿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军服，左臂佩戴保安处菱形标志。每个特别行动队由四个特遣队组成，尾随一个军团前进；每个特遣队有队员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配合一个军。重要指挥官全部由保安处领袖担任：党卫队旅队长布鲁诺·



施特雷肯巴赫领导第一特别行动队，随威廉·李斯特大将的第十四军团向伦堡<sup>①</sup>方向进军。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埃马努埃尔·舍费尔博士率领第二特别行动队，跟随瓦尔特·冯·莱希瑙上将的第十军团向华沙南面突进，直抵维斯杜拉河。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赫伯特·菲舍尔博士率领第三特别行动队，跟随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上将的第八军团向罗兹进军。党卫队旅队长洛塔尔·博伊特尔指挥第四特别行动队，紧随突向莫德林<sup>②</sup>要塞的古恩特·克鲁格上将的第四军团。党卫队旗队长恩斯特·达姆佐格指挥第五特别行动队，随格奥尔格·冯·库希勒上将的第三军团前进。

如果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想要放手执行对武装部队保密的、领袖关于集体消灭波兰民族精华的命令，这个进军中的德国中央保安局就必须考虑，不能让军人们过多地窥探它的秘密。因为，武装部队拥有控制特别行动队的某些条件；海德里希的部队在整个作战地区受陆军领导，尽管它们在业务上是接受柏林德国中央保安局指示的。它们还受武装部队军法审判权的约束。此外，陆军总司令也已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下的波兰实行军管。德国将军们如果具有足够的政治直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这里搞恐怖暴行总会招来很大的风险。

这两个党卫队头子不得不小心行事。他们向军方不多谈情况，致使例如第八军团在1939年9月9日的一份基本命令中将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概括为：“打击作战部队后方的一切敌视德国和德国人的分子、特别是打击谍报人员，逮捕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收缴武器，查封谍报警察的重要材料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当然会隐瞒特别行动队的真实任务，他们会很不高兴，但也无法长期不让士

① 现为苏联的利沃夫。——译者

② 华沙西北维斯杜拉河畔城市。——译者

兵知道特别行动队屠杀波兰贵族、教士和知识分子的行为。后来，渴求功名的党卫队领袖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要么他们只好泄露这位独裁者的诡秘，要么他们就得忍气吞声，被士兵们看成是一群无纪律的杀人匪帮——强调无纪律三个字。

275 好几个月以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久久郁郁不乐，因为他们被领袖弄得如此狼狈不堪。希姆莱以其不可谓不聪明的手法企图把罪责推诿给这位独裁者。他几乎是苦苦哀求地向将军们发誓说：“我不会做任何领袖所不知道的事情。”而海德里希后来在一份存档的笔记中透露，在波兰占领区发生了同陆军的冲突，因为“警方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命令特别偏激（例如命令大量消灭数以千计的波兰领导人）”，而领袖命令“不能告知陆军将领，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参谋部人员，以致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警察和党卫队擅自采取的独断独行的残暴行动”。

军人们很快就看出了派遣特别行动队去波兰的真相。9月8日，谍报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即报告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说，党卫队领袖们以每天枪毙两百名波兰人而炫耀自己；处决大多未经司法程序，受害者主要为犹太人、贵族和教士。三天后，卡纳里斯登上伊尔瑙的领袖专列，向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汇报。卡纳里斯警告说：“对这样的做法，有一天，世界舆论也会向武装部队追究发生在它眼皮底下的这些事情的责任的。”凯特尔大将看来没有怎么听进去。他用希特勒的强盗逻辑作为搪塞：既然武装部队不愿干“这些事情”，那它就不要干涉保安警察和党卫队去担负消灭工作。

武装部队给自己注定了充当不光彩的配角角色。尽管卡纳里斯及其代表们继续收集特别行动队所作所为的材料，一台碾轧不幸的波兰人的恐怖压路机，照样在军人们的眼前隆隆滚动。它那压出的可怕轮辙，使人想起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举国恐怖的日日夜

夜。特遣队的猎手们四处活动，捕人杀人，实现希特勒所讲的话：“凡是经我们现已确定属于波兰领袖阶层的人，必须予以消灭。以后再发现的话，由我们注意看管，过一定时间后再加以清除。”

海德里希的追捕者按准备好的名单，把波兰教师、医生、公务人员、教士、地主和商人驱赶在一起。被捕者被送进接收营。事实证明，这些接收营不少是灭绝工厂。布龙贝格<sup>①</sup>附近米尔塔尔的托尔恩油脂厂、施图特霍夫的索尔道接收营、波森省第七要塞——它们都已成为数以千计的波兰人的恐怖和死亡信号。“消灭过激分子是既定计划，”布龙贝格特遣队队长、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勒德尔博士声称道。任何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都属于“过激”，连波兰沙文主义者团体“西部边境地区协会”——他们提出要并吞大片德国领土，因而有助于希特勒推行波兰政策——会员的身分也足够刽子手们有理由把他们判处死刑，公诸于众。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使波兰民族精华受到沉重损失。库尔姆-佩普林主教区的六百九十名教士中，被捕者达三分之二，二百一十四名被处死，其中包括佩普林大教堂的几乎所有教士会成员。勒德尔向柏林报告说：“一大批天主教教士，由于持有众所周知的波兰激进立场而被消灭”。历史学家、通晓德国对波政策的编年史作者马丁·布罗斯察特统计，在德国人统治的最初几个月中，被害的人数为“几万人”。海德里希在1939年9月27日宣称：“被占领地区内留下来的波兰领导人物至多还有百分之三。”276

除了冷酷无情的特别行动队的灭绝部队外，还有另一种党卫队的力量在活动，它不是根据领袖密令行动，而是受仇恨和复仇欲所驱使。特别是在但泽和西普鲁士，成千上万狂热的德意志族人跳了出来，他们没有忘记他们一度也曾是波兰沙文主义者任意猎

---

<sup>①</sup> 现名彼得哥煦。——译者

获的对象。

波兰行政机关和团体为希特勒回到德国来的蛊惑宣传所刺激，也由于疯狂的间谍恐怖而感到惊慌失措。于是在战争爆发时对德意志族人展开了进攻。德意志族人眼见死路一条：在波兰的德意志人中间，一时拘捕令满天飞，分红色（逮捕入地方监狱）、玫瑰红色（逮捕入隔离营）和黄色（流放到中部和东部波兰）三种。手中捏着黑名单的民族主义团体，对“Niemcy”、“Hitlerowcy”和“Szwaby”<sup>①</sup>采取了特别行动。

五万名德意志族人被逐出他们在西部波兰的家园，驱赶到了东部，数以千计的人身陷囹圄。波兰行动队洗劫德意志人的住宅和农舍，杀害他们的家小。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丧命。还有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被拉去游乡，让人群诅咒、吐口水，经不住百般折磨而惨死。第三帝国当局后来宣称，截至1940年2月1日止，共发现一万三千具被害的德意志族人尸体。这个数字看来过于夸大。作者反正同意波森波兰西方研究所1954年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所提到的“好几千人”，最接近实际的数字，估计是由布罗斯察特提出的：他计算被害的德意志族人为四千至五千名，另外约有两千死于战争的原因。

不过，波兰人杀人跟德国人的暴行有一点根本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统一的计划，国家不是这些杀人凶手的主使者。一些波兰人在被煽动起来的群众的盛怒面前，将德意志族人藏匿起来，不少波兰军官保护受到迫害的德意志人。但尽管如此，德意志族人还是对迫害他们的人进行武装报复。战争刚打到一个地方，波兰的德意志人就联合起来，成立自卫团体。起初它的目的只是出于自卫。波兰境内的德意志人担心多数波兰人会发动新的攻击，为此他们

---

<sup>①</sup> 波兰文：德国人、希特勒分子和施瓦本人。——译者

建立了志愿民兵来保卫自己。

但是，这种自卫很快变成了发泄民族主义的怨恨，外加纳粹党但泽区领袖艾伯特·福斯特还利用他的保卫团和一个刚成立的特别组织（党卫队埃曼突击大队）挺进西普鲁士，煽动反对波兰人的民族斗争。西普鲁士很快就成了无情打击波兰人战役的主要战场，极尽狂热煽动和阴谋算计之能事。这些来自但泽的民族斗士们还保持着革命的冲锋队的传统，在福斯特的精心策划下，将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反波仇恨发泄出来。福斯特的目的是，让领袖看到，他作为东方纳粹党区领袖第一个把自己的地区变成“无波兰人”区。

福斯特的这种权欲使希姆莱为之震惊；他早就认为，这个纳粹党区领袖是他博得希特勒青睐的最厉害的竞争者之一。说什么也不能让福斯特掌握自卫团体的领导权。希姆莱派出他的补充处处长、党卫队旅队长戈特洛勃·伯格，交给他任务：将自卫队改组为一支德意志族人党卫队。

伯格带来了一批德国党卫队领袖，接管了波兰德占区内德意志族人自卫团体的领导权。伯格的副手们将民兵组织划为四个自卫区；自卫区又分成所谓的督察段，分别由各该地的高一级党卫队兼警察领袖领导。在一般情况下，自卫团体执行辅助警察的任务，只有在西普鲁士（后来在卢布林地区也是如此）追捕波兰人，滥加杀害。

西普鲁士自卫团体的头子是党卫队区队长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勒本，他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称霸一方的暴君，跟当年私设“野蛮”集中营、虐待民主派和共和派人士的卡尔·恩斯特之流的冲锋队恶棍们如出一辙。自卫区领袖冯·阿尔文斯勒本俨然是操生杀予夺之权的统治者。一个德意志族人告密，他在名单上挥笔一勾，自卫团员就把波兰人押进地窖、汽车间或树林，加以杀

害。

有些纳粹分子对令人发指地迫害波兰人渐渐地看不下去了。霍亨萨尔察县一个德意志族人地主的妻子、党员莉莉·容克布卢特给赫尔曼·戈林写信提出抗议。她诉说道：“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已〕被枪杀。”连关心纪律胜过关心人道的海德里希也埋怨自卫团体干出了自卫行动中“部分难以想象和过火的复仇行动”。

可是，对希姆莱来说，主要的只是“成绩”，只是被消灭的或——按现在的说法——“被特殊处理掉的”波兰人的统计数字。9月中旬，全国领袖派出一支新的灭绝队，即党卫队副总指挥乌多·冯·沃伊尔施率领的加强特别行动队；它的任务是消灭卡托维兹地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特别行动队头子冯·沃伊尔施是希姆莱围剿罗姆时期的老搭档，他奉命在东部上西里西亚开展了党卫队奉行自己的东方政策的新阶段：将但泽、西普鲁士、波森和上西里西亚约五十万名犹太人赶往波兰内地。

沃伊尔施所部显然是考虑作为一种恐怖队而组织起来的，它的任务是采用恐怖手段恫吓东部上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将他们强行迁往克拉科夫一带。这位党卫队副总指挥刚刚开始战役行动，海德里希就亲自上陆军总司令部，把新计划告知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这个计划是：将已经重归德国的东部地区的所有犹太人，集中到在波兰划定的犹太人隔离区，将来有一天让他们移居海外。对此瓦格纳未表示异议。二十四小时后，9月21日，海德里希指示特别行动队，开始将犹太人强行迁往波兰腹地。

可是，跟陆军事先打招呼并未使海德里希得到好处。陆军突然起来反对了。在这期间，在占领的波兰已建立了以东线总司令（东总）格德·冯·伦斯德大将为首的军事管制，把德占区划成四个军区，军区领导为将军，由作为民政机关领导人的干练的纳粹干部协助。军人们负责抓治安和秩序，恪守陆军向波兰人发布的庄

严宣言：“武装部队不以居民为敌人。一切国际法条款均将得到尊重。”党卫队部队的野蛮恐怖，尤其是沃伊尔施特别行动队的残酷暴行，使陆军的诺言成了骗人之谈。不过，有的军官还猛烈地攻击党卫队的杀人暴行。

9月20日，第十四军团情报处报告，部队情绪严重不安，“这是由于沃伊尔施的特别行动队在军区的部分违法行为（集体枪杀，尤其是集体枪杀犹太人）……引起的。部队特别感到气愤的是，年轻人不上前线去作战，而是拿手无寸铁的人来证明他们的勇敢。”接着东总声明，不能再容忍沃伊尔施的特别行动队继续留在作战地区。希姆莱缩了回去；冯·沃伊尔施只好屈从军方的意愿。此外，陆军还要求取消已经开始进行的反犹措施。希姆莱再次应允。10月1日，陆军总司令部通知驻波兰各军团司令部：“保安警察首脑1939年9月21日给特别行动队的II288/39G号关于占领区内犹太人问题的命令，暂时仅限于采取措施作好准备。据悉，已由党卫队全国领袖向特别行动队发布一项相应的新命令。”

武装部队本来是有可能制止在东方的专横行为的，如果它坚持继续对希姆莱施加压力的话。可是希特勒更了解他的将军们，他迅速结束了东方的军事管制，同时还能满有把握地缓和高级将领们的情绪。 279

10月5日，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去见希特勒，诉说军人们在西普鲁士不断给他制造的麻烦。就在同一天，希特勒下令撤除西普鲁士的军事管制，将其交由福斯特领导。这个闪电式的决定引起了一阵雪崩，埋葬了东方的军政权。10月中旬，希特勒大笔一挥，批准了在波兰德占区建立一套新的统治体系，出现了一个染指东方的纳粹特权阶层内部相互争权和日后勾心斗角的新迷宫：但泽和西普鲁士被并为德国的一个区，由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任领导。福斯特在但泽的竞争者、纳粹党区副领袖兼议会主席阿图尔·

格赖泽尔，出任新划的另一个德国区瓦尔特兰区（波森）领袖。和东普鲁士接壤的小块波兰领土，成了福斯特另一竞争者、纳粹党柯尼斯堡区领袖埃里希·科赫的地盘。上西里西亚并入纳粹党区领袖约瑟夫·瓦格纳的西里西亚，但到1941年又改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归纳粹党区领袖弗里茨·布拉赫特领导。经过德国人（以及从东面入侵的苏联人）这样肢解后余下来的波兰，则被强行划为一个总督辖区，它的最高领导人是表面上拥有特别全权的纳粹法学家领袖汉斯·弗朗克博士。

军人们反对剥夺他们在东方的大权吗？他们抗议希特勒背弃由武装部队掌握执行权的诺言吗？没有。将军们为这位独裁者不要他们对屠杀负有责任而感到高兴，狡猾的希特勒事先故意向军人们描绘了波兰未来的可怖形象，令人喘不过气来。10月17日，希特勒在凯特尔在场时阐述了他的对波政策要点。震惊不已的军人们匆忙地记录了下来：“无情的民族斗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些方法同我们的原则是不会一致的……要阻止波兰的才智之士充任领袖阶层……清除新老德国领土上的犹太人、波兰佬和贱民。”

军人们毛骨悚然地走开了。希特勒的估计完全正确，这一点可由冯·伦斯德大将的表现来足以说明：这位东总在获悉老纳粹弗朗克出任总督时，立即提出辞呈。将军们忙不迭地急于结束军管，以致来不及建立新的国家行政机构，军方就已撤走。于是出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法律真空”（布罗斯察特语），希姆莱利用这个时机，派他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队乘虚而入。

280 新的行政机关的统治者们还未来得及开始工作，波兰就已置于隶属党卫队控制的政府那个蛛网之下了。特别行动队变成了地方常驻的区秘密警察局和区保安处，它们在总督辖区的各地区内，由一名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司令（KdS）统管。波兰五个地区的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司令，受保安警察兼保安处总司令（BdS）领导，后者



又直接听命于德国中央保安局。同时，在波兰被占领区还铺设了另一条警察渠道，即风纪警察的指挥系统。风纪警察在战争爆发时即进行了动员，好多个警察营参加了征服波兰和特别行动队的某些活动。风纪警察体系建制和保安警察一样：总督辖区的每个地区设风纪警察司令一人，整个总督辖区设风纪警察总司令一人，总司令又受风纪警察总处领导。

掌握实权的是控制两条警察渠道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HSSRF)。从1937年起，德国就有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了；他们多半是希姆莱派在各军区作为他的代表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他们的任务名义上是在动员时采取措施协调所有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实际上是希姆莱所企求的党卫队和警察一体化的铁钳子。可是，希姆莱派在全国各地的这些代表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内政部门对突出这些排斥警察的党卫队干部进行反抗，迫使全国领袖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作用仅限于行使他的代表的职能。

但在一无主人、二无传统官僚政治思想统治的大德意志殖民地波兰，希姆莱给予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以较多的权力。新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被委以监督东方所有警察和党卫队组织的全权，构成对付黑色集团内部海德里希的优势地位的平衡力量，并建立起希姆莱用以充当领袖意志的真正体现者的政治警察特别行动权。

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还特别关系到希姆莱的意图在东方能否得到贯彻。全国领袖给自己挑选了三个人，他们都是手段强硬、雄心勃勃的党卫队领袖，干劲很足但又并非强大到足以对希姆莱构成威胁：他任命地区总队长里夏德·希尔德布兰特为维斯杜拉(但泽)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此人是老战士，有“小希特勒们”的对头之称，由于同纳粹党区领袖施特莱彻争吵，一度被希姆莱撤去党卫队内一切职务。地区总队长威廉·科佩是一名有魄力的干

部，被任命为瓦尔特兰(波森)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被任命为东部(克拉科夫)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他是最不受欢迎的党卫队领袖之一，为冲锋队所憎恨，因为他在1934年6月30日玩弄两面派手法，传播谣言，自命博学，对所谓不忠于路线的同志进行诋毁，连希姆莱也差点难以忍  
281 受。希姆莱还给驻波兰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配了一个助手团，这是过去不曾有的：党卫队兼警察领袖。他们驻在总督辖区的每个地区，也负责确保党卫队和警察在省一级的一体化。

希姆莱利用在东方迅速建立的党卫队兼警察体系，要求在德国占领政策中有权担当领导角色。现在，他也开始把矛头指向溃散的波兰部队和新成立的游击队，而不同武装部队进行商量。在反游击队的幌子下，希姆莱的部队继续大肆消灭波兰上层人物。波兰人不断被捕，并随时排成一行行遭到杀害。类似这种臭名昭著的做法的如1940年春的“特别绥靖行动”，这一次即有三千五百名波兰人被枪杀。

希姆莱的部队以名正言顺的占领军自居，致使武装部队将领们也产生了强烈反应。尽管象最高统帅部凯特尔将军这类唯唯诺诺的人和象伦斯德这类宿命论者放弃了在东方的政治作用，但作为占领部队的陆军的垄断地位仍未动摇。党卫队领袖们很久以后才看到，新任命的东总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大将“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左右局势的人，是真正能发号施令的人”，旅队长伯格尔这样记述说。

武装部队在总督辖区始终还拥有牢固的地位：由于希特勒颁发的一项命令，它还掌握着唯一发布命令以对付内部骚乱的权力。它有权采取一切保卫国防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它掌握着交通和电讯，监督战时经济的一切重要工厂和企业。不，武装部队是不会容许这个希姆莱撵走他们的，只是还缺乏一个促使军官们恼羞成

怒的外因。现在，这个理想的外因有了，它就是保安警察和党卫队部队的强化灭绝行动。东总勃拉斯科维兹首先掀起了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武装部队讨伐党卫队刽子手们的战斗，而且“使用了德国陆军史上从未有过的语言”——慕尼黑历史学家赫尔穆特·克劳恩斯尼克这样写道。

勃拉斯科维兹布置收集有关党卫队在波兰胡作非为的报告，把材料整理成一份备忘录，由他在1939年11月中旬寄给陆军总司令部。11月18日，勃拉斯科维兹的这份文件摆到了希特勒的办公桌上。希特勒的军事副官恩格尔上尉在日记里记下了备忘录的内容：“因非法枪杀、逮捕和查抄引起了巨大忧虑，担心部队目睹这些事情后难以保持纪律；就地同保安队和秘密警察磋商毫无结果，有党卫队全国领袖的指示撑腰；请求重整法纪，特别应规定必须经过依法判决才能执行处决。”希特勒断然拒绝陆军领导持有这种 282 “幼稚的看法”。希特勒骂道，他对勃拉斯科维兹将军从未寄予信任，现在是赶快将这个人撤职的时候了。

东总勃拉斯科维兹没有因领袖勃然大怒而失去主见，他继续收集材料反对党卫队。部队的报告从各方面源源送来。1939年11月23日，瓦尔特兰区军区司令贝茨尔将军报告：“所述这些组织〔党卫队和警察〕几乎在所有较大的村镇进行公开枪杀。枪杀各种各样人物，而且经常令人不解，其做法很不光彩。几乎总是一边抓人，一边抢劫。”1939年10月30日关于图尔克城所发生的事件报告说：“……一批犹太人被押进犹太会堂，命令他们在那里唱着歌并爬在地上钻板凳，一面由党卫队员用鞭子不停地抽打。然后强迫他们脱下裤子打屁股。一个犹太人吓得大小便失禁，竟逼着他把屎尿抹在别的犹太人的脸上。”1940年2月2日，南部边区总司令乌莱克斯将军写道：“最近一段时间内，警方人员暴行层出不穷，反映出一种缺乏人性和道德感，实在令人费解，以致可以称之为与

禽兽无异……摆脱这种不光彩的、玷污整个德国人民声誉的状况的唯一办法，我认为是……立即调走和解散所有警察部队包括其全体高级领袖。”

勃拉斯科维兹又整理了一份党卫队所作所为的材料，列举了三十三起事件，对经过情况作了详细记述：虐待犹太人和波兰人、强奸、抢劫、屠杀。这位大将在2月6日作出结论说：“部队对党卫队和警察的态度，时而厌恶，时而痛恨。每一个军人都对德国人和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在波兰犯下的这些罪行感到可耻和恶心。”

东线总司令的再次讨伐，迫使党卫队及其警察机构采取守势。连象瓦尔特·冯·莱希瑙这样的对希特勒忠心耿耿的军人，也加入了控诉党卫队的行列，在领袖大本营里的武装部队军官，谁也不再跟任何一个党卫队领袖握手了。连希姆莱也不得不为了保住面子大胆作出一个姿态：他指示风纪警察和党卫队中央法庭处调查核对东总的“抗议”。

可是，总督弗朗克却忙不迭地去援助这个处境窘迫的党卫队头子，后来他不得不为此懊悔莫及。他去找希特勒，在2月13日请求领袖：撵走这个一味挑剔毛病的批评者勃拉斯科维兹——实际上领袖早已作出了这个决定。三个月后，这位党卫队头子摆脱了  
283 他的军方对头。勃拉斯科维兹被调往西线，随着他的调动，总督辖区内的德国陆军部队移向德法边境。军人们调动后不到几个星期，就于1940年5月10日打响了西线战役。

1940年5月，正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口授打字写出那份“处理东方异族人”备忘录的时候，道路畅通无阻了：现在希姆莱可以开始将已经沦亡而又弹痕遍地的波兰，用刀斧雕塑成党卫队集团之国——未来德意志农民和武士民族的理想国了。

这份五月备忘录标志着希姆莱东进的新篇章。集体屠杀波兰上层人物的刽子手，摇身一变成为德意志化的园艺师，德国警察头

子变成了“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一支拥有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辅助部队的新的黑色集团侵略军，已作好准备，待命行动。党卫队的移民办事机构纷纷搭起架子，设立起难民营，种族委员会印就了征询意见表——由党卫队控制的精心策划的德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移民工作开始形成。

他们已经出发了，他们就是党卫队企图用来达到它统治东方目的的人，他们就是被丧尽天良的强权政治蒙在鼓里的、听从回到德国来的宣传号召和诱骗的牺牲品：十二万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十三万六千苏联占领下的东部波兰的德意志人、二十万人来自罗马尼亚，成千上万的来自南斯拉夫和斯洛伐克。他们按规定移居德国东部。宣传家们告诉他们说，血统的呼声向他们发出召唤。其实，统治者叫他们迁回来，只是出于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大德意志国家缺少劳动力；这个叫喊所谓“缺少空间的人民”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全力经营它的工业和农业。

早在1937年，奉命主持制定四年计划的赫尔曼·戈林，就叫人计算出德国缺少十五万名工人。随后警察头子希姆莱根据戈林的指令，采取种种措施确保搞到所需要的劳动力。希姆莱在他的本部设立了“四年计划办公室”，委派一名党卫队领袖、党卫队重要技术政治家之一的智囊人物乌尔里希·格赖费尔特负责。这个人柏林药剂师的儿子，1896年生，当过自由团员、代理人，曾经反对过纳粹，现在是党卫队区队长。他认为统计学、生产数字和销售额这个领域比意识形态领域更重要；他只是在他个人支配的时间里，才表现出有些经理们所常有的那种多愁善感。

1939年1月——这时劳动力短缺的数字已突破五十万大关——，格赖费尔特在一份报告中阐明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办法：迁回居住在国外的三千万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他们是现成的

284

费尔特有机会将他说的话付诸实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达成协议，抽掉卡在加好了油的轮轴下的一块令人讨厌的滑橇，即讲德语的南提罗尔人；1939年7月，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把这支南提罗尔人迁回德国。格赖费尔特奉命为他们进行组织运送工作。

他搞了一个二十人的班子，取名为“移民迁入和迁回办公室”，设在柏林库尔菲尔斯特滕达姆大街142号。第一批回国移民刚到达德国，希姆莱又给他的设计师格赖费尔特提出一项更大的新任务，要他把东欧的德意志族人迁到德国占领的波兰境内定居。

几十万德国劳动力弃工从军参加作战部队，以及军火工业日益增长的需要，促使希特勒和戈林采纳了格赖费尔特1939年1月的建议。9月底，德国同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达成协议，商定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德意志人迁回德国。这位独裁者召见了受他本人直接领导的德意志族人中心头子、党卫队副总指挥维尔纳·洛伦茨，任命他负责领导这项迁移工作。其所以挑选洛伦茨是不言而喻的；从1938年起，德意志族人中心就同国外德意志族人一直保持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联系。

可是希姆莱一听到洛伦茨同事得到了这样的幸运，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希特勒。希姆莱进言说，这么一件重大的民族政策工作不应交给一个副总指挥，这是全体党卫队的使命。这位独裁者为之动心，于是将这项工作的领导权改授给希姆莱。9月29日，这位党卫队头子得到了一份领袖密令的底稿，委派希姆莱负责“加强德意志民族”。密令说，党卫队全国领袖有三项任务：“迁入最终符合回国定居条件的国外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消除对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共同体具有危险的这些异民族居民的有害影响；通过移民、特别是通过安置从国外回来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定居以建立新德意志居民区”。

这三项大权使希姆莱能在东方为所欲为，因为一纸命令给予

了这个加强民族长官以特权。这个敕令规定，希姆莱有权节制“中央、各邦和地区以及其他公众团体和现有移民协会的现有机关和部门”。只要充分运用这些新的大权，他就能在短时间内成为被征服的东方的统治者了。 285

当然，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正走向一个民族社会主义权力斗争的爆炸性地区，面对一群自命不凡的褐衫帝国主义者，因为沦亡的波兰对他们来说已成为新封建主义本能的角逐场所。希姆莱不能同时向东方各地统治者挑战。他必须尽可能无声无息地掌握权力的操纵杆。他也不能在自己的新入侵部队尚未进入阵地之前就引起别人注目。

他给自己戴上“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RKF)的这个庄严的头衔，但同时却放弃建立异常庞大的机构。他选定格赖费尔特的办公室作为自己的民族进攻参谋本部，将其改名为“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办事处”(1941年起称“本部总处”)。随后希姆莱将工作分给好几个党卫队组织：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办事处负责规划德国移民回国的迁移和定居工作，并通过没收波兰人或犹太人的产业，给移民提供定居地；德意志族人中心负责将回国者送往接收营集中，并督导各入境移民小组的政治领导工作；种族和移民局负责对回国的德意志族人进行种族审查；德国中央保安局负责征用所谓的敌产，驱逐波兰人和把他们——按人们的说法是——“放逐”到总督辖区。

可以开始行动了。德意志族人中心头子洛伦茨在这期间已率领手下各班子完成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德意志人回国的准备工作，从10月20日起，首批运载爱沙尼亚移民的船只抵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德意志人按规定安置在但泽地区。可是，如果说希姆莱原以为他的对手们未曾注意到党卫队全国领袖的权力有了新的增长的话，那么他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看法错了。希姆莱的劲敌

之一、其貌不扬，令人十分讨厌，却又偏偏穿上一身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制服的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不准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对他统治的地区进行任何干预。

为了便于在移民工作中充分利用所有行政机关的力量，希姆莱打算任命每个地区的最高掌权者作为他的代表。可是但泽-西普鲁士地区头子拒绝受命于希姆莱这位中央长官。他只好改任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为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的代表。福斯特也拒绝给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提供工作方便。当德意志族人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保安警察协助下开始在西普鲁士各城市划定整段整段的地区，作为安置移民之用时，这位区领袖叫人把德意志族人中心的代表找来，以逮捕相威胁，如果不命令手下人停止活动的話。这位身穿褐衫的土皇帝一点面子也不给，使得按规定迁来但泽的移民只好改运到斯德丁。后来希姆莱打了几个电话，才使福斯特改变主意；不过他只允许对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德意志移民作短时期的安置。

即便如此，希姆莱还是被迫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德意志人的安置工作推迟到下一年。福斯特的阻挠以及由于德意志族人中心组织工作草率，使回国移民吃尽了苦头，以致抨击希姆莱民族政策的另一个人、波罗的海地区出生的德国人、纳粹政治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跳了出来。“许多人对待波罗的海人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使人想起布尔什维克时代，”罗森堡写信给希姆莱埋怨道。德意志族人中心使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变成了一群心灰意冷、痛苦绝望的乌合之众”。福斯特和罗森堡并不是希姆莱仅有的两个敢于同加强民族长官作对的竞争者。其他的争夺者想尽办法使希姆莱的移民区搞不起来，而移民区是整个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

党卫队的一个老对手、秉性粗暴的纳粹党东普鲁士区领袖科赫横加阻挠，他不让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将迁回德国的移民



安置在“新东普鲁士”——这是人们对划给科赫管辖的波兰领土的称呼。当格赖费尔特的空间规划主要制定者康拉德·迈尔-赫特林格教授开始丈量土地时，科赫扬言要把他撵出东普鲁士。其他的人以比较圆滑的方式进行反对。希姆莱刚刚设立了一个中央地产局，作为专管没收波兰人地产事宜的机构，戈林的四年计划办公室就增设了一个“东方托管主管处”(HTO)。它公开宣称德国第二号实力人物要求掌握所有波兰人和犹太人的产业，这就是说，也包括希姆莱的中央地产局计划分配给移民的土地在内。

戈林立即向党卫队头子表示自己并不把他视为平起平坐的伙伴。希姆莱眼见戈林成立了东方托管主管处，预感对他不利，去找四年计划头子申述自己的看法，这时戈林叫他去找东方托管主管处处长马克斯·温克勒市长。经过长时间谈判后，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才和戈林的人取得一致：东方托管主管处掌握所有波兰工业和城市地产不变，没收波兰德占区的农村地产则归中央长官希姆莱。

但是，希姆莱并未因此而拥有对新移民区的绝对支配权。希姆莱那个已对其失望的阿尔塔曼朋友农业部长达里，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在分配东方移民土地工作中也不得不给予发言权，但他却钻进了戈林在东方贸然建立起来的机构。他自行组织一个团体，专门经营被没收的波兰农场，并将其置于戈林领导之下——很明显，这是指望通过这条曲线，找到一个比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 287  
长官更强大的靠山。

在这种阻力重重的处境中，希姆莱必须谨慎地排除困难，绕过暗礁，以便达到实现他的计划的目的。这位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眼看要失败于民族社会主义自我拆台这条铁的规律上了，如果这位全国领袖的党卫队不能依靠它在东方的警察机器的话。还在1939年11月8日，驻东方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在克拉科夫

同总督辖区保安警察司令聚会，讨论了党卫队队员委婉地称之为民族政策的“不利”的一面；将“重新并入”德国的原波兰领土上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强行迁走。

在里茨曼施塔特（罗兹），保安警察设立了一个所谓易地安置总处（UWZ），准备将划归德国的几个区内的不受欢迎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统一强行迁往总督辖区。保安警察采用一向毫不容情的手段驱逐被列入另册的波兰人。截至1940年2月止，有三十万波兰人“迁入”总督辖区。被保安警察驱赶的人数飞速上升：被迁走的占有土地的波兰人在瓦尔特兰区达十二万人，在但泽-西普鲁士为三万五千人，在上西里西亚为一万五千人。到对俄作战开始时，共计有一百万波兰人被逐出他们的家园。党卫队各地的移民安置本部迅速把迁入的德意志族人运来——经过种族和移民局进行复杂的审查——分配已被赶走的波兰原主的房产。

1941年年中，有二十万迁回来的德国移民分得了房产。经手分配波兰人财产的是格赖费尔特的办事处：德国移民总共获得九十二万八千所波兰农舍中的四万七千所，九千九百五十万公顷土地中的九百二十二万公顷。截至1942年年底，六万个波兰经济企业中，约有百分之二十被分配给移民，百分之八归了德国人；百分之五十一属于定居的德意志人，百分之二十一由德国托管人掌握。约有两万家手工业店铺作坊落入了迁进来的德国移民之手，大部分（百分之八十）仍归波兰业主所有。

无疑，民族幻想家希姆莱并不满足于召唤真正的德意志族人返归德国，和安置他们在东方定居。根据自己起草的1940年五月备忘录，希姆莱开始从波兰民族中榨取每一点德国血统的苗裔：种族委员会再次被动员起来，清查尚未发现的日耳曼人。希姆莱叫人制定了一种“德意志民族登记册”，对东方所有德裔居民进行登记。每个德裔居民必须按下述四类登记入册。第一类：表现积极的民

族战士。第二类：至少会一半德语的消极的德意志族人。第三类：德裔出身可疑者。第四类：曾参与反对波兰境内德意志族人斗争的、敌视纳粹的德裔居民。

除德裔居民外，土生土长的波兰人也成了种族调查员审查的对象。之所以对他们进行审查，是要找出北欧人的基本特征，以便发挥“重新德意志化”的机械论的作用；但如果带有德意志血统的居民是波兰人的话，按照种族主义救世说的荒谬逻辑和一份党卫队官方文件的说法（“人力的发掘”），则是要把在东方“现有的德意志血统为德意志民族争取回来”。在希姆莱看来，几乎不存在任何不能日耳曼化的异族的“北欧人代表”。希姆莱声称，连确实属于“日耳曼人出身，至少是日耳曼混血的戈拉人、莱姆克人和胡楚人<sup>①</sup>”，也应“逐渐加以德意志化”。

希姆莱特别顽固地让波兰儿童遭受迫害，因为在他心目中，他们是理想的德意志化的对象。在波森有谣言说，波兰人在战争最初的日子里，把德意志儿童藏在孤儿院。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立即下令查封了波兰所有的孤儿院，将在院孤儿经过种族政治审查后，送到德意志儿童之家。后来，有父母的儿童也被掳到德国来。“纯种波兰儿童，”希姆莱在1941年6月13日给瓦尔特兰区统治者、纳粹党区领袖格赖泽尔说，“应由我们送到特别幼儿园或儿童之家进行教育。可以对他们的父母说这是为了儿童的健康。”

半年以后，希姆莱打出党卫队特有的“生命之源”助产协会这张牌。该协会的产妇休养院被指定收养波兰儿童，后来并将这些儿童介绍送给没有子女的党卫队队员家庭。“干草行动”（劫夺儿童行动计划的代号）把成千上万的波兰儿童掳到德国，下落不明。

① 东喀尔巴阡山一种以游牧为生、说南部乌克兰方言的民族。——译者



来了新的敌对者。纳粹党西里西亚区领袖、天主教徒约瑟夫·瓦格纳担心，希姆莱还将强行迁走上西里西亚重工业部门的全部波兰技术工人大军。他采取对策，一再干扰格赖费尔特办事处下令进行的运送措施。最高统帅部的经济军官们，也呼吁希姆莱放慢移民进度。在但泽，福斯特公开讽刺——据当地保安警察督察员报告称：“使用了极其玩世不恭的口吻”——某些理论家（“十分清楚，他完全是指党卫队集团”）对民族政策一窍不通。总督辖区政府则在致总理府的紧急信中表示不满说，易地安置政策将逐渐变得“有害无益，并以其灾难性的严重后果也令人难以忍受。”1940年6月25日的一封信还说，将易地安置的波兰人源源不断运进总督辖区，导致了“粮食供应情况异常紧张”。

希姆莱眼见各条战线上都有竞争者、妒嫉者和批评者挡道，因而唯一指望能出现一个奇迹，给他带来新的活动自由。阿道夫·希特勒提供了这个奇迹：1941年6月22日，德国所有电台一致报道，德国师开始了对布尔什维主义世界敌人的十字军讨伐战役。

东方战争的继续，对俄国进行的征伐，给希姆莱的事业心开拓了新的和日益广阔的用武之地。曾经受阻于福斯特和瓦格纳、科赫和戈林因而未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希姆莱可以在无限辽阔的俄国土地上做到了：开拓新的、无边无际的移民区。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领袖们利令智昏，为几乎一望无垠的草原和莽莽森林所陶醉。这些党卫队设计师们被俄罗斯辽阔广袤的土地弄得头脑发昏，开始取出他们的绘图板，描绘出美妙的未来幻想的图画，一幅怪诞、臆想、病态的图画。

290

早在1941年1月，希姆莱就在韦韦尔斯堡的一次会议上，向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埃里希·冯·德姆·巴赫-齐列夫斯基透露，伟大的德意志东方计划要求消灭三千万斯拉夫人。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三处B组集中了民族事务专家，设计德意志人未来的东方之国。

他们的美妙设想成文后称之为“东方总计划”，其中规定：德意志人要在沿列宁格勒——拉多加湖——瓦尔代高地——布良斯克——第聂伯河曲一线内的整个东方地区移民。必须将三千一百万异族人迁走，移民区内可以留下一千四百万人，但必须在三十年内实现德意志化。总督辖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应该彻底“更换居民”。应将两千万波兰人中的百分之八十五和百分之六十五的西乌克兰人迁往西伯利亚的西部。他们必须腾出地方，给迁来的德意志人定居，首批八十四万名“紧急移民”，随后第二批一百一十万德意志移民。在以后的十年中，德国中央保安局估计移民人数为二十万，再后的两个十年为二百四十万。

可是，为数有限的这么一点人，怎能对付光在数量上就占优势的异族人民，并做到希姆莱提出的必须掌握领导权呢？对此，党卫队区队长、柏林大学农业和农业政策学院院长、移民和空间规划制定者康拉德·迈尔-赫特林格教授作了书面回答。这位党卫队教授在1942年5月28日致全国领袖的一份备忘录中，勾画了德意志主宰民族梦想之国的轮廓：在东方辽阔的土地上划定所谓的移民特别区，直属党卫队全国领袖统治，由他作为未来东方领主管所有特别区的移民，并将其分别定为不同类型的“短期领地”、“世袭领地”和“特权产业”。由党卫队全国领袖委派的“特区头目们”对移民特别区进行监督，经过二十五年的创业之后，各特区的居民必须有一半是德意志人。迈尔-赫特林格首先设计了除全盘德意志化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波兰以外的三个移民特别区：列宁格勒以西地区（因格尔曼兰）、克里木-赫尔松地区（“哥特区”）、梅梅尔和纳雷夫地区。同时在德意志东方殖民帝国内建立一个有二十六个据点的体系。这些地区的异族居民暂时只有百分之三十德意志化；根据地确保“大德意志的生命线，在生命线的交叉点上建立两万左右居民的小城市，周围直径五至十公里内设置德意志村

镇”，希姆莱这样说。

全国领袖兴致勃勃。在这里终于出现了他过去梦寐以求的世界：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人保护之下的农民防御移民区。“克尔斯滕先生，您想想，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想法啊，”他对知己朋友吐露了倾吐真言。“这将是举世无双的最伟大的移民事业，同时又和防御亚洲人入侵西方世界这一最高和最迫切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他反复拿出标明农民防御移民区的地图和计划，不顾疲劳地向保健医生解释农民防御移民区的概貌：这儿是一片有三十至四十个农民点的农村，那儿是领导人居住的院子，它的四周围是农民防御村，那边是由全体男性居民组成属于党卫队的农民防御突击队。克尔斯滕一边听一边记下希姆莱的话：“我们将在这里培养出一种您从未见过的防御精神，它将确保我们建立起坚不可摧的堡垒。”

希姆莱已经物色了愿将全国领袖的幻想变为现实的党卫队领袖：卢布林党卫队兼警察领袖、旅队长奥迪多·格洛波斯尼克。格洛波斯尼克是科班出身的土木建筑工程师、希姆莱手下最缺乏教养和性格最暴躁的部属之一，出于种种原因以苦干、勤奋博得了全国领袖的好感。他应该感谢希姆莱，是党卫队把这个老纳粹分子和的里雅斯特骑兵上尉的儿子吸收加入集团，尽管连那个心眼并不狭窄的全国司库施瓦兹也把他列为党内最讨厌的知名人物：1933年，格洛波斯尼克是纳粹党副区领袖，因谋杀维也纳一个珠宝商而逃到德国；1939年，格洛波斯尼克任纳粹党区领袖，由于套购外汇被撤职。他以顽强蛮干来弥补社会声望的不足。党卫队中央人事处给他写了这样的操行评语：“他的鲁莽性格常常使他越规和不顾集团内部的限制”。

这个后来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格洛波斯尼克，是同希姆莱如出一辙的种族优生学庞大规划的信徒，他在自己管辖的卢布林的东南方，发现了过去德意志移民的痕迹。这一发现启发他制定出

开辟一个新的德意志移民区的计划：“放逐”所有波兰人，在每一个县安排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同德意志移民定居——格洛博斯尼克计划先从查莫什奇、托马舒夫和赫鲁比斯措夫这几个城市做起。

292 这位旅队长当然也知道，总督弗朗克将不会同意这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它必将进一步恶化波兰的灾难性的经济和交通情况。然而格洛博斯尼克正希望弗朗克和希姆莱之间必然要发生的争夺。他把计划送给全国领袖看，希姆莱一拍即合。他看了看地图，立即明白格洛博斯尼克的试验区就靠在一片长方形的地带，希姆莱正打算把这片地带作为党卫队推行自己的移民政策的重点。

这片长方形地带位于卢布林、日托米尔、文尼察和伦堡之间。其中每一处都标志着党卫队积极进行活动的高峰：卢布林是格洛博斯尼克的驻地；日托米尔是希姆莱东征第一阶段建立战地指挥所所在地，同时还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安置所有乌克兰德意志人的移民中心；文尼察位于特兰斯尼斯特里恩的边缘，那里要计划设立另一个德意志移民区；而伦堡这时已是总督辖区属下的东加里西亚首府，掌权者为陶尔斐斯的宿敌党卫队旅队长韦希特尔。最杰出的黑色集团民族政策通、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L·克尔推测说：“在这片两个德国行政区接壤和波兰人—乌克兰人交界的长方形地带内，也许真的有一天要出现一个党卫队之国，如果德国人战胜了俄国的话。”

1941年秋，希姆莱给格洛博斯尼克发出行动信号。显然他过分低估了弗朗克抵制卢布林移民方案的可能性，从而引起了一场无法制止的权力斗争；它再次说明，党卫队要想一手操纵第三帝国的政策是多么不容易。

希姆莱在一次卢布林之行中，不跟总督辖区政府打招呼，宣布查莫什奇县为第一个德意志大移民区，立刻就有一人出来和他



抗衡。在此以前这个人没有显出他对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侵入他的地盘气得火冒三丈，这个人就是纳粹党法律部负责人兼全国指导处成员、中央不管部长、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博士。

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律师弗朗克是对党卫队心怀仇恨，必欲发泄一顿而后快。汉斯·弗朗克是最激进的纳粹领袖之一，他主张取消对法律作出的任何不抱成见的细则说明，他盲目狂热地崇拜阿道夫·希特勒，竟达到了审美家和同性恋爱好者对男性极权主义父辈形象常常怀有的那种顺从的程度。这个魔鬼律师是一位“才华出众而又暴戾乖张的老战士”——美国精神病医师G·M·吉尔伯特这样分析他——，他同样是抱着坚决贯彻领袖纲领的坚定意志来到波兰的。弗朗克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所作演说的要点，全是些令人压抑的迷信强权的狂妄措辞。弗朗克说：“我们要保住总督辖区，我们不会再把它交出去……我坦白承认，有那么几千个波兰人将要失去生命，特别是波兰精神领袖上层……我们将把他们就地消灭。我们也将采用最省事的办法……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在这个地区完成伟大的民族社会主义东方使命。因此目的并不是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法治国……凡是引起我们怀疑的人，均应立即予以消灭。”

293

当然弗朗克聪明过度，不会在哪一天才突然发现，光靠残暴手段是不能实现统治的。他相信，只有把总督辖区变成一个经济发达的模范地区，将德国统治阶层迁入这个地区，并煽动从乌克兰人到卡舒布人这些异民族反对波兰人，才能使波兰人臣服德国。

可是希姆莱的民族政策使弗朗克的方案破灭了。保安警察把一百万波兰人从重新划归德国的地区撵出来，赶入总督辖区，从而严重影响到弗朗克地盘内的粮食基础。移民家希姆莱将三万名居住在总督辖区的德意志族人（总数为九万）迁入划归德国后设立的瓦尔特兰区，削弱了弗朗克设想中的德国统治阶层。加强德意志

民族中央长官开始对戈拉人、莱姆克人、卡舒布人和胡楚人进行德意志化，这些人都是弗朗克计划中作为平衡波兰人力量的零散的民族。更糟糕的是，党卫队部队和保安警察转而毫不留情地迫害真正的或所谓的波兰反抗者，逼使成千上万并无危险性的农民跑进森林，加入游击队的行列。党卫队兼警察法庭一手垄断死刑的宣判，对政府和正常的司法置之不顾。

弗朗克渐生疑窦，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是由希姆莱（戈特洛勃·伯格今天坦率承认确有其事）“委以明确任务，派到克拉科夫来收拾弗朗克的”。在总督辖区的行政工作中，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一种趋势：党卫队和警察的行政管理另搞一套，俨然以弗朗克地盘内的真正统治者自居。

这个处境窘迫的总督怒气冲天，大骂党卫队这伙入侵者。他接二连三上书总理府提出抗议，几乎利用每一次克拉科夫召开“内阁会议”的机会，至少向克吕格尔明话直说谁是总督辖区的主人。“我从未向任何人流露过怀疑，在这里的负责人只有真正尽责，他才能治理这个地区，”弗朗克气势汹汹地对副总指挥克吕格尔说。“因此很清楚，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是我的下属，警察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各区的党卫队兼警察领袖接受行政长官领导。”另一次他说：“任何德国机关都不可以直接或间接插手统治这个地区。只有直接代表领袖的总督才有权发布命令，此外，其他任何人无此权力。”

294 希姆莱的代表们不动声色地听着弗朗克的训诫，他们等待时机给弗朗克国王以致命打击。1941年晚秋，他们认为实现他们目标的时机已到：保安警察查获了一起贪污案，案件也牵涉到汉斯·弗朗克。

华沙总督府机关事务部门负责人、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洛伦茨·勒夫，涉嫌私自出售由他经管的一个皮货栈的货物以牟

取暴利。他被告到克拉科夫党卫队兼警察第六法庭，以鲸吞中饱罪判处无期徒刑。同时，负责办案的党卫队法官京特·赖内克博士的调查员，也发现总督及其家属热衷于谋利，他们显然利用公家交际费报销购买的东西。这一家子特别酷爱皮货。

勒夫被捕后，弗朗克立即关闭了皮货栈，将存货大肆削价出售。党卫队法官赖内克于1941年12月1日报告全国领袖：“总督夫人从货栈取走各种皮大衣（至少十件），数量远远超出了她个人的需要。但总督夫人并未就此稍感满足！因此她又从华沙苹果树公司等取走一件真鼯鼠皮茄克、一件海狸皮大衣、一件麝皮大衣、一件白鼯皮大衣、两件上等羔皮大衣、一件白鼯皮茄克、一件银狐和玄狐披肩，以及其他皮货。据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法斯本德尔交代，在购买这些皮货时，总督夫人的代表（总督府机关人员）干脆规定按进货价的半价左右计价。”

总督本人也善于将其他公物占为己有：弗朗克的家里叫华沙犹太人社团以“特贱价格”（赖内克语）供应钻戒、金镯、金笔、罐头食品、野餐提包、咖啡器具和食品。弗朗克指示把克雷森多夫国营农场的财物和产品运到他在南德的朔贝恩霍夫庄园，包括二十万枚鲜蛋、用一年收获的水果加工制成的果酱，还有床上用品和家具。1940年11月两次给朔贝恩霍夫装运食品。一次包括七十二公斤牛肉、二十二公斤猪肉、二十只鹅、五十只母鸡、十一公斤意大利腊肠、十三公斤火腿香肠和十一公斤火腿。另一次装运八十公斤黄油、五十公斤油脂、十二公斤乳酪、一千四百四十枚鲜蛋、二十公斤咖啡豆和五十六公斤食糖。同时弗朗克还派人把从教堂里抢得的艺术雕塑品、圣母塑像、小天使塑像和圣像运往朔贝恩霍夫的家庭礼拜堂。党卫队法官赖内克提出意见说：“此事构成严重贪污案，其令人羞耻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即……同胞们竟滥用其身为德国高级政治领袖的地位，不断利用战争造成的状况使个

295

人发财致富。”

希姆莱抓住这件事给弗朗克当头一棒。由于这时弗朗克最亲信的部属、腊多姆区行政长官卡尔·拉施博士也因一场贪污丑闻被保安警察搞下去了，党卫队头子认定现在可以迫使对手屈服了。1942年3月5日，这位总督被传登上总理府长官拉麦斯的华丽的专列，出席一个宗教裁判法庭受审。这个法庭的成员除拉麦斯外，还有全国党务书记官鲍曼和希姆莱。全国领袖进行了揭发，他点滴不漏地斥责这位波兰统治者的种种罪行，从弗朗克的连襟海因里希·赫布斯特突然加入瑞典籍一直谈到布里吉特·弗朗克太太的皮货。

弗朗克国王不得不低头屈服，然后才获准回去。代价是：同意任命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克吕格尔为总督府政务秘书，承认克吕格尔同时可以受党卫队全国领袖的直接指示，并答应撤换敌视党卫队的卢布林区行政长官策纳。

可是希姆莱的法庭并未达到它的目的，弗朗克刚一回到克拉科夫，就表示要同党卫队继续争斗。3月10日，弗朗克竟然还胆敢写信给拉麦斯，信中实际上推翻了他华丽的专列上供认的一切。“今天我可以这样说，”他写道，“总督辖区内实行的是一种真正德意志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它足以驳斥最卑鄙的诽谤污蔑。……我首先坚决反对那种只是谴责越来越多的贪污事件的无风不起浪的说法。”

虽然他不得不任命监视人克吕格尔为政务秘书，但党卫队的对手策纳仍留在自己的位子上。弗朗克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他重新开始讲话中或文件中猛烈攻击党卫队和警察。例如，弗朗克授意在内阁会议记录中写道：保安处的报告是“恶劣透顶的密探的产物，跟客观实际毫不相干，纯粹是出于敌视总督辖区政务工作的拙劣产品”。当格洛博斯尼克终于不经克拉科夫政府批准在

卢布林开始驱逐波兰人和迁入德意志人时，弗朗克怒不可遏。他不顾后果地对希姆莱展开了一场第三帝国史上空前绝后的讨伐战。

弗朗克讲了他后来在临死前不久所记述的话：“1942年我终于醒悟过来了。”他在1934年6月30日在施塔德尔海姆审讯监狱时就在脑子里浮现过的事情，他在反对保留集中营斗争时内心有增无已的事情，现在他都感到确信无疑了。这位律师领袖警告德国人提防极权主义国家的毒害。他应德国一些大学的邀请作报告，从一处讲坛赶赴另一处讲坛。柏林、维也纳、慕尼黑、海德堡——受到他告诫的听众们听到了一个从来不曾公开提出的呼声：制止警察和党卫队的专横！

1942年6月9日弗朗克在柏林大学说：“从来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设想不要法律——或反对法律。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不能用强权政治进行统治的；如果没有法律，人民的生活是不可设想的……在一个国家里剥夺一个集体成员的荣誉、自由、生命、财产，将他加以驱逐和判刑，而事前不给予他机会由他对提出的指控表示意见，这是毫无道理的。”

1942年7月1日弗朗克在维也纳大学说：“我将孜孜不倦地用我的全部思想反复证明，企图把警察国家的理想说成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特有思想，那将是极其有害的……有许多人这样说：人道是一种疲惫软弱的东西，同这个时代的强大不协调。我不认为是这样。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们这个国家，必须以这一点作为自己的根本原则，那就是它所采用的方法必须符合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而人道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危害一个国家的。”

1942年7月20日弗朗克在慕尼黑大学说：“为发展我们的民族运动制度的法治教育要求，即使在战争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在我们德国法律是无保障的。法律是我们

人民的人身保障……促使国家强大并不单靠强权。而残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与强大同日而语……我要说：唯有无惧于法律的人才**是强者。**”

1942年7月21日弗朗克在海德堡大学说：“绝对不能搞警察国家，绝对不能！我反对这一点。因此我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德国律师领袖，有责任反对这种经常不断对法律和律师施加种种辱骂。我反对仅仅出于厌恶不满和吹毛求疵，就对一种情况进行攻击和辱骂。”

知情人都屏息不语。现在，毁灭性的打击要落到这个自找死路的、对党卫队开炮的弗朗克头上来了，现在，再也没有任何力量 and 任何人可以挽救这个希姆莱的挑战者了。打击开始了。“领袖，你也保护保护律师吧！”弗朗克发狂地站在讲台上大声疾呼。希特勒作出了回答：他将弗朗克从所有党的机关踢出去，并解除了他的部长职务。1942年8月24日，弗朗克提出他的波兰总督辞呈。

可是说来也怪：也许是由于对老战友的勇气表示敬佩，或者是独裁者不想让警察机器过分得势——汉斯·弗朗克依然留在克拉科夫的职位上。1942年如此，1943年如此，1944年还是如此——他始终留在那里，直到踏上纽伦堡绞架的道路。希姆莱终究未能抓到独霸波兰的大权。相反，倒是弗朗克的党卫队对手们自己栽了跟斗。1943年秋，奥迪罗·格洛布斯尼克所干的肮脏勾当，举不胜数，他被希姆莱从反弗朗克的前沿阵地上调走；同年秋天，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克吕格尔随后也被调走，他早已感到自己会取地位摇摇欲坠的弗朗克而代之。

海因里希·希姆莱必须挽回声誉上的损失。领袖很少给他时间考虑。他已召唤希姆莱去担负一项新的任务。对于这项任务，波兰的灾难只是一场情节平常的序幕而已。等待党卫队全国领袖去进行的，是历史上最残酷的刽子手行径：消灭欧洲犹太民族。

## 第十三章 最后解决

298

1941年11月11日，保健医生费利克斯·克尔斯滕在日记中写道：“希姆莱今天心情特别沉重。他从领袖办公厅回来。我给他按摩。经再三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之后，他说人们正计划消灭犹太人。”这是希姆莱的亲信又是按摩医生第一次听到说“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克尔斯滕（“我大吃了一惊”）当即想表示断然不同意这种可怕的计划，可是平素一向健谈的希姆莱显然不想多说什么。

此后不久，克尔斯滕继续作了一次新的努力。11月16日他写道：“近几天我一再试图跟希姆莱谈及犹太人的命运问题。但他一反常态，只听不讲。”直到一年以后，即1942年11月10日，希姆莱才变得又喜欢讲话了。希姆莱说：“唉，克尔斯滕，我是根本打算消灭犹太人的。我原来的想法完全不是这样。可是整个事情都坏在戈培尔这个人手里。”接着他谈到：“几年前，我奉领袖的命令把犹太人撵出德国，允许带走他们的资财和动产。我采取了行动，对我手下违法乱纪的行为，凡是告到我这里来的，我甚至都给予了处分。但有一点毫不容情和不可动摇：犹太人必须离开德国！直到1940年春天，犹太人还可以安全地离开德国。之后，戈培尔就占了上风。”

克尔斯滕问道：“戈培尔怎么啦？”

希姆莱答道：“戈培尔的看法是，只有将所有的犹太人消灭干净，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只要还有一个犹太人活着，这个犹太人就始终要与纳粹德国为敌。因此不能对犹太人讲任何宽容和人道。”

在勤于写日记的克尔斯滕笔下，他所记述的同希姆莱的谈话，和许多同时代的人、特别是后一代人描述的所谓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形成史是不同的。消灭欧洲犹太人和党卫队的历史紧密相联，看来它将是人类多少个世纪都不会遗忘的唯一的的事件，只要提及党卫队这三个字的话。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误的设想，以为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罪行的凶手，也就是罪行的主要策划者。

299 第一任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战后凭空臆测，最后解决犹太人是1942年“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想出来的”；前外交部首席译员保罗·施密特同样认为，“‘最后解决’犹太人是海德里希、希姆莱和施特莱彻三人小组出的主意”。甚至熟悉史料的历史学家们也接受这种论断。撰写历史的莱昂·波利亚科夫说，在纳粹干部中，海德里希是早在战争爆发前就设计了消灭犹太人的第一个人，波利亚科夫的美国同行亨利·A·蔡格甚至断言，只是在听了海德里希灭绝欧洲所有犹太人的方案之后，希特勒和戈林才于1940年作出最后解决的决定。

这种说法缺少具体证据。实际上它只是基于这样一种肤浅的论点，即把几百万犹太人投入疯狂屠杀的血泊之中的这些人，不可能是由和平公民一夜之间变成集体屠杀刽子手的——换言之：在消灭犹太人的命令尚未发布之前，党卫队就已拿定主意，执意要消灭犹太人。然而种种证据和这类看法相反，从这些证据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屠杀犹太人的决定是党卫队领导机关以外的地方作出的。截至1941年初夏——估计这可能是希特勒作出决定的时间——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党卫队组织的文件提到要从肉体上消灭欧洲犹太人。在臭名昭著的1940年5月“处理东方异族人”备忘录中，希姆莱还拒绝“采用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因为这是非日耳曼式的和不可能的。”

希姆莱在思想上起了主导作用的论点之所以完全站不住脚，



是有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希特勒最后解决的决定，破坏了党卫队曾经眷恋多年的另外一个方案。党卫队的方案是，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即美其名的所谓移民出境。不论党卫队推行原定的这种对犹政策如何残暴，直到战争爆发时为止，它并未想到考虑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对党卫队领导机关的犹太问题助理们来说，再没有比反犹的纳粹党区领袖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及其《冲锋队员》周刊赤裸裸地煽动屠杀更使他们恼怒的了。

自从党卫队成为领袖专政的最重要的工具起，党卫队内举足轻重的人士宁愿采取一种多少有别于纳粹党的庸俗反犹主义的对犹政策。不言而喻，党卫队也受到非人道的教义的影响，把犹太人说成是一种敌对种族，一种邪恶的准则，因为按照党的首席法官布赫的说法是：“犹太人不是人，是一种堕落的形象。”

当在经济危机年代破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子弟涌入党卫队时，反犹主义更加变成了党卫队不可动摇的教义的真谛，这两个阶级出于单一的反犹主义世界观，把犹太人看成是造成经济灾难的真正根源。穿上党卫队衬衫的资产阶级子弟和他们的父辈们抱有相同的、略带社会主义色彩的反犹主义，但对他们的思想来说，更主要的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仇犹感；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说，持这种论点者认为，英国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1809—1882年)所发现的自然淘汰、生存竞争的法则，也可运用到国家政治这个领域中来。

再没有任何一个纳粹党的其他组织象黑色集团这样陶醉于照搬达尔文所继承和发展的信念，即通过精选可以改进和提高一个民族的良种。党卫队种族神秘论者心目中的良种只有一种：北欧日耳曼人种。这种在政治上运用的生物学，给达尔文的生存竞争概念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对于这位英国人来说还只是自然界的东  
西，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要用极权主义国家的强制手段把它人

为地加以确定；较强大和较优秀的种族有权消灭弱小的种族。

文明国家的每项社会政策的目标都向反面转化。国家为保护其他种族中的少数民族、弱小者和受害者的应尽任务似乎并不能持续多久。现在却只是加强“优秀血统”和消灭所谓不适于生存的分子了。在党卫队队员看来，民族不再是正在成长中的人，而是——按历史学家布赫海姆的提法——“分布不合理和杂草丛生的庄稼，必须经过一番整顿，方法是消除变种，使‘起解体作用的媒介物’不致为患，增加良种和淘汰劣种”。

早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已把种族概念列为他们考虑的中心了。生物学家威廉·沙尔迈尔在1903年提出了一种“生育精选”法，认为通过对夫妇配偶实行种族优生学控制、婚姻限制法、禁止劣等人生育，可以培育出优秀种族的成长。谁还看不出这就是希姆莱所搞的血族宣誓、结婚需经批准以及种族优生学调查那一套种族浪漫主义呢？希姆莱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唱的是一个腔调：“如果攸关我们兴衰的这个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血统不能依靠这个优秀血统得以扩展，我们就统治不了地球。”

由此也可看出，党卫队世界观特有的一点，即它对犹太人的敌视，系由两方面结合而成的：从经济上立论的反犹主义，和以种族为重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犹太人变成了一种异己分子或劣等人的象征，优秀种族必须同它势不两立，进行斗争。希姆莱声称，反犹十字军战役、“人和劣等人之间的斗争”，乃是“自然法则，有如人类同任何一种病疫作斗争，如同黑死病菌危害健康的肌体一模一样。”<sup>301</sup>连篇累牍的敌视犹太人的教育报告灌输给党卫队，在任何场合都有人谆谆教诲：犹太人是一种异体。1936年的一份发给各党卫队各部队的统一报告宣称：“犹太人是寄生虫。它在哪里繁殖，哪里的民族就要死亡。从洪荒时代直到今天，犹太人名副其实地杀害和毁灭了他的所有宿主，只要他有力量做的话。如果说我们

把犹太人从我们民族肌体内清除，那么这是一种自卫行动。”

但是应该怎样“清除”犹太人呢？这是纳粹反犹太主义者们的中心问题，民族社会主义营垒里的智囊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各持己见。以担任保安处指挥职责为主的这批年轻知识分子，明确表示厌恶党的机关主张砸烂犹太人的粗野方案。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知道他们是**不想**这么干的。他们不愿取纳粹党区领袖施特莱彻及其《冲锋队员》周刊所推行的“冲锋队员办法”，即出于经济和性欲仇恨与眼红嫉妒相混杂的动机而煽起迫害狂，因为它会最终导致激发最低级的反犹本能和剥夺犹太人的一切生存权利。

对于想要和“明智的”纳粹分子一样激进的保安处的知识分子来说，似乎敌视犹太人的这种方式才是一种“损害我们的反犹太主义”——这是《黑色团》一条通栏标题的提法。保安处领袖们认为，煽动街头反犹是蛮人的愚蠢行动；他们表示异议说，谁砸犹太人的店铺，谁就损害了新德国在世界上的声誉，而根本不会有助于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人们在1935年6月5日《黑色团》上读到：“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国家坚决反对这些罪恶阴谋。党不能容许自己争取民族神圣事业的斗争，被篡改改为街头骚动和毁坏财物。”

保安处分子们过于文质彬彬，以致不满于党的低级反犹太主义宣传。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行事，他们定会砸掉反犹宣传的，因为他们认为，根本关键是用一种冷静的合理方式解决所谓犹太人问题。民族社会主义反犹狂的某些作品被他们用红铅笔删掉了。1935年秋，柏林保罗·施密特出版社出版了一份传单，把阿比西尼亚战争的责任栽到犹太人头上。人们将传单折叠起来，就可看到一幅犹太人脑袋的讽刺画。这时秘密警察II处2科B组在日志中记道：“传单内容纯属胡言乱语。警务参议赖因克（柏林国家警察局）接到电话指示，立即采取措施没收传单。”

《郇山博士》记事录是一切反犹宣传家的强有力的武器，连它  
302 也得不到保安处检查人员的宽容。在普通党卫队学习班中，它始终被看成是疯狂反犹主义的遗墨，是所谓给半瓶醋的党卫队员准备的精神食粮，保安处第一任犹太问题助理、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埃德勒·冯·米尔登施泰因干脆将其称之为“胡说八道”。1938年7月21日，保安处犹太问题专家、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赫伯特·哈根说，霍赫穆特出版社出版的书，“除了拾《郇山博士》记事录的牙慧外”，都是些不必担心有害的作品。对经纳粹党中央出版社出版的鲁道夫写的小册子《犹太人明镜》，哈根记道：“他〔作者〕以其过分的热情也看到了犹太人的事业，那是一种自然的和精神的发展，即使没有犹太人的作用，这种发展也将导致……某种结果。”

保安处的专家们也不因为纳粹干部们中显要人物的推荐而改变自己拒绝阅读过分拙劣的反犹作品的态度。《冲锋队员》主编恩斯特·希梅尔写的青年读物《毒蘑菇》，是施特莱彻营垒中最臭名昭著的产品，博得了赞扬备至的夸奖。纳粹出版部门头儿阿曼说：“德国男女少年必读之物。”冲锋队参谋长卢策说：“这本书〔是〕一枝独秀，……对进行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教育具有启示作用。”纳粹党区领袖韦希特勒说：“这也对将来德国人对待犹太人持正确态度有了保证。”反之，保安处的评论是严肃的：“对众多评论家的看法未便苟同，因为这本书除客观方面不值一谈之外，连文字也不通顺，因而此间认为不适于作为孩子们的读物。”

但是，在后来任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的莱奥波尔德·埃德勒·冯·米尔登施泰因于1935年夏开始提出党卫队自己的犹太人政策以前，保安处中坚派明显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未公开暴露出来。海德里希对这个生于布拉格的科班出身的工程师兼漫游世界的旅行家冯·米尔登施泰因以他写的一篇巴勒斯坦之行

的报道引起了注意。他的这篇报道于1934年秋发表在柏林纳粹党机关报《进攻》上，冯·米尔登施泰因在报道中非常客观地描绘了一个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之未来前景。

这个三级突击队中队长，跟他的笨拙的助手阿道夫·艾希曼或是那个保安处中央科长赖因哈德·赫恩一样，原先并不是反犹主义者，后者于1929年还在一本著作中称反犹主义象“传染病似地猖獗”。埃德勒·冯·米尔登施泰因有权称自己为犹太复国主义头面人物的朋友，他定期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会议，在会上，他认为只有移民巴勒斯坦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个想法使他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站在一起。他幻想纳粹的反犹主义可能而且将会促进移民巴勒斯坦。党卫队应对此予以协助，因为冯·米尔登施泰因知道，党卫队领导对纳粹党大搞蛮横无理的、各搞一套的犹太人政策持批评态度。

对于应该如何具体贯彻反犹主义，党永远也作不出最后的定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任何对反犹主义立法的具体指示避而不谈，纳粹种族问题专家阿希姆·格尔克在1933年表示，“要订出计划总还为时过早”。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则权且提出一种说法，即必须将犹太人“作为生活在德国的一个民族而加以承认”，但排除在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导职位之外。而党卫队旗队长、后来担任全国卫生事业领袖的康蒂博士甚至声明，新德国谴责任何种族仇恨，犹太人“不是劣等种族，而是一个异族”。303

历史学家们后来满足于把纳粹这些互不一致的公开说法，看成是形形色色的伪装，认为其用意在于掩护一场由中央策划的、逐步升级的灭绝战。谁把第三帝国的行动看得如此计划周密，谁就会看不到民族社会主义统治的罕有的缺乏结构和矛盾重重的特点。上述这些说法是反映了党内形形色色反犹主义派别的见解，其中主要至少有三派：一是民族运动派，这一派主张限制犹太人

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但允许他们在经济方面合作共事，几乎不加以任何限制——这一派的领导人物，有纳粹党种族政策局局长瓦尔特·格罗斯博士，和中央内政部种族问题助理、部务参议伯恩哈德·勒泽纳博士。另外两派是，以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为中心的神秘的纳粹反犹太主义者和种族问题理论家，以及以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和后来参加进来的约瑟夫·戈培尔两人为首的色情描写和患神经官能症的反犹太主义者。

从1933年以后德国犹太人的惨痛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些不同的纳粹派别，各自在德国对犹政策中起过哪些决定性作用。

在纳粹上台后的开头几个月中，施特莱彻的反犹太主义决定了政权的反犹措施。1933年3月对犹太人采取的血腥暴行，4月1日发动的不向犹太人商店购买商品的抵制活动，禁止犹太人当公务员、行医、司法，犹太人商店最初的亚利安化，不许犹太人进浴室、音乐厅和艺术展览会——所有这些措施，都是由施特莱彻亲笔签署的。

1934年反犹恐怖处于低潮。指挥反犹的是适可而止的反犹太主义者，如同纳粹法学家领袖汉斯·弗朗克所说，政权有意“在继续反犹斗争中稍事告一段落”。犹太同胞感到有了新的希望，1935年5月9日《人民观察家报》已报道，几乎有一万名逃离德国的犹太人又回来了。

304 但是，就在1935年，敌视犹太人的摆锤又无情地荡了回来。这一次是约瑟夫·戈培尔说了算。“我们再也不要犹太人了！”他在1935年6月29日的一次演说中这样叫嚣，并驳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关于犹太人同样是人的愚蠢和荒谬说法”。德国犹太人的生存空间在一步步紧缩。柏林库尔菲尔斯特大街发生了激烈的反犹暴行，规定犹太人必须退出国防军和劳动服役部门，出现了新的告示牌：“犹太人不受欢迎”——最后颁布了德国历史上最

不光彩的法律——纽伦堡法律，它宣布德国犹太人是一群贱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任何交往均属政治罪行。

不论如何，一年后——1936年——反犹太主义者的铁拳再次松弛了。暗中对犹太人进行的诽谤和口诛笔伐并未停止，但这位如今起决定性作用的和毋宁说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早就属于民族运动反犹太派的四年计划主持人赫尔曼·戈林，对犹太人完全被逐出经济领域显然有所犹豫。

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莱奥波尔德·冯·米尔登施泰因试图结束党内反犹太主义派别的这些搞法，采用他认为唯一可以确保合理和长期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措施：把所有犹太人移民出境。这个想法不是什么新创造，只是由于其他国家不愿大量接受移民，一再遇到阻挠而无法实现。因此，保安处领导计划将五十万零三千名德国犹太人，通通迁往党卫队领袖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致认为的新老犹太人的祖国巴勒斯坦。

可是，莱奥波尔德·冯·米尔登施泰因的巴勒斯坦计划遇到了一个困难。德国犹太人仅有少数表示乐意去巴勒斯坦。1933年，第三帝国外移的犹太人中约有百分之十九去巴勒斯坦，后一年上升为百分之三十八，这是唯一的高峰，此后就一直下降：1935年为百分之三十六，1936年为百分之三十四，1937年为百分之十六。广大德国犹太人尽管受压，横遭诽谤、恐怖，仍然坚持犹太教信仰的德国公民中央联合会机关刊物《中央联合会报》的观点：“我们将善于用尊严和勇敢，在自己的乡土上承受德国人对德国犹太人采取的无情的措施。”

诚然，除了这些多数犹太人以外，还有一小批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在活动，他们试图改变德国犹太人传统的德意志爱国主义思想。他们起初并未意识到民族社会主义上台就是灾难，而认为是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回到犹太国家和恢复犹太人

的民族感。他们出奇地醉心于德国反犹主义者的胜利，同时把这种胜利看成是西方启蒙的犹太主义的失败，西方启蒙的犹太主义  
305 所希冀的，无非是被同化为非犹太人的主人民族。当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周报》在希特勒上台后宣布：“一种世界观崩溃了，我们不想为它叹惜，而是放眼于未来”，当时几乎响起了一片欢呼胜利的声音。

有的人开始时心驰神往，以为 1933 年 1 月 30 日，是犹太人历史上一个有利的转折点，从此“犹太人”可以回到“自己的犹太主义”去了。这句话出现在年轻的犹太法学教师约阿希姆·普林茨博士的一篇文章《我们犹太人》中，第三帝国德国犹太主义编年史作家汉斯·拉姆认为，该文是“对反犹主义现象作出一种古怪的、差不多是辩护性的解释”。普林茨写道：“面对这个犹太人问题，再也没有任何回避的余地了”；为从寄人篱下的境地中求解脱，犹太人被迫“隐姓埋名和否认自己信奉犹太主义”，这是不利于自己的。因为“这样隐姓埋名，在那些总能认识犹太人的人中，引起了陌生和不信任的紧张心情。”可是如何摆脱这种犹太悲剧呢？道路只有一条：去巴勒斯坦。普林茨说：“再也没有容纳我们的避风港了。我们希望采用新的办法以取代同化：自己承认是犹太民族和犹太种族。”

对犹太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多么诱人的诱惑力啊，依靠德国种族主义帮助并在其压力之下，取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胜利，而这种思想在魏玛共和国人道和民主的气候下都始终未能赢得胜利！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哪里以种族和民族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准绳，哪里也就必然会搭起一座沟通双方的  
306 桥梁。早在 1933 年 6 月 13 日，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喉舌《犹太人周报》就公开声明：“犹太复国主义承认存在犹太人问题，并愿采取宽宏大量和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为此，它准备争取各



国人民包括对犹太人友好和敌视犹太人的人民的帮助，因为它认为这不是感情用事，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各国人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都是关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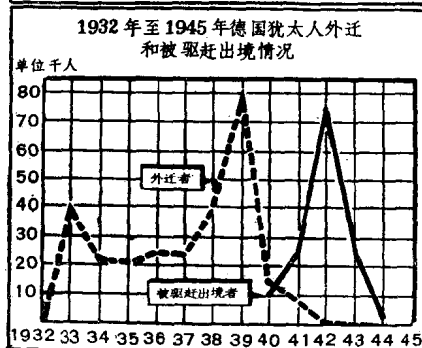
莱奥波尔德·冯·米尔登施泰因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保安处必须使已同化的德国犹太人恢复成为“自觉的”犹太人，必须鼓励“拒绝同化”，以便唤起尽可能多的犹太人积极去巴勒斯坦——这是(当时)还允许大批犹太人入境的唯一地区。希姆莱详细了解了米尔登施泰因的计划，命令他着手进行工作。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在保安总处设立了一个犹太事务科，取名II处112科，开始了党卫队自己的对犹政策的时代；汉斯·拉姆高兴地把这一政策称为“采取或表示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

党卫队的新政策刊登在《黑色团》的版面上，《黑色团》的反犹攻击，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冷静、毫不感情用事的犹太人”面前突然刹车了。“巴勒斯坦能够重新接纳它流放达一千多年之久的儿孙们的时候为期不会太远了，”党卫队机关报这样预言说。“我们希望怀着国家的善意为他们送别。”

保安处加紧进行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工作，虽然暂时还只是由秘密警察和中央内政部出面主管其事。从1933年到1937年期间，有

### 德国犹太人的命运

1933年犹太居民人数：	<b>503000</b>
1933年至1945年外迁人数：	<b>270000</b>
其中迁往美国：	90000
迁往巴勒斯坦：	50000
被杀害人数：	<b>170000</b>
(包括外迁至战争中 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中的受害者)	
1933年至1945年死亡过剩人数：	<b>72000</b>
(死亡多于出生，不包括被杀害者)	
1945年犹太居民人数：	<b>23000</b>
所列数字均指1933年德国境内的犹太居民	



二万四千名犹太人得以迁往巴勒斯坦；现在保安处进一步施加压力，促使愿意外迁的犹太人出境。犹太事务科长冯·米尔登施泰因鼓励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举办转业训练营，训练犹太青年准备去巴勒斯坦参加基布兹<sup>①</sup>，从事农业生产。他很重视抓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工作，指示自己的犹太事务科绘制出大地图，标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德国犹太人中积极开展活动的进度。

307 II处 112科的人员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每一个成就当作自己的成就，也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失败看成保安处的失败。II处 112科不无骄傲地写道，首先需要纳粹掌权执政，才能“有一部分德国犹太人重新回返犹太民族主义”；同时也以近乎遗憾的口吻灰心地指出，“很大一部分目前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只是‘假犹太复国主义者’，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并无真正的联系”。保安处有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观察员失望地记下了反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的各种活动，例如，主张同化的“犹太人前线军人全国同盟”的体育运动联合会，它拥有“犹太体育运动界在人数上和活动能力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根本没有一种令人高兴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一再表明，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在一大批犹太青年当中远未扎根”。

犹太复国主义观察员中有一个年轻的党卫队员，他曾因在保安总处所在地威廉街官约翰尼斯大厅一个窗框上张贴共济会地方组织的旧会章，当场被党卫队头头抓住，改调犹太事务科工作。这个人工作勤快出奇，引起每一个上级的注意。三级小队长阿道夫·艾希曼1906年生于佐林根，随父母移居上奥地利，先在一家矿山当矿工，任电工器材商和石油器材代理商，偶然来到德国，干了一阵子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后，进入了保安处。他通常把所有党卫队领袖看成高人一等的人物，只要上级走进会场，他就霍地

---

<sup>①</sup> 以色列居民合作社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译者

跳了起来，站得笔直，经常都是这等模样。莱奥波尔德·冯·米尔登施泰因正是很需要这么一个积极分子。他问艾希曼是否愿意到II处112科工作。艾希曼把胸脯一挺点头同意，虽然他说不出为什么偏偏要干犹太事务工作；但后来阿道夫·艾希曼倒坦白承认：“那阵子叫我干什么，我都会说愿意和阿门，只要不追究贴会章的事。”

从艾希曼的身世中找不出任何反犹太主义的踪迹。他曾经长时间拿不定主意，究竟是加入共济会地方组织，还是加入党卫队，同样他也不知道犹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犹太人，他的成见并不比其他同事多一些，而是更少一些：他的亲友中就有一些犹太人，他有一个犹太女友，多亏了犹太人的帮忙他才能从事商业生涯，而且干得不错。尽管如此，在米尔登施泰因的庇护下，他迅速变成了反犹太主义专家，并很快成为犹太事务科不可缺少的助手，而冯·米尔登施泰因则由于属非正统派，不讨希姆莱总部的喜欢，干了十个月差事后离开了保安总处，后来到外交部工作。

艾希曼在II处112科负责抓“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他经常口 308  
不离希伯来语词汇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字眼，说来令人深信不疑，以致保安总处纷纷传说，艾希曼是个老资格的巴勒斯坦德国人，深深了解该地风土人情。其实他是靠开夜车，发狠钻研特奥多尔·黑尔茨尔<sup>①</sup>的《犹太国》和一本希伯来文课本，强记硬背了几个急于应用的词汇而已。反正这点知识也够得上插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党派的事务了。为时不久，艾希曼写了一份备忘录《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于1936年10月印发给党卫队领导机关，作为阅读材料。在这项工作中，艾希曼同冯·米尔登施泰因的继任者、记者和党卫队二级小队队长赫伯特·哈根，第一次意识到，党卫队鼓励犹

---

<sup>①</sup> 特奥多尔·黑尔茨尔(Theodor Herzl, 1860—1904)，出生于布达佩斯的犹太作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首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犹太国》一书作于1896年。——译者

太复国主义移民出境的计划，正在走向困境。

在这两位党卫队队员面前，出现一条他们永远也无法完全逾越的思想鸿沟。所谓困境是指，一方面他们要把所有的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那里可能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犹太人国家。艾希曼在1936年写道：“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工作隐藏着一种日益扩大的危险：一个强大的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世界犹太主义将作为德国的敌人……而永远存在；一个强大的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将构成它的斗争的基本因素。”这还不是全部危险所在；犹太复国主义势必要向自己营垒里的德国反犹主义挑战，这个时刻的来到，也就是在巴勒斯坦出现一个犹太人国家并将德国犹太人置于其庇护之下之日。犹太事务科长哈根对此的看法是：“不言而喻，德国不能同意建立这样一个畸形国家，否则有可能出现这么一天，即它的所有无国籍犹太人将加入巴勒斯坦国籍，以便进而作为〔所谓的〕少数民族要求在德国政府中拥有代表资格。”

哈根和艾希曼象后来任保安处领袖的脾气古怪的奥托·奥仑道夫，不愿承认犹太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因此他们只是模糊地寄希望于巴勒斯坦的英国委任统治政权决不允许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是，对此是否确有把握呢？保安处决定进一步严密监视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活动。

保安总处命令谨慎掌握“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ZVfD）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黑夏卢茨”的所有行动计划。“特别要求严密监视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中央——柏林西区迈因内克街10号，电话号码J19031——的工作，”保安处的一项密令中这样说。对于“黑夏卢茨”，II处112科指示：“尽力监视‘黑夏卢茨’及其附属组织的转业训练营的工作；这就是说，要掌握参加这种学习班的人的姓名。学习班……结业后，应查明这些参加者是否确实离境外迁，如果他们居住于本大区内的话。”

但哈根和艾希曼并不满足于控制德国国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他们要想详细了解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可能性，他们就必须打入犹太复国运动的神经中枢。

冯·米尔登施泰因的一个老朋友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商人奥托·冯·博德尔施文格同巴勒斯坦一派德国人有联系，冯·博德尔施文格是党员、保安处情报员，长期从事汽车买卖。这些巴勒斯坦德国人也附带做些情报工作，捞些外快。他们中间的一个是“德通社”驻耶路撒冷记者赖歇特博士。而赖歇特又同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秘密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有接触，这个秘密组织是（除英国谍报局以外）最能勾引起保安处异想天开的机构：哈加纳。

关于哈加纳，艾希曼在1936年就写道：“所有参加ZO〔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党派和协会，都受一个中央自卫和监督机构统一控制，这个机构在犹太人政治生活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该机构名为‘哈加纳’〔=自卫〕。”它不仅是犹太移民的武装保卫组织，而且也有一个分支机构众多的情报机构。这支地下军领导班子的成员之一，是1900年9月11日出生在波兰的会计检查员法伊费尔·波尔克斯。此人不时给赖歇特博士提供情报，以取得酬金。他在哈加纳内任指挥官之职，负责——哈根记道——“领导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整个自卫组织”。

II处112科表示对这位哈加纳指挥官颇有兴趣，于是这个以色列人在1937年2月启程来柏林。2月26日，阿道夫·艾希曼在柏林欢迎他的犹太客人，党卫队一级小队长两次招待这个哈加纳分子，第一次是在动物园附近的“葡萄”酒家，第二次宴席间波尔克斯作出答谢：他邀请艾希曼访问巴勒斯坦。无疑这位巴勒斯坦使者不是一名普通的情报人员。他向艾希曼声明，他的使命是促进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使犹太人在自己的故国能取得压倒阿拉伯人的优势；为了这个目的，他和英、法两国情报机关合作，他也愿意

同希特勒德国合作。

“他也将大力支持德国在近东的外交利益……如果德国放宽去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外汇条例的话，”艾希曼的犹太事务科在1937年6月17日报告道。保安处定然渐次明白，波尔克斯并不是出于个人动机而来的——他显然代表哈加纳的移民入境政策。因为艾希曼也写道：“作为交换条件，似可向波尔克斯作出下述保证：对在德国的犹太人全国代表机构施加压力，使它保证把从德国出境的犹太人移民全部去巴勒斯坦，而不去任何其他国家。这一措施完全符合德国的利益，并已由秘密警察处采取措施进行准备。”

1937年9月26日8时50分，艾希曼和哈根乘火车前去对慎重宣布的党卫队和哈加纳之间的盟约做加强工作。保安处长海德里希批准同意应波尔克斯邀请访问巴勒斯坦。两位使者草草乔装打扮，起程前往，艾希曼的身分是《柏林日报》主笔，哈根的身分是大学生。

10月2日，“罗马尼亚<sup>①</sup>号”邮船载着两名保安处分子抵达海法港，不料反犹太的阿拉伯人打乱了反犹太的德国人的方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9月底发动了一次新的起义，迫使英国委任统治政权宣布戒严，封锁边境。保安处分子只好和波尔克斯改在开罗会晤。这位哈加纳指挥官表示，要求每月付给他十五英镑的固定薪金，经同意后提供了第一批情报。哈根记述波尔克斯的意见道：“对德国激进的对犹政策，民族主义犹太人士非常高兴，因为这样做将使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人口增加，不久即可望巴勒斯坦犹太人多于阿拉伯人。”

虽然艾希曼认为巴勒斯坦之行的收获“油水不大”，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还是感到，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专家将会带来丰硕成

---

<sup>①</sup> Romania的译音，并非指罗马尼亚这个国名，而是指“罗马帝国”的别称。——译者

果，以致事隔半年进军奥地利后，他们就责成他负责抓犹太人移民出境事宜。保安处也首次正式介入政权的对犹政策。艾希曼从1938年1月起晋升为三级突击队中队长，被任命为维也纳保安警察兼保安处督察员的犹太问题助理。他的任务是千方百计推动犹太人外迁的工作。

在这以前，外迁多少带自愿性质的，现在，艾希曼使用保安警察的强制手段逼迫犹太人外迁，以致名为外迁，实是驱逐出境。这个新提升的三级突击队中队长迷信于组织力量：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有权计划安排和发布命令了。艾希曼想了一个主意。由于警察局、国家机关和党的机构全都来抓犹太人移民外迁工作，出现了工作上的混乱。他想结束这种局面，把所有参与其事的主管部门以及犹太人代表统在一起，成立一个统一机构，办理强制犹太人移民出境；按照艾希曼的说法是“一条流水线，先缴验证书，审查其他证件，然后签发护照”。

这条流水线挂出的招牌是“犹太移民总处”，由艾希曼领导，设在维也纳欧根亲王大街20—22号旧罗特希尔德家族<sup>①</sup>的一幢宅邸里。随艾希曼到达的工作人员都是后来成为推行种族屠杀的使者和执行命令的人：汉斯和罗尔夫·京特兄弟、弗兰茨·诺瓦克、阿洛伊斯和安东·布龙纳、埃里希·拉雅科维奇、施图施卡、赫罗西内克；这批人无一不是残酷无情和干劲十足的驱犹战略家。 311

艾希曼的犹太移民总处用敲诈勒索的手段，开始放犹太人出境。由于奥地利达三十万之众的犹太人没有资产，他们缴不起入境国所规定的最低资金（“入境申报费”）；另一方面，外汇枯竭的纳粹政权又不肯给外迁犹太人以资助，于是富有的犹太人被迫掏腰包，为移民出钱。“我们是采取这种形式来做的，”海德里希解释

---

<sup>①</sup> 罗特希尔德是法兰克福起家的犹太大富豪，主要经营银行业，在欧洲各国均有财产和家族。——译者

他的具体驱犹做法时说，“我们要求愿意外迁的富裕犹太人，向犹太教育团体缴纳一笔钱。问题并不是要搞清楚富裕犹太人，而是要搞清楚犹太坏蛋。”同时，艾希曼还叫奥地利犹太人领袖去国外四处活动，向犹太人救济团体募款资助出境移民。例如，“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在1938年春天就提供了约十万美金。

以这些方法，艾希曼就不难向柏林汇报成绩的数字了。截至1938年深秋止，总处共办理了四万五千名奥地利犹太人离境，在将近一年半时间里，共有十五万犹太人被赶出他们父辈们居住的国土。但是，艾希曼冷酷的强制移民出境的政策，只是在党卫队技术政治家们善于通过平静的驱逐过程使接受移民国家开放边境以及犹太救济团体打开钱箱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成绩。但恰恰这一点，遭到了党内过激派的破坏，这些人本来就不乐意保安处介入对犹政策，他们在1938年夏天又掀起了一次新的反犹运动。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冲锋队员》周刊首先发难。周刊版面上刊载了越来越尖锐的要求：赶走还留在经济工作职位上的犹太人。该刊不断呼吁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反对犹太人，并向“世界头号敌人”关闭它们的边界——艾希曼却致力争取这些国家开放边界，让外迁移民过境。

艾希曼竭力促使这份煽动性的刊物改弦易辙，但徒劳无益。1938年5月底，三级突击队中队长约清正逗留在维也纳的《冲锋队员》周刊主编希梅尔，向他解释党卫队移民工作的具体情况，给客人作了一次“长达两小时左右的方针性报告”（艾希曼语）。这个保安处分子还应纳粹党区领袖施特莱彻的邀请去纽伦堡，以便——艾希曼在一份存档的笔记中这样写道——“借此机会促使《冲锋队员》周刊改变方针”。结果是白费力气。希梅尔写了一篇长达两页的关于维也纳犹太人的文章，明确地告诉艾希曼的上级哈根，“我们认为，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有可能促成改宗转向的看法



遭到多么沉重的失败。”

1938年6月28日，哈根给艾希曼写道：“不过，我感到最荒诞的一点是，他〔希梅尔〕对维也纳众多的犹太人重新信仰犹太教这种过于乐观的事实，附加下述引号中的说明：‘信仰一种承认犹太教法典的教义为最高准则的宗教！允许对非犹太人犯下一切罪行的犹太教法典！’听到这种提法，我就想到：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啊！也许《冲锋队员》周刊有助于这样一种激进的解决办法，即把他们的脑袋砍掉，从而使他们根本不会产生重新承认自己是犹太人这种乐意的想法。”保安处和施特莱彻的关系严重恶化，以致海德里希命令艾希曼再次拒绝施特莱彻的邀请。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西克斯作了记录：“C〔海德里希〕指示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艾希曼，暂以正在休假为由谢绝邀请。”

几星期后，一个更危险的对手加入了反对党卫队对犹政策的行列：中央宣传部长戈培尔。长期以来，他就在等待机会，将政权的对犹政策抓到手；他的宣传机器已作好准备掀起一次反犹新浪潮。

德波两国敌视犹太人的领导者之间的一场隐蔽的战争，给戈培尔提供了可乘之机。1938年10月6日，波兰政府公布一项法令：凡波兰护照持有者如不在本月底前办理好只有在波兰发给的特别签证手续，其波兰护照一律作废。柏林外交部立即看出，这是华沙政府企图一举将众多的波兰籍犹太人推给德国。纳粹政权自有对付办法。10月28日，保安警察处长海德里希下令逮捕了一万七千名波兰犹太人，用闷罐子车皮把他们拉到德波边境。在10月28日深夜到29日凌晨前，第三帝国首批大规模武装押送出境的受害犹太人赶出了边界，站在波兰边防部队的机枪的面前。

处在德波两国警察之间的汉诺威裁缝师傅格林斯潘也感到走投无路了。在巴黎，十七岁的赫舍尔·格林斯潘接到了父亲的噩耗。11月7日，他买了一支手枪，用五颗子弹打死了德国大使馆

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一个犹太人刺杀一名德国外交官员这样的行动，正是约瑟夫·戈培尔求之不得的事情。他的宣传机器开始转动了。11月8日《人民观察家报》气势汹汹地说：“很清楚，德国人民必将从这个新的事实中引出自己的结论。”库尔黑森和马格德堡-安哈尔特两区受纳粹指使的流氓已经在聚众闹事，捣毁犹太人商店。

戈培尔感到这是良好时机：每年11月9日，希特勒最早的老战士们按例要聚集在慕尼黑旧市政厅礼堂，开会纪念1923年的褐色啤酒馆暴动。党内有声望和地位的人士都要出席——到时候，只需这个瘸腿靡非斯特<sup>①</sup>发表一通激昂慷慨的讲话，就能撺掇党的机构对犹太人进行一场决战。其结果是，柏林居民用尖刻的俏皮话将百万块犹太人商店玻璃橱窗被砸成碎片喻为全国晶莹透明之夜<sup>②</sup>。它以可耻的一夜载入史册：一个政权下令群众进行有组织的集体迫害活动。

不过，对希特勒政权的内部历史来说，全国砸玻璃窗之夜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统治的一份教材。象罗姆事件和勃洛姆堡-弗立契丑闻一样，它暴露了那个自称领袖国家的混乱和无结构的政府体制，完全是一片杂乱无章的树丛。它还留下了一个辛辣讽刺的脚注：几年之后推行最后解决的人，都是当年搞戈培尔式突然袭击的反对者。因为，1938年11月9日的行动同时潜在一个因素，即党内反对党卫队垄断对犹政策。当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获悉行动的消息时，它早已开始了，而且在宣传部长操纵下进行好久了，这决不是偶然的。

宣传部长显然在11月9日到了慕尼黑，去煽动老战士们采取

---

① 戈培尔本人是瘸腿，靡非斯特是歌德著名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译者

② 原文为Reichskristallnacht，通常译为全国砸玻璃窗之夜，此处考虑到原文逻辑，特按该词本义译出。——译者

血腥暴行。一桩偶然事件还给他的行动计划帮了忙。老纳粹分子们刚刚在旧市政厅礼堂坐下来共进晚餐，这时消息传来，恩斯特·冯·拉特于下午4时30分伤重死去。“希特勒听到消息后面色非常难看，但不肯象他平素必不可少的那样发表讲话，”慕尼黑警察局长、党卫队副总指挥冯·埃贝施泰因男爵记述亲眼所见时这样说。希特勒和戈培尔把头凑在一起，埃贝施泰因感到他们俩是在进行“特别认真的磋商”。

毫无疑问：决定必定是在这一时刻内作出的。国家元首希特勒当然不便卷入这场集体暴行，而由戈培尔负责担任导演——这简直把他乐坏了。独裁者离开了礼堂，同时这位宣传部首脑长篇大论地发表了一通演说，虽然演说原文已经佚失，但肯定可以称之为民族社会主义蛊惑人心的杰作。“这是一篇十足的煽动性演说，从中可以看出戈培尔蓄意发动一次行动，”后来任全国青年领袖的巴尔杜·冯·席腊赫回忆说。对这个演讲，听者各执一辞，有的说是提出不要阻止反犹行动，有的说是命令积极发动迫害犹太人，有的说是指示焚烧犹太会堂，也有的说是布置把犹太人赶出市区。

那么戈培尔到底讲了哪些具体东西呢？只有一点：他（戈培尔）向领袖报告了在一些区已经发生的反犹行动；领袖当即决定，这种示威游行既不是由党计划的，也不是由党组织的，只要是出于自发，那也就不要去制止。这就是戈培尔演说的全部内容。可是，老战士们惯常能不用他们的领袖开口也可以领会领袖意图。“全国宣传领导人口头发出的指示，”后来党的最高法庭判断说，“肯定被全体在场的党的领袖们理解为，党对外不应以游行示威的主使者面目出现，而是在实际中加以组织和领导。”

老战士们大多是党的各部门机构的头头，他们赶忙打电话向全国各自的单位发出紧急命令。他们终于感到自己是犹太问题的主宰了，党终于再次允许他们有发言权了，冲锋队终于看到时机

来临,可以从不显眼的角色中走出来,为1934年6月30日报仇雪恨了。约瑟夫·戈培尔博士掌握着这场戏的演出,他不厌其烦地口授发给各地党的宣传机构的电报,电话铃声几乎没有间断,副官们匆匆赶来接受中央宣传部长的指令。

但是民族社会主义对犹政策的官方策划者们,并不知道行将来临的将是什么事情。在职权范围内应予负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赫尔曼·戈林正搭着夜里的一趟火车驶往柏林,而希姆莱正要陪同领袖去菲尔德赫恩会堂,参加党卫队新队员的宣誓仪式;海德里希则坐在慕尼黑“四季”饭店的一间房间里和同志们聚会。这位德国保安警察处长被戈培尔的行动弄得“完全摸不着头脑”,秘密警察法官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后来说,当时他正陪上司海德里希参加传统的纳粹显要人物聚会。贝斯特说:“我当时和他待在一起,只见离开我们所在的饭店没有多少米远的一座犹太会堂着了大火。”

海德里希和随同人员还在猜测破坏犹太会堂有什么背景,慕尼黑秘密警察局的一个电话使他们恍然大悟。夜里11时15分,秘密警察局值班领袖报告:纳粹党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区宣传部  
315 领导刚才通知,说接到上级命令打击犹太人,叫秘密警察不得进行阻挠。打电话的人请求给予指示。海德里希不知如何指示是好。他立即派党卫队全国领袖本部处长、地区总队长卡尔·沃尔夫去找希姆莱,向他报信。等沃尔夫赶到市郊普林茨雷根滕街希特勒私邸找到自己的头儿时,已是午夜11点30分了。

对于这次反犹行动,看来谁也比不上阿道夫·希特勒那么震惊。率直的党卫队头子后来记载道:“当我问领袖时,我的印象是他对事件一点也不知道。”不过,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就从他那装得绝妙的惊愕中恢复了常态。他命令党卫队不要卷入行动,秘密警察只应注意保护犹太人的财产。沃尔夫将命令传达给了海德里希。随后短短一段时间里——这时希姆莱就和希特勒参加菲尔德

赫恩会堂的宣誓仪式去了——的情况无案可查。不过可以设想，海德里希对留在柏林的秘密警察缪勒作了指示，通知所有秘密警察所属单位实行戒备。海德里希自己对行动计划的背景知道得不多，在希姆莱到来之前避免作什么具体指示。显然他想听听自己头儿的意见，看党卫队对戈培尔的突然袭击应抱什么态度。11月10日1时，希姆莱终于走进了“四季”饭店。他向海德里希和在那里聚会的普通党卫队副总指挥们发布了命令。

海德里希用特急电报指示所有秘密警察和保安处机构：“犹太人商店和住宅只可捣毁，不得抢劫。责成警察监督这一指示的執行和逮捕抢劫者。”店铺集中的街道特别受到注意，“绝对保证不使非犹太人店铺受到损失”，无论如何“不使外国人——即使他们是犹太人——受到波及”。可是，希姆莱刚发出命令，就对同他作对的戈培尔的行径表示愤怒。他一开始就看穿了11月9日集体暴行的用意何在！打横炮破坏党卫队的合理的对犹政策，攻击党卫队在所有犹太人移民出境事务上的垄断地位，干扰党卫队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可能解决的办法。希姆莱把沃尔夫的助手、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卢伊特波尔德·沙勒迈埃尔叫来，在3时口授他写出一份档案记录，封在一只信套里。希姆莱这样提到：“我估计，戈培尔怀着 he 早已被我注意到的权力欲和出于他笨拙的头脑，恰恰在目前外交形势最困难的时刻发动了这次行动。”

其他党卫队领袖和希姆莱一样，对约瑟夫·戈培尔的行动也感到不满。根据一个不过问政治的学友证实，后来任国内保安处长的奥托·奥仑道夫对这场暴行“气愤至极”。地区总队长沃尔夫向印度政治家哈菲茨·坎承认，德国打了“一场道义上的败仗”。警察局长冯·埃贝施泰因禁止他的党卫队部属参与任何行动，他感到“这是一次自始至终地地道道的非义之举”。这些就是党卫队用来表示它的抗议的全部内容吗？这就是全部的内容，或者说几乎

是全部的内容。没有一个党卫队领袖想到怠工，拒不参与对党卫队犹太人问题助理们说来同样是一次错误的活动。党卫队集合整队，听从命令行动。

当然，人们还传说希姆莱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抗议姿态。普鲁士邦财政部长波比茨听说，希姆莱向希特勒声明，他不能听从领袖命令；党卫队领袖京特·施密特告诉前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说，全国领袖对暴行“表示反对，因此命令特别机动部队待在营房里，两天不准外出”。传说纷纭，只有一点确有其事，即希姆莱耐着性子收集有关戈培尔煽动流氓胡作非为和趁火抢劫的材料，以便向独裁者证明戈培尔所采取的突然袭击是十分荒谬的，并要求解除这个对手所担负的一切国家职务。

损失结果查明后，希姆莱就准备跟戈培尔公开交锋。11月11日，海德里希记下了初步结果：八百一十五家商店被捣毁，二十九家百货公司遭到破坏，一百七十一所住宅被砸，七十六处犹太会堂受到破坏，另外一百九十一处犹太会堂被纵火焚烧，犹太人三十六名被杀害，三十六名受重伤，一百七十四名抢劫犯被捕。行事谨慎的全国领袖，四处物色盟友共同反对强有力的宣传部头目。他选中了赫尔曼·戈林，因为戈林也看到自己在对犹政策中的地位受到戈培尔的触犯。

在获悉最初反犹暴行的消息后，戈林曾赶往总理府要求希特勒立即下令制止行动。戈林提出的理由和希姆莱相似，并非出于人道，四年计划主持人只是关心物质上的损失。戈林说：“对这些示威游行，我已受够了！”希特勒袒护自己的宣传部长，不过戈林还是向戈培尔加倍开火。他同戈培尔一见面，就“严词”（戈林语）训斥戈培尔；希姆莱则再次控诉宣传部长，要求部长下台。希姆莱责备戈培尔，说他用不负责任的反犹暴行，使德国在国外蒙受了无法估计的损失。

反戈培尔斗争在11月14日达到了高峰。国际联盟驻但泽专员卡尔·布克哈特原定这一天访问中央宣传部长，当他走进宣传部时，戈培尔叫人告诉这位瑞士人，说要晚一些时候才能接见他。布克哈特当即知道了原因何在。国际联盟政治家听波兰大使利普斯基说，内阁“出现了一场自发的反戈培尔运动”，瑞士人“从第一手材料”获悉，有人“要求立即将宣传部长打入冷宫”。11月13日斗争还未分胜负，但在第二天早晨，希特勒已表示支持自己身边的宣传要员。11时左右，这位独裁者亲抵戈培尔的私邸向他表示信任，当晚，柏林和全世界都知道了：希特勒和戈培尔一同出席观看了席勒剧院的演出。

布克哈特若有所思地返回但泽。但他刚抵但泽，就见到一张条子：希姆莱来过电话，请他务必立即去德国首都。党卫队头子还没有放弃同戈培尔的斗争，还可以抓住戈培尔损害德国外交政策利益为理由，再放一把火。不过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已经来给宣传部头目解围了，并为他开了保票：谈不上什么有损德国外交政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布克哈特尚能助一臂之力；在这位国联人物眼里，那些纳粹领袖都是希特勒过激政策的制动器，自己是他们的热心朋友。

当卡尔·布克哈特来到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的时候，希姆莱已经因徒劳无益而终于罢休了。出面接待来客的，不是党卫队全国领袖，而是地区总队长卡尔·沃尔夫。沃尔夫介绍说，他的首领病了，近几星期来发生的事使希姆莱神经过分紧张。不过，全国领袖谴责迫害犹太人的作法。“这个国家的内部形势已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必须有所改变，”沃尔夫大声说。“应负责任的是戈培尔先生，他对领袖起着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影响。”沃尔夫埋怨道：“我们曾经指望抓住他在捷克危机中所搞的宣传活动收拾他；这一次我们原来相信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可这一次又是领袖解救了他。再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非采取行动不可。”

布克哈特返回但泽，但在他脑海里宛如一团乱麻；他对自己能看到这点而感到高兴，即希姆莱毕竟“比他的仪表和举止显得更聪明些”。布克哈特哪里知道，请他去柏林，只不过是一场战斗结束前的虚晃一枪罢了，这场战斗以希姆莱败于戈培尔而告终。当然，戈培尔的绝处逢生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他虽然继续留在自己的职位上，可是已不能再插手犹太人问题了。希特勒作出决定，犹太人问题完全由戈林负责；“现在要采取断然措施，由中央统一来抓，”戈林用地道的纳粹行话说道。

但是，这就意味着进一步压迫德国犹太人，将犹太人彻底从经济领域中排挤出去，特别是要继续推行保安处的外迁政策。于是，  
318 海德里希也在1939年1月24日接到了戈林的指示，采取一切手段加速犹太人外迁。继续勒索和驱赶犹太人。

现在，海德里希以艾希曼在奥地利初期试验过的办法为蓝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柏林成立了“德国犹太移民总处”，按照维也纳的办法，集中所有全国主管机关和德国犹太人的强制性代表机构（“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共同办理非亚利安人的外迁工作。总处负责人为保安警察处长海德里希，他又任命了一名常务负责人：秘密警察II处处长、党卫队旗队长海因里希·缪勒。总处采用新的勒索办法，驱使犹太人领袖组织犹太人外迁。

总处要求柏林的犹太人每天提交一份列有七十户准备出境的犹太人名单。犹太人全国代表机构鼓励外迁，1938年夏天，它已公开声明全国还有二十万名应予离境的德国犹太人。海德里希和缪勒的总处一时间刷新了外迁人数的纪录。1939年，有七万八千名原来的德国的犹太人（1938年为四万名）离开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在艾希曼的压力下，这一期间布拉格设立了另一个犹太移民总处，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个德国保护领迁出了



将近三万名犹太人。

海德里希的移民专家们抓住一切机会，将犹太人从陆路撵出  
国境。他们甚至同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情报组织沆瀣一气，密切勾  
结，因为这个情报组织本身就企图实现艾希曼和哈根在1937年同  
他们谈判的犹太人法伊费尔·波尔克斯的计划：把大批德国犹太  
人迁往巴勒斯坦。这个计划被英国委任统治政权破坏了。1937年  
秋，阿拉伯人、犹太人和英国委任统治政权之间发生流血冲突之  
后，英国政府转而更加严格限制犹太人在圣地入境。

1937年12月颁布了第一批条例，1938年英国政府再次采取  
关闭边境措施，这些措施最后反映在1939年5月17日的一本英  
国白皮书里：在今后五年内，虽然规定巴勒斯坦可以再入境七万五  
千名犹太人，但伦敦政府保留每六个月对下半年内入境人数作出  
具体规定的权利。为了反对英国的新移民政策，成立了一个犹太  
复国主义抵抗小组；支持这个小组的，主要也包括波尔克斯所属  
的哈加纳。1937年，在哈加纳强有力的领袖埃利亚胡·戈洛姆布  
的房间里，建立了一个情报组织，它自称“摩沙德勒阿利亚贝特”<sup>①</sup>，  
意即入境移民办事处。

摩沙德在欧洲设有一个情报人员的机构，他们将犹太移民秘  
密地用小船运往巴勒斯坦。摩沙德的代表们在欧洲各个国家奔  
走，网罗有志去巴勒斯坦过艰苦生活的青年犹太人。摩沙德情报  
人员仿佛受到一股无法抑制的渴望所吸引，目光注视着第三帝  
国。哈加纳领袖戈洛姆布手下的人也着实不凭意气用事，他们依  
靠党卫队机构的帮助，把犹太人弄到巴勒斯坦去，敢于象两位英国  
政论作家乔恩·金奇和戴维·金奇所说的那样：“同魔鬼结盟”。

大约在砸玻璃窗之夜前后，摩沙德的两名代表皮诺·京茨堡

---

<sup>①</sup> 即 Mossad le Aliyah Bet 的译音，以下简称摩沙德。——译者

和莫歇·奥尔巴赫，来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帮助黑色集团先生们作犹太人的外迁工作。两名摩沙德分子建议，加速进行犹太复国主义对愿意离境的犹太人转业训练计划，和运送犹太人去巴勒斯坦。保安处采纳了这项建议，并委托摩沙德进行这些工作，更何况这时离境人数已越来越减少。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哈根注意到，显然“所有接受移民的国家都采取了更严格的入境限制措施”。他在1939年6月15日写道：“德国对犹政策的目标”是“利用一切力量促进外迁。犹太人入境愈来愈困难。鼓励一切外迁计划，不论迁往什么地方。”

那时，保安处对把德国犹太人弄到国外去的任何人都得表示感谢。当然，黑色集团的这些犹太人出口商不能公开出面同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反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纳粹党国外组织也暗中反对党卫队在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方面去尽这种不能理解的支援。1939年1月25日，外交部在发给德国所有驻外使团和领事馆的通知中，概括地提出以色列的见解说：为了促使形成一种“符合国际法的力量增长”以取代世界犹太主义，德国政策的目标只能是继续“分化犹太民族”。

摩沙德在运送德国出境移民时——这是保安处提出的不成文的条件——，决不能透露规定去巴勒斯坦。于是双方达成了一种罕有的盟约：保安处勾结犹太复国主义者，共同对付外交部和党内的激进派，同时也对付英国；英国在巴勒斯坦海岸加强了舰队巡弋，缉捕每一条非法的移民入境船只。

皮诺·京茨堡代表搬进了柏林迈内克街犹太复国主义者总部，开始组织运送。海德里希的移民总处要求京茨堡的机构每星期必须安排四百名犹太人，并设法用船只送往巴勒斯坦；移民总处后来甚至介绍了一个德籍希腊船主，不过他的船只很快就证明是

些很差、容易出事的船艇。策划者戈洛姆布在巴勒斯坦设法搞到较好的运输工具；起初他能搞到装五十名乘客的船就算不错了，现在他又弄到了可载八百名乘客的船只。但是摩沙德驻在德国的人员仍然无钱支付这笔运费。

皮诺·京茨堡好歹总算在1939年3月组织了第一批运送工作：二百八十名移民，迁往地区为墨西哥，且对保安处机构以目送示意的方式进行申报的。这二百八十人和由莫歇·奥尔巴赫在维也纳组织的另一批移民汇合，一道在南斯拉夫的祖萨克港口登上“科罗拉多号”轮船，行抵科孚岛海域后，移民换乘摩沙德的另一艘“奥特拉托号”轮，载往巴勒斯坦。摩沙德装运犹太人的工作一次比一次顺利，出境人数也越来越多。夏天，“科罗拉多号”一次又装了四百名移民出海。随后不久，从荷兰启碇的“多腊号”一次又运走了五百名难民。

英国坚决防止非法的移民入境。英国海军部门调动一小队驱逐舰，沿巴勒斯坦海岸线游弋防守，并命令空军加强巡航监视。同时，英国情报机关的密探在欧洲各港口城市出没，报告出港移民船只的消息。英国外交官员出动，劝说希腊和土耳其政府不支持任何停泊在有关国家港口的难民船只。英国委任统治政权宣布给予一次“惩戒”：取消下半年内所有犹太人入境名额。英国殖民大臣麦克唐纳居然在反对党不满的叫喊声中报告对付走投无路的移民取得的某些胜利。1939年7月21日，他在下院报告：英国武装部队两个月内捕获了三千五百零七名非法的入境移民。6月里，运载七百二十四名犹太人的“阿斯蒂尔号”被拦截，8月里，皇家海军截获了装载二百九十七名德国犹太人的五艘船只，随后不久，又有一条装载八百名非法入境移民的船被扣。

英国当局反应愈是强硬，海德里希的移民总处愈是提供方便。盛夏时节，它批准皮诺·京茨堡将他的船只调到埃姆登和汉堡，以

便出境移民可以直接从德国登船出港。京茨堡已经包租了四艘船，按照新的计划，定于10月装载一万名犹太人启航。

这时，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使党卫队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那种并非出于本意的合作关系告终。在斯图卡式俯冲战斗机和火炮构成的密集火网下，抢救德国犹太人的最后良机遽然告终。保安处独立自主的对犹政策不复存在。关于这一点，没有再比一个事实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即从此以后，犹太人问题为秘密警察一手操纵；对于政治问题，秘密警察比保安处更惯于只是用警察政治思想的粗糙准则来衡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完全变成了任凭国家政权鱼肉的对象。赫伯特·哈根这一类的保安处知识分子，至少还尽力对犹太人问题加以区别对待，并找到一种使民族社会主义教义和某种程度的世俗人情相一致的解决办法。而秘密警察分子则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改造教育学校出身的、唯命是从的官员，他们是领袖崇拜的信徒，不少人工作干劲有余而对民族社会主义虔诚不足。对他们来说，犹太人问题纯属国家安全范畴，这个问题的界线和内容都是由政治领导所决定的。

这种毫无独立思考的人，最典型的莫过于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阿道夫·艾希曼了，他很快就在执行秘密警察的对犹政策方面脱颖而出，一马当先。1939年10月，秘密警察缪勒辞去了德国犹太移民总处常务负责人的职务，建议任命艾希曼接替他。艾希曼不乐意干。他后来向审讯他的以色列人供称：“我坚持不肯去，待在外省，我的日子好过得多”。但艾希曼毕竟是艾希曼，否则他就不会两腿一并，碰响鞋后跟心甘情愿地接受新任务了。他只知道服从命令和执行命令。

艾希曼在秘密警察体系的苗床里崭露头角，对党卫队区队长缪勒如此器重自己几乎感到受宠若惊。他被调到德国中央保安局

第四处(秘密警察)。他掌握了四处D4科(移民和清肃)。不久又调到四处B4科(犹太事务和清肃事务)。他把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的老同事调来,搬进柏林库尔菲尔斯滕街116号四楼的一排房间,这儿有大理石扶梯和宽敞的会议室,是“一个理想的办公机关”(艾希曼语)。可是他不知道,他已踏进即将动手灭绝犹太人的司令部驻地。

当然,从这个时候到最终使用灭绝人性的最后解决的方式,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程,因为眼下艾希曼还相信继续要执行移民政策。但渐渐地他也注意到,几乎没有一个犹太人到库尔菲尔斯滕街来申请出境了。艾希曼说:“我可以说是景象萧条。”不过,艾希曼仍然死抱住移民政策的概念,想不出再有任何其他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突然他感到波兰战役提供了毕竟还有可能达到目的的妥善手段。艾希曼和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施塔勒克早先拟定过一个计划,艾希曼把它概括为:“给犹太人安置领土,那么全部问题就都解决了。”

这两个党卫队领袖建议,在波兰德占区的东端建立一个犹太人保护区,把犹太人集中到这个保护区里。艾希曼和施塔勒克跑到波兰去寻找一块合适的大地区。他们选定了卢布林西南靠近桑河河畔小城市尼斯科地区。“我们看到好大一块地方,”艾希曼以预言家发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似的兴奋心情说,“我们看到了桑河、村落、市镇、小城市,心想这是再好不过的地方了。然后我们考虑,干吗不可以把波兰人迁走,让犹太人在这里开拓这一大片领土呢。”

无意之中,艾希曼和施塔勒克就将党卫队的对犹政策,向灭绝人性的目标更加推进了一步。方案越来越残酷,使用的方法已变得惨无人道。最初,党卫队让犹太人“自愿”移民出境,继而变为完全强迫外迁,现在更继之以集中驱逐,押解犹太人出境。1939年9月21日,保安警察处长海德里希给他最亲密的同僚阐述新的作战

计划；一份文件提纲挈领地记下了他的命令：“尽快把犹太人集中到城市，把犹太人送到波兰，用货车将犹太人有计划地运出境外。”

这就是说：被德国并吞的原属波兰领土上的犹太人和居住在波兰德占区农村的犹太人，必须集中到克拉科夫以东地区内的城市里；在犹太人隔离区建立长老委员会或犹太人委员会，以便它们在日后规划成立的犹太人保护区里行使自己管理的职能。海德里希在一封致各特别行动队队长——他们奉命立即着手把东方犹太人集中起来——的急函中，描绘了未来犹太人保护区的地理概貌。他写道：“本指示不适用于第一特别行动队地区，该地区在克拉科夫以东，位于波拉尼科、雅罗斯瓦夫、新划定的边界线以及原来的斯拉夫—波兰交界处圈内。在这个地区内，只对犹太人进行应急的清查工作。”这里就是那个以尼斯科为中心的、艾希曼未来的犹太人之国的地区。

10月初，第一批运送车辆开始驶向艾希曼的犹太人理想国尼斯科，运来了建筑器材、工程师和四千名移民，他们是保安警察部队从捷克和维也纳抓来的犹太人。随后，保安警察开始在东方各地区大规模搜捕犹太人。犹太人被无情地逐出家园，赶入总督辖区：六千名犹太人来自维也纳和摩拉维亚—奥斯特劳，八万七千名犹太人来自所谓的重新划归德国的地区。一列列火车满载犹太人驶向艾希曼幻想的荒凉的东方，等待着他们的是前途未卜的命运。

323 库尔菲尔斯滕街的这个人自诩为犹太人之国的未来总督、统治东方犹太移民的主人。但是阿道夫·艾希曼已亲身体会到民族社会主义对犹政策的一条基本规律，对此他愤然写道：“每个单位都插手干预，插手犹太人事务成了赶时髦。”总督汉斯·弗朗克就是“插手”的一个人。他对唯独由他一人收容被逐犹太人不高兴；党卫队好大喜功的对犹政策破坏了总督辖区内本来就薄弱的粮食基础，海德里希和艾希曼越来越冒险的移民计划打乱了总督辖区

的经济。弗朗克起来反对运送犹太人的政策。1940年2月12日，他跑到柏林，就犹太人运进总督辖区而造成的混乱状况向戈林诉苦。弗朗克的抗议成功了。戈林下令停止运送犹太人，从3月底起，凡是送犹太人去波兰，需经弗朗克批准，而他却是难得批准一次的。艾希曼的梦想破灭了，1940年4月13日，布满犹太人临时棚屋的尼斯科城被废弃。

东方犹太人乐园失败之后，还出现过反犹主义空想家们的另一个更为美妙的计划。早在征服法国战争期间，纳粹外交官员们就想把所有欧洲犹太人移民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竭力主张这个想法的是外交部德国司犹太事务科科长、公使衔参赞弗兰茨·拉德马赫尔。他提出，法国必须在和约中将马达加斯加出让给德国，迁走岛上的所有法国人，从而开辟一个收容四百万犹太人的“大隔离区”，置于保安警察管辖之下。

艾希曼饥不择食地接过这一方案，并让专家签注意见，得到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欣赏。库尔菲尔斯滕街的这个人脑子发热了，他和朋友雅科维奇赶到汉堡热带研究所，了解这个遥远的海岛上的气候情况。他派同僚特奥多尔·丹内克尔去巴黎殖民部查阅马达加斯加的资料。他埋头钻读历史书，发现从拿破仑到法国外长庞纳等一些政治家，都有过把犹太人运往马达加斯加岛去的想法。

他告诉中央内政部部务参议伯恩哈德·勒泽纳博士说，战争结束后将在一个五年计划范围内，运送六百万左右犹太人去马达加斯加，当然“只用非德国人的船舱”。勒泽纳记述说：“犹太人在那里应从事生产。那里的生产和贸易将受在德国监督下的组织领导。要开办完全由德国人经营的和完全由犹太人经营的企业。总代理处和发行货币及转账银行由德国人创办。劳动银行和生产组织由犹太人创办。”

艾希曼再度以犹太人之国的总督自居，他以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离奇幻思使国家和党卫队的头目们也想跃跃欲试。希特勒在1940年6月18日同他的盟友墨索里尼举行的一次会晤中说：“有可能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可是，这个希望之国再次从阿道夫·艾希曼视野中消失了。他很快就看到“我所想象的极限现在到头了，梦境到此为止，再也没有办法了”。实际上，马达加斯加计划乃是党卫队移民政策最后的回光返照，也是一种设想的破灭。随后来到的，乃是种族屠杀。

这位刚才向墨索里尼介绍可能在马达加斯加岛建立犹太人国家决定的独裁者，将要实施他在1939年1月21日向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所说的话——据官方记录——：“我们这里的犹太人可能要被灭绝。”九天后，他预言，如果发生战争，那么“其结果将不会是世界布尔什维化和随之而来的犹太人胜利，而是欧洲犹太人的灭绝”。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准备彻底消灭一个民族。他是在什么时候终于下令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对此人们不得而知了，没有任何档案材料透露出作出这个罪恶滔天的决定日期。

但是，给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命令依然存在，戈林元帅在这份1941年7月31日命令中，指示保安警察处长：“速即就有关执行拟议中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组织工作、具体办法和物质措施，制定一份总计划报送给我”；但这些说明，希特勒关于进行屠杀的基本命令在此以前早已定下来了。历史学家赫尔穆特·克罗斯尼克搜集了足以说明最后解决计划产生过程的可靠资料。克罗斯尼克说：“可以肯定，希特勒对击败苏俄这个欧洲大陆上最后可能的敌人的计划愈趋成熟，他也就愈益强烈地有一个想法——作为‘最大限度的解决办法’的想法早就萦回于他的脑际——：消灭他统治范围内的犹太人。最迟在1941年3月，他提出枪杀红军政治



委员的打算时，可能同时发布了灭绝犹太人的密令。”

有一份类似准备行动的命令提供了确凿的证明：1941年3月3日，阿道夫·希特勒向最高统帅部作战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口授行将对苏作战的方针，其中首次出现了一句话：叫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去东方负责抓灭绝犹太——布尔什维克领导阶层的工作。希特勒说——约德尔记录——：“犹太—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一向是人民的压迫者，必须加以清除。”特别是要消灭所有“布尔什维克分子首领和政治委员”，尽可能在部队挺进的作战地区内就地消灭；是否“有必要除野战秘密警察外在该地另设党卫队全国领袖的机构，必须同党卫队全国领袖共同研究”。<sup>325</sup>

作为任务来布置这样的集体罪行当然还戴着一块面纱。希特勒首先说的“只”是消灭犹太—苏联领导层，他的方针没有一行透露出后来实际上每一个犹太人都被列为杀人机器吞噬的对象——按照褐色集团排犹者含意混乱的逻辑，他们把布尔什维主义说成是犹太主义典型的表现。这位独裁者一步步迈向黑色集团索取集体屠杀的贡品。起初他命令黑色集团消灭犹太人当中的“布尔什维克分子首领”，接着他把杀害对象的圈子越划越大：继政工干部之后是知识分子阶层，随后是所有公务人员，随后又是游击队嫌疑分子，最后是所有犹太人。

军方人士对这种恐怖升级茫然无知。希特勒指令全国领袖在东方扮演行将到来的关键性角色，足以使他们立即同希姆莱商谈，把奉命进行的肮脏勾当交给希姆莱的部队，但不得损害武装部队的权利。3月13日，陆军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少将和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面对面坐着，探询德国中央保安局对在东方的合作有何设想。海德里希热情地给予回答：党卫队全国领袖将象波兰战役一样，采用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特别行动队。

没有作出决定的只是，特别行动队应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作战部队的领导。海德里希指定秘密警察缪勒同陆军总司令部磋商。可是这个粗暴的秘密警察头子无比骄傲，以致使磋商一时陷入僵局。不过军人们还是不得不同警察机构达成协议，因为3月30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向两百名武装部队高级将领明确地说了，东方战役将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布尔什维主义就是社会的罪恶，”这位独裁者叫嚣道。“我们必须克服军人的哥们义气观点。政治委员和格伯乌<sup>①</sup>分子都是罪犯，必须把他们作为罪犯来对待。”

326 希特勒的癫狂使德国军事史上最野蛮的命令出笼了，即臭名昭著的政治委员命令，它强加给陆军部队指挥官们以这样的义务：凡属被俘的红军政治军官和情报军官，均不得作为军人对待，而是作为政治犯加以消灭，或交由保安警察处决。由于几乎没有一个将军站出来积极抵制希特勒的命令，因此更不可避免地要把“特别处理”上述俄国人的任务完全交给希姆莱的警察了。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国际法学家们正要着手草拟政治委员命令，军需总监瓦格纳在4月4日送给海德里希一份关于特别行动队在东方战役中所起作用的协议草案。陆军在协议草案中同意特别行动队的活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瓦格纳的草案规定，在军队进驻的后方地区内，特别行动队“在行军、给养和驻营方面”均受陆军节制，而纪律和业务方面则归德国中央保安局领导。当然，集团军司令有权对可能发生干扰军事行动的地方，节制特别行动队的活动。瓦格纳草案中有一句核心的话，可以使海德里希放手干，这句话是：“特别队〔特别行动队〕有权在其任务范围内自行负责对普通居民采取处决措施。”海德里希同意接受瓦格纳这份草案。他看到他的屠杀队的道路已畅通无阻了。

---

<sup>①</sup> 原文 GPU，俄文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1922—1934）的缩写的译音。——译者

那么，是否可以说陆军就这样同意了特别行动队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呢？绝非如此。种种情况说明，军人们对希特勒命令最后解决犹太人一无所知。瓦格纳在提到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时也只说：“在军队进驻的后方：查封作战行动开始前确定的项目（敌视德国或敌视国家的组织、协会、集团等的材料、档案和卡片），以及特别是防止重要人物（首要的流亡者、破坏分子、恐怖分子等）逃匿”和“在陆军的后方：清查和打击属于敌方作战部队以外的敌视国家和敌视德国的活动，以及向陆军后方的司令官报告一般政治情况”。

这份文件本身即已证明军人们患了罕见的精神分裂症，给特别行动队开了方便之门：将军们把海德里希的突击部队看成打击后方敌人的正常保卫机构，而同时他们至少知道，特别行动队在东方是执行政治性“特别任务”，不论其具体内容如何，军方总是非常乐意让海德里希的人去担负这种“特别任务”。

连特别行动队的成员开始时也怀有另一种类似的矛盾心理，因为海德里希将屠杀令零敲碎打的方式告诉他的刽子手。他在1941年4月召见德国中央保安局各部门负责人时，也只是谈到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解释说，这次任务是运用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手段，来“巩固和绥靖”俄国地区。海德里希说：“我需要精力充沛的人，并希望我的各部门领导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任务。”

刑事警察处长阿图尔·奈比向前跨了一步，敲响鞋后跟说：327  
“地区总队长，您可以把任务交给我。”海德里希点点头：一支特别行动队的第一个队长报名请战了，而这时候特别行动队还不曾拉起来呢。后来，抵抗运动成员的密友奈比的劫后余生的朋友们，煞费苦心解释刑事警察头子为什么会自动报名。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在其《奈比在哪里？》一书中，谈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故

事，企图用来证明，奈比只是在顾虑重重的心情下和完全听从贝克一戈台勒抵抗小组的建议，才担任指挥职务的。

作者吉斯维乌斯甚至美化他的朋友奈比说，“只是在他〔从俄国〕回来之后，那里才掀起难以想象的恐怖行动”。不管怎么说，奈比的特别行动队屠杀了四万五千名犹太人。吉斯维乌斯的论点，使人想起了另一个奈比之友的辩护词，在纽伦堡审讯战犯时，美国检察官罗伯特·肯普纳问这个人道：“那么，抵抗运动领袖先生，照您的看法，请问究竟屠杀多少犹太人才算是违反人道呢？”实际情况很简单：党卫队旅队长奈比以为，坚决报名参加东方任务可以捞到一级铁十字勋章，和博得海德里希的常有的令人捉摸不定的好感。而这次“东方任务”竟会与历史上最大的集体屠杀等同起来，却是出乎奈比开始时的意料之外。

不论怎样，阿图尔·奈比是唯一自愿争当特别行动队长的人。在这些特别行动队长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出于自愿的，每个人各有各的理由才听从海德里希的命令：国内保安处长奥托·奥仑道夫由于受爱牢骚，被认为是脾气乖戾的“民族社会主义圣杯派骑士”，不讨希姆莱的喜欢，曾两次不肯去东方执行任务，这一次只是为了不致再被骂成胆小鬼，才服从海德里希的命令的。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施塔勒克是海德里希的对头，已改调外交部工作，他指望当上特别行动队队长能重返德国中央保安局。党卫队旅队长、两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奥托·拉施，也是由于在东普鲁士保安处栽了跟头，感到有个机会通过积极去东方工作，从而在柏林中央部门捞个领导职位。

但是，讽刺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只有奈比和奥仑道夫这两个唯独反常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处长，在东方真正干了屠杀犹太人的勾当。他们的同事们都懂得多少有所收敛：弗朗兹·西克斯处长（莫斯科先遣队）和海因茨·约斯特处长（特别行动队 A）在

东方干了几周后就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其他几个处长——海因里希·缪勒、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瓦尔特·施伦堡和诺克曼博士——对党卫队所期望的英勇精神压根儿就不想沾边。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和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是特别行动队的中层领导，他们几乎也不比处长们更出自衷心。海德里希把他们从党卫队——警察机器的各个部门挑选出来，集中在一起，他们多数原来干知识分子行当。一支古怪的灭绝犹太人的队伍形成了，其中有两个博士学衔的大学毕业生、部务官员、律师，还有一名新教牧师和一名歌剧演员。后来有几个人抓住机会，离开了杀人机器。如同西克斯和约斯特经过或未经海德里希批准离开岗位一样，象特遣队长埃尔夫·舒尔茨或卡尔·耶格尔这些人也逃脱了徒然成为最凶狠的种族狂的下场。甚至官阶不高的人也摆脱屠杀命令的约束。党卫队二级小队长马赛厄斯·格拉夫拒绝在俄国当小队长，结果被捕押送回国。保安处西克斯教授作证说：“人们至少可以设法使自己调离特别行动队。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由于这样做而被枪毙的。”

一般队员也对海德里希提出的东方任务表示很少一点的热情，以致德国中央保安局长不得不对秘密警察、刑事警察和保安处所属各单位反复施加压力，抽调必要的人手。海德里希甚至被迫向风纪警察和武装党卫队借调人员，解散了一营柏林警察，将其人员分配到各个特别行动队。

1941年5月，海德里希反正抽调了大约三千人，分别组成了四个特别行动队。施塔勒克领导特别行动队A，随北方集团军向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进发，直抵列宁格勒。奈比领导特别行动队B，跟随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乌克兰之间作战地区的中央集团军。拉施领导特别行动队C，在南方集团军的西、北、东三面地区行动。奥仑道夫的特别行动D，在南方集团军的南部地区，即比萨拉比



集中，将他们送到易北河畔维登堡的普雷奇边防警察学校，接受对种族敌人进行灭绝战役的训练。海德里希逐步拧紧世界观改造教育的螺丝：德国中央保安局派来的教官越来越明确和从严训练他们进行种族屠杀。6月中旬，海德里希将三千特别行动队队员集合在穆尔德河畔小城迪本附近。保安警察兼保安处长摆出大元帅的架势，站在他的排成四方形队伍的死神队面前，准备作一次激昂有力的训话，其内容不外乎含糊其词，只说要执行一项空前未有的艰巨任务。

稍后，他在边防警校校园内的巴洛克式普雷奇旧宅邸里召见各特别行动队队长，这时他明话直说了。旗队长瓦尔特·布卢默博士战后还回忆了海德里希当时讲的话：“东方犹太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后备军，因此根据领袖的看法必须将其消灭”。奥仑道夫事后几年也还记得：海德里希给他们传达了一项领袖命令，命令中把“共产党干部和积极分子、犹太人、吉卜赛人、破坏分子和情报人员，原则上都定为有他们存在就会危害部队安全的分子，因此必须毫不犹豫地一律处死”。330

受到召见的人当中有谁反对这种罪恶滔天的命令吗？有谁拒绝听命于独裁者吗？奥仑道夫也许本想在普雷奇“当着与会的特别行动队长和特遣队长、特别队长的面，明确地大声抗议处死的命令”，但是，对他来说，“服从我的政府的命令，而不以我认为命令是否合乎道义为转移”，乃是义务。同样，1a特别队队长、法学博士马丁·赞德贝格尔也表明态度说道：他虽不同意领袖命令，但还是认为它是“合法的”，因为希特勒“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布卢默后来也这样声称，他本想抵制领袖命令，但“我当时认为领袖的命令乃是作战令”。

谁也没有反对，个个唯命是从。特别行动队队员顺从地乘车开赴待命出发的地区。1941年6月23日，阿道夫·希特勒点燃俄

国战火的第二天，海德里希的死神们倾巢出动，从事惨绝人寰的冒险勾当：三千人争相逐猎俄国的五百万犹太人。

俄国犹太人对特别行动队的屠杀毫无准备。只有少数犹太人意识到德国反犹主义死神来临的威胁。暗中反犹的斯大林俄国的报刊，几乎从未报道过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消息。有些城市——例如在乌克兰——的犹太人社团误以为希特勒的士兵和1918年德皇的军队差不多，把纳粹德国人当成解放者来欢迎。“犹太人显然不了解我们对他们的态度，”特别队队长施勒特尔在1941年7月21日从白俄罗斯报告说。正因为这样，他们受到了海德里希的最后解决者们更残酷的打击。

特别行动队紧跟先头部队向前挺进，以能充分发挥出其不意的效果。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集中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犹太人居住的苏联城市。往往一个城市正在围攻，特别行动队的首批先头部队即已动手杀人了。德国军队的进攻和德国中央保安局行刑队的渗透，在不少情况下起了相同的重要作用。例如考那斯、耶尔加法、里加和雷维尔，这些城市都是由特别行动队配合军队攻占的，三卡车特别行动队C的队员，在第一批坦克掩护下侵占了日托米尔，4a特遣队在基辅陷落的当天（1941年9月19日）同时占领了这个城市。

特别行动队部队几乎每到一个城市，那里的犹太居民就眼睁睁地被死神扼住咽喉，每日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为完成规定的惨无人道的指标，在海德里希的部下看来，怎么残忍也算不上卑劣，使用任何手段也不算狡猾，怎么野蛮也不会过分。报告象雪片飞来，每一份报告都用冰箱生产者和病虫害消灭者的语言，表达最后解决者的狂热激情。

特别行动队D第一百五十三号情况报告：“各分队的工作面，首先是将小片地区变成无犹太人区。自上次报告以来，又枪毙了



三千一百七十六名犹太人、八十五名游击队员、十二名抢劫犯、一百二十二名共产党干部。累计共达七万九千二百七十六人。”特别行动队C第十七号情况报告：“奉德国中央保安局命令，在白俄罗斯所有列入计划的城市进行了消灭党政机关干部的行动。对犹太人也同样按命令采取了行动。”C队报告：“为消灭这种情况〔疫病威胁〕，4a特别队已枪毙一千一百零七名成年犹太人，乌克兰民团已枪毙六百六十一名青年犹太人。这样，截至1941年9月6日止，4a特别队共消灭犹太人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八名。

杀、杀、杀！第六特遣队：“余下的三万名中已枪毙了近一万名。”特别行动队D：“自上次报告以来，又枪毙了二千零十名。”第八特遣队：“……消灭一百三十名犹太人。”4a特遣队先头部队：“……已捕杀五百三十七名犹太人（男、女和青少年）。”特别行动队的恐怖呼喊声席卷各地，势如燎原。德国军队愈是深入苏俄内地，犹太人也愈是胆战心惊地逃离德军逼近的城市。犹太人终于警觉起来了，最后解决日见困难。一个特遣队不无烦恼地报告说：“其他地方传来的枪杀消息给行动队造成很大困难。逃亡的犹太人和俄国人以及德国士兵的随意谈论逐渐透露了对付犹太人的行动。”

尽管如此，杀人者还是绞尽脑汁，大批抓捕牺牲品。一份报告的笔者沾沾自喜道：“城里的犹太人奉令到指定的营房报到，以便清查人数和听候安置。前来报到的共约三万四千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命令他们交出他们的贵重物品和衣物之后，通通被杀死，前后共花去好几天时间。”在基辅——按特别行动C记载——“墙头张贴出布告，命令犹太居民易地安置。虽然起初估计只有五、六千人报到，但结果来了三万名犹太人。由于采用了异常巧妙的组织方法，竟使他们在处决之前还以为是易地安置。”

大规模屠杀者的冷酷无情的官方语言对俄国犹太人惨遭杀戮、血流成河竟丝毫没有厌恶和羞耻之感。可是，即使胆战心惊

的旁观者的证词，也难以说清楚其恐怖情景：成千上万以至几十万人走向惨死道路、集体屠杀的万人坑、裸体的妇女们怀抱着的婴儿成队行进、坑边的枪杀惨不忍睹。

第五百二十八步兵团团长勒斯勒少校在1941年7月底的某天，突然在日托米尔驻地被密集的枪声惊起。他向出事地点走去，到了一段铁路路基旁，看到了“一幅凄惨的景象，使得这个思想上毫无准备而走近的人大吃一惊，毛发直竖”。在勒斯勒的眼前，出现一个大坑，坑中躺着无数被枪杀的犹太人尸体，男女老小都有；闻声赶来的士兵和居民都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坑里。勒斯勒说：“在坑里死尸堆中，有一个大白胡子老人，他的左胳膊上还挽着一根小拐杖。因为这老人还在呻吟，没有咽气，我要一个警察给他补一枪。这个警察一听笑着说：‘我已经叫这家伙的肚皮挨了七下子，他自个儿会死的！’”

有一个俄国村庄的犹太人听到屠杀队临近的消息，全都躲了起来。屠杀队进村时，党卫队员只看到有个抱婴儿的妇女站在道旁。这位妇女不肯说出犹太人躲藏的地方，一个党卫队员当即从她手里夺过婴儿，倒提着婴儿的小腿，将小脑袋朝门上砸去。一名党卫队员回忆说：“这响声好似爆了一只轮胎。这种响声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位妇女变得神经失常，说出了犹太人的藏身地点。在里加，一名党卫队员看到两个犹太人扛一根梁木；他不动声色地摸出手枪，砰的一枪打倒了一个犹太人。理由是：“干这种活一个人就够了！”在清剿拉脱维亚犹太人区时，一个党卫队领袖也用了类似的手法。有病的犹太人躺在担架上被抬过来，这个党卫队领袖走到前面，拔出手枪，挨着担架把犹太人一个个击毙。

特别行动队的无情魔火使俄国的犹太人队伍日益稀疏。截至1941年末至1942年初的冬季为止，特别行动队报告消灭犹太人的数字为：A队二十四万九千四百二十人，B队四万五千四百六十七

人，C队九万五千人，D队九万二千人。

第一批特别行动队过去之后，接踵而至的是由党卫队领导的另一批屠犹刽子手。在此期间，火线后方成立了德国人组成的民政机构，由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为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领导，该部管辖“奥斯特兰”和“乌克兰”两个德国专区，德国专区又划成若干专区。在民政机构中，党卫队全国领袖也占有要职；333 1941年7月17日的一项领袖命令提到，希姆莱奉命负责“东方新占领区的警察保安”事务，并受权“在他的任务范围内向德国专员们……作出指示”。在此以前，希姆莱已任命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为他的驻俄国代表：北方区（里加）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为地区总队长汉斯·普吕茨曼，中央区（明斯克）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为地区总队长埃里希·冯·德姆·巴赫-齐列夫斯基，南方区（基辅）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为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1942年年中起，又增派旅队长格雷特·科尔泽曼为高加索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

希姆莱的这些首席代表，手下都各有一个风纪警察团和一定数量的武装党卫队，他们和特别行动队长们一样，接受相同的灭绝任务。从上次屠杀队魔掌逃脱出来的人，现在又成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灭绝部队的目标。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们存心要在屠犹方面比特别行动队干得更加出色。他们借助于吸收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乌克兰的经过拙劣训练的自愿效力分子（简称“自效分子”）而加强了部队，企图用来进一步扩大消灭数字。突出的例子是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耶克尔恩，他在1941年8月一个月内，就报告共计杀害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五人，主要是犹太人。

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部队在东方战役最初几个月内究竟屠杀了多少犹太人，已无法作出准确的统计数字了。但有案可查的是，当特别行动队和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部队在年底停止活动，

和直到次年春天补充新的兵力时，被害的犹太人已达五十万，其中三十万左右记在特别行动队的账户上。

尽管“成绩”如此辉煌，党卫队屠犹刽子手们还是明显地露出了厌倦迹象。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也吃了苦头：指挥官舒尔茨在9月被调职；队长拉施中途休假，从此一去不返；奈比在11月暗示他的副手维尔纳（“阿图尔，要是你吃不消，我可以替你解围”）要回老家，因为象吉斯维乌斯证实的那样，他“已经消瘦得不象人样，神经极度衰弱，郁郁不乐”——他的司机、刑事高级文书克恩看到屠杀犹太人的惨状便用手枪自杀了。

334 几个月过后，连希姆莱在东方的干劲最足的干部也被屠犹恶梦弄垮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冯·德姆·巴赫-齐列夫斯基患了精神分裂症和肠绞痛，被送进霍亨利申党卫队战地医院，他夜里大声呼叫，神经错乱，语无伦次，被自己罪孽的恶梦缠身。“他特别被由他亲手布置的枪杀犹太人和在东方的其他经历所造成的景象所折磨，”党卫队医生格拉维茨博士向他的最高领导报告说。当医生问为何感到害怕时，巴赫-齐列夫斯基向医生吼叫道：“我想我完了。您难道不知道在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在那里，整个犹太民族……要被斩尽杀绝。”可是，当病人问及全国领袖，在东方对犹太人的这套作法是否可以收场时，希姆莱生气了。希姆莱道：“这是领袖的命令。犹太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播者……要是您不停止过问犹太人问题，那么会叫您知道厉害的！”

当然，就连这个执行领袖命令的狂热分子也已知道，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的虐待狂和杀人狂以外，特别行动队的队员们几乎同巴赫或旅队长埃贝哈德·赫尔夫没有什么两样的想法，这个赫尔夫曾写信给党卫队中央人事处处长说，他想“离开东方，因为我坦白地说，我已经受够了”。

这时，在各特别行动队中已形成一支干到底的死神队，连党卫

队也相形见绌。死神队无限崇尚急功近利、铁石心肠和帮派义气，自己承认崇奉仅次于集中营看守部队那种毫无灵魂的机器人式的冷酷无情。在这里，汇集着一群野蛮成性、只图功名的干将，希姆莱把这些人誉为党卫队的理想典范：一个佩戴骷髅标志的集团，舍弃市民的周围世界及其道德标准，听任领导自由驱使，听凭一个集团的摆布，因为它一手给党卫队员确定了社会和伦理的标准。好几年来，特别行动队队员被灌输产生优越感的教育，使他们权迷心窍和自诩为人类的精华，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高人一等，高居于一般党员之上，也高居于道德标准之上，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有权拿人作为生物实验的对象。

对屠杀犹太人来说，看来再没有别人比黑色集团这些亡命之徒更合适的了，何况他们是在茫茫无际的辽阔的俄国土地上大干这些勾当，离开常住的环境如此遥远，致使刽子手们对屠杀活动宛如梦中的见闻。的确，对于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良心上——如果说还有良心的话——可能会无动于衷，处之泰然。但尽管如此，当他们千百次看到了自己动手杀人时，他们内心里的所有新日耳曼人的英雄感还是彻底破产了。这些日耳曼的贵人们重又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色厉内荏的庸俗之辈，因为他们以典型的德意志人的自我怜悯之心干着野兽的勾当，同时却又百感交集、流着眼泪思念自己家里的妻小。

“这不是一桩美差！”在塞尔维亚进行屠杀的地区总队长图尔纳这样谈论自己忧郁的体会说，特别行动队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杀害一排排的犹太人，甚至还以为可以指望得到善心的亚利安人的怜悯。4a 特遣队队长保罗·布洛贝尔在战后表示，真正值得受到

335

怜悯的人，倒是他们自己，即当年的刽子手们：“我们这些参加行刑的人在精神上所受的负担比受害者沉重得多。从心理学观点来看，是他们经受了凄惨可怕的遭遇。”宪兵队长弗里茨·雅各布埋

怨到远离家室的地方去干消灭犹太人的勾当，只是违心地听从地区总队长克韦尔纳指出的对祖国应尽的义务。雅各布立誓要改邪归正。他说：“我感谢您的告诫。您说得很对。我们新德国的男子汉必须严以律己，即使需要较长时间离开家庭也罢。”

希姆莱非常清楚他手下的这些庸人的苦恼。他不放过任何机会，给特别行动队员再次从道义思想上打气——用的是一套假爱国主义的话，即使那些最玩世不恭的听众也听出他的言外之意：应当成为这样的人，他为拯救德意志民族和北欧人种去参与一个人类智力几乎无法理解的诉诸暴力的世界计划。

希姆莱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多数人一定明白，一百具死尸、五百具死尸或一千具死尸排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坚持这样做，除了由于人性弱点所造成的例外情况，真正持之以恒，这就是我们的艰苦所在。这是我们历史上前人未曾写过也永远难以描述的光荣的一页。”为了抽掉集体屠杀的犯罪性质，他的奇思遐想是无穷无尽的。他对党卫队刽子手们的讲话不少含有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辩解的成分，因为最后解决已“变成我一生中负担最重的问题”，希姆莱在一次纳粹党全国指导处领袖和各区领袖会议上这样说。

他对最亲近的同事，也蓄意缩小消灭犹太人行动的真实规模。他千方百计寻找理由，否认最后解决的恐怖性。他在内心深处，也象他的刽子手们一样感到孤立，环顾左右，对他们表示一片震惊——每天送来要求营救犹太人的信件也使他看到了这一点。“你们自己想想，”希姆莱对纳粹党区领袖们说，“有多少人——包括党员——给我或任何一个机关送来众所周知的求情信。信中说：犹太人当然通通是猪猡，只有某某一个是正直的犹太人，不应该动他。我可以大胆讲一句，按照国内求情信和所提意见之多来看，正直的犹太人简直比户口册上的犹太人还要多得多。”

摆脱这种孤立只有一条出路：给自己和驻东方的最后解决执

行者反复不断地鼓气，说明大家是执行一项千载罕有的使命的工具，是一种超乎人类想象力的事业的工具。希姆莱说：“不能从小‘我’观点看问题，而要着眼于整个日耳曼民族。总会有人牺牲的。”希姆莱始终不渝地鼓励特别行动队完成他们的“艰巨任务”，他老是用这种话慰勉那些在东方茹苦含辛的刽子手：“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德国人看到这种情况，他是会感到厌恶和可怕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感到厌恶和可怕，那我们也就不能成为德意志人，不能成为日耳曼人了。正因为事情如此可厌，也就有必要这样做，并且还要由我们在许多方面去做。”

希姆莱也亲临视察特别行动队，给伤感的最后解决执行者们打气。他在明斯克，让人表演处决二百名犹太人，但在残酷的景象面前却吓了个半死，以致希姆莱本部处长、副总指挥卡尔·沃尔夫费了好大力气扶着他才使他没有晕倒。沃尔夫对他的随行人员说：“他这个人应该看看，他要求别人干的事情是什么滋味。”希姆莱只是慢慢地才镇定下来，发表了一通打肿脸充胖子那样的激情的讲话。大家——他这样说——一定注意到他“看不惯这种流血的活计”，但是人人都得尽自己的责任，不管它是多么困难。希姆莱对这个特别行动队长奈比说，不过应该另找处决的办法。于是，一种残酷的处决工具，即毒气车就由此而产生了。

特别行动队的队长们当然并不是仅仅相信希姆莱花言巧语的说服力。奥仑道夫、拉施、奈比和施塔勒克所最感害怕的莫过于纪律的崩溃和屠犹刽子手们虐杀狂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因此需要明确作出规定，确保迅速有效地进行处决，使行刑的刽子手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

奥仑道夫在他的特别行动队D培养了一种可怕的被歪曲了的尚武精神，把处决作为执行军法。它的后面隐藏着精心设计的一招：不让特别行动队员个别和被害者接触，特别行动队员是集体中

的一员，这个集体只是奉上级的命令在一起行事，从而使大家不产生个人犯罪的感觉。任何时候都不许一个人单独枪杀犹太人，奥仑道夫经常设法使受害者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保持镇静，因为决定被处死的人群中发生任何一点骚动，都有引起刽子手们向被害者疯狂地扫射和不顾一切而乱发子弹的危险，这个冒牌军人奥仑道夫对此比大批犹太人集体逃跑还要担心。这种担心并非出于人道，但也使奥仑道夫不敢使用毒气车。他认为，毒气车对他手下的人造成“过于沉重的心理负担”：处死过后必须把恶形怪状、屎尿横流的尸体从毒气车里拉出来——这样，行刑者还得亲眼目睹自己所干的勾当，而这种一刹那的真实情况，正是奥仑道夫竭力不让行刑者看到的。

337 特别行动队 C 队长、两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奥托·拉施，采用另一种办法：他本队的每个队员必须成为集体犯罪的一员，恐怖活动人人有份，可以约束特别行动队的精诚团结。集体制造的流血，应该变成将大家捏在一起的粘合剂。这位双重博士命令全体特别行动队员都必须参与行刑处决；每个人都得“克服自我”。这个队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曾——象某目击者叙述——受到“最可怕的恶梦”的折磨。但是目的却达到了：集体犯罪，人人有份。

为了使刽子手们干活时心情比较轻松，任何心理学上的办法都被使用上了。修饰词句也起了它的妙用。在刽子手们的词汇中，没有“屠杀”这两个字，而是一大堆形形色色毫无恶意和欺人自欺的用语：从“特别行动”、“特别处理”、“剔除”，直到“执行任务”、“清理”和“外迁”。不断的宣传灌输，在俄国尤其如此，其目的也不外乎使最后解决执行者们消除一种感觉，即犹太人同样是人。在宣传用语中，犹太人变成了害群之马，变成了苍蝇蚊子。

尽管如此，特别行动队的队长们并不满足于这种令人头皮发麻的宣传。美国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对特别行动队的活动作



了罕见的悉心研究。他发现：“心理学上的辩护构成了屠杀活动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如果一次行将采取的行动找不到辩护的理由，那是不会付诸实行的。”主要是从两方面寻找辩解的理由：预防疾病传染危险，以及防止犹太人同敌人进行任何合作。在波罗的海地区，犹太人是因“袭击”德国武装部队而被消灭，在新乌克兰卡是因为犹太人几次进行“骚扰”，在基辅是由于犹太人纵火，在另一个城市则是因为犹太人的“敌对思想”。

根据希姆莱自己的笔记，他在1942年向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撒谎说：“在俄国，我们不得不枪毙了一批为数不能说不多的犹太人，而且男女都有，因为那个地方连妇女和半大的孩子都给游击队送情报。”犹太人“到处都是怠工、间谍、抵抗运动和匪帮结伙的基础”。

这种编造犹太人全是游击队的论点已属于1942年初开始的新灭绝计划了。这个计划不可谓不高明：现在，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在同游击队作战的外衣下秘密进行的，并把武装部队也卷进本世纪的罪恶渊藪。

由于陆军有时也拉特别行动队参加作战任务（歼灭溃散敌军），前线部队司令官们一开始就同海德里希的代表们保持良好的关系。4b特遣队赞赏“武装部队的反犹态度相当好”，特别行动队A对第四装甲军团的关系“密切，非常融洽”。被追逐的犹太人所持的恐慌和游击队的最初行动，促使军人们鼓励特别行动队加强打击犹太人。1941年9月，第十七军团要求4b特遣队消灭克烈缅楚格城的犹太人，求助的原因是：克烈缅楚格的军用长途电话线三次不知遭到什么人的破坏。另一个例子是：8月里，第三十军的秘密战地宪兵(GFD)迫切要求10a特遣队派一个分队，打击乌克兰城市科迪马的犹太人，因为秘密战地宪兵上尉克雷默尔接到报告说，犹太人计划袭击德国陆军部队。

对许多（当然并非所有）军人来说，消灭犹太人似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冒险行为，陆军元帅瓦尔特·冯·莱希瑙已在一份逐命日令中，提醒他的第六军团的士兵应作为“不可动摇的民族运动思想拥护者”，要培养自己“对无情而正当地清算犹太劣等民族的必要性的完全理解”。他们的这种理解竟达到如此远的地步：第十七军团命令，在查获不到破坏活动的幕后操纵者时，必须枪毙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中的共青团员；特别行动队A报告，截至1941年12月止，中央集团军共消灭一万九千名游击队员和犯罪分子，其中多数系犹太人。阿道夫·希特勒的俄国大军也知道使用集中营。第三十军司令官将军命令，为对付游击队袭击抓捕人质，将人质关在集中营里。第一百二十四步兵团在库丘克穆斯科姆亚设有一所集中营；第二百六十六步兵团在瓦鲁姆特卡和第七十二反坦克营在福罗斯各设一所。

军人们对交给他们看押的犹太人的任何骚动都惊慌失措。占科伊驻军司令发现所属犹太人集中营有传染疾病的危险，请求特别行动队D将集中营的犹太人全部消灭；他不得不花了很长时间去说服这个人力不足的行动队，直到它同意和秘密战地宪兵共同行动，以满足驻军司令的愿望。个别军人极力敦促德国中央保安局代表，额外增加灭绝任务，致使德国中央保安局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林多竟有一次生气地叫道：秘密警察可不是“武装部队的行刑队员！”

339 敌对的苏联人对德国人越是开展游击战，军人们就越加迫切求助于特别行动队。1941年12月，总参谋长哈尔德在奥尔沙召集各军团司令开会时，他听到了对特别行动队的一致赞扬：“这些人对我们象黄金一样宝贵，因为他们确保了后方联系，从而省得抽调部队去对付这项工作。”

特别行动队A是第一支和游击队对阵的特别行动队。1941年

9月底，列宁格勒地区发现了苏联游击队；直到这一年年底，施塔勒克所率特别行动队的主力一直集中在北线对付游击队。施塔勒克本人也在1942年3月初同游击队作战中丧命。希姆莱很快就抓住机会，以对付游击队为借口，加紧消灭犹太人。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执行希特勒在1941年7月说过的话而已：“这种游击战反过来看也有它的好处，它使我们有可能消灭一切敌视我们的力量。”

党卫队头子给自己执行最后解决的部队，披上了类似军人的反游击队兵团的伪装，公开取名为“剿匪部队”。特别行动队变成了保安警察驻地指挥部；A、C两队的队长变成了司令员，特遣队长变为保安警察兼保安处指挥官。后来，这支反游击战大军由剿匪部队总指挥（巴赫-齐列夫斯基）领导，增加了五团风纪警察和东方德占区内的地方民团。1942年年底总人数为：一万四千九百五十三名德国人和二十三万八千一百零五名东方自效分子。

经过精心伪装的最后解决执行者，利用这支军队发动新的攻势，经常得到各地陆军部队和武装党卫队的支持。调往北线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耶克尔恩首先行动。1942年2、3两月内，他开展了旨在消灭犹太人和游击队的“沼地热行动”。战役结束后，他报告：杀死游击队员三百八十九名，枪毙可疑分子一千七百七十四名，消灭犹太人八千三百五十名。

把犹太人跟游击队员联系起来加以消灭的“沼地热行动”，成了希姆莱借口军事需要、继续消灭犹太人的屠杀行动样板。收获节行动、汉堡行动、阿尔托纳行动、二月行动、纽伦堡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旨在灭绝犹太民族。同时套在未投奔游击队的犹太人头上的绞索也愈收愈紧了。刽子手们把大批犹太人赶进隔离区和集中营；在奥斯特兰还有十万名犹太人，其中约六万八千名居住在城市里，对这些犹太人开展了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这一次灭绝行动的重点在白俄罗斯专区，新统治者给它恢复

了旧日的名称：白卢西尼亚。警察营和自效分子旅对城市相继搜索，隔离区逐一在清剿者的冲锋枪下一扫而空。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及其所属各保安警察司令和指挥官深信，斩尽杀绝白卢西尼亚所有的犹太人已指日可待。就在这一时刻，奥斯特兰德国专区的民政机构官员出于一种统治者和保护者的本能，驱使老纳粹分子们少有地起而反对千载帝国的种族主义。这些造反者为首的是最腐化的党的干部之一：纳粹党区领袖、白卢西尼亚专员威廉·库贝。

象其他东方纳粹殖民统治者一样，库贝也对党卫队警察部队急于消灭犹太人的行动而破坏了奥斯特兰经济基础抱有反感。“立即调走所有从事生产作业的犹太人〔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大城市更不可能，”甚至连施塔勒克也曾提过这样的警告，但驻白卢西尼亚的最后解决执行者、保安警察司令、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爱德华·施特劳赫博士疯狂地加紧灭绝行动。性情暴烈的白卢西尼亚统治者眼见自己所辖地区的经济陷于崩溃，因为白俄罗斯犹太人是当地唯一的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阶层。不过使库贝更为恼火的是，党卫队各分队打击犹太人时，事前都不跟他打招呼。早在屠杀队发动新攻势以前，库贝就已经怒气冲冲了。

1941年10月27日，斯卢次克第十一警察营副官报告并通知地区专员卡尔，几小时后将出动消灭该城的所有犹太人。党员卡尔大吃一惊，他请求警察营营长放过犹太手工业者，但警察对他的请求不加理睬。斯卢次克的犹太人终于被斩尽杀绝。“整个场面的凄惨可怕非言语所能形容，”卡尔于10月30日向白卢西尼亚专员报告说。“犹太人被德国警方人员、特别是立陶宛游击队〔辅助警察〕用难以描述的残酷……从住宅中拉出来，赶到一起。全城到处响起枪声，一条条街道上堆着被枪杀的犹太人尸体。”卡尔和手下的官员还曾试图“抢救可能抢救的人。好几次我真的不得不拔

出手枪，将德国警方人员和立陶宛游击队撵出工厂”。

威廉·库贝控告第十一警察营全体军官团破坏纪律。库贝在一封信中写道，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卑劣行为”，把中弹未死的犹太人活埋——象在斯卢次克一样。“用这种方法是不能维护白卢西尼亚的安定和秩序的。”这个老反犹主义分子库贝（1934年说：“必须消灭黑死病传播者”）对“有秩序地”消灭俄国犹太人，无疑是不会提出任何异议的，而且也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参与屠犹，如果不是突然间成千的德国犹太人被押解来明斯克处决的话。当库贝看到德国犹太人时，他内心深处的一种世界观崩溃了：犹太人之敌的库贝变成了犹太人的保护者。<sup>341</sup>

库贝知道，德国犹太人中间，也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兵并得到高级勋章的。这位纳粹党区领袖叫人拟出一份名单，向德国中央保安局呼吁，仿佛他并不知道有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计划似的。海德里希生气地驳斥道，他总是有什么都有正确理由，而且他肯定还会有“比侈谈犹太人更重要的军事任务，怎么能浪费时间去调查，影响我这么多同事做其他远为重要的工作”。海德里希写信给库贝：“我感到遗憾，在纽伦堡法令颁布六年半之后，竟然还写出这样的辩护信来。”

可是，库贝不加以理睬。他将德国犹太人置于亲自保护之下，正当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施特劳赫的保安警察布置屠杀行动时，他就急忙插手干预。“对犹太人问题采取从来未见过的立场，”施特劳赫责难说。他还不知道，第三帝国最早的纳粹党区领袖之一，已经参加了犹太人保护者的行列。施特劳赫弄不懂这是什么世道。他写道：“我要强调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竟会为了几个犹太人而闹得意见不一。我经常反复指出，有人骂我手下的人和我野蛮和虐待狂，而我完全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民族社会主义者库贝有什么好反对的呢？施特劳赫记道：“我们中间的这种做法同一个

德国人及一个康德和歌德的德国是不相称的。如果德国的声誉在全世界遭到败坏,那么责任就在我们〔党卫队〕的身上。再说,我的部下率直地热心于执行这种处决,这也是正确的。”

库贝不满足于公开谴责最后解决执行者是野蛮人。他撤去自己办公大楼门口的党卫队岗哨,改派冲锋队员担任。遇到哪个党卫队员对犹太人干了坏事,他总要出面干预。他竭尽全力阻挠消灭犹太人。施特劳赫定于1942年3月1日对明斯克隔离区进行屠杀;五千名犹太人接到保安警察命令,到指定的地点集中听候“易地安置”。可是库贝泄露了这个行动计划。犹太人从他那里明白了施特劳赫的真实企图;在专区本部机关工作的犹太人,得到库贝间接的警告:不要去隔离区。施特劳赫在盛怒之下,只好设法一个一个地搜捕犹太人。这样就出现了骚乱局面,促使专员再次提出抗议。施特劳赫报告道:“他大肆辱骂了我手下的好些人。一个劲骂‘肮脏东西’和‘我们还要算账的’。”

342 最后解放执行者施特劳赫眼见自己被老战士库贝搞得寸步难行,只好向上司报警。希姆莱向库贝的最高领导、东方事务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告了一状,后者也答应立即警告抨击党卫队的库贝。但库贝并未让步,何况他知道顶头上司、奥斯特兰德国专员欣里希·洛泽同样也象他自己一样厌恶希姆莱的机器。库贝抓住新发动的一次名为打击游击队、实则大规模消灭犹太人的行动计划(“科特布斯大行动计划”),抨击党卫队部队的整个作战方式。他在致罗森堡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这种行动计划的政治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被警察消灭的俄国人,有些根本不是什么游击队,而是无辜的农民。库贝写道:“如果说在四千五百名被击毙的敌人中只缴获到四百九十二支枪的话,那么两个数字相差如此悬殊就足以表明,在这些击毙的敌人中间,也有一大批是当地农民。”1943年6月18日,洛泽对库贝的报告评述道:“对比一下卡

廷\*,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只要想想,这种事件将会被对方知道,在那里进行大屠杀!也许这样的宣传,只是由于听众和读者对此不愿信以为真,所以才没有起什么作用。”

恐怖机器的操纵者们想不出办法收拾他们在明斯克的对手。突然,苏联游击队帮了他们的忙:1943年9月22日凌晨以前的夜里,威廉·库贝丧命于一颗炸弹,这颗炸弹是由他的女服务员(一名游击队女谍报员)偷偷装在他床底下的。希姆莱得意洋洋地说,库贝的死是祖国的幸运。

希姆莱可以从容不迫地作出判断了,因为最后解决执行者在俄国的工作已接近尾声。他们完成了大量任务:在德国人到达时来不及逃走的二百五十万俄国犹太人,已有九十万被消灭。在苏军转入反攻追击入侵者之前,旗队长保罗·布洛贝尔开始消灭屠杀犹太人的罪迹。他带领一支番号为“1005分队”的特别队,打开被害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坑,把尸体拉出来,架在浇了油的铁格子上焚化,烧不干净的骨头,则用特制的磨子碾成骨粉。焚尸灭迹的熊熊火光映出一幅地狱般的景象,这是征伐和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丧心病狂的军国主义最新创举。

可是,就在灭绝俄国犹太人的活动尚未完全结束之前,希姆莱已下令转入一个新的集体屠杀阶段。不固定的屠杀场一变而为固定的杀人工厂,枪杀改为用毒气杀人、令人发指的毒气室。最早提出用毒气杀人的,是瓦尔特兰区长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阿图尔·格赖泽尔;1941年秋,他请求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给他调来杀人不眨眼的最后解决执行者,以便将瓦尔特兰区也尽快变成“无犹区”。格赖泽尔的独立王国里还有十万名犹太人,几乎全部集中在里茨曼施塔特的隔离区——必须把他们赶快消灭掉。

---

\* 德国军队侵入苏联时,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发现了大规模杀人坑,约有一万名波兰军官在1940年被苏联人杀害。——原注

希姆莱和主管其事的德国中央保安局长海德里希立即表示同意，并派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朗格出发。海德里希指示他带去德国中央保安局最可怖的创造发明，即已经在俄国用过的毒气车。这一年年底，朗格在里茨曼施塔特附近建立了人类史上第一座杀人工厂。在里茨曼施塔特西北六十公里的地方库尔姆霍夫的森林里，找到了一所古堡，四周荒无人烟，是执行他的兽性使命的理想地方。1941年12月，朗格的分队用三辆毒气车开始了灭绝工作。

一列一列火车从里茨曼施塔特将犹太人装到库尔姆霍夫车站，押进古堡；到达后他们被命令脱光衣裤，排队登上一辆闷罐子卡车，只说是送他们去洗淋浴。乘车洗澡变成了乘车去见死神；车门刚在犹太人身后关闭，一根暗装的管子就将毒气排进车厢，把受害者杀死。同时，还准备了一支从犹太人中挑选组成的特别队，它把死人搬进事先掘好的大尸坑，取走死者身上的最后一点贵重物品。靠着这种下手活，有些犹太人换来这样一种特权——可以在古堡的地下室里多活上几个星期，等待下一批受难者运到。但是，这种原始的屠杀工具常常给刽子手带来麻烦，有时排气要出故障。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使用说明书介绍，十五分钟能全部解决问题，可是实际上往往要几个钟头。有时打开死亡车的车门，还有人活着。

库尔姆霍夫集体屠杀的报告也必定被地区总队长海因里希·缪勒看到了，因为秘密警察处长有一天将他的犹太问题助手艾希曼找了来。缪勒说：“您下去走走，我想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于是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出发了，他走进朗格同事的古堡，视察犹太人怎样被送进死亡车和运往万人坑的。“接着我跟在卡车后面，”艾希曼后来回忆说，“突然，我看到了生平最可怕的事情。”艾希曼写道：“它〔卡车〕开到一个长方形坑的旁边，



车门被打开，死尸从车上卸下来；好象他们还活着，四肢柔软无力。全被扔进坑里。我还看见有个穿便服的人，拿一把钳子在撬牙齿。后来我就离开了。乘上汽车走了，再也没有说什么。我的差事已结束，任务已经完成。”艾希曼知道的“还有一点：那里有个穿白外衣的医生，叫我到一个窥视孔旁看看他们在车厢里的情形。我拒绝了。我不能看，我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我得走。可怕，我要说，这是地狱。不，我不能看，我告诉了他〔秘密警察缪勒〕。”

库尔姆霍夫的残酷暴行引起了杀人技术专家和毒气专家进行一场疯狂的竞争，因为朗格的计划发出了最后解决进入新阶段的信号，即推行一种种族主义狂的新变种：集体灭绝一支最大的犹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落入卐字旗阴影里的波兰犹太人。

在1931年波兰进行人口调查登记的三百万犹太人，有二百三十万沦于德国统治之下。他们几乎全部在纳粹占领的最初几个月里，被迫迁到海德里希划定的隔离区，这些隔离区原是考虑作为规划中的犹太人外迁集中地的；自从开始“最后解决”起，它们就越来越变为死亡的等候处。“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消灭遇到的犹太人，”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大声告诉他的部属说。“对这些〔波兰〕犹太人，我们没法枪毙，我们没法用毒药药死他们，但是可以用某种能够收到灭绝效果的办法，而且要考虑……大规模措施。”

海因里希·希姆莱已经想出了“大规模措施”，以便按他的办法解决问题。库尔姆霍夫的试验指明了这条途径。在旧波兰领土上，即在总督辖区和所谓并入德国的地区，行将出现一系列杀人工厂，用来消灭最后一个波兰的、甚而至于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一桩偶然事件也给希姆莱提供了为此而需要的技术高超的刽子手队伍。还在格赖泽尔请求全国领袖支援消灭“他的”犹太人之前，一次代号为“无苦致死”的屠杀行动业已结束，这次行动共消灭十万

名精神病患者——这是纳粹官方用语——“活着无用的”人。

在上述行动中，也有几个参加者是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总监推荐借调的党卫队队长和刑事官员，他们用毒气杀害受难者干得十分出色。为首的是刑事高级专员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一个冷酷无情的卤莽汉，就是无苦致死方案的神经中枢人物，即总理府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刽子手。维尔特在使用一氧化碳杀人的无苦致死行动的死亡院工作，用一氧化碳杀人，既快又无声息。1942年年初，希姆莱询问党卫队医生恩斯特·格拉维茨博士，有什么办法能以最快速度消灭几百万波兰犹太人，这位青年医生当即推荐了暂时没有事做的这位刑事高级专员。希姆莱召见了毒气专家，指示他去波兰继续干他的本行。不久，维尔特向卢布林党卫队兼警察领袖奥迪洛·格洛波斯尼克报到，后者奉希姆莱之命负责消灭波兰犹太人的所谓“赖因哈德行动”。维尔特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维尔特不用朗格同事在库尔姆霍夫所用的活动的毒气室，因为这位专家认为那是不屑一顾的拙劣的玩意儿，于是这位刑事警察另行设计出固定的毒气室，将柴油发动机排出的废气从管道里打进去。死亡室伪装成“蒸汽浴室”。一位目击者记述道：毒气室系统看上去象“浴室模样”，栽有“天竺葵，接着是小阶梯，然后左右各有三间长宽各五公尺、高一公尺九十公分的房间，装有汽车间式的木门。后壁上开有一扇扇象仓库一样的大木头门。天花板上饰有‘小巧玲珑的’六角星<sup>①</sup>！”维尔特在这些杀人车间周围，配以纳粹集中营常有的点缀品：棚房、点名场、重重铁丝网。沿布格河附近一带，很快就设立了一系列灭绝营，除卢布林营以外，全由党卫队旅队长格洛波斯尼克主管。

一所一所死亡工厂在平地上建立起来。1942年3月17日，维

---

<sup>①</sup> 西俗以两个等边三角形对叠构成之六角星，亦称大卫星，标志犹太人。——译者

尔特设计的第一所灭绝工厂即设在卢布林—伦堡铁路线旁的贝乌泽茨灭绝营开工了，它装有六间毒气室，每天最多可杀害一万五千人。接着4月里开工的是靠近乌克兰德国专区边界的索比布林营，每天最多可杀两万人。三个月后，出现了设在华沙东北一百二十公里处的特雷布林卡营，它是维尔特设计的最大一所灭绝营，有十三间毒气室，每天可处死二万五千人。最后一处是附设在1942年秋天即已存在的卢布林集中营（战后称为马伊达内克）里的毒气室。克里斯蒂安·维尔特负责波兰境内的党卫队帝国全部灭绝工厂的技术领导。他不断刷新杀人纪录，表现了一种杀人不眨眼的恐怖技能，使这位刑事高级专员成为灭绝波兰犹太人的无冕之王。

但是维尔特在灭绝营这个神秘世界里碰到了嫉妒他身居高位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东方德占区内最大的、同属灭绝工厂的上西里西亚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人，他们不断采用新方法，下决心要把毒气专家维尔特从他的创记录宝座上拉下来。奥斯维辛监护营营长、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卡尔·弗里奇成功地击败了特雷布林卡的对手。他找到了一种新的杀人毒品，这是屠犹灭害思想家们认为最好的一种：德格奇公司（“德国杀虫剂有限公司”）推销的一种杀虫药氢氰酸齐克隆 B。齐克隆 B 比维尔特的毒气优越：只要戴上<sup>346</sup>防毒面具，打开圆形盒装的齐克隆 B，倒出药剂——过几分钟受害者就一命呜呼了。比较起来，维尔特花的时间长。

一批党卫队队长着手把维尔特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氢氰酸分配人、基督教徒兼纳粹政权反对者、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库特·格施泰因，和艾希曼的副手罗尔夫·京特莅临贝乌泽茨灭绝营，前来检验维尔特的灭绝方法。格施泰因后来记下了他在这次1942年8月亲身经历的事情。

“火车到了，”格施泰因在现场观看。“两百名乌克兰人打开车

门，用皮鞭把人从车上赶下来。一个大型扩音器发出下述指令：脱光衣裤，摘掉假手假脚、眼镜等等。接着替妇女和姑娘们理发，大都只是狠狠几剪刀把头发剪光，塞进装土豆的麻袋。然后队伍起步了，头里是一个异常美貌的姑娘，他们就这样沿着林荫道走去，一个个光着身子，男人、妇女、小孩，卸去假手假脚……他们走上台阶，犹豫不决地进了死亡室！多数人一言不发。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犹太女人眼里冒着怒火，大声叫嚷凶手们要在这里杀人了！她被劈头抽了五、六鞭子，然后也进了毒气室。几间房子里塞满了人。尽量塞满——这是维尔特的命令。男男女女挨个儿紧贴站着……现在我终于也懂得了，为什么人们管整个装置叫赫肯霍尔特发明。赫肯霍尔特是柴油发动机司机，一名小技术员，是这套装置的建造者。利用柴油机排出的废气将人杀死。”

可是，就在发动机正要开动时，杀人技师维尔特遇到了叫他难堪不过的事情：发动机不响。格施泰因掏出一只马表，计算齐克隆 B 的竞争对手由此失败的时间纪录。“维尔特来了，”格施泰因记道。“可以看出他感到十分难堪，因为偏偏我今天来到这里，就出了岔子。是啊，什么我都看了！我等着。我的马表走得清清楚楚。五十分，七十秒——柴油机发动不起来了！毒气室里的人在等着。再急也没有用！可以听到他们的哭声、抽泣声……维尔特挥起鞭子，朝给三级小队副赫肯霍尔特开柴油机的乌克兰人，劈脸抽了十二、三鞭。过了两小时四十九分钟——马表计算得完全准确——柴油机发动了……又过了二十五分钟。不错，现在许多人死了。透过一扇小窗，撤亮电灯，可以看到室内的情况。过了二十八分钟，还有几个活着。最后过了三十二分钟，全都死了。劳动队打开 347 另一边的木头门。死人象玄武岩石柱，一个紧挨着一个直挺挺立着。按说，也实在没有空隙可栽倒，哪怕只是弯弯腰。”

象京特这些齐克隆 B 的信徒们清楚地看出，杀人专家维尔特

已失去自己的垄断地位。从这时起，奥斯维辛和维尔特的灭绝营之间，处于争斗状态。奥斯维辛终于引进了杀虫剂。对于这一胜利，任何人的高兴劲都比不上奥斯维辛长官鲁道夫·霍斯。“我必须坦率地说，这种毒气使我放心了，”他在自传中说。“我一直厌恶枪杀，因为我总想到有那么多人，有妇女和儿童。现在我的确放心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用不着看血流成河的场面了。”

可以开始集中消灭波兰犹太人了。希姆莱发出了动手的信号。风纪警察、外国自效分子，和由德国人组成的犹太事务纠察服役队，把犹太人逐出隔离区，赶进六个灭绝营的死亡之磨。“我命令，”希姆莱在1942年7月19日致函东部（克拉科夫）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党卫队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说，“总督辖区内的所有犹太居民易地安置工作，应于1942年12月31日以前进行并结束。”列入死亡簿上的人，已经排着队悲惨地走进杀人工厂，隔离区已逐个变为无人区，这时，有一派力量又一次阻挠着死亡之磨的转动。在德国占领波兰的短暂历史中，武装部队再次猛烈抨击最后解决的疯狂行动。

跟待在俄国、被游击战弄得六神无主的某些同行不一样，驻在波兰的军人们尽力公开出面保护犹太人。他们提出一条即使是种族主义狂热分子也不得不考虑的理由：最后解决的结果，将使武装部队丧失犹太人劳动力，没有这些劳动力，东方的军备企业将陷于瘫痪。海德里希早已料到会有人提这种抗议。他在1941年10月4日指出存在着一种危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很多人要求将犹太人作为不可缺少的劳动力加以保留，而谁也不去设法寻找其他劳动力来代替犹太人”。总督辖区军区司令库特·冯·吉南特男爵将军和华沙军备管理处处长弗雷特尔上校决定要做正是海德里希所担心的事情。

他们毫不怀疑，所谓的易地安置犹太人（格洛博斯尼克说：“整

个这件事情是当前所有事情中最保密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打算屠杀几百万人。7月里,弗里德里希·威廉·哈斯勒上尉问弗雷特上校,消灭犹太人之说是否确实。弗雷特上校默不作声。哈斯勒嘟囔着说:“这里发生的事情,从法学上来说,对身为基督教徒的我来说是罪恶。将来会有报应的。”接着,弗雷特上校告诉哈斯勒面前有三种选择:他可以大声说出他的看法,其结果必是自我毁灭;他可以请病假;不过他也可以继续留在他弗雷特的身边,支持军备管理处为犹太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哈斯勒上尉同意留下来。

但是,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克吕格尔看出了军人们的意图,表面上迁就他们一点。他征得最高统帅部军备管理处同意,允许暂时保留犹太人劳动力,不过犹太人必须集中在工厂或营里,由党卫队看管。克吕格尔企图用这种办法,逐步解除军人们对犹太人的控制权。可是即使这么一点微小的让步,最后解决的狂人希姆莱也认为太过分了,他一再训诫克吕格尔不要向武装部队作任何让步。希姆莱还从另外一条渠道着手对付军方的抵制:逼着最高统帅部命令总督辖区的军人们退让妥协。

象多次遇到发生政治争执时情况一样,最高统帅部凯特尔元帅又一次给他的军官们从背后捅了一刀。就在军备管理处坚持保留总督辖区所有犹太人的时候,凯特尔在1942年9月5日命令立即用波兰人代替所有犹太人劳动力。军区司令冯·吉南特痛斥领袖大本营里的走狗特尔<sup>①</sup>。9月18日,他给武装部队司令部送了一份备忘录,列举数字阐明他的看法:“立即弄走犹太人,结果将严重削弱德国战争实力和至少暂时使前方及总〔督〕辖〔区〕部队的补给陷于停顿。”

---

<sup>①</sup> 原文为 Lakaitel,系本书作者将 Lakai(走狗)和 Keitel(凯特尔)两词并在一起构成的一个贬义词。——译者

吉南特提出：“请求将在工商企业中工作的犹太人的易地安置工作延期（至少俟重要产品任务完成以后）进行。”凯特尔好歹不得不将吉南特的备忘录拿给希姆莱看，但后者对军方破坏消灭犹太人的计划很生气。希姆莱在10月2日发火道：“对一切认为必须以所谓军备利益为由进行反对，而实际上纯系企图支持犹太人及其工商企业的人，我已指示毫不留情地采取行动。”胆小怕事的凯特尔不等希姆莱作出什么反应，就直接挥动他的指挥棒朝波兰的造反者们打去。冯·吉南特将军随即被调离职务。10月10日，武装部队司令部在一份电报中重申：“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党卫队全国领袖一致坚持这一原则，即立即以亚利安种劳动力代替由武装部队用作军事辅助勤务和在军备经济部门中工作的犹太人。” 349

武装部队投降了。1942年10月13日至15日，总督辖区最高司令部奉命解雇它的犹太劳动力。这样——历史学家汉斯·冯·克兰哈尔斯估计——“总督辖区的所有犹太人就统统落进了党卫队之手”。最后解决执行者可以为所欲为了。一星期接一星期，一天接一天，一小时接一小时，党卫队刽子手及其外国帮凶们把犹太人赶进毒气室，对他们拳打脚踢，百般折磨、凌辱和拷打。

东方的死亡之磨几乎不停地转动，每一小时，每一具死尸，增添着德国野蛮罪行录上的新罪行。屠杀工厂记录的数字，即使以今天的人类智力，也几难记录：在库尔姆霍夫死去的犹太人超过十五万二千，贝乌泽茨为六十万，索比布尔二十五万，特雷布林卡七十万，卢布林—马伊达内克二十万，奥斯维辛在一百万以上。几十万犹太人葬身于不受任何约束的肆虐狂的恶浪之中。从索比布尔的刽子手戈梅斯基在押送犹太人来营途中，就用铁水壶将病号的天灵盖砸破，直到把小孩往棚房墙壁上擗去，小脑袋开了花——这些都是“工余闲暇的消遣”——身披党卫队制服的野蛮人真是无恶不作。

马克斯·卡斯纳是奥斯维辛干清除死尸活的囚徒，他奉命来到一所大棚房的院子里。“左边躺着七十来具女尸，都是挑出来的美人。死后模样仍然很美，”他说。“女尸的乳房都被割掉，所有柔软的部分，靠近大腿处，大块肌肉被一条条割了下来。院子地面已倾斜，阴沟里积满了血水，我们淌着齐脚踝深的血水走。”看守每天都朝小孩开枪。华沙教授卢德维克·希尔斯茨费尔德看到“一个小女孩想悄悄钻过岗哨。看守喊她站住。那人慢条斯理地摘下肩上的枪。小女孩抱住他的皮靴请求饶命。哨兵笑了一声说：‘不要你的命，只让你再也无法悄悄地钻了。’说着对准小女孩腿上就是一枪。后来她不得不被截去大腿。”

350 奥斯维辛的情报队长、二级小队长奥斯瓦尔德·卡杜克，晚上把五十名囚徒赶进淋浴室，命令他们光着身子，跃过一根离地面五十公分高的手杖。谁跳不过就叫到左边站着，随后用毒气毒死。如果大多数人都跳过了，卡杜克就殴打他们，直到他们同样倒地而死。“卡杜克还有一个癖好，”囚徒勒德雷尔说：卡杜克在所谓检查虱子时，叫身上查出还有一个虱子的囚徒，将一根抬饭桶的杠捧架在脖子上，然后他在杠棒的两头反复使劲向下压，直到把囚徒弄死为止。

特雷布林卡长官库特·弗兰茨经常唆使他的训练得非常凶恶的大狼狗“巴里”去咬囚徒，吊在绞刑架上的犹太人，凡是脑袋下垂的，都被狼狗咬得血肉模糊。弗兰茨也设有一间伪装成军医院的行刑所，紧挨着一个长八米宽四米的大尸坑，里面经常烧着火。这位长官每天点三次名，每次都要挑出十个犹太人，供自己亲手处决。把他们——囚徒雅库博维茨谈——“用皮鞭赶进军医院，在那里将他们枪毙。好象自动化式的，枪毙一个，掉进坑里一个，再毙一个，再掉进去一个”。

属于奥斯维辛营政治部的二级小队长威廉·博格尔，同样是



个作恶多端的魔鬼。他发明了无疑是欧洲最大灭绝工厂使用的最臭名远扬的刑具。党卫队二级小队队长佩里·布罗德在战后写道：“两张桌子并排摆着，相隔一公尺。受害者被强令坐在地上，收紧大腿，双手抱住膝盖，然后给他戴上手铐，用一根粗棍子从胳膊和膝盖间穿过，棍子两头架在两张桌沿上。这样他就脑袋朝下，悬空倒挂在桌子当中。接着再用一根牛鞭子抽打他的屁股和赤裸的脚后跟。抽打得如此狠毒，致使受刑者几乎翻转身来。每当屁股摆动到很高时，就要狠挨一棍子。如果号叫声过于刺耳，虐待狂的秘密警察恶魔就给他戴上一只防毒面具……大约过了十五分钟，受刑者经过痛苦的抽搐变得人事不省了。他再也讲不出话来，裤子变成了紫红色，鲜血淋漓，滴落到地上。最后，脑袋木然下垂，昏厥过去。但这个秘密警察声色不动，若无其事。他咧嘴狞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装有刺鼻气味的液体的小瓶，伸到囚徒的鼻孔边。几分钟后囚徒果然又恢复了知觉。”

这些兽行后来导致后代人错误地以为虐待狂是了解集体灭绝这一现象的关键。直到今天，还有人设想最后解决执行者都是毫无人性的畜生，是一群完全以毁灭和杀人为乐的怪物。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化了。奥斯维辛囚徒埃拉·林根斯-赖纳博士作证说：“在我所认识的党卫队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不出自己不曾救过别人的性命。虐待狂是少数。真正具有病态主动犯罪的不超过百分之五至十。其他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完全能分辨善恶。他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情。”

西德战后审判大规模灭绝者虐待狂的惊心动魄的揭露，恰恰 351  
造成掩饰一种真相的危险，这一真相在1944年就曾为美籍德国女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所指出。她认为，组织大规模灭绝行动“既不在于狂热主义者，也不在于嗜血成性的刽子手或虐待狂”，“它完全在于海因里希·希姆莱先生这类正常人身上。”大规模灭绝的机

器虽也为虐待狂和发泄兽性者所操作，但这并不构成事件的典型特征。这种罪行总是要招引变态人物参加的，因为法国大革命中醉心于断头台和苏联格伯乌分队的清洗狂，对这些人颇有诱惑力。

消灭犹太人的真正骇人听闻、确实令人震惊之处在于，成千上万正直的有妻室儿女的人也参加了这种公开屠杀的勾当，并且在每天屠杀过后还俨然自以为是忠于法律、循规蹈矩的公民，从未想到过有了一步偏离个人道德的道路。虐待狂仅仅只是大规模灭绝的一个方面，而且甚至并不是党卫队领导机关所希望的方面。相反，希姆莱坚持一个根本思想，即大规模灭绝要干得认真、干净，党卫队员在执行国家的屠杀令中必须保持“体面”。

他再三告诫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弗兰克-格里克施：“党卫队领袖同样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可以暴戾乖张。执行任务时发现哪个领袖越出职责规定的范围或对某些界线模糊不清，您都要立即加以干预！谁要是存心装糊涂或者在落到自己手中的敌人面前克制不住自己，那就证明他不配做党卫队领袖。”希姆莱甚至发布条例，以此约束集中营刽子手们的残酷折磨行为。“我严格禁止任何党卫队成员擅自对犹太人采取任何个人行动，”他在1935年8月的一项命令中指出，当时的集中营看守人员，必须每三个月在一份声明书上签名保证自己不虐待囚徒。

1942年秋，党卫队中央法庭处向他请示一个难题：如何裁决专横独断的、不经任何命令擅自枪杀犹太人的案件。希姆莱批复：“一、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者不予治罪，除非考虑到维护秩序有必要给予惩处。二、出于个人私利或虐待狂及发泄性欲动机者，应依法判罪，而且根据情况也包括行凶杀人和打人致死者在内。”有时他确实惩办党卫队中的虐待狂。1943年6月，一名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被判处死刑，原因是他残酷虐待过许多犹太人。党卫队兼警察最高法庭在1943年6月9日的判决书中，说明了惩办这个

三级突击队中队长的原因。理由是：“他擅自……采取与德国人和党卫队领袖身份不相称的残暴手段。这些胡作非为的行径也不能用被告想要提出的理由作为辩解，即它们只是对犹太人加之于德国人民的不幸进行理所当然的报复。在势必消灭我国人民的死敌的斗争中，采用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是德国人民所不取的。被告的行径同这种方法相差无几。”

要是虐待狂再加上贪污腐化，希姆莱则给真正主张惩办的人开放绿灯，因为他认为两者对党卫队都是致命的危险：虐待狂破坏纪律，贪污腐化以腐蚀思想。一段时间里，党卫队法官康拉德·莫根可以在党卫队灭绝者内部进行一次清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海因里希·希姆莱仿佛突然变成了杰基尔博士兼海德先生\*。在全国领袖身上，小资产阶级的个人道德突然同狂热执行领袖命令的机器人性格交织在一起，出现了一种不合情理的现象：希姆莱指令一批党卫队自己的律师，调查几桩“未经许可的”杀害犹太人事件——就在每天有千千万万的人惨遭杀害的灭绝营里！

铁路员工儿子康拉德·莫根，1910年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于反对他所在的地方法院院长的判决，被解除司法工作，后来在克拉科夫党卫队兼警察法庭任打击贪污腐化调查员和助理法官，在同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克吕格尔吵了一架以后，被贬滴到党卫队“维京”师，他发现了集中营一起牵涉面很广的贪污腐化案件。1943年，他被调到中央刑事警察处，同时理所当然地禁止他插手政治性案件。有一天，中央刑事警察处“严重犯罪”小组——莫根也属于这个小组——突然接到来自卡塞尔的求援：该地负责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第二十二党卫队兼警察法庭，计划揭发一起贪污腐

---

\* 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蒂文生所叙述的一个故事（《化身博士》——译者）中的人物：待人和气、乐于助人的医生杰基尔博士经常服药变成阴险残忍的海德先生，随后重又变为富有人情味的杰基尔。——原注

化积案，它牵涉到集中营铁丝网后面的人。

年轻的刑事警察书记埃米尔·霍尔特施密特，怀疑纳粹党魏玛地方组织领袖博恩沙因，这个人食品商，勾结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卡尔·科赫，进行各种非法买卖、从中牟利的活动。当霍尔特施密特过分好奇时，博恩沙因向武装党卫队报到，请求把自己调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司令部。党卫队兼警察法庭抓住了这件案子，但无法采取行动。虽然党卫队兼警察法庭作为一种军事法庭有权过问武装党卫队——集中营看守人员形式上也隶属武装党卫队——，但集中营里自有所谓的军法检察军官，他们不受党卫队中央法庭领导，而是受集中营最高法院法官、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处处长、副总指挥奥斯瓦德·波尔领导。

于是，卡塞尔党卫队兼警察法庭拉中央刑事警察处介入此事。它请求刑事警察处帮助收拾科赫这帮人，不过提出条件，要求中央刑事警察处必须派一名在武装党卫队内拥有领袖头衔的官员来——如果派其他的人，就根本不要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大门。康拉德·莫根原是武装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接受了这项任务，来到魏玛。他在“大象”饭店开了一个房间，进行隐蔽的调查了解。他很快就查明了博恩沙因的罪行。他还很快掌握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讳莫如深的秘密。他没有通过正式手续，查阅了科赫在魏玛银行的存款账户，并派人检查这时已调任卢布林灭绝营长官的科赫跟其留在布痕瓦尔德的妻子伊尔泽的往返信件。莫根越深入调查，就越清楚地看出这个贪污网，它的线也通到其他的集中营。

一件贪污案变成了一桩错综复杂的凶杀案，因为莫根已查明：科赫不仅敲诈勒索过1938年砸玻璃窗之夜抓进集中营来的富裕的犹太人，而且还指使手下人杀害了囚徒中的令人厌恶的人证。莫根决定搞掉以科赫为首的这帮敲诈勒索和行凶杀人的集团。可是

当他向刑事警察处长奈比报告调查结果时，刑事警察头子脸色发白，因为他的歇洛克·福尔摩斯<sup>①</sup>太卖力了。阿图尔·奈比看到了莫根兴师讨伐的可怕后果。他不愿承担责任。但这位侦探眼看战利品就要到手，从一个党卫队领袖找到另一个党卫队领袖。他向秘密警察缪勒报告了案情，缪勒叫他去找德国中央保安局长；后者又告诉他去找党卫队中央法庭处处长，这位处长只回答了一句：去找希姆莱。

莫根跑到全国领袖战地指挥所，但没有找到希姆莱。他向希姆莱本部的一人报告了整个案情，和他商定用一封表面看来很正常的电报进行联系；要是电报来了，就说明希姆莱同意办案。这封电报果然来了。谁也无法证实是什么原因促使希姆莱同意收拾科赫集团的。是他一贯对副总指挥波尔及其贪污腐化的党羽的厌恶，还是他没有估计到科赫案件必会引起的连锁反应？事实终究是事实：小资产阶级希姆莱可以一时坚定地在他的“干净”两字目标前进而自豪。

康拉德·莫根博士就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约请科赫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对他严加审问，这个前集中营统治者终于乱了阵脚，供认不讳。对科赫的起诉书越来越长，杀害克雷默尔和派克斯两名囚徒，侵吞中饱，瓦解防御力量。莫根还逮捕了科赫的同伙：集中营的虐待狂看守佐默尔、集中营医生瓦尔德马尔·霍芬博士、一级小队长布兰克，以及特别是还有“女长官”伊尔泽·科赫。罪状是：凶杀、打死人、摧残人身而致死。

然而莫根及其同事并不满足于肃清科赫一帮人的危害。在莫根的倡议下，这时卡塞尔党卫队兼警察法庭变成了一个“特别”法庭；它有权调查起诉所有集中营里的罪行。莫根查到了新线索：这

---

<sup>①</sup> 科南·道尔(A. Conan Doyle)小说中的高级侦探。——译者

些线索通向东方，直接牵涉到超级保密的灭绝营。侦缉队长莫根发现了他不应该发现的东西：东方死亡工厂里成百万地屠杀犹太人。在卢布林和奥斯维辛，他突然看到了毒气室，并发现在他努力侦查的几件凶杀案背后，有几百万人丧生。他对这一发现有何反应呢？今天他所作出的回答表明，他在当年也患有和全国领袖一样的精神分裂症。莫根博士说，当时的屠杀分为三种：正式屠杀犹太人，“对此我们无法反对，因为这种命令属于最后解决的范围，是总理府也就是希特勒亲自发布的”；同样属于正式屠杀的无苦致死；以及第三种“擅自杀害”囚徒。他开动党卫队司法机器反对的，就是——按照莫根划分的——第三种屠杀。

奈比的中央刑事警察处和莫根在几乎所有的集中营里设了调查委员会，调查贪污腐化和“擅自杀人”案件。波尔的副手们拼命抵制调查人员介入；在一个集中营里调查虐待狂，这可不是没有危险的——集中营人员极力进行反击，甚至狗急跳墙地行凶杀人。奥兰宁堡集中营囚徒罗特是中央刑事警察处的暗探，只是在临到被拉上绞刑架的最后一分钟，才得到解救；集中营领导准备公开处死罗特，以警告其他囚徒不得同莫根合作。在另一所集中营里，刑事警察人员存放案卷材料的棚房被纵火焚毁。在奥斯维辛，一级小队队长格哈德·帕利奇在一所关押犯人的碉堡里失踪，他是莫根派来推翻集中营长官霍斯的。

尽管如此，莫根还是取得一些成绩。在他的领导下，调查了八百起贪污和凶杀事件，其中两百起由法院进行了处理。莫根的战果簿上，记入了阴森的集中营贵族统治的重要人物的姓名：布痕瓦尔德和卢布林长官卡尔·科赫因凶杀罪判处双倍死刑，已予执行；卢布林长官赫尔曼·弗洛尔施泰特因凶杀罪判处死刑，已予执行；卢布林监护拘留营领袖赫尔曼·哈克曼因凶杀罪判处死刑，后改为送惩罚队服役；奥兰宁堡长官汉斯·洛里茨因擅自杀人、嫌疑重

大，进行了起诉调查；塞尔托亨博斯长官亚当·格吕内瓦尔德因虐待囚徒判处有罪，降级使用；弗洛森比尔格长官卡尔·京斯特勒因酗酒和生活放荡被撤职；达豪长官亚历克斯·皮奥科夫斯基因凶杀案被控，但未予判罪；奥斯维辛政治部领导人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因凶杀案被控，但未予判罪。

可是，中央刑事警察处的人愈深入集中营世界的秘密，希姆莱就愈是感到惶惶不安。1944年4月中旬，他命令莫根今后的工作只限于处理科赫一案，所有其他调查一概停止。这一命令暴露出大规模灭绝者希姆莱和干净的使徒希姆莱在理论上陷入了困境。全国领袖命令副总指挥波尔亲自负责处决科赫，其他凶手却被指令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谁坦白交代，谁就可以得到从宽处理。海因里希·希姆莱又一次缩进了他的那种幻想之壳里。“总起来看我们可以说，”还在1943年他就在一次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会议上说，“我们已经使我国人民满意地完成了这个最困难的任务〔消灭犹太人〕。我们也没有因此而使我们在内部、精神上、性格上受到丝毫损失。”

希姆莱正好在开始调查奥斯维辛集中营长官霍斯的时刻指令莫根停止行动，这决非偶然。在鲁道夫·霍斯身上，体现了那种合乎卫生学的大规模屠杀，那种干净利落的机器人性格和理想的党卫队员，希姆莱在批准进行短暂的内部清洗运动时，正是考虑到这几方面的“纯洁性”。因为：决定大规模灭绝的速度和性质的，不是博格勒和卡杜克之流的虐待狂，而是象鲁道夫·霍斯这样的人：有妻儿女的勤恳汉子，在反犹主义的除害灭病斗争的思想中长大，坚持一种不从个人考虑、而讲究军人—工业式规范性的机械主义，这种机械主义将个人对别人应负的任何责任置之度外。

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斯察特描述道，大规模屠杀是“追逐功名、尽忠效劳、崇拜权威而又故作正经的市侩们干的勾当，他们受

到盲目顺从的教育，毫无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浑然自信，人亦云云地说什么，‘消灭’几十万人乃是为人民和祖国所做的好事”。操作消灭犹太人的机器的是现代的普通人。对这些人，汉娜·阿伦特由于找不到一个新的社会学名词而称之为庸人。在这些庸人身上，明显地打上了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相脱离的极坏的烙印，只为自己着想，一种无法根除的自我秉公感，致使他们看不到自己是杀人犯。

356 相反，甚至有一种受到荒唐地推崇的公民诚实感使他们想到，从根本上说，他们在大屠杀中倒是有怜悯心的人，他们非常同情别人的死，同情“造化和罪过”——这是霍斯对集体屠杀的伪善的叙述。霍斯说：“确实再没有比这更难做到的事了，即对这一点必须冷酷无情地、毫无恻隐之心地置之不顾。”象特别行动队员一样，死亡工厂的技术人员也给自己套上一副虚假的自我怜惜的面罩，蒙住他们的眼睛，自以为是真正无辜受罪的人。“对我来说是无法回避的，”霍斯写道。“我必须继续进行和亲自经受这项灭绝工作和集体屠杀，必须继续冷酷地眼看着尽管引起内心深为不安的事情。”只要有一点事情使他激动，这个感情丰富的人就控制不住自己：“我没脸回家去见老婆孩子了。于是我骑马奔驰，以此忘掉这可怕景象，或者在夜里常常进入马房，待在我心爱的马旁寻求内心的平静。”

不过，一旦他们那种市俗的自我秉公感的面罩被戳破，他们就会难过得痛哭流涕，大多会纵情酗酒。即使象旅队长格洛博斯尼克这样野蛮的屠犹者，也在酗酒时对工厂主舒尔茨说出真心话来：“我再也没有心思干了，不过我已经陷得很深，除了同希特勒一道胜利或毁灭外，再无其他办法。”格洛博斯尼克的那个粗暴的助手、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赫尔曼·赫夫勒负责武装放逐过二十万名以上犹太人，他在他的几个死于白喉症的子女坟前抽泣着说：“这是老



天爷对我所干的种种坏事的惩罚！”

但是就在心里刚有所怀疑的时候，他们对有一点仍然顽固地认为：这是命令。“我当时没有作过任何考虑，”霍斯说，“我接到命令，执行了命令。领袖既然亲自下令‘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作为一个老民族社会主义者就没有任何考虑的余地，更不用说一个党卫队领袖了。‘领袖，你下令，我们跟着执行！’——对我们来说绝不是一句空话，不光是嘴上喊喊的口号。它的含义是极其严肃的。”命令，这是他们的偶像、辩护词和最后的防空洞。当美国心理学家吉尔伯特后来问霍斯，当年他是否确信犹太人命中注定该遭这种劫难时，霍斯尽力作出——这位美国人记述——“耐心的解释说，这样提问题本身就不大现实，因为他是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您要知道，我们党卫队员是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我们也根本没想到过要考虑。’”

可是，如果命令含糊不清，如果发布命令者的指示相互矛盾，甚至否定更加不可动摇的信条，又会怎么样呢？那样，集体屠杀者们就必然不可避免地陷入迷宫，而找不到任何出路。当灭绝犹太人的行动进入最后阶段时，最后解决执行者正遇到了这样的处境：在波兰犹太人尚未完全斩尽杀绝以前，一派党卫队势力插手控制东方毒气室的开关阀门，它放慢了灭绝进度，并宣布要留下犹太人作为大德意志战争实力的苦力奴隶。

奥斯瓦德·波尔领导的党卫队经济企业主管机关中央经济管理总处(WVHA)，是集中营和灭绝营世界的一个新部门。最初，主管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是集中营督察员西奥多·艾克，他只是在名义上隶属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领导；艾克改调武装党卫队后，他的继任者理查德·格吕克斯就真正属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管辖了。1942年，希姆莱再次改组了集中营领导的主管系统：格吕克斯和他的工作班子搬进波尔的经济管理总处，集中营督察员组成了

经济管理总处的 D 处。

进入经济管理和热心抓生产的人员的神经中枢的这一步给集中营系统赋予了全新的格局。在此以前，集中营的任务规定为惩罚和灭绝所谓国家和种族敌人；而就经济管理总处的知识分子来看，设立集中营的目的只是为党卫队的经济企业提供奴隶大军。1942 年 4 月 30 日，波尔写信给希姆莱说，提高军备生产使“调动所有囚徒劳动力”势在必行，并要求“采取措施，使集中营从它过去单一的政治形式逐渐过渡为适应经济任务的组织”。

如果说，在此以前人们有意识地残酷无情对待囚徒，以期大量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那么，现在就提出了最终目的在于饶恕和保存集中营的在押人员。格吕克斯指示，必须不停地驱使囚徒干活，但“禁止对囚徒拳打脚踢或者哪怕只是去碰一碰囚徒，这是不言而喻的”。希姆莱命令，可以“通过合理的、必要时额外改进伙食和衣着”的办法，提高囚徒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囚徒为经济事业出力的兴趣”：“因此必须在大部分无动于衷的人的面前表扬积极的囚徒，让他们起表率作用。”属于经济管理总处领导的建筑材料企业“德国土石工程公司”举办了训练班，以便在囚徒中培养技术力量。人们打算通过许诺，吸引囚徒的兴趣，提出给予特别安置、释放出集中营和以民工身分继续就业。一些党卫队经济企业认真计划，安置一大批获释的囚徒住在党卫队企业周围的民房里。

但经济管理总处同时也越来越加重囚徒的劳动；奥斯瓦德·  
358 波尔手下的奴隶，每天必须劳动十一小时，营养不良，常常受到难以设想的对待。经济管理总处的非自愿的劳动大军涌入党卫队和私营经济的各个部门。1944 年底，经济管理总处关在铁丝网内的六十万名囚徒中，有二十五万名在私营军备企业中劳动，十七万名在中央武器军火部直接掌握的企业中劳动，一万五千名在建筑企业中劳动，一万二千名在图林根修建一个领袖大本营的公司劳动，

五万名为经济管理总处 C 处所属的公司劳动，十三万名干农业和服务行业。

转瞬之间，希姆莱就尝到了威胁着他的最后解决计划的思想后果和实际后果。因为经济管理总处的功利主义信徒们也不愿放弃已经注定要死的众多的犹太人。总管所有集中营党卫队木材和铁器加工企业的中央机构“德国装备工程公司”(DAW)已伸手要还活着的波兰犹太人劳动力。

截至 1942 年年底为止，波兰犹太人已被杀掉四分之三；活着的还有七十万人。他们在总督辖区党卫队兼警察领袖管辖下的无数劳动营里苟延残喘，并每隔一定时间就被抓进杀人工厂。经济管理总处的经济帝国主义分子们，把波兰的党卫队集中营掌握在自己手里。1943 年 3 月，波尔的经济管理人员另行组织了“东方工业有限公司”(Osti)，他们利用这家公司占有了犹太劳动力和隔离区残存的工厂。多罗胡恰泥炭厂、卢布林毛刷厂、腊多姆—布利岑装备厂、特拉夫尼基皮革制品厂——原来的犹太人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不被东方工业公司所掌握。

但是，争夺波兰犹太人的斗争，打乱了最后解决狂热分子们的部署，他们突然看到自己的灭绝计划受到了阻碍。华沙党卫队兼警察领袖集中代表了他们的思想感情，他训斥一名经济管理总处人员说：“东方工业公司！只要听到‘工业’两个字，我就讨厌！”对经济管理总处的同事们的反感，在屠杀专家们中间非常强烈，他们给了东方工业公司一次致命的打击。东方工业公司几乎还没开始大展宏图，最后解决执行者就夺走了它的所有犹太工人。1943 年 11 月 3 日，东方工业公司的犹太人被迫走上通向毒气室的道路。东方工业公司第二经理、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马克斯·霍恩博士抱怨说：“由于犹太人劳动力被弄走，直到现在所进行的建设和扩建工作全功尽弃。”

东方工业公司事件，暴露了经济管理总处和德国中央保安局之间的争斗，它一直延续到第三帝国的末日。德国中央保安局想要尽可能斩尽杀绝所有犹太人，经济管理总处想要尽可能保存所有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德国中央保安局，”霍斯记述道，“把每一所新建的劳动营、每一千个新确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都看成是危险：恢复自由、提供某种条件以保住生命。不过看来强者是波尔，因为他的背后有党卫队全国领袖，并越来越迫切需要囚徒参加军备生产。”最后解决执行者的争执愈是激烈，掌握毒气室开关阀门的人就愈加显得不知所措。屠杀专家们的争夺，沉重打击了阿道夫·艾希曼手下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对犹太人迫害者，此外，欧洲各国的抵抗运动越来越激烈，一些党卫队领袖也明显感觉到心灵上的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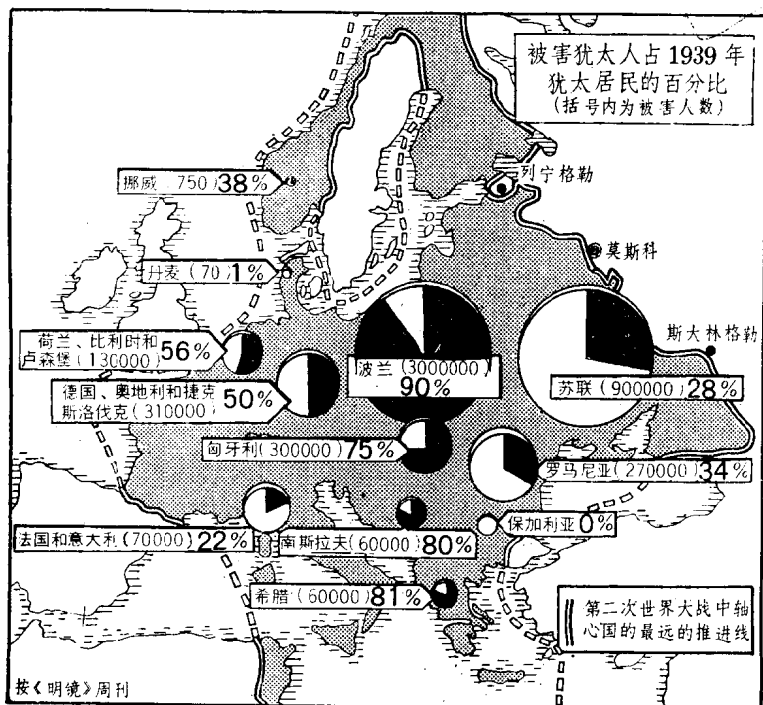
起初，艾希曼及其代表们似乎能够通过一连串迅猛的行动，把欧洲犹太人抓起来送上开往奥斯维辛的死亡专列。1942年1月，德国中央保安局长海德里希在一次会议上——以开会地点取名为万湖会议——，布置将所有欧洲各国犹太人列入屠杀计划，从此阿道夫·艾希曼只认定一个目标：可靠地、万无一失地驱赶和运送注定要死的人。

阴森森的柏林库尔菲尔斯特街116号，原来是共济会的一个地方机构，秘密警察四处B4科就设立在这些宽敞而几乎有些阴森可怕的房间里。在这里，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艾希曼掌握着通向整个〔欧洲〕大陆的、旨在扼杀欧洲犹太民族的各条渠道。他手下有一个由冷酷无情的干部组成的工作班子，他们随时准备把艾希曼的命令贯彻到各个地区。这个工作班子的影响遍及其他德国机构和国外机构的权力范围。大德意志国家的外交人员用高压手段要求外国政府交出它们国家的犹太人，德国铁路局拨出车皮运送；在外交人员和铁路局的支持下，艾希曼开始了他的搜捕战役。艾

希曼在占领地区的保安警察司令和德国各驻外使团身边，均派有犹太问题助手，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库尔菲尔斯滕街发来的命令付诸行动。

在万湖会议召开之前，中欧和西欧的犹太人即已开始了死亡之行。1941年10月，艾希曼的工作班子编好了第一批德国犹太人的死亡专列；11月，从原来德国境内和奥地利运来的犹太人，被送进了明斯克、里加和里茨曼施塔特等地的死亡隔离区。经过几趟押运的专列，德国犹太人就所剩无几了。最后解决执行者的屠杀碌碌转而滚向西方。接着就轮到了荷兰犹太人。在荷兰成立了德国民政机构，掌权的是决非偶然穿上党卫队副总指挥制服的总督

### 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情况



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屠犹分子们可以放开手干了。从1942年5月起，荷兰犹太人被强令配戴黄色六角星章，一个月后，艾希曼指挥把他们用专列运走。6月，死亡的列车滚滚东行。只有荷兰犹太人被消灭得最彻底：押运出境的十一万犹太人中共有六千人幸存。

艾希曼的捕犹猎手们纷纷南下，闯进比利时和法国。可是对最后解决执行者来说，在这个地方开始变得不顺手了；这两个国家归武装部队将领统治，同他们打交道，谁也没有把握是不是还会遇到他们对消灭犹太人的抵制。

波兰和俄国犹太人的命运主要也取决于武装部队的态度，如同在东方一样，这里的军人又给人一个捉摸不定的回答。多亏这个回答，法、比两国犹太人没有受到象巴尔干犹太人那样明显的打击。在巴尔干，德国军方统治者恰恰证明了自己是参与最后解决的忠实的帮凶——又是游击战使军人们堕落为屠犹者的共谋犯。同塞尔维亚游击队作战，使有些最后解决执行者想到，可以干脆让军人将两万名塞尔维亚犹太人作为人质枪毙。外交部负责最后解决的副国务秘书马丁·路德讲了一句俏皮话：“其他军事司令官在其他地区干掉了为数相当大的犹太人，也根本没有吭过一声。”

361 军人们遵命照办。1941年10月2日，第三百四十二步兵师的一个卡车队，在托波拉地区遭到游击队伏击，驻塞尔维亚全权长官、山地部队将军弗兰茨·柏梅当即命令枪毙二千一百名犹太人，以示惩罚。截至10月底，被德国武装部队消灭的犹太人已增至五千。只有余下一万五千犹太妇女和小孩，军方不愿再处决，因为——据军政处处长、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哈拉尔德·图尔纳博士的明确解释——以妇女作人质，同德国士兵们的看法有抵触。剩下的这一万五千人被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毒气车所吞噬：塞尔维亚犹太人几乎无一幸存。

驻希腊的德国占领将军也和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使者狼狈为奸。驻萨洛尼卡—爱琴海地区德军司令冯·克伦茨基中将，授权对五万五千名德占区犹太人发动第一次打击（意大利占领的希腊地区有犹太人一万三千名，保加利亚占领的东北角地区有五千犹太人）。他下令强拉七千名犹太人修筑工事。1943年初，艾希曼派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迪特尔·维斯利歇尼和安东·布龙纳两名密使到希腊，安排押运犹太人去奥斯维辛，军人们又给予协助。陆军士兵奉命出动清剿萨洛尼卡隔离区，武装部队用军车装载犹太人驶往东北，德国“爱琴海海军司令”提供船舱，将希腊大小岛屿上的最后一批犹太人也送进毒气室。

但是西欧占领区的德国将军们，则和他们在巴尔干的同事们大不一样。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德军司令的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据最后解决编年史作者吉拉德·莱特林格估计——“直到1944年7月他自己被捕时止，始终〔能够〕成功地顶住保安警察的干预”。消灭犹太人的速度首次在比利时开始慢下来。艾希曼的密探们只能向柏林报告完成了一半任务：住在比利时的五万二千名犹太人，受害者达两万四千，但几乎没有一个比利时籍犹太人被送进东方死亡工厂。

驻法国德军司令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也很少有兴致支持灭犹计划。他一再拒绝借调军队给保安警察驻法司令、党卫队旗队长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搜捕犹太人。尽管施图尔纳格尔几乎不可能使法国犹太人避免他们在塞尔维亚和希腊的难友的厄运，如果不是法国人坚决保护犹太人不使他们落入克诺亨一伙的魔掌的话。就连听命于德国人的法国维希政府也抵制最后解决执行者。虽然狡猾阴险的法国政府首脑皮埃尔·赖伐尔并不知道，艾希曼的代表提出的将犹太人运往东方的最终目的是杀害他们，但他还是堵住了捕杀犹太人的猎手们的道路——当然

362

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准备万一抵制不住时，就牺牲无国籍犹太人，而决不交出犹太裔法国公民。

1942年7月6日，艾希曼驻巴黎代表、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特奥多尔·丹内克尔以胜利者的口吻向柏林报告，法国政府准备运送无国籍犹太人。可是高兴的时间没有多久。巴黎虽有一万三千名犹太人启程去东方，但艾希曼在外省的死亡专列却始终空空如也。由于保安警察要靠法国宪兵部队合作，法国人得以消极破坏艾希曼的计划。在波尔多，确定7月中旬对无国籍犹太人进行一次大规模行动，可是届时宪兵只交出了一百五十名受害者。艾希曼气势汹汹地打电话给丹内克尔的部队，接电话的是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海因茨·勒特克。勒特克在7月15日的日记里记下了艾希曼的电话：“他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件事太‘丢人’了。他不得不考虑，是否应该索性放弃将法国列为有运送任务的国家。”

半年以后，艾希曼才看到总算还有一个机会捕获他的猎物。1942年11月，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随后德国部队开进法国未被占领的地区——法国人的最后一点行动自由被剥夺了。艾希曼的捕人猎手急忙进入法国南部。不料，这时有一支备受德国军人嘲笑和奚落的军队的代表们以身作则地显示了在集体屠杀时代应有的军人荣誉和人道：十一月事变后进驻法国南部罗纳河东侧地区的意大利军团的军官们不让消灭犹太人了。

意大利军人们在他们的占领地区（希腊、克罗地亚）内不同意采取任何反犹主义措施，这一点过去早就引人注意到了。意大利总参谋部头目向一名托特组织<sup>①</sup>领袖宣布，“对犹太人采取暴行”，是“同意大利军队的荣誉不相符的”。德国将军对这句话，想必也不能置若罔闻。意大利军人给犹太人以帮助的事情不胜枚举：在

---

<sup>①</sup> 指负责修建西壁工事的工程师托特(Todt, Fritz, 1891—1942)博士领导的工程机构，成立于1938年。——译者



希腊，意大利第二军团司令格洛索将军拒绝在自己的占领区内搞犹太人六角星章，并指示派人保护雅典的犹太会堂和犹太人社团的房屋，以防希腊敌视犹太人的组织进行反犹暴行。在德国占领的萨洛尼卡，意大利领事馆通过签发意大利国籍证明，营救了数百名犹太人。1941年夏天，一支意大利部队以打击游击队为名深入克罗地亚腹地，保护了一批犹太人，免遭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最后解决执行者们的搜捕。只因克罗地亚政府提出抗议，这支部队的军官们才被军事法庭传讯，但仅仅判处几天禁闭就了事。

意大利军人们在其新占领的法国地区，也禁止任何反犹行动。德国人在法国行政当局协助下开始拘捕犹太人，意大利人立即起来反对捕犹者。1943年2月，里昂警察头子抓了三百名犹太人，准备运往奥斯维辛，一名意大利将军当即强令释放犹太人。3月初，法国宪兵部队在意占区内逮捕犹太人，意大利人阻止把他们运往德国。在安纳西，意大利士兵久久包围宪兵部队营房，直到当地被捕的犹太人获得释放。

“规定在全欧洲进行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由于意大利方面的态度，在整个法国受到了很大阻碍，”保安警察司令克诺亨诉苦说，并呼吁德国西线总司令教训意大利人。德国军人们突然受到了意大利盟友的榜样的感染。西线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中将通知克诺亨：“倘使意大利政府持有不同观点，西线总司令无法作出任何决策。”

艾希曼随即向外交部求援。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竭力向罗马讲述意大利将军们的消极破坏，请求独裁者墨索里尼帮忙。独裁者不但不予解决问题，而且也使盟友们傻了眼：他派意大利警察总监古伊多·洛斯皮诺索来法国南部；但是很显然，这位警察总监的首要任务似乎是避免同德国人进行任何接触。艾希曼及其代表很快也知道了原因何在。洛斯皮诺索带了一个名叫多纳蒂的助

手，他是一家法一意银行的董事长和梵蒂冈的亲信。洛皮诺索和多纳蒂打算借助罗马教皇宝座，将这时逃入意占区境内的三万名犹太人送往瑞士。屠犹捐客们竭尽全力反对，而且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勒特克对此非常怀疑：“多纳蒂甚至可能是个十足的犹太人。”勒特克计划准备将多纳蒂从尼斯意大利总部绑架到马赛。但保安处的绑架匪徒还没来得及出发，多纳蒂已经登上飞机飞往罗马去了。

364 直到1943年夏意大利投降，才使法国犹太人失去了他们的意大利靠山。不论怎样，意大利将军们的人道主义，使三十万法国犹太人中的百分之八十没有落入死亡工厂。更有甚者，意大利反对最后解决的斗争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和两件事情同时发生，这两件事情放慢了屠杀迫害犹太人的速度和缩小了规模，即希特勒战争时运已一去不返，以及尤其是梵蒂冈对艾希曼东方“易地安置”的真相的揭露。

跟纳粹德国站在一起的机会主义盟友们知道，他们是坐在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上。党卫队最后解决执行者的紧箍咒已经失灵了。大德意志国家的卫星国逐步放弃反犹暴行：1942年秋，斯洛伐克政府停止押运任何犹太人去东方。官方的理由是，梵蒂冈报道了有关被押运去波兰“易地安置”的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命运的真相，以及艾希曼拒绝斯洛伐克派调查委员会视察所谓的东方犹太人易地安置营。1942年12月，罗马尼亚政府——它的反犹主义者所作所为，比德国反犹主义者更残暴——指令停止向德国人交送犹太人。1943年4月，保加利亚皇帝博里斯三世指示，禁止所有押运犹太人的活动——保加利亚犹太人一个也未落入屠犹者之手。

消灭犹太人的计划只能零敲碎打地进行了。作为对意大利消极破坏者的报复，艾希曼计划定于1943年10月16日深夜至17日凌晨前，逮捕罗马的所有犹太人，这次计划也没有成功；八千犹太

人中只抓到了一千二百五十九人。“意大利居民显然进行消极抵制，甚至在许多具体场合积极提供帮助，”10月17日，领导这次行动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警务随员赫伯特·卡普勒拍电报说，“在行动中，反犹主义居民没有露面，相反有大批群众在个别情况下甚至企图赶走警察，保护犹太人。”

毫无疑问，欧洲在愈来愈强烈地抵制最后解决。连希姆莱的一些顾问和部属，也无法置欧洲的这种抵制精神于不顾，并小心翼翼地、悄悄地向各方面靠拢，加入正直人士的行列。希姆莱的保健医生、按摩大夫费利克斯·克尔斯滕起了带头作用。1942年7月15日，他获悉希特勒也将要芬兰交出犹太人，希姆莱将在随后访问赫尔辛基时提出这一要求，这位按摩大夫当即告诉了芬兰驻柏林公使。

7月29日，希姆莱偕克尔斯滕飞抵芬兰。不等希姆莱同芬兰政府开始会谈，克尔斯滕就去找外交部长维廷，就对付希姆莱准备进行的打击出谋献策，并指出，可以说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只有国会有权作出决定，不过最近一次国会要到11月才开会。芬兰人采用了克尔斯滕的献策——果然希姆莱同意等到11月再说。12月14日，全国领袖想起了芬兰人，并问他的保健医生芬兰对最后解决怎么样了。克尔斯滕又提出了一个借口：战局对芬兰人非常不利，政府未敢贸然召开国会提出讨论这种棘手的问题。1943年9月18日，希姆莱又一次谈起芬兰犹太人问题，他悻悻地对按摩大夫嘟囔：“这个虱子大的国家竟然这样傲慢，不尊重领袖的意愿！”芬兰犹太人得救了——这是希姆莱的知心朋友的第一项功绩，以后还有成千上万名欧洲犹太人，多亏这位知心朋友保住了性命。

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德军司令领导下的军政府负责人、党卫队旅队长埃格特·雷德尔，对屠杀犹太人也有自己的看法。早在

1942年3月，他就拒绝接受保安警察克诺亨提出的在比利时也搞犹太六角星章的方案。1943年9月，他自行决定释放被关在梅克林多辛营房、集中等待运往奥斯维辛的比利时犹太人。

甚至象中央内政部国务秘书、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威廉·斯图卡特这样顽固的希特勒信徒，也不想背上屠杀犹太人的恶名。在他的部务参议伯恩哈德·勒泽纳的温和催逼下，他试图救护两支处在危险边沿、命运未卜的德国犹太人：十万零七千名“混血种”和二万八千名“杂婚”犹太人。

在同艾希曼和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屠犹凶手们举行的多次会议上，中央内政部搜索枯肠，竭力陈述理由，试图说服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专家们改变消灭混血种的主张。当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人不为所动时，地区总队长斯图卡特最后采取没有办法中的一个办法：他建议用绝育以代替处死。1942年9月，勒泽纳亲自以斯图卡特的名义拟就一封信致希姆莱。在第三帝国的秘密档案中，几乎再也找不出另一份文件比它更能说明，有意帮助德国犹太人的人，不得不采用多么令人感到尴尬的方法和措辞了。勒泽纳巧妙地针对党卫队头子的日耳曼人和祖先崇拜思想进言。

勒泽勒——亦即斯图卡特——写道：对混血种有必要考虑，“抛弃半犹太种的人，其结果不光是使我们失去了他们的一半应属日耳曼人所有的财产，而且使这些财产恰恰落进反对德国的人的手里”；此外，这些混血种“当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曾经为德国的利益出过大力”。还必须考虑到“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后果”，因为  
366 将混血种和犹太人一律对待，有可能“给祖先和亲属是亚利安人的人造成心灵上的严重负担”。勒泽纳提出：“因此我不认为抛弃计划是真正出于意识到德国的利益，我宁愿……主张对这种半犹太人绝育，让其自然绝种。”然后还有一句关键性的话：“不论抛弃或绝育，当然都应俟……战争结束以后进行。”

全国领袖收到斯图卡特—勒泽纳这封信时，恰巧是他比较听得进意见的时候：大部分混血种得救了——希姆莱下令禁止消灭混血种。斯图卡特由于这封信后来在纽伦堡盟国法官面前也得到了宽大处理，他特别还就他在信中的内情提出了佐证：他在写信前曾向卫生部国务秘书、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康蒂博士进行过了解，混血种绝育事实上是根本做不到的。

最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党卫队领袖暗中怀疑前秘密警察法官和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因为他身为德国驻哥本哈根总督积极破坏消灭丹麦犹太人的行动。贝斯特于1943年9月初获悉，希特勒命令启运六千五百名丹麦犹太人，他立即打电报给外交部，提出理由反对这一行动：“国王和国会〔将〕停止同政府合作。此外还必须估计会出现总罢工。”

尽管如此，希特勒和希姆莱仍坚持打击丹麦犹太人。9月18日，贝斯特再次提出警告：“从政治上说，运走犹太人无疑将造成丹麦局势异常紧张。可能出现动乱，甚至出现总罢工。”贝斯特的警告连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也深信不疑，他向希特勒陈述了总督的顾虑。外交部驻领袖大本营代表赫维尔大使作出的答复是：“领袖不相信行动会引起此种后果。”行动开始了。两营风纪警察被调往丹麦，“瓦尔特兰德号”轮噗噗地驶抵哥本哈根港，前来接运被俘的犹太人。

这时瓦尔纳·贝斯特决定抵制此事。这位总督起来反对领袖了——当然他保持了自己素有的小心谨慎和略显玩世不恭的、但又不给人抓到把柄的风格。贝斯特一听到计划行动日期，就暗中告诉了参与其事的航运专家、老党员格奥尔格·费迪南德·杜克维茨，叫他向犹太人报警。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亲密同事、金质党徽获得者杜克维茨分秒必争。9月27日，他在哥本哈根同丹麦抵抗运动领袖碰头，请他们通知丹麦犹太人领袖。口讯暗中传开，遍

最后解决的牺牲者	
党卫队势力范围内屠杀的犹太人	
德国 (包括奥地利和德国保护领):	250000
斯洛伐克:	60000
丹麦和挪威:	不足1000
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	130000
法国和意大利:	70000
苏联(包括立陶宛、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900000
波兰:	3000000
南斯拉夫:	60000
希腊:	60000
罗马尼亚:	270000
匈牙利:	300000
共计:	5100000
表列数字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进行的研究,其资料来源几乎全系党卫队和德国外交部的文件。	

及犹太会堂和犹太人住宅。丹麦犹太人纷纷躲藏起来,随后他们在历史上一国人民对一个少数民族采取的最值得纪念的援救行动中,被送过厄雷宗德海峡,安全到达瑞典。

贝斯特唯恐保护犹太人做得不够周到。他还多余地指示保安警察司令,不许手下人在这次行动中进入犹太人住宅,只准在外面撒门铃。后来贝斯特说明理由:由于“本地绝大部分犹太人都已经不在他们的

住宅里”,如果“进入主人不在的住宅,只会引起不愉快的印象和导致偷窃等案件发生,从而会增加我们的麻烦”。1943年10月1日深夜至2日拂晓前进行的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保安警察只是抓到了几个没有接到贝斯特的警报的老年犹太人。共抓走四百七十七名犹太人——犹太人总数为六千五百人。贝斯特设法使被捕犹太人关进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所谓老集中营,他们在那里几乎个个活到看见千载帝国的末日。

368 瓦尔纳·贝斯特也许就不会是当年秘密警察的恶讼师,如果他为掩人耳目不采用开玩笑的变幻手法的话。仿佛保安警察刚刚对世界犹太主义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沉重打击,他毕恭毕敬地向柏林报告:“一、在丹麦对犹太人采取的行动已于1943年10月1日深夜至2日凌晨前顺利地进行了。二、即日起丹麦可以称为无犹国了。”当柏林的最后解决执行者大嚷抓到的犹太人寥寥无几时,贝斯特同样装出一副正经相,用不必斤斤计较的口气语中带刺地教

训他们。他在1943年10月5日说：“所说抓到的犹太人寥寥无几，对这一点，保安警察和我事前早已预料到的……鉴于在丹麦对犹太人采取行动的真正目的在于使丹麦成为无犹国而并非尽量多杀人，因此有理由指出，对犹太人采取行动业已达到了它的目的。”

阿道夫·艾希曼再也无法理解他所处的世界了。继威廉·斯图卡特之后，又一个党卫队领袖再次破坏了他的彻底最后解决方案。“我对这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艾希曼后来对审讯他的以色列人说，“因为我在当时还感到惊奇，并说道：‘好啊，这个贝斯特博士还当过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一处处长，当年还就警察的任务和目标作过大报告呐。’于是我对自己说：‘你瞧，你瞧，他现在待在丹麦，他现在在反对他的上级的决定。’”

对这么多的怪事，艾希曼那只庸俗而又凶恶的奴才脑袋再也无法理解了。在他的面前，还有更加使他气愤的意外事情。在他刽子手生涯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即匈牙利犹太人的覆灭中，和他作对的一个犹太人保护者竟会是海因里希·希姆莱。

## 第十四章 党卫队权力的盛衰

毁灭欧洲犹太人，使最后一个怀疑者也看到了党卫队拥有多么可怕的权力，支配着希特勒德国毫无保障的人们。党卫队有如一只长着许多触手的水螅，将它庞大的组织布满全国。保安处和秘密警察，武装党卫队和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遗传研究所和生命之源协会，集中营和经济企业——在国民生活领域里，几乎没有一处不被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机关和部属打入。党卫队组织的结构越来越错综复杂，党卫队机器的系统越来越庞杂和重叠。

庞大组织的各方面都经常在不断变动，往往使人无法准确估计党卫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黑色集团的胚种细胞，即党的卫队或普通党卫队，早已僵化为有名无实的装饰品；它的成员中百分之六十已被吸收入作战部队，其他人无精打采地过着组织生活，或在集会游行时担任纠察，同冲锋队或民族社会主义汽车团中的纳粹老战士几乎毫无区别。取普通党卫队而代之的，是党卫队的特别组织，它们并不引人注目，但影响却大得多。

从德国中央保安局令人窒息的发迹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卫队对德国的控制已达到了何等地步。战争每拖长一年，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国家保卫人员也就越发变本加厉地限制德国人本来就已少得可怜的权利。

战争刚爆发，德国中央保安局就凭借权力，公然将正式法律判决“修改”为任意处决。它反驳中央司法部的抗议者说，党卫队全国领袖根据领袖命令采取一切手段确保德国的安全，这一任务也



包括对违犯战时法者立即处决。

但是，希特勒对德意志民族党人弗朗兹·古特纳多少怀有几分敬畏心情，只要他担任着中央司法部长，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权力毕竟还局限于一定界限之内。1941年1月古特纳一死，它就利用司法部的真空状态——未任命新部长，由软弱无能的国务秘书弗兰茨·施勒格贝格尔暂时负责——发动了一次进攻，使司法从此不再有所起色。

1941年秋，德国中央保安局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除原有职务外，还暂兼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代理保护长官。由于希特勒责成他采取严厉措施，无情镇压骚动的捷克人，海德里希打算在到任之日举行一次公开审判，以使捷克臣民懂得这位新统治者的厉害。保护长官海德里希选中布拉格保护领政府首脑、捷克师长阿洛伊斯·埃利亚斯开刀。长期以来，保安处就怀疑他同捷克抵抗分子和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暗中合作。 370

1940年年中以来，德国中央保安局曾提出将埃利亚斯撤职，并交军事法庭审理。但海德里希王朝的要求没有实现，因为行事审慎的保护长官冯·牛赖特男爵进行抵制，不同意法办埃利亚斯。连纳粹法学家、人民法庭检察长恩斯特·劳茨也认为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有关埃利亚斯的材料很不充分，不足以提出起诉。

可是，新任捷克保护长官海德里希自有除掉埃利亚斯的办法。海德里希知道，野心勃勃的人民法庭主席奥托·蒂拉克博士——老战士，前萨克森邦第一任纳粹司法部长——急于想当中央司法部长，于是便鼓励蒂拉克进行阴谋活动，答应扶持这个萨克森人稳坐中央司法部第一把交椅。1941年9月27日，海德里希和蒂拉克商定逮捕政府总理埃利亚斯，并将他押上人民法庭；但必须把怀疑派检察长劳茨排除在案件之外，而由保安警察代表起诉。德国中央保安局眼看可一举使旧梦成为现实：未来的中央司法部长支

持将始终还遵循常规办事的检察官全都撵走，同意警察专断独行，因为他们今后还要戴上检察官的假面具出席法庭。蒂拉克甘愿出卖司法，后来他的确告诉他的国务秘书罗滕贝格尔说，他当时同海德里希达成协议，“如果他被任命为中央司法部长”，他蒂拉克将“把所有检察官的位子让给全国领袖”，罗滕贝格尔在一份笔记中这样写道。

在柏林商定的这出埃利亚斯的戏，在布拉格上演了。蒂拉克让这位被他蒙在鼓里的检察长去作周末旅行，同时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逮捕了捷克总理，由布拉格秘密警察局长、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汉斯·格施克博士出面对埃利亚斯起诉。柏林司法最高当局还没来得及了解布拉格出了什么事情，海德里希已强行演完了这出残酷的司法喜剧：9月28日逮捕埃利亚斯，翌日即由党卫队格施克起诉，9月30日第一人民法庭审判庭下到布拉格，10月1  
371 日10时整正式开庭审判埃利亚斯，四小时后立即宣布判决。判词称：阴谋通敌叛国，数罪诸发，判处死刑。

奥托·蒂拉克干得不坏，理应得到报酬：1942年8月20日，这位有功必赏的独裁者任命他为中央司法部长。这位新部长后来也紧紧投靠党卫队。虽然一般司法官员的抵制使蒂拉克未能将检察权全部送给黑色集团，但是司法部长一步步把司法特权让给党卫队全国领袖：1942年9月18日，蒂拉克同希姆莱达成协议，同意德国中央保安局拥有特权，可以由秘密警察作出“特别处理”修改法院的判决；他也同意将通过正常司法手续判处八年以上徒刑的犯人交给警察。1942年11月初，蒂拉克把并入德国的东方地区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刑事司法权全部交给保安警察。1943年夏，他同意德国领土上对所有犹太人的刑事司法统统置于德国中央保安局掌握之下。

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了。一批忠于传统的中

央内政部(RMdl)官员, 还曾试图对形式上隶属中央内政部领导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警察机器进行整顿。从1943年8月起, 这批内政部反对派也被堵住了嘴巴: 海因里希·希姆莱接替下台的抨击党卫队的威廉·弗立克, 任内政部长。这样一来, 内政部的重要职权转入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手中。该部第一司几乎完全失去了宪法—立法—行政方面的主要职能, 这些职能落入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竞争者之手。

希姆莱的出任此职使风纪警察总处特别受到沉重的打击; 因为这个处富有传统思想的官员、法学家和军官, 对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保安警察一直怀有戒心。在一次婉转地称之为“明确划分业务范围”的内部清洗行动中, 风纪警察总处被划归德国中央保安局, 完全置于刑事警察控制之下。更有甚者: 以前属于风纪警察业务的户籍申报管理工作、普通警察权利和一般警察机构问题直到风纪警察的工作范围全被德国中央保安局囊括一空。风纪警察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政治职权, 风纪警察总处被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政治优势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

内政部长希姆莱踌躇满志地解散了风纪警察的“行政和法律”处, 因为该处不随大流的处长、部务主任维尔纳·布拉赫特经常叫党卫队头子受闷气。这个令人讨厌的法律职权机构被改为经济管理处, 老战士、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奥古斯特·弗兰克取代了旧官员 372 布拉赫特。几乎与此同时, 风纪警察处长和希姆莱的竞争对手库特·达吕格患了重病, 全国领袖乘机取消了风纪警察的最后一点独立性。1944年夏, 风纪警察的福利补助问题划归党卫队管理; 风纪警察作为警察的物质待遇权利也被剥夺一空, 并入了德国中央保安局。

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扩张, 当然只是说明党卫队权力不断增长的一个佐证。希姆莱组织天才的另一个创造发明, 即经济管理总

处(WVHA)也同样说明,党卫队是如何深入地渗透到纳粹政权的统治机构的。

经济管理总处的前身是党卫队的行政管理处,是党卫队中央主管处局属下的一个部门,从1934年起负责普通党卫队的行政管理问题。希姆莱派了一个名叫奥斯瓦德·波尔的前海军军需官当处长,波尔是个既蛮横又精灵的行政暴君,外表酷似墨索里尼,并且和这个意大利人一样有着毫无天良的功名心。事实证明,旅队长波尔是个会动脑筋的组织者,他很快就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他把他的行政管理处的职权扩大到骷髅队和特别机动部队,本人晋升为党卫队全国司库,以部务主任身分在党卫队全国领袖兼中央内政部德国警察总监头儿手下主管(国家机关)“财政和建筑工程”处。

1939年,财界人士波尔已是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掌握很大权力,致使希姆莱让他摆脱党卫队中央主管处局的束缚,自行领导一个总处,即管理和经济总处。三年以后,当集中营也划归波尔领导时,他就把管理和经济总处同财政和建筑工程处合并成经济管理总处(WVHA)。不久,波尔就争得了很高的地位,仅次于德国中央保安局长的党卫队中央主管处局长一级中最有势力的人物。

四条宽阔的渠道,将他同党卫队帝国最重要的力量源泉联系在一起:他监督武装党卫队的所有部队管理和部队经济,控制了二十个集中营和一百六十五所劳动营,掌握着党卫队和警察的全部建筑工程计划,指挥党卫队的经济企业。特别是经济管理总处处长把集中营大批囚徒和党卫队企业之间的联系,看成是一个力量源泉,可以使他的处跃居德国经济生活中最强大的实力因素之列。

很早以前,商学士格奥尔格和汉斯·勒尔纳兄弟,以及建筑工程主任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弗兰茨·艾伦施马尔茨等人,就已大胆开办了党卫队自己的经济企业。战争爆发时,党卫队拥有四大企业:“德国土石工程有限公司”,这是开采建筑材料的企业,它的十

四家花岗石、砖瓦和钢化砖瓦厂于1943年达到总销售金额一千四百八十二万二千马克；“德国装备有限公司”，这是综合各集中营所有面包工场、从铸剑直到木铁加工等工厂的车间而成的一个企业，1943年总营业额为二千三百二十万零四千零三十二马克；“德国粮食和给养试验所”，这是利用集中营旁空地开辟百草园的草药迷希姆莱最爱好的企业，不过后来也并进了农场、林业企业和养鱼场，试验生产新的和无副作用的食品；“纺织品和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这是在腊文斯勃鲁克妇女集中营办的企业，主要生产武装党卫队的军服，1943年业务年度总营业额为九百万马克以上。

波尔把四大企业合并成一家康采恩（“德国经济经营公司”，DWB），作为总管理公司掌握党卫队企业的所有业务投资。德国经济经营公司的成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管理总处运用大型资本主义渗透术，对德国一些经济部门进行蚕食。党卫队对外几乎不以公司老板或企业主的面目出现——代表德国经济经营公司出面的两个伙计，一个是部务主任奥斯瓦德·波尔，一个是商学士格奥尔格·勒尔纳。人们必须查阅党卫队花名册，才能知道波尔是党卫队副总指挥，勒尔纳是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他们分别担任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处的正副处长。

感谢历史学家恩诺·格奥尔格，是他给人们提供了编写历史中所需要的、有助于了解希姆莱经济企业的许多原则性启示。格奥尔格评述道：党卫队帝国“利用商法的诡辩，理想地掩盖了它的真实面目”，并将这个打着合法的官方招牌行营私之实的卡特尔，化为“一种机会主义的大企业”。超级资本家波尔当然非常清醒，不会忘记打入各个经济领域。他拟定了一个重点计划，以打开各个具体生产行业的大门，实现党卫队进行垄断的企图。

波尔的首次出击选择了一个工业行业作为目标，这个行业对经济管理总处资本主义掠夺欲的诱惑力，同生活改革家希姆莱反

对饮酒的热忱不谋而合。在苏台德地区，有许多主要属于犹太人或英国人所有的矿泉水厂；在亚利安法令的庇护下，波尔的代表们攫取了许多饮料公司。经济管理总处买下了格林矿泉水的矿泉，后来将其改名为“苏台德矿泉”。接着先后又收买了海因里希·马托尼公司和德国骑士团在弗罗依登塔尔的饮料厂——没有一家重要的非酒精性饮料工业厂家能逃脱党卫队的控制。在德国，波尔也使矿泉水灌进了党卫队的容器。林堡附近的下泽尔特斯矿泉，为经济管理总处独家租用，德国阿波利纳里斯矿泉水公司由经济管理总处占为己有。1944年，波尔掌握了德国矿泉水生产的百分之七十五。

苏台德区也是经济管理总处的资本家们另一项收获相当大的掠夺场所。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家具厂之一、前犹太企业埃米尔·格斯特尔字号落入了这些资本家之手，变成了党卫队自己的家具工业总店。当然，经济管理总处不得不特别小心地给自己采用的手法披上一层伪装。由于中央经济部提出格斯特尔字号不得由党卫队占为己有，所以斯图加特家具厂老板库特·迈博士和两个伙计组织了“德国巧匠公司”，他们是未来格斯特尔字号的业主。中央经济部哪里知道，迈博士也是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经济管理总处W处第四科科长。迈和他的两个傀儡，也立即将他们在德国巧匠公司的营业股份献给党卫队康采恩（德国经济经营公司）。党卫队这条蛀虫，一步步地蛀空了木材和家具工业的骨架子。林茨附近的巴赫曼宁格锯木厂、伊拉特·里夏德夹板厂、前犹太人的德鲁克尔家具厂等等，也为党卫队在家具市场建立垄断地位作出了贡献，例如经济管理总处的“德国家庭美化社”，就大肆宣传特别廉价的家用工艺设备，并印有产品目录单，连非党卫队家具工厂也同它挂上了钩。

党卫队工业大亨们第三个回合选定的攻击目标，是东方德国

占领区内的建筑材料企业，和波兰犹太人隔离区的工厂。在波森开办了“东德建筑材料企业公司”。它作为信托公司，经营着三百一十三家并入德国的东方地区前波兰人或犹太人的砖瓦厂（1943年销售金额为一千一百万马克以上）。波尔创办的另一家“钢化砖瓦水泥公司”，则典进了东部上西里西亚和总督辖区内的砖瓦厂、石灰厂、水泥厂和陶瓷厂。另一方面，1943年建立的“东方工业公司”，早在波兰最后解决上演可怖的压轴戏之前，就曾尽力利用犹太人劳动力和隔离区企业。德国经济经营公司的支店“德国装备公司”，也接收了波兰的木材和铁器加工企业，并将手伸向新的纺织、印刷和制鞋厂。几乎没有一个经济活动领域，波尔的使者们不去一试身手了。不论是合伙开采油母页岩炼油，或开办新新型订书厂和在俄国办农场或罐头食品厂——奥斯瓦德·波尔 375 领导的总处都有份。

成就不亚于经济管理总处 W 处（经济企业）的，是构成党卫队军火工业基础的 C 处。C 处主管党卫队和警察的工程建筑事务，处长是人们公认身穿骷髅制服的最大胆的野心家之一：汉斯·卡姆勒工学博士。此人有一种即使在党卫队内也罕见的名利欲，驱使他无论在奥斯维辛建造毒气室或修建 V-1 飞弹发射场，都很细心卖力。这位地区总队长尽管地位很高，在党卫队内却始终是陌生人，因为对他来说，党卫队只是个人飞黄腾达的跳板而已。

波尔并不介意这一点；他懂得争取和依靠即使是对党卫队不接近的人士也为经济管理总处工作，只要他们对他有利。例如经济管理总处 W 处处长汉斯·霍尔贝格博士，是个不问政治的经济检验人员，从未参加任何一个纳粹组织，从未穿过党卫队制服。同样，工学博士汉斯·卡姆勒也是来自另一个营垒：这位高级政务参议曾经长期在中央航空部当建筑工程主任。1941年，热衷于网罗人才的希姆莱动员他率领一帮空军工程建筑专家参加党卫队工作。卡

姆勒一进队就被封为党卫队旗队长，领导经济管理总处的 C 处，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计划，为了执行这项计划，他在 1942 年就提出要求拨给他近十七万五千名集中营囚徒和战俘。

然而卡姆勒并不满足于修建给养库和集中营杀人室，建造武装党卫队军火库和营房，他还贪图更大功名。军备部长斯佩尔回忆：“当卡姆勒担负他的使命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内定接替我职务的人。”希姆莱和卡姆勒的野心不谋而合：党卫队头子梦想建立自己的军备工业，使所有党卫队单位不依赖心存疑忌的武装部队供应武器；建筑工程头子卡姆勒则一心想爬上超级军备部的顶峰。两人都得到了至少能部分实现他们野心的机会。

从 1943 年起，卡姆勒奉命进一步加紧修建新的军火工厂，并将重要军工企业转入地下。卡姆勒处长拥有自己的建筑工程队——部分属于他领导的来自集中营和党卫队在东方辽阔练兵场上的奴隶大军——，变成了一切军备工程计划不可或缺的帮手。他成立了一个“卡姆勒特别办公室”，使 C 处逐渐摆脱了波尔的管辖，只承认党卫队全国领袖是他唯一的上级。从 1944 年起，地区总队长卡姆勒正式称自己为“党卫队全国领袖代表”。他的工程兵一次又一次地给希姆莱炸开了通向军备政策核心的较为宽阔的小道。卡姆勒接受了难以胜数的特别任务：在图林根修建一所地下领袖大本营，设计地下的飞机制造厂和飞弹制造厂，插手完成梅塞施密特 262 型喷气式歼击机的生产，以及最后监督大德意志奇迹崇拜中最绝密的神秘武器：V-1 飞弹和 V-2 火箭。

由于希姆莱在 1944 年 7 月 20 日当上了补充军总司令，因此他不难将（由陆军研制的）V-2 火箭武器的技术领导权交给卡姆勒；1944 年 9 月，这位党卫队将军也掌握了“北方”和“南方”两支陆军火箭部队的战术指挥权。截至 1944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作战结果是：向伦敦和安特卫普发射了 V-2 火箭一千五百六十一枚。



1945年初,空军也将第五高炮师(W)以及 V-1 飞弹拨归卡姆勒掌握;这位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可以以一支特别军的指挥将领自命,获得了党卫队员唯一的光荣声誉;他只受希特勒个人调用。

这样,工学博士汉斯·卡姆勒的火箭生涯也就生动地表明,党卫队及其领袖们在第三帝国权力集团中,窃踞了多么重要的要害地位。对德国中央保安局或经济管理总处飞黄腾达的历史,几乎每一个党卫队组织都有目共睹。这必然会产生一种想法,即党卫队接管整个国家的日子已为期不远。这种声誉、地位和重要人物合在一起,导致后来历史学家们错误地把党卫队看成全能,似乎是它使第三帝国变成了黑色集团的附属物。然而,这种看法是建筑在一种广为流传的、对极权主义领导实践的误解基础之上的。

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第三帝国统治系统具有相当规模的计划性、结构和等级制度,一句话:具有相当规模的秩序,而这种规模是希特勒德国的当权者们全然不了解的。因为构成领袖专政随心所欲的原则的,并不是权威和秩序,而是毫无等级制度和结构。阿道夫·希特勒最担心不过的是出现新的制度结构,因为它必然要妨碍所谓领导的有活力的意志。出于顾虑和本能,希特勒不允许在自己和群众之间形成任何新等级的中间层,它只会削弱领袖的独裁地位。

纳粹政权的特点,正如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有一次分析斯大林政权所说的,是“不存在任何体系”;第三帝国也知道在干将当中经常变换权力重心,剪除政权副头目们之间的任何横的联系,保持纳粹统治头目中的相互争夺。“领袖的意志,”汉娜·阿伦特说过,“可以随时随地体现出来,他自己不受任何等级制度、也不受哪怕是由他自己确定的等级制度的束缚。”各级官方当局权威的缺少正好是确保只凭自己活力行事的领袖进行独裁统治的手段。就连类似一种等级制度的党的干部团的权力金字塔,

377

也没有构成它的权威；按照极权主义问题专家阿伦特女士的看法，决定一种行动的合法性“不在于执行这个或那个官方当局发布的命令，而是在于‘执行领导的意志’”。

在这么一个没有体系的体系中，党卫队虽然能够依靠它众多的组织占有强大的地位，但缺少权威性，一再导致产生敌对势力反对党卫队在国家中的绝对优势。不论党、冲锋队或武装部队——都经常构成争夺者，有如千钧重担拖住权迷心窍的党卫队，不使它跃飞高空，青云直上。即使是1938年勃洛姆堡—弗立契危机以后政治上失势的武装部队，也仍然有手段和办法不承认党卫队的领导权要求。直到战争结束，它始终懂得要坚持自己的特殊地位。在德国占领的欧洲各地区内推行的占领政策，反映了党卫队和陆军之间进行的隐蔽的战争，这种战争在德国军队发动波兰战役的时候就开始了。

陆军一开始就提出，必须由它掌握波兰被占领区内的执行权，在当地执行战役行动的保安警察特别行动队（至少在作战期间）必须接受它的领导。军人们的确建立了军政府，但由于陆军同希姆莱的屠杀队陷入了十分激烈的争执，最高将领们终于屈服于希特勒的压力，乐得高兴地退出了波兰政权。尽管如此，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大将仍继续提出自己的要求。在下一战役、对挪威作战之前，陆军总司令部要求希特勒必须再次同意授予陆军以执行权，并节制特别行动队在挪威的活动。

希特勒表面上同意军人们的要求：海德里希的特工队没有获准参加挪威战役。可是战争结束只有十天，这位独裁者就违背自己的诺言。他解除军人的权力，派去一名总督，即惯于搞阴谋的纳粹党区领袖约瑟夫·特波文——可他却是党卫队的党内对头之一；同时奥斯陆进驻了一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他立即把特遣队调进挪威。同样的做法在入侵荷兰时又再次重复。等希特勒任

命了总督之后，特遣队才开进荷兰。这一次政权更迭，意味着党卫队的真正得势：总督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博士穿上了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的制服。

同荷兰的情况相反，军人在比利时和法国却坚持了占领者地位。在这两个国家中，军人们也不同意作战行动期间有特遣队参加；只是在赫尔曼·戈林干预之后，陆军总司令部才批准由当时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率领一个保安警察十人小组，随军进驻法国——穿武装部队制服。克诺亨在巴黎“罗浮宫饭店”设立自己的总部，但驻法德军司令奥托·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及其两千五百名秘密宪兵，限制了克诺亨手下人员的活动。

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海德里希感到前景不妙，陆军有可能“在一部分政治上不完全可靠、重新得势的和谍报局预备役军官领导之下”，自行建立警察机器，不受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控制。因此，象该局对所有占领地区要求的一样，他提出派驻一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只接受希姆莱的命令，指挥当地的警察部队。军人们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们至多只同意接受一名“保安警察兼保安处代表”，即党卫队旅队长马克斯·托马斯博士。当希姆莱的这位监督员活动过分积极时，军官们又把他撵走了。

托马斯结识了法国反犹分子领袖欧仁·德隆克尔，这人给他献了一条妙计：为了在法国煽起最后解决犹太人之火，德隆克尔准备和几个同伙炸毁多所巴黎犹太会堂。托马斯紧紧握住他的手，表示同意，并责成同僚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国外保安处人员汉斯·佐默尔准备炸药。1941年10月3日凌晨2时30分，巴黎图雷尔街犹太会堂轰的一声，被一颗炸弹炸得摇摇晃晃。另外还有六处犹太会堂被炸坏。克诺亨由于职责所在采取了行动：几天后，他报告驻法德军司令说，事情是法国右派激进分子干的，据巴黎警

方了解,为首分子是一个姓德隆克尔的人。

可是,克诺亨做梦也没有料到,经手搞炸药的佐默尔嗜酒贪杯。一次在“香蒂夜总会”酒吧间喝酒时,这个二级突击队中队长结结巴巴地对两名军政府密探说,事件是克诺亨亲自导演的。“炸药,”陆军总司令部(OKH)在1941年10月21日斥责海德里希说,“是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佐默尔从柏林搞来,交给凶手的。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佐默尔知道爆炸的时间和进行爆炸的方式,并在爆炸前同凶手们亲自会过面。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佐默尔系奉保安警察兼保安处驻巴黎机构负责人、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克诺亨博士之命而行动的。”

379 军人们抓住保安处的纰漏,大做文章整他们的党卫队对手。10月22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要求召回克诺亨、佐默尔以及托马斯。理由是:由于克诺亨的掩护策略,驻法德军司令已无法惩办实际上受保安处指使的法国罪犯。海德里希于11月6日尴尬地口授答复:“鉴于所采取措施的特殊性,我派在巴黎机构的负责人未向驻法司令先生报告,因为根据以往同驻法司令先生合作的经验,未考虑就采取这些措施反对世界敌人的必要性作出必要的说明。”

陆军坚持自己的要求,海德里希不得不作出让步。托马斯和佐默尔被召回,只有克诺亨留任。此后军人们进一步限制克诺亨的活动范围。一时间,他同柏林的情报联系全被切断,禁止他擅自进行侦察活动。这位保安警察头子被弄得一筹莫展,无所作为,以致秘密警察缪勒在柏林以为,克诺亨也已不在西方了。直到1942年5月,海德里希才任命了一名驻法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通过他把克诺亨及其部属从武装部队控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可是,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奥伯格,和新任驻法德军司令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奥托·冯·

施图尔纳格尔的堂兄弟——过去是同一个师的熟人，他显然竭力在同军人们搞好关系。

党卫队领袖们之所以对军方采取审慎作法，还因为这时武装部队已统治着更多的占领地区。巴尔干战役后，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也成立了军政府，它们不允许党卫队插手进来。党卫队领导机关疑虑重重地注视着武装部队所有堵死党卫队前进的企图。诚然，希姆莱相信在军人队伍里拥有一支可靠的第五纵队：在西欧和东南欧几个地区的军政府中，有高级党卫队领袖担任军政府委员。可是这些党卫队成员时运不济，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能证明是得力的帮手。最使希姆莱痛心的，要算是在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德军司令部任军政府首脑的党卫队旅队长埃格特·雷德尔了。

前地方行政机关首脑、旧普鲁士—德意志民族主义官僚传统的不妥协的维护者雷德尔，不得被希姆莱及其无数使者提醒注意，他自己也是党卫队名誉领袖，因而理应执行有利于党卫队的政策。特别是雷德尔在敌视纳粹的驻军司令冯·福肯豪森支持下 380 执行比较温和的占领政策，使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的先生们感到震惊。希姆莱在 1943 年 2 月 16 日写信给雷德尔说：他经常要“反对一些我在党卫队领袖们中间看不惯的事情”，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党卫队中央主管处局头儿、希姆莱忠实的喉舌戈特洛勃·伯格说，雷德尔大概“不了解他自己是在推行比利时人的政策”，不去“改变他的政策，并使之成为‘德国的政策’”。雷德尔不动声色，听凭希姆莱训斥，再说他还对一位右倾天主教的反纳粹顾问言听计从，这个人就是高级军政委员、后来任波恩全德事务部国务秘书的弗兰茨·特迪克。特迪克不仅仅是公然身穿武装部队制服上教堂做弥撒，引起党卫队先生们生气。全国领袖再次指出：“您曾答应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伯格，于 1942 年 12 月 31 日前免去您的助手特迪克的职务，因为我们认为他是不受欢迎的，更不用说他是在

比利时败事有余的政治顾问了；您的诺言没有兑现。”雷德尔根本不会兑现这一诺言。

同样，希姆莱对驻法德军司令部行政管理部负责人、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寄予的希望也未实现。这位参加建立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人，常常表现很同情军人们比较审慎的占领政策，此外军官们在1942年7月，还从组织上使了绝妙的花招，将他撵出了驻法德军司令部。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奥伯格进驻法国后，军人们决定对党卫队分子不予支持。巴黎行政管理部大大紧缩机构，致使这位前部务参议贝斯特只能当个可怜的助手。瓦尔纳·贝斯特却自愿迁就。

驻塞尔维亚军方统治者使用类似的手法，对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哈拉尔德·图尔纳博士。图尔纳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和反犹太主义者，担任驻贝尔格莱德长官司令部的军政处长。“毫无疑问，”图尔纳的同事、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格奥尔格·基泽尔博士于1942年3月31日向柏林报告说，“武装部队方面现正试图千方百计将地区总队长图尔纳撵出军政府，因为武装部队认为他是党卫队领袖，过于危险，就是不能容纳他。”基泽尔从武装部队东南司令手下一名特工人员处获悉，人们准备象巴黎一样，将行政管理部改为行政管理科，从而把党卫队图尔纳撵出塞尔维亚。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同巴黎一样，就是因为任命了一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

军人们对党卫队的军政处长发动一场“人身攻击”，按照基泽尔的说法是，旨在“使地区总队长图尔纳神经上疲惫不堪”。武装部队东南司令决心将图尔纳赶出他的官邸，禁止他亲手签署军政工作报告，并扣发一份图尔纳的报告，原因是，司令——据司令通知说——“发现报告中含有一些对部队领导的批评，感到有破坏性作用”。接着，武装部队东南司令部负责人赫尔曼·弗奇上校发动了

最后一击。他写信给图尔纳说：“我可以设想，塞尔维亚局势的继续发展，是不会使一个象你有这样经历和能力的人满意和胜任的。”

图尔纳向全国领袖告急。于是希姆莱得以阻止军人们改组塞尔维亚司令部的计划。军官们眼见自己的事情就要失败了，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盟友突然赶来帮忙：驻塞尔维亚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地区总队长奥古斯特·迈斯纳，他宁愿心向军人，而不愿跟党卫队图尔纳同志携手合作。这两个党卫队领袖为了争夺职权和名望吵得不可开交，致使——据图尔纳说——“贝尔格莱德的统治者们掩盖不住他们那股幸灾乐祸的劲头”。不论控制塞尔维亚的地方警察、管理被害犹太人的财产，或在打击游击队斗争中先发制人——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迈斯纳总是站在军人们这一边，提醒“他们的”军政处长注意遵守纪律。

奥古斯特·迈斯纳显然属于这一类党卫队领袖，他们大多是过去的警察或部队军官，内心深处始终没有消除对旧日穿灰制服的战友们某些暗中思慕。即使党卫队制服和精华崇拜的思想，也打消不了过去这些人的固有信念，即归根到底只有武装部队是民族中唯一合法的携带武器者。前希特勒副官恩格尔中将，有一次谈起党卫队兼警察最高领袖卡尔·沃尔夫时说，他“作为过去的现役卫队军官，经常在履行党卫队义务和感情上倾向于武装部队之间摇摆”。前工兵中尉阿图尔·奈比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他在任特别行动队 B 队长时，往往听从中央集团军参谋部反对派军官的主意多于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命令。就连驻法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地区总队长奥伯格，也掩饰不住对自己的战友、反纳粹的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敬意。1944年7月20日后，他保护某些处境危险的密谋分子，使他们免于落入秘密警察之手。施图尔纳格尔说：“奥伯格想干啥尽可干啥——我相信他

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某些党卫队领袖认为，武装部队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更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常常对将军们的老练判断信服不已。驻俄国中部地区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地区总队长格雷特·科尔泽曼揭露了党卫队领袖们患有一种平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自负慢性病，  
382 其难堪的程度使希姆莱不禁感到脸红。

1943年夏，党卫队领袖们责骂科尔泽曼，说他在高加索撤退时逃跑得太快了一点，露出了“受惊的兔子或十足胆小鬼”（科尔泽曼语）的本色。这时，被侮辱者很自然地想到，最好莫过于请武装部队出具一份证明，以澄清事实。1943年6月30日，他给他的上级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元帅写了一封长信提出要求。“尊敬的陆军元帅先生！”科尔泽曼用这样的称呼开始写道，“卑职特”恳请“惠予阅览”，希望元帅先生“赐我短信一封，以说明我不仅按照规定时间，而且超过规定时间留在我的岗位上，并且我是在得到陆军元帅先生同意之后，才乘飞机离开的。事实上当时我的任务已全部完成，无事可做了”。“这是一封愚蠢的和献媚讨好的信，它使全体党卫队、特别使党卫队全国领袖丢脸，”党卫队中央主管处处长伯格爾暴跳如雷地说。希姆莱一气之下撤了科尔泽曼的职，将他调到武装党卫队，以示惩罚。

希姆莱怀疑将军们企图通过过去年代某些横的联系，扩大武装部队势力范围和遏制党卫队扩张，这时他更加不择手段地惩办对武装部队的任何“献媚讨好”。此外，全国领袖看到武装部队一边又多了一个党卫队的对头，这个对头几年来一直苦苦地拉拢同盟者，准备同黑色集团干到底。它就是冲锋队。

悼念罗姆的幸存者们的地位已被降为一个退伍军人协会，但冲锋队的心头，仍然燃烧着对1934年6月30日的刽子手们的仇火。冲锋队参谋长维克多·卢策，也始终没有忘记1934年的盛夏



酷暑，那时他出于对希特勒的盲目效忠和利欲熏心，告了竞争者罗姆的密。6月30日褐色大厦里的那一幕，他始终记忆犹新，那一天，希特勒的僚属们阴森可怖地竞相以杀人为乐，希特勒还命令他维克多·卢策去结果自己同志的性命。不，参谋长卢策一辈子也忘不了希特勒搞的圣多托罗缪之夜惨案。他要向将冲锋队员成排地杀害在党卫队自己刑房地窖里的党卫队刽子手报仇。但是冲锋队现在力量太小，无法向党卫队挑战。卢策心目中只有一个可靠的盟友，这就是武装部队。

早在冯·勃洛姆堡和冯·弗立契下台以后，卢策就想联合武装部队，跟党卫队干。在1933年5月为沃耳夫斯堡大众汽车厂奠基的大会上，参谋长把众所周知的反党分子乌莱克斯将军拉到一旁，告诉他必须利用弗立契事件推翻希姆莱；这个党卫队头子已经培植了一个小王朝，准备取希特勒而代之。当将军问如果武装部队对党卫队采取行动，冲锋队准备持何态度时，卢策应声回答：“无条件地支持武装部队！”如果希特勒支持党卫队头子呢？卢策说：383  
“当然应尽可能不伤害领袖。”乌莱克斯理解卢策的回答实际上是：“如果他不同意，那就叫他一起完蛋。”乌莱克斯答应，将卢策的计划转告冯·弗立契男爵大将及其继任者瓦尔特·冯·勃劳希契，不过要卢策先给他提供材料，证明诈骗犯施密特是在秘密警察暴力迫供下诬告冯·弗立契的。

“过了八天或十四天，”乌莱克斯记述道，“菲尔德赫恩会堂冲锋队旗队长向我报告说，他奉参谋长卢策之命来向我报告，参谋长现在也已经有了证据，证明罪犯施密特是由希姆莱胁迫招供的。”乌莱克斯将军当即去见冯·弗立契和冯·勃劳希契，但这两位军人无意赞同卢策的政变计划。勃劳希契说：“先生们想干，让他们独自去干好了。”陆军总司令在对政权不满和军人的服从性之间摇摆，又一次打定主意还是服从希特勒。不过他的信念始终不能持

久。后来他又想起他过去对乌莱克斯说过的话：“我向您保证，不消除希姆莱这个藏污纳垢之所，我是不会罢休的。”

于是卢策也反复设法争取摇摆不定的陆军总司令部参与反对党卫队的行动。此外，他由于自己的妻子和陆军大将是亲戚关系，因此卢策坚持不懈地劝说和怂恿他起来同党卫队干。随着战局愈趋紧张和党卫队的权力愈益咄咄逼人，这个冲锋队队员的警告也愈加迫切。党内高级人士都知道卢策同军人们搞在一起。“卢策在这里通过妻子以及由妻子同勃劳希契的亲戚关系，两家来往密切，而让自己受人愚弄，动辄对党卫队抨击指责，”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并生气地说：“他到处抨击和发牢骚。他总是认为冲锋队受到了歧视。他已落到坏人手里了。”

还在1940年3月12日，地区总队长伯格即写道：“参谋长卢策的态度即使不是对党，也已逐步发展为党卫队的祸害。由他发起举行的联谊晚会，特别是在武装部队那里，总是被利用来宣传反对……党卫队……而且，其做法是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不能容忍的。”卢策在和武装部队军官们公开聚会时，发出“骇人听闻的反对全国领袖的呼声”（伯格语），非常尖锐，致使这个希姆莱的忠实伙计终于提议：“我认为有必要对参谋长卢策进行监视。”

384 希姆莱的代表们注视着他们对手的一举一动。连细微末节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卢策赞扬中央宗教事务部长凯尔抨击希特勒违背自己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的诺言，卢策在自己的马厩里养着很多马匹，卢策辱骂欢喜佩剑的党卫队精神空虚（“我们要丰富精神，不要佩剑”）——事无巨细都被记下来，汇报到党的秘书处。党卫队领导机关还注意到，冲锋队头子在这期间又找到了一个盟友，即波兰暴君和党卫队的对头汉斯·弗朗克，因为他也兴趣勃勃地怂恿冲锋队同排挤他的驻总督辖区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队斗争。

弗朗克最初给自己搞了一个类似私人警察的所谓特别勤务

处，由他个人领导，任务是给各区行政长官当差。但由于弗朗克最厉害的竞争者、克拉科夫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克吕格尔进行争夺，两年后终于夺走了总督对特别勤务处的领导权。就在这个时候——1942年年底——冲锋队自愿充当党卫队对手弗朗克的卫队。冲锋队驻东方的头子、区队长佩尔茨，甚至试图打进克吕格尔的警察机构，进行分化瓦解活动：他建议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克吕格尔把总督辖区内的冲锋队编成小分队，作为辅助警察——佩尔茨显然企图用这种方式建立一支力量，同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分庭抗礼。克吕格尔根据希姆莱的指示当即予以拒绝。紧接着冲锋队又另找新的靠山：佩尔茨提出自己的部队接受驻克拉科夫第八防空司令部领导。这一着棋几乎使佩尔茨的冲锋队掌握了梦寐以求的武器（机枪、高炮）——克吕格尔只是在最后一分钟，才设法使防空司令部收回成命，取消已作出的允诺。冲锋队又重起炉灶：它向东方占领区事务部提出，要求批准在所有东方占领地区成立建设服役队。监督员伯格勒设法使这一申请被批复为“非法”——他是这样说的——，希姆莱又一次粉碎了对手的阴谋。

但是，当希姆莱1943年2月获悉，卢策跑到了弗朗克的“王国”，甚至下榻弗朗克在克雷尼查温泉浴场的别墅时，他几乎吓得心惊肉跳，立即写了一封信向鲍曼告状。“我以为参谋长卢策待在总督辖区那边的一个温泉浴场，”希姆莱在1943年2月26日的信中写道，“不会有好事情，我认为，参谋长卢策还是……另到德国境内的任何一处温泉浴场疗养为好。”

几个月后，卢策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毙命。党卫队去掉了一个危险的敌人，但尽管如此，冲锋队仍是党卫队对头们的一支后备力量，不论谁需要物色帮手同党卫队较量，都不会不乐意找它参加。连东方事务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也同冲锋队领袖和党的知名人物结盟，以抵制党卫队在东方德国占领区内过分强大的影响。希

姆莱的耳目伯格侦察到一个危险的反党卫队运动。“我惊奇地发现，”伯格向全国领袖报告，“罗森堡周围纠集了一大批党的区领袖，同时他也是冲锋队心目中的最后一个‘法律维护者’。党内有许多高级领袖，他们认为 RFSS〔党卫队全国领袖〕地位太高，并以嫉妒的眼光看着党卫队的发展。”

在俄国的新殖民主义分子们相互抱成一团，不容许党卫队插足：东方占领政权的十名总督中，有两名纳粹党区领袖、两名冲锋队副总指挥和一名民族社会主义汽车团副总指挥、一名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机关负责人、两名德国劳工阵线干部和两名公务人员，没有一个是党卫队领袖。党卫队的对头们亲如一家人。最高的头衔也为十足的反对党卫队的人所占有。坐镇乌克兰的德国驻乌克兰专员埃里希·科赫，是党卫队在三十年代中期曾经打算打倒的人；奥斯特兰德国专区发号施令者纳粹党区领袖欣里希·洛泽，按监督员伯格之见，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人”，并受一种“对党卫队的刻骨仇恨”所驱使；而莫斯科德国专区（始终未正式成立）的头子、冲锋队副总指挥、罗姆被杀之夜的幸存者西格弗里德·卡舍，则是一个一有机会就跟党卫队干的人。

他们这些人之所以同党卫队作对，其原因如同褐色东方封建主义分子们的成分一样五花八门。野蛮的新帝国主义分子、残酷镇压斯拉夫“劣等民族”的科赫之所以反党卫队，是因为他怀疑党卫队不满意他的主宰民族精神。而他的同僚洛泽跟党卫队作对，则是因为党卫队采用的手法，同格伯乌惯用的伎俩几乎一模一样。

洛泽以其滥用职权和政治上的庸碌无能，斥责计划挟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儿童进行德国化教育的奥斯特兰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不过，他认为“麻烦”和“成问题”的是，“竟然派警察去抓小孩，因为布尔什维主义也以用警察手段放逐儿童、进行布尔什维主义教育见长”——洛泽在1942年4月13日这样写道。另一方面，乌

克兰沙皇科赫则感到自己受到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监视，因而不放过任何机会对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施加压力，使之屈服。科赫一再设法剥夺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副总指挥普吕茨曼的权力；他甚至不许普吕茨曼接受希姆莱的命令。经常发生的争吵纠纷，惊动了科赫的部属。“科赫回答说，”普吕茨曼就1942年9月27日同纳粹党区领袖发生的一次冲突报告道，“我是他的下级，只能接受他的指示。他还说一定要把我赶走，因为他需要一个听话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除了对事情的斥责外，科赫还进行了一系列人身攻击，显然科赫是存心这样做的，因此谈话越来越尖锐。最后我坚决要求辞职，因为科赫大声嚷叫，再次宣布他不相信我说的任何话。”

386

科赫同党卫队之间的散兵战无疑表明，纳粹在东方的内部争吵，原因不仅仅在于党卫队的赤裸裸的权力欲。其中也夹有党卫队抨击褐色大亨们贪污腐化和权贵骄横的因素，这一因素必然促使黑色集团愈益明显地同党对立。

东方战争的转变，促使一些比较审慎的党卫队领袖对主宰民族政策的方案不再积极支持，以及对东方各国人民有所收敛。1943年夏，连伯格也转而奉行另一种有区别的东方政策了；身为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领导，他开始执行东方事务部的政策，变成了罗森堡反对独断独行的科赫的最强有力帮手。党卫队东方政策的执行者们愈是转而采取比较温和的做法，就愈是陷入同科赫及其保护者全国党务书记官马丁·鲍曼的冲突。保安处开始一笔一笔记下科赫恐怖统治的帐。

保安处的报告变得非常尖锐，科赫对希姆莱的抗议变得非常强烈，以致被撵出法国后改任驻乌克兰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司令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托马斯，禁止手下的保安处助手继续书面汇报德国专员的情况。当保安处继续写有关科赫情况的汇报时，希姆

莱插手了。德国中央保安局保安处科长、旗队长汉斯·埃利希博士后来还记得下达了希姆莱这样的指示：“保安处必须最终停止写汇报，否则将解散保安处并逮捕负责的主管人”。关于科赫的汇报总算没有再写了。

海因里希·希姆莱突然看到了一个无底深渊，被吓得缩了回来。这位全国领袖展望未来，惶恐不安；担心跟党闹翻。

自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战争时运一去不复返起，政权的权力机器就越来越两极分化。党卫队和党，从对立的两端出发，月复一月地啃着德国统治结构这具骨架子，一步步啃到政权的核心部分——双方短兵相接的时刻不会太远了。英国历史学家休·R·特雷弗-罗珀描绘了这个过程：象党卫队一样，在整个战争期间，“党的机器也发展了；它象党卫队一样也将武装部队的职能攫为己有，尤其是在行政和供应、防御和疏散等问题上；象党卫队一样，党也随着德国军队的每一次失败，变得权力越发庞大和越发不可缺少了”。此外，党在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以后，挑选了马丁·鲍曼这样一个决心不让党卫队最后掌握第三帝国操纵杆的领袖，他的控制既不动声色，又居心叵测：他坐在领袖大本营深处的房间里办公，他疏通希特勒和党之间的往来渠道，他掌握着纳粹党各区领袖和机关的卫队，他不引人注意，却无处不在，影响很大。

最使内心虚弱的小资产阶级希姆莱伤脑筋的是，莫过于想到有一天要同党进行决斗了。他非常清楚，党并不喜欢他。只要党卫队的声誉不致败落，他不得不避免去争夺这些最后的地位。希姆莱同党的官僚政客从未建立过良好关系。多数党阀和贪生怕死的卤莽汉，都是满脑子当官思想和充满穿金丝线制服的虚荣心，他们对这个侈谈道德的迂儒及其所搞的集团和日耳曼人崇拜，对这个冷酷无情而非常不实在的人不屑一顾。尽管他纠集了这样大批穿制服的人，但对党来说他永远是一个局外人。因此，这位看上去无

所不能的全国领袖，对于来自党内的任何一点批评也异常敏感。虽然希姆莱有时甚至当着刑事警察官员的面大声抱怨，说只有将最后一名党的区领袖吊在路灯杆上，才能在德国重新建立秩序——但是，党的特权阶级只要轻轻咳一声，就会使希姆莱心惊胆寒。

他一再书面下达命令叫保安处永远不要侦查党的干部或干预党的问题，就已经暴露了希姆莱的敏感。针对鲍曼书记处关于《黑色团》对党的抨击的所有怨言，他也怒气冲冲地采取措施——于是党卫队的编辑们经常在办公桌上看到书面申斥。全国妇女领袖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批评《黑色团》登载的一则短评，在短评中喜欢挖苦的编辑米歇尔·穆姆就一位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的一则愚蠢无比的出生通告开了个玩笑（“我们人丁兴旺”）。希姆莱书面批示通知说：“党卫队全国领袖希望《黑色团》上不再发表米歇尔·穆姆的诗作，因为它很容易招来怨言。”

遇上党的全国指导处成员卡尔·菲勒尔指责《黑色团》，说它“象过去在犹太人报纸上一样，不管恰当与否，迫不及待地找机会将所有公务人员一概打成落后的官僚”，或遇上鲍曼提出必须停止对个别党员进行攻击，那么编辑部是肯定会挨希姆莱的申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他在1941年5月2日写道，“原因是这份过去很有威信的报纸，降低到现在这种厨娘和使女的水平了。请你们务必收起这种无聊的小聪明，显然除开主笔先生以外，它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因为主笔先生们大概想借此表达某种内心深处的需要。”

希姆莱当然还有一个私人动机，想要搞好跟党的总管鲍曼的关系。从1940年起，党卫队头子同过于神经质的、好吵嘴的妻子玛尔加打心眼里感情破裂，转而钟情于他过去的女秘书黑德维格（“小白兔”）·波特哈斯特，他从1937年起认识了这个颇有魅力的科隆女人。这位1912年2月6日出生的商人女儿，三十年代中期

388

毕业于曼海姆商科大学，然后进了党卫队全国领袖总部当秘书，很快使这位古板的希姆莱产生了一种温情。希姆莱本想申请离婚，但终于下不了决心。两人的关系不是没有结果的。1942年初，黑德维格·波特哈斯特就要生第一个孩子黑尔格了（1944年生第二个孩子、女儿娜内特·多罗特娅）。

但对希姆莱来说，这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他不能让自己新出生的孩子的母亲，再当三房客住在柏林-施特格利茨区俾斯麦街48号C宅米勒的家里，他必须给她找幢房子。黑德维格·波特哈斯特的父母对女儿姘居很生气。由于他们一再敦促希姆莱的情妇断绝同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关系，住房问题更是非解决不可的了。他们说，希姆莱身为有妇之夫，不能同小白兔建立合法的家庭。在东线阵亡的哥哥瓦尔特·波特哈斯特博士的妻子希尔德·波特哈斯特是黑德维格的嫂子，她转达了父母亲的这一意见。“为了两老的缘故，我希望你能尽快结婚，”她郑重地告诉小姑。在另一封信中说：“黑德维格，我担心永远不会〔跟父母〕言归于好。他们说了，只要你同他一刀两断或他为了你而离婚，他们将原谅一切。整个事情难就难在你和他同居。”希尔德嫂嫂不肯罢休：“他是有妇之夫，他们认为，整个事情在于欺骗他的妻子和不把你放在眼里。母亲问我他的妻子是否知道这件事情，我不得不遗憾地回答说，据我了解她至今还不知道。母亲随即指出这是他胆小怕事。父母为此非常苦恼。”

要想不失去黑德维格，希姆莱就得搞到房子。可是用什么办法呢？党卫队帝国的统治者、党卫队经济企业的主宰、德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警察机器的控制者却没有私人积蓄。除了采取其他党员同样的办法，即向党的书记处申请借款外，他想不出别的主意。鲍曼大方地批准他的要求，开给他八万马克。党卫队头子用这笔钱，给黑德维格·波特哈斯特在伯希特斯加登-舍瑙的柯尼希湖附近盖



了一幢房子。“雪角领地私邸”缔结了希姆莱和鲍曼之间暂时的联盟。此外，希姆莱的这个寂寞的情妇，还同住在附近的鲍曼的妻子格尔达交上了朋友。

象两位太太一样，鲍曼和希姆莱也打得火热。“唉，孩子他爸，”389 格尔达·鲍曼写信给党务书记官说，“我简直不能想象会出什么事情，如果你和海因里希不事事操心的话。领袖决不能事事过问。因此你们俩要好好相处，多多注意。”马丁·鲍曼注意到了，不让“海因里希大叔”过于得势，遇到全国领袖垂头丧气，他就给希姆莱鼓励；遇到希姆莱擅自批评“首脑”希特勒，他就责备希姆莱。有一次希姆莱在这位同志面前诉苦，说希特勒对他不公平，他完全是一片好心给领袖源源不断建立新的师。鲍曼安慰他，并警告希姆莱不应该对阿道夫·希特勒批评过火。妻子格尔达听到丈夫说：“他那冷冰冰的批评是令人很不高兴的。不论说了什么话和做了什么事，领袖毕竟总是领袖！没有他能有我们吗？”

对这样一位牧师，又是通向希姆莱心目中性格乖戾的上帝希特勒的唯一一扇大门的把门者，全国领袖无意使用黑色集团的火力攻击，只要党卫队的根本利益不受威胁的话。希姆莱禁止对党进行任何批评。

但是，党卫队头子对他的副手们那种爆炸性的名利欲估计不足，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私人理由要去保护党。特别是有这样一个人物，他对党同床异梦，在这个人的身上，绝妙地反映了党卫队内这些知识分子的全部精神分裂症：他有本领一手指挥一支庞大的谍报人员大军，并梦想用一个由民族社会主义贵族组成的文化集团来取代党。也算是希姆莱的晦气，这个人当上了国内保安处长：奥托·奥仑道夫。他是在党卫队圈子里给人们印象最不一致的人物之一。希姆莱感到他是一只智囊猛兽；历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谜，因为他屠杀了七万名犹太人，同时却又对褐色当权者们的浑浑

匪匪感到震惊。

他的朋友们后来把他说成是黑色集团内部的抵抗运动战士，是——象纳粹党区队长尤斯图斯·拜尔所说——“积极的反对派”的传声筒。他们故意不提这种反对立场并非出于本意的；党卫队旅队长奥仑道夫自己搞了一种机能主义，而结果表明，他并不是这种机能主义的主人，倒是它的受害者。因为奥仑道夫秘密煽动民意，如实地记录德国人的一切生活动态，并登在由他每星期出版二至三期的《全国简报》上，供高级领导人参阅。这样一个主意，必然使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三处处长陷入严重的冲突之中。保安处是不准对党搞侦察调查的。可是，如果说保安处的《全国简报》可以掌握所谓生活领域种种情形，那怎么能不接触到恰恰是最重要的政治生活领域的党呢？

390 奥仑道夫惊喜参半地看到，几乎没有任何党内争执的细节能逃脱保安处观察员的眼睛。保安处注视着党阀们的狂妄和骄横，党的宣传工作无能，党的区、县领导的管理无方。民族社会主义者奥仑道夫力图刹住由他自己搞的这种机能主义，但怎么也刹不住。他一本正经地对保安处高级领袖们说，他有“特大的烦恼”，保安处的报道有可能使人们产生印象，似乎党是“反面的或敌对性的东西”，似乎“希特勒、全国领袖和党卫队在反对党的官僚主义”。他在发出的命令中反复说明，保安处的唯一心愿是进一步加强民族社会主义的统治。在1941年对保安处工作的训令中，他提出“法律的现实”必须“始终符合民族社会主义政治和世界观的原则”。他责备司法“至今尚未做到使判决一清二楚地着眼于巩固我们人民制度的政治需要”。

在人权基本问题上，他的想法跟罗兰·法赖斯勒一类的野蛮践踏法律者并没有什么不同。1942年10月，他起草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他诬蔑警察政权抨击者汉斯·弗朗克是英国豪门政客

同伙，并用奥托·奥仑道夫擅长的花言巧语，论证违法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合法。奥仑道夫狡辩说，法律的宗旨不是在于保障个别的人，而是在于保障民族共同体。法律保障和德国保障是同一个意思。它在什么地方受到世界观不可靠的法官团的危害，警察就必须“纠正定罪偏轻”并“抵制法院量刑过轻的判决”。那么法律保障呢？奥仑道夫说：“这是个陈旧古董的字眼。”

抱着这种狂热的纳粹正统思想，清教徒奥仑道夫目光所及，到处都是渎职、愚蠢和堕落。它们毁灭了他想象中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图景。他周围世界所企求的乐观主义无疑距离奥仑道夫十万八千里；保安处人员提出的每一份报告，都使他更加深信党患了癌症，很快会扩散到政权的健康肌体。希姆莱困惑不解地说：“他害了肝病和胆病。他的报告总是充满忧郁，他用那么悲观的眼光看世界，背后肯定隐藏着肉体上的痛苦。大家知道，害肝病和胆病的人是有这种心理反应的。”党卫队头子并不认为，纳粹知识分子奥仑道夫正为他每天在保安处报告中读到的东西的痛苦所折磨，他从一页一页的报告中，仿佛看到了民心越来越离开党和政权。

保安处宾德外勤站 1941 年 5 月 13 日报告：“象领袖代表〔赫斯〕飞往英国事件这样的消息引起了人们极大震惊，这大概从来还不曾有过。乌烟瘴气的谣诼纷纭，人们根本不相信真是神经错乱、异想天开才会作出这样的事情。另一些人说，这是一次道义上的失败……是老战士的又一次背信弃义。”391

保安处明登外勤站 1941 年 6 月 24 日报告：“大部分居民刚一听到星期日对俄国作战，几乎全身瘫痪。领袖祈求上帝保佑此次战争获胜这一事实，也促成情绪并不具有兴高采烈的样子。”

战争越是无情地转变得对它的发动者不利，保安处的报告就越是流露出悲观主义的情调。党和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工作，

越来越深地陷入保安处报告员们的批评火力网。“据埃尔富特保安处外勤中心站收到的消息，”1942年1月12日的一份报告中说，“上星期的报刊宣传受到多数居民的强烈抵制。不论通栏标题——特别是《图林根区党报》的通栏标题——或就具体消息写的评论，都缺乏客观性，提出的结论十分夸大其词，致使人们很快就不会再相信报纸了。”

“戈培尔博士在1942年1月11日《德国》第二期上写的文章，”奥仑道夫读到，“在居民中也没有引起掌声。如果戈培尔博士后来断言丘吉尔是杂技舞台上的演员，而不是一个帝国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那么这种话实际上也只能导致轻敌思想。身为德国宣传当局最高领导人的戈培尔博士，应当真正停止干这种蠢事了。”这位宣传部长此后也仍然是保安处报告中的反面人物。对戈培尔的另一篇文章，埃尔富特保安处记述居民的意见说：“他讲的话也许会被一个主持居民晚会的居民点负责人接受，相反对一位中央宣传部长来说，必须指出这是不成体统的。”

奥仑道夫的《全国简报》也被党内知道了，引起了党阙的警觉。知名的纳粹党区领袖们在党内掀起一阵愤怒浪涛，冲击着保安处的调查系统。越来越多的纳粹党领导干部找马丁·鲍曼告状，斥责党卫队全国领袖纵容保安处执意打破给它规定的调查侦察范围。仿佛敌对国家的间谍分子就在眼前那样，对保安处的指控逐月激化：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记下了“对所谓秘密情报持有的郑重保留态度，因为所谓的保安处背着总督辖区，将这些情报源源不断送到德国，任其泛滥”。它们“纯粹是拙劣的密探产物”。纳粹党区领袖阿尔伯特·弗洛里安1942年11月30日写道：“我原来一直遗憾地无法证实的猜测，即保安处很可能在党务方面千方百计挑剔非难……〔现在〕一清二楚地被证实了。我必须进行自卫，并……将禁止任何政治领导人和职员接受保安处的任务，或者接

受任务必须经过他所在的县领导或我本人的批准。”纳粹党区领袖卡尔·魏因里希在1943年1月22日宣布：“我绝对禁止保安处进行这种暗探活动。我们不是待在俄国，要受格伯乌的监视。”

保安处突然眼见自己成了党的干部们攻击的总目标，因为他们尽力使用种种狡计揭露这个保安处谍报网，甚至使之陷于瘫痪。“你们当中谁是保安处的所谓情报员(VM)?”纳粹党但泽县领袖卡姆佩在他属下的基层组织领导人会议上大声问道。当有一个人——普劳斯特地方基层组织领导人波勒——承认时，卡姆佩给了他一顿臭骂，并形象化地——据但泽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里夏德·希尔德布兰特记述——“把情报员简直比喻成为不要祖国和毫无品格的特务分子”。卡姆佩对保安处的攻击，博得了其他基层组织领导人的热烈鼓掌。“密探！”一个人叫道，“契卡手段！”另一个叫道。一名基层组织领导人私下告诉希尔德布兰特：“我不得不说，我实在感到惊奇，政治领导中竟如此痛恨党卫队。”

党阀们怒不可遏，向被揭露出来的、保安处派在党内的坐探提出最后通牒，要么选择纳粹党，要么选择党卫队。卡姆佩教训情报员波勒：不可以既听纳粹党区领袖的话，同时又对“希姆莱先生”尽义务。冲锋队总部禁止同保安处进行任何合作。1943年3月26日，保安处某居民点外勤站头头的副手、冲锋队小队长赫曼·施普林格，接到他所属冲锋队旗队的指示：“奉冲锋队维斯杜拉地区总队命令，任何冲锋队员均不得担任保安处的工作。您在八天内给我写一份书面宣誓，声明您已脱离保安处的工作。否则我必须将您在冲锋队内除名。”党阀们试图给情报员加上反党分子罪名，对他们进行揭发，以消除隐患。例如，纳粹党县领袖卡姆佩向党的法庭起诉，控告在保安处任职的党员库特·厄勒特“行动违反纳粹党的方针”。理由：情报员厄勒特在党内不积极工作。

其他纳粹党干部则对保安处进行全面抵制。驻白卢西亚专

员、纳粹党区领袖威廉·库贝，禁止他工作班子里的任何男女工作人员同保安处的人来往；他们之中谁也不得进保安处机构的大门——工作商谈需事先经区领袖批准，并且也只限定在专员公署的办公室里商谈。连全国党务书记官鲍曼也在1943年2月2日警告全国领袖：“我在不久前已提请您注意，不少纳粹党区领袖感到，保安处以监视政治领导人和监视党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任务。我认为当务之急是，立即向各纳粹党区领袖发出通知就此事作出澄清。”

当党的干部们吵得越来越凶时，希姆莱让步了。1943年3月18日，党卫队头子给鲍曼写了一封信，保证保安处“象过去一样遵守不插手党的内部活动的严格命令”。鲍曼对希姆莱的保证表示满意，何况他也知道，希姆莱最不高兴的党卫队领袖，莫过于知识分子奥仑道夫了。

“说实话，我不喜欢他，”希姆莱私下告诉他的保健医生克尔斯滕说。“他是个毫无幽默感的人，也是令人难堪的自以为是的人，仗着他有金质党徽和党卫队队员证号码数字小，自诩为民族社会主义圣杯派骑士。”据希姆莱秘书鲁道夫·勃兰特说，希姆莱觉得奥仑道夫“经常在管教他，他感到奥仑道夫是第二号全国领袖，事事总是自作聪明，样样讲得头头是道”。毫无疑问，奥托·奥仑道夫是希姆莱企图把同党的争论以投其所好的最后一个党卫队队员。党卫队头子给保安处的工作作了严格规定，希姆莱接二连三发出谕令，破坏了保安处的方案。

送给希姆莱看的《全国简报》经常被撕毁退回奥仑道夫，全国领袖一再声言要逮捕奥仑道夫和撤消国内保安处，如果它继续过问党的事情的话。希姆莱也不准将完全反映真实情况的《全国简报》送给希特勒看。希姆莱说：“它们是那么令人难以相信地反映了悲观主义，这势必干扰领袖的创造力。”

“如果它们说的都是真话呢？”克斯滕问。

“说真话也不行，”希姆莱不为所动。“我不能用任何反面的琐事去干扰领袖，即使看起来重要得很。”

可是，奥仑道夫处长不愿听从全国领袖的命令。保安处继续盯住党阀们。正是这一点，使众矢之的的戈培尔不费吹灰之力，制造了一次雪崩，在马丁·鲍曼的配合下埋葬了奥仑道夫的事业。戈培尔提出必须取缔《全国简报》，或者至少同（戈培尔主管的）中央宣传部的简报合并。理由是：阅读保安处简报的也有国家机关，而它所报道的党内的事情，完全属于党的书记处主管的范围。

这位宣传部的统治者也对保安处首次主动发起进攻。他禁止在他的部里散发简报，因为它们——据广播事业管理科长汉斯·弗里茨彻回忆戈培尔的一次讲话——完全“适合于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传播对人民情绪和战争命运的失败主义观点”。希姆莱退却下去。1943年5月12日，戈培尔已在日记中写道，全国领袖“现在准备指示停发保安处简报，因为长此下去它将产生失败主义影响”。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希姆莱在坐观鲍曼的动静。 394

党务书记官久久没有动静，直到发生一桩事情彻底改变希姆莱和党务书记官之间的关系：1943年8月，希姆莱被任命为中央内政部长。党和党卫队短兵相接的时刻来到了。两个权力集团开始对阵了。

希姆莱很快就发觉情况有了改变。鲍曼加入了保安处的敌对集团，并提出必须严格遵守党的命令。这个命令是：评论党内事件，乃至对对国家官员的政治评价，都属党的事情。保安处的对头们一步步限制奥仑道夫机器的行动自由：1943年夏，《全国简报》的读者范围被大大压缩，一年后简报被完全取缔。同时，鲍曼禁止纳粹党主管机关和名誉干部参加保安处的一切工作；随后不久，德国劳工阵线宣布了类似的命令——冲锋队更早就作出过这一决定。

海因里希·希姆莱对他的保安处失去市场进行了反抗吗？他动员了他现在拥有的全部实力吗？没有，他没有反抗。他躺倒了。奥仑道夫骂道：“他掌握了权力，〔但〕实际上他没有在德国使用这一权力，他和他的权力犹如肥皂泡。”战术家希姆莱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拯救保安处：拖延刚刚开始同党的书记处进行的关于保安处新任务的谈判，希望能出现一个奇迹。战争临近结束时，希姆莱还在谈判。不过他已经不相信能谈出什么好结果了，他早已将警察业务范围的工作划给了作为中央内政部一个司的保安处，以便使保安处接受新的任务和得以重新存在的权利。

希姆莱的退却，首先也暴露出这个平素被极权主义统一的外表所掩盖的集团内部的虚弱。党卫队始终不敢下决心同党决斗，因为党卫队领袖们对党卫队的真正利益究竟是什么，未能取得一致看法。黑色集团铁板一块的说法是党卫队宣传家们精心炮制的一种神话。

395 党卫队坚如磐石的团结之梦有如一种幻觉，对此希姆莱并不抱任何幻想。还在1940年，他就对“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领袖们谈过他“我有时产生的忧虑”：“只有整个党卫队存在，这支武装党卫队才能存在。只有整个部队真正成为一个集团，而其内部按照集团的原则生存，并懂得一部分不存在，另一部分就不堪设想。”1943年10月间，他对驻波森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们的一席话说得更清楚：“如果党卫队和警察分崩离析，如果各主管处局由于用心虽好但对它们的任务认识不清因而分兵把口，各自发号施令，那将是不幸的。我完全相信，到了这么一天，人们将一枪把我打死，党卫队就此完蛋。”他忧心忡忡地描绘黑色集团的覆灭说：“如果各处局、各主管人在这里错误地看待他们的任务，那将是不幸的……如果〔党卫队外围组织的〕这些纽带一旦松散，那将是不幸的，那样，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所有一切将在一代人之间和



短短的时间里重新沦为它过去的微不足道的境地。”

在这些团结誓词中，恰恰反映了一个被扩张欲迷住心窍的企业创始人的绝望，他平地办起了为数愈来愈多和规模愈来愈大的企业，但同时陷入了心无全局和无法驾驭的危险。秉性多疑和怯懦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也不得不常常思忖，他究竟是不是本家族的统治者。党卫队王国的活动能量和掠夺欲愈大，各个部分组织显然同希姆莱离心离德的趋势和自负的副手们那种主子派头，也就愈加明显。此外，党卫队组织的不断发展，也迫使希姆莱将那些并非完全符合严格的纳粹观点的人拉入党卫队。

即使在党卫队的最前面行列里，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分子，以致党卫队变成了极权主义领袖专政中的一个罕见的多元集合体。党卫队仿佛是一团大海绵，它能吸收性格上水火不相容的人——相互矛盾到这种地步，致使党卫队常常难以显示团结态度。“遗憾的是，”在罗马尼亚的德意志族人领袖、戈特洛勃·伯格爾的女婿安德烈亚斯·施密特说，“党卫队员甚至在困难时期也不能团结一致，反而恰恰在困难时期大肆钩心斗角，从而大大增加了已存在的困难。”

党卫队本身各部分组织各有各的利益，以及长期灌输的以精华自居的信念，凝缩成一种不时转而反对集团整体的统治狂。贪图权力和声望的党卫队领袖们相互争斗，常常给党卫队造成祸害，甚至还可以找到粗俗的结党营私的权术的例子，它使党卫队高级领袖同希姆莱的利益和命令背道而驰。从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希姆莱在党卫队集团内部这座丛林中，多么难以按自己的意愿办事。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给他最重要的代表们树立威信；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们在党卫队内有时也受到欺侮和轻视。

希姆莱在1937年设置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是为了达到两

个目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在各地区一级（象希姆莱在中央一样）把党卫队和警察统一成“国家保卫团”，同时又代表希姆莱直接监督党卫队各单位。设置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是一个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从党卫队愈益发展和不断增加新的机构起，希姆莱有如梦魇缠身，唯恐党卫队帝国各部分可能各自为政，各部门的头头即各主管处局领导人破坏希姆莱的独裁统治地位。因此，希姆莱设计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不仅是钳制多元化的党卫队社会的工具，也是对付党卫队各主管处局日益增长的权力的抗衡力量。

权力最大的柏林中央各主管处局的达官大臣们同样千方百计地使党卫队最高统治者的副手们成为光有显赫头衔而有职无权的邦长。由于毋庸讳言的传统意识十分强烈的国家行政系统拒绝新设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拥有惩戒下属的任何属于行政机关的权力，也由于希姆莱面对极力反对的行政势力最初不得不掩人耳目，只授予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以纯属代表性的任务，因而党卫队竞争者们对付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即使当希姆莱得以在并无保守的行政势力干扰的欧洲各地德占区内，可以给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们以较多的权力时，地方党卫队各单位也总对希姆莱的副手们尽量不加理睬。同样，党卫队和警察的主管部门也注意不让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拥有过大的权力。例如风纪警察总处就拒绝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一再提出的授予他们对风纪警察进行处分和晋升的权力的要求。风纪警察头子也坚持要求驻俄国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应由他控制。党卫队领袖们一再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怎么把希姆莱的代表放在眼里。负责汉堡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向当地集中营长官询问囚徒数字，遭到拒绝，对方声言奉命有责任保密。第八党卫队骷髅旗队司令、党卫队区队长莱奥·冯·耶纳，不承认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克吕格尔有权要求他汇报部队人数、兵力部署和部队

士气情况。

武装党卫队尤其抵制党卫队警察兼高级领袖对它发号施令的企图。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克吕格尔命令区队长冯·耶纳所部换防，待命投入计划进行的一次清剿波兰游击队的行动，耶纳拒不服从，并告诉克吕格尔，只有加强骷髅旗队总督察员一人才有权调动部队。希姆莱对下级领袖们不服从命令非常恼火，一气之下，重新拟定关于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职权的命令，他从武装党卫队事件中发现，原来通行的条例“实际上”——希姆莱写道——只是“使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可以帮助武装党卫队的，否则就不免要被它视为讨厌的局外人而不予理睬。”1942年3月16日，希姆莱提醒倔强的达官大臣们：“我提醒我的所有各主管处局的负责人考虑，他们是否希望看到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如此缺少威信和权力的处境。我还要提请考虑，十年后党卫队和警察的情况将何以设想，如果我继续容忍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

希姆莱给他的爪牙扩大了权力。他让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总管所属区内的所有普通党卫队、风纪警察和保安警察及保安处司令，此外还掌管德意志族人中心和本部总处的所有机构。希姆莱总部在1943年1月拟定的一份草案中说，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负责领导党卫队份内的行动和公开代表所有普通党卫队、武装党卫队、风纪警察和保安处机构”。从此，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有权一手抓所辖地区内的所有党卫队事务了。

中央各主管处局又一次发现，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权威有空子可钻，因为1943年1月8日给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暂行训令”指出，所有党卫队成员“在党卫队范围内的行动”属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领导，但“业务上的命令和指示”只能由中央各主管处局向“业务上属于它们领导的党卫队成员”发布。当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叫喊中央各主管处局进行新的消极抵制时，希

姆莱再一次扩大他的代表们的权限。地方党卫队领袖因公去中央各主管处局者，需向所属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报告，批准休假也需经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会签。

尽管如此，这位全国领袖十分清楚，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权威，正象党卫队的统一一样，常常是一句空话。希姆莱在1943年说：“即使到第十任党卫队全国领袖手里，党卫队这个部门繁杂的集团也是……一个派别、一个实体、一个集团，必须如此。”但是，大量处分和仲裁案件的档案说明，事实上这个集团是一个最形形色色、最好斗的分子们的角逐场。几乎没有一个高级党卫队领袖不唾骂另一个高级党卫队领袖背叛党卫队的政策和思想：

398 驻塞尔维亚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奥古斯特·迈斯纳指控自己的党卫队同事、军政处长、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哈拉尔德·图尔纳，因为后者在饭店里谈论一次即将进行的清剿游击队行动的细节，从而泄露了国家机密。迈斯纳还破坏图尔纳的反对武装部队政策，因为他发觉这个党卫队同事是个争权夺利者。“根据您的行动方式，”图尔纳在1942年8月29日斥责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迈斯纳说，“您已遗憾地向我证明，您……根本不了解党卫队思想——即一个集团、一个共图大事的共同体——的深刻含义。当然更不了解我……所阐明的向武装部队的势力野心挑战、同这个地区内的掌权者站在一起的思想。”

加里西亚行政长官和纳粹理想主义者、旅队长奥托·G·韦希特尔博士，在希姆莱反对总督弗朗克的斗争中，站在党卫队对头弗朗克一边，并责骂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克吕格尔毫无道理地煽动反对弗朗克，有损德国的威望。克吕格尔的回答是：“您虽然身穿党卫队旅队长制服，但您在执行交给您的任务中，从未按照一个党卫队成员的原则办事。”

国内保安处长奥托·奥仑道夫骂《黑色团》主笔冈特·达阿尔

克文,说他利用党卫队机关报对整个在职人员进行“难以相信的诋毁性”攻击。这个头脑机灵的记者当即回敬说,奥仑道夫的看法“背离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和党卫队的特殊利益”。奥仑道夫认为,达阿尔克文的话是“一个只能使我感到十分粗野的侮辱性的回答”。希姆莱本部收到了奥仑道夫“应予党卫队旗队长达阿尔克文以相应训斥的要求”。希姆莱秘书鲁道夫·勃兰特有些不知所措:“对整个事情实际上只宜宽大为怀,不加深究,以便您和党卫队旗队长达阿尔克文之间能通过私人谈心……讨论今后的合作,以利于党卫队。”

党卫队中央处长、地区总队长戈特洛勃·伯格,也感到一直受党卫队同事的侮辱,特别是受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副总指挥楚·瓦尔台克-皮尔蒙特亲王的侮辱。伯格说:“楚·瓦尔台克亲王对我不高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1943年,亲王风闻伯格手下的人用讹诈手段拉“志愿人员”加入武装党卫队。亲王控告拉壮丁者、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朗格犯胁迫罪。伯格大发雷霆:“这是不幸的现象,一个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竟然干天主教会的勾当,抓住一件经过私下商谈早已解决了的事情,也许现在还在‘收集材料’,传讯家长,唯恐天下不乱。”

希姆莱的大日耳曼主义的野心,使党卫队的统一完全蜕变成一种怪诞的现象。例如,德国驻被占领的荷兰总督、党卫队地区总队长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博士,攻击受柏林党卫队中央主管局控制的“荷兰党卫队”,并同被希姆莱厌恶地视为“腐化的”阿德里安·穆塞特的纳粹运动结盟。在比利时同时有三派党卫队勾心斗角: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德军司令手下的军政府首脑、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埃格特·雷德尔,支持试图建立一个“大迪奇兰”(使比利时的弗兰德斯部分和荷兰合并)的弗兰德斯民族主义派领袖;党卫队中央处长戈特洛勃·伯格领导和支持“德夫拉格”(DEVLAG),这是

一个比奸分子组织，它鼓吹弗兰德斯地区脱离比利时，并入德国；而比利时法西斯分子领袖莱翁·德格雷及其党徒（不顾伯格爾反对）加入武装党卫队，旨在破坏大迪奇兰计划，又破坏大德意志计划，拯救比利时的国家统一。在丹麦，伯格爾又怂恿丹麦党卫队自由团“丹马克”<sup>①</sup>领袖、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马丁森，反对本国纳粹领袖弗里茨·克劳森，直到他获悉马丁森是德国政策的反对者，打算把马丁森投入集中营。而在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里，则高坐着有党卫队官阶的芬兰志愿作战者，他们奉芬兰作战局之命监视党卫队同芬兰的接触。

在这么一座个人利益和民族特殊利益交错纷繁的迷宫里，很难形成内部团结。希姆莱也很难使五花八门的利益统一起来。党卫队领袖们粗野好斗的利己主义，即使在希姆莱面前也不肯有所收敛。这位“全国海尼”的身材微胖、模样滑稽的形象，在同下级领袖们公开交锋时也很不容易占到上风。因此希姆莱也不喜欢一次同时接见多名下级领袖，他觉得最保险的做法是一头钻进文件堆里，通过向他的独立王国发布举不胜数的命令，以发挥防御火力。

“有人说，您再也听不进任何敢于如实看待事物和讲出真话的人的话了，”一次老集中营刽子手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西奥多·艾克写信告诉这位首领，并平心静气地教训他：党卫队领袖们“不能总是唯唯诺诺；他们这样做多半会给上级办坏事情”。人们面对希姆莱，有时会流露出十分轻蔑的语调，致使这位全国领袖不得不禁止那种说话没遮栏的少尉们惯用的油腔滑调。伯格爾帮腔说：“批评是需要的，但领袖们批评自己的上级和最高领导机关，那是不相称的。在这里，我们有些领袖还没有摆脱旧日的少尉立场。”

---

<sup>①</sup> 译音，原文 Danmark 是丹麦文，意即“丹麦”。——译者

忠心耿耿超过别人的伯格爾，甚至向全国领袖对根绝最高级领袖层中不听话的现象提出具体办法。“出于个人原因进行攻击，400甚至攻击全国领袖的行为，没有被根绝，在个别高级领袖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思想上生了根，”他在1940年12月2日写信给希姆莱说，“我认为急需建立一个机构，负责对即将或已走上不忠之路的党卫队成员，事先提出警告。”如果这些不忠实的人损害全国领袖利益达三次，他们就要“承担后果，或自动退队或被开除出队，因为他们违犯了党卫队第一条基本原则即忠于全国领袖。只要开除他两三个领袖，公告周知，就能大大提高我们的威信！”

不过，希姆莱也还有其它方法制服下级领袖的顽固不化。极端粗暴的学究式的责备，对包括最高级党卫队领袖在内的人进行侦查，将一项命令发给尽可能多的干部，所有这些综合构成一套控制系统，使党卫队内新的权力中心刚一露头就消灭于萌芽状态。经常的警告和训斥旨在不断提醒党卫队领袖们想到，党卫队全国领袖是他们权力的唯一源泉。

希姆莱书面通知旅队长欣策：“这次我给了您当党卫队兼警察领袖的机会。如果您由于放肆、酗酒和狂妄自大而不珍惜这一机会，那您就只能怨自己没有出息。”随后不久又一次训诫：“您按命令去找党卫队副总指挥耶克尔恩报到。您要少讲话，多做工作。”党卫队区队长、教授阿诺尔德·瓦尔德施密特博士挨到了这样的教训：“我希望您作为老党员和党卫队员，在今后严格地和无条件地奉行领袖的意见。对这一次，虽然您……严重损害了德意志民族和党卫队的威望，我还可以不作结论。在另有通知以前暂不批准您出国旅行。”

连久经考验的副总指挥们也受到训斥。对西南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训斥是：“在目前这一严重时刻，我请您终于能发挥果断和主动精神，非此不能消除恐怖局面。”对称兄道弟的老朋友和

竞争者副总指挥达吕格的训斥是：“我郑重要求你采取严厉措施，彻底消除并根绝时而还在出现的官僚主义。”甚至对党卫队领袖的家庭生活，他也要插上一手。“亲爱的潘克，”1944年5月16日，他写信给驻丹麦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说，“我请您教育您的太太，不要到处就区内任何政治事件或就区领袖本人大声公开发表  
401 议论。总之，我感到您在家里还没有对您年轻的太太进行如同我必须要求一个党卫队领袖所做到的领导和教育。”

另一方面，他派人监视高级党卫队领袖，记下他们私生活中的任何不正常现象。许多高级领袖都发现自己是写匿名信的对象，而希姆莱非常重视这种匿名信。

这一点，经济管理总处处长、副总指挥奥斯瓦德·波尔也领教过，他不得不就一封信表态，信中说：波尔的连襟、德国红十字会干事长克拉森鲸吞自己经管的新巴贝尔斯贝格德国红十字会中心大仓库的物品，中饱私囊。波尔读到“这种诽谤”时，大骂全国领袖。“这就是我们重视匿名信招来的结果，”他写信给希姆莱秘书勃兰特抗议说。“全国领袖当然喜欢这一套。不过他的原则性看法……引起的反应太不一致了，多数摇头和拒绝。就我个人来说，是拿起火钳把每一封匿名信夹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去。”希姆莱听到这种批评火极了，他在1942年8月29日口授指示：“根据上级考核下级的惯例，我考核我的地区总队长和副总指挥的办法是，看他们的地区有多少封匿名信。”

一个党卫队领袖监视另一个党卫队领袖。副总指挥沃尔夫叫地区总队长卡尔登勃鲁纳看一份报告，报告中说地区总队长家里的汽车使用公家的汽油；旅队长奥仑道夫给副总指挥沃尔夫送呈一份报告，报告提到沃尔夫叫人用公家汽车将很大一批鹅鸭运往自己家里。有时希姆莱不相信老党卫队领袖，甚至用非党卫队队员对他们进行监督。1940年，他挑了一个非党卫队队员担任超级



督察员，此人很快就被黑色集团恨之入骨，成了众矢之的。

这个替罪羊理查德·科赫尔博士，是笃信的天主教徒和德国最杰出的统计学家之一。“生性胆小，见了人有些腼腆，易怒且敏感，”纳粹党维尔次堡县领导机关这样描写他的性格说。要制服强悍的中央各主管处局的利益政客们，再也没有比他更不适合的人了。可是希姆莱偏偏寄希望于被蒙在鼓里的统计学家科赫尔，派这位学者任“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总监和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的主计长”，负责审查中央各主管处局的统计报表和报告。中央各主管处局的头儿们立即联合起来，除掉这个新手。连忠心耿耿尽力维护全国领袖威望的伯格，也试图笼络希姆莱的主计长。伯格说：“科赫尔，你上我这儿来。我也可以给你个旗队长当当。”这位统计学家拒绝了。

科赫尔很快就捉住了中央各主管处局头儿们向希姆莱谎报他们成绩所玩弄的大小欺骗花招。他给希姆莱算账说：“我可以立即从党卫队中央各主管处局抽调相当于三个作战师的人力，而丝毫不影响行政管理工作。”（科赫尔语）他指出，生命之源助产协会一份关于婴儿死亡率的报告是“彻头彻尾的客里空”。生命之源助产协会干事格雷戈尔·埃布纳博士报告，他主管的助产医院婴儿死亡率为百分之四，比德国其他托儿所的平均死亡率低百分之二。科赫尔查明，生命之源协会助产医院的婴儿死亡率实际为百分之八。埃布纳气急败坏，提出要求将可恶的学究科赫尔进行监护拘留。

本部总处处长、地区总队长格赖费尔特也有同感。他跟科赫尔发生争吵，原因是他指定本部手下负责民族工作的人，审查在波森举办的展览会（“瓦尔特兰区斗争和建设展览会”）的图表统计数字，没有让科赫尔插手。这位易怒的统计学家当即抨击“这种做法是将我干脆推到既成事实的面前”，气势汹汹地威胁说，他可以让他的“店铺关门打烊，并呈请党卫队全国领袖考虑，鉴于中央各主

管处局负责人继续进行消极对抗而免去我这份非常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真是岂有此理，”格赖费尔特进行反击说，“竟然责骂这位多年来忠心耿耿、忘我地为全国领袖工作的中央主管处负责人‘继续进行消极对抗’”。格赖费尔特道：“这是无中生有的诬告。”

这场猛烈交锋，揭开了统计学家和中央各主管处局之间的战斗序幕。不除掉科赫尔，头儿们是不会罢休的。格赖费尔特就“主计长的闻所未闻的态度”向全国领袖提出控告，本部总处指控科赫尔非法占用公家的汽车，伯格不怀好意地说，必须把科赫尔变成“不起作用的人”。

终于有一位中央主管处局负责人动武进行自卫了。1943年8月12日，新任种族和移民局长、副总指挥里夏德·希尔德布兰特找科赫尔博士谈话，责备他妄自尊大侵犯这个主管局的检查大权。接着，就发生了科赫尔在写给希姆莱的书面报告中陈述的事件：“我正想告退，副总指挥希尔德布兰特又说：‘我坚决不许您要无赖。’我顺口答道：‘要无赖的是您’，再次敬礼后就转身走出门去。副总指挥希尔德布兰特追上来，打了我左右两记响亮的耳光。我仿佛听到他还说了：‘现在滚吧！’不过我不敢肯定。我一声不吭，没有还手地走了。”科赫尔满肚子委屈，等待向他赔罪。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全国领袖未采取任何行动给自己的统计学家以支持。希姆莱能够劝说这位中央局长做到的，只是写了一封轻描淡写的道歉信——不是写给科赫尔，而是写给希姆莱。希尔德布兰特写道：“最尊敬的全国领袖！我诚恳地请您向高级政务参议科赫尔博士由于他受到粗暴对待转达我的歉意。希特勒万岁！您的希尔德布兰特。”

理查德·科赫尔懂得了这一课的意义。希姆莱显然无力保护自己手下的督察员。科赫尔要求调往累根斯堡市郊，奉希姆莱的委托在那里办一所统计学研究所，这是中央主管处局头儿们拳头

打不到的地方。科赫尔的插曲也说明，中央各主管处局在党卫队组织中已经变得多么飞扬跋扈。当然，中央各主管处局只是在共患难时，才团结一致——在平时，它们各行其是，各走各的路。“这些机构并未按照希姆莱的要求能和衷共济地发展，”党卫队区队长赖内克在战后评论说，“它们正是由于各自任务的不同而一直离心离德。”

它们经常推行一种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政策：德国中央保安局极力主张斩尽杀绝所有犹太人，相反，经济管理总处则极力主张保存所有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德国中央保安局头目在对俄占领政策方面坚持打击俄国劣等民族的方案，反之，党卫队中央机关则鼓吹建立一支由德国人领导的俄国叛军。在国家保安问题上(例如：偷听敌台广播)，秘密警察所持态度原则上比保安处来得严厉。经济管理总处尽力使它的企业不受国家的任何控制，而奥仑道夫周围的一伙党卫队领袖，则力图加强国家机关对党卫队经济企业的监督。在罗马尼亚存在四种不同的党卫队政策：党卫队中央机关奉行尽可能多地招募德意志族人的方针；德意志族人中心(Vomi)主张更加积极地进行招募；党卫队旗队长明克领导的、敌视德意志族人中心的国外德意志民族协会的实干政策；以及外交部机关党卫队区队长兼总领事罗德的私人政策。

但是，党卫队各部门争取独立的倾向，在管辖一支部队的中央那个处的历史中，反映得最为明显，这支部队在欧洲各处战场上广为传布党卫队恐怖的嚎叫声，但又越来越背离黑色集团的思想意识。这支部队就是武装党卫队。

## 第十五章 武装党卫队

1942年3月，中央保安局向海因里希·希姆莱打了一份秘密报告，党卫队保安处的调研人员在秘密报告中，抓住了德国人对希特勒的这支令人毛骨悚然和极其顽强的部队的看法。“原则上可以肯定，”党卫队保安处的调研人员陈述道：“武装党卫队由于它的成就已经赢得了国民的重视，确立了它的地位。对此，谈论得特别多的是，党卫队领袖和副领袖及队员之间的亲密友谊和融洽关系。”

不过，党卫队保安处在报告中也记述了：“这方面的舆论认为，武装党卫队……缺少经过正规训练的军官，因此党卫队员成了‘轻率的牺牲品’。武装党卫队还‘毫无意义地冲在前面’，因为它认为必须给国防军作出榜样。”更加糟糕的是：“评论性的意见认为，武装党卫队是‘军队的督军’。教育武装党卫队员残酷无情，显然也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能够用他们来对付德国的其他部队。”结论是：“武装党卫队是激进的军队，它根本不抓什么俘虏，而是干净彻底地消灭每一个敌人。”

保安处从而着墨不多地概括了国民对于武装党卫队的看法，勾勒了众多德国人慑于这支部队的畏惧和惊讶神色，这支部队集中反映了黑色集团的成分复杂、令人战栗和具有的理想主义，为党卫队任何其他组织所望尘莫及。集团的首领希姆莱把武装党卫队建成为纳粹政权的一支警卫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它的士兵连续不断地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它的领袖们仍然古怪、执拗地沉溺于他们全国领袖的意识形态的梦幻之中。

作为党的卫队而设计、并被训练成为在世界观和征服方面进

行狂热而又冷酷战争的武装党卫队，年复一年，越来越明显地离开希姆莱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日夜夜，使全国领袖的士兵几乎变成了普通军队，跟武装部队的成员差不多，无所区别。但是纽伦堡的集体判决却把武装党卫队定成是一支“歹徒军队”（菲立克斯·施坦因纳语），说成是一群政治狂热分子。武装党卫队的士兵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剥夺军队的资格，被列入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屠杀分遣队和集中营刽子手同一个类型。

武装部队的前军官本来是能够纠正武装党卫队这一片面形象<sup>405</sup>的，但是许多人都保持缄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再也记不起，当他们知道武装党卫队的精锐师站在他们一边时曾经一度满心喜悦。不少军人还参与了对党卫队部队作出的总评价。陆军元帅艾伯特·凯塞林认为建立武装党卫队是“一个性格执拗的孩子搞出的儿戏”，齐格菲·维斯特法尔将军愤懑地埋怨，说武装党卫队挖走了陆军“最重要的后备力量和新兵”，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斯坦因气呼呼地说：“他们付出的大量流血代价，一般说来，与他们达到的目的并不相称。”显而易见，一些军人的记忆力存在着缺陷。曼斯坦因元帅在1943年8月哈尔科夫西面的防御战以后，曾一度公开肯定过党卫队“帝国”师的功勋，由于它击退了突入别尔哥罗德-瓦尔基地区的苏军部队，德国方面才有可能进行一次反攻——而回忆录作者的曼斯坦因却绝口不再提起此事。

这种一眼即可看穿的保留态度，促使武装党卫队的前领袖们进行反击，党卫队的将军们用反击证明，他们跟武装部队的回忆录作者们并不相上下——至少在记忆力的衰退方面来说亦复如此。因为：武装党卫队的辩护士，首先是总指挥、退役大将保罗·豪塞尔，他的已故同僚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和“原武装党卫队军人互助团”（Hiag）的发言人企图证实无法得到证实的事情：当年他们的部队没有什么不同于一支军事部队的地方。原武装党卫队军人互

助团首先凭空捏造希特勒的讲话和错误的年月日，试图以此证明，武装党卫队及其前身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VT)一开始就是非政治性的。说什么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是在1935年公布义务兵役制以后才成立的，而且是作为“国防军的第四部分”，作为一支“现代化的实验部队”。

事实上，武装党卫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它的编年史发端于纳粹接管政权的头几个月，那时党卫队正打算建立武装部队。当年，在普通党卫队的区队和地区总队中就形成了装备轻武器的战斗小组，以使冲锋队大军对党卫队畏服，并对虽已被击败、但还相当活跃的民主派敌人使用暴力。

406 一般情况是，每个党卫队区队拥有一百名左右武装党卫队员，组成一支所谓本部警卫队。这个名称本身说明，它首先是地方党卫队头目用来炫耀门面的一项军事装饰品(它往往并不受希姆莱的节制)，并无其他目的。遇上本部警卫进行集训，它就自称是特遣队，并扮演辅助警察的角色，这主要也是想由邦警察的预算款项中给它关饷。如果特遣队有了好几个连队，那就换一个新名称：“政治预备队”。它已经具有了完全军事形式的结构：政治预备队由小组、小队、突击队(相当连)和突击大队(相当营)组成。

这样，最终就在全国用政治预备队编织成一张粗网眼的罗网，武装起来的党卫队人员以政治预备队的面目准备实行国内政治恐怖。在沃尔特丁根、阿罗尔森、埃尔万根和莱斯尼希，在符腾堡和萨克森，政治预备队排演了1934年6月30日的德国国内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成为令人胆战心惊的现实。

普通党卫队中这批政治打手的最杰出的单位，是由阿道夫·希特勒创建的一支部队。他指示建立一支本部警卫来保卫他个人的安全，希特勒委托一个诡计多端和性格骠悍的上巴伐利亚人担任这支卫队的领导：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瑟夫(“塞普”)·狄特里

希。狄特里希生于1892年。干过形形色色的行当，先后做过农具工人、仆役、坦克兵、警察、烟草厂的监工、税务员和加油站职员，他被人们看作是生性诙谐的巴伐利亚粗汉。洋溢在希特勒的梅塞德斯牌轿车里的这种诙谐，伴同着这位首脑周游全德发表巡回演说，被富有文化教养的党员同志称为“司机越轨”。希特勒将他这个多面手的私人警卫员派作各种用场：1928年入党的狄特里希充当了慕尼黑纳粹经营的弗朗茨·埃耶出版社的发行人，负责创建南巴伐利亚的党卫队，1931年担任汉堡党卫队北方大区领导，在纳粹攫取政权后，立即进入总理府，被任命为纳粹总理的私人卫士长。

1933年3月17日，根据领袖指示，他从希特勒的前慕尼黑私人警卫中挑选一百二十名一色彪形大汉，建立“柏林党卫队本部警卫”，这支卫队最早驻扎在亚历山大兵营，附近就是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环城铁路车站。塞普·狄特里希创建了纳粹军事史上作用最为重大的部队的胚胎细胞：领袖警卫旗队。最初，它的发展过程与其他政治预备队的道路几乎并无两样：在本部警卫的基础上增强为两个连，外加一个党卫队特遣队，1933年初秋，以“柏林警卫营”的名义迁入柏林利希特菲尔德前士官总校的营房，不久又充实了三个经过于特博格练兵场训练的连队。

军事训练工作由波茨坦第九步兵团负责，因为前卫队长狄特里希的水平一直远远不能符合现代战争的要求。他的同僚们后来也花费过一些力气，来给持怀疑论者证实这位武装党卫队最早的一个大将的军事功绩。他们通常不得不对这样一种设想感到满意，<sup>407</sup>即这个过去的坦克兵具有天然的军人禀赋，他仍然以一种罕见的匹夫之勇和一种粗野的、根本不把希姆莱的命令放在心上的蛮劲，成为自己部队里深孚众望的人物。然而他连一个团也几乎指挥不了。原党卫队副总指挥威廉·比特里希回忆道：“我曾经试图，叫塞普·狄特里希就一张地图作一个半小时的报告，谈谈地

形。结果，报告做得根本不象话，他对什么也是一窍不通的。”

希特勒对他的卫士长的这种缺陷泰然处之，不当一回事。这支新的部队并不是军事作战部队，而是主要作为第三帝国的警卫队和以壮声势的卫队来考虑的。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它因此不久也就担负起对希特勒的保卫工作。后来，警卫队负责德国新总理府的内勤警卫。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前，站着穿黑制服、束白色武装带、戴白手套、内着白衬衫的双岗警卫，它象征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形成了一支和国防军并列的第二武装力量。

1933年9月，在纽伦堡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希特勒还给这个警卫营命了名，从此它可以自称“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LAH)。两个月后，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十周年纪念日，警卫旗队向给他们命名的主子宣誓永远忠贞不贰。但是几乎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场军事政治和宪法政治的革命已塑造出一个袖珍样板：警卫旗队员们向阿道夫·希特勒总理宣誓效忠，然而德国总统乃是武装部队的唯一最高统帅；他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肯定说过，德国总理可以拥有一支私人部队。尽管当时的警卫旗队只不过几百个人，但是希特勒的这种架势也暴露了几分哲那斯<sup>①</sup>的那种两面性，后来这种两面性还跟武装党卫队联在一起：希特勒建立了一支为他个人达到政治目的服务的部队，今天他把它作为一支军事部队，而明天就可以用它来作为实行政治恐怖的工具——必要时也可用来对付传统的武器携带者：国防军。

1934年6月30日那个血腥周末给对此持怀疑态度者以启迪：警卫旗队的两个连奉命开赴巴伐利亚，袭击在维西浴场集会的冲锋队领袖，并将他们加以逮捕。狄特里希率领的特遣队在慕尼黑施塔德尔海姆监狱的院子里处决了六名杰出的冲锋队领袖，同时，

---

① 哲那斯(Janus):罗马神话中之肇始神及具有两面头的门神。——译者



警卫旗队的其他行动队在柏林追捕纳粹的敌对者，将他们押到“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驻地利希特菲尔德营房的院子里加以枪杀。政治预备队也参与了血腥的搜捕行动。党卫队第三政治预备队（萨克森）屠杀了九名失去宠信的党员，西德和南德的一些政治预备队拘押了涉嫌的冲锋队领袖。

政治预备队的出动轰动一时，使得希姆莱野心萌动，决定建立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希特勒表示了同意，并且允许党卫队全国 408 领袖从没收冲锋队的军火库里，调拨足够的武器，以便能够建立一支部队——尽管这样做已经引起国防军的将军们开始对黑色集团这个军事竞争者喃喃抱怨。希特勒当然谨慎行事，以免引起国防军领导部门抨击。他批准建立三个党卫队武装团，但同时出于对国防军的考虑，禁止它们合并成一个配备工兵和炮兵的完整师。

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随后发出的一些指示，还规定这支未来的“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的最紧急任务在于确保政权的**内部安全**，特别机动部队仍然是党卫队的一部分，从而也仍然是党的一部分。它只在国防军进行备战活动时投入军事行动，至于具体投入军事行动，当然要到动员日的那一天，“根据当时的内政情况，以及这三个党卫队的团具有的作战能力”来决定。这是1934年9月24日国防部长（当时往往自称军事部长）的一项命令中的提法，这项命令还再次强调：“为执行领袖赋予党卫队对内政方面的特殊任务，”党卫队得建立“一支永久性的武装的特别机动部队”。

这就清楚地说明了，特别机动部队应以政权的国家警察部队为己任。希姆莱只要将警卫旗队和政治预备队联合成一支唯一的部队，他就掌握了未来党卫队的军队干部。然而党卫队全国领袖很快就认识到，仅仅靠普通党卫队作为后备兵源，是不可能建设一支新型部队的。他需要进行战争的工艺家、军事专家；光靠塞普·狄特里希那种类型的粗汉性格是无法形成一支精锐部队的。

可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极其为难的情况：希姆莱需要有经验的职业军人，但这些职业军人是很难献身于一支其地位仅仅跟警察有所不同的部队的。这个党卫队头子必须掩盖建立特别机动部队的真实目的，必须给这支部队安排较之希特勒和国防军在命令中给它下达的任务更为常规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资格最老的武装党卫队领袖今天仍然真实地相信，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在一支正常的军事部队里服役。

一支新型警卫部队的虚假图象诱使一些早先的军官加入特别机动部队的行列。党卫队法官保罗·沙尔费甚至获得了国防军的一个货真价实的将军头衔：冲锋队在奥登瓦尔德进行军事演习时，他重逢他的老战友、当时身穿冲锋队旗队长制服的保罗·豪塞尔。沙尔费问豪塞尔是否有意加入党卫队。豪塞尔就同意了。

409 跟脖子短粗、身材矮小的巴伐利亚人狄特里希相比，再也很难想象有比高个子、瘦骨嶙峋的勃兰登堡人豪塞尔更显明对照的另一类型的人了。豪塞尔出身普鲁士士官团，是一个军官和经过正规训练的总参谋部人员的儿子，生于1880年，仪表堂堂，处处显示出普鲁士军官风度，他举止潇洒，富有教养，谈吐挖苦俏皮，这使得他在等级森严的国防军中树立了一些敌人。他的军事经历表明他正常地努力向上和具有扎实的实际知识：受过步兵训练，经过军事学院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东、西两线的陆军总参谋部任职，任过第二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第十步兵团团长，马格德堡步兵司令，最后于1932年1月退役，时为中将衔。这位非常保守的赋闲将军知道，参与德意志民族党的前线战士组织“钢盔团”活动，是愉快的消闲工作。参加“钢盔团”后，他立即擢升为柏林-勃兰登堡地区领袖——这个职位是“退役的国防军将军最合适不过的了”（豪塞尔语）。在“钢盔团”被迫并入冲锋队时，他乐意地接受了冲锋队参谋长罗姆授予的冲锋队预备队旗队长头衔，他也同样

高兴地穿上了希姆莱发给他的党卫队旗队长制服。

党卫队首领估计到，这位前国防军将军有着手艺才能的那种冷静头脑，这是希姆莱在着手改编武装党卫队时所需要的。希姆莱在1934年12月14日已发出指示，将政治预备队改编成营，并与领袖警卫旗队合并成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在这次改编中，考虑让旗队长豪塞尔担负一项关键性的任务，党卫队战士缺什么，豪塞尔就应灌输给他们什么——纪律、服从、操练、敢于拼杀，简而言之：即军事知识。

1935年初，这位新教练能手在不伦瑞克公爵府邸开办了一所党卫队士官学校，这儿是培育有朝一日担任党卫队部队营、团级干部接班人的学习场所。这是第二所这一类型的领袖学校；1934年10月1日，原国防军军官保罗·莱托已在特尔茨浴场士官学校开始进行第一期课程。豪塞尔迅即认识到，他只有以国防军的素质和精神为蓝本进行训练，才有可能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我当时认为，”今天他这样说，“党卫队必须建立一支首先以国防军训练教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部队，因为这种教程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豪塞尔在不伦瑞克施教的内容扎实的手艺，完全吸引住了那些早年的警官、国防军服役期满的中士和热情的青年军人，可以使他们成为未来党卫队军队领袖和副领袖干部。这批干部被派到分布在各地的营，这些营逐渐发展成团：慕尼黑三个突击大队组成了党卫队第一团（“德国”团），配备了并采用备有马匹的步兵团编制；在汉堡，同样也由三个突击大队组成党卫队第二团（“日耳曼尼亚”团）；在柏林，由领袖警卫旗队扩充为一个摩托化步兵团，而1938年起，在维也纳建立了第四个步兵团，即党卫队第三步兵团（“领袖”团）。1936年盛夏，这支特别机动部队的建立已清楚地具有规模，以致希姆莱将他的这位将军也正式安排进党卫队自己的

这支小型部队的领导岗位：1936年10月1日，党卫队旅队长豪塞尔被提升为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员。

这个动听的头衔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豪塞尔还不大可能成为自己家中的主人。豪塞尔正式隶属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领导，给自己建立了一个类似师司令部的部门，负责监督部队的装备和教练工作，可是党卫队的各路政治和军事头目开始时并不愿意自动地承认豪塞尔的权威。普通党卫队的地区总队长们，实在不想交出过去由自己建立起来的对这些武装部队（当时为政治预备队）的监督权。因为希姆莱在1936年9月17日发布的一项命令中也曾指出，监督“只是包括教练要求的范围”，不触及“党卫队地区总队范围内的特别机动部队以外的地区职权”。小心谨慎的豪塞尔只是在希姆莱的帮助下，才逐渐能向党卫队地区总队发号施令。

但是，他刚刚排除了背后的倾轧，又遇到了自己部队里冒出来的一个愤愤不满的敌手：领袖警卫旗队长狄特里希没有兴趣接受普鲁士人豪塞尔的监督。甚至希姆莱也不敢大声叫狄特里希遵守纪律。他早就防了一手，在给特别机动部队的命令中写下由自己保留对警卫旗队进行监督的权利，督察员仅仅“可以参加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勤务工作”。这句话证明全国领袖悄悄地放弃了打算，他不想以希姆莱的命令去触动狄特里希领导的警卫队。“全国海尼”的权力在利希特菲尔德的营房里常常是不起作用的。

“亲爱的塞普，这当然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希姆莱在一封信中激动地写道：“你的领袖们如此亲切地对我个人表示尊重，否则党卫队警卫旗队就成了一桩叫人难办的事情，它可以随自己的心意想干什么和不想干什么，根本不必考虑来自上面的任何命令了。”跟国防军的士兵经常进行殴斗，对这支“娱乐部队”的同伴们高声辱骂，未经国防军同意擅自征集有兵役义务的人——警卫旗

队叫人恼火的事情没完没了。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首脑担心地说：“要是警卫旗队违背一切规章、命令和诺言，继续这样擅自行动，我看将会发生很大困难。”希姆莱再次劝告塞普：“我最后一次实实在在地请你不要再干这些事情。我不可能向国防军承认，我对督促警卫旗队遵守对整个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和命令无能为力。我也不可能容忍警卫旗队一再任意胡闹。”411

首席教官豪塞尔暂时也不得不对狄特里希的不满让步，虽然这些“柏油士兵”——这是特别机动部队管他们那些自命不凡的领袖警卫旗队同志们的叫法——缺少基本的军事训练。那些似乎从不间断的检阅和封锁交通的任务，使领袖警卫旗队无法学习战斗训练的基础知识。直到狄特里希自己发觉，没有一个士兵看得起警卫旗队，他才态度软了下来，让督察员豪塞尔施加更多影响。1938年，他同意警卫旗队与特别机动部队互换营、连长，豪塞尔的学生们逐渐地把军事纪律带进了警卫旗队。

尽管如此，早先的将军豪塞尔仍然不能单独确定特别机动部队的军事概念。不久，原先的军人和纳粹主义的卤莽汉就钻进了特别机动部队，这些人根本不象豪塞尔那样致力效法国防军的榜样。新来的人反而传播一种信念，即特别机动部队的使命是要成为新德国的革命的核心部队，被选定用来取代所谓僵化了的国防军。他们给特别机动部队注入一种活力和一种警卫军的傲慢的中坚意识；在这支警卫军里，成长中的一代希特勒青年的盲从信仰，和持有独特见解的前线军官的军事改革提纲，凝缩成一种自视被遴选为精华的姿态。

军事改革派的头目是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和原国防军军官菲立克斯·施坦因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一次事件使他变成了反对保守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叛逆者。在1918年的突破战役中，他是缺乏机动性能的大部队遭到覆灭和一支新型作战部

队诞生出现的见证人。这支诞生的新型部队是一支突击部队，一支机动的战斗部队。

为了摆脱大部队和大部队相持不下、消耗实力的那种瘫痪性的胶着状态，德国前线军官们想了一个主意，把他们的优秀士兵从战壕里抽出来，组成突击部队。这些所谓突击营起到的作用，仿佛是束着大部队柔软腹部的钢条：防御的核心力量，进攻的尖刀。这些战斗部队进行了近战训练，配备了火焰喷射器、机枪、手枪、手榴弹、铁锹，并且很早就掌握了后来被称为战斗协作的技术：以最小型的部队进行协同作战。趴在机枪后面的当年才二十岁的施坦因纳少尉任机枪狙击营的连长，他是东普鲁士人，也是一个萨尔斯堡流亡者家庭的后裔。他认为已经看见了军事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他以为，未来既不属于优劣混杂的大批人马，也不属于传统的单独作战的战士，而唯独属于精干的战斗小组。

这位少尉的看法错了。国防军后来接班的将军们，跟后任党卫队旅队长的豪塞尔看法一样，因为他认为，突击营是在紧急情况下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就一支正规军范围而言，它始终只能是例外的现象。这个出生东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家1927年起就成为上尉，1932年起任科尼斯堡第一歩兵团连长，跟国防军的教条主义者一直处于愈来愈激烈的对立状态。将军们计划在下一次战争中仍然用一支义务兵役制的国民军进行作战，施坦因纳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军事精华的概念。施坦因纳的想法大致是，总体战要求的大部队必须能进行防御性作战的行动。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高度精锐部队快速作战的战斗实体”，即最现代化的核心部队，它们能够“在闪击战中把敌人分割开来，然后将其失去联系的部分逐个歼灭”。

一条合乎逻辑的道路将精华论的理论家施坦因纳引向豪塞尔的特别机动部队，军事改革家菲立克斯·施坦因纳感到，这支部

队今后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那种核心部队。他奉命对特别机动部队“德国”团的改革提出设想，没有几个月就成为国防军传统军人豪塞尔的思想对立面。施坦因纳当然首先将其改革局限于一个营。他中断了占主导地位的在营房院子里进行机械性的操练，将训练重点改为在广泛的水平上开展竞技比赛，把士兵培训成熟悉地形的“狙击手、猎手和竞技选手”，即英国军事著作家利德尔·哈特推崇其为现代步兵的那种典型。

施坦因纳认为，要使队员和领袖之间的差别拉平，以促进他的士兵中的同志友谊，这种友谊是消除严酷的操练和进行战斗带来的疲劳辛苦的因素。领袖、副领袖和队员必须相互进行军事技术比赛——这同样是一种打消级别差异概念的办法。再说选拔领袖制度也有利促进部队的内部团结。党卫队士官学校彻底与国防军的体制决裂，即只要完成基本训练成绩合格，就提前承认其候补军官资格。未来的士官必须在进入军事学校之前先在部队服役两年，不考虑文化教养和出身的特权——1938年以前，有百分之四十的士官不是高中毕业生。施坦因纳和其他党卫队指挥官一再表明，他们背弃国防军的准则：党卫队营地的栅门和房门必须彻底打开，部队管理部门的领袖在他们的专业学校毕业之前，必须进行一413次军事训练，并且如同美国历史学家乔治·H·斯坦作出的评述一样：日益增进了“军官、军士和士兵之间精诚团结和相互尊敬的感情，这种感情在陆军中一般是陌生的”。

施坦因纳在作战训练上也是走的新路子。他认为，军事基本单位不是班（如国防军那样），而是突击队——施坦因纳计划把整个团分成若干突击队，足以迅捷地缠住敌人，进行近战，同时又仍然保持着团的编制。以高度灵活和速射武器更替国防军通常用的卡宾枪，首先是配备冲锋枪、手榴弹和工兵爆破炸药。同时作战服装也用新型的伪装茄克和伪装军服更换陆军制服。施坦因纳迅速

建立起一支军事健儿部队，一种“具有运动员姿态、轻松而又灵活的士兵类型，然而却又具有高水平的行军能力和战斗力，”后来，施坦因纳作了这样概括的表达。国防军甚至也为此大吃一惊：让一支部队在二十分钟内急行军走完三公里路程——这是我们从来还没见到过的事情。

致力于现代化的施坦因纳的成就有目共睹，以致特别机动部队把他看作为实际领袖。就是希姆莱也由于革新而轻易地受到了影响，选择这个执拗的东普鲁士人作为他的“推心置腹的宠儿”（对手豪塞尔这样说）。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去见全国领袖时神情过于泰然自若，他不想结婚，也拒绝退出教会（这是党卫队中升官晋级的先决条件），希姆莱起初对这些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党卫队首领几乎随时愿意听从他这位神奇战士的主意。

施坦因纳之所以多年在特别机动部队里享有明星地位，是因为他跟同僚豪塞尔、比特里希、弗里德曼·格茨、格奥尔格·克普勒和赫伯特·吉勒一样，同属选择了投奔党卫队部队、为数寥寥的职业军人。建设特别机动部队的精神愉快掩盖不了这支新部队缺乏足够数量的有经验的军官，缺乏一个在世代相沿的军人勤务中久经考验、训练有素的士兵阶层。在国防军中，军官团成员的百分之四十九出身于军人家庭，而在特别机动部队至多只占百分之五。国防军军官农民出身的不到百分之二，相反特别机动部队的领袖则百分之九十来自农村。特别机动部队从来就不可能从资产阶级和大城市居民中为自己招募人员，它始终是一支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军队。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下萨克森、弗兰肯和萨尔，几乎每三个农民子弟中就有一个加入特别机动部队或后来的武装党卫队。

特别机动部队的新兵和新领袖缺乏军事传统，他们就通过勤  
414 学苦练，通过纳粹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模式来加以弥补，它让特别



机动部队的许多人相信，和“反动的”国防军相反，特别机动部队是纳粹国家唯一可靠的武装力量。如果说施坦因纳的军事技术改革思想已经培育了一种军人优越感，认为特别机动部队高于国防军，那么那些先在希特勒青年团中定型、经过士官学校在世界观上改造过的特别机动部队新领袖，就把一种坚定的纳粹信念带进了部队，这种信念促使希姆莱的士兵跟“老鞋匠们”（这是罗姆过去对国防军将军们的叫法）处于一种几乎毫不遮掩的对峙状态。憎恨穿灰制服的官兵是特别机动部队的一帖保命药，因为国防军暂时还成功地束缚着这支不受欢迎的部队。

将军们从来没有把特别机动部队视为一支第四武装力量，相反，他们担心，希姆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警察机构，他手中掌握的这支第二武装部队短时期内将对国防军的存在形成致命的威胁。特别机动部队和国防军成员之间的任何一次殴斗，在党卫队俱乐部里对反纳粹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的任何一次辱骂，陆军和党卫队共同使用的部队演习场上发生的任何一次意外事件，在陆军总司令部看来都是一种危险，有朝一日，它可能把军队的垄断地位和作为国家唯一的武器携带者的特权让给黑色分子。“所有部门的报告都认为，”冯·弗立契大将在1938年2月1日记述道，“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与陆军的关系非常冷淡，甚至是对抗的。我们不能排斥一种印象，即在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内部简直是在鼓励对陆军持对抗态度。”

弗立契和陆军的将军们曾极力对希特勒施加压力，使得独裁者暂时不让党卫队进行任何扩大，甚至不完全承认它是军事战斗部队。特别机动部队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国防军紧紧捆住手脚：不容许它成立师，不同意它建立炮兵部队，禁止它在报纸上登载招募兵员的公告。陆军有权对党卫队部队进行监督。所有这一切效力直到战争爆发时才结束——然后，希特勒就要作出抉择，是否将作为

他自己部队的特别机动部队置于陆军领导之下，或是干脆把这支部队解散，将它的成员分配到国防军的各个部队中去。厄运决不会危及这支部队的生存，何况它本身就是以德国武装力量的精锐和核心部队的形式起家的。

突然，国防军发生一次出乎意料的危机，这对特别机动部队来得正是时候。1938年2月，特别机动部队的手冯·弗立契和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倒台。希特勒掌握了武装部队的领导权。半年后，特别机动部队的生存威胁已经烟消云散。1938年8月17日，希特勒签署了一项公告，它成为后来的武装党卫队的真正出生证：  
415 希特勒承认特别机动部队是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一支常备部队。希特勒指示写道，这支部队用于“执行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总监的并由我视情况作出保留的特殊内政任务，或执行作战陆军范围内的机动任务”。特别机动部队的目的达到了。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旅队长莱奥·佩特里得意洋洋地说：“武装部队认识到，党卫队全国领袖为达到自己目的而进行的斗争，到底比它反对第三帝国的新事物来得坚强。”

然而奇怪的是，特别机动部队原来的领袖们这时几乎并不认为希特勒的公告具有意义，他们对自己部队出生证的文字内容听起来并未感到舒服。因为希特勒的命令中的一些段落再次清楚地表明，特别机动部队作为纯粹的军事部队形式一直尚未获得国家的承认。“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公告中说道：“既不是武装部队的一部分，也不是警察的一部分。它是一支受我〔希特勒〕专门支配的常备武装部队。作为这样一支部队和纳粹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世界观上和政治上应按照由我为纳粹党和党卫队所确定的路线通过党卫队全国领袖来选定。”

但是，由于前武装党卫队领袖们今天不愿再承认自己曾经是一支党的军队的成员，因此他们就必然把1938年8月17日这个

关键性的文件不当一回事。豪塞尔在1966年说：“不能认为这项公告有什么根本性的重大意义。”可是旅队长豪塞尔有一次却不是这种看法。1939年1月23日，他在柏林地区总队长的一次会议上阐述了为什么希特勒的命令对整个特别机动部队具有“根本性”意义：“特别机动部队现在是，并且永远是党卫队的一部分，它实现了党内可靠的政治战士和武器携带者之间的统一。”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假设，象豪塞尔和施坦因纳这样的职业军人在当时内心里对希特勒的公告已持相当程度的保留态度，这项公告的确毁掉了他们心目中的整个世界，即充当只是执行军事任务的军人。豪塞尔、施坦因纳和另一些早先的职业军人在军事技术问题上尽管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分歧，但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却是一致的：他们要从事一种纯军事技术业务。他们要“象别人一样”当军人——他们最不愿听到的事情，莫过于象佩特里那样洋洋得意地欢呼“党的部队”的胜利了。他们认为，特别反常的想法莫过于他们的全国领袖的整个思想了，他把特别机动部队主要看作是他那梦寐以求的国家保卫团铁链上环节中的一环。豪塞尔在1939年1月23日的报告中对此已有清楚反映。尽管豪塞尔也强调特别机动部队是整个党卫队的一部分，但他试图同时将一个非党卫队的权威偷偷塞进部队：陆军总司令（OBH）。豪塞尔说：“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是党卫队最卓越的部分，除全国领袖按领袖命令发出的指示对它具有约束力外，还服从党卫队以外担任陆军总司令职务的人作出的决定。”

416

渐渐出现的一条裂缝，在开始时几乎还觉察不出来，但在战争期间年复一年变得更加清楚了：集团神秘论者希姆莱和他部队的军事首领之间的裂缝，他们之间的疏远，后来使得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首脑大声叫嚷，部队的领袖们“从来就不领会党卫队全国领袖的措施，并且不断对之抨击”。希姆莱满腹狐疑地注意着他手下

的高级军官在外表上模仿武装部队。希姆莱同意服役于特别机动部队应承认为服兵役；但他很不高兴地看到，特别机动部队不穿黑色制服而穿陆军的灰色军服，以及也佩戴武装部队的肩章和袖口条纹。当特别机动部队领袖甚至想接受部队建制概念和实行军阶时，希姆莱就予以否决。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当时的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海斯迈尔不得不在一项命令中通知党卫队高级军官，特别机动部队“不采用连和营的名称，而是称为突击中队和突击大队，领袖不叫连长和营长，而叫突击中队长和突击大队长。”

党卫队全国领袖预感到，特别机动部队的高级军官醉心于传统职衔一事，隐藏着叛逆的危险，但他也清楚，“明智的高级党卫队领袖们在和平时代里与希姆莱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部队应该“全面地编入陆军”，正如敌视党卫队的希特勒武装部队副官霍斯巴赫将军所证实的一样。对特别机动部队也应关心内政和警察一类的任务，党卫队自己的职业军人，经常持有不同意见。希姆莱原打算，特别机动部队领袖必须定期去其他非军事性质的党卫队单位执勤，以锻炼世界观和培育出一种集团精神，使特别机动部队成员跟集中营看守人员和保安处调研人员具有同样水平。只是费尽气力才促使希姆莱放弃了这个主张。

希姆莱在1936年5月22日预先说明，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要到特别机动部队当十个月左右的小队长，然后去种族和训练处工作十个月，进行世界观方面的初期重要学习。还要到保安处去工作十个月，以学会识别敌人，再在普通党卫队干十个月，学习担任领导工作”。这项规划如同党卫队训练处的试验一样趋于失败，因为训练处试图在部队里通过自己的世界观教官建立王朝权力，这种权力与苏联政治体制不无类似，它渐渐地达到与部队指挥官的权威分庭抗礼的程度。1936年，希姆莱不得不把世界观的培训工作交给指挥官；训练处只负责抓方针和教材。

但是指挥官的纳粹课程恰好暴露出，在褐色德国苏醒的陶醉<sup>417</sup>

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特别机动部队领袖们，遇到的是一批老一代较为明智的纯粹军人，他们很少有兴致侈谈纳粹主义的一套。这两个派系之间不止一次地发生了争吵。1938年5月17日，纳粹信徒、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恩斯特·菲克报告说，在一个“上了年纪的非常诚实的军人”党卫队区队长格茨身上发现了一个“死敌，我们在涉及世界观的事情上激烈顶撞起来，这使我一直认为，他一定是神经不正常”。这位观察家还注意到，特别机动部队的偶像施坦因纳对纳粹思想根本不热心。他在笔记中对施坦因纳作了这样的勾勒：“在精神上大有典型的国防军传统，对我们的政治问题却万难接受的。”

然而，纯粹的军人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有效地对抗他们年青领袖的政治激进化。特别机动部队始终是政权保护者的一支部队；每项世界观课程都得向希姆莱的士兵说教，他们必须作好准备，必要时不惜对自己的弟兄下手，以保卫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特别机动部队队员懂得，如同党卫队的一项正式文件中所述，他们的部队“是民族社会主义党显而易见的武器携带者”；招募新兵的规划要求每个“健康的、德意志血统的男丁”加入特别机动部队，只要他无条件拥护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训练课程应确保特别机动部队的士兵在思想上也是一个狂热的、绝对顺从的、彻底执行这位独裁总理的任何命令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一股反基督教的煽动宣传在整个部队中大肆泛滥起来，迫使特别机动部队队员与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习惯的范畴决裂，断绝同教会的联系。

特别机动部队变成了党卫队本身不信上帝的一个堡垒，当时纳粹宣传家们对这一情况反倒突出地称之为“信奉上帝”。1938年年底，特别机动部队的士兵已有百分之五十三点六退出教会，仅次于残暴的髑髅队，那里已有百分之六十九与教会决裂。当然，不少

特别机动部队队员是被迫脱离教会的。有些人的情况与斯培萨山区的天主教徒弗兰茨·瓦尔德曼一样，瓦尔德曼事件后来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了处理。他志愿加入部队，如同瓦尔德曼的天主教神父所述，因为他的父亲认为武装党卫队“是一种警卫部队”。

瓦尔德曼刚刚进入部队——神父在向自己掌管的大主教区的一次报告中说——就开始“进行改造，叫他应该退出教会。据他的母亲讲，约有三十名同伴拒绝这样做。于是这批人被迫走着一一条对年青人来说简直无法忍受的苦难道路。在每次执勤时，特别是  
418 在上课时都有人喊叫：谁还没有退出教会，出列！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这批人进行辱骂和嘲笑。弗兰茨一再为自己辩解：关键不在于信不信教，而是在于我完成任务好坏，这才是大事。他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在压力下屈服了，以致弗兰茨……剩下孤零零一个人。在这些日子里，弗兰茨的一个朋友写信给父亲说，弗兰茨恐怕无法再坚持下去了。眼下，弗兰茨也已折腾得精疲力竭。”此后不久，神父就接到通知：弗兰茨·瓦尔德曼退出教会。1942年10月瓦尔德曼在芬兰阵亡。他在最后一次休假中跟母亲说：“每天都逼着我放弃自己的信仰。尽管我很喜爱服役，我也不会再进这支部队。战争结束后，我要重新自由自在，仍旧干我早先干的事情。”

在驻有一千名队员的拉多尔夫策尔党卫队兵营里，明显地可以看到特别机动部队和后来的武装党卫队反基督教的宣传日益增长。在约莫三百名天主教徒党卫队队员中，声明退出教会的人数为：1937年四名；1938年三名；1940年六十七名；1942年一百二十九名。弗赖堡大主教行政机关代表克舍在致最高统帅部的一封抗议信中写道：“兵营里的教徒逐步地终于全部退出教会，是进行一种世界观课程的结果。几乎再也不允许存在个人的……直接出自良知的要求……。”特别机动部队的青年领袖也必须不断地证明，

他们是坚决反对所谓非德意志的基督教和解和宽恕使者的战士。军官们一开始就接受教育，憎恶基督教那种涣散人心、软弱无力和“犹太主义的”教程。“基督教从哪些方面导致东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没落？”或“试论基督教在我国人民对祖先的敬仰上造成的后果，”这些都是特别机动部队领袖们在离开士官学校后必须完成的试题。希姆莱称这种考试为“进修”。它确保了特别机动部队领袖们的每一种思维里都意识到自己的部队是一支“世界观部队”。

特别机动部队队员知道，整个部队必须时刻下定决心，通过对内部的最严厉干预，以防止发生一次新的1918年11月事件<sup>①</sup>。如同1943年10月还在党卫队“霍亨斯陶芬”坦克步兵师中散发过的一份重点提纲所述：历史的教训“需要建立一支部队，它毫不动摇并在任何情况下供国家调遣使用，包括需要采用一切手段维护国内秩序”。这可不是一纸空文的说明。当1938年11月9日夜首次野蛮暴行笼罩到大德意志犹太人头上的时候，保安警察处长海德里希的电报也向特别机动部队下达准备执行极其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这是身穿军服的德国人的首次出动。1938年11月14日，维也纳多瑙河大区保安处报告柏林保安处：“特别机动部队行动队已419到达各犹太教堂前，着手准备用手榴弹炸毁所有家具设备。”在特别机动部队砸玻璃窗之夜的编年史上，暴行始终是一种例外的情况，但它表明，党卫队领导考虑叫特别机动部队起什么样的作用。

希姆莱一直把特别机动部队看作是一个干预内政的权力工具。用它来保卫政权和牵制从来就不可靠的武装部队；如果出现一次军事改变的危險，特别机动部队的任务就是同警察部队和普通党卫队各单位联合起来，镇压政变。但是，希特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特别机动部队的政治计划。这位独裁者的冒险政策驱使

---

<sup>①</sup> 指1918年基尔水兵起义，十一月革命的开始，慕尼黑工人示威，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宣告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译者

特别机动部队奔赴战场，使它变成了军事战斗部队。

1939年8月19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向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处传达一项希特勒命令：“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所属各部立即划归陆军总司令领导。陆军总司令根据我的指示对其进行指挥调遣。”在整个出征作战中，特别机动部队队员始终抱着幻想，满以为自己就是正规军人了。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员豪塞尔同意去当陆军少将维尔纳·肯普夫师部的联络军官，从此再也没有回柏林党卫队主管处局。充当督察员那种软弱无能的日子已被遗忘，现在保罗·豪塞尔可以再干他一直想干的事情了：一位指挥部队的将军。

施坦因纳的步兵团“德国”团、一个炮兵团和特别机动部队的另一些单位也编进肯普夫的混合坦克师。同样，领袖警卫旗队的摩托化步兵团和特别机动部队的“日耳曼尼亚”团并入向波兰进军的攻击部队。施坦因纳的部队在第三军团进攻姆拉瓦和莫德林时表现得英勇善战，而领袖警卫旗队则参加了波兰中部的布祖拉战役，“日耳曼尼亚”团配合第十四军团向伦堡挺进。

420 尽管如此，党卫队部队的投入战斗并不能使评头品足的军人感到满意。与陆军部队相比，特别机动部队的伤亡要严重得多；很快就暴露出，特别机动部队的士兵没有经过师一级的战斗训练，它的军官不能胜任武装部队司令提出的复杂要求。虽然它的领袖们可以提出异议，说什么陆军在波兰战役中很少给特别机动部队以重武器支持，给养也很差，但党卫队军人们对自己部队的成绩也不满意。出路只有一条：特别机动部队必须改编为师的编制，必须有重武器和保证自己的给养。但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把这条路给堵死了，因为他们已经发誓要尽可能不让希姆莱的部队扩大。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对特别机动部队的兵员数量实际上作了规定：每年限定了征召的控制数字，按照这一数字征召在地方各军



区(WBK)登记的适龄德国公民,参加各兵种部队;地方军区司令部具有最后决定权,任何德国公民在未经本人所在地方军区司令部批准之前,不得应征进入一支部队。这些规定也适用于特别机动部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无法不给党卫队野战部队补充兵员,但武装部队领导有权规定一个最高限额,使特别机动部队勉强保持原有人数,不能扩大。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对于这种可能性进行了充分利用。

这时,一个干练的施瓦本人找上门来,为特别机动部队领袖们效力,他诡计多端,颇有胆识,有办法使特别机动部队摆脱武装部队的束缚。随着党卫队旅队长戈特洛勃·伯格尔的出场,就有了一个武装党卫队的真正创始人。但是尽管如此,在千载帝国寿终正寝以来,他那大千世界里的将军们还是把他当成麻疯病患者一样看待。“伯格尔吗?他与武装党卫队毫无关系,”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在死前不久还否认;而党卫队前副总指挥比特里希听到伯格尔的名字时浑身发抖。他说:“一个牛皮大王,一个爱出风头、好管闲事的家伙。”

这词汇的含义已大为走样,也消释了疑团,即将伯格尔说成是武装党卫队的辩护士并不符合“我们大家都只是军人的印象”。这个“施瓦本公爵”——党卫队内部喜爱这样叫他——是纳粹党员和最早的冲锋队领袖,他把党卫队部队主要看成党和民族社会主义的武器携带者。伯格尔是锯木厂主的儿子,生于1896年,经过正规教育的体育教员,熟谙军事知识,尽管他也是早先的志愿参战者和突击队长,而且是负过重伤的少尉,但特别机动部队的职业军官对他敬而远之。他们对这个施瓦本人没遮拦地喜爱闲扯,以及在希姆莱身边充当提词员的角色,都嗤之以鼻。多年来,他以忠实信徒中最忠心耿耿的一员自居,认为必须在那些最亲密的同事面前,特别是在特别机动部队的军人面前,保卫自己的全国领

袖，防止他们对他桀骜不驯。他致函希姆莱说，在有些“团，尤其在特别机动部队参谋部里，有人试图不把党卫队全国领袖放在眼里”。伯格说：“我自己可以证实这一点，并为此当时同豪塞尔干了起来。”

他以谄媚、狡黠和率直三者相互糅合的态度给希姆莱出谋献策，叫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放弃某些妄想（首先是在东方政策方面），并且紧紧依靠他，“因为我的全国领袖对我信任，告诉我那些只有在完全了解对方为人之后才会讲的私事”。——他在1943年3月9日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这位忠心耿耿的埃克哈德<sup>①</sup>用这样的语言紧紧护着希姆莱，因为只有希姆莱的善意才能确保这个曾在冲锋队摔过跤的伯格的飞黄腾达。1933年春，这位老冲锋队员伯格跟年轻的同事们发生了一场争吵，经过仲裁处理退出冲锋队。但是在罗姆事件后，他看到又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在冲锋队内攫取领袖地位。

1934年11月13日，他写信给冲锋队领导，坚定地表示：“我认为冲锋队是一支基本力量，……我决不跟那些曾经想把冲锋队打倒在地的人站在一起。”可是不出几个星期，他就改变了主意：他跑到冲锋队副总指挥、后来是党卫队副总指挥的克吕格尔那儿去工作，克吕格尔在冲锋队里由于1934年6月30日扮演了暧昧不明的角色而被当作叛徒遭到斗争；此后一年，伯格终于钻进了党卫队。1934年12月7日，伯格的一个早年朋友，冲锋队地区总队长汉斯·卢丁向冲锋队总部特别法庭陈述，伯格患有“一种严重的对自己估计过高”的毛病，“夸夸其谈，大言不惭”，并表现出“令人遗憾地缺乏自我批评和军人的谦虚的品质”。冲锋队领袖跟叛

---

<sup>①</sup> 指伯格。《埃克哈德》(Ekkehard)原系德国作家约瑟夫·维克托·冯·舍费尔(Joseph Victor von Scheffel, 1826—1886)的同名长篇小说。小说中把埃克哈德一世和二世奉为英雄典范。——译者

离他们的伯格儿之间绝对不可调和的仇恨，注定了还要给武装党卫队带来严重的后果。冲锋队三位地区总队长（卢丁、冯·雅戈、贝克尔勒）是在冲锋队内部仲裁法庭对伯格儿作出判决的签字人，后来，他们担任巴尔干地区的使节，在那里破坏伯格儿为武装党卫队招募新兵的工作——而没有外交部的帮助，伯格儿是召不到任何德意志族人到部队里来的。

伯格儿从1938年任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补充处处长起，为党卫队招募新兵就是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他由于跟希姆莱具有同样的野心，一定要把特别机动部队扩建成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他曾反复考虑过，怎样扩充武装党卫队部队的问题。现在，当特别机动部队的扩充计划在波兰战役结束后遭到武装部队反对、濒临失败危险的时候，伯格儿懂得采取对策。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总监的三支嫡系部队不属武装部队调遣指挥：看守集中营的髑髅队员，及其为战事考虑的加强部队（所谓警察加强部队，也叫加强髑髅旗队）和风纪警察的一部分人员。希特勒的两道命令使伯格儿有可能扩充武装党卫队，而不再遭到武装部队的阻挠：1938年8月17日的命令规定，特别机动部队在战时由部分髑髅队来进行补充；另一项1939年5月18日的命令宣布，同意希姆莱征召五万名普通党卫队队员作为“加强髑髅旗队员”。

伯格儿给他的全国领袖算了一笔账，他能立即使拥有武装的党卫队兵力翻一番，建立起两个作战师，更有甚者：如果希特勒同意将风纪警察部队和髑髅队并入特别机动部队，那么希姆莱在短期内就能拥有三到四个师。希特勒批准了伯格儿的计划，因为这项计划在形式上对党卫队较为敏感的武装部队所规定的补充兵员的最高限额并不抵触。伯格儿和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处可以着手建立一支全新的军队了，它也就获得了一个新的名称：武装党卫队。

422

但是，伯格尔的军事谋略却把特别机动部队跟党卫队集团的最残暴的部队结合起来，即使在一些特别机动部队领袖中，也有些人感到这支部队对于任何一个军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西奥多·艾克的髑髅队是存心不按军人要求训练成的部队。它们与特别机动部队源出同一系统，两者的前身都是政治预备队；分开以后，它们犹如翻了脸的弟兄，彼此对立。特别机动部队想要成为一支军事部队，而髑髅队员们则怀有反军队的激动情绪，在一些酒店里发泄怒气。

性格暴躁的阿尔萨斯人艾克，是处死冲锋队首领罗姆的刽子手和官僚化集中营暴政的创造者，他有一个固执的想法，即必须把他的部队训练成为一支同特别机动部队相对立的部队。作为旧陆军部队的前军需官使他对职业军官深抱反感，他也感到特别机动部队就是掌握在这些职业军官的手中。他在陆军中被解除职务，随后在自己选择的警察生涯中也遭到失败，在党内爱发牢骚而声名狼藉，这个集中营刽子手愤懑不平，不能自解，并且把这种情绪传给他的队员，这样一种教育法对他来说轻而易举，毫不费力，因为构成这支棍棒军队的主力是头脑简单的乡村凶莽汉和忿懑不平的失业者，至于对艾克“爸爸”反犹太人、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职业军人的激烈言论，他们是不会有所反对的。

他们的深褐色制服大概就是要清楚地表明，在穿黑色制服的集团中，这支部队有权要求拥有特殊地位。希姆莱在外表上给予他的集中营的最高看守一种接近自治的地位：艾克是集中营督察员兼党卫队看守部队司令，只听从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命令。艾克在每座集中营都设置了看守部队，还首先建立了不受普通党卫队约束的突击大队。从1936年3月29日起，艾克的部队正式称为“髑髅队”，已经拥有三千五百人。1937年4月，艾克将五个突击大队编成三个髑髅旗队，“上巴伐利亚髑髅旗队”驻扎在达豪，“勃兰

登堡髑髅旗队”驻守在奥兰宁堡，以及“图林根髑髅旗队”驻在魏玛的布痕瓦尔德。1938年增建了第四个“德意志东部边区髑髅旗队”，驻屯林茨。

艾克满腹狐疑地警惕着，不让一个职业军官打进他的部队和动摇他对髑髅队的统治权；他一再警告部下当心不要听信“可笑的模仿军队编制的试图”。1937年，他向集中营看守队训话说：“我们既不属于陆军，也不属于警察，更不属于特别机动部队管辖。党卫队髑髅队各单位自己明确属于普通党卫队，因而可以既不需要军官，也不需要军士来进行领导。从现在起，我将开始让一些相当于军官的党卫队队长，相当于军士的小队副，相当于步兵的党卫队员调到普通党卫队中去。” 423

这支棍棒部队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中成长起来的，现在它却要与特别机动部队合并了。党卫队军人们急于一心扩充实力，不去考虑更多的问题，正象希姆莱让风纪警察大批涌进党卫队时不去考虑他们思想上缺乏可靠性一样。希姆莱说：“他们不是纳粹党员，不是党卫队员，不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人员……而是如同建筑工程队招工一样把他们吸收进来的。”

尽管武装党卫队变得同样是一支五花八门得出奇的部队——伯格尔和他的一些筹备人还是编了一个师又一个师。党卫队军队渐渐具有了规模：1939年9月底，党卫队旅队长兼警察少将卡尔·普菲费尔-维尔登布鲁赫以风纪警察人员和陆军特种部队战士编成了一个党卫队警察师。10月10日，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豪塞尔将特别机动部队的“德国”团、“日耳曼尼亚”团、“领袖”团合并编成一个特别机动部队摩托化师（后来叫“帝国”师）。11月1日起，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艾克抽调他派驻各处集中营的髑髅队旗队，加上部分警察加强部队建立了“髑髅”师。领袖警卫旗队暂时仍为摩托化步兵团建制，直到1942年才改为师。

伯格爾一舉成功地建立了一支引人矚目的黨衛隊武裝部隊。特別機動部隊參加波蘭戰役時，兵力為一萬八千人，現在希姆萊已經統率着十萬多名武裝的黨衛隊隊員了。同時，伯格爾建立了“武裝黨衛隊補充處”，因為現在關鍵的一着在於，伯格爾是否能夠為黨衛隊野戰部隊和髑髏旗隊獲得充足的後備力量。伯格爾在十七個黨衛隊地區總隊設立了補充處辦公室，形成一張大網，並且開始跟武裝部隊進行談判；他要說服最高統帥部同意擴大黨衛隊後備部隊，伯格爾指望有一天用這些後備部隊進一步擴大武裝黨衛隊。

可是武裝部隊起初不承認髑髏旗隊是軍事部隊（原先只規定它擔任警察任務）；最高統帥部只同意撥給一定數量的適齡新兵，作為彌補轉入特別機動部隊的髑髏旗隊和警察部隊的人數，准許

424 伯格爾為武裝黨衛隊野戰部隊招募當年二十歲的青年入伍。最高統帥部允許武裝黨衛隊招募新兵，但對能否將武裝黨衛隊招募的新兵用於黨衛隊勤務，保留親自作出決定的權利。這樣武裝部隊就給伯格爾設置了新的障礙。儘管伯格爾報告武裝部隊有大批應征者願意加入武裝黨衛隊服役——但各地軍區司令部通常只批准人數的三分之一。

伯格爾越是固執地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就越是堅決不同意黨衛隊兵源補充迷的擴張計劃。1940年3月8日，最高統帥部否決了此後將要承認為武裝黨衛隊的單位：領袖警衛旗隊、三個師、髑髏旗隊、補充部隊和士官學校。連希特勒也贊成他的將軍們的否決意見。對他來說，武裝黨衛隊始終是民族社會主義精萃人物的一支軍事化的警察部隊，它的任務是時刻準備保衛政權。

由於希特勒估計能速戰速決，很快取得勝利，加之他不想以一支第二武裝力量的恐懼形象吓壞了傳統的軍人們，因此〔直到1942年6月〕，他反對武裝黨衛隊進一步大肆擴張的計劃。他不讓成立黨衛隊集團軍。他規定，武裝黨衛隊的兵力只能為和平時期陸

军兵力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三令五申地强调，武装党卫队不应该是一支纯军事部队。1940年8月6日，他在一项秘密命令中说明，他阿道夫·希特勒是怎样理解“武装党卫队的必要性”的：大德意志国家版图的扩展，“有必要保持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对内代表并贯彻国家权威的国家警察部队”。

领袖大本营的批复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但伯格仍然不放弃他的扩充计划。在这期间，他已身居一项要职：从1940年6月1日起，他负责领导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从而成为扩充武装党卫队的关键性人物。在西线战役打响后，武装党卫队领导机关被分成两个主管部门。8月15日，希姆莱将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处改为作战指挥机关，即成立该机关的命令中指出的“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见成立建制命令），而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则负责世界观教育、招募新兵，以及特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兵源补充的工作。

伯格考虑采用新办法，使他得以扩充自己的人马。武装部队不同意他为武装党卫队进一步增加补充部队，他必须寻找一个使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无法插手的领域，去招募新兵。这个领域被他找到了。在德国国境之外，即巴尔干地区住着几十万德意志族人，他们虽然是外国公民，但却受到了希特勒的占领性进军和大德意志宣传的诱惑性召唤的鼓舞，蠢蠢欲动。应该将这批德意志族人吸收到武装党卫队的行列里来。在这儿，没有任何一个武装部队的将军可以阻止为希姆莱的外籍军团培训一支庞大的后备军。

伯格从自己家里做起，他有一个女婿名叫安德烈亚斯·施密特，在罗马尼亚统率德意志族人部队。施密特是个极端纳粹分子，典型的未成熟的小伙子，醉心于希特勒崇拜的狂热信徒，他向岳父许下诺言，答应给武装党卫队打开罗马尼亚籍德意志族人的大门。1940年春，施密特和伯格的代表从罗马尼亚私下运走了

一千名德意志族人，虽然罗马尼亚当局注意了不让任何有兵役义务的本国公民投效外籍军团。在罗马尼亚取得的成果使伯格爾大受鼓舞，他在1940年8月向希姆萊建议，在取得外国政府协助或不要外国政府协助的情况下，吸收东南欧一百五十万德意志族人中适龄服役壮丁加入武装党卫队。

只要是为了把德意志族人弄进武装党卫队里来的话，那伯格爾的想象力简直是无穷无尽的。党卫队的志愿人员被伪装成流动工人，他们藏在德意志野战医院人员的队伍中，或是夹在横越东南欧的党卫队各师的辎重部队里蒙混过关。后来，伯格爾的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与外国政府签订协定，允许德意志族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志愿报名加入武装党卫队，并正式离开他们的侨居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并不总是履行协定；于是伯格爾的代理人依旧通过暗中渠道将志愿人员悄悄地送进武装党卫队。

“志愿”这两个字，在戈特洛勃·伯格爾王国里包含的概念是十分闪烁不定的，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只要宣传上的诱惑性召唤在哪里失灵，纳粹主义民族领袖的棍棒分队就会赶到哪里去帮忙。伯格爾报告说：“如果把一支德意志族人部队勉强带得不错的话，那么所有的志愿人员就会报名参加，而那些没有志愿报名的人的房子就会被砸烂！”在战争的后几年中，强迫完全取代了志愿。德国强迫巴尔干半岛各国接受协议，规定所有德国血统的适龄男子都应按照德国的法令加入德国军队履行服兵役的义务，首先是加入武装党卫队。伯格爾使用这种手段，不费气力地将德意志族人强制驱入武装党卫队。1943年年底，德意志族人已占武装党卫队官兵总数的四分之一，到战争结束时，有来自欧洲各地的三十一万德意志族人在党卫队部队中服役。

在这期间，伯格爾遇上了一个新的、更加妙不可言的征募新兵源地：在党卫队中人们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德国开战初期的



胜利和闪电战的胜利，使得北欧和西欧的青年着了魔，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出几个星期，一个世界，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世界就崩溃了。在某些思想单纯的人看来，这些行进在奥斯陆、布鲁塞尔和海牙街道上的征服者，似乎是代表一个新世纪的趾高气扬的青年使者。

在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的一些青年中产生了赶浪头的愿望，渴望不要错过同这个新时代结合的机会。当然他们并非一直是相信武装党卫队神话的碧眼理想主义者。渴望冒险的心情驱使着他们指望飞黄腾达以及往后作为武装农民遏制数百万斯拉夫“劣等民族”。只有少数人追随这些政治思想。在武装党卫队作战的十二万五千西欧人中，也许约有三分之一属于各种亲纳粹的和民族主义的党派，这些党派用他们极其鲜明的言词对新的德国主子表达了依附和顺从。

不论受什么动机的驱使，他们涌进了党卫队旅队长伯格1940年年中在西欧和北欧德国占领各国设立的招兵办公室——根本没有想到，如此众多不同民族的成员渗透进来，将会对党卫队和他们同阿道夫·希特勒的关系会招致什么样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后果。伯格只看到志愿报名的数字而感到心满意足。1940年年底，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在阿尔萨斯的森海姆办了一个训练营，对来自欧洲各国的党卫队志愿人员进行世界观和军事训练。1941年春，成立了第一支庞大的外籍军人部队，由佛来芒<sup>①</sup>、荷兰、丹麦和挪威志愿人员以及担任主要职务与负责指挥的德国人组成的党卫队“维京”师。

不久日耳曼族人的武装党卫队变成了一支欧洲部队，因为一直有新的民族成员渗入部队，冲淡了部队的纳粹意识形态。伯格甚至在东方为武装党卫队招募新兵，土耳其帽和哥萨克帽给海

---

① 指比利时境内原属日耳曼人的居民。——译者

因里希·希姆莱这支一度是世界观清一色的虔诚信徒的部队中带来一种十分罕见的特色。这位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动全国领袖反斯拉夫人的心理，因为全国领袖开始认为，让东方“劣等民族”穿上武装党卫队的制服，这是对日耳曼民族的可耻背叛；不过伯格爾懂得说服希姆莱承认几乎所有东欧人都可当作俘获的日耳曼人：首先是波罗的海各民族，随后是乌克兰人，最后也包括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直至巴尔干的伊斯兰教教徒。最终有二十万名这些民族的成员在武装党卫队服役。

伯格爾的新兵花名册一年比一年厚，武装党卫队部队一年比一年更急剧膨胀起来：1940年中为十万人，1941年底为二十二万  
427 人，1942年底为三十三万人，1943年为五十四万人，1944年底达到九十一万人。戈特洛勃·伯格爾将一支新兵大军输送给武装党卫队指挥，它终于使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的军官们有可能脱掉不讨人喜欢的国家警察部队制服。武装党卫队整队集合，准备在战争史上作出一次不寻常的胜利进军。

还在1940年西线战役中，武装党卫队即已表明，可以与陆军的精锐师相比拟。党卫队的军事健儿行动快速犹如脱兔，冲过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一股狂热的劲儿，几乎所向披靡，毫不考虑自己的伤亡，盲目地一心只顾猛打猛冲，这股冲劲使希姆莱的军队与武装部队的任何其他部队迥然不同。领袖警卫旗队的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克拉斯获得了战役的第一枚铁十字勋章。而这并不是没有象征意义的：党卫队部队总是充当攻击部队的尖刀，担任德国入侵的先头部队。特别是塞普·狄特里希的领袖警卫旗队，显出一种在武装部队中罕见的对敌人和领袖毫不在乎的神情。

在敦刻尔克地区追击英军部队时，警卫旗队奉命冒着敌人最顽强的抵抗抢渡阿运河，强占瓦当城。可是1940年5月24日下午，接到了领袖大本营发出的一项截然相反的命令：不要渡过运

河。狄特里希无视领袖的这项命令，几个小时以后，他已站在运河的彼岸。在战役稍后的一个阶段中，狄特里希的工兵团强行军追击溃逃的敌人。领袖警卫旗队担任冯·克莱施特大将的坦克部队的先头部队，深入法国南部，狙击法国部队，不让其在卢瓦尔河构筑防线。这个团向南方突击，孤军深入，一直进逼到圣太田，把德国军队的主力远远抛在后面。党卫队的其他部队也同样获得了辉煌成果。“领袖”团突破了格莱伯防线。特别机动部队师追击敌人一直冲到西班牙边境，而鬮髅师则强行渡过塞纳河，经过战斗夺下了卢瓦尔河桥头堡。

陆军将领们既是敬服又是惊恐，注视着党卫队特种部队的战斗狂热，有些因循守旧者认为，这是新型士兵性格的征兆，这种士兵性格完全蔑视作战应讲究足智多谋的理性论。如同社会学家维尔纳·皮希特所说，许多人认为党卫队部队“不是作为一种前线士兵性格的新模式，而是为完成领袖交托的一切任务的帮派集团”。坦克部队将军埃里希·霍甫纳用一句简单的话表达了保守军人的反感。当下级鬮髅部队司令艾克向他报告说，一项具体攻击命令已执行，执行中人的伤亡无关紧要，这位老骑兵霍甫纳听了火冒三丈。他呵责艾克：“这是一种屠夫的精神状态！”

陆军军官们指责武装党卫队的大小领袖，说他们显然从来没有学过怎样慎重使用忠于他们的部下。有些——当然不是全部——党卫队领袖在战场上将自己在士官学校里死记的一套付诸实践：消灭敌人和视死如归是部队的最高准则。党卫队部队也终于遭受了陆军从未见过的损失。早在西线作战中法国战役打响前的间歇时刻，几个党卫队师的领袖行列已明显出现凋零状况，部队不得不把还在士官学校讲堂里听课的学员拉来当军官。

尽管党卫队部队暴露了这些弱点，武装部队领导还是感到，它是一个祸害。武装部队等于在战场上遇到了一个争宠的劲敌，它

的那股干劲不能不给领袖大本营的独裁者留下深刻印象。希特勒终于在1940年7月19日的国会讲话中，公开宣布动用“英勇的武装党卫队的师和旗帜”。独裁者的称赞，本身获得的成果，特别是军方争宠者采取克制态度，所有这些都增强了部队的傲慢姿态与集团精神，它以传统的近卫军对普通士兵睥睨一切的态度置周围的军队于不顾。随着一个个战役，武装党卫队明显地以民族的军事精锐自居。尽管武装党卫队士兵也经过了训练，特别是要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而战的信仰坚定和不屈不挠的战士——但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或后来的法国伞兵几乎并无不同：他们个个都被一种刚毅和坚强的神话蒙住了眼睛，他们个个都激动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高贵阶层少数派中的成员，是一个具有自己准则和自己忠诚的特殊集体的成员。

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和后来的总指挥汉斯·于特纳，严格注意使武装党卫队符合武装部队的军事准则和要求。党卫队部队对其过去的那种警察性质的任何怀旧，都遭到他越来越激烈地压制。西奥多·艾克谅必感觉到了这一点，他那假革命的反军国主义不再适合军事卫队的计划了。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日益严厉地要求骷髅师师长，必须更严格地服从1940年夏季建立的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的命令。艾克向副总指挥沃尔夫诉苦说，柏林有人发动“对我进行围剿”，“从我离开家乡后，有些人士即已打算千方百计地破坏党卫队全国领袖多年来对我给予的信任。”

事实上，参谋长于特纳主张，为了有利武装党卫队的军事声望，当务之急是解除这个半瓶醋的前军需官所掌握的师指挥权。积  
429 聚的炸药太多了，骷髅师的人员在西线率先制造了战犯罪行（1940年5月26日，在法国西北部进行战斗时，第二团的一个连长下令枪杀了一百名英国战俘），原先集中营看守队的残暴行为，在该师

的一些单位盛行一时，艾克叫人将达豪和奥兰宁堡集中营的武器偷偷弄到他的师里来，以及擅自从未被占领的法国地区购买载重卡车，因为武装部队不同意将他这个靠马匹驮运辎重的师摩托化。1940年8月，艾克强迫自己师内定退役的士兵书面具结，保证决不诉说该师的内部情况，这时于特纳狠狠地把这个感到忧心忡忡的莽汉训斥了一顿，叫他注意纪律。武装党卫队指挥部命令艾克，立即撤销书面具结的规定。此外，于特纳指示党卫队军法官审讯向艾克秘密提供武器的人员，并没收该师暗中搞来的备用车辆。同时，他还威胁艾克，如再发生违反命令事，他将向有关的党卫队兼警察法庭对艾克的武器商人提出起诉。

这位地区总队长对此大为恼怒，因为他一向在原则上只接受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命令，因此如果说他答应跟于特纳合作，那于特纳倒应该看作是一种光荣。艾克说：“〔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文件中对一位党卫队的高级领袖、一个师的师长使用这种语调，即使在顽固不化的军人中也不是常见的”。于特纳没有退让。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审讯了这个师的原先成员，就有关艾克的领导作风作了全面的纪录。这位师长写信给于特纳，再次反驳“由您的指挥部善于舞文弄墨的机构和恶毒的同僚们胡言乱语进行的”攻击。艾克大发雷霆地吼道：“一个在同敌人作战中死去二十三名领袖和损失三百七十名勇敢的副领袖和队员的党卫队野战师，如果说现在有人来调查这个党卫队野战师的情况，其目的就在于掌握陷害正直的党卫队领袖和队员的材料，那么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作法，起着涣散军心的作用。”

连希姆莱有时也参加反艾克的讨伐。在一次师部命令中，“大家都要笑”（希姆莱语）地看到，艾克因为一些小事处分他的一些团长，并将高级领袖患性病的情况公之于众。他勃然大怒地说：“亲爱的艾克，我在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对您的理智表示怀疑。我

在这个时候感到怀疑，您是否真正有能力领导一个师。”然而尽管如此，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名义上的总指挥希姆莱（他担任此职务到1943年初），还是不同意参谋长于特纳把这个过去看管集中营的主子从师司令部撵走。艾克忍受了一番斥责，保住了师长的位子。

在此期间，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继续抓党卫队部队扩充军事力量。1941年春季，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已经拥有四个师和  
430 一个旅，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转向东方，党卫队部队首先被调到巴尔干战场。武装党卫队部队再度担任德国入侵军的尖刀部队。领袖警卫旗队在塞尔维亚南部打开了通往阿尔巴尼亚的缺口，冲过色撒利，夺取了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通道。而党卫队“帝国”师也在南塞尔维亚中部向前挺进，突袭拿下贝尔格莱德，席卷巴奇卡。

但是，党卫队部队刚刚驻扎下来休息，领袖大本营的电传打字机就嘀嘀嗒嗒地给党卫队部队发来了新的命令。阿道夫·希特勒作出了入侵苏联的决定。希姆莱的军队现在共有十六万人，这支军队移到德国统治地区的东部边界，在那里待命准备投入第三帝国进行的最后一次灾难性的冒险行动。领袖警卫旗队和日耳曼人组成的“维京”师参加南方集团军，“帝国”师安排进中央集团军，同时骷髅师和警察师划归北方集团军部队。然而不等武装党卫队在1941年6月22日3点15分进入它将要经受到最严峻考验的战场，不等这支党卫队大军开始写下它的真正英雄战史，部队就被笼罩在一个阴影之中，从而使武装党卫队永远无法摆脱。海因里希·希姆莱发布了一项命令，这道命令把武装党卫队的所有部队跟黑色集团最阴暗的角落，即集中营，轻率地连结在一起。

1941年4月22日，希姆莱确定了他心目中对武装党卫队的概念。在此以前，他一直屈从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解释，武装

党卫队只是指作战部队、武装部队的补充部队、髑髅旗队和不伦瑞克、特尔茨浴场、克拉根福特等三所士官学校。但是眼下的希姆莱已经掌握了四个师，在东线战争前夕，自以为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可以任意扩大武装党卫队的概念了。他在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的一项命令中列出了一百七十九个党卫队单位和机构，说明这些全都是武装党卫队的组成部分——其中也包括集中营及其管理处和髑髅看守突击大队，也就是说，包括在1939年艾克的髑髅部队解除集中营的勤务以后，由没有参加作战的普通党卫队队员、德国军官联合会总会和冲锋队的成员组成起来的那些单位。

从这时起，集中营的看守人员也被看作是武装党卫队的成员。他们的军人身份证和制服跟武装党卫队一样，而武装党卫队的这些在前线作战的部队并不属于集中营帝国的恐怖系统。但尽管如此，刽子手同士兵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共同之处。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负责看守突击大队的装备和军事训练，从一个集中营调到另一个集中营，都必须通过武装党卫队指挥部。更严重的是——集中营领导机构的集中营督察处在划归经济管理处之前，短时间331内（从1940年秋到1942年春）曾经正式属于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领导。

武装党卫队的士兵对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提出抗议吗？他们急于起来反对将一支军事部队跟惩罚营和灭绝营的那些刽子手一视同仁吗？他们一声不吭地接受了希姆莱的命令。他们顺从，他们沉默。他们象1939年底一样保持缄默。当时，特别机动部队同艾克的六千五百名看守集中营暴戾恣睢的士兵合并，这些士兵把经过多年训练的那些惨无人道和野蛮虐待俘虏的毒素带进了武装党卫队。当后来髑髅部队加强旗队的五万名士兵——他们同样在集中营里接受过训练，并且是在欧洲各德占区实行政治恐怖的骨干——加入武装党卫队并成为新建立的党卫队师的干部的时候，

他们仍然保持缄默。当随着战争的进行，从恐怖和大规模屠杀的地狱出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被引进武装党卫队的时候，例如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博特曼及其灭绝行动队在库尔姆霍夫用毒气车杀害了三十万犹太人，从奥斯维辛灭绝营来了二千五百名士兵，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来了一千五百名士兵，他们也还是保持缄默。

武装党卫队领袖们可能考虑到，部队的纪律和品德足以使自己与黑色集团政治上的黑暗世界保持距离，因而感到可以放心。可是他们永远也无法做到真正保持距离：武装党卫队必须将一些单位（约一千五百名队员）拨给进行暗杀的特别行动队，它们的一些补充部队参加了希姆莱集团的惨绝人寰的行动，如镇压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起义，部队也不得不接受伯格亲信奥斯卡·迪特勒汪格尔博士的由歹徒、职业罪犯和经军事法庭判刑的人拼凑成的刑事警察队，使它获得了武装党卫队一个单位的合法身分。

332 虽然如此，党卫队的军人们还是相信，能够保持他们自己这块招牌的清白。他们的这种设想甚至获得希姆莱的支持，因为他装出一副姿态，似乎表示愿意考虑让武装党卫队的作战部队跟恐怖机器分开。1941年4月初，希姆莱建立了一种武装党卫队内的武装党卫队，一支愿意供他本人搞政治斗争派用场的私人部队。这支部队同抵达前线即归陆军统率的武装党卫队作战部队相反，这支特别部队只归希姆莱管辖，诚然他可以让陆军支配这支部队，但是也可以随时向陆军收回这支部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开始不承认骷髅旗队为武装党卫队的单位，它构成了希姆莱这支私人军队的主力。希姆莱将旗队的大部分编成步兵旅和骑兵旅，他们只归全国领袖指挥。他挑选了党卫队旅队长克诺布劳赫给自己当总参谋长，克诺布劳赫在1941年5月建立了“党卫队全国领袖司令部”，并命令他的部队出动，在前线的后方打击游击队和犹太人。

当然，上了年纪的希姆莱想当统帅的美梦同年轻的希姆莱的



梦想一样，也很快就成了泡影。东线战役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作战部队。希姆莱的私人部队被拆散成一个团又一个团，1942年年中，所有单位已全部编入野战军。但尽管如此，党卫队全国领袖司令部的建立，还是使希姆莱跟武装党卫队的职业领袖之间关系越发疏远了。党卫队各师愈是深入几乎无边无际的俄国国土，党卫队军人们就愈是明显地背离他们全国领袖的命令和幻想。

一个新的世界包围着党卫队士兵，严酷无情地将黑色集团的世界观口号推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了。本着对自己领袖和最后胜利的信念，党卫队部队穿过俄国的草原、沼泽和森林，在人类过失和神经错乱的恐怖一章中扮演了英雄和牺牲品的角色。党卫队士兵的名字接连不断地载入战争史的图表。不论在南线，还是在中路，或是在北线——不论哪里遇到敌人出乎意料的抵抗，不论哪里的敌人发起的反扑使德方攻击面出现裂口，党卫队部队总是奉命奔向哪里。

党卫队各师又是作为德国军队的进攻尖刀冲在前面。领袖警卫旗队在第聂伯河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在彼列科普附近突破克里米亚前面的苏联防卫阵地，迅猛攻占了塔甘罗格和罗斯托夫。“维京”师追击敌军直抵亚速海，“帝国”师则在鲍罗季诺南部突破莫斯科的防卫阵地，达到离苏联首都只有几公里的地方。而当苏联人在1941年年底发动第一次强大反攻时，武装党卫队又成为军人顽强性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缩影。在苏联坦克和步兵群的斯大林管风琴式的猛烈炮火下党卫队士兵得到锤炼，享有德国东线陆军的消防队的声誉。

强大的苏联武装部队从莫斯科西面进行突破后，于1942年1月挺进到中央集团军的背后，第九军团司令莫德尔将军将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库姆所率党卫队“领袖”团调到尔热夫附近的伏尔加河曲地区。该团的任务是阻击冲上来的苏联人，守住与西面

433 陆军保持联系的单薄的防线，坚持到莫德尔在南方集中足够数量的部队，以便给敌军以歼灭性打击。党卫队员们冒着零下五十二度的严寒，日日夜夜不倦地阻击着敌军。2月18日，莫德尔击溃了敌军。当库姆和他的团换防撤下来后，他碰到了军团司令莫德尔。莫德尔说：“我知道，您的团必定遭到不少损失，库姆，可是我现在还缺少不了你们。您这个团还有多少兵力？”库姆向窗外指指，说道：“我的团就在外面！”那儿站着三十五个人，两千人就剩下这点残余的人数。

甚至西奥多·艾克现在也表现得能够适应军人的精神状态。他从佩戴党卫队副总指挥的领章以来，这个早先的集中营看守人员仿佛变了样。他整天待在他的司令部里，剪取形势图的战术标记，用这些标记在地上摆弄，模拟一个师如何行军——他是偷偷地干的，以免他的总参谋部里首席参谋部军官对艾克突然爱上了军事有所觉察。当1942年2月8日苏联部队在伊尔门湖东南杰米扬斯克包围了骷髅师和另外五个陆军师时，他们发现，在德国的师一级将领中，艾克是一个考虑周密而又十分顽强的对手。陆军元帅布施曾这样说过，特别要归功于“副总指挥艾克的有力指挥”，使得在杰米扬斯克被围困的部队能坚持几个月之久。随后，党卫队士兵又再次显示了他们主动进攻的精神，他们配合陆军部队强行打开包围圈，解救了陷入苏联军队重围的杰米扬斯克要塞防守部队。

杰米扬斯克、尔热夫、米乌斯的狙击战、拉多加湖、沃尔霍夫——这些地名中的每一个名字都标志着一支部队的高度作战能力，它立时在敌我双方享有神话般的声望，既叫人迷信得望而生畏，又使人充满嫉妒而赞叹不已。朋友和敌人一致认为：武装党卫队士兵们的士气，是任何其他部队无法达到或是超过的。

苏联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阿特门科少将在1941年秋被俘时说，党卫队“维京”师的战斗力超过了过去所有的师；当陆军部队接

替了“维京”师的防务时，俄国方面的人都舒了一口气。德国第八军团司令韦勒也作了类似的评论。他煞费苦心地图用诗一般的语言赞扬说，属于他指挥的党卫队部队好似“陆军中的一块磐石”，以“坚不可摧的战斗”抗击敌人。第三装甲军军长冯·马肯森将军在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热烈颂扬领袖警卫旗队的“内部纪律，它那生龙活虎的勇敢精神、乐观的事业心、临危不惧的坚定性”。马肯森说：“一支真正的精锐部队。”

并非所有的陆军军官都乐意支持这样的全面崇拜。有些职业军人看到武装党卫队的地位日益重要，并且获得国家领导的偏爱，434不禁产生了竞争和嫉妒的心情。对这支佩戴党卫队标志的部队具有反感已是一种公开的秘密。武装党卫队领袖们猜想，陆军的目的在于把武装党卫队投入作战中最危险的焦点，以“战火消耗”这个讨厌的竞争对手。

“在这样的战斗中，党卫队就会被削弱得一蹶不振，”艾克咒骂道。希姆莱后来从“有些不怀好意的人”身上也看出这种企图，即“干掉这支讨厌的部队，并为后来可能出现的一种发展扫清道路”。例如，党卫队区队长、骷髅师团长西蒙证实，主管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故意扣押领袖大本营关于调走“骷髅”师中丹麦志愿军和主力的第二步兵团的命令，以便无需派陆军部队接防。艾克咕哝地说道，现在是“将我们的士兵从不怀好意的妒忌的帮会利爪下解救出来”的关键时刻了。

当然，许多军官之所以持冷静的保留态度，不能只用复杂的嫉妒心理来解释清楚的。军人们感到，这支新部队不论对战场上的敌人，还是对听任摆布的俘虏和无辜的老百姓都发泄一种非军人的疯狂性。武装党卫队部队破坏军事道德准则的情况屡见不鲜，尽管战争极其残酷无情，但因袭传统的军人还是应该尽力遵守这些准则。如同武装党卫队作战勇敢的传闻不脛而走一样，武装党

卫队的有些单位虐待战俘和平民的野蛮行径也迅即四处传开。

后来武装党卫队的卫道士辩解说，部队只是对苏联人惨无人道的作战方式以牙还牙。事实上，德国部队在缴获苏联军团和军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些命令，它们说明苏联人杀害了被俘的德国士兵。苏联第二十六师司令部在1941年7月13日的报告中说：“敌人在战场上留下了约四百具尸体，投降的近八十名则被枪决。”红军第三十三军团在1941年12月8日报告：“由第一‘GM’步兵师俘获的一百名战俘，鉴于情况严重根据师政委命令已于枪决。”处死德国战俘的情况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以致苏联塞瓦斯托波尔海岸部队参谋长在1941年12月2日的0068号命令中不得不进行申斥：“部队通常不对俘虏进行审问和送交师司令部就加以枪毙。俘虏只有在进行反抗或潜逃时，才应格杀不论。此外，象多次发生的情况，在前线或战场抓到俘虏时就地予以枪决，结果使愿意向我方投诚的敌方士兵感到恐惧。”1942年3月29日，领袖警卫旗435队挖掘堑壕的军官报告，在塔甘罗格的原格伯乌总部院子里，发现了被杀害的六名领袖警卫旗队第三连队员的尸体，他们全部被投在一口水井里。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右手均缺四指（推测系被砍掉的），头颅均已破裂（推测系被扔进水井所致），……颈椎骨断裂，……胸腔破裂。”

尽管如此，党卫队的辩护士仍然无视双方都残暴对待战俘的实际情况，而进攻者在第一次战争行动前即已作出决定要将所有战俘集体处决干净（政治委员命令！），他们有可能先于防守者把他们的战俘运走。此外，武装党卫队的士兵对苏联人的罪行进行了血腥的报复，其残酷程度无以复加，甚至使许多士兵感到厌恶。就说为了主持公道，也有必要同时指出，武装党卫队高级将领们，其中也包括塞普·狄特里希，（他说：“这将使我们有愧于袖口饰带上的名称标记，”）转而反对武装党卫队虐待战俘的报复行为。但他

们说的这番话没有贯彻到下层的党卫队士兵中去。

对部队陌生的、来自政治狂热主义罪恶渊藪的分子的渗入部队，例如原鬻髅部队员，或是同集中营进行交换的人员，把斗争狂热和军纪松弛带进部队，很容易使武装党卫队以形形色色惨无人道的方式进行战争。罪行一再给部队的荣誉投上阴影：在入侵俄国后的两个星期，“维京”师的士兵枪杀了加里西亚的六百名犹太人，作为对苏联人暴行的报复。1943年夏季，“欧根亲王”师的士兵消灭了塞尔维亚小镇科索蒂卡的居民，因为“据称”该地的教堂里有人向部队打枪（第二特别行动队在一次报告中如此说）。1944年春，党卫队警察师有一次突然遭到炮火袭击，该师一支部队随即毁灭了希腊北部小镇克利索拉。1944年6月，党卫队“帝国”师的一个连，在搜寻落到法国游击队手里的一名党卫队队长时，毁灭了法国南部的小镇奥拉多尔絮格兰，并杀害了该镇的全部居民。两个月后，党卫队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师，在诺曼底的防御战中杀害了六十四名加拿大和英国战俘。

不论有什么理由来解释这样的暴行，但值得注意和说明问题的却是，武装部队几未发生过类似罪行。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普通武装部队局（AM）汇总的有关武装部队和武装党卫队违法行为的报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区别所在。普通武装部队局于1943年8月2日指出，在“本次报告所述期间”共“收到一百五十一起有关案件。其中十九起案件的作案者为陆军，五十三起的作案者属于武装党卫队，另外七十九起案件的作案者无法查明属于哪个单位。强奸案数字很大。经 G.F.P.〔秘密宪兵队〕和有些经巡逻队人员传讯 436 有关当事人和证人后，十八起案件证明完全属实。十二起案件的作案者为武装党卫队成员，其余六起案件未能查明系由哪个部队的成员作案。”

武装党卫队的士兵在乌克兰的一些地区暴戾恣睢，迫使乌克

兰人离开村庄，纷纷投奔苏联军队。普通武装部队局的纪录写道：“牵走牲畜，殴打居民，强奸妇女和姑娘，使当地和周围一带的乌克兰居民惶惶不安。”1943年5月30日，两名俄国农学家请求驻大罗戈斯扬卡的驻军司令“下令武装党卫队士兵，不要再殴打居民，不要再抢劫东西，不要再到村庄里去找麻烦。”两位请愿者写道：“在党卫队进驻前，居民对部队和阿道夫·希特勒是一直深怀好感的。”

从其他地方也送来了关于武装党卫队的暴行及其自诩为主宰民族行径的报告。1942年11月，罗马尼亚参谋总部谴责武装党卫队德意志族人成员殴打罗马尼亚公务人员，违反罗马尼亚法律，阴谋破坏罗马尼亚国家威望。“根据这些具体事件，”警务随员伯姆从布加勒斯特电告：“罗马尼亚参谋总部指出，违法乱纪行为和制造事端主要出于武装党卫队的成员……但是参谋总部认为，相互要重视在内部同样存在的秩序和纪律是必要的。”甚至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特遣队对在巴尔干作战的党卫队各师灭绝人性的战斗方式也提出抗议。第二特遣队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大队长赖因霍尔茨于1943年7月15日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作战方式“给这个地区的德国利益开始产生不利影响”。当“欧根亲王”师党卫队旅队长赖希斯里特尔·冯·奥伯坎普在跟克罗地亚的一位部长谈话中，轻视地把对他部队进行的干预说成是设置故障时，在场的党卫队区队长弗罗姆大声打断他的话说：“打你们待在这儿以后，可惜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故障！”

这种“故障”有一些可以归咎于人员缺乏训练，武装党卫队越是进行扩大和通过征募士兵吃进一个师又一个师，这个问题就越发严重。因为：在此期间，党卫队战斗部队的战果和大德意志独裁者的战运日益不佳，促使阿道夫·希特勒拆掉加给武装党卫队的一切条条框框。武装党卫队年复一年地变成这位暴君的最后希

望，希特勒产生了一种垂死挣扎的信念，认为唯有党卫队这支几乎不可战胜的部队才能使他免遭厄运。

早在1942年春，希特勒就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党卫队师（“欧根亲王”师）；不久，又将骑兵旅组成“弗洛里安·盖尔”师；从秋天起，希特勒就不再对武装党卫队加以任何约束了。接着相继成立了装甲师“霍恩施陶芬”师（第一次有百分之七十的成员由招来的人员组成）、“弗龙施贝尔格”师、一个取名“北欧”师的新的日耳曼人师、“希特勒青年团”师和一个波斯尼亚师——武装党卫队一再地扩大队伍。它也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放松了在武器方面对它的控制。最高统帅部原来总是注意，使武装部队比武装党卫队优先获得现代化武器。现在，希特勒把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从进攻性火炮到步兵坦克，他都将最新装配调拨给武装党卫队。

部队终于成功地清除了导致他们人员和物资严重损失的痼疾：缺少坦克。“给我们搞坦克来，没有坦克，这支威武雄壮的部队就会完蛋，”1941年年底，前罗马尼亚将军，当时担任“维京”师团长的西本布格尔人阿图尔·弗勒普斯向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告急。同武装部队的长期抵制进行斗争，武装党卫队的三个最早的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帝国”师、“骷髅”师）逐渐更换配备成为坦克部队，组成了在保罗·豪塞尔指挥下的、为人们所承认的党卫队第一装甲军。以后又组成其他装甲军。1943年3月，副总指挥豪塞尔率领他的装甲部队越过乌克兰战场向前挺进，实现了希特勒的最大胆的希望。该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击退了苏联的强大攻势，又在1943年夏季，德军最后一次在俄国土地上展开的强大进攻中，充当南线进攻部队的尖刀。

一年后，武装党卫队各师已成为德国东线的核心部队。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判断道：“党卫队部队”两度“阻止了一种新的斯大林格勒局面的出现”，它们在切尔卡瑟和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打破

了苏联人布下的致命包围圈。1944年1月，苏联部队在一个包围圈中围困了两个德国军，此后一个月，在另一个包围圈中包围了一个完整的德国装甲军团。身陷重围的“维京”师配合陆军部队突破了切尔卡瑟的包围圈，（在此期间开往法国、后又重新调回来的）豪塞尔军粉碎了卡缅涅茨-波多尔斯基的包围。美国人斯坦在武装党卫队编年史中写道：“党卫队部队战斗的结果有时获得辉煌胜利，有时取得微不足道的战果，或是完全没有取得战绩。但是不论每次具体作战行动胜负如何，最终的结果都是：遏制住了敌方的挺进。”

可是，武装党卫队在军事上的胜利却掩盖不了部队早已“烧得  
438 焦头烂额”，“维京”师师长施坦因纳这样说。投入战斗的坦克装备为时太晚。1943年，武装党卫队第一流各师的三分之一人员已长眠在俄国地下。武装党卫队不得不蒙受沉重的损失，这种损失要是加在任何别的部队头上，肯定早已一蹶不振。仅在1941年6月22日至11月19日之间，它就损失了一千二百三十九名各级领袖和三万五千三百七十七名队员，其中死亡一万三千零三十七名。“维京”师在切尔卡瑟突围时丢失全部坦克、全部装备和一半人员。以骷髅师为例，该师师长艾克于1943年2月在哈尔科夫地区阵亡，可以看出损失对武装党卫队的士气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该师在1941年11月15日确认：“战斗迄今所受的损失，已消耗作战部队的主要领袖和副领袖这些骨干力量将近〔达到〕百分之六十。副领袖这一层严重缺乏，产生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其结果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有经验的副领袖和组长均已丧失殆尽的连队，是不可能展开进攻的。叫它担任防守是靠不住的，因为它缺少主心骨。现在，师里有的连长已经站在自己的阵地前面不知如何判断情况了。”

党卫队各师受着人员伤亡日益严重的威胁，发出的求援呼声



明显地尖锐刺耳起来，特别是因为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补充处拨给的补充兵员，不得不严重地改变部队的中坚性质和战斗水平。过去，武装党卫队的士兵热情积极地走上战场，被希特勒崇拜和为更加注重社会的新德国服务的信念所狂热鼓舞。这些年青的党卫队步兵、理想主义者，飘飘然不可一世地自以为除了献身于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和德国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更加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辽阔的俄国土地上的坟墓和木十字架证实了他们的悲剧性错误，并让整个一代人共同尝到这个悲剧性错误的滋味。紧跟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党卫队步兵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真心实意的或所谓的志愿参战人员，这些人缺少他们已故先驱者的天真信念。他们在执行勤务时往往不无反感，他们大多数是受到威胁和诱骗而加入的。他们加入武装党卫队没有热情，训练极差，疑虑重重，这些给部队带来一种与原先特别机动部队先驱者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

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在1943年春以跟纳粹相似的愤怒心情写道：“精神状态很糟，充分暴露出父母亲家庭、教会等等的明显影响。行动准则是：要是我被征召，那我无法改变这个情况，我不是志愿去的。而且也害怕投入战斗。”但是补充处处长伯格儿已无法再提供军队所期望的补充兵源，因为他早已尽了自己的最大可能。跟武装部队一样，武装党卫队的志愿兵源也很快趋于枯竭。从1942年年底起，武装党卫队不得不退而依靠义务兵。各地补充处办公室的每份新报告都证实，德国人——被关于部队的野蛮作战方式和惨重的流血伤亡的报告吓坏了——对武装党卫队持反对态度。

1943年2月，武装党卫队领导从各地补充处办公室的十三份报告中注意到，召兵工作一次又一次遭受挫折。东南(布雷斯劳)补充处办公室报告：“对录取的劲头不大。缺乏服兵役的热情。小青年不肯志愿报名。部分小青年完全讨厌武装党卫队。”南方(慕尼

黑)补充处办公室报告：“缺乏录取入伍的准备，甚至部分地引起了消极抵制的印象。壮丁不肯志愿报名，而是一直等到去把他们请来。”美因地区(纽伦堡)补充处办公室报告：“很少有录取入伍的准备……，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灾难性的。小青年不仅反对武装党卫队，而且根本反对任何形式的兵役。”现在甚至多年在部队中进行的反基督教宣传，也掉过头来攻击武装党卫队。父母亲家庭和教会使武装党卫队的招兵工作陷于瘫痪状态——甚至对秘密警察的恐怖心情也阻止不了公民对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部队持反对的态度。

党卫队东北地区补充处办公室记述，“父母亲家庭和教会施加消极影响。”“父母亲家庭的影响是不利的”(波罗的海II)。“各方面的小青年都被父母禁止去武装党卫队报名”(慕尼黑)。“父母亲家庭大多憎厌武装党卫队”(汉堡)。“教会的影响非常强大，出现了这样的言论：‘教士跟我们讲，党卫队不信奉上帝，如果我们加入党卫队，我们就要入地狱’”(维也纳)。伯格向全国领袖报告说，在领袖警卫旗队进行的一次复审中，几乎所有被征求意见的预备军官都拒绝当武装党卫队的领袖。汉诺威的一个青年说道：“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过去肚皮吃得饱，今天也还是吃得饱。谁要是肚皮吃不饱，可以自个儿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伯格报告说：“全国领袖，这可不是个别情况啊！”

希姆莱收到伯格报告的这些恶讯，情绪低沉。1943年5月14日，他咒骂道：“我认为，这是基督教教育对我国青年进行明显和有计划地毒害的全部结果。显而易见，恰恰处在当前战争时期，我们没有针对这种基督教教育在青年中进行足够的积极的世界观教育。”但伯格还不相信征兵就此结束。他找到了两位盟友，愿意为他吸引志愿人员：他可以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军事训练营和国家劳动服役训练营(RAD)中使用一切手段招募兵员。

为了在猎获新兵方面胜过武装部队的体格检查委员会，伯格  
尔让党卫队部队对适龄的征兵对象提前进行体格检查。这就造  
成，有的武装党卫队募兵军官坚决强迫年轻的国家劳动服役队  
队员个个加入武装党卫队。1943年2月24日，在哈雷的一所国家劳动服役农业学校中，有的年轻劳动队员躲起来，不愿听关于  
武装党卫队的报告，一名党卫队领袖追在他们后面说：“这些人要  
是进了党卫队，那就要立即枪毙，因为这是地道的怠工和开小  
差！”对另外的学员，他则拿出印好的表格，每人一张，填好后就得  
加入武装党卫队。当一个学员提出异议，说他必须先跟父亲谈谈  
时，这个党卫队领袖愤恨地连声说：“我们再也不会听这老一套了。  
你们大家都得签名，否则我不让任何人离开这儿。”接着他又辱骂  
另一个学员：“你们这些猪猡真以为，你们的同志在外面为了你们  
把自己的骨头去当枪靶子，是叫你们好在这儿逃避战争么？”几乎  
全体人员都签上了名。

一个国家劳动服役队员给自己的父亲哭诉道：“亲爱的爸爸，  
今天我碰到了我有生以来最卑鄙的事情”，后来，这个父亲将儿子的  
这封信托人送给了希姆莱。三名党卫队员和一名警察突然来到  
儿子的劳动服役营，要求所有在营人员填写加入武装党卫队的表  
格。这个国家劳动服役队员告诉父亲：“约莫六十名队员被强令签  
名，否则他们就要遭到辱骂，或是被关三天禁闭。对他们百般威  
胁，所有队员都非常气愤，有些人干脆走了，甚至还有几个人跳窗，  
警察站在门口，不让任何一个人出去，全营群情愤慨。我可受够  
了，我变成了另外一种人。”

纳粹党摩泽尔区领导向党务书记处报告道：“据报已在所有劳  
动服役队员中挑去一批身高一米六十五公分以上的人员，他们是在  
不顾公务命令的抵触并声称党卫队代表系直接来自领袖大本营  
的情况下，被强迫‘志愿’加入武装党卫队的。”1943年3月30

日，第五集团军临时总司令部的记录中写道：“又有不计其数的人控告，武装党卫队使用非法手段为自己的部队招兵。”来自萨斯巴赫-阿希埃恩的报告说：“在号召五次仍然无人报名的情况下，于是宣布，谁不愿意报名参加一个部队，谁就不许离开会场。”党卫队领袖在牟罗兹一家企业里威胁他们招募对象的徒工，扬言：“如拒绝报名，将把他们的父母赶出阿尔萨斯。”

但是，当部队看到自己是用什么后备力量跟愈来愈顽强的敌人进行作战时，不由大吃一惊。早在1941年8月和1942年3月，参谋长于特纳就向伯格提出抗议，反对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给部队提供这种“完全叫人受不了的补充兵”。1942年9月，于特纳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他转而反对中央技术管理局的粗野招兵方法，将用错误欺骗手段、或者甚至靠施加压力拉来的人，输送给部队。部队也经常被一些家庭提出抗议而纠缠不清，这些家庭要求让它们被强迫加入武装党卫队的家人回去。

441 此外，司令官们对新兵糟糕透顶的军训水平也埋怨不已。“一大批士兵对于前线作战一窍不通，”骷髅队司令艾克说。“这些畏畏缩缩、吊儿郎当的面孔，叫人感到忧虑。可以看得出这些士兵没有经过艰苦的、适应作战的必要训练。”如果说，德国本国的补充兵源已使前线司令官们感到不满，那么他们就眼见自己的部队受到了伯格爾的被保护者，即德意志族人志愿人员的更为不良影响。1943年，党卫队骑兵师“弗洛里安·盖尔”师司令部观察到，在德意志族人中有一种出奇的毫不在乎和倔强的性格，使得部队的精神处于麻木状态。

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德意志族人志愿人员（他们与匈牙利来的、共患难的伙伴们相反）虽然乐意参加了武装党卫队部队，可是很快就流露出对部队的失望。“弗洛里安·盖尔”师师部认为“完全有可能的是，这个或那个德意志族人志愿人员并没有把这场

战争看作是自己的战争，没有把自己在武装党卫队中服役看作是“对德意志民族尽义务”。艾克还更严厉地判断说：“在德意志族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说是智力低下的。许多人不会书写和阅读德文。他们不懂指挥命令用的语言，生性不顺从和卑怯畏缩。发布的命令大多数都不会得到贯彻执行，他们总是借口不懂得长官要他们干什么。用这种方法来为怯懦的行为辩解。”党卫队德意志族人步兵的这种恶劣情绪大大损害了部队战斗力，终于使得人们认为，一个好的党卫队师的标志之一是，这个师尽可能少吸收德意志族人。

鉴于一支如此引起思想混乱的后备力量，指挥官们不得不对欧洲志愿人员以巨大热情加入武装党卫队感到满意。武装党卫队内的二十万非德意志族人的欧洲人，给部队打上了多民族部队的烙印，并且多少重新带回来一些使得指挥官们感到若有所失的那种理想主义。但是战争一天天打下去，使部队迅速清醒过来。即使是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东征的共同口号也已无法掩盖，武装党卫队是并不适合于欧洲志愿参战运动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奇特人物的。

汇集众多国籍和思想意识的党卫队志愿人员，骤然之间要由一支军队来进行训练，而这支军队是在最严格的普鲁士操练和戴着一副极权主义世界观的最保守眼罩下成长起来的。在武装党卫队内，外国人跟从来没有学会对其他民族和信仰的成员宽容相处的人发生冲突。人们很快就纷纷埋怨，说党卫队领袖和副领袖以粗暴的主人作风对待外籍志愿人员。佛来芒人、挪威人和荷兰人首先在部队中对武装党卫队过于德国式的训练方法进行了反抗。<sup>442</sup>连希姆莱也指责使他的外籍德意志族人“受到不公正的和心理上如此错误的对待”，必须将“对日耳曼人的未来作出损害的领袖和副领袖不讲情面地加以降级和开除出队”。在挪威，早先的武装党

卫队士兵聚众闹事，跟柏林的党卫队招募人员公开斗争；从1943年年初起，荷兰、丹麦和比利时籍的德意志族人志愿人员日益增多地申请，要求退出武装党卫队。

1942年10月，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第六处悲叹道：“简直叫人难以理解的是，武装党卫队内处理队员的作法在一些情况下对他们的世界观立场产生了多么消极的影响。”某些暗藏的党卫队敌人穿上了武装党卫队制服。例如军邮检查处截获了党卫队荷兰籍预备军官特·费尔写给他在阿姆斯特丹一个朋友的一封密信，信中说，他“再次倍加乐观，因为我们的盟友〔盟军〕已经在意大利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希姆莱命令道：“这个人必须立即送交党卫队法庭审判。”还有一位受到人们热烈赞扬的武装党卫队英雄，比利时雷克斯分子<sup>①</sup>领袖、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胜利奖章获得者莱昂·德格雷勒，他之所以加入部队，只是因为他把这支部队看成是可以阻止希姆莱分割佛莱芒地区并将其并入德国的唯一手段。而荷兰纳粹运动宣传部负责人、德国敌人和党卫队大日耳曼政策的对手福尔胡费，则向一个朋友说：唯有参加这支“愚蠢的白痴部队”才能挫败党卫队的计划。“接受这个人加入武装党卫队太危险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劳特尔警告道：“要是这个人进而作为‘英雄’再度在荷兰出现，对于我们来说，要反对这样杰出的前线战士那将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武装党卫队的一般欧洲志愿人员也开始感到，自己过去听信的那些诺言，这支部队是不会将其实现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之所以加入武装党卫队，是因为他们听信了（由柏林的招募人员所鼓吹的）信条，即通过为德国人服兵役就能确保他们的祖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新欧洲大陆上拥有独立地位。武装党卫队领

---

<sup>①</sup> 指1930年由莱昂·德格雷勒建立的比利时激进天主教右派改革运动的成员。该运动倾向于民族社会主义，曾与德国占领政权合作。1944年被取缔。——译者

袖们支持他们的欧洲步兵的这种独立要求，但希特勒对自己的警卫军的这些设想却置之不理。月复一月，领袖团在欧洲志愿人员眼里的这种地位已维持不下去了。武装党卫队领袖们就变换花样来加以搪塞：他们将特尔茨浴场士官学校改为一所欧洲军事学院。在这所军事学院里，非德意志族人也可以评论民族社会主义党纲；他们打算在荷兰建立一座“日耳曼人战士纪念碑”。他们规划了一项共同的未来前景的计划——不过他们早就心里明白，他们 443 为他们的步兵虚构的未来前景是永远不会付诸实现的。

武装党卫队领袖们一度相信的一个世界在他们的内心中破灭了。将施坦因纳、豪塞尔、比特里希和狄特里希的陆军与黑色集团连接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的脐带断裂了，它不是突然之间、而是渐渐地、月复一月地变得更加脆弱和创巨痛深。他们对希特勒的信任已经动摇，对胜利灰心丧气，对颇成问题的补充兵源忧心忡忡，在欧洲志愿人员问题上陷入内心矛盾——党卫队各师的陆军就这样在战争的意识形态之间摇摆不定，并且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属于党卫队。党卫队部队的行军纵队现在只是走在一面小小的自己的旗子后面，尾随着跟国家领导的关系已陷入动摇状态的野战军主帅们前进。

诸如领袖、德国、效忠和最后胜利这些刻板字眼依然挂在他们的嘴边，但他们内心深处已感到部队在痛苦中挣扎，它已变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势力，既不再是党卫队，又还说不上是武装部队。因而也就和某些警卫部队的命运相同，即按照瑞士社会学家罗尔夫·比格勒所说的那种始终“与国家权威、从而也与政府保持一种特殊关系”的警卫部队。对于武装党卫队来说，无论参加作战和战争失利，部队都已成为实际上的祖国；自己采用的番号旗帜、剧烈而又残酷的战役和对阵亡战士的缅怀，形成了一根与部队连结在一起的神秘纽带，没有一个外人能够渗透进去。军官跟他们的士兵

情况一样，也是这般模样。由这些比较自信和傲慢的将领们指挥的一支德国部队确是很少见的。好些事例证明党卫队将军们十分刚愎自用。

保罗·豪塞尔在1943年2月接到命令，率领他的党卫队第二装甲军开赴哈尔科夫，阻击密集推进的敌军，并不惜一切地守住这座城市。但俄国人在2月12日已逼近德军部队的背部。俄国人随时都能完成对豪塞尔军的包围。豪塞尔于是请求他的上级兰茨军团，允许放弃哈尔科夫，撤离该地。但兰茨司令部以希特勒禁止任何撤退为由，不予同意。2月15日，陆军总司令部向哈尔科夫加发电报，再次传达领袖的一项命令，不准豪塞尔放弃哈尔科夫。豪塞尔自己作出了决定。2月15日12点50分，他下令撤退——违反了他的领袖明确强调的命令。结果使装甲军免受歼灭，从而使曼斯坦因陆军元帅后来有可能发动一次反攻。希特勒对不听命令的党卫队将军颇有牢骚，但对豪塞尔未予处置。

444 党卫队将军们无视武装部队指挥部命令并非个别情况。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责备领袖警卫旗队司令狄特里希违反上级命令，说他在德国军队向俄国南部挺进的时候，“纯粹为了猎取声望，去进攻罗斯托夫”（见伯格的一份存档纪录）。另外一个例子是，冯·克莱斯特陆军元帅在一次绝妙的命令中，记下了一个党卫队将军的抗命行为。他给“‘维京’师师长”发电说：“第一，立即宣布禁止军队持违抗命令的态度，第二，着‘维京’师师长报告，为何他未经请示另行采取违背军部明确命令的态度。”

但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特别严重地觉察到，他的那些将军们的独立倾向。他满腹狐疑地注视着武装党卫队小心翼翼进行的消极离心的行动。1942年11月23日，党卫队人事处处长马克西米利安·冯·赫尔夫记下对有关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重要人物的看法，可以代表一般印象。他说：“必须对于特纳周围的一帮人



加以严密注意，因为这帮人有一天将会成为危险人物。这帮人是地区总队长佩特里、旅队长冯·耶拿和汉森。他们同党卫队的思想和意愿相距甚远。他们只想当警卫军人，其他倒是次要的事情。”

党卫队全国领袖与部队从来没有特别关系，但十分敏感地觉察到部队跟党卫队集团之间的距离日益增大。他对这种疏远并不感到突然。1942年3月5日，他不无有先见之明地写道：“我看到这里有一种严重危险，即武装党卫队在‘军事必要性’的座右铭下开始过一种自己的生活，就跟当年国防军在‘国防措施’的座右铭下开始过一种自己的生活一模一样。”武装党卫队自己的新生活已经一再使全国领袖不知如何是好。这可以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看出来：武装党卫队领袖们厌恶与普通党卫队队员建立手足之情，或是力图违反希姆莱的命令争取以武装部队的军衔来替代党卫队自己的军衔，或是热衷于使武装党卫队部队听从武装部队的指挥——这又是反对全国领袖的明确指令。

有一次柏林遭到空袭，六百名党卫队士兵听从了当地军区司令部的指挥，希姆莱对此勃然大怒地说：“如果再发生哪怕只有一个武装党卫队士兵接受武装部队指挥的事情，从而使武装党卫队在我这个党卫队全国领袖背后插上一刀的话，我不仅在几个小时内撤掉柏林地区驻军司令，而且要派人将他逮捕起来。”然而，武装党卫队领袖们几乎根本没有想到要放弃他们的全国领袖所说的“武装部队立场”。例如，纽伦堡地区武装党卫队驻军司令、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洛完全拒绝跟普通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机关进行接445  
触。1941年10月10日，纽伦堡地区保安处报告道：“党卫队旅队长马丁博士以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身分亲自竭力把所有党卫队统一在一起……他试图把武装党卫队也拉进去，但由于上述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洛的执拗和令人费解的态度而趋于失败。”

希姆莱徒劳地提醒他的军人们，党卫队才是武装党卫队的真正家园。1941年8月，他要求在武装党卫队各师只许使用党卫队的军衔肩章、领章和袖章。施坦因纳受到申斥，命令他不得一直以“施坦因纳将军”的名义签署他的军部命令。但是在此以前，希姆莱不得不对手下的军人们作出了第一次让步。他批准旅队长以上的武装党卫队高级领袖，除他们的党卫队军阶外，还可要求接受武装部队的军衔。

希姆莱日益严厉地责备他的将军们在世界观方面放松要求。他向武装党卫队领导发布措词严格的命令，要求每个党卫队领袖必须把自己的每个士兵“教育成为始终笃信和自觉具备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意志体现者，拥护我们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思想”。希姆莱气势汹汹地说：“衡量领导一支部队的才干，我将不是单单看能否进行优良武器方面的训练……而是同样强调要看能否把每个领袖、副领袖和队员教育成为信仰坚定的、在世界上面临任何风险决不动摇的战士。”

几乎没有一个党卫队将军理睬这项指示。戈特洛勃·伯格尔惊异地感到，“党卫队内竟然有人对党卫队全国领袖的一项明确命令根本不加理睬。”有的师拒绝按希姆莱的命令开设世界观课程；而热衷于想讲授世界观课程的党卫队领袖，就只好忍受部队的嘲讽。1944年，党卫队第十三师世界观整训员埋怨道，他“作为一个党卫队领袖和军官的荣誉感受到了攻击”，因为他的政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师部的一些先生们的拒绝”。1943年10月2日，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的一位秘密情报员更加露骨地说道：“真是叫人恶心，我老是听到讲党卫队精神，一些屁话，连一点也看不到这种精神。”

希姆莱看到这种报告越多，就越是怀疑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四周尽是些忘恩负义的将军，他们已站到另一个营垒、即武装部队的

营垒里去了。他看到将军们一个接着一个背弃了黑色集团。

关于第五党卫队山地军军长、副总指挥弗勒普斯将军，伯格爾这样写道，他“变得非常奇怪”，因为他把象德意志族人地区总队长安德烈亚斯·施密特这样的非军方纳粹党员排斥在司令部会议讨论之外。副总指挥赫夫勒对武装部队的驯服服从使希姆莱恼怒异常，以致党卫队首领对这位参加过1923年11月暴动的老战友拒绝以挚友相称，并以恶狠狠的压榨手段进行威胁。希姆莱口授了一封信件：“赫夫勒先生！在我将您撤职之前，我先写这封信对您最后一次提出警告。您既是一个不服从指挥的部下，又对命令贯彻执行很不得力。我的印象是，您已完全受您的司令部摆布。您要直截了当地——不用进行任何辨白或解释——书面告诉我，从现在起，您是否打算多听我的话和尊重我的命令，少去听您的司令部的授意，或地区陆军部门的指示。”446

赫夫勒象奉命指挥党卫队第二装甲军的副总指挥比特里希一样，经受住了全国领袖的大发雷霆。比特里希在入侵战役后由于发表抨击性的言论被希姆莱撤职，但比特里希拒不离职——有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莫德尔的庇护。特别使希姆莱恼火的是，连他过去所宠信的党卫队副总指挥、武装党卫队将军菲立克斯·施坦因纳，也加入了激烈抨击全国领袖的行列。

“您是我的最不听命令的将军！”希姆莱有一次对着施坦因纳喊道，因为他已从第三方面获悉，施坦因纳管他叫“轻浮的浪漫主义者”。从此，他就猜疑地注意这个孤僻的东普鲁士人。他早已注意到，施坦因纳身边围着一批党卫队领袖，这些领袖不单单是嘲笑“全国海尼”穿上制服走路象只大蜘蛛的问题。希姆莱早就感到震惊的是，施坦因纳在1940年还是特别机动部队“德国”团团长的时侯，就在军官食堂发表言论，抨击希特勒在西线战役中采用的战略——出言不逊，毫无忌讳，以致希姆莱特派豪塞尔去叫这个抨击

希特勒的人闭嘴。希姆莱对施坦因纳首席参谋部军官、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赖希尔的抨击言论十分恼火，按照希姆莱的说法，赖希尔对“‘维京’师的军官团的情绪”施加了“特别不良的影响”。希姆莱在1942年8月向这位将军说明了原因何在：“我认为特别不能容忍长期继续下去的是，赖希尔的嘴巴不注意纪律，竟然不仅对整个领导，而且甚至对领袖本人或我的措施大放厥词。”全国领袖对施坦因纳的炮兵司令、旗队长吉勒也感到讨厌。吉勒这个纯粹军人把一切与世界观有关的事情都推到一边。希姆莱对师的意识形态观察员、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菲克大骂道：“在高贵的第五炮兵团里严禁穿着褐衫，我要派一支脱衣队来领导您的办公室！”

447 希姆莱试图用纪律约束他从前所宠爱的将军。他进行威胁，他甜言蜜语，他提出请求，他呼吁施坦因纳要感恩戴德，他派出使者去劝说这位将军。希姆莱私下对亲信伯格说，他的确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对士兵们特别是对这位典型的将军现有的虚荣，一向宽大为怀”。就感恩戴德的呼吁来说，他施坦因纳应该“心里明白，他四十七岁就能当上党卫队副总指挥和武装党卫队发号施令的将军。要是他待在陆军里，我对他究竟能否当得上将军表示怀疑。因此他应该老老实实，不要让党卫队认为他是副总指挥和将军，而应该说他是革命的将军提升的‘地区总队长或副总指挥’”。他又进行威胁说，全国领袖“期望他〔施坦因纳〕彻底改变恶意诽谤的言词，‘维京’师的一些人，在军官食堂等等地方谈话中竟然一直还对我这个全国领袖使用这种言词，对这种情况我决不会再听之任之”。

但是，希姆莱使劲施加的压力也是徒劳无益。伯格注意和认识到，“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施坦因纳是根本不听教诲的。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也听不进任何意见”。当施坦因纳见到自己的部下只喊“万岁！”而不按规定喊“希特勒万岁！”，甚至还抨击党卫队本身在俄国推行“劣等民族”政策时，伯格奉首领之命——据伯

格尔在一封信中所说——“要查明施坦因纳是否对全国领袖不忠诚”。伯格告诉希姆莱可以放心。

在武装党卫队内，忠诚已成为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希姆莱和伯格哪里知道，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在几天以前——1943年6月——在柏林一家咖啡馆里会见了一位老朋友，这个老友过去是纳粹党员，这时是纳粹的敌对者，即弗里茨·迪特洛夫·冯·舒伦堡伯爵、前柏林警察局副局长。他们两个过去一起在柯尼斯堡第一兵团服役，从那时起，施坦因纳就跟伯爵相处很好。伯爵向朋友透露了危险的想法。舒伦堡说：“我们必须在希特勒使德国完全毁灭以前，把他弄死！”党卫队副总指挥施坦因纳若有所思地离开了叛逆的伯爵。武装党卫队逐渐作出自己最大的决断。仅仅再过一年光景，这支部队就面临真理的时刻：1944年7月20日。

## 第十六章 党卫队和德国人的抵抗

1942年秋天，德国中央保安局接到了一些报告，使秘密警察处长、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海因里希·缪勒警觉起来。慕尼黑秘密警察处报告了一桩乍看属于一般违法行为、实则是严重改变第三帝国权力结构的私带外币越境案件。

在靠近德国保护领的边境上，布拉格海关缉私站抓了一个名叫戴维的人，因为他随身携带四百元美金。戴维交代，他是受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军事谍报局一位军官的委托，为保护犹太人筹措的某种经济款项。戴维供出了两名资助者，他们都是替慕尼黑军事谍报站工作的情报员，即伊克拉特上尉及其朋友德国外贸商威廉·施密德胡伯博士。两人以涉嫌违反希特勒德国外汇管理法被捕。

领事匆匆忙忙向秘密警察审讯人员口授的记录中强调说明，私带外币越境具有政治目的。同时，领事以中央法院法官汉斯·冯·杜那尼博士的类似行为为证，而杜那尼是在汉斯·奥斯特少将的谍报局本部担任特别领袖。秘密警察以为又碰到了谍报局事件，便重新进行侦察。他们调查清楚，特别领袖冯·杜那尼给犹太人提供谍报局的证件和款项，使他们以情报员身分离开德国去瑞士。

在此期间，秘密警察的阶下囚施密德胡伯在劝诱下作了进一步揭发。他交代自己的活动跟慕尼黑谍报局的约瑟夫·米勒博士中校的计划有某些联系，即促使梵蒂冈出面，在德国和盟国之间进行和平调解。秘密警察头子立即看出，慕尼黑送来的报告多么重要：秘密警察第一次接触到了那个势力强大的谍报局的核心圈子，

这个圈子反对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监视网独家统治德国，并使秘密警察不得过问武装部队的事情。更有甚者：长期以来，阿尔布希莱特亲王大街就将汉斯·奥斯特、约瑟夫·米勒和汉斯·冯·杜那尼这些姓名，跟一个设想联系起来，即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国外处里，潜伏着一批坚决敌视政权分子，他们在秘密警察过问不了的武装部队庇护下，策划推翻民族社会主义制度。

449

德国中央保安局在整个德国布下控制网后，它就跟谍报局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即使两家在工作上配合协作，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何况谍报局的军官一再反对秘密警察在所谓打击敌人中采用丧尽天良的作法，以及阻挠党卫队领导试图让德国中央保安局垄断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保安处和谍报局——的手法。在德国中央保安局里也准备好了“弹药箱”（海德里希语），一旦需要给对手以致命打击时，这个弹药箱就会冲着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领导班子打开。这个弹药箱里藏有秘密材料，记下了米勒、奥斯特和杜那尼的某些敌视政权的线索：起着谍报局参谋长作用的保皇派奥斯特，培植了一个内政情报系统，给反对希特勒政权的德国抵抗运动的领袖提供情报，而且活动能力很大，使得冯·亨蒂希公使危言耸听地声称，“整个党受到了武装部队谍报部门的监视”。法学家冯·杜那尼在1938年曾经揭露秘密警察阴谋陷害冯·弗立契男爵大将，并同待在前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和前市长卡尔·戈台勒周围的另一批反希特勒分子密切接触。之后，他就被列入了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黑名单。对于天主教徒和后来成为基督教社会联盟创建人之约瑟夫·米勒，秘密警察和保安处多年来就在进行调查，因为他涉嫌向比利时驻梵蒂冈公使馆泄露了德国发动西线战役的进攻日期（1940年5月10日）。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现在促使秘密警察缪勒利用慕尼黑外汇事件对谍报局进行一次致命的打击。不过，他必须小心行事，不能

暴露出他的行动的政治动机：秘密警察必须使人感到只是追究一桩外汇走私案件。由于秘密警察无权侦查谍报局内部的违法活动，秘密警察缪勒将案子交给武装部队调查，但是设法派了一名观察员——刑事警官宗德埃格尔——，作为秘密警察代表参加工作。德国军事法庭没有识破秘密警察的阴谋，任命了一名预审官，即最高军事法官曼弗雷德·勒德尔博士，他在处理苏联谍报网“红色乐队”一案中，已经证明是个镇压反纳粹抵抗分子的能手。

1943年4月5日，勒德尔偕同秘密警察代表宗德埃格尔来见卡纳里斯。勒德尔出示了对杜那尼的逮捕证，并向海军上将声明，他是  
450 由德国军事法庭授权来搜查杜那尼办公室的。几分钟后，三个人出现在杜那尼跟前。勒德尔的骤然造访，显露了反希特勒派的致命弱点。尽管多年来同德国国内抵抗分子保持联系的刑事警察处长阿图尔·奈比前几天还向谍报局提出过警告，说秘密警察缪勒在计划突然袭击谍报局，这位特别领袖还是猝不及防地遭到了勒德尔的袭击。

军事法官动手搜查杜那尼的办公桌，找出一叠可疑的文件。他把这些文件放到桌上。文件中，有一份关于杜那尼在瑞士的犹太人情报员小组的材料，以及在罗马和斯德哥尔摩进行和平谈判的记录卷宗，参加这些谈判的有谍报局军官和秘密警察的监视对象狄特里希·波霍弗神父。突然，秘密警察代表宗德埃格尔发现，搜查时也在场的谍报局局本部头儿奥斯特紧张地直瞪瞪望着杜那尼的办公桌。桌上有一份卷宗。“纸条，纸条！”特别领袖悄悄地对少将说。奥斯特慢慢地挨到办公桌旁边，伸手急速地把纸条拿了过来。“住手！”宗德埃格尔指着少将喊道。勒德尔猛地转过身子，立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请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命令奥斯特把纸条交出来。奥斯特开始不肯，后来还是服从了。

勒德尔看了看纸条。纸条上记着杜那尼和奥斯特拟定的一次



讲话要点，布置谍报局掩护拟定由波霍弗在国外同亲盟国的政治家举行的一次会晤，以不让人发觉。杜那尼办公室里的这一幕，导致了独立自主的谍报局完蛋。谍报局局本部头儿奥斯特——他是仅次于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奈比给反对派提供情报的最重要人物——被解职和开除出武装部队，杜那尼、约瑟夫·米勒和波霍弗三人被捕。

1944年1月，秘密警察成功地给疏忽大意的谍报局密谋分子又一次打击。秘密警察缪勒破获了以大使遗孀汉娜·索尔夫为中心的抵抗运动集团，一举逮捕了谍报局又一批核心成员，其中包括前公使基普、军政委员冯·毛奇伯爵和格勒上尉。谍报局经受过了这场新的打击之后，就由于它本身的缺陷而终于寿终正寝。在瑞士、瑞典和土耳其几个国家里，这个谍报局的工作人员都投奔了盟国。

希特勒接到开小差的报告后痛骂谍报局，说海军上将卡纳里斯的机器完全失灵了——这是独裁者身边最亲信的工作人员听到的。希姆莱驻领袖大本营的代表、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菲格莱因乘机进言说，不妨把“整个摊子”交给党卫队全国领袖来管。希特勒接受了自己未来连襟的这个建议，并召见了党卫队头子。短短几分钟内就对谍报局的命运作出了决定：1944年2月底，海因里希·希姆莱受领袖的委托合并谍报局和保安处。武装部队在跟党卫队进行的这场决战中惨遭败北。一场进行多年的斗争至此分出了胜负。大德意志武装部队失去了自己的谍报机构，从而变成世界上唯一一支本身没有情报机构的军队。从现在起，军事反间谍工作属于党卫队的主管职权——党卫队得胜了。451

奇怪的是，胜利者并未象人们预料的那样进行报复。缪勒欣然扑向卡纳里斯的“叛党”机关，但并没有取得执掌谍报局的权力，取而代之的倒是缪勒最恼火的竞争者：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国

外保安处)处长、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施伦堡。一种奇怪的彼此相连而又互为矛盾的关系使他同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多年来保持着联系，卡纳里斯十分欣赏施伦堡的天资过人。谍报局长对这位党卫队人物几乎怀有慈父般的感情，而施伦堡对海军上将也很尊敬，很有人情味，这同冷若冰霜的保安处知识分子却是格格不入的。

过去，这位海军上将即使在同施伦堡的上司海德里希发生激烈争吵时，也向这个比自己年轻的人征询意见。“我是不是又过于激烈了？”每当他早上同施伦堡碰头去柏林动物园练习骑马时，他常常这样问。他知道，施伦堡对他卡纳里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会背弃应有的忠诚的。外交部情报头子是里宾特洛甫派的极端纳粹分子，有一次向施伦堡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卡纳里斯究竟是只老奸巨猾的狐狸，还是纳粹政权的拥护者。这位保安处领袖明确地回答，海军上将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始终坚持这一看法——即使到1944年7月23日也不动摇，这一天心怀叵测的秘密警察头子偏偏交给施伦堡任务，以所谓七月二十日密谋分子的同伙的罪名逮捕海军上将。其实施伦堡知道得很清楚。他甚至还可能知道卡纳里斯和谋刺者施陶芬贝格伯爵通电话的内容，因为施陶芬贝格在7月20日那天下午将猜定希特勒已遇刺身死的消息告诉了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说：“死了？我的天！是谁干的？是俄国人吗？”

尽管如此，施伦堡同样也把谍报局完蛋看作是自己的胜利，看作是他主管的国外保安处的胜利。他多年来渴望的东西终于近在眼前了：建设一个统一的超级情报机构。他在梦幻中已经看到自己是一个谍报帝国的魔术师，连十分嫉妒的英国谍报局跟这个帝国相比也黯然失色。这一点也证明了瓦尔特·施伦堡同属党卫队领导层最为野心勃勃和莫测高深的人物；就连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其他各处处长，也感到他是一个危险的怪人，宁愿对他敬而远之。

这个萨尔布吕肯出生的法学家通过保安处间谍系统进入党卫队，来到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身边，一种既憎又爱的感情将他和海德里希联系在一起。

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同事们起初把他看成是对海德里希唯命是从的大管家，后来他们才发现，在这个仪表不凡和博览群书的健谈人物几乎具有女性多愁善感的性格中，隐含着一种执拗劲，即使在令人胆寒的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身边也能固执己见。此外，他还懂得依靠希姆莱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全国领袖喜欢叫施伦堡“本杰明”，显然对这个狡黠的“本杰明”感到满意。有一次搭机飞往维也纳，希姆莱不小心背靠在飞机舱门的把手上，施伦堡一把抓住了全国领袖的制服。从此党卫队全国领袖对这个保安处人员的直觉和谨慎深为信任。

旅队长施伦堡尽管跟党卫队集团最有势力的人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还是保持着机警的头脑，不让自己“为极权国家杀身成仁”——象政论家克劳斯·哈尔普雷希特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因素能促使他为纳粹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适应环境的能力使这个早年破产的资产阶级子弟跻身于保安处骨干队伍之列，当预告褐色众神末日来临的警钟响起时，也是这种应变能力使他背弃希特勒政权。他从进入党卫队情报机关的领导行列起，就了解德国的真实情况。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在1940年离职后，最初由他领导谍报警察，但他同自己的上级、暴戾恣睢的秘密警察缪勒一直吵得不可开交，因而当他在1942年被任命接替海因茨·约斯特任国外保安处长时，必然满心喜悦。

他担任国外保安处长显示了引人瞩目的才能，以致希姆莱在接到合并保安处和谍报局的任务后，立即就想到了他的本杰明。1944年春，施伦堡着手建立隶属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部队情报机构。但是，他不在惨遭败北的谍报局面前流露党卫队领袖的胜利

感。他几乎是小心翼翼地取消谍报局的机构，特别注意将卡纳里斯的旧部属尽可能不加触动地安排进德国中央保安局。

他之所以采取这样谨慎的策略，也是因为谍报局和德国中央保安局之间的斗争并非以党卫队取得彻底胜利而告终。在领袖大本营里，接收下来的谍报局摊子被分给了武装部队和党卫队两家：原由奥斯特主管的局本部被解散，国外办公室仍属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第一科（秘密情报）和第二科（破坏）划归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三科（反谍）由武装部队和秘密警察瓜分——“前线侦察和部队谍报”部分划给陆军总司令部，余下部分划给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  
453 E 处。施伦堡将一、二两科合并为一个新的军事谍报机构，简称“军处”，任命暗中同抵抗分子有联系的谍报军官格奥尔格·汉森上校为处长。表面上一切同过去一样，看上去几乎只是领导层人事更迭而已。

卡纳里斯暂时还没有碰到秘密警察找麻烦。起初，他被关在劳恩施泰因城堡里，类似剥夺荣誉的禁闭，但在同施伦堡作了一次谈话后，海军上将回柏林，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特别参谋部任商业和经济作战局局长。党卫队领袖们甚至给被他们搞下台的对头卡纳里斯唱赞歌。1944年5月初，希姆莱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在萨尔斯堡附近的一座宫殿里，当着许多党卫队领袖的面庆祝情报工作开始了新纪元。全国领袖在讲话中也赞扬了“军事谍报局劳苦功高”。广大谍报局军官看不透，为什么施伦堡对卡纳里斯的部下如此宽宏大量。他们慢慢地才意识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保安处长施伦堡施行的方针，同谍报局反对派奉行的方针出人意外地颇为相似。

在1944年7月20日前夕，几乎没有人知道谍报局和国外保安处的密谋多么相似。两家都不相信德国能取得最后胜利，两家都希望跟盟国单独媾和，两家都愿意为了保全德国而除掉阿道夫·

希特勒。

谍报局对战争形势的冷静分析，同保安处的敌情报告和民情报告的看法一致。就是在竭尽全力也不会有什么成效的问题上，两家看法也完全相同。卡纳里斯曾经一再埋怨，领袖大本营里再也没有人看他的情况报告；而保安处从1944年年中起，就不再需要由该处报送编给最高领导部门阅看的《全国简报》。在寻找摆脱希特勒战争的出路时，保安处和谍报局经常利用同一条秘密途径。他们两家甚至常常连找到的斡旋人和盟国的谈判对手也都是相同的对象。

在这一点上反映的目的，至少部分相同。这个目的将德国军官队伍中的良知，同冷酷的保安处理性主义者的脱身伎俩注定联系在一起，以致黑色集团的辩护士后来声称，从根本上说大家都是怀着同一个目的。瓦尔纳·贝斯特在战后认为，谍报局及其在保安处里的对手都是陷入了相同的悲剧。他写道，“我们的共同悲剧”是，“我们为了我们的人民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在作出了良好开端和取得重大的初期成就之后，由于无法预见的原因（希特勒的预言狂）最后导致了灾难”。

这样一种解释虽然否定了道义上存在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使得在7月20日主要出于道义而发难的人，同党卫队掌权的政治工艺家们泾渭分明——，但前秘密警察法官的这些话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第三帝国终于把领袖专政的勇士们推进了痛苦和失望的深渊。贝斯特所说的“希特勒的预言狂”，实际上是一把钥匙，没有它，人们就无法打开党卫队或至少是一些党卫队领袖的心扉和了解它或他们在1944年7月20日前和这一天的态度。当时，许多党卫队领袖对他们曾经盲目和狂热宣誓效忠的这个人的形象在内心深处倒塌了，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姆莱称自己所崇拜的偶像为“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智

慧”。在党卫队领袖们看来，他们集团思想和任务完全体现在这个人的身上。保护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命，彻底执行他的命令，并在将来有一天贯彻他的遗训——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就是党卫队的神圣使命。许多党卫队领袖对反映魏玛民主及其外表混乱的讽刺画历历在目，他们梦幻中的乌托邦是一个民族运动的有秩序的国家，这个国家由一个天才的、征服本世纪的领袖领导，依靠不凭感情用事和“实事求是”（这是他们最喜爱用的字眼之一）的政治技术家阶层，实现安邦治国的要求。极权主义国家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希望极权主义的国家能带来大家企求的秩序，以及同样为千百万不问政治的德国人所渴望的民族纪律。可是在同执政者们的深入接触中，一些党卫队领袖清醒过来了。他们很快发现：取代民主政治党派之争的并不是领袖专政的统一意志，而是纳粹特权阶层一大批人物追逐权位，希特勒为了确保自己的独裁统治听任群雄角逐。

保安处任职的党卫队领袖们特别感到气愤的是，事实证明独裁者并不是保安处知识分子们曾经希望通过试验所看到的那种现实主义的和卓越的国家缔造者。他们看到，处在国家顶峰的不是清醒的理性，不是保安处绝对强调的“实事求是”，而是一种残忍的征服欲，一种再也无法控制的权欲，它们同十九世纪赤裸裸生物学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主宰民族狂一脉相承，这种主宰民族狂甚至突破了党卫队领袖们本身给民族主义理论所规定的界限。

当这位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独裁者第一次并吞了一个别的民族——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其余部分的捷克人——时，希特勒同党卫队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条小小的裂缝，当然这道裂缝只有知道内情的人们才能觉察得出来。攫取拉德欣<sup>①</sup>之举，不仅

---

<sup>①</sup> 拉德欣为布拉格的一座古宫，后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机关所在地。通常把它借喻为捷克斯洛伐克。——译者

使外国也使一些党卫队领袖为之愕然。党卫队旗队长赖因哈德·赫恩永远不能忘却1939年3月的一天在柏林动物园的一件事情，当时他遇到了正在早晨骑马蹒跚的区队长贝斯特。“赫恩同志，”贝斯特私下对他说，“这一下完了。在这以前，人们一直相信我们的民族社会主义体现了民族运动思想，相信这种运动是有界限的。可是随着进军布拉格，民族社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这种一刹那的闪念，当然不会在党卫队领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留下明显的痕迹；党卫队追随希特勒走进了他的幻境，追随他进行掠夺和种族屠杀。但尽管如此，仍然有迹象表明，即使是以甘心顺从希特勒而沾沾自喜的顽固人物希姆莱，有时也明显流露出不安的神情——就在1939年夏季就流露出来了。希特勒自杀性地策马跃入战争深渊，引起了生性胆怯的党卫队头子的深思。在1938年苏台德危机中，希姆莱还是极力煽动战争的人物之一，这些人支持独裁者奉行的方针，但在希特勒挑起的但泽争执中，希姆莱已暗自觉察到希特勒是在孤注一掷。455

希姆莱和赫尔曼·戈林站在一起，因为戈林在但泽问题上采取同希特勒的武力政策背道而驰的方针，反对他所认为是希特勒的败事有余的顾问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1939年4月初希姆莱去但泽，劝说好战的纳粹党区领袖、但泽统治者艾伯特·福斯特有所节制。法国驻但泽总领事居伊·德·拉·图尔纳尔男爵向巴黎报告说，希姆莱下定决心要在柏林从事撤掉福斯特职务的活动。希姆莱得到但泽市议院议长、福斯特的竞争对手格赖泽尔的支持，但党卫队头子未能达到目的。波兰驻柏林大使当时也倾向于把希姆莱列为战争的反对者。而但泽专员瑞士人布克哈特则于1939年7月26日致信国际联盟总书记说，国外有人谈论“希姆莱和戈林孤立希特勒。这些说法不符合具体情况。希姆莱从去年秋天，特别是从11月迫害犹太人起有了转变，他和戈

林接近，同戈培尔及其宣传方式方法处于对立”。

希姆莱后来很快转而拥护希特勒的战争路线，但他还是反对里宾特洛甫，为了不致把责任加在他心目中的上帝化身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他认为里宾特洛甫应对灾难性的德国战争政策负责。希姆莱身边的党卫队领袖们幻想，通过打倒里宾特洛甫，德国可以迅速同盟国媾和。“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这是里宾特洛甫的战争！”戈林有一次这样叫喊，这也是党卫队领导机关一些人的想法。前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是德国国内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在1939年10月了解到这一点。他碰到德国前驻巴黎大使韦尔兹克伯爵，伯爵告诉人们要尽快结束战争。哈塞尔在日记中写道：“他〔韦尔兹克〕的活动圈子都是党卫队最高领导机关的人——斯图卡特和赫恩——，他断言这些人原则上和我们〔抵抗分子〕的想法相同，特别是已经在考虑是否应该牺牲里宾特洛甫，以满足对方的要求。他们已经考虑了改组部的人选。”

456

这些间接证据尽管零星分散，但足以清楚地反映出党卫队领导并不持盲从的必胜信念，以此把它成千上万的年轻党卫队队员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和民族杀戮。哈塞尔在德国胜利的顶峰时期这样记述道：“由于党卫队领导对战争结局一如既往地持现实想法，也就是说非常怀疑”，因此它不可能打心眼里支持纳粹所搞的狂热爱国主义。

这并不是说，党卫队领导怀疑希特勒暴力政策的内在正确性。即使它的领袖发布最野蛮的命令，党卫队也是一直愿意将其付诸实行的。不论是决定杀害犹太民族，还是在战场上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不论是需要将被俘的本尼托·墨索里尼从其反对者手中解救出来，还是阻止希特勒德国的某个卫星国变节——党卫队都从来没有犹豫过。

然而使一些党卫队领袖感到气愤的是，特殊的才智经常损害



为领袖专政卖力工作。保安处的骨干分子实在太机灵了，民族运动生存空间的使徒在领袖大本营里所鼓吹的那种易被识破的暴力并不能使他们轻易中毒。占领政策中的一些重要的细微差别使人看到，黑色集团的统治样板明显地不同于希特勒的简单的主仆政策。不凭感情用事的强权技术家们企图用警察机器对被征服的欧洲进行统治并同时收到绥靖之效，但他们眼见自己的工作受阻于希特勒不加区别的空间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的赤裸裸的征服者逻辑，有朝一日必然要激起被统治各国的民族奋起抵抗德国统治者。

希特勒叫下属们切记，处理被占领的俄国的原则，从根本上说也适用于欧洲其他地区：希特勒宣称，从根本上说关键在于“切开这块大蛋糕，以便我们能够第一、统治它，第二、管理它和第三、榨取它”。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德国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独立的民族和国家了，而是只有由一个中央集权主义超级独裁政权任命的各地总督。希特勒在1943年向纳粹党中央和各区领袖解释说，“七零八落的小国”必须尽快予以消灭，一个统一的欧洲“只有通过德国人才能明确地组织起来”。他根本不承认德国占领的国家有起码的民族自治权。希特勒警告说：“自治的道路导致独立自主；用民主制度不能保持用武力所夺取来的东西。”

针对这个纲领，党卫队领袖们奉行一种比较明智的、虽然道义上同样值得非议的政策，可以用时髦的说法称之为“甜面包加鞭子”。党卫队占领政策执行者们试图用软硬兼施的手法，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制造一层薄薄的协调气氛。党卫队领袖贝斯特的<sup>457</sup>意见，明显地有别于希特勒“七零八落的小国”的嘲讽：在“领导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中，“必须注意领导不能永远无视或反对被领导者的意愿行事”，因为“生活是不容许强制和欺骗的”。贝斯特于1942年在《德国、民族制度、生存空间》杂志上写道：“作为命中

注定生活在同一空间的国际范围内最强大的民族，通过和其盟友紧密合作以建立一种民族的大空间制度，以及作为真正的领导民族按照生存规律推行这一制度，乃是一个民族可能达到的高度自我发展的阶段，因为它在生存规律的发展中能确保存在，而不会由于短暂的主宰狂而必然导致没落。”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是第一个试验推行党卫队自己的占领政策的。1941年9月，这位党卫队副总指挥、保安处首领兼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除本职外，被任命为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德国代理（实际上是正式的）保护领长官。

海德里希对捷克人掀起了一阵恐怖狂，使他得到了“布拉格屠夫”的称号。他组织了纳粹史上的第一次公开审判，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就将捷克总理阿洛伊斯·埃利亚斯判处死刑，同时秘密警察分队粉碎了捷克抵抗小组和逮捕了反对派。他每天都向领袖大本营汇报他的恐怖运动取得的“成就”，在短短两个星期内消灭了绝大部分捷克人的抵抗运动，其中包括不久前成立的亲西方的小组和共产主义小组。

但是海德里希刚一达到他的目的，就恢复军事法庭。这位恐怖暴君以新的保护长官姿态出现。“屠夫”海德里希摇身一变而成为“慈善家”海德里希。他宣布结束政治搜捕，开始向捷克工人和农民献殷勤，利用他们对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认为后者是抵抗运动的主要温床。由于海德里希同时负有提高捷克工农业生产的使命，因此他废除了许多将捷克人贬为二等人的规章条例。

海德里希给两百万捷克产业工人增加油脂供应定量，给军备工人提供了二十万双鞋，并征用波希米亚世界著名疗养胜地的豪华饭店，辟为捷克工人的度假住所。同时他还改革了远远落后于德国的捷克社会保险制度。“他甚至第一次对民主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给予承认，”海德里希的英国传记作者查

尔斯·怀顿记述道。他这位保护长官偕同妻子莉娜接见一个又一个的捷克人代表团,使得某些观察家误认为,捷克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德国人的暴力统治。

警卫队行政长官使用这套绥靖手段获得成效的消息,引起了爱德华·贝奈斯在伦敦的捷克流亡政府的震惊。保护领风平浪静,有使民主派捷克流亡者的事业陷入瘫痪状态的危险,因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居民对德国统治者愈是持容忍态度,流亡政府和盟国的谈判中就愈是难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唯有在保护领积极开展抵抗运动,流亡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要求自己的盟友,在解决战后问题时充分考虑捷克的利益。但是只要德国人和暴君海德里希坚持有弹性的占领政策,就始终不可能出现一种法国式的抵抗运动局面。由此流亡派捷克人得出了一个现实的结论:必须干掉海德里希——只有刺死掌握大权的德国保护领长官才能引起德国人行凶肆虐,不这样,法国式的捷克抵抗运动是没有目标的,也不能蓬勃开展的。

1941年12月,伦敦流亡政府作出处死海德里希的决定。它挑选了扬·库比斯和约瑟夫·加拜克两名捷克军士去执行刺杀保护长官的任务。圣诞节后不久,一架英国飞机载上这两个人,将他们空投到保护领境内。库比斯和加拜克为执行任务进行了充分准备。他们经过曼彻斯特附近的谍报学校,在北苏格兰坎比龙斯达罗奇营接受破坏活动训练,然后来到多金附近的皮莱西斯别墅听取了最后指示。库比斯和加拜克计划,趁海德里希每天从容格弗恩-布雷山的夏季寓所乘车去距离不远的布拉格途中行刺。

他们选定在布拉格霍莱索菲歇区下手,具体地点位于德累斯顿—布拉格公路上靠近特罗雅桥转弯的下坡桥堍处。海德里希乘坐无警卫的汽车赴布拉格,经过这个弯道时必会使劲减速。库比斯和加拜克计划利用这一瞬间下手,另外还有两名进行破坏活动

的人员配合他们行动。他们一行四人在这个急转弯处分别选定了位置，每人配备有冲锋枪(藏在雨衣下)和手榴弹。同谋分子法尔希克站在急转弯前二百七十公尺的地方，看见海德里希来了，就吹口哨作为通知暗号。

1942年5月27日上午一切准备就绪。刺客们查明的海德里希抵达时间——9点30分——过去了，还看不到保护长官的绿色梅塞德斯敞篷轿车的影子。又过了一个小时，这四个人已经感到不耐烦了。一会儿，加拜克和库比斯听到了口哨声。加拜克解开雨衣，端起冲锋枪跳到公路上。他将枪口瞄准正在转弯的梅塞德斯轿车。加拜克看清楚海德里希苍白的面孔、司机克来因的脑袋，前面是挡风玻璃。这个刺客一扣扳机——没有击发。他又一次拉枪栓——仍然没有击发。站在他后面的库比斯气得叫了起来，摸出自己的手榴弹，朝紧急刹车后左右颠簸的梅塞德斯扔去。手榴弹落在轿车后座，梅塞德斯被炸坏了。

可是海德里希似乎没有受伤，他想跳下敞篷轿车，气势汹汹地对司机吼叫了几句。海德里希在一眼看见加拜克时，就在汽车里站了起来，拔出了手枪。现在他在马路上摇摇晃晃地一边喊叫，一边开枪追击逃跑的凶手。“简直象西方影片中一幕主角镜头”(怀顿语)。海德里希距离库比斯越来越近了，这时捷克人突然看到有了逃命的机会：两辆电车从不同方向开过来，在他身旁交会。不等海德里希追上来，库比斯已经越过电车，跳上一辆放在那里的自行车蹬跑了。这位保护长官随即追赶第二个凶手。加拜克一直为自己的冲锋枪没有击发而垂头丧气，到这时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突然他觉得情况不对头，急促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枪，一面转身射击，一面逃跑。党卫队领袖紧跟在后面追赶，他在前面逃跑，尽量掩护自己，连连开枪。

突然，他看见海德里希的枪落到地上，子弹已经打完了。海德

里希用右手捂着胯骨，摇摇晃晃地往回走去。凶手加拜克终于也脱了身。直到这时才清楚，海德里希并非没有被凶手击中要害：库比斯的手榴弹爆炸时，皮坐垫和钢丝弹簧的碎片嵌进了海德里希的胯骨和横隔膜；坐垫的毛料填充物的纤维甚至侵入了脾脏。医生们再也无法挽救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生命，他于1942年6月4日因伤重死去。这个德国历史上最大的恐怖组织的统治者所留在人间的东西，就是从他的遗容上印取的一个石膏面型，即党卫队自己的政治权术主义的象征。刑事警官伯恩哈德·魏纳博士奉命到布拉格侦破这起行刺案件，他是第一个看到海德里希的石膏面型的人之一。后来他记述道：“非凡的精灵与放荡不羁的俊美相糅合的面貌叫人迷惑，有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红衣主教。”

伦敦果然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被一阵恐怖浪潮所席卷，其残酷程度在第三帝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一万名捷克人被捕，至少有一千三百人被枪杀，其中包括离布拉格不远的利迪斯村的全体男性居民，据说这个村子给凶手提供了帮助，因而被夷为平地。在这样不分皂白进行的疯狂报复中，刺杀海德里希的凶手也落进了追捕者的手掌，这毋宁说是出于偶然。英国工党议员罗纳德·T·佩吉特战后评论说，游击战争的策略之一，往往“挑动对方采取报复手段，以便加深对占领者的仇恨和团结更多的人进行抵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将一支小分队空投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刺杀海德里希的原因。伟大的捷克抵抗运动，是党卫队采取坚决报复手段的直接产物”。

海德里希的占领政策找到了一个继承人，他决心今后避免采用那种野蛮的报复手段。讽刺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海德里希的方针由一个人来继续执行，并且有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个人是被害者恨之入骨的党卫队领袖，秘密警察机器创建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从1942年8月起任外交部部务主任的瓦尔纳·贝斯特

博士。

丹麦和德国之间的一次危机，将贝斯特在1942年年底一下送到了哥本哈根。丹麦虽然被德国占领，但仍保持着自己的、依照宪法产生的机构，希特勒感到自己受到了丹麦王室和政府的公开侮辱；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将一小批丹麦纳粹分子扶植起来，塞进丹麦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独裁者于秋天断绝同丹麦王室的关系，召回他的两名最重要的代表——德国总督和德军司令。希特勒的计划是：改派一个比前任凶狠的德国总督，以促使丹麦政府辞职，接受纳粹分子参加新内阁。

对于这项使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挑选了以精于谈判而著称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贝斯特。但贝斯特很快就看出，希特勒的要求肯定要断送德国在丹麦的占领政策。丹麦国会决不会同意任命纳粹分子当部长。贝斯特总督做出了里宾特洛甫的部里从来没有哪个外交官敢做的事情：他对领袖的命令置之不理。这个党卫队要员同丹麦政治家达成了谅解。他们组成了新内阁，放弃了几名德国人不信任的部长，贝斯特方面则没有提出纳粹分子入阁的要求。贝斯特向丹麦的党员同志说明，他们参加政府对德国占领政策有害无益。当党在1943年3月的国会选举中只获得三个议席时，他劝说纳粹领袖弗里茨·克劳森离开哥本哈根，老老实实回去当老百姓。

这种手腕典型地说明了党卫队领袖贝斯特推行一种不声不响的方针所采用的异常冷静的方式，因为他认为，在丹麦采取这种方针是最切合实际的占领政策。贝斯特希望确保自己统治地盘的安静和稳定，为此他准备对一切破坏安定的人采取行动，不论是盟国还是丹麦抵抗分子或是希特勒。

于是，他那圆滑的、以异常冷静的逻辑作指导的政策，也遭到了希特勒的反对。领袖大本营对牺牲丹麦纳粹分子的做法总算容

忍下来了。可是听到说对待丹麦抵抗分子委曲求全，则使这位独裁者勃然大怒。因为在丹麦一再发生了类似海德里希在布拉格招惹出来的事情。由英国训练的丹麦抵抗战士在瓦尔纳·贝斯特的样板保护领内发动了一场反德国占领政权的游击战。抵抗分子的目的，也是要激起德国人对继续持观望态度的居民采取残酷报复。但这位外交官贝斯特避免采取一切不必要的强硬手段。他动员军方和保安警察只进行了短时间的报复，打击应该打击的对象。这位党卫队领袖在向外交部汇报抵抗运动真实规模时，甚至宁愿将大事化小，以免引起希特勒蛮横粗暴的反应，贝斯特害怕这种反应超过害怕游击队。

但是，驻丹麦德军司令向国防军参谋部的每日报告，描绘了一幅丹麦抵抗运动十分严重的图象，以致希特勒感到总督欺骗了他。独裁者怒不可遏，要求对丹麦游击队采取最严厉的报复行动，因为丹麦是德国通往挪威的大桥，不采取报复行动，德国就有失去这座大桥的危险。贝斯特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命令他向丹麦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丹麦政府必须建立即决法庭判决丹麦抵抗分子，以及实行对攻击德国占领军者处以死刑的条例。贝斯特总督当即表示，丹麦政府决不会接受最后通牒。过了几天证实了他的看法：丹麦内阁拒不同意，并于1943年8月29日一致辞职。随即由德国驻军司令宣布紧急状态。

不多久，强权政治家贝斯特深明事理的头脑就清楚地理解，希特勒的暴力政策只能对游击队有好处。当独裁者转而提出在丹麦也采用德国人打击游击队的那种粗暴做法时，他不得不顶撞了希特勒。1943年12月30日，贝斯特奉召上领袖大本营。希特勒说，只有通过强化报复性的恐怖活动才能扑灭丹麦的恐怖活动；因此他命令以德方的恐怖活动回答丹麦抵抗分子的破坏活动，偿命的比例是五比一，包括打击游击队成员和资助游击队的人。贝斯

特反对说，报复性恐怖不会使丹麦人信服。对于象丹麦人这样一种法治国思想很深的人民，德国方面只能将抓到的恐怖分子按合法的战时条例判罪，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打击破坏分子。希特勒听到这种律师逻辑越发恼火，他本来就认为法学家的职业是世界上最可鄙的行当。希特勒的实行报复性恐怖命令不容更变。

462 丹麦全国被德国人掀起的残酷报复的洪水所淹没；报复行动也使那些对蛮横的暴力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推到了第三帝国一切犯有罪行应负责任的高级干部的一边。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贝斯特不得不参与了违心的报复性恐怖行动，但是他再次尽力放慢恐怖行动的进度。他和保安警察司令一道，将希特勒规定的偿命比例由五比一降为一比一，并逐步用德国战地军事法庭取代报复性恐怖。

总督阳奉阴违的做法没有能瞒过希特勒。1944年7月3日，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给贝斯特拍了电报：“领袖看了丹麦局势的报告，狠狠批评了您对丹麦人迄今所持的政策。领袖表示，丹麦的事态发展咎在建立法庭。”里宾特洛甫气势汹汹地要求立即作出详细汇报，特别是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您违抗领袖的指令，不是完全采用报复性恐怖，而是要加上司法审判的方法打击破坏活动。”这个持有不同观点的党卫队人士再次被召去谒见领袖。7月5日他站到了希特勒的面前。“先生们总是以为比我聪明，”独裁者怒气冲冲地说。希特勒重申他的报复性恐怖命令，并坚决指出作为总督不可以不执行他的政策。当贝斯特准备提出不同意见时，希特勒吼道：“我什么也不要听！”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敬过礼，走出了房间。过了几个钟头，他感到自己实在无法接受褐色极权国家的这种荒谬思想。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听了贝斯特的报告后，突然陷入沉思，给他出了一个可笑的主意：“您按照您认为正确和明智的方法去做。不过领袖的命令必须执行！”

贝斯特的这段插曲第一次清楚地说明：在大德意志占领政策



中，希特勒的设想和黑色集团的设想并不是始终一致的。特别是在对待所谓的日耳曼族人方面反映出很大的区别，它们暴露了被千篇一律的纳粹教义外衣掩盖下的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这些分歧反映出，阿道夫·希特勒尽管使用所有日耳曼的堂皇词藻，但他仍然是威廉帝国民族运动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并把任何超国家的形式视为民族的背叛；相反，党卫队领袖们则真心致力于建立一个日耳曼帝国，希望这样一个德国能开创他们模糊不清、但竭诚相信的超民族友谊的新时代——更不用说是印上德意志标记了。

希姆莱有一次兴致勃勃地说，他完全可以设想下一任党卫队全国领袖不由德国人来当，而希特勒则经常讥笑这位党卫队头子的日耳曼试验狂。他说，不端正思想意识，每一个日耳曼党卫队志愿兵都必然要“感到自己是民族的叛徒”。从这两个提法可以看出，如同历史学家保罗·克鲁克所说，党卫队存在着“倾向于一种比较独立自主的、思想属于不同范畴的政策”的苗子，这跟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纲领截然相反。克鲁克发现希姆莱“非常愿意从非德意志公民中清理出北欧人因素，也就是说从生物学观点网罗其他民族，而希特勒本人对于这些民族却是顾虑多端的”。463

随着希姆莱愈益坚持自己的日耳曼纲领和在一些国家——党卫队术语所称的北欧的日耳曼国家——掌握了推行占领政策的大权，党卫队和希特勒之间的裂痕就不可避免地明显化了。号召日耳曼族人志愿者参加武装党卫队的呼声，和纳粹集团在德国占领区内勾心斗角的喧嚣，促使希特勒任命党卫队头子为日耳曼国家的总管。希特勒的一项命令说：“所有同占领地区日耳曼民族运动小组就日耳曼民族运动共同事务进行的谈判，概由党卫队全国领袖负责。”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成立了一个“日耳曼领导小组”(GL)，由1938年下台的瓦尔纳·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的女婿、

瑞士人军医弗兰茨·里德韦格博士主管。日耳曼领导小组在挪威、荷兰、丹麦和比利时四国首都设立办事机构，建立了一个泛日耳曼的党卫队据点网。

各地的日耳曼领导小组办事机构给武装党卫队招兵买马，为普通党卫队征募日耳曼族人队员，主办训练所，收买出版社，办报纸，同当地对党的正式领导持反对态度的纳粹党领袖们建立联系。狂热的党卫队日耳曼分子们已经看到大日耳曼帝国行将出现。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戈特洛勃·伯格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武装党卫队中的日耳曼志愿战士……有一天将和日耳曼党卫队成员一道为建立日耳曼帝国打下基础。”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1942年10月8日领袖会议的记录记下了党卫队的纲领：“全国领袖受权主管整个日耳曼空间。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是，为领袖开辟道路，使他日后将各日耳曼国家并入日耳曼帝国。这些国家可以不放弃它们固有的民族特点和文化，进入我们的日耳曼帝国。”

但是，党卫队日耳曼分子的帝国幻想在独裁者的民族主义原始本能面前破灭了，他没有想到要给予这些日耳曼国家以党卫队领袖们愿意承认的起码自治权，因为多数德国占领国家从国际法观点上来说还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只要希特勒不想承认愿意给予这些国家在拟议中的“德意志民族日耳曼帝国”中拥有多大的民族主权，党卫队的大日耳曼宣传就必然毫无作用。

464 这不单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希特勒的沉默，在实际工作中也刺到了党卫队的一个痛处。由于希特勒拒不表态，武装党卫队征募人员眼看自己的工作被阿道夫·希特勒弄得瘫痪下来。日耳曼领导小组的报告越来越明确地提出，如果希特勒不立即用书面保证承认各日耳曼国家拥有民族独立，党卫队的征募工作就要完全停顿。地区总队长伯格在1943年就挪威的局势提出报告说：“同志愿者的接触已完全中断。尽管费尽力气，我们还是无法再

争取到志愿者，因为缺乏扩大人员的基础。”据伯格人说，挪威党卫队员一个月比一个月迫切地提出“这个老问题：战争结束后，我们算什么？”

伯格人绝望地逼着全国领袖请希特勒同被占领的挪威缔结和约。伯格人在1943年9月25日写信给希姆莱说：“由于我们必须充分发掘各日耳曼国家的兵源，我相信有理由可以将这个问题——虽然一度为领袖所拒绝——结合下一次征兵条例再次提出来。”这一次仍然被希特勒拒绝。直到后来他才同意让统治挪威的德国长官约瑟夫·特博文宣读了一份希特勒声明，用模棱两可的字眼答应不知在哪年哪月给予挪威人民以内政主权。党卫队领袖们没有被希特勒内容空洞的花言巧语所蒙骗。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三处和挪威日耳曼领导小组在一份联合报告中，记下了挪威人对希特勒声明的看法：“它是含混不清的，掌握了权力的人可以为所欲为。因此实际上没有任何改变。”

希特勒的沉默策略促使党卫队领袖们错误地自作主张，对日耳曼臣仆们在政治上许下诺言。早在1942年夏天，奥斯特兰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副总指挥耶克尔恩就答应拉脱维亚军官，“在大日耳曼帝国中拉脱维亚人民的阳光下的地位也”将得到保证。耶克尔恩还具体说道：“拉脱维亚现在就已得到了自治，它的文化生活没有受到限制，它的经济也在开始重新活跃。战争结束后，拉脱维亚肯定也能以类似的方法享有这种独立，并通过和德国合并又将在各方面繁荣昌盛。”<sup>①</sup>愤怒地制止党卫队领袖们在政治上自行其事。1942年8月14日，东方部副部长迈尔抗议道：“就拉脱维亚国家法律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在对外谈话中发表看法，这不是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任务。”

---

<sup>①</sup> 指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译者

465 耶克尔恩并不是意识到想要在占领区站稳脚跟就必须积极主动抵制希特勒的总命令的唯一党卫队领袖。其他担任长官的党卫队领袖，也在政策尚属容许和已引起独裁者愤怒之间的狭窄范围内活动。加里西亚行政长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奥托·古斯塔夫·韦希特尔主张让波兰人休养生息，虽然最高当局的命令要求他驱逐波兰人以利于安置德国移民。他的同事、驻白卢西尼亚专员库特·冯·戈特贝格支持俄国人自治，虽然希特勒谆谆训诫，任何内部自治都将危害德国的统治。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加里西亚和白卢西尼亚这几处已经将党卫队的历史直接导致1944年7月20日事件的最后一场大型戏剧联在一起。没有任何一场戏剧象它一样削弱了希特勒和党卫队之间的联系，并促使一些黑色集团领袖心情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这场大型戏剧就是：对俄作战。

希特勒的俄国方案和党卫队领导机关的俄国方案本来是完全一致的。双方都想将这块俄国“大蛋糕”切成小块，大量减少东方各族人民，从而将腾出的空间用来安置德意志移民。党卫队世界观教官们污蔑千百万斯拉夫人为没有文化的起着害虫作用的劣等民族。伯格尔的中央技术管理局的世界观工厂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劣等民族》）明确告诉党卫队员，为什么斯拉夫人根本就不是人。“劣等民族，即从生物学观点来看外貌完全相同，长有手、脚和一个脑袋，有眼睛和嘴巴，”这本小册子说，“但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可怕的生物，他们刚具有人形，面貌和人相似——精神上、心灵上却低于任何一种动物。这种人的内心贪得无厌，无所不用其极；疯狂的毁灭狂、最低级的性欲、赤裸裸的卑鄙无耻。”

特别行动队的屠杀，秘密警察集体枪杀苏联战俘，武装党卫队连队和士兵对俄国老百姓的暴行——它们都证明，小册子字里行间的話都是极其真实的。党卫队成为德国占领的俄国的鞭子。

黑色集团的千万双眼睛警惕地注视着，不许任何德国士兵同斯拉夫劣等民族友好。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谍报员和分遣队竭力阻止德国军方和行政官员试图向东方居民作出给以政治自治的任何许诺，来吸引他们拥护德国。希姆莱已经把这种企图看作是对德国东方使命的背叛。谁要是在反苏十字军征战中准备接受俄国人作为支助者，或者甚至作为地位平等的盟友，在希姆莱眼中就是破坏了德国的东方统治纲领。他理所当然地要消灭一切支持东方自治的苗子。特遣队解散了经武装部队批准建立的乌克兰民族政府，并逮捕了它的领导成员；保安警察在白俄罗斯消灭了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小组，纳粹党区领袖库贝（冯·戈特贝格的前任）准备用这个小组建立白俄罗斯政府；党卫队领导机关拒绝苏联被俘将领提出的同德国人联合反对斯大林的一切建议。 466

但是，即使最严格的意识形态专家的警惕性也无法阻止德国人面对着俄国的现实。流血最多、最能使人清醒的两年俄国战争足以无情地驳斥劣等民族的谎言。早在1942年8月，保安处就在一份《全国简报》中记载道，在德国人民中“产生了一种感觉，即我们成了某种欺骗的牺牲品。〔苏联的〕大量武器，它的技术质量，大规模的工业化，这些都是叫人感到惊讶的第一个印象，它同过去描绘苏联形象的基本论点截然相反。人们心里想，布尔什维主义怎么能做到这一切的？”

武装党卫队领袖们首先激烈攻击制造劣等民族谎言的人。日日夜夜在泥泞的地里和尘土中打滚，再一次告诉党卫队步兵跟俄国人作战是什么滋味。再也抑制不住对意识形态专家们所制造的谎言的愤怒，人们向全国领袖痛心疾首地上条陈。“维京”师长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向希姆莱提出，只有给予象乌克兰人这些民族以自治并让他们和德国军队并肩同苏联敌人作战，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希姆莱拒绝：“您别忘了，这些‘亲爱的’乌克兰人在1918年

杀害了冯·艾希霍恩<sup>①</sup>陆军元帅!”当冈特·达阿尔克文领导的党卫队自己的战地记者科开始抨击已经变得荒谬可笑的劣等民族教条,并要求修改欧洲方案时,希姆莱表示反对“关于也有乌克兰人和俄国人参加在内的欧洲共同体的愚蠢空谈”。希姆莱说:“我断然禁止党卫队以任何一种方式……随声附和走这条……领袖一贯反对的路子。”

希姆莱不仅害怕整个世界崩溃,他也害怕挨独裁者责骂,独裁者禁止接受东方各民族的任何民族愿望。单是为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自治声明之争,就弄得党卫队头子跟希特勒处于对立。

这场争吵起因于希姆莱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三国为武装党卫队募兵的计划。由于他的国际法学家向他提出,要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进行普遍动员,必须改变占领状况,因此希姆莱主张给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自治。同意三国在大德意志国家的“保护统治”下享有自己的主权,但三国的军事和外交仍继续由德国控制。希姆莱的计划没有能在领袖大本营内获得通过。1943年2月8日,希特勒在全国党务书记官鲍曼的掌声中拒绝了希姆莱的自治方案,鲍曼看出,加强党卫队就等于削弱党的机器。

但是,明智的策略使党卫队愈来愈卷入德国东方占领政策的问题,并使反俄的党卫队教条被东方的现实所粉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自治之争的继续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在拉脱维亚前战争部长鲁道夫·班格尔斯基的领导下,波罗的海地区有大批志愿者涌进武装党卫队,以致使希姆莱认为,应该为他的波罗的海旅再次进行自治之争。1943年11月,他又谒见领袖,希特勒再次不予同意。东方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在日记中写道:“在交谈中领袖也多次插话指出,他当然决不能放弃这几个国家。他心中也反对在困难的

---

<sup>①</sup> 艾希霍恩(Eichhorn, Hermann von, 1848—1919), 1915年指挥第十军团对俄作战, 1918年任“基辅”军团司令。——译者

时候作出这样大的迁就姿态。”

希姆莱再次碰了壁，但是有如美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达林的判断，“党卫队这一回同‘反东方的’立场的首次决裂，开创了一个重要先例。”从东方居民群众中罗致党卫队新的兵源的胃口已经大开，现在再也无法抑制：劣等民族理论家希姆莱步步后退，他同意这些民族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党卫队——从事抢劫掠夺的日耳曼人纵队。

继波罗的海人之后轮到了乌克兰人。早在1943年春天，加里西亚行政长官、党卫队旅队长奥托·韦希特尔博士就开始建立一支由应征的乌克兰人组成的“加里西亚”党卫队志愿师。希姆莱对此表示同意，因为对于他来说，加里西亚和乌克兰民族主义是两回事：加里西亚包括西乌克兰地区，过去是属于奥匈帝国的，它向来以同德国友好而著称。

但是，当乌克兰志愿报名者一下子达到十万人时，韦希特尔呈请希姆莱将“加里西亚”改名为“乌克兰”。希姆莱吃了一惊，心想这种叫法听来长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志气，无异于背弃德国东方殖民事业。领袖将会怎么说呢？1943年7月14日希姆莱命令：“致中央各主管处（局）长。在提到加里西亚师时，我禁止在任何场合用乌克兰师或乌克兰民军的叫法。”韦希特尔反对。他于7月30日写信给希姆莱说：不给师以“乌克兰”番号，无异于德国试图使乌克兰人灭族，而这是不符合德国利益的，因为这将削弱乌克兰人抵制布尔什维主义的引诱活动。希姆莱坚持他的命令，不过同时也答应不处分使用“乌克兰”这一概念的人。当韦希特尔再次提出不同意见时，党卫队头子不再给他复信。但到了1945年，他拆除了思想战线上的障碍：希姆莱同意加里西亚师打出“乌克兰国民第一师”的旗号；乌克兰将军山德鲁克成为首批穿上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制服的第一批“劣等民族”的人物之一。

这时，其他东方民族不断获准参加党卫队。俄国冒险家卡明斯基率领一个旅加入了乌克兰人的队伍。继卡明斯基旅之后是一个白俄罗斯党卫队师，而陆军中将冯·潘维茨带领所部哥萨克部队投奔党卫队，在武装党卫队行列里于是也出现了回教徒。劣等民族教条如此戏剧性地破产，终于吸引来了一大批东方通的军官、上层纳粹和俄国迷，他们两年来徒劳地为大德意志的政治领导和经济领导提供了一件秘密武器，指望靠这件武器给东方战役带来决定性转机。

陆军总参谋部和谍报军官们早就提出，德国必须利用大批苏联战俘建立一支俄国解放军；通过给予未来俄国以充分主权的保证，使这支解放军反对共同的苏联敌人——不是作为“自愿效力者”(Hiwi)，而是作为和德国地位平等的盟友。出于一次偶然事件，这支俄国军的领袖也给策划者送上门来：1941年冬季战役中莫斯科守卫者、驻沃尔霍夫苏联第二突击军军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中将于1942年被德军俘虏。战俘弗拉索夫中将声明愿意同德国人一起进军反对斯大林。在那些敢于自己负责的年轻德国军官的支持下，弗拉索夫开始在战俘营里招兵买马。这位将军发表了几次讲话后，正如他意料的那样就有大批战俘保证参加。

可是，弗拉索夫军的计划在独裁者的嘲笑和发怒中破灭了。希特勒不许同俄国民族主义者缔结任何协定，这种协定会干扰纳粹领袖一味着眼于压榨东方空间的殖民政策。希特勒在1943年6月8日说：“我决不建立一支俄国军。这是极端的欺人之谈。我们中间任何人都不要以为我们只需要建立一个……〔俄国人的〕国家，那样就万事大吉了。那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百万军队。我们什么也不会得到的，一个人也不会得到的。我们倒是会变得神经错乱。”

弗拉索夫在军方的朋友们投降了。只有一小撮不可救药的俄



国迷继续相信可能开展弗拉索夫运动。他们中间有一些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民族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几个军官和一个名叫梅利塔·维德曼的女人，这个女人没有泄气，一再把她的英雄弗拉索夫介绍给第三帝国有影响的人物。梅利塔·维德曼出生于彼得堡，曾任戈培尔机关报《进攻》编辑部秘书，又是反共产国际宣传刊物《行动》的主要撰稿人，她想起了一个绝境逢生的办法：弗拉索夫运动只能从它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即党卫队那里得到帮助。这个女记者凭着对纳粹有坚定的现实感物色了一位党卫队领袖，她相信这个党卫队领袖有勇气不顾一切阻力，支持弗拉索夫运动，这个人就是加里西亚行政长官韦希特尔。维德曼夫人在她父母的家中安排了弗拉索夫跟韦希特尔的会晤。这位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对这个俄国人很器重，答应给予帮助。

但是，希姆莱不能断然背离自己的教条和领袖的命令。希姆莱说：“我们决不可以同意这个俄国将军的想法，因为这样我们会给自己搞成一个新的、甚至可能是由我们组织起来的俄国。”希姆莱对弗拉索夫的朋友们小心谨慎地提出的辩驳不加理睬，这时梅利塔·维德曼急躁地继续活动。这个卡珊德拉<sup>①</sup>给黑色集团显赫的大头目写信和上条陈，推着这个死抱住自己的老教条、打哆嗦的头子前进。

“对东方各民族、特别是对俄国人所持的劣等民族理论，已经为实践所否定，”维德曼夫人在1943年5月26日给希姆莱的信中说。“他们善于作战，他们为自己的祖国牺牲一切，他们制造出一部〔分〕武器，至少跟我们的一样好……为了调动德国的千百万东方工人群众和以后的前方千百万东方部队陆军，绝对必须收起我们宣传中的劣等民族理论。”她在1943年10月5日写道：“我们的劣等民

<sup>①</sup>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能预卜吉凶。这里喻维德曼。——译者

族口号给斯大林进行民族战争帮了忙。对我们恨之入骨……另一方面铁的事实是，整个俄国农民，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整个中、高级和最高级红军军官团是布尔什维主义、特别是斯大林的敌人。但是这些人已经被我们的政策逼到必须作出悲剧性的抉择：或者为斯大林战斗，或者把他们的人民，从而也把他们自己听凭一个行将被消灭的、被掠夺的殖民区域的命运摆布，这个区域的居民被宣布为劣等民族和世代代被贬为从事奴隶劳动，实际上，他们是有才干的白种民族。”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执行一种新的德国东方政策，建立东方民族国家，建立一支俄国解放军。维德曼夫人鼓吹说：“真正的危险在于一味墨守成规，不能看清战争时乖命蹇的根源。”

470

当这位卡珊德拉有意亲自向党卫队头子面陈自己的想法时，希姆莱没有敢领教她那泼辣有余的迷人风韵。象经常遇到处境尴尬时的情况一样，希姆莱拿出希特勒的命令作为挡箭牌。“在具体问题上，”他指示秘书鲁道夫·勃兰特给维德曼夫人写信说，“我不想作进一步研究，因为我可以告诉您，领袖对弗拉索夫一事刚刚提出了明确的既定方针。”

弗拉索夫运动在党卫队里注定要遭到彻底失败，如果不是党卫队首席战地记者、旗队长冈特·达阿尔克文把他抓起来的话，他掌握了诀窍，能够用震荡症治疗法加上狡诈机智，使希姆莱一步步脱离领袖的反俄思想。在1943年9月同机飞往前线的途中，这个全国领袖给他看了《劣等民族》小册子。达阿尔克文考虑了一会儿，接着又着重提到了这个性格乖张的党卫队同胞。他咕哝着说，这种文章是“破烂货”。达阿尔克文骂道：“我们的人在外面不知道自己的屁股该坐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对您老实讲，如果我们的人在这里看到这种小册子，您可以相信我，他们一定会直截了当地大声问：他们叫我们遭到这么大的损失，坦克比我们的还好，而且战

略战术也完全是高水平的，这难道是所谓劣等民族？我们这种主宰民族岂不又是太蹩脚了么！这种劣等民族给自己的国家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他们怎么会让自己被别人打败。”

希姆莱反问道：“这是一种什么语调？”

达阿尔克文说：“全国领袖，这是我现在到处听到我们的人讲话的语调。我们不可能在打了两年仗之后，再用这种理论同我们相持的对手作战了。”

希姆莱生气地中断了谈话。但党卫队头子在继续考虑达阿尔克文的抨击，几天后他就召见了这位首席宣传员，授权他去前线配合弗拉索夫运动的成员对苏联进行心理战，当然只是限于在希特勒所批准的框框之内——这就是许诺苏联投诚者加入一支俄国解放军，但这支军队并不存在，而且根据希特勒的意愿永远也不许存在。

达阿尔克文心里保留着对这一方针的看法，着手进行工作。在劣等民族教条的另一个批评者、副总指挥施坦因纳部队的阵地上，达阿尔克文开始了他的第一批包括多种宣传的“冬天的童话行动”，成功地吸引了大批军队向德方投诚。“冬天的童话”同时也给希姆莱的意识形态防线打开了一个缺口，他在自己的私人宣传助手的理由面前渐渐地作了让步。达阿尔克文可以把弗拉索夫阵营里日益重要的人物拉进他的宣传大军，直到旗队长终于能劝说他的头子也向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伸出结盟之手。“这个肉店伙计是个危险的布尔什维克，”1943年10月希姆莱还曾这样大声叫喊过。一年以后，他的想法不同了。全国领袖批准弗拉索夫成立两个俄国师，并写信告诉这个过去的“劣等人”：“我祝愿您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取得圆满成功。”<sup>471</sup>

虽然希姆莱永远摆脱不了害怕的心理，害怕领袖将会再次责

怪他同俄国民族主义者弗拉索夫谈情说爱，但前苏联将军和党卫队之间在预示纳粹众神末日来临之际的结盟，却使党卫队成为所有对德国东方政策能改弦更张还抱有幻想的人的最后救生圈。希姆莱本部档案里一份份条陈和卷宗说明，纳粹内部批评希特勒征服政策的人物认为，唯一的改革工具只有党卫队了。同时条陈也对纳粹政权的处境和能力勾划出一幅悲惨的图景。

梅利塔·维德曼再次敦促说：“弗拉索夫行动进展的速度，和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方法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种优柔寡断和坐失良机的速度。”白卢西尼亚专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冯·戈特贝格的语气更加沮丧地写道：“我要指出，从1941年末至1942年初的冬天起，我就一再口头和书面提醒必须改变所采取的根本措施。因为依我看，只关心自己眼前处境的东方各族人民的心情，恰恰构成了迅速结束东方战争的有利条件，其有利的程度肯定是一个……国家从未遇到过的。”

谴责德国占领政策最激烈的是前纳粹党区领袖、克里木专员阿尔弗雷德·E·法劳恩菲尔德。他使用了十分苛刻的语言，以致使尖锐抨击纳粹政权的纽伦堡检察官罗伯特·肯普勒后来也出乎意料地惊呼道：“您的这些话真是写得妙极了。”法劳恩菲尔德认为，德国占领政策是“错误处理的杰作，而且是有目共睹和不可思议的行动，即在一年之内将一个绝对亲德的、视我们为救星的民族当成游击队，赶进了森林和沼泽，从而对东方事态的进展大大起了消极影响”。这个纳粹党区领袖批评说：“一种不顾一切后果的残酷无情的方针……采用前几个世纪对待有色奴隶民族的方法……对一切明智的政策嗤之以鼻……证明了在对待异民族中毫无直觉感……自欺欺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说明，外表残暴和显示主宰民族威风的人，骨子里却是多么无能的庸俗之徒。”

全国党务书记官鲍曼也将法劳恩菲尔德的这个条陈送给希姆

莱看，它们的内容同样是批评党卫队反斯拉夫的教条。希姆莱在1944年3月26日记下了自己的看法：“法劳恩菲尔德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最虔诚的身穿党卫队制服的纳粹分子，也愈来愈看到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悲剧，这个国家根本不懂得掌握最简单的心理战规律。无力进行改革，陷于掌握政权的派别集团的作茧自缚的斗争，东西两线受到盟国日益强大的打击，希特勒德国就这样摇摇晃晃地走向没落。

但是，德国的局势愈是每况愈下，党卫队领袖们就愈是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即在阿道夫·希特勒身后是否还有前途的问题。保安处编印的《全国简报》清楚地说明，德国人要求和平和结束希特勒的荒谬的战争。

1944年2月10日《全国简报》：“虽然敌人愚蠢笨拙到极点，还是愈来愈使我们遭到沉重打击，人们无法想象我们究竟将如何完全摆脱敌人，经常听说他们已经和将要彻底被击溃。”

1944年4月6日《全国简报》：“在等待入侵和报复以及等待东方局势出现转机的长期不安定情况下，人们十分担心，如果我们现在无法继续坚持下去，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到处纷纷议论一个问题，战争要求、并且还将继续要求付出许多惨重的牺牲和痛苦，这是否值得……人们逐渐越来越渴望和平。”

党卫队领袖们能够看到保安处的这些有关民心的秘密报道，而不考虑一旦他们过去相信的一切彻底崩溃时党卫队将怎么办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党卫队领袖们早已开始想象不能想象的事情了。对有些人来说，似乎设想一个没有希特勒的德国已不再是革命的了。战争已经打破了党卫队领袖们的许多幻想，政权的现实，特别是东方的战事，摧毁了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党卫队之间的完全一致性。即使是党卫队领袖们也无法回避1944年德国每一个当权者面临的问题：是否应该为了取悦一个犯罪的国家领导而

完全毁掉祖国。

不过，要是说党卫队对德国命运问题看法一致的话，那它就不成其为党卫队了。从要求推翻希特勒到盲目死保政权，都有权威的  
473 党卫队领袖在提出答案。最明显的有五派：团结在中央刑事警察处长阿图尔·奈比周围的一小派，这派的志同道合者多年来就同德国国内抵抗运动合作，有的人是1944年7月20日密谋活动的真正参与者；武装党卫队的高级将领，他们反对谋刺希特勒，但愿意联合武装部队解除希特勒的作战指挥权，同西方盟国签订停战协定；以保安处长瓦尔特·施伦堡为首的一派，希望暂时争取希姆莱同意和盟国单独媾和，并愿意必要时把希特勒交给盟国；包括从瓦尔纳·贝斯特到奥托·奥伦道夫的一大批高级党卫队领袖，他们反对任何在战争中用暴力改变政权的作法，但相信可以在战后对政权进行改革；以海德里希的继任者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和秘密警察处长海因里希·缪勒为中心的至死不悟的狂热分子，他们即使对批评政权的片言只字，也要疯狂地进行迫害。

团结在奈比周围的反希特勒派的活动可以追溯到1938年，追溯到苏台德危机的高峰时期。在这次危机中，反纳粹的陆军将领们首次认真考虑，计划发动军事政变和除掉希特勒，以阻止灾难性的进军。当时，反对派政务参议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博士介绍自己的朋友阿图尔·奈比参加了一个抵抗运动小组，退职的贝克大将和谍报局军官汉斯·奥斯特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刑事警察头子、后来任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和德国中央保安局处长的奈比参加进来，并不是没有疑虑和顾忌的，因为他根据同奥斯特和贝克秘密会晤中所遇到的情况来看，这位有经验的刑事警官认为，他们从事密谋活动简直太不老练了。

这些密谋者非常轻率，仿佛在半公开地策划搞掉希特勒，奈比则与此相反，采取不留痕迹的手法。他从来不坐公家汽车去跟密

谋者碰头；他把车子停在一条偏僻的街上，反复观察接头地点周围的情况，然后突然出现在密谋者中间。性格率直的抵抗运动头子戈台勒甚至不知道这个党卫队领袖的姓名，德国国内反对派得到的来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情报，都是由他提供的。每当奈比参加秘密会议听到戈台勒要来时，细心胆小的中央刑事警察处长总是懂得及时回避。

不论是什么动机促使奈比参加抵抗活动，是担心自己的前途，还是国家考虑，他始终忠于反对派。早在1941年末，担任特别行动队队长的奈比就认为，谋杀希特勒是脱离纳粹政权和与自己的罪行实行决裂的唯一可能的办法。从此以后，他鼓励抵抗分子刺杀希特勒，他为一再计划、也一再停止执行的每一次政变方案准备一个刑事警察分队，该分队的任务是在举事的那天，将密谋者的陆军部队悄悄地领入柏林政府各部。这些准备工作要求争取更多的穿党卫队制服的警察机构的干部参加政变。奈比找来了他的朋友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中央刑事警察执行科长汉斯·洛贝斯，同时在秘密警察方面也拉到了另一名反纳粹者：后来担任党卫队旅队长的保罗·康斯泰因。

474

1937年，康斯泰因担任了柏林秘密警察处领导职务，变成了所有反纳粹政变计划的关键性人物。他这个党卫队队员改善了两个重要密谋者之间最初存在的紧张关系，即柏林警察局长沃尔夫·冯·赫尔道夫伯爵及其副手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伯爵。康斯泰因做好工作，以确保柏林警察至少配合密谋分子出击。政变分子感谢他的活动；要是1944年7月20日政变成功，前秘密警察官员康斯泰因肯定当上了希特勒以后的德国的新保安警察头子。

同这个柏林党卫队小组保持松散接触的，还有一些互不联系单独活动的党卫队领袖。例如，在赫尔曼·戈林的电讯控制的气

象研究局工作的高级政府参议、二级突击队大队哈特穆特·普拉斯，他提醒密谋分子注意秘密警察的反监视；例如，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马匹补充处处长、1941年起任冯·伦斯德陆军元帅副官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汉斯-维克托·冯·扎尔菲阿蒂伯爵；党卫队领袖、总督辖区政府劳动总局（相当于劳工部）局长老党员马克思·弗劳恩多夫。他们之间之所以能结成一伙并和党卫队内其他抨击希特勒的人所不同的地方，是对蔑视人类和作茧自缚的狂妄自大的政权怀着深恶痛绝的正义感，是良心上抗议不负责任的政治权术。以勤于写日记而闻名的冯·哈塞尔对党卫队员弗劳恩多夫印象很深，说他“对他在波兰每天每时的所见所闻绝望已极，情况非常可怕，以致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在同海因里希·希姆莱王国里的领袖们进行无声的合作中，一些抵抗分子想到，必须设法从举事的那天能在决定成败的这个危险机构中争取更多的干部。卡纳里斯就曾经说过，在这么多次刺杀希特勒全都失败之后，唯一的办法只有设法找希姆莱“晓以大义进行谈判”，争取他支持反独裁者。陆军元帅冯·包克也表示，只有希姆莱参加政变，他才和大家一起干。

不久，戈台勒求教于自己的朋友瑞典银行家雅可布·瓦伦堡。瓦伦堡问：“希姆莱知道你们的活动吗？”戈台勒答：“我不清楚。”后来这位瑞典人听说，人们放弃了一次刺杀希特勒的好机会，因为计划同时刺杀的希姆莱不在场，这时他劝告戈台勒：“切莫把希姆莱列入你们的行刺计划。如果目标只对准希特勒一个人的话，他不会阻碍你们的。”

1943年秋，密谋分子冯·德·舒伦堡到党卫队中央机关来摸清情况。他向日耳曼领导小组的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里德韦格，可以和哪个党卫队领袖坦率谈谈政治局势。里德韦格告诉伯爵找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希尔德布兰特，以及副总指挥豪塞尔和施坦因



纳两位武装党卫队将军。施坦因纳过去是舒伦堡的第一步兵团连长，舒伦堡早已同他有过接触。在柏林的一家咖啡馆里，密谋分子向这位党卫队将军表示，如果想要使德国免遭覆灭的话，必须用武力干掉希特勒。但是施坦因纳没有赞同他旧部下的劝说。他反驳舒伦堡说：东线已经彻底垮掉了，西面盟军随时可能发动入侵，在这种时刻要改变体制，只有整个武装部队支持政变才有可能，而这一点恰恰很成问题。不过一些密谋分子并不相信这是党卫队将军们的定论。乌尔里希·冯·哈塞尔的女工作人员玛丽-路易泽（“普皮”）·扎雷知道：“武装党卫队的民族社会主义精神越来越靠不住了。他们感到和作战的武装部队同病相怜。”乌尔里希·冯·哈塞尔的女友说对了。几个星期以后，施坦因纳及其参谋长党卫队区队长约阿西姆·齐格勒已跟梅利塔·维德曼进行了历时三天的会晤，讨论怎样搞掉希特勒的问题。他们有一个大致的设想：由施坦因纳的第三日耳曼装甲军开赴东线时，将希特勒在其驻地狼穴加以“劫持，并公开历数他的罪行，宣布他患了精神病”，这是维德曼夫人的说法。一年后，武装党卫队领袖们也向抵抗分子真正交了底：他们已向陆军元帅隆美尔保证，同他一道脱离希特勒。但1943年他们还不愿意这样做，因此舒伦堡没有取得成功。

政治学教授詹斯·彼得·耶森博士也同样没有获得成效，他力图争取过去的学生和朋友、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三处处长、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奥托·奥仑道夫参加密谋活动。耶森和奥仑道夫曾经一道为民族社会主义而同别人论战，但希特勒的战争和堕落到参与国家政治罪行使这两人分道扬镳。原则上他们都坚持他们所想要的民族社会主义，然而两个聪明人在一个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即一个已经发号施令屠杀了千百万人的、现在还要把祖国断送在一意孤行到底的独夫手里的政权，是否还值得任其继续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前特别行动队队长奥仑道夫的回答是肯定的，

虽然他象密谋分子耶森一样，也对这个第三帝国的许多现象抱有反感。宣传部发言人弗里茨彻后来供称，这位《全国简报》的编辑在纳粹圈子里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传声筒，否则反对派就没有发言的余地”，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他由于支持被取缔的通神论者，而一再受到秘密警察缪勒的怀疑；他同反纳粹银行家威廉·阿尔曼是莫逆之交，后者由于被查明他同谋刺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有接触，日后自杀身死；他私下草拟了建立一个实际上剥夺纳粹党权力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远景计划。他收集前线青年士兵的抨击性战地书信，同写信人保持联系，并考虑建立一个以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和士兵为主要代表、以经过纯洁化的纳粹党为辅的战后政权，这个纳粹党不再拥有强权政治和行政命令的职能，而是仅仅起“智慧庙宇”、起政治专家顾问团的作用。

尽管有这样一些考虑，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奥仑道夫还是不能设想，德国可以不是纳粹党的王国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谁怀疑这一点，在奥仑道夫看来，就是对祖国和“民族共同体”犯了弥天大罪。他直到被关在纽伦堡死牢里，还在1948年怒斥“否定自己过去、并以叛变和谎言掩饰曾对领袖宣誓效忠的许多人”。他的愤怒也是针对他过去的战友耶森的所谓变节行为的。当教授后来落入秘密警察的掌心时，奥仑道夫完全坐视不救。在詹斯·彼得·耶森站在绞刑架下的那个不眠之夜使奥仑道夫不能忘怀——也不能忘记自己出于内疚而作的誓言：今后从供养自己家小的薪金中，拿出一部分来供养耶森的家小。

赫恩和贝斯特，还有斯图卡特和施特雷肯巴赫，跟奥托·奥仑道夫的反应一样：他们几个人，谁也不能摆脱希特勒始终还在起作用的蛊惑宣传，谁也不能防止灾难和没落。虽然他们也部分地看出自己所梦想的民族运动的领袖国家变成了什么样子——但他们终究不能抛弃一种充满幻想、谬误和罪恶的生涯。

只有一个党卫队领袖没有丝毫犹豫和具有卓识远见，他焚毁了他和他的同事们过去顶礼膜拜的一切，他密切注视着反纳粹阴谋者的一举一动，并将其纳入自己的计划：在灾难过去的那一天站在拯救的岸上。这个党卫队领袖就是旅队长瓦尔特·施伦堡。

他从1941年6月担任保安处国外情报机构领导职务起——最初任副处长——，就对德国取得全胜的前景持怀疑的态度。保安处的情报使施伦堡十分现实地看到，敌人坚持战斗日益顽强的印象和保安处头子一相情愿的想象完全是两码事。从1941年秋起，他就开始小心地、但尚未毅然地试探同西方盟国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在试探过程中，施伦堡也利用了一派反纳粹抵抗分子，这些人从战争爆发以来就通过国际渠道和盟国或亲盟国的外国人在进行秘密谈判。一些奇特的偶然情况，把这些反纳粹者跟党卫队领导人物联系起来。柏林律师卡尔·兰格本博士是贝克—戈台勒反对派小组的成员，他通过自己女儿和希姆莱女儿古德龙的同学关系，跟党卫队头子发生了接触。耶森教授是主张推翻希特勒的最积极人物之一，他一如既往同党卫队领袖赫恩来往——他曾经把自己的学生奥仑道夫推荐给赫恩。连冯·哈塞尔也以自己同全国领袖有点关系而自豪：他的管家舒克内希特在希姆莱身边当差。

施伦堡认为，插手反纳粹分子同外国举行的秘密对话是有好处的。1941年夏末，美国银行家斯托尔福思到达柏林，明确告诉乌尔里希·冯·哈塞尔等德方对话者，只有德国人干掉希特勒，美国总统罗斯福才会向德国人伸出手来；保安处不动声色地听了这位美国人的谈话。德国中央保安局国外保安处D组勤勉地记录了哈塞尔和他的美国伙伴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1941年11月11日，该组记录了斯托尔福思用电话发给他的女秘书博恩塞尔小姐的指示，“请她通知冯·哈塞尔先生（事前约定公开称霍韦），他的方案已非常顺利地接受。请冯·哈塞尔先生通知他是否能同任何一位

有权威的人士赴里斯本一行，以便在该处同美国领导人士会晤，进行会谈”。施伦堡手下的人对于截获哈塞尔和斯托尔福思用事先约定的代号和缩写字母写的信件，能够毫不费力就看懂内容。D组解释说：“‘南来者’代表墨索里尼。Ph.指美国驻罗马大使菲利普斯。”

保安处的先生们相信跟反对派的秘密谈判，他们可以直接同这位美国中介人对话。当密谋分子冯·哈塞尔看到保安处人员丹费尔德前来见他，声称转达斯托尔福思先生的衷心问候时，他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惊奇神情。哈塞尔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年轻的党卫队员对外交消息特别灵通，判断问题准确，谈吐异常直率。他坐了一个半小时，并坦率地说，自己出于小心谨慎的原因没有听从他的话。从种种情况来看，希姆莱圈子里的人忧心忡忡，正在考虑出路。”

但是施伦堡认为，现在还不是向希姆莱陈述自己的深远计划的时候，德国军队还驰骋在俄国国土上，节节胜利；希特勒是否能迅速结束战争，在俄国的这一仗是决定性的关键。在1942年4月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之行中，施伦堡向文策尔（驻马德里）和施罗德（驻里斯本）两位警务随员说，明年夏天将决定大局；在俄国南方和在埃及两处的德国军队如能突破，战争就决定了胜负，反之德国就输光了。

盛夏时节，两处战役传来的消息每况愈下，这时施伦堡知道自己该拿定主意了。他在自己回忆录中述及，早在1942年8月，保安处头子就在希姆莱设在乌克兰文尼察的战地指挥所问希姆莱：“全国领袖，您在自己的哪张办公桌抽屉里放有结束战争的抉择性方案吗？”

希姆莱：“您怎么突然发疯了？您神经失常了吗？”

施伦堡：“全国领袖，我知道您会作出这样反应的。我甚至相

信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反应呢。”

希姆莱——施伦堡继续记述道——冷静下来了，并叫保安处头子拟订一个计划。施伦堡建议，必须立即利用俄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刻，着手同西方盟国秘密和谈；不过先决条件是必须搞掉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他在西方被认为是“战争的罪魁祸首”——美国人斯托尔福思也证实了这一点。希姆莱对他的谍报头子的计划表示赞同。施伦堡回忆说：“他甚至握着我的手保证，里宾特洛甫最迟不出圣诞节（1942年）就一定会下台。”

不论采用什么形式谈判都无关紧要，事实是，在希姆莱保健医生费利克斯·克尔斯滕和党卫队全国领袖私人本部处长、副总指挥卡尔·沃尔夫协助下，施伦堡和希姆莱从1942年夏末起就已认真设想同西方单独媾和，其中内容也包括搞掉希特勒。长时间以来，希姆莱热衷于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想法，即一旦战局恶化时，他是否能取代希特勒给德国和世界带来和平。每次考虑到这一点时，又随即自己作出否定——不行，党卫队全国领袖决不能不忠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慧。但这种具有诱惑力的想法又一再地折返纠缠。还在1941年5月，瑞士人布克哈特就告诉前大使的妻子、铁比茨的女儿伊尔莎·冯·哈塞尔：“希姆莱的一个心腹去找过他，问他英国是否有可能愿意不同希特勒而同希姆莱媾和。”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于1942年4月9日在日记中写道：“希姆莱早先是那个过激分子，而今天却按摩着人民的脉搏，希望妥协和平。”

479

在后代的人看来，这是一个荒谬绝伦的设想，即党卫队头子、本世纪犯有最残酷罪行的凶手竟会真心实意相信世界能同他进行谈判，以缔造和平。对此，同时代的人当年却是另一种看法：正因为他们相信希姆莱有权力，他们希望他坐到谈判桌上来。有些政治家，就象西班牙外交部部务主任何塞·玛利亚·杜西纳凯那样，持有这样的论点，只是他们没有说出来罢了。杜西纳凯把希姆

莱看成是“那些寻求跟盟国达成和平解决，以防止苏俄入侵的人物之一。人们完全同意，为此必须搞掉希特勒及其最核心的领导集团。希姆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此他的手里掌握着开启和谈之门的钥匙。”

但是，希姆莱在这种抛弃领袖走自己的路的不道德想法面前缩了回去。况且，他在1942年夏天就掌握了一项武器，必要时可以用它来叫独裁者下台：一份长达二十六页的病状报告书。报告书说明希特勒患有花柳病后遗症，并有逐步转向麻痹的危险。希姆莱向自己的保健医生克尔斯滕提出了类似奈比有一天夜晚在同中央刑事警察处刑事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散步时提出过的问题：“医生，您告诉我，能够说领袖是害了精神病吗？”克尔斯滕直截了当地回答希姆莱：阿道夫·希特勒应该马上进精神病院，而不应该待在领袖大本营里。这位全国领袖别转身子，他没有勇气作出明确的决断。希姆莱说：“党卫队的武装带上铸有‘忠诚是我的荣誉’字眼，我身为党卫队全国领袖怎能去反对领袖呢！”

施伦堡可没有这样的疑虑。他着手发动一次战役行动，通过许多渠道以达到两个目的：同美国机构对话和甩掉里宾特洛甫这个包袱。旅队长争取了一些五花八门的人物，积极为他的计划活动。施伦堡鼓励贪污腐化的外交部副国务秘书马丁·路德反对里宾特洛甫；他派抵抗分子兰格本去中立国同盟国进行接触；他通过“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书记、野心勃勃的党卫队区队长弗里茨·克拉内富斯能够利用该社的实业家们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他还请欧洲大贵族成员之一的马克斯-埃贡·霍恩洛厄-兰根堡亲王作顾问，这位亲王在施伦堡的亲信人员名单上的代号是144/7957。

亲王生于1897年，退役少尉，同西班牙贝尔维斯·德拉斯纳瓦斯侯爵夫人结婚，居住在西班牙多年。该家族奉行保持业主权利的方针，促使亲王与保安处保持密切的关系。霍恩洛厄家族在

苏台德地区拥有大庄园，需要确保它们不受本世纪的动乱及其变迁的影响。这一原因促使信奉天主教的亲王在1938年苏台德危机中也支持希特勒，并自愿以其并非微不足道的外交才能为保安处效力，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原因也促使他在战争中早就竭力探测和平调解的机会，和平调解可以确保霍恩洛厄家族在苏台德地区的产业。

当然，单是亲王的业主本能还不足以解释何以霍恩洛厄之所以能在施伦堡的这台戏中扮演的角色；马克斯-埃贡·霍恩洛厄还是欧洲一段时间内典型的外交权术和贵族政治的象征——并非没有影响的是，霍恩洛厄家族在十九世纪出了一个德国宰相、一个德国元帅、一个罗马天主教会红衣主教、多名奥匈帝国陆军中将、普鲁士和巴登将军、符腾堡的世袭德国将军以及俄国皇帝的将军衔侍从武官长。马克斯-埃贡·霍恩洛厄亲王也相信旧欧洲列强音乐会，他并非不乐意地利用高级纳粹干部向第三帝国当权者们陈述一些真实情况。

“德国做这种事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基于对情况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而且不论怎么说都是失算的，”他在1939年9月呈送赫尔曼·戈林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说。“它不认为英国和法国在战争中会支持波兰。它没有看到，问题不是关系到波兰而是关系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即关系到维护和确保欧洲的安定。”他毫不客气地要求，人们必须“着眼于大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看来为时已晚。这种解决方法必须包括：恢复信任、保证恪守协定、相互监督下的裁军，必要时承认已经被解除武装的捷克为自由国。”他警告说：“罗斯福至今还保持调解的道路畅通，但机会稍纵即逝。”

亲王和党卫队区队长赫恩一道写条陈，用来启发比较明事理的纳粹领袖以及他认为适当的人来倡议和平；有些条陈按照同霍

恩洛厄和赫恩合作的大使赫维尔——他是老纳粹党员，外交部派在希特勒身边的代表——的嘱咐，用领袖专用的打字机打印出来，甚至送给独裁者看，直到独裁者生气地禁止这种“失败主义的拙作”和对赫恩提出警告才收场。但是亲王继续宣传同西方盟国单独媾和。他跑到瑞士，劝说盟国外交家支持他的方案，同时也争取梵蒂冈的同情，梵蒂冈有时利用亲王向第三帝国转达警告。

481 1941年年底，赫维尔访问西班牙，霍恩洛厄亲王将他在梵蒂冈授意下写的一份条陈交给赫维尔。亲王指出：“现在事实证明，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完全投入了普鲁士将军的怀抱，并转而采用普鲁士的方法对待被征服的各国人民。每一个月都使各国人民愈益看清楚，普鲁士将军在统治欧洲，各国人民都将亲眼看到普鲁士将军残酷的暴力手段，并促使他们作好准备奋起反抗。每次枪杀都促使人们增强一分有力的团结。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整个欧洲变成唯一的强大的道义上的防御战线。德国……除了一步步后退外别无其他办法。然后，各国人民起来进行解放斗争的伟大时刻就要来到了。”但是这场斗争的失败者将是德国，如果它不放宽它的政策，并寻求同欧洲各国人民及国家妥协的话。

戈林看了亲王的条陈，但他不敢造他领袖的反。霍恩洛厄物色比较恰当的盟友，找到了施伦堡。他在1942年认识了国外保安处处长，立即知道施伦堡决心在必要时推翻希特勒。虽然亲王在今天无意承认自己是施伦堡计划中的关键性人物，但还是能非常详细地记述旅队长的论点：“他甚至对我说明，他知道西方不会同希特勒缔结和平，因此德国内政方面的改变是必不可少的。谈话中他还进一步向我说明，他希望希特勒能有高度爱国心，做到个人服从德国人民的利益。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必须用武力搞掉他。”

亲王给施伦堡指出了一条道路，并推荐了一个领路人，帮助保



安处长同美国中间人接头。这个领路人是亲王业务上的同行，警卫队员，在缴获的保安处档案中只载明叫做“阿尔方索”，这个人同里斯本的美国人有关系，他们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后，就对施伦堡提出的想法表示感兴趣。1942年12月，阿尔方索同在里斯本的美国斡旋者坐在一起，说明他的委托人愿意同西方单独媾和，使德国能在东方继续进行战争，并不让俄国染指欧洲。美国人认为保安处的方案值得讨论，只要阿尔方索的委托人能保证改革德国的内政，以便西方各国政府能使自己的公众感到满意。在谈判中，美国人的要求越来越集中在希特勒本人身上。必须将活的独裁者——这是坚定不移的条件——交付给盟国；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出现希特勒神话的死灰复燃和确保持久和平。

听到美国人提到这项条件，连施伦堡也大吃一惊，但是既然上了这条船，他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德国的形势一个月比一个月恶化：1942年11月，英美两国军队在北非登陆，不断压缩非洲军团的活动地盘，威胁越来越大。在东方，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宣告惨败。施伦堡的答复根本没有收到什么积极效果。里斯本的美国人没有兴趣同保安处头子继续举行谈判。他们叫德国人去找“白宫驻欧洲的最有势力的人物”——这是霍恩洛厄的提法——：后来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W·杜勒斯，当时他是驻伯尔尼特使。霍恩洛厄亲王向保安处头子对杜勒斯作了这样的描绘：“他身体魁梧，个子高大，象个运动员，年约四十五岁，神色很健康，牙齿整齐，精力充沛，朴实大方。”保安处的另一份报告记述：“有把握认为并通过调查确定，在公牛先生〔这是保安处内部给杜勒斯取的代号〕的认真的伙伴们手里，是不会做出任何不公正的运动的。”

可是施伦堡还没有来得及派出使者去伯尔尼，他自己安置的一颗定时炸弹就轰然一声炸开了，破坏了保安处头子精心导演的

这出阴谋戏剧。施伦堡的同伙路德和一批年轻外交官们动手收拾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了。

冲锋队旅队长马丁·路德是外交部最缺乏文化教养和最令人憎恶的人物之一，靠着跟冯·里宾特洛甫的友谊做了官。他被提升为副国务秘书兼德国司司长，这个司的任务是协调外交部同党和党卫队的关系，同时也协助消灭犹太人。尽管起初同德国中央保安局争吵不和，路德还是越来越支持抨击里宾特洛甫的党卫队分子。此外他还受到外交部的一批少壮派官员的逼迫，他们主张必须推翻里宾特洛甫，以此为和平铺平道路。反里宾特洛甫派人员之一的公使馆参赞瓦尔特·基泽尔博士，过去是施伦堡大学时期的同学，他私下将情况告诉了保安处头子；保安处头子立即鼓励他放手抨击里宾特洛甫。第二天，路德打电话找施伦堡，让他证实这次谈话。1943年1月，施伦堡对路德把话讲得更加明确了：他施伦堡已经同美国谍报机关建立了初步的、还不稳固的联系；“现在有必要推翻里宾特洛甫，以便发展与美国人的关系”——路德的助手瓦尔特·格德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外交部内反里宾特洛甫的头子、公使馆参赞瓦尔特·皮特纳也同施伦堡有接触，并准备发难。当时外交部人事司司长施罗德已经知道了路德的计划，将情况告诉了国务秘书威兹萨克。

483 路德的同伙瓦尔特·皮特纳回忆说：“施伦堡在1943年2月8日再次约见谈判对手，说明希姆莱愿意参加促使希特勒撤换里宾特洛甫的活动。不过，他还要求路德这一派人提出一份列举所有理由的书面材料。于是就在施伦堡在场的情况下，立即将2月初口头申述的理由口授打成文字。”理由归结到一点，即冯·里宾特洛甫生了精神病，不能担任部长工作。可是希姆莱又一次摇摆不定，他还没有下决心同里宾特洛甫干，外交部长已经先获得了消息，提前进行反击了。里宾特洛甫把路德找来，指责他背信弃义；随后路

德及其同谋者被捕——路德关进集中营，皮特纳及其同伙发往前线服役，以观后效。就在1943年2月10日被捕前不久，原籍柏林的路德还给皮特纳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已经完了，您到格里恩埃森〔柏林棺材厂〕去订制两个花圈！”

施伦堡吁请希姆莱不要将同谋者路德被关进集中营，从轻处理推翻里宾特洛甫一案，但没有起作用。希姆莱犹豫不决。但是他的私人本部处长找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使希姆莱的漠不关心在一个党卫队人物的眼中看来不无有其道理。沃尔夫说：“全国领袖，您不能看着党卫队副总指挥里宾特洛甫被路德这个坏蛋赶下台。”

施伦堡只好在没有将里宾特洛甫搞掉的情况下，争取继续同美国人谈判。1943年1月15日，化名保尔斯的霍恩洛厄和一名保安处领袖（化名鲍尔）已经同美国代表杜勒斯开始谈判。杜勒斯也强调指出，美国人关心的问题是搞掉希特勒。显然，杜勒斯的目的就是要明确告诉施伦堡的代表，德国要指望靠希特勒是输定了。霍恩洛厄亲王在一份报告中记述了杜勒斯的讲话：他感到“难以设想，盎格鲁萨克逊人中被激怒的公众舆论会甘愿承认希特勒是大德意志国家的无可争议的主人。人们不相信同他达成的协议能保持长久和得到恪守”。但是——杜勒斯继续说明——如果搞掉了希特勒，那就应该建立一个和平的秩序，这个秩序不分什么战胜者和战败者。杜勒斯毫不踌躇地向德方谈判对手描绘了一个强大的大德意志国家的虚幻图景。霍恩洛厄亲王记述道：“德国应该作为维护秩序的和建设性的因素继续存在，不存在分割德国或奥地利脱离德国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普鲁士在德国的势力必须退居到一个合理的程度。公牛先生感到捷克问题不怎么重要，另一方面，他认为，必须支持波兰向东方扩大疆界和保持罗马尼亚以及一个强大的匈牙利，从而建立一条坚固遏止布尔什维主义和泛斯拉

夫主义的有效防线。”杜勒斯认为，“一个类似美国的联邦制的大德意志国家同这个多瑙联邦毗邻，是中欧和东欧的秩序和建设的最可靠的保证。”无论如何，霍恩洛厄亲王在1943年2月中旬给他 在柏林的保安处朋友们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总之，杜勒斯愿意同施伦堡的代表继续谈判。他向亲王说明，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已经接到了他的指示，随时听从霍恩洛厄的吩咐；他向亲王推荐大使馆参赞巴特沃斯作为联络人。里斯本的党卫队密使阿尔方索也可以利用规定的密码随时打电话找他杜勒斯。

不久人们很快就发现，英国政府不赞成美国人同保安处对话。保安处的人员后来深信，施伦堡的戏之所以没有演成，主要是由于英国人反对；当时保安处相信一些亲信人物有关美国人愿意谈判的报告。1943年6月10日，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恩斯特·基纳斯特根据美籍匈牙利人士的消息报告说：“1. 美国愿意在下述基础上同德国达成协议：（1）德国继续保留日耳曼的北部和东部；（2）美国占领以佛罗伦萨附近一线为界的南部意大利；（3）此后美国对欧洲 战争不再表示兴趣。2. 这个计划是……在西班牙研究讨论的。3. 这个计划在通知德国以前，由于英国人打横炮而破灭。”

施伦堡的同事们突然想到，必须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持以克服英国的阻力。霍恩洛厄把事情密告西班牙外交部的领导人士，争取他们支持由希姆莱搞掉希特勒的计划。“我们获悉，”西班牙外交部部务主任杜西纳凯记述道，“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地知道，希姆莱有力量在德国推行激进的政治变革，条件是这种变革不 于军事上的完全失败。完全可以相信，他愿意并且能够除掉德国政府的主要人物。”但是英国政府也通知西班牙斡旋者不予同意。当部务主任杜西纳凯打算争取英国女王陛下政府驻马德里大使馆一等

参赞延肯支持希姆莱计划时，这个英国人表示拒绝：“我实在感到非常奇怪，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竟想坐下来同德国无神论的主要代表党卫队举行和谈！”

希姆莱犹豫不决地尾随着施伦堡，现在在西班牙的失利促使他们两个向更广泛的公众提出自己的和平愿望。奉保安处头子的命令，使者们到中立国家去四处活动，保证由希特勒忠心耿耿的保安处头子来搞掉他；1943年5月和6月，希姆莱派人同瑞典银行家雅可布·瓦伦堡接触，探听党卫队提出的单独缔和的可能性。夏天，施伦堡派抵抗分子兰格本去斯德哥尔摩同苏联外交官商谈，在此以前，兰格本曾在这里同一名英国代表和一名美国代表举行过谈判。夏末，兰格本在伯尔尼同杜勒斯的工作人员德裔美国人格罗·冯·格费尼茨会商。10月，克尔斯滕在斯德哥尔摩同美国特使休伊特讨论了由美国提出的七点和平方案，但未能促使希姆莱亲自同休伊特会晤；当党卫队头子终于在12月9日决心会见美国人时，休伊特已经离开。1943年12月25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通知美国同行哈里曼，英国政府通过瑞典“获悉希姆莱要求接触”；希姆莱表示愿意派代表去英国，了解英国对“德国无条件投降”这一提法作何解释。英国回答：这一提法无需作任何解释。

但是，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党卫队领导能用什么方法搞掉希特勒，以便为和平廓清道路。在这一点上明显存在着分歧：施伦堡愿意采取断然处置，但希姆莱对由他或党卫队亲手加害于亲爱的领袖的想法感到恐惧。“小沃尔夫”——希姆莱的亲信卡尔·沃尔夫——急中生智，他建议索性平静地听听，看那些显然企图推翻政权的人打算拿希特勒怎么办，再作考虑。也许——这一点无法证实——沃尔夫心中有一个狡滑的计划：让反纳粹分子搞掉希特勒，然后再来收拾反纳粹分子。

同德国国内抵抗运动的接触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党员兰格本

是希姆莱家里的朋友，又是反政权密谋派的自己人，他同柏林的“周三聚餐会”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这个聚餐会上碰头的有最积极的反政权分子：耶森、哈塞尔和抵抗运动的军事专家贝克大将。参加这个圈子的还有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比茨博士，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是政变的促进派，但有时候意见并不一致。密谋分子兰格本根据沃尔夫的授意去问他，是否不值得将反对派的想法公开告诉希姆莱。这位部长对密谋分子兰格本同党卫队进行接触有些担心。波比茨沉思地说道：“他在这些人那里有求必应，又是他们的死对头。有时候我以为，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采纳了兰格本的提议。

486

恰好在这个时候——1943年夏——，抵抗分子们同希姆莱身边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只不过符号一正一反。由于武装部队将领们越来越回避密谋分子们要求放手采取行动的催促，因此促使人们想依靠另一派强大势力的党卫队同希特勒和党干起来。冯·哈塞尔记道：越来越“经常讨论到，在不得已的时候，利用党卫队推翻政权的可能性，先把这个工具抓到手和防止国内出现混乱。事过之后，当然也要搞掉党卫队。”不过，“问题只是在于：第一，希姆莱和同志们是否敢于进行这场赌博，以后能否本着这种值得欢迎的友好精神继续合作。第二，这种方法在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国外恰恰理所当然地把党卫队看作是魔鬼。”而且，即使在抵抗运动领袖们中间，对于由“希姆莱来解决问题”也并不是没有争论的，尽管贝克、戈特勒和许多军人（奥尔布里希特、维茨勒本、特莱斯科夫）都暂时表示了同意。邦财政部长波比茨出马，去争取政权保卫者希姆莱推翻政权。

1943年8月26日，波比茨在兰格本陪同下来到中央内政部；兰格本和沃尔夫留在希姆莱的秘书室里，由邦财政部长向党卫队头子长篇大论地进行了阐述：战争再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了，必须解

除希特勒的职务，由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指希姆莱）来负责进行同西方媾和。他巧妙地激起希姆莱承担重任的妄想。人民——后来中央检察机关对波比茨的起诉书这样记述他提出的理由说——“现在在考虑希姆莱要的是什么，是要实行恐怖统治，还是真正要保持秩序。如果他想为安定和明智而干，他就能够再一次使国家重新得到巩固。”但是，靠希特勒是再也无法挽救德国了。至于波比茨提出的挽救大局的方案，按照希姆莱在1944年7月20日以后一次冲淡了的讲话中的解释是，有“一个条件，即领袖必须真正下台，必须采取类似引退的办法，当个名誉主席”。

在这当儿，兰格本和希姆莱的助手沃尔夫在隔壁房间里拟定了类似的提法。兰格本表示，现在是由明智、正直和目光远大的人士来重建德国的时候了，他还肯定地认为，党卫队领袖们也属于这些人士之列。政变失败后，希姆莱感到有机会开脱希特勒信徒们同抵抗分子进行令人少见多怪的谈判责任。这时党卫队头子在一次纳粹党区领袖和中央部门领袖的会议上说，他当时立即去谒见领袖，报告了全部情况，但希特勒指示希姆莱暂时不要采取行动，而是继续观察波比茨一帮人的活动。

实际上，希姆莱当时的反应完全不同，跟他欺骗党的要员们情况截然相反。8月26日，他还同波比茨约定再次举行会谈，当时波比茨去找维茨勒本元帅——仍按对波比茨起诉书上的说法——，询问元帅，“他〔波比茨〕是否可以说元帅已同意出任最高军事领导，如果拟议的与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合作证明是可行的话”。沃尔夫已在8月27日再次约见兰格本，准备跟他讨论继续同抵抗分子领导人举行会晤的细节。谈判充满了希望，以致几天之后兰格本就受沃尔夫的委托启程去瑞士。

兰格本会见了杜勒斯的顾问格罗·冯·格费尼茨，告诉他，希姆莱本部的一名高级党卫队领袖（他指的是沃尔夫）已经插手一次

行动,目的是限制希特勒的无限的权力;人们希望借此创造条件,有助于同西方国家的对话。但是恰好此刻密谋分子和希姆莱干了一仗,打破了他们的计划。1943年9月初,希姆莱王国恣睢暴戾的政权保卫者秘密警察,破译了一份通过电台发出的密电,这份密电(据杜勒斯说)是“某盟国机关,但既不是美国、也不是英国”拍发的,暴露了兰格本的瑞士会谈,文本立即送陈领袖大本营,没有先给希姆莱过目。究竟是事出偶然,还是对摇摆不定的全国领袖搞的一次阴谋?总之这份报告逼得希姆莱立即抢在希特勒作出反应之前,跟抵抗分子断绝关系。党卫队头子叫人逮捕了兰格本,将其投入集中营,波比茨则再也无法跟希姆莱见面了。

现在重新由施伦堡来推行计划,采取激烈手段搞掉希特勒。这位保安处处长首先在西班牙同美国军方人士进行了接触,同他们讨论了一个奇妙的方案,马德里《人民报》在1958年给它起名为“KN作战计划”(绑架);将希特勒强行绑架,交给盟国。这家西班牙报刊声称,党卫队领导机关和美国军方之间“就执行绑架计划密切保持默契。具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已经确定,拟就的一项组织工作,包括要在马德里、里斯本和靠近地中海的巴伦西亚等地设立据点”。但是这个行动计划始终只是停留在讨论阶段。通过驻马德里的警务随员保罗·文策尔同盟国进行了会谈,他企图把天主教会也拉进来,协助绑架希特勒。教会不愿惹人不满意:孔拉多·西蒙森教士是梵蒂冈领导阶层的心腹,他和伊比里亚半岛以及南美洲的一些同事前来供警务随员调遣,有的奔走,有的出钱。但这个计划最多在1944年5月就已束之高阁。文策尔的主要信使是一位法国人,名叫勒泰利埃,他从文策尔的保险柜里窃取了同KN作战计划有关的秘密文件,将其卖给某盟国情报机关;保安处无疑认识到,由于希特勒的保卫工作非常严密,从技术上说绑架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施伦堡在西班牙的会谈使盟国人士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唯有希姆莱和党卫队才能推翻希特勒的体系。现在，连英国方面也对所谓由希姆莱解决问题表示有兴趣。党卫队旅队长克拉内富斯在1944年4月3日记述道：“据悉在英国人士中，党卫队全国领袖和党卫队经常是种种谣言和猜测的对象”，保安处驻里斯本的一名密使（姓名不详）报告道：英国人今后只寄希望于依靠党卫队而不再是依靠武装部队在德国搞政变。

这个密使写道：“另一方面，自从去年以来，这些〔英国〕人士越来越注意党卫队，最近尤其注意武装党卫队。想要了解领袖和党卫队以及武装党卫队之间已经暗中存在或者甚至激烈的对立状况的意见，部分可以想象，部分……，显然也是以英国的意见为基础。”这个密使听英国人士报告说，特别是武装党卫队将领们对希特勒将愈益持批判态度，“这种趋势，其原因在于对战局的判断。”1944年1月初，里斯本已经“传闻，‘武装党卫队将领们，其中有一位在秋末被授予橡树叶骑士勋章的将军’，已同英国人进行了谈判。”

报告人看来没有料到，他的报告实际上是个预言，因为在西线作战的党卫队部队领袖们三个月后组成了第一个正式的、准备一致拒绝听命于希特勒的小组。对于他们来说，决定性的一点也正是驻里斯本保安处人员谈到的党卫队将军们所抱的那种指导思想：对战局的判断。

1944年6月6日开始的入侵战役，也促使武装党卫队领袖们对希特勒及对德国真实处境的最后幻想趋于破灭。在诺曼底，党卫队部队一团接一团地血染战场——成了领袖的牺牲品。这个领袖待在狼穴，沉缅在幽灵梦幻中，退却、敌人的物质优势、德国士兵元气丧尽，这一切都不能使他从睡梦中惊醒。党卫队的警卫部队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因为武装党卫队的主力驻在西线，六个师包括领

袖警卫旗队，分别组成塞普·狄特里希的第一党卫队装甲军和保罗·豪塞尔的第二党卫队装甲军。希望自己的部队免遭覆灭的思想，也使党卫队将领们愿意支持反希特勒分子的事业。如果不是B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这样一个军人给他们作出样板的话，他们本来还会犹豫不决的——隆美尔象武装党卫队将领们一样，对希特勒的信仰一落千丈。在1944年年初，隆美尔还听不进抵抗运动派的理由，但从5月份起，他已经明白，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

时间紧迫。隆美尔估计，德国在诺曼第的防线还可以支持三个星期，然后就必然是美国部队的突进和法国陷落。沉痛的认识使他支持B集团军参谋部反对派军官早在入侵前就制定的一项计划。在隆美尔的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中将博士主持下，拟定了一个“动员日程表”，内容包括主动放弃西部占领地区，将德国军队撤回西壁工事境内，并将占领机构移交给盟军。最重要的一点是：“逮捕阿道夫·希特勒，将他交给德国法庭审判。”

7月初，隆美尔决定将计划付诸实现。7月9日，他委托西线军人反对派的主要策划者，施陶芬贝格的表兄弟凯撒·冯·霍法克中校博士，以他隆美尔的名义起草一封致盟军的信件，通知：德国西线军队将自动停止敌对行为，并撤回德国。可是，作为B集团军后盾的六个武装党卫队师将会抱什么态度呢？隆美尔想要行动就必须万无一失。他不倦地深入到前沿阵地，听取负责将领和高级指挥官的意见。他们一个个声明赞成脱离希特勒。武装党卫队的将领们也不例外。就连党的老战士塞普·狄特里希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斯派达尔作证说，狄特里希已经“表示对最高领导的愤怒，要求‘一旦战线崩溃时自行采取措施’”。这时已接任第七军团司令的党卫队副总指挥豪塞尔，同意抨击希特勒及其癫狂的坚持打到底的战略。

接替豪塞尔指挥第二党卫队装甲军的副总指挥威廉·比特里希发表的意见最为尖锐。1944年7月15日深夜至16日黎明前，他刚刚回到自己的指挥所就接待了来访的隆美尔元帅。这位在武装党卫队内以其言辞犀利令人畏惧的副总指挥开门见山地说：“元帅先生，我不仅了解诺曼第的形势，我也知道东线的情况多么糟糕！那边再也谈不上有计划地进行指挥了。那边的情况完全是剜肉补疮。”比特里希气愤地说：“上面没有认识到危险性，因为不了解情况，因而也不能正确估计形势。我自己每天都看到年轻人白白地死去，原因是上面的领导稀里糊涂。因此，今后我再也不执行糊涂的命令了，而是根据形势需要行动。”隆美尔抓住这一机会讲话，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党卫队领袖。隆美尔说：“我也知道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现在已跟对方进行联系，让我表示能有计划地放弃法国被占领区，撤退到西壁工事以内。”这位党卫队人物没有多加犹豫，就表示同意合作，一道反对阿道夫·希特勒。“元帅先生，”他说，“如果说了算数的话，那么我和第二党卫队装甲军支持您和服从您的指挥。我的每个指挥官都跟我的想法一样。”

490

但是，武装党卫队领导同西线陆军之间的反希特勒联盟成立得很快，垮得也快。7月17日，隆美尔在诺曼底德方前线行车途中，遭到一架飞得很低的英国飞机的袭击，受到重伤——西线军方反对派失去了领导人物。三天以后，去总参谋部任补充军总司令参谋长的克劳斯·沈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上校的行动，破坏了党卫队将领们同西线陆军反对派将领之间的合作。谋刺希特勒的行动破坏了隆美尔和党卫队将领就西线陆军造反达成的共同遵守条件：不得杀害希特勒。

领袖大本营里发生行刺事件使前线的党卫队将领们大吃一惊，其程度并不亚于党卫队的政治领导。军人的暴动使希姆莱和施伦堡目瞪口呆——过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才采取对策，对早已失

败的政变进行残酷镇压。党卫队领袖们在几个月以前还曾同抵抗分子进行过谈判,掌握了反纳粹派许多秘密,现在他们竟然不知所措,这使历史学家们感到困惑不解。分明知道七月二十日运动的人,怎么会 对施陶芬贝格的行动感到如此突然呢?某些理论学家满足于肤浅的解释,说党卫队领导感到突然只不过是装模作样——实际上希姆莱和他的亲信只是有意观望,以便施陶芬贝格的行动成功时,能同反叛分子合伙。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当然只是凭空猜测,他们拿不出具体证据。

相反,党卫队领导机关的档案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不论党卫队全国领袖私人本部还是德国中央保安局,都从来没有对以施陶芬贝格为中心的这一派密谋分子产生过怀疑。七月二十日运动共有三派:一派是保守的公务人员和多半属于退休养老的军人(贝克—戈台勒派);另一派是基督教保守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政治家(克莱骚集团);第三派是从1943年秋开始才积极活动的以施陶芬贝格伯爵为中心的年轻军官。这三派中,秘密警察只知道前两派。对于贝克—戈台勒一派的成员,秘密警察的档案里记有详细名单。象贝克、戈台勒、兰格本和奥斯特这些姓名,秘密警察缪勒可以倒背如流。早在1943年,希莱姆就警告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说他现在知道谁是敌视政权的反对派在陆军中的后台,他将“及时地制止贝克和戈台勒之流作祟”。自从为首分子赫尔莫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和其他成员在1944年初被捕以后,克莱骚集团对于秘密警察也不再是秘密的了。

德国中央保安局对施陶芬贝格这一派军官之所以还不了解,因为这一派军官在武装部队的掩护下活动,而秘密警察的密探们是钻不进武装部队的。党卫队全国领袖根本没有想到怀疑冯·施陶芬贝格上校。1944年6月中旬,他在领袖大本营一次访问时,还帮助这位行动不便的总参谋部军官脱大衣,替这位未来的凶手拿

公文皮包，这只皮包很重，里面装着施陶芬贝格打算有一天用来杀害希特勒的炸弹。在希姆莱眼中——他们两人直到1944年6月初才认识——伯爵是个能干的参谋部军官，值得提拔的对象。7月中旬，古德里安大将告诉全国领袖说，总参谋部必须最终起用熟悉前线情况的军官，让施陶芬贝格当总参谋长，希姆莱当即同意向希特勒推荐施陶芬贝格。

海因里希·希姆莱确实一点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伯爵的计划。希姆莱的司机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卢卡斯在下午1点钟左右冲进党卫队全国领袖战地指挥所的专列卧车，大声告诉每一节车厢里的人：“有人行刺领袖！有人行刺领袖！”就是在这时，希姆莱也没有怀疑是施陶芬贝格干的。12时42分，希特勒的会客室里正在进行汇报会议，施陶芬贝格的炸弹爆炸了，凶手在爆炸前一会儿匆忙离开会场。爆炸后不久，施陶芬贝格还被领袖大本营外面一层岗哨拦住，不信任地再一次不让他通过，但是一个电话打开了大门，这个密谋分子头子可以发动政变了。

但是希姆莱还是丝毫没有觉察。就是当他在几分钟后来到他驻地不远的领袖大本营向脱险的希特勒祝贺时，他那综合性的判断力也是集中到一条错误的线索上：他怀疑派在大本营里施工的托特组织工程队，在地下室的地板下面安放了炸弹。过了一些时间以后，希姆莱才注意到地下室里一个电话值班中士所谈的情况：冯·施陶芬贝格上校急速离走。他当时就感到奇怪。但是希姆莱疏忽没有下令，把这个被推测的凶手在柏林着陆时就加以逮捕。<sup>492</sup>

卡尔登勃鲁姆终于接到领袖大本营一个人打来的电话，建议他务必到柏林本德勒街最高统帅部去找冯·施陶芬贝格了解一下，询问伯爵先生为什么那么急急忙忙离开了狼穴。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对这个建议没有听出话中有话。他派区队长庇弗雷德博

士只身进入戒备森严的密谋分子巢穴，结果不得不使这位区队长暂时失去自由：施陶芬贝格拒绝接见这个并无恶意的来访者，叫人将他关在一间房间里。

这个插曲多少说明，党卫队阵营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多年以来，纳粹党的党卫队一直时刻警惕镇压一切政变活动，多年以来，保安警察和保安处一直在同所谓的国家敌人作斗争，而现在只有几个钟点，就在短短的时间内戳穿了关于无所不能的党卫队时刻戒备、待命出击的神话。7月20日下午，柏林党卫队领导眼见自己趋于瘫痪状态，对于本德勒街的政变分子无能为力，而德国中央保安局对政变分子们的势力却作了荒诞的过高估计。就在奈比的刑事警察分队出动，应施陶芬贝格报警的陆军部队之请，协助包围柏林政府区的时候，领袖警卫旗队的几个连队都小心翼翼地龟缩在利希特菲尔德的营房里。没有任何一支武装党卫队或风纪警察的部队赶来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支援德国中央保安局，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先生们傻了眼，站在窗子前面看着一营营应密谋分子暗号“伐尔克里”召来的几营武装部队从街上走过。不过各省和德军占领区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则更加惊惶失措。

下午6时30分，第十七军区（维也纳）参谋长海因里希·科德勒上校接到本德勒街电报，指示他逮捕奥地利的所有党和警察的重要人物。理由是：“一个由对前线情况一无所知的党的头目们组成的伤天害理的集团，企图利用眼前的形势〔行刺希特勒〕向正在艰苦战斗的前线将士从背后插上一刀，同时力图攫取权力以达到营私的目的。”随后不久，政变分子们又用无线电发来一道新的命令：立即解除所有纳粹党区领袖、邦长、部长、省长、警察局长、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秘密警察局长和党卫队机关领导人的职务，将他们特别严密地加以隔离监禁。”此外，“如发现武装党卫队部队领导人有不服从的嫌疑或不称职者，应予以监护拘留，改派陆军军

官充任。对不服从命令的武装党卫队部队，必须断然解除其武装。”

科德勒看了柏林发来的这些命令，在思想上不是没有压力的，因为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他的司令官将军外出旅行去了，将军的副手也不在家。但是靠着几分奸诈并使出几分维也纳人的风度，他说服了党卫队和警察机关的当权者顺从大势所趋。他请当权的头头们在晚上8时来司令官将军的办公室进行一次紧急商谈，将到会的人全部禁闭起来，同时始终对他们以军人相待。应该来的都来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克韦尔纳，警察中将舒曼，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副总监，武装党卫队驻军司令。<sup>493</sup>

这些先生们善于应变，不慌不忙。副总指挥克韦尔纳和警察局长戈茨曼立即表示听从新政权的调遣。当科德勒上校向克韦尔纳恳切说明，他只是按柏林本德勒的命令办事，副总指挥先生尽可亲自看看发来的电报时，克韦尔纳几乎有些生气了，手一摆说道：“有您给我讲了，我还有什么不相信的！”一句话，警察当权者没有制造任何麻烦。这些被扣押的人关在房间里，间或聊天以消磨时间。即使当天晚上9点30分左右最后一次同柏林电话联系证实政变失败时，党卫队领袖们也就没有翻脸。

军人们向自己的阶下囚道歉，指出这是令人不快的命令而引起的，并恭维了一番，将党卫队头头们送了回去。科德勒后来回忆说：“就是在事过之后，也没有一个在场的人抱冤，或现在表示自己并无过错而被冤枉扣押。”

驻在被占领的巴黎的党卫队和警察机构也受到了政变分子以类似方式的袭击。大约在科德勒上校于维也纳送走拘留者的同一时刻，第一保安团的突击队冯·克勒韦尔中校的领导下武装起来，对巴黎保安警察机关（秘密警察和保安处）采取断然行动。巴黎城防副司令、老党员和血旗勋章获得者布雷默尔少将亲自负责逮

捕驻法最高党卫队领袖：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奥伯格和保安警察头子、旗队长赫尔穆特·克诺亨。几分钟之内，全部更迭了巴黎的政权。夜里11点钟，奥伯格和克诺亨已经被关在“大陆”饭店的一个房间里，桌上摆着上等白兰地酒，无线电播送着音乐。一千二百名保安警察则被关在弗雷纳武装部队监狱里和旧东线要塞的掩体中。

494 巴黎警备区的军官们正在“拉斐尔”饭店里庆祝战胜黑色集团，突然无线电播送了希特勒的广播演说和西线总司令古恩特·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命令，政变的一切希望成为泡影。克鲁格曾经一度同反对派有过密切接触，但后来又重为希特勒所笼络。他在获悉巴黎保安警察被捕后，解除了驻法德军司令、反纳粹将军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职务，并命令立即释放奥伯格的人。

7月21日凌晨1点30分，巴黎城防司令汉斯·冯·博伊内堡-伦格斯费尔德男爵中将出发前去释放党卫队领袖。在这期间，奥伯格和克诺亨待在旅馆的房间里也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说。当将军向两个党卫队领袖说明他们已重获自由时，奥伯格跳起来叫道：“博伊内堡！你们这是干的什么卑鄙勾当？”将军请两位先生到“拉斐尔”饭店去找冯·施图尔纳格尔要他对一切作出解释。奥伯格激动地大步走进“拉斐尔”饭店的酒吧间，正打算痛斥从座位上立起身来的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当时也在场的奥托·阿贝茨大使赶了过来。阿贝茨劝阻说：“不管出了什么事情，根子在柏林；现在在法国这里的诺曼第战役打得正紧张，德国人必须互相团结一致。”

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奥伯格还在发牢骚，但怒气已渐渐消退。这天夜里，出现了军事历史学家威廉·里特·冯·施拉姆称之为1944年7月20日的人类奇迹的事情：党卫队和武装部队之间结成



了一条秘密战线，反对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野蛮的搜捕者。“能挽救的应尽量挽救，应该建立一条反对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联合战线，”施拉姆写道。对于外界，特别是对于希姆莱，保安警察头子克诺亨想出了一个说法：逮捕保安警察——人们这样说——只是一种演习，是事先由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奥伯格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商定的。

奥伯格和军方人士出面保护大祸临头的巴黎政变分子，使德国中央保安局在几个钟点之内无法对他们下手。就是在希姆莱的第一批命令到达后，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也试图设法挽救；他选派了头脑精明的军人充实负责审查军官表现的调查委员会。他征求参与密谋活动的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将军的意见，从而一开始就使审查对象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当施图尔纳格尔——克鲁格陆军元帅在向领袖大本营的报告中点明，他是最重要的政变分子之一——奉命去柏林汇报，并在行车途中自杀时，奥伯格追上了他，向他表示一定保护他的家属，不使受到任何株连。虽然地区总队长没有能够阻止在法国的政变领导人——霍法克、芬克上校、冯·林斯托夫上校、恩斯特·勒希林博士和枢密顾问克罗伊特尔——落入秘密警察的魔掌，但多数密谋者和同谋者由于奥伯格的态度而没有踏上去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死亡之路。里特·冯·施拉姆作证说：“7月20日对巴黎保安机关采取突然行动的领导人全部幸免于难。负责的军官们没有吃任何苦头。”

武装党卫队领导人也参加了营救大祸临头的政变分子。党卫队将军们救出了三名未来联邦国防军的领导人：通过塞普·狄特里希在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活动释放了斯派达尔；党卫队副总指挥洛姆巴德从秘密警察手里救出了总参谋部上校基尔曼斯埃格伯爵；豪辛格少将也由于党卫队担保而获得了自由。

当隆美尔过去的伙伴、党卫队副总指挥比特里希在无线电中

听到，自己原来在东线战役的老司令、七月二十日事件参加者埃里希·霍普纳大将已被绞死时，他激动地从坐椅上跳了起来，愤怒地说：“这是德国军队的末日！一名军官由于谋反而被绞死，这种做法在德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过去是依军法枪决。”比特里希的参谋长是一个由陆军调到武装党卫队的军官。他小声提醒比特里希说：“将军先生，我不得不请您不要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话。”副总指挥做了一个手势说道：“不关您的事。”党卫队副总指挥的失言传到了希姆莱的耳朵里，他马上命令威廉·比特里希立即交出指挥权。但是比特里希的上级第五装甲军团司令埃贝尔巴赫将军提出前线形势紧张，不同意解除副总指挥的职务，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武装党卫队在前线属于陆军及其领导人节制，因此希姆莱在他自己部队里的权威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希姆莱并不肯就此罢休，一定要强行搞掉这位太不听话的党卫队将军。在几个星期后的阿纳姆战役中，他看到一个新的机会。希姆莱派自己青年时期的朋友、党卫队兼警察医生卡尔·格布哈特、克里尼克上校和武装党卫队中将去见比特里希，命令副总指挥向党卫队全国领袖报到。陆军再次抵制希姆莱的惩处下属的权力。新上任的西线总司令莫德尔陆军元帅声明反对任何解除比特里希职务的做法，并且在撤出法国以后，也继续坚决站在比特里希一边。希姆莱打算搞掉不听话的党卫队将军，但始终没有得逞。

但是，在希姆莱消灭 1944 年七月二十日事件的密谋分子和知情者的战役中，对比特里希斗争的失败，当然只不过是少数失败情况之一。这个党卫队头子无情地迫害所谓的叛徒和他们的家属——德国军事史上最残酷的嗜血司法开始了。

496 7月20日中午，保健医生克斯滕已经绝望地看出，希姆莱重又摇身一变，狂热拥护领袖——就是希姆莱不久前还曾打算借助抵抗分子解除其权力的那个领袖。他再也不想让人说他摇摆不定

了，他大声对克尔斯滕说：“现在是我动手的时候了，我要彻底收拾掉这批反革命坏蛋，我已经下令逮捕叛徒了。”当克尔斯滕表示怀疑挽救独裁者对德国是否有利时，希姆莱生气地说：“克尔斯滕，您这是什么话？您真这样想吗？您不应该这样想，更不应该这样说。天意已经预示我们，领袖大难不死。领袖活着，任何人对他都无法加害，天意叫他不离开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将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吧！”

随后，他抱着满脑子虚伪的宗教狂，一头钻进了领袖大本营，并开足秘密警察这部死亡机器的马力，疯狂地镇压密谋分子。他看出时间对他有利。他时刻不离开他心目中那个上帝的化身，而且抑制内心的狂喜，不露声色地将一份份命令送给希特勒过目，旨在使他海因里希·希姆莱成为德国的第二号实力人物。

希特勒在7月20日下午听到叛乱运动正在扩大的报告非常气愤，这时希姆莱将一份任命党卫队全国领袖为补充军总司令的文件送给他过目。希特勒签了字。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保证帮助他消灭密谋分子，不论什么文件他都会签字。希特勒叫喊道：“您要枪毙每一个抵抗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事关民族的命运。您不能心慈手软。”希姆莱霍地敲响鞋跟立正，大声说：“我的领袖，您可以完全相信我！”主子的这条忠实警犬急急忙忙地冲了出去。希姆莱乘飞机去柏林，下午4时30分在首都降落。不过领袖派来的这个镇压异端的裁判官颇为审慎，他先让密谋分子所在单位的同事们出面消灭密谋分子。但是刚一接获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电话通知——宣布密谋分子发出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希姆莱就放手大干了，开始对政变进行报复性的恐怖活动。

他命令留在柏林的领袖警卫旗队的连队和扎罗党卫队旗队的部队进驻柏林的政府机关区，成立了“七·二〇”特别委员会，并把交给他领导的补充军抓在手里。秘密警察恶魔们搜遍了每个角

落，只要有一点可疑的影子，就足以把一个德国人送进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审讯室。连无辜的家属也为最残酷的警察铁幕所包围。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抵抗运动领袖能逃脱政权的报复。施陶芬贝格小组的重要成员是在7月20日晚上被本德勒街忠于希特勒的军官枪毙的，而其他抵抗分子则通过秘密警察监狱、集中营、横蛮无理的法官罗兰·法赖斯勒的公审，直到在希特勒德国的绞刑架下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站。

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死亡砵碌也向跟贝克一戈台勒小组抵抗分子结盟的党卫队领袖滚来。刑事警察头子奈比自以为已被秘密警察识破——其实是判断错误——，7月24日只身潜逃。他被自己的下属刑事警察缉捕了好几个月，直到1944年11月才为一个嫉妒的女友出卖而被捕。在施伦堡的“军处”就捕的谍报局汉森上校和冯·弗赖伊塔格-洛林格霍芬男爵也和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普拉斯一样被害。普拉斯在政变前即已被捕，于7月19日处死。一本叛乱分子的日记也使党卫队骑兵领袖冯·扎尔菲阿蒂落入密探们之手。希姆莱特别要在他身上发泄复仇欲，指示下属向军事检察长提出进行调查起诉，理由是——据党卫队人事处长冯·赫尔夫说——这位骑师“是民族社会主义和领袖的不可救药的敌人”。希姆莱说：“如果人民法庭不判处他，我就派人将扎尔菲阿蒂先生作为变节的党卫队员枪毙。”

但是，在反纳粹的党卫队密谋分子中，旅队长康斯泰因却逃脱了处决。这个为密谋分子内定的保安警察头子在德国中央保安局里受到连续不断的审讯。但是，由于内政部国务秘书兼党卫队副总指挥施图卡特的一项自作主张的指示，康斯泰因重新获得了自由——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大发脾气，他永远也不能原谅施图卡特同事的这次干预。

可是，希姆莱的刽子手们越是对抵抗运动领袖恣睢暴戾，这

位大法官的言论就越是审慎。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信念并没有保持多久。过去曾经妨碍他忠于自己领袖的怀疑又重新出现了。他突然怀有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说不定还能同已经注定要死的1944年7月20日的囚徒合作争取和平呢？希姆莱考虑了一项计划，同贝克-戈台勒小组的外国朋友们进行谈判。他指示推迟处决死囚，并且开始跟他的牺牲品举行阴森恐怖的对话。戈台勒、波比茨和冯·舒伦堡伯爵三人获准，详细地写出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反对希特勒的。

在这种阴森恐怖的延期处决的后面，隐藏着一种党卫队可以乔装打扮成抵抗分子的盘算。1944年10月，希姆莱派自己的保安处长施伦堡跟瑞典银行家雅可布·瓦伦堡接触，正是这个银行家同卡尔·戈台勒友好，构成了被告抵抗运动头子罪该处死的理由。现在，希姆莱却想利用戈台勒同瓦伦堡的友谊，和盟国重开谈判。瓦伦堡不听施伦堡的宣传。希姆莱没有罢休，叫人把戈台勒带来，498逼他最后一次为祖国效力。

“有一天，”看守戈台勒的威廉·布兰登堡说，“最高当局——希姆莱——向戈台勒博士提出，也可以说是委托戈台勒博士，最后运用他同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财政家瓦伦堡以及同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威兹曼博士并通过威兹曼博士同瑞典国王在私人方面以及当然也有政治方面的关系和友谊，以便现在进行戈台勒及其一伙非常可能在一旦政变成功后规定少不了要做的事情，即……着手同英国首相丘吉尔进行联系，通过这一途径迅速的、以还能差强人意的的方式结束战争。”戈台勒表示，如果希姆莱让他去瑞典一行，他愿意这样做。然而党卫队头子不敢答应。此后希姆莱跟抵抗运动头子又会了一次面，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希姆莱中断了同戈台勒的对话。1945年2月2日，德国抵抗运动的殉难者踏上生命终局的道路。但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再也

无法使自己从他既想保卫又想推翻的这个政权中摆脱出来。他和黑色集团依然是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狂热主义的俘虏——直到痛苦的末日来临。

## 第十七章 结局

499

1944年秋，部务主任格布哈德·希姆莱碰到他的哥哥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哥哥患了重感冒，正要去开会，跟纳粹党的一些高级领袖讨论问题。“你应保重自己，会议延期吧！”弟弟这样劝告党卫队首领。这时，全国领袖用几乎有点责备的口气回答道：“你听说过教皇伤了风就推迟过复活节吗？”

这个回答生动地描绘了海因里希·希姆莱完全沉缅于武士道式天降大任于己的梦幻世界，七月二十日叛乱事件失败后，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占据了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实力地位。有些人认为，似乎他只是等阿道夫·希特勒一死就能最终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列举他所担任的职务就一清二楚，希姆莱那双精心修饰过指甲的手已攫取了多少权力。他是第三帝国内仅次于党的最重要组织——党卫队的主宰。他驾驭着警察机器和情报机构。他职掌中央内政部。他作为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监督着政府的种族政策。他监视德国同所谓日耳曼各国纳粹运动的关系。他统帅着——虽然只是名义上——三十八个师的武装党卫队。他作为陆军装备的主管和补充军总司令指挥着国内武装部队。他的一名副总指挥（戈特洛勃·伯格）掌管着武装部队的战俘营。

拥有如此庞大的权势，使得某些同时代的人错误地认为，在希特勒日暮穷途的阴影下，只有依靠这个党卫队主子才能把分崩离析的政权捏在一起。1944年底，从斯德哥尔摩到旧金山的各国报纸用醒目的通栏标题宣称：“希姆莱——德国的独裁者”；而没有在国内身历其境见到民族社会主义最后阶段那种令人胆战心惊的荒诞

现实的人也许后来还会相信，“希特勒德国”的最后几个月是由党卫队兵营中发出的号令进行统治的。“就这样，在末日来临前的十个月，党卫队终于把德国掌握在手掌之中。1944年至1945年之际已经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机构、国家机关和党的部门能采取行动同党卫队相抗衡了”，远在纽约生活的编年史家卡尔·O·佩特尔十年之后还作出这样的设想。“集团明显地和部分不明显地接管了权力。其他一切机构都变成了工具。1944年的德国，处在两双眼睛的虎视眈眈之下：阿道夫·希特勒和海因里希·希姆莱。”

500 至少有一个人当时相信所谓的党卫队万能论，这个人就是集团的首领。他以为，这样一个时刻已经到来，此刻，他可以使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摆脱一切“叛逆”和一切怀疑，摆脱在希姆莱的哈哈镜里原来一直阻碍德国取得最后胜利的阴暗势力。1944年8月，他极度兴奋地预告道：“我们现在是在进行神圣的全民战争。”

希姆莱效法苏维埃人的作法，使用威胁、巡回特别军事法庭和全民拿起武器的刺耳鼓动宣传，竭尽全力推进动员工作。他公开承认以布尔什维克为其样板。他将保安处写的一篇研究文章《苏联保卫列宁格勒的卓有成效措施》，作为德国保卫本土战争的教材，发给陆军的将军们。“我赋予你们以全权，”他向一个师的军官们大声说：“将每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抓起来，如果有必要就捆起来扔进大卡车。你们把师里最为凶狠、干练和优秀的军官派出去，立即将这帮子人抓起来，谁反抗就枪毙！”

希姆莱这样做，是把他那疯狂坚持到底的战略动员措施，与其常年对保守军人的积怨联系在一起。七月二十日事件后，希特勒命令他新建十五个师。希姆莱感到，这是创建一支新的武装部队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支民族社会主义的人民军”。希姆莱从工厂厂房和学校课堂里拼凑人员，有意识地建立一支与陆军截然不同的新部队。他让那些信仰虔诚而缺乏扎实基本训练的青年纳粹



分子担任军官，褐色政治委员的权力、民族社会主义领导军官(NSFO)的权力加强了。部队采用的番号也在于显示希姆莱的“革命军”的特点。它们自称“人民特种步兵师”和“人民炮兵军”。

“党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内在结合，今天……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人民观察家报》欢呼地写道。希姆莱要护卫他的人民军，不让旧军官有任何染指。任何一个“人民军军官”均不得调到其他部队去，这支新部队始终由补充军总司令希姆莱执掌裁决权。希姆莱说：“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军是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的军队。”

同时，他将密探和情报人员派进其他补充部队，这些人必须将如何稍有偏离坚持作战到底的方针的情况向希姆莱作出报告。还在1944年8月3日，希姆莱就在波森预先通知纳粹党各区领袖，他将毫不姑息地处决最后胜利的任何怀疑论者。他也知道必须作出恰当的估计。“此后将有较少或较多的这样一部分的人，”这个宗教裁判长自鸣得意地描绘道：“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不能这么说，他们全都是真正的猪猡，都属于这个〔反政权军官〕集团的人。他们将被揪出来，或者迟早要受到法庭审判，如果他们采取敌对行动的话。”党卫队保安处的暗探在侦察武装部队的一切部门，探听失败主义的言论。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必须编造名册，定期审查当地武装部队驻军将领政治上是否可靠，以及是否激励部队坚持战斗直到“最后胜利”。

西部大区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副总指挥古滕贝格尔记录的不可靠的军官有：“上校法因德，迪伦人，服役观点半心半意，必须撤换……，中校比尔曼，克雷费尔德人，六十岁，责任心不强，缺乏果断力，立即需要撤换……，上校克勒，诺伊斯人，无政治色彩，没有果断力，必须立即撤换。”西南大区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副总指挥霍夫曼注意到：“中校格拉夫，施勒特施塔特人，政治上不可靠，急需撤换……，中校冯·霍恩斯泰因，拉斯塔特人，撤换条件已

经成熟（据说其祖母系犹太人）。"同样，部队里的军官也由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巨眼紧紧盯住。保安处的亲信——多半是普通党卫队的士兵和军士——用详尽的报告记录了“作战指挥的毫无计划，最重要的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被闲置未用……，关键性的部门严重不负责任，”保安处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关于现时驻施魏青根附近的多森瓦尔德营地的第二百零五装甲部队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二十九岁的指挥官希尔施贝格尔不称职的情况，保安处曼海姆外勤总站于1944年11月14日向施特拉斯堡保安处头头报告道，“最好能争取该部两名尉官表态，即：一、格鲁舍普夫中尉；二、特别是指挥官的副官布鲁斯曼中尉。两人都系党卫队员。”任何情况也逃脱不了该装甲部队中保安处亲信的注意。关于民族社会主义领导军官：“纳粹党军官在今天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许多人根本对此缺乏必要的支持。目前军官和军士，甚至普通士兵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必须平心静气地以布尔什维克军队为榜样。”军官的私人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至今看得最重要的还是在军官俱乐部里胡闹。法国使他们更加沉缅于声色。相反甚至不搞政治培训。”对纳粹军官的态度：“军官帮始终认为，一名军士进入军官集团的重要标准是从社会角度考虑。至今首先拒不接纳名副其实的民族社会主义者。”

502 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三处A2组汇集了暗探的报告。这些报告说明，武装部队法庭对于所谓对防务力量的破坏分子所作出的判决是多么符合希姆莱粗野的抵抗到底的尺度。但是，当德国中央保安局调阅军事法庭审理意见不一致的档案时，陆军拒不合作。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于1944年10月17日在给希姆莱的信中说：“因此我建议，就陆军军法领域来说，首先将陆军军事法庭的全部档案和判决移送德国中央保安局，并允许保安处各区主管部门审阅自己区内的师军事法庭的档案。”但是希姆莱感到，

对武装部队的庄严职权进行这样的干预，未免过于胆大妄为了——连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之流在军事上唯唯诺诺的人物，也还在捍卫长期以来已被破坏得千疮百孔的武装部队特权。希姆莱在卡尔登勃鲁纳来信的边上歪歪斜斜地写了批语，“不行，不聪明。”

此外，他认为，时间反正是有利于他的。希特勒象一个快要没顶的人死死抱住一个想法，只有依靠愿意拼死打到底的党卫队才能使他避免面临的灾难，只有忠实的希姆莱才会完成武装部队将军们辱命败北的业绩。德国的生存空间急剧收缩。1944年夏季攻势后，苏联人已挺进到维斯杜拉河，直捣东普鲁士。9月，英美军队已出现在原德国西部边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相信党卫队旧有的恐怖魔术的思想支撑着这位独裁者，使他没有倒下。

希姆莱起初没有辜负领袖对他的期望。这位党卫队首领以其固有的组织才能在9、10两个月内征集了五十万名新兵，匆忙而又马虎地训练了一下，就将他们投入前线作战。在这以前，他已将计划用于镇压国内动乱的补充军的六个旅调上战场。他制定了保卫德国的逐屋战斗到底的疯狂作战方案，苦心经营着一种为狂热的纳粹游击队所设计、取名“狼人”的组织，并梦想在南德阿尔卑斯山建立据点，成为不可征服的纳粹中坚分子的避难所。“任何一个逃兵……都不能逃脱应有的惩罚。除此以外，这种可耻行径将会给他的家属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9月10日，希姆莱命令贴出这样的布告，随后他的特别军事法庭以血腥方式将全国领袖恶毒阴险的预告付诸实现。东线和西线的战斗愈是濒临绝望，希姆莱特别行动队的死神碾磨就转动得愈是残酷。特别军事法庭的受害者被成排地吊在树上，数目日益增多，他们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我是逃兵”，或“我被吊在这儿，是因为未获允许擅离部队”。

不论希特勒的哪条战线受到威胁，党卫队全国领袖就派出他

的古罗马式的步兵队去哪里进行反击。独裁者三次得到了他的党卫队的支援，党卫队三次对敌对者进行了镇压。

1944年8月1日，波兰起义领袖塔德舒·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在苏联军队接近的鼓舞下，号召手下三万五千名游击队员在  
503 华沙的大街小巷打击德国人；这时苏联军队已抵达维斯杜拉河的广阔前沿，苏军侦察队已出现在河对岸的华沙市郊普拉加。华沙起义威胁着德军防线——割断了与华沙东面作战的第九军团的联系。陆军参谋总长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建议希特勒，将尚处于陆军军事行动区域之外的华沙划归武装部队管辖，由陆军来镇压起义。希特勒不同意这一建议，而将此项任务委托给主管的补充军总司令——希姆莱。

希姆莱派他的歹徒部队头子、党卫队副总指挥埃里希·冯·德姆·巴赫-齐列夫斯基到华沙前线，叫他以惯用的残暴手段镇压波兰人的叛乱。巴赫-齐列夫斯基动员了党卫队最臭名昭著的部队：除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海因茨·赖内法特的十二个警察连外，他还派出了党卫队区队长奥斯卡·迪莱汪格尔博士率领的由偷猎野兽者和囚犯组成的团，以及俄国战俘拼凑成的白俄罗斯党卫队旅队长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的部队。关于迪莱汪格尔和卡明斯基这两个旅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情况一直传到了领袖大本营。“我当时听到的情况，”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写道：“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不禁感到有必要当天晚上就得向希特勒作出报告，要求将这两个旅调离东线。”甚至希姆莱的首席代表、地区总队长菲格莱因也证实说：“是的，我的领袖，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流氓！”

希特勒在陆军参谋总长的极力要求下不得不出让让步，当然在事先不会不给巴赫-齐列夫斯基以机会，将进行抢劫掳掠的匪兵头子卡明斯基作为“一名并非无可指摘的人证”（古德里安语）执行枪决。这项行动只不过使独裁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这个巴

赫-齐列夫斯基是最干练的人之一。”

华沙起义者的余烬尚未完全熄灭，希特勒一道命令又将党卫队调往德军东线后方的一处新的危急地区。8月29日，斯洛伐克的政治家和军人在苏联的鼓励下举行起义，斯洛伐克的部分军队参与行动。这次起义切断了从加里西亚溃退德军的道路。但在起义尚未扩及全国、从而并将迟疑不决的普赖斯堡政府冲垮以前，党卫队又一次插手干预了。保安处逮捕了一些起义领袖，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党卫队军校人员则编成一个装甲团，出动讨伐斯洛伐克的起义者。

军校学员占领了起义中心诺伊佐尔<sup>①</sup>，同时党卫队第十八装甲步兵混合师“霍尔斯特·威塞尔”师和新编成的“加里西亚”师从东面进逼；后来武装部队和迪尔莱汪格尔团也都参加了行动。希姆莱还从柏林调来了最忠实的信徒、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 504  
戈特洛勃·伯格接任驻斯洛伐克武装部队司令，掌握了指挥权。伯格只花了四个星期，依靠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约瑟夫·维蒂斯卡博士的特别行动队 H，在前线的后方再次建立了在大德意志统治下墓地一般的平静局面。如同美国历史学家希尔贝格所述，斯洛伐克“从一个傀儡政权变成了一个阴影”。党卫队事实上与武装部队一起成了这个卫星国的主宰。

当伯格回来汇报执行斯洛伐克的使命情况时，已有一名大个子党卫队领袖在领袖大本营等待希特勒的又一项指示了。独裁者在狼穴召见最富传奇性的党卫队员、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命令他指挥保安处进行最后一次国际性的破坏活动。

斯科尔兹内是维也纳人，1908年生，原系某支架建筑工程企

---

① 现名班斯卡-比斯特里察。——译者

业的工程师和经理，1939年加入空军，后来参加了“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经历过一段技术军官生涯后，进入保安处国外处，负责指挥颠覆破坏活动。对于指靠上演特务工作的闹剧来扭转战局的那些德国人来说，他是颇具象征性的人物。他那具有近乎神话般的声誉源于1943年9月12日，那是一个星期天，斯科尔兹内率领德国伞兵，把本尼托·墨索里尼从持有冲锋枪的看守人员掌中营救出来，当时墨索里尼被巴多格里奥政府<sup>①</sup>监禁在意大利最荒凉的地区大萨索山一家山顶旅馆里。斯科尔兹内向墨索里尼报告道：“是领袖派我来的！”一年以后，这一次希特勒也是特意派这个党卫队伞兵部队司令去见一个同盟者，当然这一次的任务性质截然不同：上一次是营救一位卫星国的首脑，现在是要去逮捕一个人，消除隐患。

“我们现在已获得密报，”希特勒向这个党卫队员指示道：“匈牙利摄政者霍尔蒂海军上将企图与敌人勾结，使匈牙利单独媾和。您，斯科尔兹内作好准备，一旦这个摄政者不信守自己作出的盟约义务，就占领布格贝格<sup>②</sup>〔霍尔蒂的驻地〕。”

斯科尔兹内乔装打扮，穿上一套便服，带上化名沃尔夫博士的假证件去匈牙利。途中，他突然为这次行动想到了一个代号：由于他忘了命令他的伞兵部队的军士们携带反坦克手雷，于是他给这次军事行动取名为“反坦克手雷行动”。当斯科尔兹内向驻匈牙利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党卫队副总指挥奥托·温克尔曼博士报到时，他获悉，匈牙利的情况已急转直下，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1944年8月30日，霍尔蒂已起用盖佐·拉卡托什中将组阁，更替

---

<sup>①</sup> 1943年，意大利的陆军元帅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召集一些文官武将组成了一个无党派政府，解散法西斯党，监禁了墨索里尼。——译者

<sup>②</sup> 原文 Burgberg，意为“城堡山”，布格贝格系译音。——译者

了匈牙利的亲德政府，这个内阁显然要使匈牙利退出战争。不到一个月后，匈牙利宪兵总监福劳戈中将赴莫斯科，与苏联人就停火 505 举行谈判。

但是在福劳戈与俄国人签署草约之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温克尔曼已获悉行将停火的消息。从任命拉卡托什政府（温克尔曼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背叛的警告信号。”）以来，这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就作了一些准备，一旦匈牙利倒戈，就立即以一个纳粹体制来取代霍尔蒂政权。从8月底起，匈牙利纳粹领袖费伦茨·什扎拉希已准备登场，保安处已印好三百万份新纳粹政府号召书的传单，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埃里希·克恩迈尔率领一个分队待命行动，准备突袭占领布达佩斯电台。

温克尔曼无意久等，而是要抢在匈牙利人前面。温克尔曼说：“鉴于叛变已近在眼前，另一方面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允许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于是，我在星期五，即1944年10月6日，……来澄清局势。”温克尔曼作出决定：“尽快逮捕霍尔蒂周围的人员。”温克尔曼为保安警察驻匈牙利司令、党卫队区队长汉斯·格施克和斯科尔兹内拟定了一项作战方案。10月10日清晨，他们首次出击了。

当霍尔蒂最重要的部队亲信、驻布达佩斯匈牙利第一军团司令鲍考伊中将在5点钟左右去霍尔蒂住所“丽特兹”饭店谒见霍尔蒂时，格施克手下的暗探逮住了鲍考伊，将他劫持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霍尔蒂随即任命奥格泰莱基中将为鲍考伊的继任人——他也毫无痕迹地失踪了。同样德国人打算静悄悄地抓走摄政者霍尔蒂的儿子米克洛什（“尼茨克伊”）。米克洛什因为涉嫌要跟南斯拉夫游击队司令铁托的代表谈判停火，保安处很久以来就对他暗中进行监视。布达佩斯保安处处本部于是拟定了一项计划，完全符合特工人员的做法。他们打算在小霍尔蒂与铁托的使者进行谈判时当

场抓住并把他劫走，从而迫使其父亲霍尔蒂允诺继续站在德国一边，任命一个亲德政府。这次绑架计划的代号叫“米老鼠行动”——这是由于没有听清楚小霍尔蒂的绰号，将“尼茨克伊”误为“米基”<sup>①</sup>，从而使驻布达佩斯保安处的爱开玩笑的家伙们兴致勃勃地虚构了“米老鼠”这个假名。

506 两名保安处人员化装成铁托军队的军官，很快就跟尼古劳斯·霍尔蒂接上了头。原商定在10月13日进行一次秘密会晤，然而一位在布达佩斯也颇有名气的保安处头头过早地突然露面，使尼茨克伊产生满腹狐疑——他取消了这次会晤。但小霍尔蒂被劝说进行一次新的会见，时间定在10月15日，地点为布达佩斯埃什屈广场匈牙利多瑙河港口公司经理费利克斯·博尔内迈什扎的办公室，这位经理系霍尔蒂的好友。尼古劳斯·霍尔蒂给自己采取了保卫措施，他带了五名匈牙利国防军军官，让他们监视着这座楼房的入口，此外，还有匈牙利国防军的一个警卫连在附近几条街道布岗放哨。

但是，德国人也作好了准备工作。前一天，保安处的一支行动队住进了一座比多瑙河港口公司高出一层楼的供膳公寓，斯科尔兹内还在旁边的一条街上布置了他的一个连，人员全部潜伏在遮盖严实的载重卡车里。计划于10点10分劫持霍尔蒂。斯科尔兹内这一次又化装成老百姓，于几分钟前驾驶一辆汽车，停在摄政者的儿子刚进去的这座大楼前面。大楼入口处停着霍尔蒂乘坐的轿车，在其后面是一辆越野车，里面坐着三名匈牙利军官——外边的人看不出来。

这时，两名保安处人员向大楼走去。他们俩打算进入大楼时，三名匈牙利国防军军官发觉情况不对头，当即向保安处人员开枪

---

<sup>①</sup> 英语：男子名。与 mouse 联用，为迪斯尼卡通片内通译的“米老鼠”。——译者



射击，一名被击中倒地，当场毙命。就在这一刹那间，匈牙利士兵的步枪和冲锋枪枪管都从窗口伸了出来，朝着斯科尔兹内的车辆开火。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拔出手枪，指挥他的连队冲过来。斯科尔兹内的士兵占据了对面的广场，他们的火力迫使往前冲过来的匈牙利士兵退进邻近的房屋。在外围一带行进的匈牙利国防军士兵几乎没有听到报警的信号，这时侵入大楼的保安处人员已挟着戴上手铐的霍尔蒂和他的朋友博尔内迈什扎奔了出来。这两名俘虏被塞进载重卡车，几分钟后，一架飞机载着他们飞走，航向：毛特豪森集中营。

“反坦克手雷行动”就在这时拉开了序幕：12点，德国公使费森迈尔博士——他也是一名党卫队领袖——来见霍尔蒂海军上将，要求摄政者立即表态：支持或是反对德国。不过党卫队旅队长费森迈尔自己感到担任这个敲诈勒索的角色并不愉快；他早先就批评过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温克尔曼的粗野方法——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一度曾在党卫队内指控费森迈尔犯有“失败主义”。如同温克尔曼气愤地指出的那样，费森迈尔没有“按照商定的做法，即使用最严厉的言词告诉这位老人，倘使他一丁点儿背叛行为，就要枪毙他的儿子”。这位摇摆不定的公使沉默寡言，从而使行动计划受到损害；下午2点，布达佩斯电台广播宣布，匈牙利与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

但是在此期间，温克尔曼早已控制了布达佩斯。在四十辆德国坦克轧轧的履带声威胁下，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克恩迈尔占领了布达佩斯广播电台，播送了新的纳粹政权的公告；此外，德国军队占据了城市的一切要害场所。这时，斯科尔兹内也动手给霍尔蒂政权以最后的致命一击。他向党卫队第二十二骑兵师发出行动警报，命令他们封锁所有通向霍尔蒂的要塞即布格贝格的道路。然后斯科尔兹内给他的伞兵进行了分工，定于10月16日凌

晨发起决定性的攻击。6时整，斯科尔兹内率领他的士兵空降登上山顶，短时间内就控制了局面。斯科尔兹内说：“我们没有发一枪就登上了布格贝格，整个战斗不到半个钟点即告结束。”实际上，这是白忙了一场，因为在临近4点钟的时候，费森迈尔已向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温克尔曼报告，霍尔蒂愿意下台，把他的权力交给纳粹领袖什扎拉希。匈牙利不得不继续为希特勒流血。

党卫队再一次证明，它一直还能以巨大牺牲换取急剧的表面胜利，来支持梦想坚持打到底的希特勒。党卫队临近覆灭前取得的成就愈是引人瞩目，海因里希·希姆莱这颗明星就在那个阴暗得出奇的宫廷里愈加明亮地熠熠发光，这个宫廷号称为领袖大本营，可是却一直酷似阿拉伯苏丹进行阴谋活动的巢穴。

因此，1944年10月，也可以看作是希姆莱权力达到顶峰的一个月。独裁者没有忘记感谢他的近卫军在波兰、在斯洛伐克和在匈牙利取得的成绩；党卫队头子获得了特权，于1944年11月8日代表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传统的啤酒馆暴动纪念演说。希姆莱感到如醉如痴，神魂颠倒，尽情享受着他获得的权力，被成为领袖看来无人可以取代的第一助手的幸福感弄得飘飘然。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嘲笑说，德国的没落把希姆莱“靠向上帝了”：这个人在几个月以前还曾考虑过，为了缔和叫希特勒靠边站，现在又懂得毫不迟疑地为他的上帝要求别人付出惨重的流血牺牲。

“在去年一年中，”他私下对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说：“我又学会了要相信奇迹。领袖在7月20日幸免于难，就是一个奇迹。”他以一种令人战栗而又荒诞的乐观主义排除自己心里对独裁者的任何怀疑。他指责众所周知的怀疑派费利克斯·克尔斯滕说：“希特勒的一切估计都将证实是正确的。他的确始终还是永恒的最伟大的天才。他精确地知道，我们在哪一天赢得胜利。明年1月26日，我们将再度站在大西洋的岸边。”陆军参谋总

长古德里安表示异议说，他不知道哪儿能有军队来阻击苏联人的下一次进攻。这时，全国领袖对如此不必要的忧心忡忡和缺乏信心微微一笑。希姆莱说：“您知道，亲爱的大将，我根本不相信俄国人会进攻。这一切不过是虚张声势。”

在一个短暂的时刻里，德国好似处在希特勒和希姆莱的两双眼睛注视之下。然而希姆莱的权力只是虚假的表象。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证实：“希姆莱尽管表面上权力有了增长，但实际上还是在走下坡路。”这些两双眼睛论者忘记了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没有计算在内。这一双眼睛属于这个人，他以炽热的嫉妒心密切地注视着竞争者希姆莱跨出的每一步。全国党务书记官、纳粹党组织的总管马丁·鲍曼是独裁者的主要幕僚，同时，也是把守通向独裁者身边的卫士。他阻挠着“海因里希大叔”的青云直上——鲍曼喜爱称呼希姆莱为“海因里希大叔”。

希姆莱跟鲍曼为掌握国内保安处大权的斗争，已经说明领袖大本营灰衣主教的权力有了急剧的增长。德国的地盘在敌人连续追击下愈是缩小，鲍曼的金雄旅行动队<sup>①</sup>在战线后方的叫声就愈尖锐刺耳。鲍曼猜疑地注视着，不让希姆莱和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触犯党的统治地位。只要哪个纳粹党区领袖自认为受到一名党卫队领袖的侵犯挑战，鲍曼就出面干预。装备部部长斯佩尔回忆道：“鲍曼碰到这样的情况就立即向希特勒报告，并借此加强自己的地位。”由于希特勒也与他的耳边告密者看法相同，即越来越进入德国本土的战争只能由党来掌握政治领导，因此鲍曼把他的党阀们明显地推上指挥军事的操纵台。取代在领袖大本营里业已被摒弃的武装部队地位的，不是党卫队，而是纳粹党区领袖们彼此竞相争夺。

<sup>①</sup> 指德国在苏联被占领地区内任职的纳粹经济专家，受纳粹党中央、即鲍曼的直接领导。——译者

在他们当中，最野蛮残暴的埃里希·科赫，已从乌克兰被撵回老家东普鲁士，首先表明鲍曼式的党领导如何设想来保卫德国本土的战争的。科赫作为纳粹党东普鲁士区的德国防卫长官自诩为该区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不受武装部队和党卫队掣肘，因为他不把这两个部门放在眼里。他不征询莱因哈特大将领导的集团军的意见，擅自派人挖掘防御阵地，建立一支以残废者、老人、未成年的少年组成的私人部队，名为“人民冲锋队”。他还征用东普鲁士为陆军从事生产的军火工厂，拒绝任何人给他的人民冲锋队在军事上出主意。东普鲁士防卫长官科赫甚至同领袖大本营讨价还价，获得了希姆莱为自己及其部下所要求拥有的职权。这位纳粹党区领袖可以支配军官和士兵，并且派人搜捕开小差的官兵。

509 科赫的这种由半瓶醋加上妄自尊大取得的胜利，启发了希特勒和鲍曼，决定不遗余力地使德国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古德里安曾经建议，在东部建立一支归陆军领导的地方冲锋队，希特勒将这一建议改为按照科赫的样板，搞一支由党直接控制的人民冲锋队。人民冲锋队的首领是马丁·鲍曼。9月26日，鲍曼指示纳粹党各区领袖，立即准备着手建立人民冲锋队。三个星期后，在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1813年10月18日)纪念日这一天，由希特勒发布一项公告，人民冲锋队正式成立。但纳粹政权这一最后的疯狂挣扎的行动同时也削弱了希姆莱的权力，因为补充军总司令只授权监督人民冲锋队的组织、训练和装备事宜，而征召新兵和政治领导则由鲍曼负责。

此外，鲍曼还懂得怂恿希姆莱的另一对头约瑟夫·戈培尔，来反对党卫队头子。在7月20日以前，中央宣传部长还指望：“希姆莱抓军队，我抓民兵作战！这样结合起来，能对我们的作战以新的促进”；但是在行刺希特勒事件以后，戈培尔看出鲍曼的实力更强大了，于是站到了鲍曼一边。鲍曼因此执意任命宣传首脑为负责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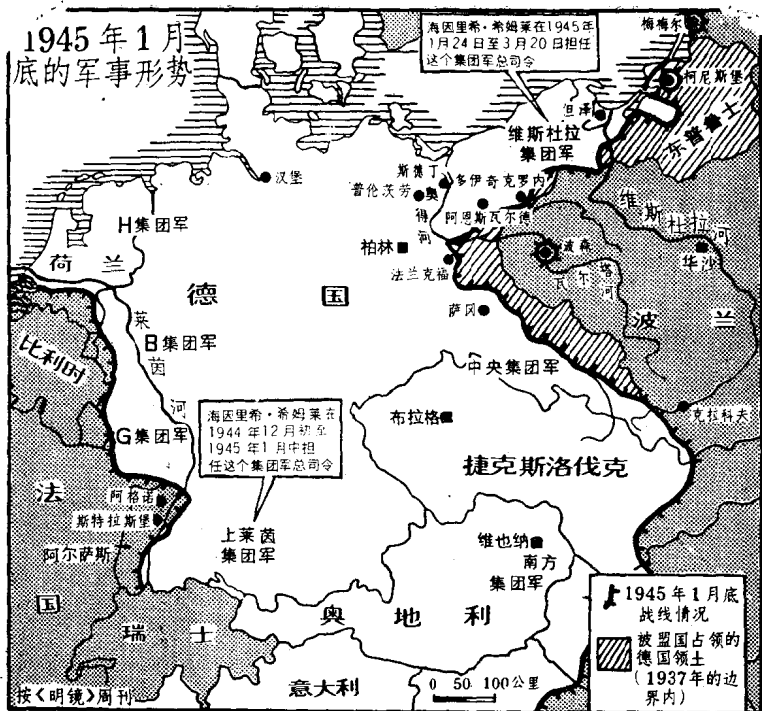
作战兵力调配的中央全权代表。12月，戈培尔奉命负责检查部队的兵力，以向领袖大本营提出调动部队的建议——这是再一次明显地侵犯补充军总司令希姆莱的职权。

不过，尽管如此，鲍曼仍然畏惧希姆莱的权力，只要党卫队头子依然出入领袖大本营，并对全国党务书记官在暗中出点子展开斗争的话。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即把希姆莱从独裁者的贴身圈子中排除出去。鲍曼想了一个主意。他知道，这个早先的见习士官希姆莱私心渴望有一天担任作战部队的统帅；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兰次胡特的文科中学生一直对所谓前线经历未能如愿以偿，他梦想过统帅生涯。马丁·鲍曼设法满足了他这个愿望——从而导致了希姆莱的没落。

11月底，英美军队进入阿尔萨斯，迫使德国第十九军团退缩到莱茵河左岸的一个桥头堡。形势需要在河的右岸配置一支截击部队，以便一旦第十九军团进一步撤过莱茵河时收容其残部，并阻击敌人的进攻。领袖大本营决定，在卡尔斯鲁厄和瑞士边境之间的地区新成立一个集团军。这时，鲍曼建议，任命希姆莱担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

希特勒和鲍曼提出希姆莱为这支解围部队的指挥人选，很合<sup>510</sup>胆战心惊的军人们的胃口：希姆莱是唯一能给新建集团军配备兵力的补充军总司令，再说身兼警察总监的希姆莱在第一线担任阻击任务也最合适不过了。

12月初，希姆莱被任命。这位喜形于色的“上莱茵总司令”没有觉察，鲍曼递给他的是一把刀口向上打开的刀子。现在，希姆莱终于可以实现青年时代的梦想了。现在，希姆莱元帅将要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一个伟大转折了。起初，他还能以他的勤勉和组织才能蒙骗一些士兵。他在短期内建立了一条阻击线，动员他的补充部队加入上莱茵集团军，并很快就掌握了一支由他的补充军



人员、人民冲锋队队员、边境海关防卫人员、高炮兵助手和东方步兵营拼凑起来的五花八门得出奇罕有的武装力量。而且尽管迷信得不敢走出设在黑森林的战地指挥所，他还是准备跟敌军激战一场。不过，他目前仅满足于对内部敌人取得的一些微小的胜利。他以所谓无能为理由，解除军司令和团司令的职务，拒绝集团军在任任何一点上服从负责整个西线的西线总司令的领导。

511 他已经坐在自己大本营里在纸上进行着西部的决战，但却没有觉察到，他在党卫队和国家内的统治业已分崩离析。党卫队全国领袖隐身在黑森林中，这使某些党卫队领袖们感到振奋，他们跑到显然比希姆莱更有权势的对手鲍曼那里去寻求自身的运道。投靠对手的倒戈者不乏其人，其中具有影响的党卫队员，例如希姆莱

派驻领袖大本营的私人代表、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赫尔曼·菲格莱因，他与爱娃·勃劳恩的妹妹格蕾特结了婚；还有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副总指挥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博士。

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的倒戈不是没有讽刺意义的，在海德里希死去后，希姆莱于1943年1月将党卫队第二梯队领袖人物的林茨律师卡尔登勃鲁纳召到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以阻止再出现一个海德里希。当时几乎谁也不认识这个瘦长个子、满脸疤痕、连续不断抽烟的卡尔登勃鲁纳。同事们要问起他的经历，得到的回答是，他先前负责党卫队多瑙河地区总队的领导工作。他的飞黄腾达完全是夤缘时会，1938年以前，奥地利的准法西斯警方制服了他的一个个前任。此外，希姆莱注意到让卡尔登勃鲁纳的权力小于前任海德里希。党卫队头子事先已把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人事权和经济问题主管权拿了过来，将其交给党卫队内部的两个竞争者，即党卫队的人事处和经济管理总处。

卡尔登勃鲁纳到职视察时，发现这个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各处处长竟比新主人具有更高的权威。他被他那些各自为政的各处处长“常常抛在一边，许多事情只是在事后才了解”，卡尔登勃鲁纳有一次向他早年的同学斯科尔兹内诉苦说。这个解救墨索里尼的人记述道：“我感到，这个人似乎……并不完全心情舒畅。”不过，德国中央保安局新局长率直得有些过分的奥地利式的魅力，并不能掩饰卡尔登勃鲁纳迫不及待地要夺回他前任的权力。1944年，他已被公认为黑色集团的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甚至希姆莱有时也对卡尔登勃鲁纳的一双粗糙、不加修饰的手感到畏惧，这双手曾经使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吓得心惊肉跳。

但是，与鲍曼的结盟确保卡尔登勃鲁纳拥有海德里希从未享受过的特权。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主人成了领袖大本营的常客，直接听取希特勒的命令，不用再经过希姆莱转手。过去从未有过

的事情是：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有职有权，似乎他执行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政策只对他的领袖负责。

希姆莱的忠实部下理解卡尔登勃鲁纳的倒戈意味着什么。他们提醒全国领袖注意鲍曼集团的阴谋，并力图使希姆莱抛弃他的统帅美梦。1944年12月21日，戈特洛勃·伯格在致希姆莱的  
512 信中写道：“我请求您，尽可能在短期内结束上莱茵总司令的活动，重返领袖大本营。我的这项请求不仅仅是鉴于某些方面在竭尽全力推波助澜地制造谣言——党卫队全国领袖已失宠，武装部队凯特尔可赢得了胜利——而是因为发现，党卫队全国领袖不在大本营，我们的政治工作……已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在武装党卫队宣传队的“库特·埃格斯”旗队中，忠于希姆莱的人也都感到不安。旗队长冈特·达阿尔克文派他的军官草拟了一份致希姆莱的条陈，要求党卫队必须结束“鲍曼垄断”的局面。

然而迷恋统帅威风的希姆莱对接连的报警呼吁置若罔闻。他对自己的王储地位感到十分可靠。他坚信，自己有权当希特勒的继任人——直到后来，他才认识到，1945年5月2日深夜至3日凌晨，他将这一认识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写信告诉了党卫队副总指挥贝斯特：鲍曼和最高统帅部是使用了伎俩制服他的，他们交给他军事指挥权，只不过是让他失败。1944年底，他还不愿相信这一点，那时，他感到当统帅是有前途的。1945年1月初，正当他有机会显示其作战素质时，他是多么醉心于表现自己啊！

在一次规模有限的反攻当中，某友邻集团军部队的两个快速师成功地在阿格诺突破了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挺进到阿尔萨斯的北部。这个战果激励希姆莱制定了一项好大喜功的计划：他在领袖大本营提出建议，把这两个师划归他指挥，让他率领这些部队去收复斯特拉斯堡。他坚决要求他的第十九军团还要在阿尔萨斯中部保持一个桥头堡，只要拨给他这两个师加强他在阿格诺地区



的力量，攻占斯特拉斯堡是不困难的。领袖大本营不顾西线总司令的反对意见，批准了这位统帅的方案，高级将领希姆莱火速发出了命令。

阿格诺的两个师沿着莱茵河动作迟缓地向南运动，在它们还未来得及进入新阵地之前，盟军在北阿尔萨斯受挫后已稳住阵脚。尽管这样，美国军队仍然遭到希姆莱猝不及防的攻击，希姆莱的部队已进逼到距离斯特拉斯堡不多几公里的地方，致使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打算放弃城市，并将他右翼的部队撤至佛日山后面。但斯特拉斯堡市长弗雷表示抗议，于是盟军据城固守。德军攻势已急。1月20日，盟军开始反攻，扫掉了希姆莱部队去莱茵河西岸的所有桥头堡，并在一个月后将最后一个德国士兵撵到了莱茵河东岸。

就在希姆莱这位统帅预兆行将败北的时候，鲍曼又为他的对手安排了一个作战指挥任务。这个任务必然使党卫队头子更深地卷入这个日趋败亡政权的军事灾难，并成为疑神疑鬼的独裁者不得不发泄怒气的对象。希姆莱接受了一支新的影子部队，这一次是上东线：维斯杜拉集团军。 513

1945年1月12日，苏联人展开了不久以前还被希姆莱一笑置之的攻势，事实证明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最强大的一次攻势。三百万红军向着七十五万装备低劣的德国士兵压将过来，在短短几天内就摧毁了几乎整个德军的防御线。苏联元帅切尔那亚科夫斯基和罗科索夫斯基的集团军直指柯尼斯堡和但泽，而苏军中路攻击部队的朱可夫元帅占领了德国专区瓦尔特兰，他的同志科涅夫则挺进到萨冈，德方防御者惊慌失措：行列长长的溃逃士兵、被强奸的妇女的悲号声以及特别军事法庭发出自杀性的愤怒喊叫，在这一片混乱声中，东普鲁士直到海岸的狭长地带已全部丢失，北方集团军遭到了沉重打击。

苏联攻击部队在德军北方和中央集团军之间进行突破，将东北方面防线撕开了一个大缺口。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地区任凭俄国军队驰骋。七零八落的战斗部队、补充部队和人民冲锋队没有统一的指挥，几无任何防御可言。因此，参谋总长古德里安于1月23日建议，在波美拉尼亚配备一个新的集团军司令部，由它负责迅速把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现有的部队集中起来，并建立一条防线。这支“维斯杜拉集团军”可由陆军元帅冯·魏克斯男爵指挥，由于巴尔干战场的缩小，他的司令部早已空闲无事。

希特勒表示同意，但是独裁者对古德里安为这支新集团军推荐的统帅候选人“感到反感”。他知道有一个较为合适的人：希姆莱。唯有党卫队头子可以考虑担任这个地区的保卫工作。古德里安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对这一明显的失策感到惊讶，”参谋总长记述道，“我竭力进行争辩，以扭转对于不幸的东线采取这种胡闹的做法。一切都是徒然。希特勒断言，希姆莱在上莱茵地区干得非常出色。他手里有补充军，因此可以直截了当地动用他的兵源。”当古德里安试图至少给这个外行战略家配备几个有经验的总参谋部的军官时，独裁者也不同意给以这种支援。希姆莱挑选了一名果断的、但不熟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武装党卫队装甲部队将军担任自己的参谋长，即旅队长海因兹·拉麦丁，并且给自己身边配备了另外一些党卫队领袖，直到后来，他才接纳陆军军官担任幕僚。

不过，这个于1月24日在多伊奇-克罗内<sup>①</sup>设立起战地指挥所的人物，当时在上莱茵还大做其荒唐的统帅之梦时所具有的妄自尊大的信心现已不复存在。他来到东线并非没有忧虑；恐惧感紧紧抓住了他。他畏惧独裁者喜怒无常的性格和报复狂。希姆莱

---

<sup>①</sup> 旧德国波森-西普鲁士境内地名。现为波兰境内的伐乌奇。——译者

很清楚，不把多年经营的赌注统统押上去，他是一定要再次吃败仗的。他必须分秒必争，立即和时刻取得战绩。他既是惶惶不安，又有莫名其妙的怒火，急匆匆地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他把最后一批补充军队调来，派出党卫队和警察行动队去搜寻还能作战的士兵，拼凑新的武装党卫队部队，不过这些师只拥有旅的兵力，还把经过考验的党卫队将军如副总指挥施坦因纳调到他的集团军里来。他缺少有作战能力的部队，他就以“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空洞口号、英勇善战的大话，在老百姓的面前装成实力雄厚的样子，对于这种虚假实力就连希姆莱自己也是不会相信。“我们担负的任务，”他向本集团军的将领和师长训话说：“是我们祖先对付阿瓦伦人<sup>①</sup>、蒙古人以及在东南部对付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曾经上百次完成过的。当年唯一可靠的盟友也是自己的力量和勇敢的心。”他通过党的机关报《波美拉尼亚报》宣布：“对现有兵源和武器的挖掘和利用，以及将后方的全部力量投入战斗，正在出现奇迹般成绩。南波美拉尼亚居民已认识到当务之急，前线屹立不动，并将不断增强实力。”

希姆莱尽管自吹自擂得很热闹，但也无法掩盖他正在走向一场灾难。这个迷信的冒牌统帅是第三帝国统治者中最相信星相和听信占卜家的预言的人，他眼见自己晦星高照。希姆莱刚想派出党卫队第十集团军在奥得河—瓦尔塔河河曲地区阻挡住苏军向奥得河的挺进，尚未付之行动即已宣告失败。1月29日，朱可夫的部队出现在奥得河阵地旧有的坦克工事前面，并且迅捷占领了阵地。

希姆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试图发动反攻来挽回奥得河的失利。他把自己最精锐的党卫队部队调到施奈德米尔地区，从侧翼进攻朱可夫的部队——这次毫无希望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失

---

<sup>①</sup> 阿瓦伦人：亚洲的一种游牧民族。——译者

败。德国人被迫继续后退。希姆莱统帅连续败北，再也没有把握  
515 得到领袖的恩宠，托病规避。他日益频繁地造访青年时代的朋友、  
这时在霍恩吕兴负责党卫队一所军医院的卡尔·格布哈特；而在  
战地指挥所里，总司令希姆莱也只在几个小时里面才接见部属，到  
了晚上十点钟，对于他来说战争已完全停止——没有一个军官敢  
于打扰这位贪睡的高贵人物。

希姆莱自动偃旗息鼓，使参谋总长古德里安有了借口，拼凑维  
斯杜拉集团军的余力进行一次决战。他计划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  
出其不意地向苏联部队进行突击，将其击溃在瓦尔塔河以北，肃清  
波美拉尼亚境内的俄国人，从而确保与西普鲁士的联系。为实现  
此项目标，古德里安想派瓦尔特·温克将军去希姆莱司令部担任  
作战指挥。大概古德里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际上排除身为  
作战指挥官的希姆莱。2月13日，参谋总长在总理府向希特勒报  
告了这项计划，可是独裁者立即看穿了古德里安自私的打算。当  
独裁者跟参谋总长就党卫队头子的军事素质进行争论时，希姆莱  
神色尴尬、面容苍白地坐在一旁倾听。争辩者嗓门越来越高，言词  
越来越尖锐。

古德里安：“温克将军一定得去全国领袖司令部负责指挥，否  
则就无法保证这次进攻的胜利。”

希特勒：“全国领袖足有能力指挥这次进攻。”

古德里安：“全国领袖缺乏经验，没有一个合适的司令部，不能  
独自指挥这次进攻，为此温克将军是断不可少的。”

希特勒：“我不许您在我面前责备全国领袖不能承担他的任  
务。”

古德里安：“我不得不坚持温克将军去集团军司令部担任指  
挥，以便恰当地领导这次作战行动。”

争论双方拉开嗓门对吵了两个小时，互不相让。希特勒怒气

冲冲地踱来踱去，突然在党卫队头子的面前站住。希特勒说：“好吧，希姆莱，温克将军今天晚上就上您的司令部去，指挥这次进攻。”他向古德里安瞅了一眼，然后微笑道：“请吧，您继续报告下去。总参谋部今天已打胜了一仗。”

希姆莱权力的末日开始到来了。古德里安的计划虽然遭到失败——四天后，温克遭遇车祸，进攻失利——但参谋总长坚持不懈地设法使东部陆军摆脱希姆莱的控制。他两次向希特勒提出要求撤换维斯杜拉集团军总司令，独裁者两次不予同意。这时古德里安绝望之余想了一个计划：他亲自出马去劝说希姆莱辞职。但是，当他找到战地指挥所——这时已迁至普伦茨劳——要求通报 516 见集团军总司令时，古德里安获悉，希姆莱患了“重感冒”，已躺在他的朋友格布哈特的医院里好几个星期了。拉麦丁旅长问大将：“您能把我们从我们总司令的掌握下解救出来吗？”

古德里安能够做到这点。3月18日，他出现在希姆莱的面前，当希姆莱认出来访者的时候，他咳嗽着，害羞地缩进鸭绒被里去。但是古德里安婉言对党卫队头子劝慰一番，并向他断言，大家完全理解，全国领袖担任了不少重要领导职务，不必再为一个集团军司令官的琐碎工作操劳，特别是他的健康状况又这么不好。这位吃了败仗的统帅一面听他讲话，一面再次大吃一惊。他喃喃自语道，领袖会怎么说呢，充满期待地望着参谋长。古德里安表示给予帮助：要是全国领袖没有顾虑，那么他古德里安可以主动请求领袖卸去全国领袖的集团军指挥职务。1945年3月20日，这件事情终于实现。希特勒几乎漫不经心地同意了这项提议，委派第一装甲军团司令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接替党卫队全国领袖对维斯杜拉集团军的领导工作。希姆莱的统帅之梦破灭了。

几乎谁也没有料到，1945年3月20日这一天竟显露了：海因里希·希姆莱向其毕生崇拜的偶像告别，背离这个身穿党卫队外

衣的神秘主义者为之奉献最残忍的鲜血祭品的上帝，同任何作者都无法如此程度编造的弥天大谎者告别了。从1945年3月20日这一天起，希姆莱打算挽救他认为还可挽救的东西：他自己的生命，集团，一种阴暗的、飞黄腾达的幻想。当然，要说他不遁入一个新的梦幻世界的话，那他也就不能成为海因里希·希姆莱了，因为他异想天开地认为自己是促成和平、领导摆脱希特勒的战后德国的合适人选。

3月22日，海因里希大将在任命后来到普伦茨劳司令部向他的前任报到。希姆莱神色尴尬地让他过目移交给他的家底，但是当这位军人请求全国领袖作一次“一般政治性讲话”时，希姆莱又恢复了原先的信心。他的神态判若两人。权势显赫的党卫队的主子缓缓转过身子，挽住海因里希的胳膊，审慎地把他带到自己的司令办公室一角的沙发上。希姆莱低声说：“现在是我们跟西方敌对者进行谈判的时候了。我已为此采取了行动，我的联系人已接上了头。”

希姆莱第一次向一个局外人透露了他一直战战兢兢隐藏的秘密：几个月来，这位党卫队头子力图通过瑞典和瑞士的居间人跟盟国接触，劝说西方国家同意单独媾和。在这以前，德国人只看到党卫队的一面。现在，至少它向了解内情的人露出了另一面，而这一面少不了具有十分怪诞的线条：就是这个党卫队，它无情地扑灭任何对最后胜利的怀疑，它运用特别军事法庭、慷慨激昂的号召和切腹自杀的行动煽动德国人坚决顶住，它竟然试图通过跟敌人秘密签订协定来挽救自己的生存，原因是它自己已不再相信能够取得胜利了。这种怪诞线条中掺杂着一种阴森恐怖的成分，因为愿意投降的党卫队领袖们恰好挑选了一个民族作为自己求得生存的救命稻草和抵押品，他们曾经打算把这个民族斩尽杀绝，不留一人。党卫队领袖们估量，只有通过犹太人质才能争取促成他们同西方

国家进行对话。

某些党卫队领袖包括希姆莱在内之所以抱这样幻想，主要也是归功于那个肥胖的、干练的、有点喜爱吹牛的波罗的海地区人，他不厌其烦地劝说党卫队及其全国领袖背弃阿道夫·希特勒。保健医生费利克斯·克尔斯滕是勃兰登堡行政区一个家族的子孙，1908年生于多尔帕特，是个养尊处优、乐于助人的按摩医生。他多年以来对希姆莱起着奇特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历史上只有一个事例可以与之相比拟：即华伦斯坦<sup>①</sup>屈服于意大利占星家吉奥瓦尼·巴帕蒂斯塔·塞尼的魅力。这位十七世纪的帝国元帅不向他的亲信塞尼征询对命运的预言，就寸步难行，同样全国领袖也经常要听取他这位外国常客的意见。如果说那个意大利人的望远镜使瓦伦斯坦摆脱了黑暗势力的梦魇，那么这个波罗的海人的“两只妙手”——这是法国作家约瑟夫·克塞尔的说法——就使希姆莱消除了几乎无法忍受的胃痛。

因为费利克斯·克尔斯滕的拿手本领是，借助他的双手敏感的按压就可使人消除病痛。他早年在芬兰学会了这种用手操作的治疗法和一种医学，这种医学的代表人物认为，许多疾病都是由于神经紧张造成的，因此只要让神经放松就能重新康复。克尔斯滕持着他那张芬兰发给的按摩医生学位证书移居柏林，成为柏林上流社会的一名时髦医生。有一次中国的按摩名手郭医生<sup>②</sup>让这位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进行治疗，高兴地叫了起来：“年轻的朋友，您还有一点不理解，但是我等了您三十年，您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能手。”

克尔斯滕的魔手创造了奇迹，收入达到二十年代柏林一个医生收入的最高酬金。杰出按摩医生的名声迅速传遍全欧洲，特别是克尔斯滕善于把他的医术和一种粗俗的赚钱欲，同周旋于宫廷

<sup>①</sup> 华伦斯坦(1583—1634)：欧洲历史上三十年战争之统帅。——译者

<sup>②</sup> 原文 Dr. Ko。——译者

518 贵族之间的殷勤结合起来。几乎生来就决定了他扮演王公显贵的御医角色：他的教父中有俄国沙皇宫廷的御医亚历山大·韦斯特贝格。克尔斯滕在1928年担任荷兰皇族的御医。十一年后，他可以自称是第三帝国医生所能想象的一个最危险的病人的保健医生，这个最危险的病人就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

克尔斯滕的一个病人叫奥古斯特·罗斯特尔贝格<sup>①</sup>，是苛性钾工厂主，也是“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的成员，他把这位神医介绍给希姆莱。克尔斯滕的传记作者天主教神学家阿希姆·贝斯根记述说，1939年3月，克尔斯滕确诊“希姆莱患有交感神经系统的剧烈痛疼病，在发作痛疼时，他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消除了他的苦痛”。党卫队头子对于这种奇速疗效几乎难以置信。希姆莱说：“许多德国教授替我看过病，没有一个人能帮我治好。请您帮我看看，教授先生。”克尔斯滕不得不向他的新病人说明，他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博士，不过虽然这么说，他还是应召来给这个忧心忡忡的人充当保健医生。

克尔斯滕再也离不开希姆莱的左右。不久他就懂得，这双止痛的手给了他以对希姆莱施加影响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遇到希特勒开始施展魔法才不起作用。不然，希姆莱就无所顾忌地听取克尔斯滕的一切提示和意见——只要按摩医生的手指按到了全国领袖被疼痛折磨着的躯体，希姆莱自己就承认，他也是一个人。克尔斯滕两只手进行的各种搓揉动作，促使病人作出异乎寻常的让步。有时一个知名人物被放出了集中营，有时一个危险人物弄到了护照离开德国，有时则使成千名犹太人免遭最后解决机器的杀害——克尔斯滕对于别人是有求必应，而且常常能够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他的拯救，他们感激希姆莱的按

---

<sup>①</sup> 正文为 Rosterg。书末索引为 Rosta:berg。按后者音译。——译者



摩医生救了他们的命。克尔斯滕使后来担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总理的特奥多尔·施特尔策免遭处决，他阻止了消灭芬兰犹太人的计划的实现，他制止了掠夺荷兰的艺术宝藏，他使斯堪的那维亚集中营的囚徒转移到中立国瑞典。

不过，克尔斯滕同时也使党卫队头子对这位世界主义者亲信到这种程度，甚至他在1943年可以完全不受希姆莱的约束。克尔斯滕获准离开他那位于柏林北面的哈尔茨瓦尔德庄园，移居斯德哥尔摩，具有用145代号随时和希姆莱通电话的特权。费利克斯·克尔斯滕的历史叫后人看来，显得如此奇妙和难以置信，致使荷兰政府在1947年委托以中央战争史研究所所长尼古拉·威廉斯·皮斯特胡穆斯教授为领导的历史学家委员会，研究一度任荷兰御医的克尔斯滕的活动。委员会用了三年时间，对克尔斯滕的敌人和朋友作了调查，详细研究了好几个国家的档案，并审查了按摩医生长达八百页的日记。1950年波斯特胡穆斯作出判断：费利克斯·克尔斯滕为人类与和平如此不寻常地做了这么许多事情，以致他这位教授敢于断言，历史上还找不到任何同样甘冒危险施爱于人的范例。 519

教授之所以作出这一论断，也可能是特别考虑到克尔斯滕的机灵，他凭着这种机灵从1944年初起就善于使希姆莱错误地认为，全国领袖只要停止执行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方案，才能博得西方盟国的好感和倾听他的要求。党卫队头子在百依百顺听从希特勒和自己需要苟全生命之间摇摆不定，克尔斯滕进一步逼使他离开激进的最后解决的政策方针，拨动他的怪诞想象，即一旦希姆莱中止屠杀犹太人，与西方国家谈判的大门就会自动打开。希姆莱完全乐意相信克尔斯滕的神话。

“1944年初夏”，波斯特胡穆斯教授听一位不愿暴露真名的党卫队副总指挥介绍说：“克尔斯滕在东普鲁士黑格瓦尔德海姆有次

用餐时谈起犹太人的问题。提得相当突然。谈话因此非常活跃，出现了许多尖锐的字眼。克尔斯滕态度变得非常坚决起来，我本人当时也在场。克尔斯滕象一只鹿身上的虱子，紧紧缠牢希姆莱不放，直到他最后答应彻底改变整个关于犹太人事务才罢休。犹太人得到优待。‘您将会满意的，克尔斯滕，’希姆莱说。”

在党卫队领袖中，最后解决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首先觉察到情况有所改变。1944年3月，他偕同同事克鲁迈、丹内克尔、维斯利歇尼、诺瓦克、洪舍和阿布罗迈特去匈牙利，上演种族主义屠杀的最后一幕：消灭匈牙利的犹太民族。鉴于苏联军队的逼进，艾希曼鼓励德匈两国的最后解决执行者赶快抓紧干。匈牙利的九十万名犹太人被赶进隔离区。犹太人按六个地区集中。随后，这位不知疲倦的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向德国铁道部门下达了载运死囚的命令。最后的一次奥斯维辛之行可以开始了。艾希曼刚刚为第一批两个区的运送工作准备就绪，突然遭到一个同僚的阻挡。

保安处驻匈牙利的头头、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奥托·克拉格斯预感千载帝国末日日益临近，正在神经质地寻找一种手段，以保自己在灾难过后能有前途。在保安处驻布达佩斯的机关里，也有被保安处吃掉的原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谍报局的代表人物。克拉格斯从他们那里获悉，他们跟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有接触，这个组织打算以巨款说服德国人中止对犹太人的屠杀。

1943年1月，三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工程师奥托·科默吕、新闻记者雷茨佐·卡斯特纳和针织品商人约埃尔·布兰德——加入一个小组，他们叫它“瓦达特埃茨拉弗-哈察拉赫伯-布达佩斯”(瓦达赫)，译成德语为：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他们计划帮助在德国、波兰和斯洛伐克处境危险的犹太人逃到匈牙利，然后去巴勒斯坦。在进行营救活动时，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

员会的负责人想了一个主意，只能用金钱贿赂最后解决执行者，来赎买受害的犹太人。卡斯特纳和布兰德迅即发觉，在金字招牌的后面有一些党卫队员，他们完全愿意待价而沽。

主管最后解决斯洛伐克犹太人的执行者、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迪特尔·维斯利歇尼，甚至将生意经奉为党卫队的一项纲领。1942年，他在一份“欧洲计划”中提出建议，如果“世界犹太民族”打算交付二百万至三百万美元高价赎身金，我们可以不对还活着的欧洲犹太人（波兰犹太人除外）进行最后解决。当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获悉这个维斯利歇尼同属艾希曼驻布达佩斯的党卫队特遣队时，卡斯特纳和布兰德产生了希望，认为可以通过行贿减轻匈牙利犹太人的厄运。1944年4月初，卡斯特纳造访了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向他提出进行这笔交易，维斯利歇尼立即表示同意。这位党卫队员答应，党卫队特遣队准许以四百万德国马克赎买六百名犹太人，让他们移往巴勒斯坦。卡斯特纳的拯救委员会付了赎身金，可是维斯利歇尼背信食言，他讥讽地拒绝了卡斯特纳的一切请求。

虽然如此，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仍坚持执行既定的赎买计划，在陆军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中物色比较可靠的谈判对手。布兰德这时也跟德国谍报局的成员有了接触，1944年4月初，保安处头头克拉格斯于是通过这条渠道听到了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的建议。他将该委员会的方案报告了希姆莱，并建议全国领袖，同意与拯救犹太人委员会就提供武装党卫队军事物资问题进行谈判。克拉格斯的这项建议显然引起了希姆莱的贪欲，因而几天后艾希曼就接到最高指令：同约埃尔·布兰德进行接触。

党卫队首领难道仅仅是出于贪欲的驱使吗？起初无疑是这么回事。但不久看来希姆莱就有了进一步的考虑，党卫队全国领袖可以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者布兰德和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同

西方盟国进行对话。何况布兰德和卡斯特纳的胃口很大，他们后面有被党卫队员迷信地称之为“世界犹太民族”的金钱和力量。布兰德的表兄弟、匈牙利企业主安德烈亚斯·比斯是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的积极赞助者，也是匈牙利最后解决方面知识最渊博的编年史家，他发现“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嘴脸越来越清楚了，希姆莱指望通过同我们的接触，首先充实他的武器和物资，进一步扩充他的党卫队，但是随后——不多久——就试图在华盛顿缔结一项转保险，而且如我后来所发现的，这项转保险只限于他自己，是把他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完全排除在外的。”

艾希曼在看到许诺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可能结束屠杀犹太人的命令时，心中必然也产生了不愉快的感觉。他执行任务时心里老不高兴。4月25日，他约见布兰德，向布兰德提出建议，如果世界犹太民族付出一种代价，而且不是金钱，是物资，当可把匈牙利犹太人不列为最后解决对象。艾希曼要求获得的东西是：一万辆卡车，二百万箱肥皂，两百吨茶叶和二百吨咖啡。艾希曼还要求布兰德上伊斯坦布尔去，跟该地的世界犹太人组织代表磋商供应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仍按原定计划开始集中押运匈牙利犹太人，只有等布兰德提出了世界犹太民族的应诺证明，才予以停止。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声明，尽管有些为难，还是表示同意。不过要求艾希曼作出一个诚意的象征表示：开出一趟“示范专列”。在布兰德到达伊斯坦布尔的同时，必须有六百至一千二百名匈牙利犹太人启程去一个中立国家。艾希曼表示同意。1944年5月17日，谈判人布兰德启程出发。

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的代表还未打点好行装，艾希曼就开始用鞭子将匈牙利犹太人赶入去奥斯维辛的死囚列车。布兰德打算至迟十四天返回布达佩斯——到那时，艾希曼赌咒发誓非把匈牙利犹太人斩尽杀绝不可。艾希曼以一个认为自己被别人欺

骗失去了人生意义的人的病态狂，撵着一列又一列火车驶往奥斯维辛。他凭着善于理解上级意图的能力完全懂得，最后解决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他的顶头上司卡尔登勃鲁纳和秘密警察缪勒坚决主张屠杀犹太人，但是在希姆莱的指示中已可听出新的语气。艾希曼更是仓皇急促地下达押送犹太人的命令，匈牙利犹太人隔离区更加迅速地腾空出来。6月7日，一号和二号隔离区的犹太人已运送一空，二十八万九千三百五十七名犹太人已在西里西亚的毒气室中被杀害。6月17日，三号隔离区已出空，五万零八百零五名犹太人送进奥斯维辛。6月30日，轮到四号区的四万一千四百九十九名犹太人。

当谈判人布兰德看来无影无踪不知去向时——他遭到伊斯坦布尔犹太人代表的拒绝，在行经叙利亚的途中被英国人逮捕——艾希曼更是放开手来大干。他千方百计地破坏已应允的将犹太人释放去国外的运输工作。他拒绝让挑选出来乘“示范列车”的犹太人运往布达佩斯集中。他想不断减少挑选的犹太人人数。他禁止按商定的精神放犹太人去葡萄牙。为了拒绝给这批为数寥寥的犹太人自由，艾希曼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卡斯特纳呼吁最后解决执行者信守诺言，请求保安处头头克拉格斯给以帮助也都徒劳无益。<sup>522</sup>业已丧失信心的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的人员突然获悉，布达佩斯驻有一名希姆莱的全权代表，这个人是艾希曼眼中最厉害的竞争者。

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库特·贝歇尔负责党卫队全国领袖本部的装备部，并受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机关的委托，提供部队补充供给物资。一种偶然的心情驱使他去阻碍艾希曼的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他为了给武装党卫队置办两万匹马，结识了银行家弗兰茨·科林博士。他是匈牙利最大的工业康采恩犹太人创办的曼弗雷德-魏斯工厂的股东。善于相马的科林，给热情的骑手贝歇

尔搞到好马出了许多点子，这个党卫队队员对其殷勤也作出了报答。

没有多久，这两位骑手已成为莫逆之交，银行家可以把已故工厂主曼弗雷德-魏斯的家属担心私下告诉这位党卫队员。魏斯家族的大多数犹太人成员想赶在艾希曼的屠杀机器还未把他们卷进去之前，离开这个国家，希望贝歇尔给予帮助——对党卫队也有好处和利益。贝歇尔与魏斯公司签订了一项人道和敲诈勒索相结合的协定：党卫队接管魏斯家属“亚利安族”成员掌握的股份（占股份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五），让魏斯家属的四十八名成员，其中三十八名为犹太人，去葡萄牙，付给他们三百万德国马克补偿金，并留下九名家属作为人质。1944年5月17日，这项协定签了字，这个犹太工业家族的人员奔向了自由。

这项协定奠定了贝歇尔和艾希曼之间的死敌关系，因为这个最后解决执行人现在眼看自己的计划被希姆莱的代表破坏。如果说唯德国人之命是从的匈牙利政府已在责备贝歇尔侵犯马扎儿人<sup>①</sup>的经济的话，那么艾希曼就对贝歇尔的自行其事愤愤不满。他感到这种搞法骨子里意味着推行他所坚决反对的一种方案：通过赎身金拯救犹太人。艾希曼认为，库特·贝歇尔的行动证实了他的怀疑，即面对纳粹政权的日益衰落，全国领袖在犹太人的问题上“软下来了”。艾希曼深恶痛绝的东西，在他看来也体现在贝歇尔身上：“戴细软羊皮手套的党卫队领袖”。尽管身穿制服和担负任务，小资产阶级的艾希曼也不会忘记自己仍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他对商人的儿子贝歇尔的架势忍受不了：一个传统的汉堡社会的子弟、一个党卫队骑师和封建阶层人士的朋友，而且现在通过魏斯协定变成了匈牙利犹太人大草原社会的最后希望。

---

① 匈牙利的一种主要民族。——译者

在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看来，他是最适合于使艾希曼的屠杀机器停止转动的这样一种人。贝歇尔在给希姆莱写信时最后总是爱用“全国领袖的最顺从的贝歇尔”，他有一条同党卫队首领直接通话的专用线，他跟魏斯家族的谈判恰好符合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的原定计划。卡斯特纳顺利地会见了这位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争取他同意了“示范列车”的想法。6月底，贝歇尔乘飞机去谒见希姆莱，获得批准，今后由他自己取代艾希曼同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进行谈判。贝歇尔有力地推动了计划的实施。他要求在匈牙利为“示范列车”交付一笔保证金，专列到达确定的国家后，必须付清全部款项。每一名移居国外的犹太人价格为一千美元。卡斯特纳表示同意。6月30日，载着一千六百八十四名犹太人的一列火车驶离布达佩斯。

但是，艾希曼并未罢休。他擅自指示让装运犹太人的列车改道，驶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而希姆莱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因为英美报纸这时报道了约埃尔·布兰德的使命和以卡车交换犹太人的条件，其结果只能是，不论犹太人组织还是各盟国政府都不同意进行这种交易。据比斯记述，艾希曼洋洋得意地威胁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说：“呆在贝尔根-贝尔森的示范列车乘客将于一星期内运往奥斯维辛，抵达后将不加区别地全部送进‘磨坊’”，如果到时候约埃尔·布兰德没有带着犹太人世界组织的诺言返回布达佩斯的话。当卡斯特纳和比斯竭力要求他们的助手贝歇尔支持他们对付艾希曼的时候，这个党卫队员一口拒绝。党卫队全国领袖的最顺从的贝歇尔觉察到希姆莱战地指挥所的风向改变了，拒绝给予任何帮助。

但是，这一次保安处的克拉格斯给予了帮助：他允许比斯草拟一份备忘录，载明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在经济上作出的新诺言，由他代转希姆莱。1944年7月26日，比斯从克拉格斯处获

悉，“我的备忘录已由柏林接受，印象很好，希姆莱作出指示，在无新的命令之前，暂停匈牙利的外运工作。”——比斯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是第一次取得胜利，中止了死囚车去奥斯维辛之行。

现在，贝歇尔也鼓起新的勇气，再次乘飞机去谒见希姆莱。这位党卫队头子批准立即放行“示范列车”的五百名犹太人出境；关于所有其他一切人员移居国外的交付金额，则由贝歇尔同犹太裔美国人的资助组织“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驻瑞士代表进行谈判。希姆莱终于看到同西方国家谈判的门打开了一条微缝。由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居间接洽的、联合分配委员会提出的谈判条件，使希姆莱坚定起来，因为他可以想象，美国无非只是世界犹太民族的猎获物而已，相信由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经过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接头直接通往华盛顿白宫，并争取德国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单独媾和。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助长了这种狡猾的信念。比斯回忆道：“我们一再提出罗斯福总统是我们的保护人。”惯作奇思遐想的党卫队谈判对手们，对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工作人员谈到他们与华盛顿的所谓种种关系，都非常听得进去。

党卫队领袖催促给自己帮忙的犹太人敞开通向西方的大门。克拉格斯提醒谈判对手比斯：归根结底，问题不仅在于拯救几十万犹太人，而且在瑞士进行谈判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件完全具有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但是谈判人贝歇尔不久以后看穿了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的宣传目的。1944年8月21日，在瑞士边境圣玛加勒滕同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代表、诚实的瑞士银行家扎利·迈尔进行了第一轮会谈，贝歇尔通过这次会谈已完全清楚，无法指望促使犹太人组织作出这笔以犹太人换取卡车的交易，迈尔坚持，只有在希姆莱公开宣布停止屠杀犹太人，并给“示范列车”的全部乘客放行之后，才好谈生意。



· 其实贝歇尔只要给希姆莱写个报告就够了，而同联合分配委员会进行的谈判也就算失败了。但是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贝歇尔没有向他的全国领袖说明真实情况。他美化了拒不同意的银行家迈尔的声明，从而把摇摆、犹豫、恐惧的希姆莱越来越深地拉进反希特勒阴谋的灌木林中。也许贝歇尔为犹太人的命运所感动，也许是他自己相信这是一次排除希特勒在外的单独媾和的机会——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即这个党卫队员参加了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的演出。9月1日，同迈尔的会谈中，贝歇尔叫副官、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马克斯·格吕宗，以近乎央求的口吻请这位瑞士人至少略微作一点让步，即使要冒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领导拒绝承认迈尔的危险也在所不计。

但是，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和迈尔迟迟不表示任何具体允诺。如果不是9月底传来消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派教友会领袖罗斯韦尔·D·麦克莱伦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瑞士，受委托参加美国分配委员会的谈判，贝歇尔就要不得不承认他的努力遭到失败了。这正是希姆莱盼望了几个月的消息。他立即作出反应：还在9月30日，他让人通知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他已批准并确定从现在起最终停止在奥斯维辛的“行动”（当然反正已受到苏联部队的进逼威胁）；10月中，他作出决定，可以将“示范列车”残存的犹太人送往瑞士，不取决于人头费的支付。

刹那间，似乎美国就在酬答希姆莱的盛情了。罗斯福的代表麦克莱伦努力与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贝歇尔进行会谈，美国驻伯尔尼公使馆赶紧请求瑞士当局立即给希姆莱代表团办理入境护照签证。1944年11月5日，教友会会员和党卫队队员在苏黎世“博伦维尔的萨瓦饭店”会晤。“虽然盟国一致商定除全面的、无条件的投降外不同任何德国人谈判，但竟能举行这次会谈，对于这一事实，希姆莱定然看成是同我们进行接触的一项重要的一——迄今最

525

重要的——成果，”编年史家比斯评论说。“不过单从形式上来看，这次会谈即已破坏了德黑兰协定，因为西方国家和斯大林在德黑兰已达成协议同第三帝国绝对断绝来往。”

但是，希姆莱和贝歇尔对这次会谈寄予的希望并未获得实现。党卫队头子把最后解决执行人艾希曼从匈牙利召了回去，12月，布达佩斯“示范列车”的残余犹太人到达瑞士，可是进一步的谈判由于犹太人组织不愿以金钱和货物来酬答希姆莱的姿态而搁浅。尽管如此，瑞士的谈判仍然对一个党卫队领袖有所启迪，因为他长期以来就试图动员全国领袖反对阿道夫·希特勒。

保安处国外处处长、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施伦堡两年多以来一直在竭力争取希姆莱支持一项行动，以结束战争，并使党卫队幸存下来进入一个没有希特勒的未来时代。他和希姆莱同样妄想，犹太人质能引导党卫队领袖进入盟国阵营，因此施伦堡寻找熟悉的国外重要犹太人士。他跟蒙特勒两个信奉正教的犹太人施特恩布赫兄弟进行了接触，他们是美国犹太法学家协会在瑞士的代表。保安处国外处处长向他们提出，同样可望将犹太人从希姆莱的统治区内搭救出来。施特恩布赫兄弟与瑞士联邦老总统让-马里·米西博士<sup>①</sup>有联系，这位老总统出于人道的原因不拒绝参加跟施伦堡具有双重意义的赌博。

1944年10月初，米西宣布愿意去德国同希姆莱商谈犹太人的命运。这位瑞士人跟党卫队头子在维也纳附近会晤。希姆莱开始略有踌躇，随后他表示准备逐步释放德国在押犹太人，并让他们离境去瑞士。施伦堡在回忆录中斷言，希姆莱当时曾当着他的面口授打印一项指示，命令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保护所有集中营的犹太人生命安全。今天的不来梅粮食批发商人贝

---

<sup>①</sup> 让-马里·米西(Jean-Marie Musy, 1876—1952)为天主教保守党政治家、律师、银行家，1925—1930年任瑞士联邦总统。——译者

歌尔当然也提出同样要求，他在纽伦堡审判中还凭记忆谈到希姆莱指示的原文：“即日起，我禁止消灭任何犹太人，相反命令对体弱和患病的人给予护理。”

不管是谁促成希姆莱发布这项诏书，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党卫队头子的一纸命令使自己陷入了与希特勒的严重冲突之中。<sup>526</sup>命令至少意味着党卫队将无视希特勒关于不考虑战争形势继续进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指示。海因里希·希姆莱跨出了使他离开自己心目中的上帝的第一步。施伦堡乘势推了一把。现在他必须利用机会，完全切断独裁者与警察头子之间的联系。下一幕由克斯滕出场，支持那富有幻想的施伦堡的背离行动。此外，约莫就在同一时间，瑞典政府向希姆莱的亲信发出了使国家摆脱严重外交困境的呼吁。

为了摆脱盟国日益强大的要求压力，瑞典人站在反希特勒同盟的一边参战了，瑞典政府作出决定，采取一次轰动一时的营救行动。瑞典声明愿意向集中营囚徒提供食品和接受被释放的拘留人员。瑞典外交部为此向希姆莱提出建议，但是希姆莱对瑞典政府的各项援助一概拒绝。瑞典外交大臣克·冯·京特转而向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克斯滕求援。这位按摩医生坚持说服自己的病人，直到希姆莱作出让步。1944年12月8日，克斯滕在黑森林的小镇特里贝格希姆莱战地指挥所里同全国领袖达成了一项协议。党卫队头子准许将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集中营囚徒运送到一个集中营内（汉堡附近的诺因加默），由瑞典红十字会负责供应给养，释放一千名荷兰妇女、八百名法国妇女、五百名波兰妇女、四百名比利时人，以及丹麦人和挪威人各五十名——由瑞典派公共汽车把他们运走。

外交大臣京特向克斯滕表示感谢，让他转告希姆莱，瑞典将提供公共汽车和运送人员。这是1945年1月1日的事情。但是

瑞典人没有抓紧时间。显然他们希望，战局骤变将使他们免了这个麻烦的营救行动。直到2月5日，京特才行动起来，通知克尔斯滕，由瑞典国王的侄子、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负责运送工作。随后又不见任何动静地过了两个星期，施伦堡和克尔斯滕焦急地盼望着他们曾属意扮演角色的人物到来，从而使希姆莱完全脱离领袖。

1945年2月16日，伯纳多特伯爵终于蹉跎地走过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布罗马机场，飞往已被围困的、大火熊熊的希特勒德国。这位瑞典人在滕佩尔霍夫机场着陆后，前来第一个迎接他的党卫队领袖是瓦尔特·施伦堡；伯爵对卡尔登勃鲁纳作礼节性拜会时，保安处国外处长也在座。

527 伯纳多特迅即看出，施伦堡只有一个目的：离弃这艘正在下沉的船只。“我乐意承认，”这个瑞典人在回忆录中记述道：“我一开船就对这个讲人情的纳粹分子抱有一定的信任。”但是施伦堡却感到很难争取这个瑞典人支持他和克尔斯滕的计划。希姆莱也迟迟不接受施伦堡的观点。他对这个瑞典人的到来，既是恐惧，又是好奇，尤其是他知道：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在猜疑地注视着施伦堡移动一步步棋子。卡尔登勃鲁纳越过菲格莱因向独裁者请示，如何看待伯纳多特来访。希特勒回答说：“在一场总体战中，靠这种愚蠢的举动不会有任何收获。”施伦堡不得不花了很多时间进行劝说，党卫队头子才决定接见瑞典人。2月19日，施伦堡将伯爵接到霍恩吕兴党卫队军医院，把他介绍给全国领袖。

希姆莱立即明确表示：“我向阿道夫·希特勒作过效忠宣誓。作为军人和德国人我不能违反这一誓言，因此我也不可能采取任何违背领袖意志和愿望的措施。”然而在两个半小时以后，他还是又一次作出了另外的决定。他允许伯纳多特将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那些集中营囚徒接到挪威去。同时，他还再一次确认已经

许诺过克尔斯滕的事情：由瑞典红十字会负责供应北欧各国囚徒的给养。

伯纳多特刚启程飞返瑞典，施伦堡就以其擅长词令的口才不倦地对全国领袖施加压力。他几乎毫不间断地向希姆莱强调说明，他的论据要点始终在于要求：搞掉希特勒，结束战争。如同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所描述的，施伦堡“在希姆莱的私人圣物柜里，缓慢地、迟疑地，并不顾偶像奴仆的拼命抵制，用新的、更加不适合的肖像来替代逐渐崩裂的希特勒偶像，这副肖像就是已加冕的第二领袖，亚利安人德国第二化身的希姆莱肖像”。保安处国外处处长一个劲儿地催促，现在必须使用伯纳多特伯爵，派他带上一项投降建议去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大本营。希姆莱吓得往后一退，但是施伦堡的论据使他实在无法坚持，他终于至少同意他的试探者自行争取伯纳多特肩负使命前去盟国。

4月2日，伯纳多特再次来见希姆莱。当党卫队头子去隔壁房间打电话时，施伦堡抓住这个时机。施伦堡说：“您能去见艾森豪威尔，同他探讨在西线进行投降的可能性吗？”伯纳多特拒绝了，并说：这件事情必须首先由希姆莱提出。保安处国外处处长这时就说服瑞典人。“他不断地请求我。他的语调既勉强，又亲切，”伯爵回忆说。但是这位瑞典人提出，只有希姆莱事先声明自己是希特勒的继承人，解散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释放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全部拘留人员，他才能去找艾森豪威尔。“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以为，”伯纳多特伯爵说，“希姆莱决不会接受这些要求，但施伦堡表示，愿意促使他的首领接受这些条件。”保安处国外处处长又开始工作，但他确信，领袖大本营中希姆莱这颗将星正在陨落，除掉让党卫队头子给希特勒一次突然打击以挽救自己的生存外，别无其他选择。

“您是说要求我搞掉领袖吗？”希姆莱问。施伦堡答道：“是

的。”他当然清楚，只有能够向希姆莱证明，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命反正就要完蛋了，希姆莱才会打起精神来干。施伦堡把自己的朋友、柏林慈善医院附属神经科医院院长、医学教授马克斯·德·克里尼斯推出来向全国领袖解释说：希特勒是个重病人，他已接近完全瘫痪，受着震颤性麻痹症的折磨。希姆莱得出结论说：“施伦堡，我相信希特勒是完了。”

不过希姆莱还拿不定主意。他梦想担任拯救德国的角色，但又不能摆脱褐色迷信。他考虑到了独裁者的死，可是挣脱不出希特勒对他精神上的影响。他看到这场战争已经失败，但还鼓励自己以及德国人打到底。4月1日，他还在一次报告中教导纳粹党汉堡市议员说，盟国之间不和以及德国喷气式歼击机即将大量投入战斗，将会带来决定性的喘息机会。4月13日，他获得报告，“小沃尔夫”——驻意大利党卫队兼警察最高领袖、党卫队副总指挥卡尔·沃尔夫——在瑞士跟美国特使艾伦·W·杜勒斯进行谈判，这时，他立刻感到这是对领袖的背叛行为。

就在这天夜里，希姆莱打电话给他过去的亲信沃尔夫，粗暴地要沃尔夫对此作出进一步解释，并立即来向他报告。副总指挥答应了，但随后给他的上级拍了一份电报，寥寥数语告诉希姆莱：沃尔夫不能来。4月14日，希姆莱再次给沃尔夫设在加尔达湖畔的沃尔夫司令部打电话。希姆莱两次要求副总指挥立刻启程，沃尔夫两次对命令置之不理。他随即征求杜勒斯的意见。这个美国人建议，沃尔夫可以带着他的家属逃到希姆莱的魔手伸不到的瑞士去。但是，卡尔·沃尔夫作出了另外的决定。这位早先的护卫军官、多年任全国领袖副官长和本部负责人，同全国领袖感情融洽并已卷进党卫队领导最阴暗的秘密，他相信自己具有使对方无法反对的魔力，敢于跟希姆莱面对面密谈。他要摸清楚，希姆莱究竟知道多少关于沃尔夫和盟国在瑞士谈判的情况。

他上柏林去可能是一次死亡之行，因为副总指挥沃尔夫做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其他任何将军都无法引以为荣的事情：他已经跟敌人约定了一百万德国士兵的投降。

1944年4月间，教皇庇护士十二世的一次召见，对信奉上帝的纳粹党员沃尔夫来说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党卫队旗队长、历史学家、译员、兼沃尔夫同墨索里尼的残缺共和国的联络军官欧根·多尔曼博士，通过与罗马社会的关系安排了这次教皇的召见。这个党卫队领袖给教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庇护士十二世说：“要是上帝早些把您引来见我的话，那该避免多少不幸啊。”沃尔夫永远也不能忘怀教皇在临别时讲的话：“您走的是艰难的行程，沃尔夫将军！我可以为走在这条危险道路上的您和您的家属祝福吗？”这位早已意识到德国必败无疑的副总指挥，当时即已让人家看出，有一天他可能采取单独行动来结束在意大利的战斗。

1945年2月，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意大利通多尔曼又利用他的各方面关系进行协助。他所信任的米兰工厂主和具有影响的瑞士人的朋友巨商卢伊季·帕里利，通过瑞士情报机关军官告诉驻在伯尔尼的美国代表杜勒斯，德国的意大利军团将领关注结束交战。杜勒斯要求作出良好愿望的姿态，沃尔夫立即释放了两名特别重要在押人员的意大利游击运动领袖。多尔曼首先赴瑞士，同美国人谈判，随后沃尔夫接踵而至。1945年3月8日，作出决定：党卫队副总指挥沃尔夫表示允诺在意大利国土上的德国军队投降。但是德国陆军军官们还一直强烈地处在一种病态的军官誓言精神的影响下，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迟迟没有进行投降签字。先后更迭的驻意大利统帅们，例如凯塞林陆军元帅和冯·菲廷霍夫大将都感到害怕，就在这时候，希姆莱得到了有关沃尔夫访问瑞士的情报。

但是沃尔夫在飞往柏林的途中苦苦思索，是否希姆莱已经知

道了沃尔夫—杜勒斯的口头约定，因而不用说就会把他逮捕起来。4月16日，副总指挥在柏林附近着陆，正好这一天，苏联元帅朱可夫率领所部开始对柏林发动最后一次强大攻势，揭开了第三帝国历史的最后一章。

530 几小时后，沃尔夫站到了希姆莱的面前。然而党卫队头子不敢公然指责“小沃尔夫”的背叛行为，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年青时代的朋友格布哈特，来对这位党卫队兼警察最高领袖进行讯问。两位先生住进了柏林的“阿德隆”饭店。沃尔夫想好了一则听来令人信服的故事。不错，他同杜勒斯在瑞士进行了谈判，但仅仅是谈交换战俘问题，此外，他还想到了1945年2月领袖在跟他进行的一次谈话中的提示：利用一切机会使盟国相互内讧。而副总指挥沃尔夫正是这样做的。

希姆莱高兴地同意了沃尔夫的说法，为自己的老朋友并未不忠于领袖而庆幸。这时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突然走进房间，犹如灾祸临头似地请求跟希姆莱私下密谈。卡尔登勃鲁纳带来了一则对沃尔夫具有危险的消息：一个情报人员刚刚报告，沃尔夫同米兰红衣主教舒斯特尔就德国的意大利军团投降问题进行了谈判，因此在任何时刻德国的整个南方战线都有可能崩溃，希姆莱对“小沃尔夫”大发雷霆，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在一旁帮腔。沃尔夫明确保证说：“我本人从未和红衣主教舒斯特尔谈判投降！”沃尔夫眼看已被逼得毫无退路了。他觉得，只有逃跑才有可能脱身得救。

沃尔夫拒绝这种中伤，大喊大叫，现在他必须请全国领袖和同僚卡尔登勃鲁纳跟他去见领袖，当着领袖的面驳斥他们的无耻谰言。在那里，只有在那里，他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希姆莱面孔失色，他哪里敢去见希特勒。他决定，由卡尔登勃鲁纳陪同副总指挥沃尔夫上领袖避弹室去一趟就可以了。1945年4月18日凌晨3



点，两位党卫队领袖走进领袖避弹室。一会儿功夫，他们在过道里遇见了拖着沉重步子走来的希特勒。“啊，您来了，沃尔夫！”独裁者招呼他。“好吧！请您等我把早上的事情处理好。”

4点，两个党卫队领袖被叫去见希特勒。独裁者迫不及待地询问沃尔夫，为什么要跟杜勒斯打交道。沃尔夫说，领袖在2月6日当着外交部长的面指示过，如果新的秘密武器不能及时完成作战准备，就必须暂时跟盟国进行谈判。沃尔夫说：“我的领袖，我高兴地告诉您，我已通过杜勒斯成功地打开了通向美国总统、丘吉尔和亚历山大陆军元帅的大门。我请求您对今后工作发布命令。”希特勒肯定了沃尔夫的说明，叫沃尔夫下午再上他这儿来一趟。他在领袖避弹室向沃尔夫阐述了他的未来计划，荒唐透顶的幻觉只能使这个党卫队领袖证实，阿道夫·希特勒已接近神经错乱。

这个暴君用逼人的目光打量了谒见者片刻，随即向他伸出簌簌发抖的手。希特勒最后说：“目前谈判，您要采取拖的态度，从而争取基本上获得较好的条件。您向我的朋友杜切<sup>①</sup>转达我的良好祝愿的问候。感谢和赞许您的努力。”卡尔·沃尔夫得救了。他火速飞返自己在意大利司令部，准备就意大利投降进行签字（4月29日）。但是党卫队旗队长多尔曼感到——如他自己所述——有“时间实现我的誓言，给我所永远不能忘怀的罗萨里奥圣母奉献蜡烛，这是我在沃尔夫不在期间为了我们的得救向她许下的心愿”。531

希姆莱的小沃尔夫并非是背弃阿道夫·希特勒的唯一一名党卫队领袖。党卫队副总指挥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库特·冯·戈特贝格和里夏德·希尔德布兰特曾策划谋杀希特勒，从而结束这场战争。甚至政权保卫者卡尔登勃鲁纳也曾在2月底派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威廉·赫特尔博士去瑞士，向杜勒斯的同僚们洽

---

① 意大利语：领袖。对墨索里尼的称呼。——译者

谈德国占领的奥地利地区单独投降。武装党卫队最清楚地表明，党卫队和希特勒之间的纽带已断裂到何等程度。

3月底，党卫队总指挥塞普·狄特里希的党卫队第六装甲军团在匈牙利进行最后一次强大攻势，结果被百倍强大于自己的敌人炮火所歼灭。这时希特勒对其心爱的武装党卫队刻意讥讽，大发雷霆。陆军元帅凯特尔拍电报给塞普说：“领袖认为，部队没有根据形势要求进行战斗，因此命令摘掉‘阿道夫·希特勒’师、‘帝国’师、‘骷髅’师和‘霍亨斯陶芬’师几个党卫队师的臂章（绣有各师番号）。”

党卫队特种部队人员大为激动，他们相信一种说法，据说塞普·狄特里希把他的师长们找来，将凯特尔的电报啪地掼在桌上，大声吼道：“这就是现在对你们流血流汗干了五年之久的酬谢！”他说要把他的勋章退还给希特勒，并向其表示，他宁愿自杀，也不再执行领袖的这道命令了。当然这些说法只有一点是真实的，即狄特里希对独裁者的命令不加理睬。至于他说了并未做到的事，倒是由一位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某部指挥官代他做到了，在匈牙利的攻击战中，这位指挥官的部队楔入敌方战线。这个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听到希特勒这道命令时，愤怒地建议他的领袖们：“我们拿把尿壶来，把我们的所有勋章统统塞进去，扎上一圈‘葛兹·冯·伯利欣根<sup>①</sup>’师的臂章”——每个德国人都能清楚地懂得其中含义。

人们用这种方式表示背弃这个待在柏林领袖避弹室里自我毁灭的暴君，几乎没有再比这种方式更粗暴的了。成千上万的党卫队

---

<sup>①</sup> 葛兹·冯·伯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 1480—1562)，法兰克尼亚骑士，在1504年兰次胡特因继承王位引起的战争中失去右手，装上铁手，人称“铁手骑士”或“铁手伯利欣根”，德国农民战争中任一支农民军首领，后背叛农军。歌德于1773年以其作为背信弃义者的形象创作了著名剧本。——译者

员心目中的—个世界已经瓦解。小股的党卫队狂热分子还在继续战斗，将自己和别人驱向毫无意义的死亡，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老百姓的灾祸和恐惧就不会消除——但黑色集团的多数人在官方指令的牺牲道路面前畏缩不前。据说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当拿破仑的老卫队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为英国骑兵部队所包围，被敦促投降时，法国将军康布罗纳高声呼叫：“卫队宁死决不投降！”这句（非正史的）名言过去和现在都被看作是任何一支卫队的特征，被看作是出类拔萃军人的意义和身价证明。希特勒的卫队并未打光最后一粒子弹，党卫队在还没有被敌人完全围困之前就投降了。党卫队领袖们一批紧接一批地放弃了战斗。

但是，希姆莱在纳粹政权的火山口地区上面盲目摸索和自我折磨，他怯懦地在他的谋士施伦堡的呼吁和柏林领袖避弹室阴影之间来回奔窜。背后出点子的施伦堡将他紧紧抓住不放，希姆莱非作出决定不可！在此期间，保安处国外处长找到了一个新的赞助者，即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4月19日，他向保安处头子保证，要把德国从总理府这个神经错乱的人手里解脱出来，缔造和平。这时施伦堡和前“钢盔团”领袖弗朗兹·赛尔特为希姆莱草拟了一份政纲：废黜希特勒，解散党，废除人民法庭，投降谈判。当这项呼吁也未能推动希姆莱见诸行动时，施伦堡又招来一个帮手。克尔斯滕从斯德哥尔摩出发了，他还带来一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可能想象的、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客人：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诺贝特·马祖尔。4月19日晚，两人在滕佩尔霍夫机场着陆。几小时后，他们到达克尔斯滕的哈尔茨瓦尔德庄园。

但是这时没有见到希姆莱，他已驱车去领袖避弹室。1945年4月20日是领袖的生日。海因里希·希姆莱要向他的领袖最后一次表示敬意。因为独裁者在总理府庭院里举行幽灵般的接见，党卫队头子是不能缺席的。但是在回来的途中，希姆莱又重新摆

出一副决心拯救德国的架势。“您跟艾森豪威尔联系上了吗？”他到达哈尔茨瓦尔德打过招呼后就问克尔斯滕。克尔斯滕作了否定的回答。希姆莱接着又问他，是否愿意去看看艾森豪威尔，跟他进行投降谈判。克尔斯滕显然得到施伦堡的授意，提出让伯纳多特伯爵去同艾森豪威尔接触，因为伯爵作为官方的人士更加合适一些。

但是，几个小时后——4月21日——，党卫队头子跟应施伦堡邀来的瑞典伯爵相对而坐，这时，他又丧失了勇气。“军事形势严重，非常严重，”希姆莱咕哝着。但他绝口不提跟艾森豪威尔接触的方案。伯纳多特惊奇地离去。

领袖大本营里没有一个人料到，忠心耿耿的希姆莱背叛自己领袖的时刻已临近。恰恰相反，深居总理府的独裁者把疯狂挣扎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党卫队身上，他一字一顿地叨念着唯一的一个名字：施坦因纳。“施坦因纳，施坦因纳，”希特勒喃喃自语，一边拿着他的放大镜在作战地图上缓缓挪动。他伸出簌簌抖动的手指往地图上使劲地抠：柏林东北面的一个地方，党卫队副总指挥、武装党卫队将军菲立克斯·施坦因纳率领着一群疲惫不堪的残部待在那儿。希特勒指望这支“施坦因纳集团军”来解救即将陷入苏联军队重围的柏林。

4月21日，希特勒命令施坦因纳立即率领埃伯斯瓦尔德地区所部南下，击溃苏联军队的侧翼进攻，收复柏林东南已被摧毁的德军防御阵地。希特勒对施坦因纳说：“您会看到，俄国人将遭到惨败，在柏林大门口遭到他们历史上付出最大流血的惨败。”希特勒告诫施坦因纳说：“严禁任何部门西退，凡拒绝无条件服从这项命令的军官，必须立即逮捕，就地枪决。我责成您负责执行……命令，如不完成，要您的脑袋。”

之后，希特勒在4月22日等着施坦因纳发动强大的减压攻势。

一连几小时过去了。可是党卫队副总指挥不肯下达攻击命令。以一万士兵去进攻十万敌军，这在党卫队将军来看是发疯的事情。希特勒一再探询，施坦因纳在哪儿发起进攻。独裁者身边的高级将领早就清楚，这位党卫队副总指挥永远也不会发动攻势，他们只是不愿说出来罢了。希特勒直到下午才知道真相。这时希特勒象中风一样周身抽搐起来。他尖叫着，怒吼着，咒骂他的僚属们背叛和怯懦，说大家对他背信弃义，弃置不顾，先是武装部队，现在党卫队也是如此。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已丧失殆尽，再活下去已无意义。他声称不离开柏林，而是要死在他的首都。他身边的人目瞪口呆地望着领袖，只见他痉挛地缩成一团吼叫着，突然间又软弱无力地倒在安乐椅中。

到了这个时候，有谁最终会想到，让这个疯子下台投降呢？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每个人都试图使这个已经垮了的人振作起来，每个人都在搜索枯肠，寻觅激励的语言。海因里希·希姆莱表现得最积极，他打来了电话——因为听到了独裁者在勃然大怒的消息——恳请希特勒离开柏林，到德国南部去继续战斗。于是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去敦促那位不耐烦的施坦因纳统帅为他的领袖作最后的效劳。凯特尔陆军元帅、约德尔大将、克雷布斯将军都毫无畏缩地上党卫队副总指挥司令部去看望施坦因纳，动员他发动进攻——他们对他既是恳求又是威胁。

“施坦因纳，这是为了您的领袖。领袖要求用这种办法救他！”<sup>534</sup>连海因里希大将也这样叫了起来，实际上对他来说只是为了稳住前线的局面而已。凯特尔用元帅权杖威胁施坦因纳，但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坚持不为所动：“不，我决不这样干，这样进攻是胡闹——是蓄意杀人。随您把我怎么办好了。”希特勒再次期待着施坦因纳的报告。4月27日，希特勒死了心，放弃了一切希望：他发出命令，撤掉施坦因纳的职务，由霍尔斯特陆军中将接替。施坦

因纳又一次破坏了领袖的命令。他说服霍尔斯特将军，让他继续掌握指挥权。

二十四小时后，宣传部的一名官员给领袖避弹室送来一份报告。报告使希特勒越发疑神疑鬼。洛伦茨截获路透社记者保罗·斯科特·兰金从旧金山发出的一则急电，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向西方盟国提出了德国的投降。瓦尔特·施伦堡到底制服了心怀恐惧的偶像奴仆。

这则消息使领袖避弹室的人员陷于瘫痪状态。这时宣传部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被叫去听电话。一会儿功夫，他带了一则更为重要（不过是不正确的）的消息回来。斯德哥尔摩电台刚刚广播，希姆莱已跟英美统帅部进行谈判。独裁者直愣愣地朝上翻着眼睛，从双唇迸发出一阵泣不成声地嚎叫，现在党卫队的卑鄙行为已在他面前暴露无遗。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施坦因纳不肯发动进攻，为什么党卫队在匈牙利的进攻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希姆莱在维斯杜拉河边不卖力。所有这一切都是一项重大阴谋，都和他过去称之为“忠实的海因里希”这个凶恶的阴谋家有联系。但是，他的血液还在血管里沸腾，他还有力量让这些背信弃义的家伙粉身碎骨。“决不允许一个叛徒代替他当领袖！”他嚎叫着，并叫人把里特·冯·格莱姆陆军元帅叫来，责成他飞出被围的柏林，无论如何要把希姆莱逮捕起来。

希特勒再也不愿有任何一个党卫队领袖待在他的身边，每个党卫队领袖在他眼里都成了嫌疑犯，好象都是一个庞大叛徒集团的成员。当听说，他的连襟、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希姆莱的首席代表赫尔曼·菲格莱因换上便衣，擅自离开领袖避弹室时，他命令将他枪决在总理府院子里。独裁者在口授遗嘱中说：“在我去世之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撤去他的一切国家职务，……戈林和希姆莱瞒着我，违背我的意

志与敌人进行秘密谈判，并企图非法夺取国家权力，从而给国家和全体人民带来了无法估计的损失，姑且不说对我个人的不忠。”

535

两天后，阿道夫·希特勒死了，但是他的不忠的奴仆还一直相信未来的前途，他海因里希·希姆莱将决定德国的命运。盟国早已拒绝了希姆莱一相情愿的投降要求，可是全国领袖还一直心怀希望。

他已在脑子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纳粹党（定名“民族集中党”），他已拼凑了一个战后政府，长期反对他的国内保安处处长奥托·奥仑道夫也将在这个政府中获得一席部长职位。他草拟了新政府纲领。可是大德意志国家愈是被盟国坦克的楔形编队碾得粉碎，党卫队头子的妄想和希望也就愈快地成为泡影。首先他想当战后的德国领袖，继而又渴望靠紧希特勒的继任人卡尔·邓尼茨当第二号人物，并逃往邓尼茨在弗伦斯堡的司令部。末了他愿意只当个警察头子也就算了。最后他感到坐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邦政府总理的交椅也还合适。

当海军元帅邓尼茨的残缺帝国也土崩瓦解时，希姆莱知道，他已是一个什么都输光了的人。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看出这个强自镇定（希姆莱说：“纪律，我的先生们，纪律”）的党卫队主子心里盘算着什么。伯爵劝告希姆莱：“原来的党卫队全国领袖可不能改名换姓和贴上假胡须给别人抓住！除了到〔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那儿去自首说：‘我在这儿。’除此，您别无其他道路可走。这样您就必须对您的队员承担责任。”

但是，希姆莱想到的唯一办法，恰恰是伯爵警告他不可以做的那个办法。1945年5月20日，希姆莱戴上一只眼罩，穿上一套野战秘密警察的制服，揣着一张名叫海因里希·青格尔的身份证，这个人面部特征酷似希姆莱，是经人民法庭判处死刑的犯人。随后，党卫队领袖就开始潜逃，企图逃脱历史的惩罚。希姆莱带着几名忠

实亲信，其中有奥仑道夫、秘书勃兰特、卡尔·格布哈特和副官格罗特曼，他们穿过荷尔斯泰因，渡过易北河，试图偷越英国哨所。可是英国哨兵注意到这个情况。5月23日，希姆莱一帮人被抓住了，下午2时，英国宪兵将他们押入吕南堡附近的031号盘查营。

当盘查营长官英国上尉汤姆·塞尔维斯特让这些被押解来的人从他的面前走过时，有三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两个高个子和“一个矮小、外貌丑陋、衣衫褴褛的人”，塞尔维斯特这样记述道。英  
536 军上尉命令这三个德国人走到自己跟前。塞尔维斯特将两个身材魁梧的人另行单独监禁，随后——英国上尉记述道——“小个子摘下左眼上的黑眼罩，戴上眼镜。站在我面前的是什么人，也就一清二楚了，他用非常平静的语调说道：‘海因里希·希姆莱’。”

塞尔维斯特向军事情报部门作了紧急报告，很快就来了两名情报军官。当天晚上，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总部情报部门领导人迈克尔·墨菲上校也赶来了。墨菲立即怀疑，希姆莱藏有毒药，可以在监视者未加注意的刹那间吞服。事实上，英国士兵已在希姆莱的衣服中搜出一只装毒药的小玻璃瓶。但是这位情报官上校对事情并不放心。他叫来一位医生对希姆莱再一次进行检查。希姆莱张开嘴巴，突然医生在囚室的暗淡光线里，看到希姆莱的齿槽间有黑色的东西闪亮。这位医生叫俘虏将头对着光亮，这时，希姆莱扭过头，合上嘴巴，牙齿发出喀嚓喀嚓的咬嚼声——暗藏的氰化钾微型管状瓶破裂了——几秒钟后，希姆莱结束了他的生命。

时为1945年5月23日，海因里希·希姆莱死了，党卫队的历史宣告结束。在众神末日的熊熊烈火的烟雾中，黑色集团树倒猢猻散，一个时代的最恐怖的工具和缩影消失了，在党卫队镜中图像里显示出来的这个时代说明，醉心于权力、国家万能、个人崇拜和不加判断的虔诚能把人们驱向哪里。

只有少数党卫队的领袖效法他们集团首领的榜样，结束了他



们自己的生命。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格洛博斯尼克服毒自杀；党卫队最高医生格拉维茨拉响两颗手榴弹将自己和家小炸得血肉横飞；施滕内斯的告密者康蒂在纽伦堡监狱中自杀；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在东部地区自戕；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普吕茨曼在希姆莱指挥所不远的地方自尽。盟国军事法庭和欧洲人民法庭抓住希姆莱的一些重要助手，加以惩处。被处决的一些党卫队领袖有：奥斯维辛集中营长官霍斯；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和劳特尔；中央主管处局头子卡尔登勃鲁纳、波尔和达吕格；特别行动队长奥仑道夫和瑙曼；名誉领袖格赖泽尔、福斯特和赛斯-英夸特。不过大部分的党卫队领袖得到宽大得出奇的处理。三十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中活下来的有十六人；十二名中央主管处局头子活下来的为八人；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六名部门负责人中活下来的为三人；在俄国执行过任务的八名特别行动队中活下来的为三人。这些活下来的人绝大多数被判处徒刑，但后来得到赦免和释放。党卫队地狱里的几个最凶狠残暴的家伙逃脱了，首先是艾希曼，不过他在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缉捕归案，两年后在耶路撒冷被处以死刑。他的一些重要帮凶仍消声匿迹，计有：阿洛伊斯·布龙纳、京特、丹内克尔、勒特克——同样还有秘密警察缪勒和集中营督察员格吕克斯。

537

但大部分党卫队员进了俘虏营，等待他们的命运是，对他们既不能判处严刑，也不能轻易开释。在盟国俘虏营的木头营房里和集合点名的操场上，从此展开了无休止的辩论：失望者和失败者的辩论，顽固不化者和死抱住昨天不放者的辩论，感到羞愧者和精神崩溃者的辩论。罪过和赎罪折磨着他们，并且提出一个尖锐深刻的问题，即具有热情和献身精神的年青人，怎么会变成丧心病狂的强权工具，怎么会变成一种反常的忠诚和荣誉概念的奴仆，这种

概念使党卫队的每个成员都成为在道义上驯服执行领袖意志的人员。

无疑，他们可以自己掂量，并以一种集体犯罪的论点来减轻自己的罪责。因为在一百万党卫队员中也许有五万名参加了残暴的罪行。但是有些提出问题的人不满足于这样的解答，他们进一步探究：不，他们身上有过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使得他们对于野蛮行径，对于披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外衣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权力狂缺乏免疫力。党卫队编年史就象一部电影，再次一幕一幕地在他们眼前映过。他们讲述被毁掉的一代人的历史，这一代人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对文化憎恶的黑色厌世主义中成长起来，受到一个许诺给他们提供原始人团体的经历和冒险集团的引诱，而去为一个所谓天才的人和一种思想效力。

他们加入了佩戴党卫队标志的集团，因为这个集团满足了德国人的两种古老的渴望：参加一个军事团体，可望得到荣誉、保障以及尚武的光采，并且成为一种秘密中坚、万能的秘密集会的一部分。的确，就许多德国人来说，他们对政治和政府的想象，除了视为神秘力量、秘密团体和灰衣主教的统治外，别无其他。黑色集团满足了这种白日梦想，谁加入了党卫队，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为民族的主人，成为肩负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担的、菁萃贵人的教派成员。

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相信人们对他们进行的说教：民族共同体；为祖国效力；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他们根本没有发觉，这个菁萃贵人的集团一步步地堕落为棍棒卫队的水平，除了充当走卒为一个丧心病狂和反复无常的独裁者及其集团效劳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1934年6月30日屠杀冲锋队的这一天，产生  
538 了党卫队内部的不幸。从这时起它开始步入深渊的行程，急剧地毁灭一切：自由、正直、人性和最终也毁灭了黑色集团的追随者们一直挂在嘴上的“帝国”。

“慕尼黑协定后,当我们的军队开进保护领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都说过不去吗?”前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埃里希·克恩迈尔在一次俘虏营的讨论中高声喊叫道。“我们当年,哪怕只是心底里,表示过不同意吗?没有,一千个没有。我们为权力梦所陶醉:统治全世界。它使人们冲昏头脑,陶醉于权力。”权迷心窍的狂人行动破坏了一切界限和准则,特别是当所谓新德国的年青活跃的使者们不仅被独裁者的魔术所支配,而且还受到古老德意志的迷信在他们中间散发影响时,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他们认为,一个政府不可能干坏事,即使干了坏事,那么公私之间的区分还始终使公民可以不被国家的任何苛求所玷污。

因此,党卫队的血腥历史也属于这个古老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时代,党卫队的活动和行径表明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万能的过分膨胀。德国人,“这些过来人”是否已经理解这个教训?历史学家不能作出回答。但是问题仍然存在,缠住不放,以致毫无疑问,党卫队的编年史将作为惊心动魄的权力狂的文献继续伴随着德国人——只要德国有前途,它将起着告诫和约束的有效作用。

# 人名索引

- Abetz, Otto (奥托·阿贝茨), 494  
Abromeit, Franz (弗兰茨·阿布罗迈特), 519  
Abshagen, Karl Heinz (卡尔·海因茨·阿布斯哈根), 152, 217  
Adam, Wilhelm (威廉·亚当), 95, 108  
Adensauer, Konrad (康拉德·阿登纳), 133  
Adler, H.G. (H·G·阿德勒), 153  
Aggteleki (奥格泰莱基), 505  
Ahlmann, Wilhelm (威廉·阿尔曼), 476  
Albert, Wilhelm (威廉·阿尔贝特), 200  
Alexander, Harold (哈罗德·亚历山大), 530  
Alexander, Leo (莱奥·亚历山大), 11  
Alfonso (阿尔方索), 481, 484  
Alper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阿尔佩斯), 195  
d'Alquen, Gunter (冈特·达阿尔克文), 196, 198, 204 起一连几页, 398, 466, 470, 512  
d'Alquen, Rolf (罗尔夫·达阿尔克文), 207  
Alvensleben, Ludolf von (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勒本), 277  
Alvensleben, Werner von (瓦尔纳·冯·阿尔文斯勒本), 99, 127  
Amann, Max (马克斯·阿曼), 111, 112, 205, 302  
Ampletzer, Albert (阿尔贝特·阿姆普勒策尔), 194  
Angerer (安格雷尔), 40  
Angress, Werner T. (沃纳·T·安格雷斯), 39  
Antonescu, Ion (伊昂·安东奈斯库), 267  
Apfelbaum (阿普费尔鲍姆), 294  
Arco auf valley, Anton von (安东·冯·阿尔科-凡雷), 37, 79  
Arendt, Hannah (汉娜·阿伦特), 14, 16, 351, 355, 376, 377  
Aronson, Shlomo (什洛莫·阿伦森), 153, 158, 166, 200  
Artemenko, Paul (保罗·阿特门科), 433  
Artus (阿塔尔王), 142  
Auerbach, Hellmuth (赫尔穆特·奥尔巴赫), 251  
Auerbach, Moshe (莫歇·奥尔巴赫), 319, 320  
Augsburg (奥格斯堡), 204  
August Wilhelm von Preußen (奥古斯特·威廉普鲁士亲王), 99, 117  
Bach-Zelewski, Erich von dem (埃里希·冯·德姆·巴赫-齐列夫斯基), 56, 115, 290, 333, 334, 339, 503  
Badoglio, Pietro (彼得罗·巴多格里奥), 504  
Baecke, Hermann (赫尔曼·贝克), 123  
Bakay, Szilárd (什齐洛尔德·鲍考伊), 505  
Baldwin, Stanley (斯坦莱·鲍尔温), 212  
Balzac, Honoré de (奥诺莱·巴尔扎克), 85  
Bangerskis, Rudolf (鲁道夫·班格尔斯斯基), 467  
Barco, Inge (英格·巴尔科), 39  
Bartels, Hermann (赫尔曼·巴特尔斯), 143  
Bassowitz-Behr, Georg-Hemming von

- (格奥尔格-亨宁·冯·巴塞维茨-贝尔), 127
- Bauer (鲍尔), 483
- Becher, Kurt (库特·贝歇尔), 522 一连几页
- Beck, Ludwig (路德维希·贝克), 102, 231 一连几页, 327, 449, 473, 477, 485, 486, 491, 497
- Beckerle, Adolf Heinz (阿道夫·海因茨·贝克勒), 269, 421
- Behrends, Hermann (赫尔曼·贝伦茨), 86, 198, 214, 215, 256
- Bell, Georg (乔治·贝尔), 71 一连几页, 93, 94
- Belvis de las Navas, Maria de=Hohenlohe-Langenburg, Maria zu (玛利亚·德·贝耳维斯·德拉斯纳瓦斯, 即玛利亚·楚·霍恩洛厄-朗根堡)
- Benesch, Edward (爱德华·贝奈斯), 215, 458
- Beaenecke, Heinrich (海因里希·贝内克), 27
- Benoit-Méchin, Jacques (雅克·伯努瓦-梅尚), 13
- Berchtold, Josef (约瑟夫·伯希托尔德), 24, 25, 29, 30, 54
- Bergbohm (贝格博姆), 196
- Berger, Gottlob (戈特洛勃·伯格), 16, 18, 133, 136, 268, 277, 281, 293, 380, 382 一连几页, 395, 398, 399, 401, 402, 420 一连几页, 431, 439 一连几页, 444, 445, 447, 463 一连几页, 499, 504, 511
- Bergmann (贝格曼), 106
- Bernadotte, Folke von (福尔克·冯·伯纳多特), 33, 36, 526 一连几页, 532
- Besgen, Achim (阿希姆·贝斯根), 518
- Best, Werner (瓦尔纳·贝斯特), 12, 17, 18, 81, 87, 97, 146, 147, 163, 169, 170, 172, 174, 179, 184, 185, 190, 193, 195, 198, 199, 213, 217, 229, 230, 232, 236 一连几页, 269, 314, 366 一连几页, 380, 452 一连几页, 427, 460 一连几页, 473, 476, 512
- Best, S. Payne (S. 潘恩·贝斯特), 263 一连几页
- Beuthel, Lothar (洛塔尔·博伊特尔), 274
- Beyer, Justus (尤斯图斯·拜尔), 389
- Bigler, Rolf (罗尔夫·比格勒), 443
- Biron (比龙), 229
- Bismarck, 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 47, 258
- Biss, Andreas (安德烈亚斯·比斯), 520, 523 一连几页
- Bittrich, Wilhelm (威廉·比特里希), 128, 148, 407, 413, 420, 443, 446, 489, 490, 495
- Blanck (布兰克), 354
- Blaskowitz, Johannes (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 274, 281 一连几页
- Bleyl (布莱尔), 140
- Blobel, Paul (保罗·布洛贝尔), 335, 342
- Blomberg, Erna von (埃娜·冯·勃洛姆堡), 224, 225
- Blomberg, Werner von (瓦尔纳·冯·勃洛姆堡), 91, 92, 100, 101, 103, 104, 106, 118, 122, 223, 224, 226 一连几页, 232, 233, 313, 377, 382, 414, 463
- Blume, Walter (瓦尔特·布卢默), 329
- Blumentritt, Günther (古恩特·勃鲁门特里特), 363, 494
- Blüml, Max (马克斯·布吕梅尔), 34
- Bock, Fedor von (费多尔·冯·包克), 273, 474
- Böckenhauer (伯肯豪尔), 123
- Bodelschwingh, Otto von (奥托·冯·博德尔施文格), 309
- Boden, Margarete=Himmeler, Margarete (玛加丽特·博登, 即玛加丽特·希姆莱)
- Bodenschatz, Karl (卡尔·包登夏茨), 113, 117

- Boehm, Hermann (赫尔曼·包姆), 223
- Boehme, Franz (弗兰茨·伯梅), 361, 436
- Boensel (博恩塞尔), 477
- Boger, Wilhelm (威廉·博格尔), 350, 355
- Bohle, Ernst Wilhelm (恩斯特·威廉·博勒), 247, 255
- Böhme, Albrecht (阿尔布雷希特·伯梅), 266
- Boineburg-Langsfeld, Haas von (汉斯·冯·博伊内堡-朗斯菲尔德), 494
- Bond, James (詹姆斯·邦德), 200
- Bonhoeffer, Dietrich (狄特里希·波霍弗), 126, 450
- Bonner, Georges (乔治·庞纳), 323
- Boris III. von Bulgarien (保加利亚国王博里斯三世), 364
- Bor-Komorowski, Tadeusz (塔德舒·博尔-科莫罗夫斯基), 502
- Bormann, Gerda (格尔夫达·鲍曼), 388, 389
- Bormann, Martin (马丁·鲍曼), 73, 112, 129, 195, 295, 384, 386—连几页, 391—连几页, 467, 472, 508—连几页
- Bornemisza, Félix (费利克斯·博尔内迈什扎), 506
- Bornschein (博恩沙因), 352, 353
- Borsig, August (奥古斯特·博尔西希), 132
- Bosch, Robert (罗伯特·博施), 131
- Bose, von (冯·包斯), 113
- Bothmann (博特曼), 431
- Bouhler, Philip (菲利普·布勒), 29, 30
- Bracht, Fritz (弗里茨·布拉赫特), 279
- Bracht, Werner (维尔纳·布拉赫特), 191, 192, 371, 372
- Brand, Joel (约埃尔·布兰德), 523
- Brand, Walter (瓦尔特·布兰德), 259
- Brandenburg, Wilhelm (威廉·布兰登堡), 498
- Brandt, Rudolf (鲁道夫·勃兰特), 220, 393, 398, 401, 470, 535
- Braunschweig, Walther von (瓦尔特·冯·勃劳希契), 231, 244, 377, 383, 415
- Braun, Eva (爱娃·勃劳恩), 511
- Braun, Gretl (格蕾特·勃劳恩), 511
- Bredow, Ferdinand von (费迪南德·冯·布雷多), 115
- Brehmer (布雷默尔), 493
- Brill (布里尔), 9
- Broad, Perry (佩里·布罗德), 350
- Brossmann (布鲁斯曼), 501
- Broszat, Martin (马丁·布罗斯察特), 184, 190, 276, 279, 355
- Brückner, Wilhelm (威廉·勃鲁克纳), 106, 109
- Brunner, Alois (阿洛伊斯·布龙纳), 311, 537
- Brunner, Anton (安东·布龙纳), 311, 361
- Buch, Walter (瓦尔特·布赫), 59, 71—连几页, 111, 112, 193, 299
- Buchheim, Hans (汉斯·布赫海姆), 14, 15, 149, 150, 300
- Buchhold, Johannes (约翰内斯·布赫霍尔德), 140, 141
- Bührmann (比尔曼), 501
- Bülow, Bernhard W. von (伯恩哈德·W·冯·贝劳), 117
- Bürckel, Josef (约瑟夫·贝克尔), 189, 260, 261
- Burckhardt, Carl J. (卡尔·J·布克哈特), 33, 152, 154, 157, 316, 317, 455, 478
- Burkert (布克尔特), 224
- Busch (布许), 433
- Bütefisch, Heinrich (海因里希·比特菲施), 131, 133
- Buttleworth, W. Walton (沃尔顿·W·巴特沃斯), 484

- Büttner, Walter (瓦尔特·比特纳), 483
- Caesar (凯撒), 146
- Cambronne, Pierre J. E. de (皮埃尔·J·E·德·康布罗纳), 532
- Canaris, Erika (埃里卡·卡纳里斯), 158, 213
- Canaris, Wilhelm (威廉·卡纳里斯), 13, 152, 158, 213—连几页, 230—连几页, 240—连几页, 275, 448—连几页, 474, 491, 511, 519
- Carl (卡尔), 340
- Carol II, von Rumänien (罗马尼亚国王卡洛尔二世), 267
- Căsar (恺撒), 31
- Castillo, Ramón S. (拉蒙·S·卡斯蒂洛), 261
- Chamberlain, Arthur Neville (阿瑟·尼维尔·张伯伦), 208
- Chanti, Ibrahim (易卜拉欣·香蒂), 212
- Chorin, Franz (弗兰茨·科林), 522
- Christof von Hessen (克里斯托夫黑森亲王), 127
- Chruschtschow, Nikita S. (尼基塔·S·赫鲁晓夫), 215
-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215, 391, 498, 530
- Chvalkowsky, Frantisek Karel (弗朗吉席克·卡雷尔·契瓦尔科夫斯基), 324
- Ciano di Cortelazzo, Galeazzo(加里亚佐·齐亚诺), 129, 268, 478
- Ciano, Frau (齐亚诺夫人), 129
- Clages, Otto (奥托·克拉格斯), 519—连几页, 523, 524
- Clark, Comer (库默·克拉克), 10, 13
- Clasen (克拉森), 401
- Clausen, Frits (弗里茨·克劳森), 399, 460
- Cohen, Abraham (亚伯拉罕·科恩)
- Conn (科恩), 32
- Conti, Leonardo (莱奥纳多·康蒂), 65, 66, 303, 366, 536
- Copper=Klop (科佩尔, 即克洛普)
- Crankshaw, Edward (爱德华·克兰克肖), 13
- Crisis, Max de (马克斯·德·克里尼斯), 528
- Cyklar (齐拉尔), 251
- Daffner (达夫纳), 35
- Dahlerus, Birger (比尔格·达勒鲁斯), 246
- Dallin, Alexander (亚历山大·达林), 13, 467
- Daluege, Kurt (库特·达吕格), 60, 62—连几页, 75, 76, 85, 86, 89, 103, 123, 181, 182, 185, 191, 192, 239, 372, 400, 536
- Damzog, Ernst (恩斯特·达姆佐格), 274
- Danfeld (丹费尔德), 477
- Daniels, Alexander von (亚历山大·冯·丹尼尔斯), 127
- Dannecke, Theodor (特奥多尔·丹内克尔), 323, 362, 519, 537
- Danzeisen, Emil Traugott (埃米尔·特劳戈特·丹察森), 71, 72, 193, 194
- Darré, Richard Walther (里夏德·瓦尔特·达里), 49, 51, 53, 136, 145, 218, 272, 286
- Darwin, Charles (查理·达尔文), 300
- Daub (道布), 28
- David (戴维), 448
- Degrelle, Léon (莱昂·德格雷), 399, 442
- Delarue, Jacques (雅克·德拉律), 13
- Deloncle, Eugène (欧仁·德隆克尔), 378
- Denk, Wolfgang (沃尔夫冈·登克), 208
- Detten, Georg von (格奥尔格·冯·德滕), 98, 110, 121
- Diebitsch, Karl (卡尔·迪比契), 142

- Diels, Ilse (伊尔莎·狄尔斯), 86
- Diels, Rudolf (鲁道夫·狄尔斯), 82  
一连几页, 89, 97, 129, 169, 172, 176,  
179, 180, 188, 298
- Dietrich, Josef (约瑟夫·狄特里希),  
80, 101, 102, 106, 111 一连几页, 128,  
157, 406 一连几页, 427, 435, 443, 444,  
488, 489, 495, 531
- Dincklage, Paul (保罗·丁克拉格),  
62
- Dingler (丁勒), 242
- Dirlewanger, Oskar (奥斯卡·迪尔勒汪格尔), 431, 503
- Dischner (迪施纳), 167
- Dobler, Johann (约翰·多布勒), 252
- Doerr, Hans (汉斯·德耳), 107
- Dohnányi, Hans von (汉斯·冯·杜那尼), 178, 448 一连几页
- Dollfuß, Engelbert (恩格尔伯特·陶尔菲斯), 247 一连几页, 252, 253, 292
- Dollmann, Eugen (欧根·多尔曼),  
529, 531
- Donati, Angelo (安格洛·多纳蒂),  
363
- Dönitz, Karl (卡尔·邓尼茨), 535
- Dörnberg, Alexander von (亚历山大·冯·德恩贝格), 258
- Dornberger, Walter (瓦尔特·多恩贝格尔), 33
- Doussinague, José Maria (何塞·玛利亚·杜西勒凯), 479, 484
- Drucker (德鲁克尔), 374
- Duckwitz, Georg Ferdinand (格奥尔格·费迪南德·杜克维茨), 366
- Duesterberg, Theodor (西奥多·杜施特堡), 91
- Dulles, Allen W. (艾伦·W·杜勒斯), 282 一连几页, 487, 528 一连几页
- Du Moulin-Eckart, Karl-Leonhard (卡尔-莱昂哈德·杜·穆林-埃卡特),  
42, 71 一连几页
- Eberbach, Heinrich (海因里希·埃贝巴赫), 495
- Eberstein, Karl von (卡尔·冯·埃贝施泰因), 56, 101, 160, 313, 316
- Ebner, Gregor (格雷戈尔·埃布纳),  
148, 402
- Eden, Anthony (安东尼·艾登), 98
- Edrich, Viktoria (维多利亚·埃德里希), 161
- Eggers, Kurt (库特·埃格斯), 512
- Eher, Franz (弗兰茨·埃尔), 205, 406
- Ehlich, Hans (汉斯·埃利希), 386
- Ehrhardt, Hermann (赫尔曼·埃尔哈特), 22 一连几页, 26, 27, 69, 115,  
130, 131
- Eichhorn, von (冯·艾希霍恩), 466
- Eichmann, Adolf (阿道夫·艾希曼),  
10, 13, 14, 18, 195, 201, 302, 307 一连  
几页, 318, 321 一连几页, 343, 344,  
346, 359 一连几页, 368, 519 一连几页,  
525, 536
- Eicke, Theodor (西奥多·艾克), 96,  
97, 101, 120, 121, 188 一连几页, 357,  
399, 422, 423, 427 一连几页, 433, 434,  
438, 441
- Eirenschmalz, Franz (弗兰茨·艾伦施马尔茨), 372
- Eisenhower, Dwight D.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512, 527, 528, 532
- Eisenlohr, Ernst (恩斯特·埃森洛尔), 258
- Eisner, Kurt (库特·艾斯纳), 36, 37,  
79
- Eliás, Alois (阿洛伊斯·埃利亚斯),  
370, 371, 457
- Elsar, Georg (格奥尔格·艾尔塞),  
265 一连几页
- Engel, Gerhard (格哈德·恩格尔),  
281, 381
- Engels (恩格斯), 115
- Epp, Franz von (弗朗兹·冯·埃普),  
21, 26, 42, 75, 110 一连几页, 118, 165
- Erhard, Hans (汉斯·艾哈德), 45
- Ernst, Karl (卡尔·恩斯特), 71, 98,



- 103, 107, 115, 135, 221, 277
- Ernst, Frau (恩斯特夫人), 107
- Erzberger, Matthias (马修斯·埃尔兹伯格), 22
- Escherich, Georg (格奥尔格·埃舍里希), 21
- Esser, Hermann (赫尔曼·埃塞), 59, 68
- Falkenhausen, Alexander von (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 361, 380
- Falkenhausen, Hans Joachim von (汉斯·约阿希姆·冯·法尔肯豪森), 110, 121
- Farago (福劳戈), 505
- Faßbender (法斯本德), 294
- Fegelein, Hermann (赫尔曼·菲格莱因), 450, 503, 511, 534
- Fehling (费林), 224, 231, 232
- Feind (法因德), 501
- Felten (费尔滕), 123
- Fey, Emil (埃米尔·法伊), 252
- Fick, Ernst (恩斯特·菲克), 417, 446
- Fishler, Karl (卡尔·菲勒尔), 387
- Finckh, Eberhard (埃贝哈德·芬克), 494
- Fischer, Herbert (赫伯特·菲舍尔), 274
- Flach (弗拉赫), 81
- Flechner, Willi (维利·弗勒希纳), 172
- Fleisch, Reinhard (赖因哈德·弗勒施), 166—连几页, 172
- Flick,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弗利克), 131
- Florian, Albert (阿尔伯特·弗洛里安), 391
- Florstedt, Hermann (赫尔曼·弗洛施泰特), 354
- Foertsch, Hermann (赫尔曼·弗奇), 381
- Foitzik (福伊齐克), 245
- Formis, Rudolf (鲁道夫·福米斯), 211, 212, 214
- Förster (弗尔斯特), 115
- Forster, Albert (艾伯特·福斯特), 129, 277, 279, 285, 286, 289, 290, 455, 536
- Francke-Griksch (弗兰克-格里克施), 351
- Franco, Bahamonde Francisco (巴哈蒙德·佛朗西斯科·佛朗哥), 261
- François-Poncet, André (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 111, 116
- Frank, August (奥古斯特·弗兰克), 372
- Frank, Brigitte (布里吉特·弗朗克), 294, 295
- Frank, Hans (汉斯·弗朗克), 15, 17, 77, 112, 113, 120, 175, 177, 178, 279, 282, 291—连几页, 303, 323, 344, 384, 390, 391, 398
- Frank, Karl Hermann (卡尔·赫尔曼·弗朗克), 259
- Frank, Lorenz (洛伦茨·弗兰克), 19, 20
- Frank, Walter (瓦尔特·弗兰克), 219
- Franz (弗兰茨), 263
- Franz, Kurt (库特·弗兰茨), 350
- Franz, Wilhelm (威廉·弗兰茨), 475
- Frauendorfer, Max (马克斯·弗劳恩多夫), 474
- Frauenfeld, Alfred E. (阿尔弗雷德·E·法劳恩菲尔德), 471, 472
- Freisler, Roland (罗兰·法赖斯勒), 176, 178, 390, 497
- Freter (弗雷特尔), 347, 348
- Fretter-Pico, Maximilian (马克西米利安·弗雷特-皮科), 102
- Freund, Michael (米夏埃尔·弗罗因德), 153, 154
- Frey (弗雷), 512
- Freytagh-Loringhoven, Wend von (文德·冯·弗赖伊塔格-洛林格霍芬), 497
- Frick, Wilhelm (威廉·弗立克), 75,

- 76, 78 一连几页, 87 一连几页, 103, 165, 179 一连几页, 185, 371
- Friedrich II (der Große) von Preußen (普鲁士国王老腓特烈), 31
- Frisch von (弗里施·冯), 224, 231
- Frischauer, Willi (威利·弗里绍尔), 45
- Fritsch, Werner von (瓦尔纳·冯·弗立契), 101, 102, 118, 122, 221 一连几页, 313, 377, 382, 383, 414, 449
- Fritzsch, Karl (卡尔·弗里奇), 188, 345
- Fritzsche, Hans (汉斯·弗里茨彻), 393, 476
- Fromm, Fritz (弗里茨·弗洛姆), 101, 102
- Fromm, Werner (维尔纳·弗罗姆), 436
- Funk, Walter (瓦尔特·丰克), 221
- Gabeik, Josef (约瑟夫·加拜克), 458, 459
- Gebhardt, Karl (卡尔·格布哈特), 495, 515, 516, 529, 535
- Gehre, Ludwig (路德维希·格勒), 450
- Geloso, Carlo (卡洛·格洛索), 362
- Georg VI. von England (英王乔治六世), 484
- Georg Enno (恩诺·格奥尔格), 14, 373
- Gercke, Achim (阿希姆·格尔克), 151 一连几页, 303
- Gerstein, Kurt (库特·格施泰因), 346
- Gerstel, Emil (埃米尔·格斯特尔), 374
- Geschke, Hans (汉斯·格施克), 370, 505
- Geyr von Schweppenburg (盖尔·冯·施韦彭堡), 127
- Ghadar (加达尔), 13
- Gilbert, Gustave M. (古斯塔夫·M·吉尔伯特), 292, 356
- Gildisch, Kurt (库特·吉尔狄施), 114, 115
- Gille, Herbert (赫伯特·吉勒), 413, 446
- Ginath, Kurt von (库特·冯·吉南特), 347, 348
- Ginzburg, Pino (皮诺·京茨堡), 319, 320
- Gisevius, Hans Bernd (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 85, 86, 230, 327, 333, 473
- Glass, Fridolin (弗里多林·格拉斯), 248 一连几页
- Gleichen-Rußwurm,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格莱兴-鲁斯武尔姆), 99
- Globocnik, Odilo (奥迪洛·格洛博斯尼克), 291, 292, 295, 297, 345, 347, 356, 536
- Glücks, Richard (理查德·格吕克斯), 357, 537
- Goebbels, Joseph (约瑟夫·戈培尔), 29, 35, 45, 59 一连几页, 64 一连几页, 75, 76, 78, 106, 109, 110, 113, 298, 303, 304, 312 一连几页, 383, 391, 393, 394, 455, 469, 509
- Goerdeler, Carl (卡尔·戈台勒), 327, 449, 473 一连几页, 477, 486, 491, 497, 498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341
- Goetsch, Werner (维尔纳·格奇), 212
- Goetze, Friedemann (弗里德曼·格策), 413, 417
- Golomb, Elishu (埃利亚胡·戈洛姆布), 319, 320
- Goltz, von der (冯·德·戈尔茨), 127, 130, 221, 230, 231
- Gomerski, Hubert (胡伯特·戈梅斯基), 349
- Göring, Hermann (赫尔曼·戈林), 8, 23, 25, 67, 75, 76, 78, 80, 82 一连几

- 页, 94, 95, 97—连几页, 104, 105, 110, 113, 115—连几页, 120, 122, 132, 136, 155, 165, 169—连几页, 176, 179, 180, 223—连几页, 229, 232, 246, 261, 277, 283, 284, 286, 287, 290, 299, 304, 314, 316—连几页, 323, 324, 378, 455, 474, 480, 481, 534
- Göring, Ilse (伊尔莎·戈林), 82  
 Göring, Karl (卡尔·戈林), 82  
 Gottberg, Curt von (库特·冯·戈特贝格), 272, 465, 466, 471, 531  
 Gotzmann, Leo (莱奥·戈茨曼), 493  
 Grabner (格拉布纳), 355  
 Graf, Mathias (马赛厄斯·格拉夫), 328  
 Graf, Ulrich (乌尔里希·格拉夫), 24, 25, 54, 501  
 Granninger, Peter (彼得·格兰宁林格), 70  
 Grawitz, Ernst (恩斯特·格拉维茨), 333, 344, 536  
 Greifelt, Ulrich (乌尔里希·格赖费尔特), 283, 284, 286, 287, 289, 402  
 Greim, Robert von (罗伯特·冯·格莱姆), 534  
 Greiser, Arthur (阿图尔·格赖泽尔), 279, 288, 343, 344, 455, 536  
 Grieneisen (格里恩埃森), 483  
 Grillenberger (格里伦贝克尔), 203  
 Grinsch (格林施), 72  
 Gröber, Konrad (康拉德·格勒贝尔), 125  
 Groß, Walter (瓦尔特·格罗斯), 303  
 Grothmann (格罗特曼), 535  
 Gruhl, Erich (埃里希·格鲁尔), 194  
 Gruhn, Erna = Blomberg, Erna von (埃娜·格鲁恩, 即埃娜·冯·勃洛姆堡)  
 Grund, Werner (维尔纳·格龙德), 207  
 Grünwald, Adam (亚当·格吕内瓦尔德), 355  
 Grünspan, Herschel (赫舍尔·格林斯潘), 312  
 Grünstadt (格林施塔特), 37  
 Gruschopf (格鲁舍普夫), 501  
 Grüson, Max (马克斯·格吕宗), 524  
 Grzimek, Josef (约瑟夫·格尔夫茨梅克), 243, 245  
 Guderian, Heinz (海因兹·古德里安), 33, 491, 503, 507—连几页, 513, 515, 516  
 Güntel, Marie (玛丽·京特尔), 116  
 Günther, Ch. von (Ch·冯·京特), 526  
 Günther, Hans (汉斯·京特), 311  
 Günther, Rolf (罗尔夫·京特), 311, 346, 347, 537  
 Gürtner, Franz (弗朗兹·古特纳), 177—连几页, 228, 369  
 Gustav Adolf v. Schweden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526  
 Gutenberg, Karl (卡尔·古滕贝格尔), 501  
 Haacke, Werner von (维尔纳·冯·哈克), 84, 176  
 Haase (哈泽), 52, 58  
 Habicht, Theo (西奥多·哈比希特), 247—连几页, 254  
 Hácha, Emil (艾米尔·哈查), 260, 261  
 Hackmann, Hermann (赫尔曼·哈克曼), 354  
 Hagen, Herbert (赫伯特·哈根), 204, 207, 212, 302, 308—连几页, 312, 318, 319, 321  
 Halder, Franz (弗朗兹·哈尔德), 102, 103, 233, 240, 241, 338  
 Hallgarten, Wolfgang (沃尔夫冈·哈尔加滕), 39  
 Hamburg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哈姆布格尔), 250, 251  
 Handschuch, Hugo (胡戈·汉德舒赫), 175  
 Hanselbauer (汉斯尔包尔), 106, 108

- Hansen, Georg (格奥尔格·汉森), 444, 453, 497
- Hansen, Gottfried (戈特弗里德·汉森), 159
- Harprecht, Klaus (克劳斯·哈普雷希特), 452
- Harriman, Averell (艾夫里尔·哈里曼), 485
- Hart, Liddel (利德尔·哈特), 412
- Hasse, O. E. (O. E. 哈塞), 215
- Hasselbacher, Karl (卡尔·哈塞尔巴赫), 172
- Hassell, Ilse von (伊尔莎·冯·哈塞尔), 478
- Hassell, Ulrich von (乌尔里希·冯·哈塞尔), 16, 316, 455, 456, 474, 475, 477, 485, 486
- Hassler, Friedrich Wilhelm (弗里德里希·威廉·哈斯勒), 347, 348
- Hauenstein (豪恩施泰因), 61
- Hausmann (豪斯曼), 175
- Hausser, Paul (保罗·豪塞尔), 9, 128, 233, 405, 408—连几页, 415, 419, 420, 423, 437, 443, 446, 475, 489
- Häusserer (霍伊塞雷尔), 221, 222
- Hayn, Hans (汉斯·海因), 110—连几页
- Heckeholt (赫肯霍尔特), 346
- Hedtoft, Hans (汉斯·黑德托夫特), 366
- Hedvicek (黑德维策克), 252, 253
- Heiden, Erhard (埃哈德·海登), 30
- Heiden, Konrad (康拉德·海登), 21, 30, 125
- Heimsoth (海姆佐特), 70
- Heine, Edmund (埃德蒙·海因斯), 26, 71, 95, 102, 109, 111, 112
- Heinrich I. (亨利一世), 46, 144, 145
- Heinrich von Bayern (海因里希巴伐利亚亲王), 35, 36
- Heinrich, Gotthard (戈特哈德·海因里希), 102, 122, 516, 533, 534
- Heyßmeyer, August (奥古斯特·海斯迈尔), 136, 163, 416
- Heiter (海特尔), 222
- Held, Heinrich (海因里希·赫尔德), 75
- Helfferich, Emil (埃米尔·黑尔费里希), 139
- Helldorf, Wolf-Heinrich von (沃尔夫-海因里希·冯·赫尔道夫), 26, 56, 224, 225, 474
- Heller, Reinhold (赖因霍尔德·黑勒), 84, 172
- Hellwig, Otfried (奥特弗里德·黑尔维希), 242—连几页
- Henckell (亨克尔), 257
- Henlein, Konrad (康拉德·汉莱因), 129, 258, 259
- Hentig, von (冯·亨蒂希), 449
- Herbst, Heinrich (海因里希·赫布斯特), 295
- Herf, Eberhard (埃贝哈德·赫尔夫), 334
- Herff, Maximilian von (马克西米利安·冯·赫尔夫), 136, 444, 497
- Hering, Hermann (赫尔曼·黑林), 152
- Herzer (黑策尔), 63
- Herzl, Theodor (特奥多尔·黑尔茨尔), 308
- Heß, Rudolf (鲁道夫·赫斯), 73, 93, 104, 114—连几页, 166, 196, 217, 235, 237, 255, 256, 386, 390
- Heusinger, Adolf (阿道夫·豪辛格), 495
- Hewel, Walther (瓦尔特·赫维尔), 366, 480, 481
- Hewitt (休伊特), 485
- Heydebrek, Peter von (彼得·冯·海德布雷克), 26, 95, 110—连几页
- Heydrich, Bruno (布鲁诺·海德里希), 151, 152
- Heydrich, Elisabeth (伊丽莎白·海德里希), 160
- Heydrich, Ernestine Wilhelmine (埃

- 内斯蒂纳·威廉明尼·海德里希), 151
- Heydrich, Lina (莉娜·海德里希), 76, 155—连几页, 166, 233, 239, 457
- Heydrich, Reinhard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7, 13, 69, 76, 79, 81, 86, 87, 89, 93—连几页, 101—连几页, 110, 114, 115, 150—连几页, 178—连几页, 198—连几页, 204, 206, 208—连几页, 219—连几页, 223, 229—连几页, 256, 258, 259, 263, 264, 265—连几页, 273—连几页, 280, 298, 299, 302, 310—连几页, 318—连几页, 338, 341, 343, 344, 347, 359, 369, 370, 377—连几页, 418, 449, 451, 452, 457—连几页, 473, 511
- Heydrich, Reinhold (赖因霍尔德·海德里希), 151
- Heydrich, Sarah (扎拉·海德里希), 152
- Hiemer, Ernst (恩斯特·希梅尔), 302, 312
- Hierl, Konstantin (康斯坦丁·希尔), 78
- Hilberg, Raul (劳尔·希尔伯格), 13, 337, 504
- Hildebrandt, Richard (里夏德·希尔德布兰特), 280, 392, 402, 403, 475, 531
- Himmeler, Ernst (恩斯特·希姆莱), 34
- Himmeler, Gebhardt (格布哈特·希姆莱), 34, 35, 50, 499
- Himmeler, Gudrun (古德龙·希姆莱), 51, 477
- Himmeler, Heinrich (海因里希·希姆莱), 7—连几页, 14, 16—连几页, 31—连几页, 36—连几页, 62, 67—连几页, 73—连几页, 78—连几页, 84—连几页, 93—连几页, 98, 101, 102, 104, 105, 107, 110, 113, 115—连几页, 120, 122, 124—连几页, 151—连几页, 160—连几页, 169, 175—连几页, 184—连几页, 187—连几页, 195, 197, 202, 205, 217, 219—连几页, 229—连几页, 237, 238, 240—连几页, 246—连几页, 254—连几页, 261, 262, 264—连几页, 277—连几页, 305, 307, 310, 313, 314—连几页, 323—连几页, 333—连几页, 339, 342—连几页, 347, 348, 351—连几页, 355, 357, 358, 364—连几页, 368—连几页, 375—连几页, 407—连几页, 413—连几页, 439, 440, 442, 444—连几页, 450, 452—连几页, 462—连几页, 477—连几页, 483—连几页, 494—连几页, 507—连几页
- Himmeler, Koarad (康拉德·希姆莱), 81, 82
- Himmeler, Margarete (玛加丽特·希姆莱), 34, 44—连几页, 50, 51, 155, 388
- Himmeler, Mutter von Heinrich (海因里希之母·希姆莱), 34, 50
- Himmeler, Vater von Heinrich (海因里希之父·希姆莱), 35—连几页, 50
- Hindenburg, Paul von Bezenekendorff und von (保罗·冯·本尼肯道夫·冯·兴登堡), 90, 99, 100, 118, 121, 171, 216, 407
- Hintze, Kurt (库特·欣策), 400
- Hirschbarger (希尔施贝格尔), 501
- Hirschfeld, Ludwik (卢德维克·希尔斯茨费尔德), 349
- Hitlez,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7, 10, 12—连几页, 19, 20, 22—连几页, 29—连几页, 35, 41—连几页, 51, 53, 56—连几页, 73—连几页, 85, 86, 88—连几页, 103—连几页, 125—连几页, 130—连几页, 134, 135, 138, 139, 144, 145, 150—连几页, 155—连几页, 160, 161, 163, 168, 170, 172, 173, 177, 178, 180—连几页, 186—连几页, 194, 199, 207, 210, 211, 213, 214, 219, 222—连几页, 235, 236, 238, 240—连几页, 245—连几页, 254, 255, 257—连几页,

- 284, 289, 292, 293, 296—连几页, 303, 305, 309, 313—连几页, 324—连几页, 329, 330, 333, 334, 338, 339, 352, 354, 356, 364—连几页, 369—连几页, 376, 377, 381—连几页, 386, 387, 389, 391, 393, 400, 403—连几页, 411, 414, 一  
连几页, 419, 421, 422, 424—连几页, 430, 432, 436—连几页, 442, 443, 445—连几页, 460—连几页, 483—连几  
页, 496, 497, 499, 500, 502—连几页, 507—连几页, 511—连几页, 521, 524—  
连几页
- Hitzinger, Heinrich (海因里希·希青  
格尔), 535
- Hlinka, Andreas (安德烈亚斯·赫林  
卡), 260
- Hochmuth (霍赫穆特), 302
- Hoepner, Erich (埃里希·霍普纳),  
427, 495
- Hofacker, Caesar von (凯撒·冯·  
霍法克), 489, 494
- Hoffmann, Joachim (约阿希姆·霍  
夫曼), 22, 23, 176
- Höfle Hermann (赫尔曼·赫夫勒),  
42, 97, 356, 445, 446
- Hofmann, Otto (奥托·霍夫曼), 271,  
501
- Hohberg, Hans (汉斯·霍贝格), 18,  
375
- Hohberg und Buchwald, Anton von  
(安东·冯·霍贝格·翁德·布赫瓦  
尔德), 115, 130
- Hoheneggelsen, von (冯·霍恩埃格  
尔森), 218
- Hohealohe-Langenburg, Egon von  
(埃贡·冯·霍恩洛厄-兰根堡), 479—  
连几页
- Hohenlohe-Langenburg, Maria zu  
(玛丽亚·楚·霍恩洛厄-兰根堡), 479
- Höhn, Reinhard (赖因哈德·赫恩),  
128, 186, 198, 200, 217—连几页, 302,  
454, 455, 476, 477, 480
- Hohnstein (霍恩施泰因), 177
- Holste, Rudolf (鲁道夫·霍尔斯特),  
534
- Holtzschmidt, Emil (埃米尔·霍尔  
特施密特), 352
- Höppner, Heinz (海因茨·赫普纳),  
201
- Hörauf, von (冯·赫劳夫), 42
- Horn Karl (霍恩·卡尔), 72, 73
- Horn, Max (马克斯·霍恩), 358
- Hornstein, von (冯·霍恩施泰因),  
501
- Horrión, Johann (约翰·霍里翁), 143
- Horty von Nagybánya, Miklos (Vater)  
(老米克洛斯·霍尔蒂·纳吉巴  
尼亚), 504—连几页
- Hotry von Nagybánya, Miklos (So-  
hn) (小米克洛斯·霍尔蒂·纳吉巴  
尼亚), 505, 506
- HöB, Rudolf (鲁道夫·霍斯), 49,  
189, 347, 354—连几页, 359, 536
- Hoßbach,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霍斯巴赫), 33, 223—连几页, 231,  
232, 416
- Höttl, Wilhelm (威廉·赫特尔), 152,  
160, 162, 215, 216, 531
- Hoven, Waldemar (瓦尔德马尔·霍  
芬), 354
- Hrosineck (赫罗西内克), 311
- Huber, Franz Josef (弗兰茨·约瑟  
夫·胡贝尔), 81, 166—连几页, 172,  
193, 199, 229, 266
- Humann-Hainhofen, Rolf von (罗尔  
夫·冯·胡曼-海因霍芬), 257
- Hunsche (洪舍), 519
- Ickrath (伊克拉特), 448
- Illges, Walther (瓦尔特·伊尔格斯),  
97
- Jacob, Fritz (弗里茨·雅各布), 335
- Jäger, Karl (卡尔·耶格尔), 328
- Jagow, Dietrich von (迪特里希·  
冯·雅戈夫), 269, 421

- Jahn (雅恩), 66
- Jahnke, Erich (埃里希·雅恩克), 214
- Jakubowicz, Jakob (雅各布·雅库博维茨), 350
- Jeckeln,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 195, 333, 339, 400, 464, 536
- Jena, Leo von (莱奥·冯·耶纳), 396, 397, 444
- Jeschow, Nikolai I. (尼古拉·I. 叶若夫), 216
- Jessen, Jens Peter (詹斯·彼得·耶森), 198, 475—连几页, 485
- Jodl, Alfred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228, 230, 324, 533
- Joel, Günther (京特·约埃尔), 84, 176
- Jordan, Rudolf (鲁道夫·约尔丹), 151
- Jost, Heinz (海因茨·约斯特), 87, 200, 212, 232, 238, 242, 327, 328, 452
- Jungblut, Lily (莉莉·容克布卢特), 277
- Jünger, Ernst (恩斯特·约恩格), 55, 149, 169
- Justus (尤斯图斯), 221
- Jüttner, Hans (汉斯·于特纳), 136, 428, 429, 440, 444
- Jüttner, Max (马克斯·于特纳), 95, 109, 110, 118
- Kaduk, Oswald (奥斯瓦尔德·卡杜克), 349, 355
- Kaehler (克勒), 501
- Kahr, Gustav von (古斯塔夫·冯·卡尔), 24—连几页, 41, 42, 110
- Kallenbach, Hans (汉斯·卡伦巴赫), 194
- Kaltenbrunner, Ernst (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 168, 401, 473, 492, 497, 502, 506, 511, 521, 525—连几页, 530, 531, 536
- Kaminski, Bronislaw W. (布罗尼斯拉夫·W·卡明斯基), 468, 503
- Kammler, Hans (汉斯·卡姆勒), 18, 375, 376
- Kampe, Wilhelm (威廉·卡姆佩), 392
- Kamphausen (坎普豪森), 116
- Kanstein, Paul (保罗·康施泰因), 474, 497
- Kant, Immanuel (伊曼努尔·康德), 341
- Kantor (康托尔), 155
- Kapp, Wolfgang (沃尔夫冈·卡普), 22, 130
- Kappler, Herbert (赫伯特·卡普勒), 364
- Karl der Große (查理大帝), 144
- Karwinsky (卡温斯基), 252
- Käsbach, Edith (埃迪特·克斯巴赫), 211
- Kasche, Siegf. (西格弗里德·卡舍), 117, 269, 385
- Kasner, Max (马克斯·卡斯纳), 349
- Kastner, Rezsö (雷茨佐·卡斯特纳), 519—连几页, 523
- Katz, Delwin (德尔温·卡茨), 175
- Kautsky, Benedikt (贝内迪克特·考茨基), 189, 190
- Keitel, Wilhelm (威廉·凯特尔), 225, 227, 228, 233, 243, 244, 274, 275, 279, 281, 348, 379, 453, 496, 502, 512, 531, 533, 534
- Kempf, Werner (维尔纳·肯普夫), 419
- Kempner, Robert M.W. (罗伯特·M·W·肯普纳), 153, 327, 471
- Kenstler, Geog (格奥尔格·肯斯特勒), 48
- Keppler, Georg (格奥尔格·克普勒), 413
- Keppler, Wilhelm (威廉·凯普勒), 131, 260, 261
- Kern, Erich = Kernmayr, Erich (埃里希·克恩, 即埃里希·克恩迈尔)
- Kernmayr, Erich (埃里希·克恩迈)

- 尔), 9, 505, 507, 537
- Kerri, Hanns (汉斯·凯尔), 77, 384
- Kersten, Felix (费利克斯·克尔斯滕), 17, 45, 47, 125, 145, 152, 153, 156, 162, 271, 291, 298, 364, 365, 393, 478, 479, 485, 496, 507, 517—连几页, 526, 527, 532
- Kessel, Joseph (约瑟夫·克塞尔), 10, 517
- Kesselring, Albert (艾伯特·凯塞林), 405, 529
- Keudell, Otto von (奥托·冯·科伊德尔), 127
- Khan, Hafiz (哈菲茨·坎), 315, 316
- Kielmansegg, Adolf von (阿道夫·冯·基尔曼斯埃格), 495
- Kielpinski, von (冯·基尔平斯基), 208
- Kienast, Ernst (恩斯特·基纳斯特), 484
- Kiep (基普), 450
- Kiesel, Georg (格奥尔格·基泽尔), 380
- Killinger, Manfred von (曼弗雷德·冯·基林格), 22, 62, 66, 110, 269
- Kimche, David (戴维·金奇), 319
- Kimche, John (乔恩·金奇), 319
- Kircher, Rudolf (鲁道夫·基歇尔), 204
- Kistler, Robert (罗伯特·基斯特勒), 39, 43, 44
- Klagges, Dietrich (迪特里希·克拉格斯), 195
- Klausener, Erich (埃里希·克劳斯纳), 114
- Kleikamp, Gustav (古斯塔夫·克莱坎普), 159
- Klein (克莱因), 459
- Kleist, Ewald von (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 102, 382, 427, 444
- Klingenberg, Fritz (弗里茨·克林根贝格), 135
- Kliniker (克里尼克), 495
- Klietzsch, Johann Ulrich (约翰·乌尔里希·克林茨赫), 22
- Klop (克洛普), 263, 264
- Klotz, Helmut (赫尔穆特·克洛茨), 71
- Kluge, Günther von (古恩特·冯·克鲁格), 274, 293, 294
- Kluka, Paul (保罗·克卢克), 462, 463
- Knipp, Hans (汉斯·克尼普), 38
- Knoblauch, Kurt (库特·克诺布劳赫), 432
- Knochen, Helmut (赫尔穆特·克诺亨), 198, 361, 363, 365, 378, 379, 493, 494
- Ko (郭), 517
- Koch, Erich (埃里希·科赫), 13, 16, 180, 279, 286, 290, 385, 386, 508, 509
- Koch, Frau von Erich (埃里希·科赫夫人), 13
- Koch, Ilse, (伊尔西·科赫), 14, 353, 354
- Koch, Karl (卡尔·科赫), 352—连几页
- Koch, Paul (保罗·科赫), 207
- Koch, Robert (罗伯特·科赫), 109, 112, 113, 120
- Kodré, Heinrich (海因里希·科德勒), 492, 493
- Koehl, Robert L. (罗伯特·L·克尔), 77, 292
- Kogon, Eugen (欧根·科贡), 10—连几页, 15, 187, 195
- Köhler, Hans (汉斯·克勒), 249, 250
- Köhn (克恩), 333
- Komoly, Otto (奥托·科默吕), 519
- Konjew, Iwan S. (伊凡·S·科涅夫), 513
- Koppe, Wilhelm (威廉·科佩), 280
- Kordt, Erich (埃里希·科尔特), 258
- Korherr, Richard (理查德·科赫尔), 18, 401—连几页
- Körner, Paul (保罗·克尔纳), 105
- Korsmann, Gerret (格雷特·科尔泽



- 曼), 333, 381, 382, 536  
 Kösch (克施), 418  
 Kraas, Hugo (胡戈·克拉斯), 427  
 Kraewel, von (冯·克雷维尔), 493  
 Krämer (克雷默尔), 338, 354  
 Kransfuß, Fritz (弗里茨·克拉内富斯), 131, 132, 479, 488  
 Kramhals, Hanns von (汉斯·冯·克兰哈尔斯), 349  
 Krausnick, Helmut (赫尔穆特·克劳苏尼克), 281, 324  
 Krauß, Fritz von (弗里茨·冯·克劳塞尔), 103, 104, 109, 110, 112, 121  
 Krebs, Albert (阿尔伯特·克雷布斯), 32, 57  
 Kremser (克雷姆泽尔), 66  
 Krenzki Curt von (库特·冯·克伦茨基), 361  
 Kreuter (克罗伊特尔), 494, 495  
 Kriebel, Hermann (赫尔曼·克里贝尔), 23  
 Kröger (克勒格尔), 222  
 Krüger, Friedrich-Wilhelm (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 17, 56, 67, 91, 92, 95, 280, 293, 295, 297, 347, 348, 352, 384, 396—连几页, 421, 536  
 Krüger, Walter (瓦尔特·克吕格尔), 135  
 Krumej, Hermann (赫尔曼·克鲁迈), 519  
 Kube, Wilhelm (威廉·库贝), 17, 340—连几页, 392, 466  
 Kubis, Jan (扬·库比斯), 458, 459  
 Kuchler, Georg von (格奥尔格·冯·库希勒), 107, 274  
 Kumm, Otto (奥托·库姆), 432, 433  
 Künstler, Karl (卡尔·京斯特勒), 355  
 Kursell, Otto von (奥托·冯·库尔泽尔), 255  
 Lakatos, Géza (盖佐·拉卡托什), 504, 505  
 Lamm, Hans (汉斯·拉姆), 305  
 Lammerding, Heinz (海因兹·拉麦丁), 512, 516  
 Lammers, Heinrich (海因里希·拉麦斯), 219, 295  
 Landauer (兰道尔), 68  
 Langbehn, Carl (卡尔·兰格本), 477, 479, 485—连几页, 491  
 Lange (朗格), 343, 345, 398  
 Lanz (兰茨), 443  
 Lasch, Karl (卡尔·拉施), 295, 344  
 Lasch, Kurt (库特·拉施), 78  
 Latenser, Hans (汉斯·拉特恩泽尔), 12  
 Lautzbacher (劳滕巴赫尔), 36  
 Lutz, Ernst (恩斯特·劳茨), 370  
 Lval, Pierre (皮埃尔·赖伐尔), 362  
 Lawrence, Thomas Edward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 54  
 Lechle (勒希勒), 120  
 Lederer = Vasut (勒德雷尔, 即法祖特)  
 Letellier (勒泰利埃), 488  
 Lettow, Paul (保罗·莱托), 409  
 Ley, Robert (罗伯特·莱伊), 78, 218  
 Lichtenberg, Georg Christoph (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 154  
 Liebermann von Sonnenberg (利贝曼·冯·宗南贝格), 85  
 Likus, Rudolf (鲁道夫·利库斯), 257  
 Lindow (林多), 338  
 Lingens-Reiner, Ella (埃拉·林根斯-赖纳), 350  
 Linstow, Hans Otfried von (汉斯·奥特弗里德·冯·林斯托夫), 494  
 Lippert, Michael (迈戈尔·利伯特), 120, 121  
 Lipski, Jozef (约瑟夫·利普斯基), 316  
 List, Wilhelm (威廉·李斯特), 19, 274  
 Lobbes, Hans (汉斯·洛贝斯), 193, 265, 474  
 Lochner, Louis P. (路易斯·P·洛克纳), 243

- Löffner (勒夫纳), 222
- Loh, Hans (汉斯·洛), 444, 445
- Lohse, Hinrich (欣里希·洛泽), 32, 342, 385
- Lombard, Gustav (古斯塔夫·洛姆巴德), 495
- Lorenz, Werner (维尔纳·洛伦茨), 255, 256, 258, 259, 268, 284, 285, 534
- Loritz, Anna (安娜·洛里茨), 38—连几页
- Loritz, Maja (玛雅·洛里茨), 37—连几页, 42
- Loritz, Hans (汉斯·洛里茨), 355
- Lömer, Georg (格奥尔格·勒尔纳), 372—连几页
- Lömer, Hans (汉斯·勒尔纳), 372
- Löwenher, Bernhard (伯恩哈德·勒泽纳), 303, 323, 365, 366
- Lospinoso, Guido (古伊多·洛斯皮诺索), 363
- Lossow, Otto Hermann von (奥托·赫尔曼·冯·洛索), 24, 25, 41
- Löv, Lorenz (洛伦茨·勒夫), 294
- Loyola, Ignatius von (依纳爵·冯·罗耀拉), 135, 136
- Lubbe, Marinus van der (马瑞纳斯·范·德·卢勃), 79
- Lübbert, Ulrich (乌尔里希·吕伯特), 119
- Ludendorff, Erich (埃里希·鲁登道夫), 25, 26, 43
- Ludin, Hanns (汉斯·卢丁), 269, 421
- Ludwig III. von Bayern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 20, 39
- Lukas (卢卡斯), 491
- Lustig (卢斯蒂希), 66
-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360, 479, 482, 483
- Lutze, Viktor (维克多·卢策), 62, 93, 100, 104—连几页, 108—连几页, 112, 118, 123, 124, 134, 254, 302, 382—连几页
- Lutze, Frau von Viktor (维克多·卢策夫人), 383
- Lützw, Ludwig A. W. von (路德维希·A·W·冯·吕佐夫), 56
- Maas, Hermann (赫尔曼·马斯), 243
- MacDonald, Malcolm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320
- Mackensen, Eberhard von (埃贝哈德·冯·马肯森), 433
- MacMahon, Patrice de (帕特里斯·麦克马洪), 226
- Mærker (梅克尔), 158
- Malsen-Ponickau, von (冯·马尔森-波尼考), 127
- Manstein, Erich von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 405, 443
- Martin, Beano (本诺·马丁), 264, 445
- Martinsen (马丁森), 399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28, 81, 206, 210
- Masaryk, Tomáš (托马斯·马萨里克), 376
- Massow, Ewald von (埃瓦尔德·冯·马索), 256
- Masur, Norbert (诺伯特·马祖尔), 532
- Mattoni, Heinrich (海因里希·马托尼), 373
- Maurer, Helmut (赫尔穆特·毛雷尔), 152
- Maurice, Emil (艾米尔·莫里斯), 24,
- May, Kurt (库特·迈), 374
- Mayer, Saly (扎利·迈尔), 524
- Mayr, Karl (卡尔·迈尔), 19—连几页, 71, 73
- McClellan, Roswell D. (罗斯韦尔·D·麦克莱伦), 524
- Mecklenburg, Friedrich Franz von (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冯·梅克伦堡), 127
- Medicus, Franz Albrecht (弗兰茨·阿尔布雷希特·梅迪库斯), 87

- Mählhorn, Herbert (赫伯特·梅尔霍恩), 198, 200, 241—连几页
- Meisinger, Josef (约瑟夫·迈辛格), 81, 166, 172, 193, 221, 222, 224—连几页, 230, 232
- Mesch (梅施), 225
- Meyer (迈尔), 464
- Meyer-Hetling, Konrad (康拉德·迈尔-赫特林格), 286, 290
- Meyzner, August (奥古斯特·迈斯纳), 381, 397, 398
- Miklas, Wilhelm (威廉·米克拉斯), 252
- Mildenstein, Leopold von (莱奥波德·冯·米尔登施泰因), 302, 304—连几页
- Münke (明克), 403
- Model, Walter (瓦尔特·莫德尔), 432, 433, 446, 495
- Mohr (莫尔), 158
- Moltke, Helmuth James von (赫尔莫特·詹姆斯·冯·毛奇), 450, 491
- Montgomery, Bernard L. (伯纳德·L·蒙哥马利), 535, 536
- Morgen, Konrad (康拉德·莫根), 352—连几页
- Morgenstern (莫根施特恩), 207
- Müller (米勒), 388
- Müller, Curt (库特·米勒), 224, 225
- Müller, Ernst (恩斯特·米勒), 105
- Müller, Hans (汉斯·米勒), 211
- Müller, Heinrich (海因里希·缪勒), 133, 166—连几页, 170, 172, 185, 193, 199, 238, 242—连几页, 265, 266, 315, 318, 321, 325, 327, 343, 344, 355, 379, 448—连几页, 473, 476, 491, 521, 537
- Müller, Joseph (约瑟夫·米勒), 448—连几页
- Müller, Karl Alexander von (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 19
- Müller, Max (马克斯·米勒), 81, 96
- Mumm, Michel (米歇尔·穆姆), 387
- Murphy, Michael (迈克尔·墨菲), 533
- Musserts, Adrian (阿德里安·穆塞特), 399
- Mussolini, Benito (本尼托·墨索里尼), 243, 284, 324, 337, 363, 372, 456, 477, 504, 511, 529, 531
- Musy, Jean-Marie (让-马丽·米西), 525
- Muszynski, Brunhilde (布龙希尔德·穆斯岑斯基), 288
- Mutschmann, Martin (马丁·穆特施曼), 177
- Mutzbauer (穆茨包尔), 175
- Napoleon I. von Frankreich (拿破仑一世), 31, 75, 76, 323, 532
- Nathusius, Engelhard von (恩格尔哈德·冯·纳图西乌斯), 127
- Nauck, Gerhard (格哈德·瑙克), 193, 224, 225
- Naujock, Alfred (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 211, 212, 214, 215, 241—连几页, 245, 260, 264
- Naumann, Werner (维尔纳·瑙曼), 131, 534, 536
- Nebz, Arthur (阿图尔·奈比), 11, 85, 86, 89, 168, 169, 172, 185, 192, 193, 225, 230, 238, 246, 265, 266, 327, 328, 333, 336, 353, 381, 450, 473, 474, 479, 492, 497
- Neckmann (内克曼), 327
- Nefzger (内夫茨格尔), 175
- Neufeldt, Hans-Joachim (汉斯-约阿希姆·诺伊菲尔特), 181
- Neurath, Constantine von (康斯坦丁·冯·牛赖特), 223, 228, 247, 249, 255, 370
- Neusüß-Hunkel, Ermenhild (埃蒙希尔德·诺伊苏斯-洪克尔), 11
- Nicolai-Helmut (赫尔穆特·尼古拉), 87
- Novak, Franz (弗兰茨·诺瓦克), 311
- Nowack (诺瓦克), 519

Nuembergk (尼恩贝格), 175

Oberg, Carl-Albrecht (卡尔-阿尔布  
雷希特·奥伯格), 56, 379, 381, 493—  
连几页

Oberkamp, Carl von (卡尔·冯·奥  
伯坎普), 436

Oberndörffer, J. N. (J·N·奥伯恩德  
费尔), 36

Ohlendorf, Otto (奥托·奥仑道夫),  
10, 16, 18, 128, 195, 197, 198, 208,  
209, 217—连几页, 237, 238, 308, 315,  
327—连几页, 336, 389—连几页, 393,  
394, 398, 401, 403, 473, 475—连几页,  
535, 536

Ohlert, Kurt (库特·厄勒特), 392

Olbricht, 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奥  
尔布里希特), 486

Oshima, Hirosho (大岛浩), 261

Osten, Lina Mathilde von=Heyd-  
rich, Lina (莉娜·玛蒂尔德·冯·奥  
斯滕, 即莉娜·海德里希)

Osten, von, Vater von Lina (莉娜之  
父冯·奥斯滕), 158

Oster, Hans (汉斯·奥斯特), 233, 448  
—连几页, 452, 473, 491

Oetker, August (奥古斯特·厄特克  
尔), 132

Packebusch, Herbert (赫伯特·帕克  
布施), 63, 66, 86

Paetel, Karl O. (卡尔·O·佩特尔),  
11, 14, 499

Paget, Ronald T. (罗纳德·T·佩吉  
特), 459

Palitsch, Gerhard (格哈德·帕利奇),  
354

Pancke (潘克), 400, 401

Paanwitz Helmuth von (赫尔穆特·  
冯·潘维茨), 468

Papez, Franz von (弗朗兹·冯·巴  
本), 98—连几页, 113, 117, 254, 257

Parilli, Luigi (卢伊季·帕里利), 529

Patin, August Wilhelm (奥古斯特·  
威廉·帕廷), 38

Patzig, Conrad (康拉德·帕齐希),  
96, 103, 122, 213

Pauls=Hohenlohe (保尔斯, 即霍亨  
洛厄)

Pechel, Rudolf (鲁道夫·贝彻尔), 10

Peix (派克斯), 354

Pelz (佩尔茨), 384

Petri, Leo (莱奥·佩特里), 233, 415,  
444

Petzal, Walter (瓦尔特·贝茨尔),  
282

Pfeffer von Salomon, Franz (弗兰  
茨·普菲费尔·冯·扎洛蒙), 29, 30,  
52, 53, 57, 61, 62, 65

Pfeffer-Wildebruch, Karl (卡尔·  
普菲费尔-维尔登布鲁赫), 423

Pfeil-Burghaus, Friedrich-Niklas  
(弗里德里希-尼克拉斯·普法伊尔-  
布格豪斯), 127

Pflomm, Karl (卡尔·普夫洛姆), 192

Phillips (菲利普斯), 477

Phleps, Arthur (阿图尔·弗勒布斯),  
437, 445

Picht, Werner (维尔纳·皮希特), 427

Picot, Werner (维尔纳·皮科特), 257

Piffrader (庇弗雷德), 492

Piorkowski, Alex (亚历克斯·皮奥科  
夫斯基), 355

Pius XII (教皇庇护十二世), 38, 529

Plaas, Hartmuth (哈特穆特·普拉  
斯), 131, 474, 497

Planck, Erwin (埃尔温·普朗克),  
122

Planetta, Otto (奥托·普拉内塔),  
253, 254

Planitz, Carl von der (卡尔·冯·德·  
普拉尼茨), 127

Podbielski, Victor von (维克托·冯·  
波德比尔斯基), 127

Pohl, Oswald (奥斯瓦德·波尔), 12,  
136, 142, 148, 235, 353—连几页, 357

- 一连几页, 372—连几页, 401, 536
- Polhe (波勒), 392
- Pöhner,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珀纳), 21
- Poliaikov, Léon (莱昂·波利亚科夫), 299
- Polkes, Feivel (法韦尔·波尔克斯), 212, 309, 310, 318
- Popitz, Johannes (约翰内斯·波比茨), 316, 485—连几页, 497
- Posthumus, Nicolaas Wilhelmus (尼古拉·威廉姆斯·波斯特胡姆斯), 518, 519
- Potthast, Hedwig (黑德维格·波特哈斯特), 388
- Potthast, Helge (黑尔格·波特哈斯特), 388
- Potthast, Hilde (希尔德·波特哈斯特), 388
- Potthast, Nanette Dorothea (娜内特·多罗特娅·波特哈斯特), 388
- Potthast, Walter (瓦尔特·波特哈斯特), 388
- Prinz, Joachim (约阿希姆·普林茨), 305
- Prützmann, Hans (汉斯·普吕茨曼), 333, 385, 536
- Pustrow (普斯特罗夫), 66
- Putna, Witalij (维塔利耶·普特纳), 216
- Querner, Rudolf (鲁道夫·克韦尔纳), 335, 493
- Rabenau,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拉贝瑙), 95
- Radek, Karl (卡尔·拉狄克), 216
- Rademacher, Franz (弗兰茨·拉德马赫), 323
- Raeder, Erich (埃里希·雷德尔), 154, 159, 223
- Rajakowitsch, Erich (埃里希·拉雅科维奇), 311, 323
- Rank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朗克), 12
- Rankine, Paul Scott (保罗·斯科特·兰金), 534
- Rasch, Otto (奥托·拉施), 242, 327, 328, 333, 336, 337
- Rath, Ernst vom (恩斯特·冯·拉特), 313
- Rathenau, Walter (瓦尔特·拉特瑙), 39, 54
- Rauschmeier, Mariele (玛丽埃勒·劳施迈埃尔), 43
- Rauter, Hanns (汉斯·劳特尔), 442, 536
- Rechenbach, Horst (霍斯特·雷兴巴赫), 272
- Reader, Eggert (埃格特·雷德尔), 18, 129, 179, 180, 365, 379, 380, 399
- Reichel, Erwin (埃尔温·赖歇尔), 446
- Reichenau, Walter von (瓦尔特·冯·莱希瑙), 91—连几页, 96, 101—连几页, 115, 117, 122, 274, 282, 338
- Reichert, Wilhelm (威廉·赖歇特), 212, 309
- Reinecke, Günther (京特·赖内克), 598, 18, 294, 295, 463
- Reinefarth, Heinz (海因茨·赖内法特), 503
- Reinhard, Wilhelm (威廉·赖因哈德), 130
- Reinhardt, Georg-Hans (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 508
- Reinholz (赖因霍茨), 436
- Reinke (赖因克), 301
- Reitlinger, Gerald (吉拉德·莱特林格), 10, 13, 153, 361
- Reitzenstein,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赖岑施泰因), 127
- Reschny, Hermann (赫尔曼·雷施尼), 62, 250, 251, 253, 254
- Reynolds, Quentin (昆廷·雷诺兹), 13
- Ribbentrop, Annelies von (安内利

斯·冯·里宾特洛甫), 118, 257  
 Ribbentrop, Joachim von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16, 77, 223, 246, 247, 256—连几页, 261—连几页, 267—连几页, 317, 319, 363, 366, 451, 455, 460, 462, 478, 479, 482, 483  
 Ribbentrop, Rudolf von (鲁道夫·冯·里宾特洛甫), 257  
 Richard, Jirat (伊拉特·里夏德), 374  
 Riedweg, Franz (弗兰茨·里德韦格), 463, 475  
 Riemann, Hugo (胡戈·里曼), 151  
 Rieth, Gustav (古斯塔夫·里特), 249  
 Rintelen, Anton (安东·林特伦), 249, 251  
 Ritgen, von (冯·里特根), 212  
 Robespierre, Maximilian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 154  
 Röchling, Ernst (恩斯特·勒希林), 494  
 Rodde (罗德), 403  
 Rodenbücher, Alfred (阿尔弗雷德·罗登比歇尔), 247  
 Rödem, Max Erdmann von (马克斯·埃德曼·冯·勒德恩), 127  
 Roeder (勒德尔), 275  
 Roeder, Manfred (曼弗雷德·勒德尔), 449, 456  
 Röhm, Ernst (恩斯特·罗姆), 12, 13, 20—连几页, 40—连几页, 54, 57, 60, 65, 66, 69—连几页, 75, 78, 80, 90—连几页, 116—连几页, 134, 140, 164, 165, 169, 170, 180, 189, 193, 194, 250, 254, 267, 278, 313, 382, 385, 409, 414, 421, 423  
 Röhrbein (勒尔拜因), 71  
 Rokossowski, Konstantin (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 513  
 Rommel, Erwin (埃尔温·隆美尔), 475, 489, 490, 495  
 Roosevelt, Franklin D. (弗兰克林·D·罗斯福), 480, 524  
 Rosario, del (罗萨里奥圣母), 531

Rosenberg, Alfred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16, 33, 35, 43, 59, 60, 70, 78, 247, 255, 286, 303, 332, 342, 384—连几页, 467  
 Rosenberger, Heinrich (海因里希·罗森贝格尔), 228  
 Rosenwink, Alois (阿洛伊斯·罗森温克), 28  
 Rösler (勒斯勒), 332  
 Roßbach (罗斯巴赫), 27  
 Rössner (勒斯纳), 35  
 Rosterberg, August (奥古斯特·罗斯特尔贝格), 518  
 Roth,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罗特), 21  
 Rothe (罗特), 354  
 Rothenberger (罗滕贝格尔), 370  
 Rothfels, Hans (汉斯·罗特费尔斯), 12  
 Röhke, Heinz (海因茨·勒特克), 362, 363, 537  
 Rothschild (罗特希尔德), 311  
 Rudolfs (鲁道夫斯), 302  
 Rundstedt, Gerd von (格德·冯·伦斯德), 226, 231, 278, 279, 281, 474  
 Rust, Bernhard (伯恩哈德·卢斯特), 78  
 Rutha, Heinrich (海因里希·鲁塔), 259  
 Ruthen, Rudolf aus dem (鲁道夫·奥斯·登·鲁滕), 207  
 Sack, Carl (卡尔·沙克), 229, 231  
 Sahn, Ulrich (乌尔里希·扎姆), 179  
 Saint-Just, Antoine (安都昂·圣茹斯特), 154  
 Salomon, Ernst von (恩斯特·冯·扎洛蒙), 54—连几页, 95  
 Salomon, Franz Pfeffer von=Pfeffer von Salomon (弗兰茨·普菲费尔·冯·扎洛蒙, 即普菲费尔·冯·扎洛蒙)  
 Salpeter, Walter (瓦尔特·扎尔佩

- 特), 128
- Salvati, Haas Viktor von (汉斯·维克托·冯·扎尔菲阿蒂), 130, 474, 497
- Sandberger, Martin (马丁·赞德贝格尔), 330
- Sarre, Marie Louise (玛丽·路易泽·扎雷), 475
- Sauer, Wolfgang (沃尔夫冈·绍尔), 61
- Schacht, Hjalmar (希尔马·沙赫特), 131
- Schaefer, Emanuel (埃马努埃尔·舍费尔), 274
- Schäffer, Walter (瓦尔特·舍费尔), 176, 178
- Schaller (沙勒), 250, 251
- Schallarmeier, Luitpold (卢伊特波尔德·沙勒迈埃尔), 315
- Schallmayer, Wilhelm (威廉·沙尔迈尔), 300
- Schandruk (山德鲁克), 468
- Scharfe, Paul (保罗·沙尔费), 136, 140, 408
- Scharmhorst, Gerhard von (格尔哈德·冯·香霍斯特), 20, 90
- Schaub, Julius, (尤利乌斯·夏勃), 106, 226
- Schellenberg, Walter (瓦尔特·施伦堡), 125, 128, 135, 162, 170, 198, 199, 201, 215, 216, 220, 230, 235—连几页, 263—连几页, 327, 451—连几页, 473, 476—连几页, 481—连几页, 487, 488, 490, 497, 525—连几页, 532, 534
- Schemmel (夏梅尔), 263
- Schenk von Stauffenberg, Claus (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 122, 451, 476, 489—连几页, 496
- Schiele, Eberhard (埃贝哈德·席勒), 232
- Schiewek, Gustav (古斯塔夫·席韦克), 207
- Schilling, Heinar (海纳尔·席林), 208
- Schirach, Baldur von (巴尔杜·冯·席腊赫), 78, 314
- Schlange, Ernst (恩斯特·施兰格), 60, 61
- Schlegelberger, Franz (弗兰茨·施勒格贝格尔), 369
- Schleicher, Kurt von (库特·冯·施莱彻尔), 95, 99, 110, 116, 117
- Schleicher, Frau von Kurt (库特·冯·施莱彻尔夫人), 116, 117
- Schliebach, Helmut (赫尔穆特·施利巴赫), 188, 201
- Schloß (施洛斯), 175
- Schmauser, Heinrich (海因里希·施毛泽尔), 95, 120
- Schmid, Martina (玛蒂娜·施密特), 108
- Schmid Wilhelm Eduard (威廉·爱德华·施密特), 107, 108, 110—连几页
- Schmidhuber, Wilhelm (威廉·施密德胡伯), 448
- Schmidt Andreas (安德烈亚斯·施密特), 268, 395, 425, 445
- Schmidt, Otto (奥托·施密特), 221, 222, 224, 226, 227, 229—连几页, 383
- Schmidt, Paul (保罗·施密特), 299, 301
- Schmitt, Carl (卡尔·施密特), 178, 218
- Schmitt, Günther (京特·施密特), 316
- Schmitt, Kurt (库特·施密特), 143
- Schmitt, Ludwig (路德维希·施密特), 110
- Schmitt, Walter (瓦尔特·施密特), 148
- Schneidhuber, August (奥古斯特·施奈德休勃), 58, 62, 97, 107, 108, 111—连几页
- Scholtz-Klink, Gertrud (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 387

- Schramm, Wilhelm von (威廉·冯·施拉姆), 494, 495
- Schreck, Julius (尤利乌斯·施雷克), 24, 27—连几页, 68, 106
- Schreyer, Karl (卡尔·施赖尔), 103, 104, 111, 121
- Schröder (施罗德), 478
- Schröder, Kurt von (库特·冯·施罗德), 131—连几页, 482
- Schröter (施勒特尔), 330
- Schuckert, Johann Siegmund (约翰·西格蒙德·舒克尔特), 132
- Schukow, Grigori K. (格奥尔基·K·朱可夫), 513, 514, 529
- Schulenburg, Friedrich von der (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 95, 127
- Schulenburg, Fritz-Dietlof von der (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 447, 474, 475, 497
- Schultz (舒尔茨), 356
- Schultz, Bruno K. (布鲁诺·K·舒尔茨), 137, 138
- Schulz, Erwin (埃尔温·舒尔茨), 328, 333
- Schulz, Paul (保罗·舒尔茨), 67, 73, 118—连几页
- Schulz, Robert (罗伯特·舒尔茨), 124
- Schumann (舒曼), 493
- Schuster, Alfredo I. (阿尔弗雷多·I·舒斯特), 530
- Schwanebeck, Fritz (弗里茨·施瓦内贝克), 203
- Schwarz, Franz Xaver (弗朗兹·沙维埃·施瓦兹), 29, 30, 130, 133, 235, 291
- Schwarz van Berk, Hans (汉斯·施瓦茨·范·贝尔克), 204
- Schweder, Alfred (阿尔弗雷德·施韦德尔), 163, 172
- Schweitzer-Mjölmir, Hans (汉斯·施魏策尔-姆耶尔尼尔), 205
- Schweppenburg, Leo Geyr von =
- Geyr von Schweppeburg (莱奥·盖尔·冯·施韦彭堡, 即盖尔·冯·盖尔韦彭堡)
- Schwein von Krosigk, Lutz (卢茨·施维林·冯·克罗西克), 98, 149, 507, 532, 535
- Sebekowski, Wilhelm (威廉·西伯科夫斯基), 259
- Selchow, Bogislaw von (博吉斯拉夫·冯·泽尔肖夫), 21
- Seldte, Franz (弗朗兹·赛尔特), 532
- Selveste;, Tom (汤姆·塞尔维斯特), 535, 536
- Sembach (森巴赫), 115
- Seai, Giovanni Baptista (吉奥万尼·巴帕蒂斯塔·塞尼), 517
- Seraphim, Ernst (恩斯特·泽拉菲姆), 204
- Seraphim, Heinrich (海因里希·泽拉菲姆), 204
- Seyß-Inguart, Artur (阿图尔·赛斯-英夸特), 163, 359, 377, 399, 536
- S. Gaevernitz, Gero von (格罗·冯·S·格费尼茨), 485, 487
- Shepherd, Gordon (戈登·谢设德), 253
- Sidor, Karel (卡洛尔·西多尔), 260, 261
- Siegesmund, Herrmann (赫尔曼·西格斯蒙德), 70
- Siemens, Werner von (维尔纳·冯·西门子), 132
- Sima, Horia (霍里亚·西马), 267, 268
- Simon, Max (马克斯·西蒙), 434
- Simonson, Conrado (孔拉多·西蒙森), 487
- Sinzinger, Adolf (阿道夫·辛青格尔), 249
- Six, Franz A. (弗朗兹·A·西克斯), 128, 198, 200, 204, 207, 237, 312, 327, 328
- Skoblin, Nikolaj W. (尼古拉·W·斯科布林), 214, 216



- Skorzeny, Otto (奥托·斯科尔兹内), 504—连几页, 511
- Smith, Bradley F. (布雷德利·F·史密斯), 39
- Solf, Hanna (汉娜·索尔夫), 450
- Sommer, Hans (汉斯·佐默尔), 354, 378, 379
- Sommer, Paul (保罗·佐默尔), 155
- Sommerfeld, Martin (马丁·佐默费尔德), 99
- Sonderegger (宗德埃格尔), 449, 450
- Spalcke, Karl (卡尔·施帕尔克), 215, 217
- Spear, Albert (艾伯特·斯佩尔), 142, 375, 508
- Speidel, Hans (汉斯·斯派达尔), 489, 495
- Sprenger (施普伦格), 170, 195
- Spreti-Weilbach, Hans Joachim von (汉斯·约阿希姆·冯·施普雷蒂-魏尔巴赫), 71, 73, 111, 112
- Springer, Axel (阿克塞尔·施普林格), 255
- Springer, Hermann (赫尔曼·施普林格), 392
- Stahlecker, Walter (瓦尔特·施塔勒克), 321, 322, 327, 328, 336, 339, 340
- Stalin, Josef W. (约瑟夫·W·斯大林), 214—连几页, 261, 330, 376, 466, 468, 469, 525
- Stallforth (施托尔福思), 477, 478
- Stampf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 73
- Stapel, Wilhelm (威廉·施塔佩尔), 207
- Stauffenberg, Claus Schenk von = Schenk von Stauffenberg, Claus (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 即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
- Stein, George H. (格奥尔格·H·施泰因), 14, 413, 437
- Stein, H. J. (H·J·施泰因), 131, 132
- Steinacher (施泰纳赫), 256
- Steiner, Felix (菲立克斯·施坦因纳), 9, 96, 128, 404, 405, 411—连几页, 417, 419, 420, 437, 438, 443, 445—连几页, 466, 470, 475, 514, 531, 533, 534
- Steltzer, Theodor (特奥多尔·施特策尔), 518
- Stampfle, Bernhard (伯恩哈德·施丹佛尔), 110
- Stennes, Walter (瓦尔特·施滕内斯), 57, 62—连几页, 69, 70, 84, 85, 90, 118, 536
- Stennes, Frau von Walter (瓦尔特·施滕内斯夫人), 85
- Stepp, Walther (瓦尔特·施特普), 176
- Sternbuch (施特恩布赫), 525
- Stevens (斯蒂芬斯), 263—连几页
- Stevenson, Robert Louis (罗伯特·路易·斯蒂文生), 352
- Stölzle, Paula (保拉, 施特茨勒), 34, 35
- Strachwitz von Gross-Zauche und Camminetz, Hyazinth (许亚青特·施特拉赫维茨·冯·格罗斯-曹赫·翁德·卡米内茨), 127
- Straßburg (施特拉斯堡), 501
- Strasser, Gregor (格利戈尔·施特拉塞), 43, 45, 51, 59—连几页, 67, 88, 116, 118, 151, 172
- Strasser, Otto (奥托·施特拉塞), 60—连几页, 110, 211, 266
- Strauch, Eduard (爱德华·施特劳赫), 340, 341
- Strauß (施特劳斯), 175
- Streck (施特雷克), 22
- Streckebach, Bruno (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 156, 233, 273, 274, 327, 476
- Streicher, Julius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 43, 59, 219, 280, 299, 301—连几页, 311, 312
- Stuckart, Wilhelm (威廉·斯图卡特), 152, 365, 366, 368, 455, 476, 497

- Stülpnagel, Carl-Heinrich von (卡  
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  
275, 361, 378, 379, 381, 494
- Stülpnagel, Otto von (奥托·冯·施  
图尔纳格尔), 379
- Stuschka (施图施卡), 311
- Süß, Gustav Robert (古斯塔夫·罗  
伯特·苏斯), 151
- Szálasi, Ferenc (费伦茨·什扎拉希),  
505, 507
- Taubert, Siegfried (西格弗里德·陶  
贝特), 143, 199
- Temme, Günter (京特·特梅), 129
- Terboven, Josef (约瑟夫·特博文),  
104, 105, 377, 464
- Thedieck, Franz (弗兰茨·特迪克),  
380
- Thierack, Otto (奥托·蒂拉克), 370,  
371
- Thomas, Max (马克斯·托马斯),  
378, 379, 386
- Tirpitz, Ilse=Hassell, Ilse von (伊尔  
莎·铁比茨, 即伊尔莎·冯·哈塞尔)
- Tiso, Josef (约瑟夫·提索), 260, 261
- Tito, Josip Broz (约西普·布罗兹·  
铁托), 505
- Tobler (托布勒), 70
- Todt, Fritz (弗里茨·托特), 362, 491
- Tournelle, Guy de la (居伊·德·拉·  
图尔纳尔), 455
-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海因里  
希·冯·特莱希克), 12
- Tresckow, Henning von (海宁·冯·  
特莱斯科夫), 486
- Treuenfeld, Karl von (卡尔·冯·特  
洛伊恩费尔德), 127
- Treviranus, Gottfried (戈特弗里德·  
特雷维拉努斯), 115
- Trevor-Roper, H. R. (H·R·特雷弗-  
罗珀), 15, 16, 33, 79, 386, 507, 508,  
527
- Trummler, Hans (汉斯·特鲁姆勒),  
242, 244
- Tschernajakowski, Iwan D. (伊凡·  
D·切尔那亚科夫斯基), 513
- Tschiang Kai-Schek (蒋介石), 85
- Tschirschky, Fritz-Günther von (弗  
里茨-京特·冯·奇尔希基), 113
- Tuchatschewski, Michael N. (米哈  
伊尔·N·图哈切夫斯基), 214—连几  
页, 228
- Tüngen, von (冯·廷根), 127
- Türk (蒂尔克), 253
- Turner, Harald (哈拉尔德·图尔纳),  
334, 361, 380, 381, 398
- Uhl, Julius (尤利乌斯·乌尔), 71, 72,  
93, 109
- Ulex, Wilhelm (威廉·乌莱克斯),  
282, 382, 383
- Ulrich, Curt von (库特·冯·乌尔里  
希), 62
- Valcik (法尔希克), 458
- Vasut (瓦祖特), 349
- 't Veer (特·费尔), 442
- Veesenmayer, Edmund (埃德蒙德·  
费森迈尔), 260, 506, 507
- Veltiens (费尔蒂恩斯), 66
- Vietinghoff gen. Scheel, Heinrich  
von (海因里希·冯·菲廷霍夫, 被  
叫为谢尔), 529
- Villain, Erwin (埃尔温·菲莱因), 115
- Vogel, Erich (埃里希·福格尔), 177
- Vögler, Albert (艾伯特·伏格勒),  
131
- Vollmer (福尔默尔), 110
- Voorhoeve (福尔胡费), 442
- Waag, Carl Friedrich (卡尔·弗里  
德里希·瓦格), 158
- Wächter, Otto (奥托·韦希特尔), 248  
—连几页, 292, 398, 465, 467—连几  
页
- Wächtler, Fritz (弗里茨·韦希特勒),  
302

- Wackerle, Hilmar (希尔马尔·韦克勒), 175
- Wagener, Otto (奥托·瓦格纳), 65, 68, 77
- Wagner, Adolf (阿道夫·瓦格纳), 107, 108, 112, 114, 164, 165, 175
- Wagner, Eduard (爱德华·瓦格纳), 278, 325, 326
- Wagner, Ernst (恩斯特·瓦格纳), 29, 30, 97
- Wagner, Josef (约瑟夫·瓦格纳), 279, 288, 290
- Wagner, Richard (理查德·瓦格纳), 69, 79
- Waldeck und Pyrmont, Josias zu (约西亚斯·楚·瓦尔台克·翁德·皮尔蒙特), 112, 127, 298
- Waldmann, Franz (弗兰茨·瓦尔德曼), 417, 418
- Waldschmidt, Arnold (阿诺尔德·瓦尔德施密特), 400
- Wallenberg, Jakob (雅可布·瓦伦堡), 474, 485, 497, 498
- Wallenstein, Albrecht von (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 517
- Walther (瓦尔特), 177
- Walz, Hans (汉斯·瓦尔茨), 131
- Weber,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韦伯), 24
- Wecke, Walter (瓦尔特·韦克), 82, 84
- Wedel, Wilhelm von (威廉·冯·韦德尔), 221
- Wehner, Bernhard (伯恩哈德·魏纳), 459
- Weichs, Maximilian von (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 513
- Weingärtner, Martin (马丁·魏因格特纳), 222
- Weinrich, Karl (卡尔·魏因里希), 392
- Weiser (魏泽尔), 251
- Weiss, Manfred (曼弗雷德·魏斯), 522, 523
- Weizmann, Chaim (却姆·威兹曼), 498
- Weizsäcker, Ernst von (恩斯特·冯·威兹萨克), 129, 257, 482
- Welczek, Johannes von (约翰内斯·冯·韦尔兹克), 455
- Wenck, Walter (瓦尔特·温克), 515
- Wendzio (文德齐奥), 172
- Werner, Paul (保罗·维尔纳), 193, 333
- Wessel, Horst (霍尔斯特·威塞尔), 503
- Westberg, Alexander (亚历山大·韦斯特贝格), 518
- Westphal, Siegfried (齐格非·维斯特法尔), 101, 405
- Wetzel (韦策尔), 66
- Wewel von Büren (韦韦尔·冯·比隆), 143
- Weydenhammer, Rudolf (鲁道夫·魏登哈默尔), 248, 249, 251
- Wheeler-Bennett, John W. (约翰·W·惠勒-贝纳特), 100, 104
- Wiedemann, Fritz (弗里茨·维德曼), 224, 226, 227
- Wiedemann, Melitta (梅利塔·维德曼), 469—连几页, 475
- Wieland II = Danzeisen, Emil (维兰德·伊尔, 即埃米尔·丹蔡森)
- Wiesenthal, Simon (西蒙·维森塔尔), 13
- Wighton, Charles (查尔斯·怀顿), 153, 457, 459
- Wilhelm II. (德皇威廉二世), 99
- Wilhelm von Hessen (威廉黑森亲王), 127
- Winkelmann, Otto (奥托·温克尔曼), 504—连几页
- Winkler, Max (马克斯·温克勒尔), 286
- Wintersberger (温特尔斯贝格尔), 176
- Winzer, Paul (保罗·文策尔), 478,

- 487, 488 .
- Wirth,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维尔特), 344—连几页
- Wisliceny, Dieter (迪特尔·维斯利歇尼), 7, 361, 519, 520
- Witiska, Josef (约瑟夫·维蒂斯卡), 504
- Witting, Rolf (罗尔夫·维廷), 364
- Wittje, Kurt (库特·维特耶), 132, 134, 136, 205, 248
- Witzleben, Erwin von (埃尔温·冯·维茨勒本), 122, 486, 487
- Wlassow, Andrej A. (安德烈·A. 弗拉索夫), 468—连几页
- Woermann, Ernst (恩斯特·瓦尔曼), 257
- Wöhler, Otto (奥托·韦勒), 433
- Wolf, Karl (卡尔·沃尔夫), 56, 132, 136, 266, 315, 317, 336, 381, 401, 428, 478, 483, 485—连几页, 504, 528—连几页
- Woersch, Udo von (乌多·冯·沃伊尔施), 56, 105, 115, 277, 278
- Yenken (延肯), 484
- Ysenburg, zu (楚·伊森堡), 111, 112
- Zech, Karl (卡尔·策希), 137, 146
- Zehnter Karl (卡尔·策恩特), 70
- Zeiger, Henry A. (亨利·A·蔡格), 299
- Ziegler, Joachim (约阿希姆·齐格勒), 475
- Zimmann (青曼), 266
- Zörner (策纳), 295